

上 编

濑水钩沉：
人文溧阳的历史面孔

良渚瑰宝梅岭玉

溧阳，山清水秀，物华天宝。

物华天宝，似乎是传统的溢美之词，哪个地方不出点特产呢？

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一件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古玉琮，有文字标注“此玉产自江苏溧阳小梅岭”。眼睛为之一亮，没看错吧？隔着玻璃窗细瞧，没错！

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同样的古玉似曾相识，“溧阳小梅岭”的字样突入眼帘，让人不容置疑，这引起我极大兴趣。

小梅岭产玉吗？那是平桥与安徽省广德县交界的山区，山峰并不高，有采石场宕口数处，据说此处矿石是烧石灰的硅灰石最佳原料。我曾沿石阶登上宕口，口大如屋，山腹尽空，里面采洞纵深，洞洞相连，岩石裸露，阴森莫测。

一晃多年过去，如果说小梅岭的矿石都是美玉，那岂不是暴殄天物？无锡人、浙江人、本地人都曾承包过矿山，炸山飞石，掘洞运料，山体满目疮痍。

难道这不显山露水的山丘隐匿天然宝藏？

梅岭玉，是如何被发现的？它的发现，又有何种意义？

我国是最早发现玉和使用玉的国家。距今七八千年前，我国就有软玉玉器出现，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出土了大量的玉器文物，各大博物馆也保存了大量的玉斧、玉琮、玉璧、玉璜、玉蝉，等等。那么，这些出土玉的原料来源在哪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西方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玉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39—126）后，以和田玉为代表的昆仑软玉才传入内地，而内地不产软玉。后来学者们发现，江苏南部新石器时代软玉的显微结构，明显不同于新疆等已知产地的软玉。再说，原始社会人类活动区域有限，不可能长途贩运到这么远的地方。长江三角洲出土的“玉”源，成了一个谜。

梅岭玉的发现,得感谢一个人,他叫钟华邦。

1984年,江苏地矿局区调队在宜兴、溧阳地区找矿过程中,在溧阳南部小梅岭地区发现了一种速烧节能的陶瓷原料——透闪石岩,这引起了地质矿产部地质研究所闻广研究员的兴趣,他来信指出可能有软玉存在。

1989年,江苏地质矿产调查研究所的钟华邦和李向前、荆慧等在对小梅岭透闪石体踏勘取样过程中,果真采获到软玉矿石,后经电子探针等测试,认为属钙镁透闪石外,还有钠透闪石,与和田玉结构不同。

1992年,钟华邦将此石命名为“梅岭玉”。

梅岭玉呈白、灰白、青、浅绿白色,致密块状,质地细腻,具有一定透明度,摩氏硬度(H)为5.5—6;密度平均为2.98 mg/cm³。对梅岭玉进行切块、抛光后,玉石质地细腻,具有一定的透明度,有的具有花纹,十分美丽!

钟华邦在《江苏溧阳南部梅岭玉的发现》一文中说:“梅岭玉是内地首次发现的透闪石质软玉……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他在《古玉产地之一——溧阳梅岭》一文中写道:“江苏梅岭玉的发现,为新石器时代内地也产软玉的观点提供了例证,为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学术界的玉器原料来源之谜提供了线索,同时为在江苏南部进一步寻找软玉矿指出了方向。”

1999年7月,钟华邦与北京大学崔文元教授及研究生一行从南京至小梅岭矿区考查,在铁矿坑中发现了较好的青玉矿石,不禁高兴地叫起来。经过勘查,发现一条上窄下宽的青玉矿脉,具有开采价值。

2000年8月19日,我国台湾学者、台湾大学教授钱宪和博士和古玉学会秘书长周述蓉小姐,专程赴小梅岭石矿产地进行考察。钱教授认为,梅岭玉的发现,对古玉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梅岭玉与良渚文化有何渊源呢?

南京博物院蒋素华在《吴地早期玉器与梅岭玉矿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吴地的史前玉器包含宁镇地区的南京北阴阳营、句容城头山遗址、太湖地区吴县草鞋山、吴江梅堰、张家港东山村以及武进寺墩遗址、昆山赵陵山、吴县张陵山、常熟罗墩等。”“吴地出土这么多的玉器和梅岭玉有没有关系?”“从长江中下游吴地出土玉器示意图可以看到,以溧阳为起点,朝东北方向80 km左右是良渚的寺墩遗址,130 km左右是良渚的罗墩遗址,朝东部150 km处是吴县、吴江、昆山,这

三地出土了大量的史前和吴国王室玉器,西北 100 km 左右是句容城头山,再向西 40 km 是南京的北阴阳营遗址,即以溧阳为轴心,整个方圆不到 150 km 范围,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吴地早期玉器的玉材很可能来源于梅岭玉矿。”

故宫博物院杨伯达在《丁沙地遗址出土“玉角”考》一文中言:“(闻广)他确证了溧阳小梅岭透闪石软玉已经为南京浦口营盘山崧泽文化及江南不少崧泽、良渚文化族群玉人集采,用以磨治玉器。已确定不少的良渚文化族群用玉取自溧阳小梅岭。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来之不易的研究成果。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认识成矿条件而找到软玉的实例。”“小梅岭透闪石玉矿点正处于瑶琨板块之间,很可能是良渚文化玉料主产地之一,所产之玉堪当瑶琨。”

南京博物院溧阳籍研究员王少华,多年对梅岭玉探索研究,他在《“良渚玉”产地在溧阳》一文中言:“有一代历史文化地位的良渚玉产地,近十几年来已为众多学者所重视。笔者十多年来的考察认定,良渚文化早期的玉,也产于溧阳,并且品种多样,有五彩玉、黑(玄、墨)玉、白玉,并且还有制玉场。可贵的,溧阳更有金刚砂石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地之‘石’,更利攻玉。”

梅岭玉一经发现,钟华邦就于 2000 年在《宝石和宝石学杂志》上发表《梅岭玉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一文,引起了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上海同济大学、台湾大学等院校专家学者的兴趣。《扬子晚报》、《江苏经济报》纷纷予以报道。2011 年 5 月,天津《每日新报》派记者到现场采访,用两个整版予以介绍,并发布在互联网上,引起巨大反响。文章称:“良渚文化的玉源终于找到了,来自北京、南京、宝岛台湾的学者纷纷称赞这一发现为古玉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汪遵国在《论良渚文化玉器》一文中指出:“1982 年,江苏省地质矿产局区域调查队钟华邦工程师在溧阳南部天目山余脉海拔 230 米的小梅岭发现了透闪石软玉矿床……这样,良渚文化玉料的来源,可以确定是就地取材,而不是远地转运。玉料来源这一重要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刘晶、崔文元在《中国三个产地的软玉研究》一文中提到:“溧阳软玉和辽宁岫岩软玉的发现表明,中原和东北地区的古玉原料很可能是本地的。通过对比,综合分析,三个产地软玉的主要矿物组成均是特定地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玉石原料。”

为撰写本文，笔者特地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博物院学习了解。令人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良渚文化遗址反山、瑶山和莫角山等地，出土的大量玉琮、玉璧、玉璜等，没有一件与梅岭玉的青、青白、墨绿、白等鲜明特色相符，这是为什么呢？后又赴南京博物院，里面展呈了大量良渚时期的古玉，偶见有类似梅岭玉的青、墨玉器，但大多为“象牙白”、“鸡骨白”，让人疑窦丛生：梅岭玉难道变色了吗？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万俐在《良渚文化玉器的雕琢工艺及发白现象》一文中说：“在高碳合金工具尚未出现之前，硬度达摩氏 4—6 度的玉器是如何加工雕刻的呢？这是广大玉器爱好者最为关心的话题，也是令考古学者感到棘手的学术悬案。”“吴京山先生从事玉器雕琢工艺多年，他从制作、雕刻的角度，得出了良渚文化玉器雕琢工艺使用的是氟化物软玉法，其发白的原因也和氟化物有关的论点。”万俐认为“良渚文化玉料的来源可以确定是就地取材（梅岭玉）”。于是他对 2000 年 10 月在小梅岭采集的玉，用氢氟酸做了浸泡处理。16 小时后，原致密坚硬的玉表面发白、粉状，其受腐蚀面深度约 1 mm；96 小时后，表面发白处有龟裂状，疏松的粉状部分用手触摸即掉。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汪遵国对草鞋山、寺墩、张陵山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风化玉器，进行表层与内层的观察，得出了“外表受沁变白，内芯晶莹碧绿”的结论，终于一语道出梅岭古玉变色的“天机”！万俐认为：“良渚文化的古人在琢玉工艺中，发明了软化玉石后再进行雕刻的技术。在实施软化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对玉进行了人为的腐蚀，这是造成良渚文化玉器风化发白的主要因素。”

梅岭玉，良渚文化的瑰宝，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有一个事实让人担忧：与和田玉相比，梅岭玉像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美女，又有几人能亲泽她的芳容和肌肤？

《江苏经济报》2011 年 3 月 12 日刊有《溧阳梅岭玉何时能够开发利用》一文，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4 月 2 日，该报又登载《溧阳梅岭玉期待品牌开发》一文，论述对梅岭玉的忧虑和期许：“已有数千年历史的梅岭玉如今是否还能开采，是一些人的疑虑。”“梅岭玉既然能够开发利用，却为何一直藏在深山无人知？江苏省地质矿产调查院高级工程师吴克难说，关键在于缺乏产业的发展规划。”“虽然溧阳梅岭玉的历史早于和田玉，且与其具有基本相同的矿物构成，但市场影响却远逊于和田玉。”“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赵启斌认为，梅岭玉的开发必

须突出其文化内涵,与良渚文化品牌紧密联系推广,决不能单纯地卖资源。”

文章句句在理,话句震聋发聩。对于梅岭玉的开发,笔者认为有两难:一难在于湮没无闻,宝玉当石料卖,不当回事,弃之深山,隐埋深渊。二难在于炒作哄抬,奇货可居,囤积于库,滥采狂炸,焚琴煮鹤,竭泽而渔。黄龙玉、和田玉即是前车之鉴!

左难右难之间,梅岭玉何去何从?

据说,小梅岭之玉矿经多年滥采,已深入地下近百米的深渊,较难开采。又听说,安徽广德界苗西已在开采梅岭玉,因为同是一座山,矿脉相延。还听说,不少人开始囤积梅岭玉,总期望有朝一日会价值翻倍,眼下已卖到500元一市斤了……

喜爱梅岭玉。喜爱她那绿莹青白的色泽,古朴厚重,温润柔和。虽不及羊脂白玉的通透油滑,不及辽宁岫玉的多姿多彩,但她是本地先民用智慧和汗水开凿出的宝玉,是本地先民留给后人的文化符号和宝贵遗产!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宝贝珍视她!

最近,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江苏兴化、东台的蒋庄遗址名列其中。该遗址是长江以北首次发现的大型良渚文化聚落,也首次发现了随葬的琮、璧、环、镯等玉质礼器。这个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的发现,突破了以往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而细观墓葬的玉质礼器,其材质和江南出土之物如出一辙,具有非常鲜明的梅岭玉特征。

梅岭玉,你到底还能给人们多大的惊喜呢?

让我用钟华邦先生的诗作为本文的结语吧:“寻根问祖人憔悴,迷雾重重千万年。人类起源在何处?近在长江三角洲。”

寻找“焦尾琴”

——蔡邕在溧阳遗迹辨踪

古琴，国之乐器也。

“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神农伏羲、炎黄尧舜，一个个先帝圣人、大贤大德离开我们千年百年，渐行渐远，但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却通过一张张琴谱、一段段佳话，留给我们不可多得的历史遗存和精神财富。

“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在物欲横流的滚滚红尘之中，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一下悠然意远、恬逸淡泊的琴声，寻找一下幽雅邈远、孤高岑寂的意境。

是的，我们一直在寻找，在找一张琴。一种直觉和责任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寻找。

早期的琴，器物不存。我们仅从文献中得知其名：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蔡邕的“焦尾”，世称中国古代四大名琴。四大名琴，都有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都有一个与故事有关的琴名。与前三张琴相比，“焦尾”琴名直白无文，而蔡邕和焦尾琴的故事几乎妇孺皆知。但平心而论，我们对蔡邕和焦尾古琴到底知道多少？当年蔡邕“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到底去了哪里？在吴的十二年里蔡邕和全家定居在什么地方？历史上真有过焦尾琴吗？吴人烧桐、蔡邕火中取木裁为琴的故事可信吗？焦尾琴的诞生地又在哪里？

“焦尾琴声远，梓桐木尤香”。带着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多年来钩沉史海，实地勘问，民间采风，山中觅桐，寻找那一张千古名琴——焦尾。

一、蔡邕其人其事

蔡邕(132—192)，字伯喈，东汉陈留圉县(今河南省杞县)人，是我国历史上

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音乐家、书法家。

蔡邕生性笃孝，自小博学多才，喜辞章、数学、天文之学，“覃恩典籍，韞读六经”，熟知两汉史事，正定六经文字，自书于碑，世称《熹平石经》，为古今隶书之典范。他创“飞白体”，写《笔论》、《九势》，后人称其为“书法之开山鼻祖”。

作为旷世奇才，蔡邕却受才名之累，他本来立志于学，无意仕进，却屡被朝廷征召。灵帝时校书于东观，他多次上疏，直陈时事，忧国心切，不避祸害，由此遭群奸忌恨，被诬入狱，流放朔方。一路奸臣谋杀，幸因其忠义得免。后因他将史书《十意》献于朝，逢大赦还原郡，不意路上又生波折，因他得罪五原太守王智，被奏谤讪朝廷，蔡邕自忖难避迫害，乃流亡吴会十二年之久。

中平六年(189)，灵帝死，董卓久闻蔡邕声名，强征他进京。高压之下，蔡邕勉受任命，后拜为左中郎将。董卓亡，邕在王允座列，言及卓而叹，形于色，允大怒，不顾众人求情，治邕于死罪。可怜一代通才，只因忠孝仁义，在六十岁时冤死狱中。

因才获名，因名获罪。综观蔡邕之一生，可赞可叹，可歌可泣，可喜可悲！

二、蔡邕与古琴

蔡邕通音律，善操琴，远近闻名。

桓帝时，宦官徐璜等人听说蔡邕的才能，就向天子推荐，让陈留太守催促他到朝廷鼓琴。蔡邕不得已上路，但到了半道的偃师，就称病而归。沿途所见，激起他对当朝的不满，写下了《述行赋》，表达对统治者荒淫奢侈、百姓民不聊生的愤慨：“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这种“心愤此事”，表明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文人。回到家中，邕“闲居玩古，不交当世”，表现出不与显贵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从《后汉书》的这段记载，我们得知：蔡邕在当时已是一个闻名朝野的琴家。

蔡邕对琴界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琴赋》中的十首作品，取材于民间歌曲；他的《琴操》中的五十首琴曲，都以历史人物故事为主题，反映了汉代琴坛的斑斓色彩。他在《琴赋》中写道：

仲尼思归，鹿鸣三章。

梁甫悲吟，周公越裳。
青雀西飞，别鹤东翔。
饮马长城，楚曲明光。
楚姬遗叹，鸡鸣高桑。
走兽率舞，飞鸟下翔。
感激弦歌，一低一昂。

前十句中，每句都提出一首琴歌的名字，大多是汉代流行的民间歌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反映蔡邕作为一个有名的琴家，十分注意吸取民间音乐的营养。这些早期的琴曲作品，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详尽的古代资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像《饮马长城窟》、《聂政刺韩王曲》、《别鹤操》等，都是通过生动的民间传说，搜集整理后改编成曲，“琴不平则鸣”，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

蔡邕对琴的研究颇为精湛透彻。他在《论琴》中对斫琴有精到的看法：“伏羲削桐为琴，面圆法天，底平象地。龙池八寸，通八风；凤池四寸，象四气。”他对奏琴也有深刻感悟：“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感激弦歌，一低一昂。”从形式和内容上，表达了对演奏的独特见解。

《后汉书·蔡邕传》上有这么一段描述：“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怩然。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奏琴者细微的心理反应，蔡邕竟能从琴音中听出杀气，这种对音律的了解精熟的程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音乐天赋已臻圆通。蔡邕不仅是“书祖”，还是“琴圣”。

蔡邕对琴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是蔡邕的同乡，从小就随邕习琴。而瑀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都是“竹林七贤”中以琴见长者，深受蔡邕之影响。蔡邕之女琰，也是著名的琴家，她继承了父亲的音律

天赋，从小就对琴熟知敏感。邕夜间操琴，断一弦，文姬说是第二根弦断了；邕故意又断一根，文姬说是第四弦，果然无差。蔡琰后为胡人所掳，“文姬归汉”的故事家喻户晓，而《胡笳十八拍》和《大胡笳》、《小胡笳》这些和文姬有关的琴曲，流传了千百年。博学多才，妙于音律，这是蔡氏父女共有的品操，为中国文学、史学、音乐史增添了绚丽夺目的风采！

三、蔡邕与溧阳

溧阳，位于江苏省西南部，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东濒太湖，西望金陵，南绵皖山，北汲洮水。

溧阳历史悠久。商代末，泰伯在蕃离（今无锡）筑城定居，溧阳地属勾吴。春秋时，吴国始建，溧阳即属吴。战国初，越灭吴，溧阳地改属会稽郡。秦始皇统一中国，全国分为三十六郡，改会稽郡为鄞郡，溧阳始建县。西汉初，溧阳仍沿属秦鄞郡。武帝时废鄞郡置丹阳郡，置永平县，县治在今溧阳天目湖镇古县村。从古建制来看，溧阳地属吴越、吴楚交界之地，虽间或属越属楚，但多以吴地为称。李白诗《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写道：“长吁相劝勉，何事来吴关？闻有贞义女，振穷溧水湾”。在《宴别张旭于溧阳酒楼》（即《猛虎行》）中又有“吴歌白纻飞梁尘”之句。五代时南唐诗人许坚的“地枕吴溪与越峰”诗句，也许是对溧阳属地的确切诠释。

蔡邕，一个落难的河南才子；溧阳，一个江南的鱼米之乡。他们之间有什么渊源瓜葛呢？

关于蔡邕与乐器间的故事，史料上有两则记载。《搜神记》载：“蔡邕尝至柯亭，以竹为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为笛，发声嘹亮。一云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东间第十六竹椽可为笛，取用，果有异音。”《文选》伏韬《长笛赋序》云：“蔡邕避难江南，宿柯亭之馆，取椽为笛……柯桥之观，以竹为椽，邕取为笛，其声独绝。”柯桥取竹为笛的故事，地点表述得很清楚。

《后汉书》和《搜神记》还记录了著名的焦尾琴的故事：“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这段记叙里没有讲明地点，仅言“吴人”，那“焦尾”当产吴地。那么这里的“吴地”又为何地？

《后汉书》中载：“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吴会，秦置会稽郡，汉初分会稽为吴、会两郡，合称“吴会”。相当于今天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以东。太山羊氏，指太山郡人羊陟，与蔡邕家有姻亲关系。史书的“在吴”记之不详，那么这十二年蔡邕到底去了哪里？

蔡邕隐居到了溧阳。

溧阳有座高邃山(后称盘白山、观山)，峰峦独耸，钟灵毓秀，“孤峰犹自入云间”；山脚下是清波盈盈、蒹葭苍苍的黄山湖，“碧流尽处见山山”。在这秀山丽水之间，蔡邕带着全家找到了理想的家园，定居下来，生活下来，让一颗忐忑漂泊的心，找到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地方。遥想当年，蔡邕拖家带口，挟中原的仆仆风尘，走过江南的山山水水，他最后选择了溧阳，他与这片山水有缘。

让我们来看一看蔡邕在吴地的“第二故乡”吧。高邃山对面有山名前山，两山之间的黄山湖中，有一小岛，“一拳宛在水中央，万顷湖波浸渺茫”。山脚下有个小山村叫陆家边，临水傍湖，林荫蓊郁，鸡犬桑麻，亦耕亦渔，真个是桃花源里人家。山麓下的幽居前，是一条曲溪，溪通湖水，泛舟即达咫尺小岛。蔡邕在岛上筑台读书，抚琴习字，真个是世外神仙。后来，岛因人而名，世称“读书台”。

这不是合理的想象。在官史对蔡邕的记载不甚详尽留下遗憾之时，地方志对“蔡邕读书台”的记录却是代代相传，言之凿凿，一脉相承。

我们现在手头找到的关于“蔡邕读书台”最早的史料，是宋朝景定年的《建康志》：“蔡邕读书台，在溧阳县太虚观东北(旧志)。考证：吴《顾雍传》云：邕因内宠恶之，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积十二年，在吴。《抱朴子》云：蔡伯喈到江东，得《论衡》，中国诸儒觉其论更进，嫌得异书，求其帐中，果得之。则伯喈读书于此，理或有是。”请注意这里的“旧志”一说，证明在此之前的史书中就有关于蔡邕读书台的记载了。元代至正年间的《金陵新志》，也有和宋景定《建康志》一样的读书台记录，只不过“溧阳县”改为“溧阳州”，因为当时溧阳的建制升为“州”，金陵和建康，均为今南京之古称，溧阳一直隶属于此，到清朝由“三朝元老”、溧阳宰相史贻直奏请，始隶属镇江府。

溧阳地方志的编撰，已知始于南宋乾道年间，但志已不存。明代弘治年间知县符观纂辑了《溧阳县志》，上面清晰地记录着：“读书台，在县西三十里，太虚观

东北。”其内容与《建康志》、《金陵新志》完全一致。清朝康熙《溧阳县志》记载：“蔡邕读书堂在县西四十里读书台上，在泰虚观东北，今蔡氏堂独存。”清嘉庆志由西泠八家之一的知县陈鸿寿主修，其内容较为翔实：“蔡邕读书台，在泰虚观东北，今废。”在转引了《建康志》考证后，嘉庆志又考证道：“今案通志古迹，门有尔察：蔡邕读书台一在溧水县太虚观东北，一在溧阳县西南四十里泰虚观，何伯喈读书处之多？又何以俱在太虚观耶？皆因溧阳、溧水旧本一邑故，两地传闻未免叠出耳。”这里对史书上的记载和人们的疑惑做了合理的解释，因为从唐高祖武德三年（620），溧阳、溧水始分为两县。清光绪《溧阳续志》载：“读书台，后汉《蔡邕传》载其在吴十二年，相传曾读书于此，今废。”

自宋元明清，溧阳蔡邕读书台的史记一线贯通，绵绵未断。从县志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得知，高邃山下的泰虚观前，蔡邕曾经在湖心小岛上筑台读书，留下了古邑胜迹“读书台”。而读书台上有读书堂，康熙年间尚存，嘉庆时废。

南宋哲学家、永康学派代表、鉴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陈亮（1148—1194），曾有《蔡邕读书台》二诗：“曲曲清溪映白沙，望中几树桃李花。世情不到花开处，鸡犬桑麻三两家。”“一拳宛在水中央，万顷湖波浸渺茫。往迹至今惟石户，樵人指点说中郎。”

明代任启运曾作《重九游梅山、蔡台、登盘白绝顶赋略》：“……友朋指予以书台兮，曰维有汉之蔡邕。嗟尔才之洵美兮，常识夫爨下之焦桐。岂我躬之不阅兮，差离兰蕙于蒿蓬。何三府之敷历兮，迺思改乎此度也。涕国狼而自石殒兮，匪吾儒之步也。望高山而仰止兮，曰盘白之葱陇……”在这首长赋中，我们读到了关于“焦桐”的信息。

清光绪年间浙江嘉兴知县、本县人宋璜写《蔡邕读书台》云：“中郎旧迹倚崔嵬，东汉遗碑事可猜。蔓草千年空谷遍，牧童歌上读书台。”

从以上历代文人歌咏读书台的诗赋来看，陈亮具体描写了蔡邕读书台的环境，任启运歌颂了蔡邕的高风亮节，提到了“慧眼识焦桐”的典故，而宋璜的诗中透露出从东汉时就有碑文记载蔡邕在此生活学习过，虽石碑字迹模糊，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可猜出，这“东汉遗碑”在光绪时尚存。

综上所述，无论是史志的记载还是文人的诗赋，都无可争议地揭示了一段史实：蔡邕逃亡到吴地，一直隐居在溧阳。他在这里筑台读书，抚琴习字，度过了十

二年时光。历史的潮水，虽然淹没了岁月的印痕，但文字铸成的蔡中郎的足迹，一路清晰可鉴。

四、蔡邕遗迹今安在

在溧阳至广德 239 省道大溪段，高邃山（观山）迎面秀立，左侧平畴田野里，一座孤峰遗世独耸。山不在高，有圣则名，这就是蔡邕读书台。

黄山湖在光绪年间尚碧波万顷，后来湖面缩小，随着大溪水库的修建，古湖早变成了良田。读书台上树木葱郁，草棘茂盛，约有六七十亩面积，山头松竹间立，杂树生花，蔓草没径，但仍有一块平地，竹丛中有房基墙脚遗存，这应该就是“读书堂”的遗址了。西边山脚处，有“溧阳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石。

读书台的南面，一箭之遥是泰虚观所在的陆家边村，北边一箭之遥是前山脚下的中埏前村、下马滩村。陆家边村向东，观山北麓，在原百货公司仓库墙边，有一块平地，翠竹青青，杂草丛生。拨开草蔓，有房屋的墙基清晰可见，村民都知道：这就是蔡伯喈的旧居之地！问其来由，都说是听上代老人讲的。附近村上的农民，随便问上一个，都能讲出一段关于蔡伯喈的故事。他们都非常肯定地讲：蔡伯喈父亲的坟就葬在前山上，蔡父睡的是铁棺材，已沉到山中融为一体了。

南宋陆游曾有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在读书台附近的大溪、新昌一带，流传着许多关于蔡邕的民间故事。

蔡邕携全家避乱隐居溧阳，山村里就经常响起了琅琅书声和琤琤琴声。村民们知道伯喈先生有学问，书法又好，于是逢有节日嫁娶，都请他写字。蔡邕对村民们的请求是有求必应，贴纸赔墨，而对有钱人则不然。一位有钱的财主慕邕之才名，前来求字，伯喈顾自操琴，不爱搭理。恰在此时，文姬前来告知家中已无米断炊，财主马上搭话，只要蔡中郎肯赐墨宝，米马上送到。蔡邕眉头一皱，看看文姬，无奈地摇摇头，只得提笔给人写了副对联，以解无米之困。财主欢天喜地拿字走了，回家把联挂在中堂。但没过几天，那副对联只剩下两张白纸，字没了！村民们都讲，蔡伯喈的字是活的，夜里都化作龙凤飞走了。

文姬到溧阳，方七岁，在高邃山脚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一天，父女正在读书奏琴，蓦然听到邻居灶膛中大段的柴火燃烧后发出清脆的噼啪声，蔡邕赶紧对

女儿说：“这是块做琴的好料啊！烧掉太可惜，我们赶紧把它救出来吧！”两人急忙跑到正在做饭的邻居家，求到了那段烧着了的桐树，用水浇灭，搬到家中，制成了一端已烧焦的古琴。文姬十六岁时许配给卫仲道，出嫁时村民们都来道喜。嫁女儿前，蔡邕问女儿要什么做嫁妆，文姬说：“就把这张焦尾琴让女儿带去吧！弹起它我就会想到爹娘，想到溧阳。”

“往迹至今惟石户，樵人指点说中郎”。丰富的民间故事，口口相传，代代相袭，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蔡邕在溧阳生活的点点滴滴。

关于蔡邕在各地的遗迹，由于岁月久远已很难寻觅。笔者曾专程前去河南杞县寻访蔡邕故居，但其围镇也仅剩一条“伯喈巷”和一口古井。清朝一位杞县诗人曾有一诗：“中郎故里满蒿莱，云到围城郁不开。说奏若能陈七事，荣名终悔历三台。私恩漫感王公座，盖代唯怜汉史才。牢落一生忠孝意，至今遗址尚堪哀。”

蔡邕死后葬在了哪里？据《广舆记》载：“武进互村有蔡邕墓。”《咸淳毗陵志》也记载：“蔡伯喈墓，在尚宜乡互村，大冢岿然。按《本传》，邕尝在吴中积十二年，意歿后葬此尔。”互村即今武进东安镇夏庄西安村，原有一大墩，在“文革”时平整土地挖开后，发现是一座青砖砌成的空坟，有人猜测为疑冢。而蔡邕真正的埋骨之地，应该在高邃山、前山附近，只是有待发现。唐诗人温庭筠曾有诗《蔡中郎坟》：“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

五、蔡邕与焦尾琴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丝竹之音，推琴为首。古乐相传至今，其已变而未尽变者，独此一种。”古琴古乐，千百年来作为文人雅士寄情抒怀的器具，作为文化传承发扬的载体，作为“代代相传，变而未变，独此一种”的音乐遗存，彰显了一种不可多得的民族精神，这也是它能最早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乐器的重要原因。

在我们通过史料诗赋和民间故事，探寻到了蔡邕隐居溧阳的行踪遗迹后，疑惑还是存在：吴人燃薪、木裂声传、邕取焦桐斫琴的故事可信吗？它是不是人们的杜撰？溧阳有无斫琴的良材？焦尾琴产生于溧阳的说法能成立吗？焦尾琴后来又去了哪里？

在探究焦尾琴产地的同时,我想有必要读读蔡邕隐居之地的环境和他的创作。

嵇康在《琴赞》中云:“懿吾雅器,载璞灵山;体具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温乎其仁,玉润外鲜。”这里较好地阐述了雅器与自然的关系。明代溧阳诗人彭儒在《登盘白山》一诗中写道:“胜地多灵气,高人尽古颜。尘心应自远,日暮不思还。”蔡邕隐居之地,山清水秀,背依高邃山,门临黄山湖,不远处的中江是古长江由芜湖流经震泽(太湖)的入海通道,这也是“亡命江海”的由来。他在此期间,创作了著名的《蔡氏五弄》、《游春》、《淶水》、《幽居》、《坐愁》、《秋思》。宋人朱长文说:“伯喈所以寓其哀思者,盖在此五曲,特假物以名之耳。”此言甚是贴切。

蔡邕在《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他又在书法《九势》中写道:“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由此可见,他是主张尊重自然、效法自然、回归自然之人,书如此,琴亦然。高邃山的春天百花盛开,游春踏春归来衣袖带香。黄山湖的绿水映翠叠波,江南的婉柔无言地绵延。山麓的茅屋掩映在蓊郁林荫之中,鸟鸣蝉噪里显得十分幽静。划一叶扁舟读书台上坐一坐,忧国忧民的愁绪像这湖水,无尽无头。转眼又到了秋季,满目的落叶拍打着柴门竹篱,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是游子永远的思念。我们姑且不去计较“五弄”的真伪,单就这曲名,就留给了我们无尽的遐想。《神奇秘谱》中的《秋月照茅亭》和《山中思友人》,也同样显现出蔡邕当时的心情和心境,他在溧阳这片山水中,找到了拥抱自然的依托。

言归正传,在溧阳的自然山水中,到底有没有斫琴的桐木呢?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有!从古至今都有!

明朝溧阳诗人任启运曾赞蔡邕“嗟尔才之洵美兮,常识夫爨下之焦桐”,指出了“蔡台”附近“出焦桐”的史实,而在观山、前山的林间,生长着成片的青桐树。青桐,质地疏松而韧软,不宜做房料和打家具,村民们都多伐来烧火做饭。读书台附近林木茂盛,树种很多,榉、榆、松、槐都有,而千百年来村民们传下一个很自然的习惯:成段地烧青桐。

溧阳建设局原副局长夏尧楠,今年已是八十高龄,他说在五十年代初作为农林干部,在资源调查中他走遍了溧阳的大小山村。在读书台周围的陆家边、埝前村、下马滩村,夏尧楠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村民们砍来村前屋后的粗大青桐树,

锯成段丢在灶膛内当柴烧，常常有裂帛炸膛之声，联想到当年蔡邕取焦桐制琴的往事，他认为“焦尾琴”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信口胡编，乡民们延续千年的生活习惯，却是“焦尾故里”在溧阳的最好佐证。后来，由于“大炼钢铁”的滥伐和人口稠密的肆砍，粗壮的青桐林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2009年4月的阳春，中国民族器乐学会常务副会长毕可炜先生和舒云女士，专程前来溧阳考察蔡邕读书台遗址。在查看了相关史料和拜谒了读书台后，他们还到周围山村采风，向村民询问蔡伯喈的往事。在寻访了蔡邕“幽居”遗址后，大家又在高邃山下寻找青桐。同行的中国古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制琴委员会专家委员、扬州制琴名师张玉新，在山坡上发现了几棵青桐树，虽只有拇指粗，但大家已是十分激动，这从实物上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溧阳自古至今一直产有制琴良木——桐树。后来，专家组一行又绕到原黄山湖对岸的下马滩村，在前山脚下发现了整整一大片青桐树林！山上应该还有更大更粗的桐树。“找到了！找到了！”大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毕可炜副会长说：“经过查阅史书和实地考察，我们初步可以肯定地说：溧阳就是当年蔡邕避难江南的隐居之地，焦尾琴产生在溧阳之说，基本成立！这是中国古琴界的一大发现，也是一件喜事！”舒云副会长说：“为了寻找焦尾琴，我两次来到溧阳。溧阳市的领导和专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为我们提供了这么翔实的历史资料，令人感动。而今天我们在实地又找到了人证和物证，令人激动！发现焦尾琴故里这件事，怎么说都是一件大事！值得琴界重视。蔡邕读书台是一个圣地，每个琴人都应该来朝拜！每位有心于琴文化的人，都应该为此尽心尽力做点事情！”

专家的肯定，似乎在说明我们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道，合天地之和焉”。汉代桓谭的言论，阐述了琴的玄秘。琴，似乎是我们与古人对话、同自然相契的工具。我们找到焦尾琴了吗？关于它的下落，一说作为蔡琰的嫁妆，失落兵乱；一说为齐明帝（494—497）御府珍藏，每隔五天才拿出来让王仲雄弹奏给皇帝听，后来据传又在昆山出现过。我们今天所见，不过是历代名琴图录上的一张画样。其实，古琴下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会聆听远古的清音，重要的是去领悟民族精神遗产的底蕴，重要的是去寻找一段失落的往事！

寻找，也是一种价值的存在。

欧冶铸剑石屋山

溧阳西南的社渚镇，与广德交界处，有石屋山。石屋不高，却很有名，正合“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之句。那么，石屋因何仙而闻名？

让我们先来读下乾隆举人彭光斗的《石屋山观铸剑坑》一诗：“石屋山凝古铁精，森森壁立攒刀兵。樵子向我指遗穴，云是欧冶铸剑坑。欧冶去今三千年，图经茫昧犹传名。想当鼓鞴发薨时，太乙下瞰雷霆鎬。古人专精攻一技，气焰直欲通神明。世无风胡薛烛眼真赏，嗟尔何处鸣不平？兹山非丰狱，亦复非延平？每愁夜静风雨急，涧泉呜咽流金身。欧冶子，何英灵！”

彭诗中提及的在石屋山上铸剑的欧冶子，确实是位人物。

欧阳子，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人，是我国古代铸剑的鼻祖。他从母舅那里学会了冶金技术，冶铸出了第一把铁剑“龙渊”，开创了冷兵器之先河。《越绝书》记载，楚王令风胡子赴越，找欧冶子制造宝剑。欧冶子走遍江南名山大川，寻觅能够出铁英、寒泉和亮石的地方。他经两年之久，为楚昭王铸剑三把，名为：龙渊、泰阿、工布。三剑柔若腰带，刚可斩铁。后又经三年，为越王勾践铸世上五大名剑：湛卢、钜阙、胜邪、鱼肠、纯钧。名列第一的湛卢，发及锋而断，铁近刃如泥，举世无可匹者。风胡、薛烛，都为当年相剑士。越王勾践请薛烛相剑“纯钧”，越王说：“有市之乡二、骏马千疋、千户之都二作交易，可否？”薛烛答：“不可！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犹不能得此一物！”可见欧冶所铸之剑的珍贵，价可敌国也！

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完好如新，锋刃锐利，剑身布满菱形花纹，有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铸造工艺非常高超，说明欧冶子铸剑并非神话。

本邑康熙进士魏麟征曾有《石屋古冶》诗：“空山留古云，郁郁龙文光。谁令欧冶子，成此百炼钢。爪发投洪炉，紫雾攢飞芒。结为双芙蓉，秋水涵清霜。不

得君子佩，风尘宁自藏。”

据说欧冶子在石屋铸剑，天寒冻住精铁，他剪下自己的头发和手指投入炉中，双剑始炼成。宝剑铸成，如得不到佩带的君子，宁愿自藏风尘，不为小人所用。

溧阳状元马世俊之子马宥，也有《石屋古冶》诗：“野望多奇峰，峰形平似屋。屋角双青插远空，屋中冷焰何潜伏？忆昔阖闾真英豪，偶来望气一凭高。石骨嶙峋势欲裂，光芒万丈不敢韬。咄咄大呼欧冶子，齐金楚铁扶舆美。几年锻炼几年成，壮心岂惜截发指。发硎罔两争遁形，炎烟赫赫声铮铮。衔英铭玉曜秋水，莲花时傍雪花明。盘绕滩头忽飞去，蛟龙变化云雷惊。呜呼！干将莫邪孰仿佛，雌雄未许拘神物。阖闾已逝剑亦往，青山不改当年色。狂歌醉佩倚长天，藏锋且自安吾拙。”

峰平如屋的山丘，却是藏龙卧虎之地。吴王阖闾一眼就相中这块宝地，大呼小叫着让欧冶子前来铸剑。经削发截指几年锻炼，干将莫邪雌雄两剑化作蛟龙驾云飞去。吴王已逝，宝剑也往，只有青山依旧，岁岁年年。

清顺治举人、本县沈浚有诗《石屋山》：“金精已飞去，空余石屋山。云烟满目中，霜气寂以阑。寒林交悲风，狐兔相往还。相见古烈士，慷慨临吴关。吴关转茫茫，回顾升长峦。屹立亘千载，形势频改观。高岑宿南斗，幽壑栖双丸。嵯峨蕴灵异，谁能共追攀。我思郁以纡，陟岵兴长叹。神物合变化，隐约光芒寒。”

溧阳狄玘女史有《石屋山寻欧冶旧迹》一诗：“古木苍苍碧水流，犹传名剑响千秋。藏将玉匣惊风雨，化去神光作斗牛。术点蛟龙留楚泽，气吞泉石压吴邱。只今欧冶归何处？十里春深杜宇愁！”诗写得豪迈大气，褪尽脂粉，不像出于巾钗之手。欧冶已去，杜宇啼愁，名剑化龙，铸穴空留，怎一个愁字了得？

石屋山，前几年炸山崩石，飞沙迷眼，焚琴煮鹤，竭泽而渔。毁古人迹，吃子孙饭，罪过！近年劣行渐止，所幸欧冶子铸剑坑尚在。站在残缺的山岩，想起邑人宋镇的《欧冶子铸剑石屋山》来：“龙泉化后草如烟，片石寒潭碧落天。何处更寻欧冶迹，斗边紫气二千年。”

冶山古寺有唐音

冶山，冶炼之山，据传也是欧冶子铸剑之地，可见“剑祖”在溧阳觅矿锻金，非是一处。

陈名夏的《石云居集》中，有一篇《冶山疏》，备述其详：

欧冶子铸剑于平陵石屋，俗传冶山者是已。冶山旧檀梵宇颇宏丽，不识始何代。今所藏云磬犹唐式，或唐兴有此名？然不可考矣。冶山当九龙盘折而下，象岩狮岭，邃深陡屈，仙灵释子之所宅也。山多奇树十百本，爪牙阴森，而飞动如张盖执戈状。人至其地，罔不清肃，愿弃人间从之老焉！冶山居僧玄同者，又将辟薪除道，而更张大之，令国家太平久矣。声名文物，江左当盛，处则有甲第歌钟之美，出则有轮辕骑从之乐，数百年来民至老死不识兵火。问昔时按剑之雄心、争盟之劲智，费值百万，冶铸神物，左干将右莫邪，陆刺虎豹，水断蛟龙，侈哉！今皆已莽荡杳冥，星移物换，不可复见矣！岂非明圣御历四海同道，长吏柔安，百姓沐浴，故能优游梵教、恬养世外欤？玄同既精释氏之说，兼据有冶山之胜，尝向予一发其胸中，颇能以义理自持，此缙流中不易得者！予重喜之，急相谓曰：今之有此冶山，甚不易也！子其念之，其毋徒辇致世资，以教为市也哉！予又闻冶山之侧多魁梧奇硕之士，伏匿不出，穷愁著书，感世道之日下，悼性命之日失，求如玄同为外氏之学者而不可得，且闻磬声而太息矣！玄同尚无负予心哉！至于四方乐助，破除贪心，可以入道，贤智当自勉之，毋劳予言也。

陈疏叙述了冶山之地胜,介绍了寺僧玄同,认为治理天下当怀柔克刚,花费百万冶铸兵器,过于奢侈。如能隐居深山,礼佛修道,终老一生,则放弃人间功名利禄也,心愿也!话虽此言,陈探花一生坎坷,官拜丞相,最后人头落地,悲夫!人世间的荣华,拿得起放得下吗?难!

冶山有寺,寺中藏有唐朝贞元年间(785—805)的云版,是从山间田埂下拾得,刻有“唐贞元二年造”六字,锈蚀难辨。明人谢天选诗云:“字迹犹存啮铁深,上方时借片云阴。不贪新识前朝制,幸得重清半夜心。破衲僧贫无宋绣,空山古寺有唐音。定知铁冶多年废,筑塔何人更布金?”云版,古乐器,为长形扁铁,两端有云纹,旧时权贵以打云版为召集议事。冶山寺之云版,唐物唐音,合着晨钟暮鼓,木鱼梵唱,定是福音佳声。

湖州知府、溧阳顺治进士吴颖有《冶山寺记略》:

由九龙山折而北,逾大岭,抵冶山寺。寺在山中,大木百千,章如列队。有拒石势,游者肃焉。寺僧语:余寺故贞观旧迹,今所传云版得诸田中,诚非近制也!唐寺数百年尚存者,惟此与唐兴寺。唐兴今名胜因,而此则南唐时所云下山,不可考矣。僧又曰:山盖以欧冶获名,春秋时伍员避楚难,匍匐来此,蒙史女管浆之恩。女子贞明执操,以死谢之。后员从吴王克楚归,过濑上报之以金,故山有伍牙之号。而欧冶子亦以是时奉吴王命,铸剑铁冶山中。干将、莫邪妙简精炼,徐乃拭铎厉锷,以问盟中原张国威焉!设令两人未尝至此,则伍牙铁冶之胜终且隐伏,而其名不传。今冶山踞於群岭盘曲之间,虽林麓静阒,为幽人老僧憩息之地,而千古剑光,若时与山川云气互相辉映,何况於沉渊之贞义、复仇之壮烈乎?或曰:铁冶山在邑南八十里,石屋山西有欧冶子铸剑坑焉。宋张敦颐云。

吴记阐述欧冶自铸剑和史贞女子义救伍子胥的地方典故,由云版及唐寺,言明历史文化与山川同存,流传千古。

清工部主事、顺治进士狄敬有《冶山寺》诗:“雄刹依岩结,名从欧冶来。梵天唐相古,龙象晓峰开。饥鹤依时至,行云宿栋回。沉思三十载,魂梦到徂徠。”闲

濼水钩沉

云野鹤，似乎都是宦宦的清梦。唐寺雄刹，是思念三十年的归宿。冶山，冶心也。

同是邑人的顺治贡生黄元晋，也有同题诗云：“偶乘春行至，携杖叩柴扉。不惮披荒径，浑忘入翠微。壮年坛坵在，旧寺鼓钟稀。寂处闻幽响，空山瀑布飞。”

春如翠微，荒径柴扉，稀闻钟鼓，涧鸣幽瀑。冶山寺颓圯了。香火化作一缕云烟，消散在历史的天空。我只是遐想：那云版的唐音，或清脆？或沉郁？能契合乎？

寒光亭下水如天

溧阳古迹，楼台堂阁。楼有太白酒楼，台有蔡邕读书台，堂有孟郊射鸭堂，阁有城峙文昌阁，皆一时胜地，饱含历史人文风骚。

说到亭，皆言北湖亭，因李太白登临放歌闻名。寒光亭，早已沉湮于沧海桑田，瞻其背影，能发幽然思古之情。

寒光亭，在三塔荡。荡内原有三塔，相传是“观音大圣化身”僧伽过江造塔，并在三塔寺内行化弘法。宋朝治平年间(1064—1067)，僧奉琳修造了寒光亭。其遗址在今周城芦塘村梅山一带。

宋时宰相周必大于乾道八年曾泛舟三塔荡，观寺读碑，登亭赏湖，经过记于《南归录》中。

宋高宗时乌江(今安徽和县)状元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居士，是位善诗工词的文官，他曾写下几首咏三塔寺、寒光亭的诗词，为我们描绘了当年的胜景。

张孝祥《三塔寺阻雨》：

塔上一铃语，湖头三日风。
苍山在烟外，高浪与天通。
市迥薪篲少，僧残像教空。
不妨留滞好，且看夕阳红。
倦客三杯酒，高僧一杯茶。
凉风撼杨柳，晴日丽荷花。
铎语时鸣塔，渔歌晚钓槎。
停舻快清憩，步稳衬明霞。

张孝祥《过三塔寺》：

湖光潋滟接天浮，风卷银涛未肯休。
夜岸系舟来古塔，不妨踪迹更淹留。
层峦叠嶂几重重，万顷烟波浩淼中。
钓艇未归饶夕照，耳边芦苇战寒风。

航湖阻雨，本是恼事，但滞留三塔寺却成了诗人的美事，听风过铃语，看苍山夕阳，饮三杯薄酒，闻渔舟唱晚，拂杨柳清风，赏晴日荷花，羁旅生趣，人生何求？

张孝祥《寒光亭》：

亭依三塔占清幽，松竹环除翠欲流。
晓色晴开千嶂月，波光冷浸一天秋。
琼瑶影里诗僧屋，云锦香中钓客舟。
风送不知何处笛，雁声惊起荻花洲。

三塔清幽，亭浸寒光。松竹环翠，月冷秋湖。踏月色与诗僧坐而论韵，见渔舟载一船花香而归。湖风送过来不知何人吹响的笛声，惊醒了夜栖芦荻深处的大雁，鸣叫着飞向湖的更深处……张状元的笔下的月夜寒光亭，多么的引人入胜！

同为三塔荡之阻，三年后张孝祥还写过词《三塔寺阻风 调寄西江月》：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树丝丝拂面。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惊起沙鸥一片。

风定滩声未已，雨来篷底先知。岸边杨柳最怜伊，忆得船儿曾系。
湖雾平吞白塔，茅檐自有青旗。三杯春酒醉如泥，天色寒呵且睡。

先阻雨，后阻风，先是诗，后是词，张孝祥和三塔荡有缘。阻雨是秋，阻风是

春，匆匆三年已过。世路如水路，多阻心悠然。系舟岸边，那杨柳还记得船儿。湖雾吞白塔，茅檐现酒旗，那年三杯，今又三杯，那年秋酿，今年春酒，烂醉如泥，天色已晚，暂且睡去。寒光亭下，水天一色。又听湖鸟惊鸣，那年秋雁，今年春鸥。

宋嘉定丁卯年(1207)，岳飞之孙、嘉兴知府岳珂奉诏还京，郡人钱行于三塔湾。他路过溧阳三塔寺，写下《过三塔寺》诗：“往年曾佩双湖组，古刹犹题三塔湾。堕雁重寻湖浩渺，断虹浑记水回环。两州隔涉名无改，二纪栖迟老复还。病衲虽无分别想，经门莫作少年看。”奉命还京，岳珂又过三塔寺，时隔二十年，感叹多病的年纪再也不是少年，如堕雁断虹，壮志雄心已是昨日之梦。

二十年前，岳珂曾到过三塔寺，登过寒光亭并作有《三塔寺寒光亭张于湖书词寺柱吴毅夫命名后轩》：“竹里逢僧院，残碑不记年。雁题三峯堵，龙化两魁躔。宝正号应纪，元丰墨尚鲜。寒光定何似，谁放五湖船。”

元朝溧阳官员周子固曾有《寒光亭》一诗：“檐影流不去，天光蘸波碧。开轩足清致，远山映佳夕。轻风人坐隅，水纹浮枕席。鱼鸟喜相亲，洒然脱尘迹。”诗人把站在寒光亭上看到的三塔荡天光碧波，写得洒脱清致。

元代溧阳州教授、钱塘文人仇远，对寒光亭充满向往：“迢迢滹水上，有亭曰寒光。水天散鸥鹭，四望山苍苍。向来于湖翁，诗词题屋枋。几思一遨游，岁月飞羽忙。闻有白龙寺，石塔标铁梁。老僧颇能吟，年来曾游方。须乘未归时，秋晴呼野航。”(《久客思归言志》)仇教授虽未登过寒光寺，对周遭环境古迹却了如指掌，不知他离开溧阳之前，是否有空去野游过？

到了明嘉靖年间，寒光寺久已废。溧阳进士彭谦在靠近亭旁叫梅山的地方，构建了“寒香亭”，大概是取梅花之香吧？但是前来游览咏吟的人，仍称其为“寒光亭”。至清，寒香亭也久废。

彭谦有《寒光亭记》：“寒光亭旧矣。不详其创于何人。亭在梁城湖阴、三塔寺侧，惟宋人张孝祥留一诗，他无所据焉。嘉靖辛丑阳月之朔，予与客颺舟於湖，希旷古之高怀，求前人之彷彿。萍末起夫悲风，悽怆生于所著。溪叟邂逅，告予曰：此亭之故丘也！梁昭明之所尝游，而张状元之所留咏也。今古代谢，寺废亭圯，春深而草丰，烟暝而鱼集。湖山如昔，而寒光之亭不可复睹矣！予乃舍舟而厓迹其处所，负山面湖，风景超旷，怅其名之徒存也！因步张韵一律，诗成载歌，

山川若应，徙倚久之。回望山椒，松竹峭蒨，蔚其云兴。指问土人，曰：梅山也。陟其岵则诸峰飞拱，各抱秀特。俯其麓则波模纳远，光黏天反。视故丘，顾出其下。夫梅山去故丘不半里，景复胜，而乃为昔人所弃不得见称，何耶？於戏！事在天下，遇不遇有时。前乎柳子罗池非无丽也，前乎欧公滁山非无秀也。山川之灵，其起废显晦，亦自有遇耳！君子之人，达随其遇，而适之又何暇于决择哉！况地不自胜，因人而胜，今独存乎亭之名，而作者之名不可考，是地胜于人矣。怀古举废不能以已也！於是即其亢朗，锄彼草茅，基以崇台，周以伏栏，杰出飞栋，曲施步廊，既亭新构，庸阐旧迹，亭之外复构禅堂三楹，守以僧某，以司晨夜，以息游观。环植梅花数株，参列松竹，寒气总至，暗香往来，诚一佳境也！落成之日，改额曰：寒香。地若有胜于旧，而亭之视昔，其丽与朴，莫可稽也。始作者不可求矣，而今之名，得与寒光并传与否？又莫可必也。余非胜于地者也，惧其久之而遂废，故为之记。”

彭进士不愧是位文人雅士，帐名亭废弃，在原址附近又筑新亭，不废这片湖山的景致，种梅植竹，建庵守僧，可谓一片苦心！山川际遇，亦人时运，可惜这亭边的寒香，并没能弥远。这正如后来的明诗人刘致中所咏：“三塔湖边草树秋，寒光亭下水空流。行人欲问当年事，明月清风一白鸥。”

清代本邑榜眼任兰枝之子、探花郎任端书的《寒光亭》诗云：“澹水秋茫茫，清晨独暇眺。塔影沉花支，波声乱沙鸟。悠然寄萧旷，散赏知多少。”

本邑诗人潘如俨在一个月夜登上了寒光亭：“今宵明月千里同，独有湖上金波万顷光熊熊。此湖明月人尽望，独有亭畔倒浸广寒桂魂沉蛟宫。乾坤一碧净无滓，草亭翼翼将飞冲。当时三塔不可见，神山飞去瀛洲东。寒潮卷尽废兴事，独留古月凌虚空。三月春游过湖荡，桃花浪暖开孤篷。春风弹指又秋暮，月华湖水寒光通。寒山兮翠黛，寒木兮丹枫；寒烟兮渺渺，寒流兮淙淙；寒火兮萧寺，寒钟兮远风。霜空一声叫寒雁，苔垣几处鸣寒虫。青莲诗豪压瓦屋，红蔷薇冷埋棘丛。月白风清此良夜，骑鲸射鸭应相逢。千秋诗卷两人在，我歌君和谁最工。潮回月落风露逼，依崖啸傲呼苍穹。清吟转苦毛发冷，上帝鉴此怜诗穷。寒光转眼收拾去，伫见春回湖上日华奕奕玻璃红。”（《寒光亭对月》）

潘诗人月夜登亭，举头望月，感古今月同，人事已非。乾坤一碧，广寒宫寒。连草亭都欲振翼而飞，奔向寒月。三塔已湮，春秋过隙，山木烟流，火钟雁虫，皆

是寒光中的景物。李白和孟郊这两位诗豪，应在溧阳的月夜里相逢，唱酬应答。可是清吟的诗人又有何用？倚崖呼啸，抵不住风露寒冷，诗穷人穷，月落日升，还是看看平波无纹的春湖华阳吧！

读关于寒光亭的诗句，如与宋元明清诸位先贤对晤。

20世纪80年代，梅山已是小丘，顶有巨石，乱石岗有柱础，村人指说是这里曾是“泗州庵”，与史料合，乃三塔大圣院，僧伽称“泗州大圣”。而三塔湖早已干涸，正如史记中的南渡荡、前马荡、黄山湖，化作麦苗儿青青稻花儿黄的田畴，化作鱼跃虾嬉的池塘沟渠，沧海桑田，炊烟黄梁。

一翼亭，几世情。亭未去，留诗间。寒光清，寒香远。

屏风山麓法轮寺

史建明老师来电,说屏风山村有人拾得一块碎石,上有“法轮寺”字样,问我
有无价值?

赶赴山村,拾石者亦为一教师。石为青质,大小如拳,果有“法轮寺”三字,但
上下文字已残缺,无从判断是碑记还是寺界。根据尺寸,疑为界碑石,因字体较
为随意,无碑记笔法。

教师言,留我无用,你拿去吧!

和史老师拜谒法轮寺遗址。杂树丛生,荒草没径,野蔓绊步,荆棘牵衣。古
寺无存,瓦砾遍地,台基拾级,堂间生草,条石布藓。山坳幽静,榉栎蔽日,土墙农
舍,鸡逐鸭嬉。

从寺庙遗址看,规模不小。从依山藏坳的地势看,风水不错。从寺前农舍的
墙面看,旧物不少。从厅堂几进的台阶看,殿寮不凡。

屏风山东为茶场,正在建房。西为别墅,成片成群。南为宁杭高速,横断双
峰。北为起伏岗峦,将建高铁。

拾几块遗瓦,不知岁月。寻一下古迹,不见踪影。旧寺前有一农户,见我们
来访,告知:前一阵曾有一伙人前来偷井栏,已装上车,正巧被他发现拦下!现井
栏在他院落。院的角落,躺着那口石井栏,青石,圆制,制作精美,并无缺损。农
户言那口井原就在他家门前,坐落农田,不知何年。

我心里一揪,这正是那口有名的辩泉井啊!

本县乾隆顺天解元公狄继绅《辩泉》云:“青鸳得地始何年?兰若开时石井
穿。谷汲至今分古甃,无人不饮辩公泉。”辩泉,在法轮寺西,明万历年,开山僧
辩和尚所凿,水甘味冽,不仅寺僧饮用,村民亦来取水。

古寺早废,古井尚存,难道连一口井栏都要盗去换钱吗?何况这口井曾恩泽

过你们的祖宗先人啊!

我和主人言,井栏千万不能卖,要保管好,积德感恩。他们夫妻再三应诺。

抚石翻瓦,夜不能寐。披衣起床,沉浸史海,寻找屏风山和法轮寺的泉源,以润心渴。

从燕山往东五里,有山名屏风,清礼部尚书、康熙进士任兰枝在《过屏风山怀马甸臣》一诗云:“双峰屏列带斜阳,一径松风夹涧长。路近竹林难见寺,云寒石塔俨飞霜。皈依有客供僧饭,私淑何人问讲堂?杖履当年定何处,绿垂书带草痕香!”双峰屏列,松风夹涧,这也许正是屏风山名的由来吧?诗中马甸臣,乃溧阳状元马世俊,他和崇祯探花陈名夏等人,曾在这屏风古寺里听课读书,可见当年这寺庙的文化渊源,博大精深。

元代教授仇远《九日诸友屏峰上方登高》诗云:“天借重阳一日晴,因过竹院远寻僧。翠屏晚对无人共,画栋朝飞与客登。旋摘菊花浮腊酝,待分贝叶读秋灯。余生有暇须行乐,漫向松冈叹废陵。”

元至元年(1364)间溧阳路总管、临川人元淮,也写过《访屏风山》:“独出南关访翠微,钟楼佛阁霭霏霏。草根缚笔题墙了,更与山僧伴话归。”

明朝本邑史京《过屏风山怀狄春溪》诗云:“佳人曾此托幽栖,度竹穿花路不迷。夹道阴交深驻马,上方云合远闻鸡。新诗欲和犹存壁,野水初生半没蹊。认取当年游息地,手栽松柏与檐齐。”

邑人狄敬《宿屏风山》诗云:“山树阴森夜色寒,琉璃静对一蒲团。境空大地三千界,路隔尘区十八盘。为喜客来猿掷果,欲听经语鸟栖阑。风流谁似陶彭泽,莲社常将醉眼看。”

诗人黄询《游屏风山》诗云:“远山如见招,出郭携良友。迭步过溪桥,碧挂村村柳。山色忽平分,双屏开左右。杂坐芳草茵,领略风光久。清谈半带禅,千佛在我口。耳目得旷如,天地皆吾有。”

几首山诗,无论登屏风、过屏风、访屏风、游屏风还是宿屏风,都描绘山色平分、双屏翠微、竹院林道、佳人幽栖,但诸诗都不离寺院。那么,屏风山有过何许寺院?

据《金陵志》和旧县志记,南唐升元元年,屏风山建“看经院”,也叫屏风寺。这“看经院”原有一诗刻,相传是一读书人在县城数百步外,锄地得石刻,上有“祖

德道场下，往来三十秋。白头方问法，朗月特相留”诗句，为大唐大书法家徐浩书，久已不存了。

屏风寺应是当年名寺，从众多的题诗看，是文人雅士喜欢拜访的去处。

仇远《屏山看经寺》诗云：“去郭十五里，翼然屏风山。上有看经院，创始升元间。山润易生云，竹嫩未作斑。登高佛阁小，四面青回环。空门事弥多，永日僧不闲。归径路委蛇，班荆履屣颜。信美难久留，道远足力慳。遥知故山月，问我何时还。”

诗将看经院的地点、创始、环境交代清楚，空门事多，僧日不闲，由此可见香客访客不绝，香火很旺。

缪周民《屏风山看经寺》诗云：“马蹄踏破石苔斑，为访招提紫翠间。燕尾流分斜转涧，羊肠路绕曲通山。空花煖坠蒲团软，贝叶静翻竹户闲。怪底老僧茶易熟，鹊声先我报柴关。”

朱纯元《与杨文谷游看经寺坐东山房》诗云：“一榻云房别有天，交流已在十年前。关西昼锦还夫子，海上春风属大颠。梅雨潭清龙听法，松坛月冷虎依禅。遥怜来往风尘客，翘望孤峰数点烟。”

对于屏山寺的佛事庙况，众人多有赞述。狄冲《屏风山寺》有“古殿云深露雨尖，闲庭无径草如苔。村氓见佛惟折腰，老衲翻经只口占”之句；黄如瑾《看经寺》有“溪山列翠屏，绀阁起宏敞。”“涧泉清且冽，淪茗涤尘袂。选胜非佞佛，下帷聊息壤。”马容《裴芦院邑候过屏山寺守岁》有“此地有传灯，万感一声磬”之佳句，多少的人间烦恼、杂事兴感，都在参禅的一声钟磬中，悠然消散，神定思远，色空了无……

宋绍兴十九年，屏风寺改崇德禅寺，皇上颁赐了匾额，作为秦梓的功德寺。秦梓，字楚材，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曾任特进资政殿大学士等要职，退后隐居溧阳。他是大奸臣秦桧的胞兄，但政见不一，其乃主战派，不与弟同流合污。他居溧阳夏桥旁报恩寺侧五年之久，资助修建夏桥，人称“秦公桥”，报恩寺唐井人又称“秦公井”，深得百姓尊重。秦梓于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死于湖州知府任上，归葬于溧阳城南屏风山，故寺改“崇德”，崇仰秦公之功德也。

崇德禅寺久废，明万历年间，僧辩公在旧址重建寺庙，改名法轮寺。辩公为第一代住持。

举人狄继绅《屏风山径》诗云：“名山特地访南屏，云矗双峰天半青。修竹连岗无路入，一声孤磬破空冥。”其《山寺诗》中云：“登眺当年绝代才，云林曾此重徘徊。碧纱笼处分明见，可有诗人属后来？”诗注说，清初马世俊、彭旭诸公读书赋诗于此，碑版书迹都还在。

进士任瑞书《山寺古树》云：“黛色张屏风，岚光叠晴岫。唐年绀相留，古树虬枝变。满地生绿阴，坐来成独恋。”

双峰如屏，往事如风。松荫竹茂，鸟啼寺空。屏风山，一道历史的屏风，遮挡住山岚云气，隔绝过俗世凡尘，掩映着绀宇黄墙，回响起梵钟僧唱……

可这道屏风挡不住岁月的车轮，隔不了人世的兴废，掩不住时代的变迁，响不起往昔的古音。

饮水思源。难道有了自来水，就一定忘掉辘轳泉？有了别墅群，一定要忘了看经院？有了高速路，一定要掘掉秦公坟？

那块法轮寺的青石，我留着。冥冥中感觉，是否辘轳和尚嘱我探源习文？噫吁！

溧阳佛教拜谒

汉明帝永平七年(67),佛教传入中国。

释尊菩提树下的拈花一笑,感悟了阿难迦叶的慧根,宇宙万物天地人间的大彻大悟,自此如法雨甘霖,洒遍世界。佛教东渐,当古印度的智慧与中土华夏文明融合交汇,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理明灭,夤缘因果,正如江南烟雨,润物无声。梵宇琼楼,宝刹雄殿,恰似松风朗月,抚照灵台。拜访过峨眉、普陀、五台、九华名山,常常静思:溧阳与佛教有何渊源?不见名山大川,鲜闻高僧大德,菩叶法雨可曾在此种下夤果?结下因缘?

泛舟史海,探源谒流,我颇震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我对溧阳佛教的感悟。探之索之,记之释之,拜之谒之,高山仰之。

地藏菩萨金乔觉与燕山

释迦牟尼涅槃后 1500 年,地藏菩萨降生于新罗王族,姓金名乔觉。他心慈面善,秉性聪悟,身高七尺,头顶高耸奇骨,才力过人。他崇佛好道,曾言:“只有佛门第一义与我心合。”于是放弃王族生活,削发为僧,在新罗(今韩国)出家,法号地藏。

唐开元七年(719)间,僧地藏航海入中土,求法修道,时年 24 岁。他带着神犬谛听,初抵江南,御舟登岸,几经辗转,卓锡九华。他苦心修行 75 载,“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于 99 岁圆寂,僧众尊他为地藏菩萨应化,九华山遂辟为地藏菩萨道场。

地藏圣迹,已垂青史。那么溧阳与金地藏有何夤缘?

在清嘉庆《溧阳县志》“名胜图”上,有“燕山”之幅,编撰者邑人史炳题曰:“燕

山在城南。金地藏尝行脚至此，七月香烟之盛，亚于九华。”铭偈：“松竹宝坊，钟鱼清梵。王子所经，化成斯占。”

史炳这短短的几句图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的历史信息。

金地藏渡海至中土，由金陵一路辗转江南，在溧阳燕山曾作停憩驻锡，然后由此经宜兴太华，徒步而行，振锡观方，“至江南池州府东青阳九华山，端坐九华山头，七十五载，至开元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夜成道”。清光绪《溧阳续志》载：“燕山，旧传金地藏行脚至此，峰峦深邃，梵刹纡回，邑中九华也。”

金地藏“行脚”燕山，给江南古邑留下一段佛缘，留下千古佳话。

明万历初期，僧慈照留居燕山。清顺治十七年，道明和尚创建“圣寿寺”大殿。康熙年间，僧屏山、彻暎先后增建斋阁，邑人彭泽碑记：“燕山，县之主山也。旧无寺，明万历初僧慈照始驻锡焉。顺治十七年，檀越敦请道明和尚肇兴圣寿，建大殿以供地藏。康熙九年僧屏山继之斋庖，香积於是始备。僧彻暎广募檀施，复建弥勒阁，恢大殿而新之，迥绝旧观，其颜曰：圣寿寺，亦答太平祝无疆义也。”

乾隆初年，僧普就、通益更造圣寿寺的戒台、禅堂等处，规模完备。二十八年，大殿、祖堂遭灾，僧得源修复。四十六年，戒台、方丈、禅堂等处又被烧毁，僧然永募款建造。

县志中的“名胜图”，燕山曲径通幽，林隐禅寺，宝殿恢宏，松竹翠郁。吴环《过燕山》诗云：“溪渡思寻杖，岩栖悟听钟。荒荒樵径白，高士寄孤踪。”光绪邑人宋璜《燕山禅寺》诗写道：“十里恋回曲径幽，参天古木护龙湫，数声梵语一声磬，六月禅房凉似秋。”

燕山形燕，飞翔回舞，春去春回，鸟往鸟返。花开花落，草荣草枯，诗山佛山，仰之弥高。

道明和尚和宝藏禅寺

九华山方圆百里，99座峰如莲花，僧地藏卓锡于此，趺居崖室，苦修苦行。青阳乡老诸葛节率众为他兴建禅居，寺名化成。这就是史炳所言的“化成斯占”。

据传，九华山原山主叫闵让和。唐至德年间，僧地藏化缘至闵家，“但求一袈裟之地”，闵允诺。僧地藏一展袈裟，罩住整个99峰，闵公始知其法力无边，“以地惠施僧地藏，其子求出家，即道明和尚。后闵公亦离俗纲，反礼其子为师，

皈依僧地藏”。这就是“子兄父弟”的来历。九华山寺庙里塑像，僧地藏两边站着一老一少两个弟子，便是闵氏父子。

金地藏见弟子道明虔诚苦修，渐成正果，便鼓励他自立山门，弘扬佛法。南京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三，录僧地藏金乔觉《送童子下山》诗一道：“空门寂寞汝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爰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瓶添涧底休拈月，钵洗池中罢弄花。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此诗后选入《全唐诗》，有人言为送道明和尚之作，我以为不然。应为送另一思家童子所作，只是最后两句契合送大弟子道明的心情与场景。

道明和尚离开九华，访遍江南的秀山丽水，最后选中溧阳瓦屋山，结草为庐，饥食白壤（俗称观音土），托钵募化，营建寺庙，时年三十五岁。经四十多年的苦心修炼，经营构筑，终在瓦屋山顶建成宝藏寺。寺有大殿、经楼、僧舍九十多间，一时香火鼎盛，僧侣云集。道明和尚年逾古稀，想请师父地藏前来弘法教诲，孰料千辛万苦回到九华，方知金地藏已圆寂数年。返回后，他亲自主持宝藏寺僧人为恩师做了七七四十九天法会，并将寺名改为报恩寺。同时，将金地藏圆寂之日农历七月三十日，定为庙会，与九华山同，以示纪念。

道明和尚在瓦屋山苦修苦行一生，于唐代元和七年（812）年圆寂，享年 89 岁，三年后成为瓦屋山第一位肉身菩萨。他是瓦屋山宝藏寺的开山之祖，功德无量。

宝藏寺兴盛于唐中期之后的五百多年，山脚曾修过下院寺庙红庙、铁应寺和铁扇寺、茅棚庵等。宋代景定年间毁于战火，元朝皇庆年间（1312）重建，改名华藏禅寺，素有小九华之称，殿宇达九十九间之多。明朝嘉靖年间（1530），九华山营造祇园寺月身殿，将闵氏父子在地藏两侧配像。瓦屋山为道明和尚也建造了月身殿，将他敬为开山祖，并修了佛塔，在铁应寺修了塔林，宝藏寺改名为报藏寺。清乾隆三十三年左右，句容宝华山的觉让和尚来瓦屋山任住持，将寺名改回宝藏寺。

1937 年，宝藏寺被焚。1942 年，上海候定和尚整修庙宇四十余间，有僧人十余，庙田四十余。“文革”中千年名刹，荡然无存。20 世纪 80 年代，溧阳觉志老人和众信徒募筹数十万元，营建仿古大殿及僧房。21 世纪后由溧阳沈田春等人筹建大雄宝殿及供奉殿，现已初具规模。

地藏行脚燕山，传下佛缘一段。道明开辟瓦屋，留下宝藏禅寺。九华瓦屋，一脉相承，茗山法师联曰：“天宝物华修行胜境，地藏闵老弘法道场。”寺名更迭，寺毁寺建，地藏文化，千年相传。

澄观和尚与唐刻石井

在今凤凰公园内，有一仿唐石亭，下有唐井一口，井圈上刻有铭文 91 字。千万别小觑这口麻麻皴皴的老井，它是全国仅存的唐刻石井栏，乃国宝级文物。

井栏铭刻有纪年，“维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公元 811 年）”。置井人为“沙门澄观为零陵寺造常住石井栏并石盆，永充供养”。凿刻人为“大匠储卿郭通”。

沙门澄观，大有来头。释澄观，俗姓夏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他俊朗高逸，不拘细务，“遍寻名山，旁求秘藏”，儒佛俱通，博学多识。至贞元三年（787），撰成《华严经疏》二十卷。贞元七年奉唐德宗之诏入京，撰成《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十卷，并为德宗讲《华严经》，被授予“清凉国师”称号。此后，顺宗、宪宗、穆宗、敬宗各朝，颇受尊重，与公卿大臣有很深交往。唐文宗开成三年（838）三月圆寂，世寿 102 岁。文宗为他“辍朝三日，重臣缟素”，称赞“教融海岳，恩廓乾坤”，并为他立碑。

澄观和尚参学各家，他的诸宗融会、禅教一致的宗趣，对于中唐以后的佛教界影响很大。

澄观与零陵寺是什么夤缘？他为何要造石井石盆永充供养？他是零陵寺的住持还是寺僧？从他求学的足迹来看，越州宝林寺（浙江）、妙善寺、开元寺、润州栖霞寺（镇江）、钱塘天竺寺（杭州）金陵、苏州、剡溪、淮南等，大多在江南一带。据《金陵志》注：“溧阳临街石井刻字亦唐元和六年零陵寺澄观造，与报恩寺井同。盖澄观本零陵寺僧，时无报恩寺，或有一小庵，为零陵寺带管，一年造此两井耳。”由此可知，唐井石刻应有两具，而澄观确为寺僧，他能在一年为寺庙凿制两井，不是住持，就是高僧。

溧阳寺庙曾有“清凉国师”驻锡住持，佛缘匪浅，幸甚。

胜因寺与《蔷薇诗》

胜因寺，在旧县，晋朝义熙元年(405)建寺，唐朝时名叫唐兴寺，宋朝政和五年(1114)改名胜因寺。

邑人吴颖有《胜因寺记》，记录了他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冬，从金陵回来途经旧县，目睹的胜因寺：“寺之址逶迤阜上，开门临平畴，古澹不器。寺僧多力田，甚朴质，余问之经，不能口其义。考县志，唐时故尝建治此地。贞元年，孟郊以家贫为尉，钱客唐兴寺，有《观蔷薇诗》，即今之胜因也。又读《陆龟蒙集》，自言游溧阳，闻白首书佐，颇悉郊之为人，叙其作尉时，於投金濂东八里许，循故平陵城，得幽邃岑寂之地。多大栎，合数十抱，丛蔭蒙翳，如坞如洞，因日乘驴往，荫栝岩隐，坐积水傍，吟到日西而还。令不佳所为，请假尉代之，分其俸，郊以穷去。呜呼！自唐以来，求所为旧治城郭已不可得，大栎积水又安在哉？而唐兴寺犹存。”“今寺八九百年矣，不与旧治城郭同为瓦砾，而后之君子过焉，而凭吊感慨，徘徊不忍去，岂非贤士大夫风流之韵使然欤？宋时县令李亘为刻蔷薇诗於石上，命其子海民书之，自为跋，以流传於后。噫！亘亦贤矣哉！”

吴颖记文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信息，胜因寺的今昔，孟郊的经历，蔷薇诗的流传，都是历史的佳话。一座寺庙的兴衰，与一位诗人的宦迹、一首诗作的吟诵联系到一起，都是文化的渊源，也是历史的使然。“时移多旧迹，寺古忆先贤。环翠亭无址，红香句独传。残碑余草篆，枯树长寒烟。试向北湖望，青山似昔年。”董正域的这首《胜因寺》写得真好，寺残碑在，碑湮诗在，往昔似流水，青山依旧在。

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如今，胜因寺早已变成田畴房舍，但孟郊这位寒尉的诗歌，千秋不朽。

《唐兴寺观蔷薇花同诸公饯陈明府》

孟 郊

忽惊红琉璃，千艳万艳开。

佛火不烧物，净香空徘徊。

花下印文字，林间咏觞杯。

群官饯宰官，此地车马来。

僧伽与三塔大圣院

三塔大圣院,又名三塔寺,东晋叫白龙寺。地处县城西七十里,原有三塔湖,又名三塔荡、梁城湖,在今周城、社诸、埕口一带。从前这里有三座塔,南唐时毁寺,存一塔。宋朝治平年间(1064—1067),僧奉琳建造寒光亭,乾道年间(1165—1173)有寺,亭毁。南宋名相周必大(1126—1204)于乾道壬辰南归,途经三塔荡,他在《南归录》中写道:“甲寅晚过溧阳县三里宿……乙卯风顺,弥望皆湖田,行七十里至三塔院。院在水中,有元丰时刘谊所作记。三塔者,相传僧伽过江造塔至此,为第三耳。主僧宋净等二人,寺宇敞甚,后有寒光亭,可望湖。”过了二三年,亭也毁废。

南宋词人张孝祥在《三塔寺阻雨》中曾有“塔上一铃语,湖头三日风。苍山在烟外,高浪与天通”之句,叙述三塔荡的风高浪急。而“倦客三杯酒,高僧一味茶”说明三塔寺是旅人避风浪之良所。他的《过三塔寺》七言,有“湖光潋滟接天浮,风卷银涛未肯休。夜岸系舟来古塔,不妨踪迹更淹留”之句,说明当年三塔湖之浩渺,风浪之夜,只能系舟古塔,淹留古寺。

岳飞之孙岳珂,任嘉兴知府,于嘉定丁卯年奉诏回京,曾经过三塔寺,分别作诗文记叙。

那么,文学家周必大所述“相传僧伽过江造塔至此”,这僧伽何许人也?

僧伽,又称泗州大圣,本是西域僧人,唐高宗时来到长安、洛阳等地教化,后到江南,定居于泗州(今江苏泗县)。他常手拿杨柳枝,四处说法。有人问他姓什么?答姓何。问他何国人?答:我是何国人。何国,在西域的碎叶国以北。释迦牟尼传正法,由僧伽守护,使正法传承不绝,故僧伽又被尊称为僧宝,为三宝之一。李白曾有《僧伽歌》:“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意清净,貌棱棱,亦不减,亦不增。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万岁胡孙藤。”将僧伽的来历外貌备述于诗。

僧伽在佛教典籍中被视为“观音菩萨”化身,唐朝时的观音像即以他的容貌为模本,后才演变为女相。

史载僧伽圆寂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三月长安,后归葬于泗州普光王寺下。

溧阳的三塔寺又名“大圣院”，言大圣僧伽“行化”之寺，他曾在此讲经弘法。又据《金陵志》载，县西北四十里有落霞山，其圣塔院也曾是僧伽行化之地，有石佛，镌铭云乾符七年(880)造。

僧伽大圣，行化溧阳，幸甚。

报恩禅寺和秦公井

报恩禅寺，原在县城西北五十里，为南朝梁代天监年间(502—519)建造。唐朝会昌年间(841—846)废弃。宋朝元祐元年(1090)由邑人高先等迁建东门外一里处。宣和年间(1119—1125)改为神宵宫，后按例改正，丞相李纲写了匾额。

报恩，系《佛说心地观经》和《大方便佛报恩经》中，所言“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三宝恩”。

元朝溧阳教谕仇远诗《题报恩寺权公方丈》：“金渊多宝地，此地殊幽深。一锡得安稳，岂必栖山林？临池照佛面，见竹空人心。江枫千百年，时作海潮音。”

宋时，秦梓居住夏桥一带，报恩寺俗称夏桥寺，在桥东的王家村上。唐零陵寺的石刻井栏迁移至此，人称“秦公井”。梓子焞曾有碑记，文湮。明代屡次修建，也称秦公寺。吴嘉稷有诗云：“城南一寺古，红叶落秋田。佛殿大门锁，僧房小径穿。鹊巢风堕木，马矢晚生烟。畴昔论文地，荒凉断碣边。”可见寺已渐近荒凉。

报恩寺，现在天目湖畔桂林村附近，已成为邑人及游客礼佛参观的去处，乃20世纪80年代重建。关于寺庙旧物唐井栏，余另有专文介绍。

云泉寺与达禅师

云泉寺，在县城南面四十余地野山(南山)，唐朝兴建。

明天启二年进士、邑人陈献策记略：“予邑南山之秀拔者，秦山为最。相传秦皇道中江、奏震泽，驻毕之地。麓有小峰岿立，形势蟠绕，唐则天后时，达禅师卓锡於兹。殿宇巍焕，前有古井，可食千僧。元时里人复施长明灯田，碑记明初圯毁。其后余族祖洪山公捐资鼎新之，施田三十亩，又构书室数十间，为里中读书之所。恐沧桑之有变也，索余为记。夫寺有存亡，碑记之碑有成毁，籍记之即世远时移，载籍散佚，而公之一片婆心护持福地，且将终古不朽焉。盖道生於心，心

之安处，即是彼岸。今其地有泉、有石、有刹、有僧，建之堂室，而施田以食之，未必非安心入道之一法。”

长荡湖中普门寺

长荡湖，又叫洮湖，是与金坛、溧阳、宜兴接壤之湖，古代五湖之一。湖中有大浮山、小浮山两座（又称大坏、小坏），盛产鱼虾。

大坏山上有普门寺，唐朝元和五年（810）由僧人铁牛兴建。

谢天选有诗《夜宿洮湖大涪山寺》：“霜白蒹葭秋奈何，湖平金斗熨寒波。更深佛屋钟鸣后，月满空山僧定多。邻舍只凭渔火集，游人偶放酒船过。尚平婚嫁粗完日，来结跣趺半席莎。”虞谦《大坏山寺》：“夏日湖心寺，危栏面面通。一山都见水，万竹尽含风。石灶茶烟碧，螺杯酒晕红。胜游怀旧集。归棹夕阳中。”

大浮山现已与陆合，成半岛。多年前登山，有寺遗砖瓦，今有信众重建，规模较小。

广法寺和广教寺

一在西门，称西寺；一在东门，称东寺。

广法寺在唐代叫零陵寺，宋太平兴国改名。佛殿钟楼是唐天祐年间创建，铜钟是南唐保大十四年（956）铸造，寺外临街也有和报恩寺相同的澄观凿制的石井，同年铭文。清顺治年间，寺僧进石重建殿阁，陈氏捐献石柱。据陈抃若《迎恩寺助石记》记略，广法寺又称迎恩寺，“寺为历代宣示纶音地，风雨颓废，进石禅师起而新之”。由陈少南妻王氏，在崇祯初年捐出为其立坊旌表的石柱和四座石狮，用作修造寺庙。

溧阳状元马世俊有《重修广法寺记》文（略）：“环郭之东南西隅，有三大刹，东曰广教，南曰报恩，皆历代久远不废，而西曰广法寺。”“寺复有花果竹木之胜，茂林清樾，与经堂精室缤纷织映，诚祇园胜境、灵山要区也。余少邑居，暇日辄往，且与诸同学数过会文肆讲其中，而主僧允西工书，善谈论，煮茗焚香，意相识也。”“允公之徒进石，白足遍吴越……已十有余载，归而键户，诵经昼夜不辍……於是内而藏经楼，外而天王殿，颓坏者整葺之，毁废者兴植之，芜塞者扫除之，污蚀者涂墍之。次第告功，顿还旧观，而进公以劳惫得疾，几不起。”“今春，进公贻书官

邸，以大殿且新建，将勒碑永久，索文为记。余甚诧之，问其经始，则不伤竿牍，不烦罄铎，而诸方响应、资财辐集也。问其落成，则朱甍霞丽、绀宇峰悬，而兜率天开、耆阇地涌也。”“进公独能於衰废之后，以身肩之，不见其有扬铃持钵之劳，又能以其道行化纠桓果毅之士，使皈诚信，舍逡巡相率以避，而寺之规模更廓於旧。”

进石，乃觉弥和尚，本县雷山人。书法和诗律被陈名夏欣赏，曾住浙江金粟寺，守戒十余年，道气动人，说法时听众云集，施舍财物很多，寺庙为之焕然。

马状元长记与广法寺的缘分，赞扬了进石僧的功绩，行文充满感情，充满对乡寺的向往。

广教寺于唐长庆元年(821)建，原名资圣院，宋太平兴国五年(976)改名，明宣德年间重建，清顺治初，僧行鉴开堂解佛法于此，僧徒聚居，后改万寿寺。

清康熙探花、邑人黄梦麟有《重修万寿寺并捐田惜字记略》：“溧邑城东有广教寺，舍宅于唐，更名于宋，明正统、嘉靖间屡建屡废。国初，行鉴和尚复更新之，阅今六十余年。修举乏人，又为某僧溃坏。”“幸遇晓堂和尚，承临济之传衣，主龙池之法席，杖锡飞来，剪剔荒葳，毅然经始，远近信心，施者纷集。不数月间，凡堂庑斋寮庖湔之所，阙则补之，圯则易之，漫漶黑昧则丹堊之。危檐重窗，焕然改观。”“晓堂从拈花微笑之中，以诗文为鼓吹，其徒侣日益众。梵钟鱼版，衣衲肃然。瞻古刹之重新，幸宗风之未坠。”

广化、广教两寺，屹立城东城西，建修圯兴，幸赖进石、晓堂两僧。状元、探花作记，千古流传佛缘。寺湮没，文还在。

白云庵与优昙禅师

白云庵在[山]优昙芥，唐朝建，是优昙禅师留居之地。清乾隆年间曾大加修葺。

清释行鉴有诗《过优昙禅院》：“为访优昙旧迹来，残碑零落杂莓苔。三春腊雪犹多积，二月梅花尚未开。绀殿虽经新匠斧，老松还是昔人栽。祖师面目依然在，了了分明不用猜。”僧行鉴为顺治时高人，可见此时的白云庵已是残旧新修。

优昙，俗姓蒋，安徽丹阳人。家族世代奉事佛法，出家于庐山东林寺，住丹阳妙果寺。元朝武宗至大初年(1308)，发誓复兴净土之教，作《莲宗宝鉴》十卷，诸方

大德承其印证,无一人能动其中一字。他上书元仁宗,乞求恢复净土教法,皇帝答允,令他为“净土教主”。元文宗至顺初年(1330),入寂往生。

妙如寺与僧觉际

妙如寺在举善镇(今戴埠),宋宣和七年,僧觉际在唐隆寺废址上改建。明洪武末年并入看经寺,后恢复。明崇祯年间,重修大殿。

陈献策撰写了重修记:“余里妙如寺,正殿法云焕於翹栋,祥霭新於耸栊。因思倾圮已久,忽焉改观。”“兹为唐隆寺故址,宋宣和年建,明初余族重葺,新立石柱,额曰:妙如。妙之为言,乃众生美善之别名,而又众生精粹之心印也。如则如其初心耳,心有仁义礼智,众生同具,不仁不智、无礼无义,则天且刑之矣。”“妙如之重修,岂非大乘禅宗一助乎?况是役不损官庾、不烦公檄,修葺之功忽已告成。”

清康熙四年重修,吴颖又撰了重修记。

柏枝庙与僧了成

庙建于明万历年间,僧圆智创建,定名为万善庵。清乾隆四十八年,僧了成在庵的西面募款兴建文武帝君殿,置田四十四亩,永供香火。

蒋莲州《了成行略》云:“师名了成,丹徒人。自幼出家,溧阳西乡万善院法兴之徒,而然德之再传也。性聪悟,授以梵字经,辄有了解处。尊宿器重之,迨长神识清彻,气骨高寒,遍阅大藏,兼治儒业。同辈问之,师曰:柳柳州谓,佛书之旨,与《易》、《论语》相参,求明此理耳!性又好吟咏,与诸文士倡酬,有佳句必录藏其稿。或嘲之曰:弥勒袋作长吉囊乎?师笑不应。社中人士遗之额曰:墨名儒行。良不诬也!万善为邑之古刹,岁久残缺,师居其中,苦行护法,凡廿余载,人天卫而龙象新矣。又于院西建文武帝君殿,四方人士翕然宗之。”“师以英迈之姿,持坚定之戒,兼通儒释,光启法门,而未登耆腊,遽尔告谢”。

应心院与普大师

在大箬山有应心院,景色清幽,竹木杂丛,僧了空造院。

明万历举人、邑人宋劼碑记:“应心院之称丛林也,盖自万历乙巳秋,黄山普

大师卓锡其地始也。据旧记，庵之权兴阅孙吴、历唐，迄我明嘉靖间而荒圯，潘道人圆明，披草荆棘，庀材创辟，守优婆塞教，谨司鱼磬者百余祀矣。普大师之来黄山也，实应余请，亡友周叔夜偕师至大箬，视其横亘洮湖南浒，瑯玕、圣塔、涪口相与后先，错峙拱揖，为一方风气所会！师甚乐之。山之道人觉正、能严遂皈依於师，率徒众薙染，发宏愿为云水丛林，滴水粒糝，一遵百丈清规，盖与城东禅寺十方院，为吾濂千年来希有功德。”

千华寺与僧贯慈

千华寺在县南山中崔芥，清顺治年间贯慈大师智玕建造。

崇祯举人、本邑彭旭碑记：“(芥)去邑治五十余里，道经碧岭，凭高东望，寨山当其右蜿蜒，而北岗峦层叠，材木笼葱，意其中必有异境焉！询之樵人，知为贯慈大师之千华寺也。师系粤东南海梁氏子，得法于弁山离言义禅师，迺洞下第三十世孙也。”“余未尝一侍颜色，心窃憾之！於是归自孙谭，遂蹶屐而造焉。历危岩、穿曲径，深入三里许，豁然高敞，四山如屏列，而千华居其中。松涛涧响，竹翠荷香，步步引人入胜。回望向所从入之途，悉为众山遮断，如身到桃源而弃魏晋诸人於山外也。余因谓师曰：此山泯泯无闻久矣！今拈一茎草，辄成宝坊。师其善於选胜乎？师曰：不然！向居夏林圆通，不知有此山也。一日，心忽自誓，足目不谋，信步直往，穷日之力，其所至处即为安禅所。行及谷口，日薄西山，空林寂历，隐隐闻梵呗声。溯风求之，得一僧独处茅庵，见余骇然，曰：与梦中所见者，殆无殊也！明晨有地主养明朱君，携供具来，亦云：吾夜来梦有高僧至此，当为开山之祖。今见人，信不诬矣。因结茅住静有年，后养明朱君请舍宅为寺，其旁十数家，承协戎玉楼马公捐俸置买。中有一波，旬牢距而索重直，不肯即去。无何猛虎突入其宝，嗥怒之声，震动岩谷，经七昼夜，其人恐，方移去。乃庀材鸠工，依崖为屋，凿石为池，时甲午冬月也。当沍寒之候，忽赤莲一枝挺生池内，葩叶妍秀，香气氤氲，咸以为异！以故林邑侯额其寺曰：千华。马殿元题曰：冰莲精舍。余於兹山投分，始末如此，君其为我记云。”

贯慈大师，名智玕，广东梁氏子。初从弁山离言义禅师学法，崇祯年间，住溧夏林圆通庵。居在崔芥结茅修行，创建千华。清顺治十一年冬，赤莲一枝生池中，尚有猛虎护法奇迹。知县林文辉题写“千华寺”额。马世俊题写“冰莲精舍”额。

彭旭之碑记，奇异精彩。他在文中还述其神往：“余行将筑室孙谭，相距千华咫尺，时得追随杖履，啸傲烟霞，莲社清标，虎溪芳躅，宁令陶潜、慧远独超物外於千古耶！”

多年前，我曾在笔会时赴崔芥，见千华寺早已颓圮，有屋数间，为看山护林之人暂住。院内有麒麟石刻，埋没草土。寺池尚在，不见冰莲。寺址犹存，不闻梵呗。寺门犹立，不见僧来。寺墙犹耸，不见僧往。寺塘犹清，不见僧濯。山溪犹流，穿寺而过。翠竹犹青，栉风沐雨。据说，抗战时，此处曾是江南行署临时办公之所，冷欣、顾祝同隐匿于此。

曾将千华寺的故事告之大师南怀瑾之高足古道法师，君俗姓崔，鲜族，擅画，有禅意。师三次来溧，陪侍上瓦屋谒宝藏禅寺。后告知他独赴崔芥，甚喜千华，思重修寺院，憾周遭开山放炮，风水殆尽，惜罢。

古道师戴长舌帽，穿冲锋衫，开越野车，行脚匆匆，入世出世，俗人莫辨。后悉师去江西洞山接管寺院，恢复曹洞祖庭，传宗接派，修禅念佛，渐断音讯，甚念。二〇一五年三月，在吴江太湖大学堂南师诞辰纪念会上，又幸遇古道师，相晤甚喜。其言宝寺已修葺告成，邀去。时光匆匆已六年过矣。古道俨老法师也，平淡冲和，法相慈善，善哉！是为附记。

湖塘庵与僧寂炎

状元马世俊有《湖庵西禅堂题词》曰：“洮湖为三郡界，枕湖而居者，烟火相望地，有湖荡村。村有庵，庵分东西房，其西堂住持僧曰时哲者，法名寂炎。河西王氏子，幼丧怙，薙发律身，严正出於天性。晨夕梵呗，人感其诚。时大悲殿颓圮，师与一方贤者谋修葺之，且自出钵资，而圮者复兴。方欲有事於西禅堂，值鼎革而止。师乃诣吴门元墓剖石和尚受具戒，执事两载。以母病笃辞归，仍留庵中。水潦洊至，众皆散去，师独於课诵之。暇躬亲畎亩，以兴未竟之愿。建堂三间，颜曰：善笑。前为客坐，以问计者如堂，更募香火田若干亩。诸檀请余识其事，且有问於余者曰：申酉之乱，烽火遍野，甲者望屋而食，居人十逃其九。荆棘满村落，而庵中之声声不辍也。及承平后，或披云以耕，或带月以读，或冒风雨霜露，以商以渔。而师未尝行脚向人索一囊米，其庀材鳩工皆不劳而自至。此何以故？余曰：君不见洮湖之水乎？当其狂飈顿起，怒涛如矢镞，冈岫杳迷，帆墙倾折，而湖

之性非有所损。及其天日澄霁，群峰历历，水平似镜，渔蓑贾航，皆入图画，而湖之性非有所益。时哲师之居此庵也，大众岌岌以避乱，而师无所失；大众忧忧以谋生，而师亦无所求。何以异於此湖也欤？诸檀请名此庵，余曰：欲名之，终无踰於湖者。遂为之题其略，而并书檀施之名于左方。”

寂炎，字时哲，受剖石戒法，得孤云宗风。与马世俊、吴颖等乡贤唱和颇多，是位诗僧。吴颖赠他的诗，曾有“听得潮声不用耳，心通世态只如禅”之句，因他晚年耳聋失聪。

溧阳贡生潘如俨有《和吴邑侯湖荡寺韵》：“云静湖光远，风生竹径幽。妙香空色相，闻处即清修。”亦咏此寺。

高僧传

僧希觉，字顺之，俗姓商，毗陵（常州）人，迁居溧阳。唐末逢乱，在给事中罗隐家当佣，罗资助上学。文德元年，他二十五岁，在温州开元寺出家为僧。

比邱和尚景伦，溧阳人，往金陵途中被句容县令周惟叙挽留，在赤山建圆寂寺供居住，知府叶梦得相助办成，事在绍兴年间。

大慧禅师宗杲，七十三岁时从金坛到溧阳，访友侍郎刘岑，取道宜兴返回。

祖传法师，溧阳宋氏后人，其徒弟慧鉴亦为同宗。宋朝嘉定初年，金坛人吏部尚书曾暎重建布金寺，祖传法师实为开山之师。金坛刘宰记之云：“传一盂一衲，外无赢求。鉴以应供得赢为耻，惟自食其力。凡寺之荒冈断垄，悉树以松，其级而下者为田，农者去之曰是不可稼。乃薙其芜，乃窒其疏，而潴其上游以溉。岁甚俭亦克有秋，化蓁芜为宝坊，更雨湿短昏，为高明爽垲。嘻！其盛矣。又云：某闻人道之所以立，曰不忘先也。释氏之所以兴，曰不忘施也。若曾公其不忘先者欤？传与鉴其不忘施者欤？书之石，识其两得也。”

正果法师，字天然，溧阳人。幼年礼拜南京鸡鸣寺的古心禅师。他明心见性，了无俗累。明代天顺四年，在句容的兴教寺当住持，恪守清规戒律，士绅都敬重他。长洲县的戴洲赠诗给他，有“明月止水心源净，花落闲庭色相空”之句。县令太原张某对他尤其敬异。

远梦和尚，溧阳人，居金陵。他俗名袁应魁，弃家出游到雁荡灵岩谷，削发为僧，改名圆魁。然而他不热衷礼佛诵经，常常掩门静坐，冬夏仅穿一件衲衣。明

万历十四年，祭酒戴愚斋给他写了疏文，募款建造灵岩寺。寺建后他说：“有寺无经，佛法何明？”又持戴祭酒的书信到金陵化缘刻经。万历二十年正月十六日，远梦在元真观中忽然独语：“印藏经已有时了，今天应印好完毕了。”遂然坐化。过七天，鬓发渐生，城里许多少人前来瞻仰礼拜。元真观主郭怀野将情况禀告给宗伯王公，王公吩咐置备佛龕火化，火化时烟都向西飘去。被褥间遗下一张偈语：“自古原无死，无死亦无生，作一黄梁梦，亘古又亘今。”

汤头陀，城西人。年轻时为屠夫。一天，他把母子两牛缚于柱上，先杀其子牛，走进屋去，出来发现磨刀石上的屠刀不见了。边上一小孩说：“刚才母牛衔了一把刀，不知放置何处。”他到处寻找，在河里找出。发怒要先杀母牛。母牛跪下，哀鸣如诉。汤觉悟，毁刀弃绳于井中，出走，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他七十多岁始归溧阳，身披僧衣，自号“澹斋”，说常住在杭州的招隐寺。

正传法师，号幻有，溧阳吕氏子。二十二岁因感香山小说出家，从荆溪（宜兴）沙门乐庵剃度。乐庵死后，他为其守丧三年。寻到京师，拜谒笑岩禅师，得大悟。明万历年间，受到两宫供奉，共留二十二年。后来栖息五台山，静修十三年。遇见武进唐太常鹤征到五台请教佛法，请他南归，驻锡宜兴之龙池山，宗风大振，弟子有天童、天隐两位禅师，再传至牧城、玉林。而临济正宗得法者数以万计。禹门禅院还有鹤征和正传的塑像。

释璇，字师南，本县燕山杨氏之子。壮年向往佛法，去参拜浙江天童寺，体会诸佛心印。与石奇、雪窦诸公友好，回乡后在屏风山讲法，有语录行世。

海证，字道明，起初随屏风山的四川辨轩法师，背负瓦石建寺。后游菱山，筑静室簏簏园居住。参研大乘禅理，各种佛典莫不了解透彻。圆寂火化时，异香满院，得舍利子数百颗。

守安，中桥王氏之子，居夏林，闭门修道，有白燕绕过佛龕。太仆宋劼称赞他有儒释不二之悟性，邀请他赴东寺说法，并将皇上赏赐的朝带送他，他的后人一直珍藏。

庆祐，号自天，溧阳李氏之子，二十一岁，在五台山出家，后参拜瑞光彻禅师，师许为入室弟子。顺治初，他进京与黄冈、山阴两学士倾心有礼，两位欲向朝廷推荐，他拂衣不顾。与平常开堂说法之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碧露，四川綦江王氏之子。明崇祯十六年生，二十岁时，拜渝州慧觉和尚为

师,过了十年才决计剃发为僧。写了《心颂》呈献师父,深受器重和期许。师涅槃,他到华岩谒见圣可禅师,后来又遍访名宿,如天童山、雪窦山、弁山诸老僧,神悟超然。康熙二十六年春到溧阳,在城西仙人山搭茅屋居住,葛氏捐地给他,逐步创建崇隆寺。寺庙焕然,众僧聚集。己卯年,天旱,他虔诚诵颂《华严》祈祷得雨,年岁大熟。辛巳年应邀到金粟寺,三年后百废顿新,风规大振,又在海宁盐官亲自创建下院。僧人凡人都对他十分敬仰。一日,在安然解说偈语时归寂,时为康熙四十二年。遵其遗嘱归葬溧阳崇隆寺侧。

清光绪志记:“崇隆寺,在仙人山,重建渐已复旧。寺创始于碧露禅师,故武弁也,祝发驻锡于此,遗制寺无山门,而虎狼驯伏不扰。”彭光斗《瞻遗像》诗云:“御甲投戈日,披缁卓锡年。须眉犹带杀,锋镝忽通禅。虎卫林间座,僧耕塔畔田。我来瞻异范,非是学神仙。花雨频敷岭,松风不掩关。石衔流水住,鸟约白云还。禅喜方投社,尘踪又别山。回看青嶂合,虚羨老僧闲。”

海念,字德如。他志行坚密,与碧露同参南岳,深契宗旨。他收敛锋芒,深居不出。本县西门外双桥倾圮倒坍,海念募捐积蓄五年,修筑告成。世寿九十五岁,盘膝端坐,说偈而寂。

僧悟惺,住持法兴寺,幼师事大箬山僧万缘,能书画,尤潜心于医。讲宗旨于澄光禅院,弟子以千计。届六旬,医学益精,尝语人曰:假我十年,学力於此,其庶几乎?有求医者虽甚,雨跣足奔驰,无间寒暑。同治初,粤逆救平,悟惺归益,以阐扬宗风为己任,大箬山禅院、澄光寺、法兴寺,皆其所重修云。

溧阳佛教,根深叶茂。据清嘉庆志载,邑有寺院 60 家,有庙庵 147 座,可见当年盛况。

溧阳佛教,源远流长。地藏行脚燕山,道明开创瓦屋,僧伽行化三塔,优曇讲法□坛,澄观遗井报恩,贯慈手持冰莲……这些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菩萨、法师、高僧、大德,都在江南古邑留下他们心印足迹,开示浑沌,顿悟禅理,积德行善,普施法雨,幸甚!幸甚!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溧阳道教索隐

道通天地，德善人间。

道教，中国本土之宗教，以老庄先哲之学为核心，融天地人三界共生，提倡“道法自然”，推崇修身立德、上善若水之境界，参悟“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智慧，倡导“人能常静，天地悉归”之自律，争取“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构建。

厚德载物。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道立德，以德载道”，形成了传统的文化精髓和道德标准。先人们立“道”之德，行“道”之路，求“道”之理，大道无名，海纳百川。一部老子《道德经》，成为古代宗教之经典，成为文化传承之内核。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甲午初春，有幸陪北京东岳庙住持袁志鸿高道赴茅山，受益匪浅。袁道长由茅山入道，后到中国道教协会工作，道行颇深。返京后承寄专著《凝眸云水》，是其对道教的上下探究。

记得在金坛道教圣地乾元观，幸遇全真龙门二十五代传人信慧道长，俗名尹菊芳。她出家于杭州抱朴道院，返茅山郁岗峰下，苦营苦修，胼手胝足，白手起家，历时廿载，复建历史名观乾元观。这里是陶弘景宗师的修行地，所谓“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素有“第一福地，第八洞天”之称。尹道长慈眉善目，温文尔雅，今日乾元观，已是气势恢宏，道风盎然。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乾元观已从茶场房舍恢复成著名道观，这需要多强的修持定力和多苦的亲力亲为啊！

闲谈之时，言及溧阳道教，尹道长娓娓轻言：溧阳历史上有许多有名的道观，如需要，我们愿意尽一点力去恢复。

我很感动。

记得去年初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来到了全真教龙门派的发祥地和祖庭——龙门洞。这里地处陕甘宁交界，偏僻闭塞，交通不便。陡峭的山岩上，却林立高

道修行的洞窟，大师丘处机在此面壁七年，参玄修真，长春洞里的磨性石已抚摩滚圆。大雪封山，林静壑幽，盘山石阶上只有老道扫雪清路。风过松鸣，崖直壁立，浅窟悬空，梯垂链挂。这修行圣地有道吗？

道，飘逸灵动，神秘潜隐。

溧阳道教索隐，也是寻根之道。

太虚观 在盘白山，是晋朝盘白真人得道之所。现叫观山，因观而名，在省
道 239 大溪段。

南朝梁简文帝曾下诏，在盘白真人住宅处建道观，并赐名“招仙观”。宋朝大中祥符元年改名太虚观，并且赐铜天尊一座，真人像二座，观内有九口井，真人炼丹，藏于井中。

《金陵志》注：观的西北，有南唐隐士许坚的放鱼池；观东北有汉朝蔡伯喈的读书台；山顶有会仙亭遗址。观有铜钟，是唐朝大历六年铸造，钟上有铭文。

明万历年间赐有道藏，乃道教经典。清嘉庆志载，道藏久已散失，但用朱笔写的圣旨木牌、铜真武像还在，还有一根铁鞭，重八十多斤，说是铸铁香炉时，用余下的材料所铸而成。

太虚观应是溧阳最为著名的道观。观现在陆家边村西，久废，有石井盆在，尚有明刻龙碑立于陋室。山顶多年前登临，会仙亭荡然无存，下有一“龙池”，常年不涸，像炼丹井，中有动物游动，乃蝶螈类。村民告之，龙池下有洞，可通杭州，曾有好事者舀水干之，了无发现。登观山顶，下有大溪水库，古有黄山湖，山川秀丽，真乃神仙居所。正如元朝周子固《题太虚观诗》描述：“闻说江南盘白山，异哉仙境在人间。千年楼阁空中起，一片湖山画里看。煮药炉边云气发，步虚坛上雨声寒。明朝捧诏朝金阙，好借双溪一鹤还。”

昔日的千年楼阁和步虚道坛，早已乘鹤羽化，我们只能从前人的诗赋文略中感受当年盛况了。

《泰虚观记略》

陈名夏

盘白山距黄山不数里，再生真人，黄鹤南飞而白羽又西举。至今登陟其间者，每有翩跹望仙之思，可不谓山林之标异者乎？其概虽载在县志中，而实未悉其所以异也。名夏窃追而论之。古濂通江水源，宏远其

行也。淳泓迢选，凡五历诸荡而蓄泄众流，始旋绕城邑，汇归太湖。其山则从伍牙山祖分支直绕县龙而西，递吞江潮，以黄山湖为呼吸，烟波万状而灵异孕毓，盖本诸此。且随山之水有日月两曜，为捍门第二峰。石上有仙人迹，与黄山飞升鹤迹仿佛。又真人尝饲养一虎，不血食，世称仁虎云。其风洞则深邃不测，殆仙风出纳之窍。而蔡中郎读书台、史贞女击绵石，皆山中遗迹。迨乎唐之李白选胜来游登北湖亭、望瓦屋山，旁皇赋诗，有如遇烈丈夫、贞女子之慨！而濑上一碑，怅怀尤甚，当时虽有县令郑晏为之居停，绝不闻有一二山中主人以渔歌樵唱相与赠答，抑何落落也！开元时山有亭曰会仙，宋改泰虚观，故事遂多湮没。求所谓李仙公碑、许坚放生池，几无复存焉者。且自明初东坝加筑，阻水横流，山川之秀亦因之一减。纵有羽流高尚，修业名山，亦多淹抑不振。既而慈圣李太后颁道藏於此经楼，仪卫屹然，复兴间有就读参悟、领颺指归者，大成元功，小就艺术，咸足以名其家而述于世。而环山人士族姓繁昌，抗怀仙迹，屡助修构，元风大畅，八景载扬，庶真人之灵久远保护，与佛氏并垂勿衰。名夏欣逢胜举，故不辞而为之记。

陈名夏撰此记，详叙了盘白山太虚观周围的名胜古迹、人文渊源，从山水形状到灵异学毓，表明他对风水地势的精通，和对地方人文的熟悉。该文是我们了解太虚观的范本史鉴，在文学性、史学性上堪称佳作。

幽栖观 在县城北三十五里，有幽栖伯祠堂。

据《金陵志》注解引用旧县志云：宋绍兴中，县尉朱大廉记曰：“幽栖观，旧梁普通二年，有隐士号幽栖伯炼丹成，全家白日升天。其宅居道家流，梁以其号名曰：幽栖观。基延袤三十亩，周围有田有园，广半顷，皆仙人之旧产，旧有碑，不存。观中有藏丹九井，井泉甘美，不减惠山。观东北有小阿，号朝斗山。山侧有井，云幽栖伯祭北斗器藏其中。山之右有望仙桥，当升仙之际，居人瞻仰而名也。许坚题诗石刻尚存（按：今石已废）。诗云：‘仙翁上升去，丹灶连晴壑。山色接天台，湖光照寥廓。玉洞绝无人，老桧犹栖鹤。我欲泛灵槎，他时冲碧落。’”

黄山观 在县城西南四十里的黄山下面。

据《金陵志》注云：旧传西晋时有黄鹤真人修道飞升，唐天宝九年置观。州志

濂水钩沉

载：宋屯田员外郎周绛少为道士，一夕弃冠褐，发愤读书，登太平兴国八年第，是岁及知常州，日有书谢道友，观中藏之。

元初蒋时中《黄山观》云：

黄鹤山中黄鹤观，黄鹤仙人此修炼。
功成羽化归丹邱，环佩珊珊度遥汉。
昔闻有鸟名令威，去家千年今归来。
仙人一去不复返，长松落雪秋霏霏。

陈宗泰《黄山观》云：

翠微精舍有神仙，黄鹤时来听讲元。
一自仙人骑鹤去，桃花流水似当年。

灵宝观 在县城西面六十里的芝山。

据《金陵志》注云：旧传梅福学仙之所，唐咸通二年修，宋太平兴国中重建。州志案：福传居家，以读书养性为事。汉元始中，王莽颠政，（梅福）一朝弃妻子去，传以为仙。后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岂尝寓此乎？元丰中，封福寿春真人。

泰清观 在县城东南角，儒学的左面。宋淳熙十年（1183）道士王灵和迁移溧水废弃门额建造。据《金陵志》，理宗时（1225—1264）有金真人发迹于此。明正统初年，邑人戴庆祖请道藏贮焉。后移城隍庙东。

明高淳诸生邢昉《泰清观楼雨与李长公》云：“东风逼晓烟，日日雨如绵。俱断城深屐，独看楼角天。怜春三月破，焚火一桃然。君饮无鱼爵，偏愁乏酒钱。”

溧阳道观，尚有梁代道士谈名芝建的崇福观，唐开元初年建的永仙观，唐咸通年间建的圣祖观，唐长庆元年造的崇德观，宋朝建的紫霄宫、佑圣观、白石道院，元朝建的佑圣院、衍庆观，还有明清时期的白龙道院、清虚观、聚仙宫等。

“黄鹤飞来随带松花香道院，白云归去故留明月照丹台”。溧阳道观，地处“一片湖山画里看”的江南福地，感叹“异哉仙境在人间”的修炼境界，幽栖黄山，太虚灵宝，崇福崇德，永仙聚仙，启人间正道，佑十方百姓，成为地方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

“道德五千言玄通圣典，楼台十二仙境在人间”。溧阳高道，不乏高人，参透高论，羽化高升，“入真门秉真心参透真玄真自在，来妙理达妙境展开妙道妙神通”。志有记载，兹有笔录。

黄鹤真人 姓淳于，佚其名。孙吴赤乌间遁迹小茅山，受葛李先生秘诀。至两晋时功成，骑黄鹤飞升而去，今黄山观即其修炼得道之地云。

仙者李盘白 溧阳人(旧县志作陇西成纪人，避魏武之役隐居溧阳)。西晋初筑室高邃山之西陲炼丹，丹成，以九井藏之。得玉苗芝一本，类白莲花。养一虎，饲以药苗清水，不血食，谓之仁虎。峰顶作一亭，名会仙。元康元年八月十五日，清晨轻云缥缈，异香纷郁，太极仙翁、八洞天仙俱会于亭，乃服丹。玉皇遣朱衣使者斋玉册，诏补吴越仙任。盘白老鬓皤然，而绀发盘顶，因以盘白为嘉号。仍以名山事载于碑，或曰名盘柏云。梁简文帝诏，即真人宅造观，目曰：招仙。宋改泰虚。

幽栖伯 姓名无所考。隐居县北三十五里，梁普通二年修炼丹成，全家四百余指皆飞升去。后人以宅为观，额曰幽栖云。

宗法嗣 字宣远，溧阳人，魁岸峻拔，神仙中人也。唐开元初，于县西北四十里建永仙观，观内造玉清灵台诸胜，世称宗先生。

许坚 不知其家世。或曰晋长史穆之裔。形陋而怪，幘巾芒屣，短襦至骭，自负布囊，常括不解。每就涧浴不脱衣，出而曠之。或问其故，则言：“天象昭布，虽白昼亦常参列，人自昧之尔，其可裸裎乎？”得大鱼则全体而烹，不加醢盐，熟即嚼之。溧阳下山寺有诗(诗见《净土禅院》)。后或居茅山，或入九华。樊若水勉之以仕，颦蹙不答。尝至阳羨，人不之识。一日涉西津，凌波阔步若平地。然众昉神之不知其所在。(据《南唐书》)坚又尝游溧阳泰虚观，观西北放鱼池其遗迹也。幽栖观亦有石刻坚诗(诗见《幽栖观》)，元时尚存。(据《金陵志》)

周绛 宋初本县人，幼入黄山观，从道士杨用柔为老子学，名智进。适县令视水菑至观，威仪甚肃，因悟所学之非，改业为儒，更名绛。攻苦问学，登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第，由都官员外出守毗陵郡。与黄山观道友书信经还，信藏观中。其诗《招仙观》云：“骨化黄金鹤化胎，仙翁轻举出尘埃。石幢云锁水常在，玉马星驰炼未回。绿葍晚烟梅雨夏，朱藤余萼麦风开。丹泉长活芙蓉死，会买张山卜筑来。”

这是溧阳较早的关于茶叶的诗，“绿芽晚烟梅雨夏”，写明招仙观下梅雨时节，绿茶如烟、麦浪翻涌的景象。证明当时地方种茶已很普遍。

周绛是位茶专家，曾著《补茶经》一卷，今已不存。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绛，(宋)祥符初知建州，以陆羽《茶经》不载建安，故补之。”“丁谓以为茶佳不假水之助，绛则载诸名水云。”“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即出于《补茶经》。

黎道人 少落魄，去家足迹遍秦魏。宋政和间游陕西，夜为虎窘，鼠伏古庙。顷灯光中有三道士饮，数童侍。黎惊起，道士询所自，且以银碗酌饮之。自是不饥，惟饮水而已。宣和中至邢之磁村，闻四畔皆哭声，有媪曰：“夜间野犬为祟，搏食孩稚。”黎曰：“吾当杀之！”经宿哭声至，即持逐捕，乃一村媪，煤而裸身，化形而来，解郡斩之，祟遂绝。建炎多难，黎归溧阳，结茅庵于市侧，遇兵疠必先知之，辄别去。人每视其去留为安否。其族为营一庵以事之，会县中火灾，黎往救，四门皆有一黎人，愈崇信。黎转不自安，一日奄然逝后，有人遇之建康，且托讯其里中故旧。好事者因启棺视之，止存草履焉。（参据《闻史》及旧县志）

金真人 城西金巷人，幼愚戆不事检束。父母遣执洒扫于太清观，夜梦三茅真君授以灵符密咒，既觉忘之，复梦如初。凡三夕乃能记忆，皆御灾福民、祈祷秘文也。宋理宗时，钱塘江潮为患，天师方士不能治，真人曰：“我能治之！”晓抵江滨，众薄其貌不为礼。真人乃呼取铁券，以丹书符投券而三叱之，潮遂平。丞相史弥远引以见帝，赐三品道官，及粟帛之类，皆不受。问所欲，曰：“原免三茅峰税粮耳。”帝可其请，赐真人号遣还。弥远赠以诗云：“千载天师龙虎山，久无音迹到人间。茅山自有金真士，除却江潮免税还。”或大雪中，浴市河不解衣服；或伏水上如龟形，或逾半月不语，或三四日不食。凡旱潦，真人祷之辄应，初不假符咒也。忽一夕，不知所往，其徒晨访之，乃侧卧三清殿几上，近视已僵矣。（参据《山居野志》及旧县志）

散仙吴玉 号心元，或云江右人，或云宣城广文。师段、籍二真人，流寓溧阳南溪，陈氏延为塾师。邑令董(天启初知县有董允升)闻其有异，敦请祷雨，立致甘霖，濂土沾渥，邻邑无流潦焉。某亲藩以币交吴，托尸交没。后有人自西蜀来，附书门下士盛乳阳、陈闾儒辈，有“相逢十九年”之语。至崇祯己卯，而诸人谢世，符十九年之识云。（据《濂水备闻》）

任聃年 宜兴人，为溧阳太清观道士。明崇祯甲申之变，聃年备法衣加衰，诣县治举哀，礼成，遍别所知言：“吾分当死，设三日醮。”入玉华山，端坐而逝。（据《江南通志》）

溧阳地胜，钟灵毓秀，道家筑观，方外修行。“大道无为清静身心即黄老，任天而动逍遥尘世亦神仙”。既有黄鹤南飞、白羽西举，又有幽栖丹成、梅福寿春；既有黎道驱崇，又有金真平潮，都是修真参玄、造福于民的善行良德。

“观沉潭月影遂知身外有身，听夜静钟声惊醒梦中之梦”。纵观昔日道观，久已废圮，今日道教，渐已式微。月潭沉影，夜钟惊梦，何登蓬莱？何聆仙乐？何悟真玄？何沐清风？

“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应丢弃，不能遗忘。作为民族文化之根基，理应弘扬传承。

溧阳傩文化溯源

傩，源于原始社会的一种图腾崇拜，一种先人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

傩，滥觞于史前，商代形成固定的模式，先秦就有娱神又娱人的巫歌傩舞。明末清初，傩舞吸取戏曲的形式，盛行一时。

溯行历史的长河，追寻傩文化的渊源，我们会发现傩的形成发展、兴衰传承之进程曲折起伏。时而涓涓细流，时而汇聚奔涌，时而潜入地下，时而呼啸而来，那种乖张狞戾，那份奇异神秘，摄人心魄。

随着时间的流逝，嫩江、黄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傩，日趋衰亡。云贵、楚巴、赣湘地区尚流传保存。但在苏皖两省交界的溧阳、高淳、广德、郎溪一带，傩，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活”了下来，它以独特的生存形态遗存于世，它以独特的生存载体流传至今。作为傩文化在江南的孑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我们对溧阳地区的傩文化进行追根寻源，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

—

溧阳，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地枕吴山与越溪”，“吴风楚韵，兼而得之”，特殊的地域环境，造就了这方山水秀丽江南福地的人文积淀。蔡邕亡吴，隐居溧阳，筑读书台，斫焦尾琴。伍员奔吴，路过溧阳，贞女赐壶浆，千金报义德。李白来吴，三到溧阳，酒楼会张旭，传颂《猛虎行》。

《吕氏春秋·季东纪》有云：“命有司大傩。”大傩，即逐阴导阳、击鼓驱疫的仪式。这种“国傩”的演绎，在民间以“乡傩”形式传承，兴兴衰衰，隐隐现现，其踪迹之诡异多变，与历史发展之轨迹契合。

溧阳地区的傩舞傩戏，最早有文字记载者，应是唐代大诗人孟郊。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唐贞元十六年（800）为溧阳尉。他在任时除留

下千古绝唱《游子吟》外，还有一诗《弦歌行》值得深读：“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暗中岑岑拽茅鞭，裸足朱禪行戚戚。相顾笑声冲庭燎，桃弧射矢时独叫。”

孟郊在诗里活灵活现地给我们描摹了一幅驱傩的场景：鼓声隆隆，笛声萧萧，一群开颜染面的人扮成瘦鬼，只看到白白的牙齿。黑暗中驱鬼的茅鞭在嗖嗖作响，赤脚穿着红裤子的跳傩人急急地行进舞蹈。他们看到各自的扮相放声大笑，笑声冲溅起手中火把上的火星。他们用桃木制的弓箭射靶驱邪，射中的人不时兴奋地大叫起来。

《弦歌行》是一幅生动的唐代傩舞图，应是研究傩文化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它告诉了我们许多信息，当时的傩乐有鼓有笛，具有江南特色。跳傩者乃“染面”，证明当时不戴面具。傩者赤足红裤，还没有戏袍背旗。傩仪有桃弓射矢过程，而且在夜里举着火把举行。

陆子遹，山阴人（绍兴），宋大诗人陆游之子。他于嘉定十一年（1218）在溧阳任知县。县志载他“锄暴植良，威惠兼济”，“弊除经祠巫观之妖，有白云教者，横据民业，悉追还其主”。嘉定十三年，他写有《除妖记》，记叙了溧阳地区民间祭祀之风盛炽：“皆以经祠之鬼依附假托，种类实繁。”“殊状丑态，骇愚惑众。土木之祠，藻绘于躬鬼之部伍。”“自夫五福殇鬼之暴也。”“雉羽宝钺以饰其怒，长啸距踊以辅其气。曰：吾得请于神矣！及梏而致之狱，一问无异辞。狱成而审之，欣然称不冤，及出过通衢，长歌有得色，自谓死为神之！”

《除妖记》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视“傩”为“妖”的。我们从正面来读，则可见当年祠庙众多，信徒甚众，傩依附“白云教”等形式出现，且是“雉羽宝钺”，“长啸距踊”，已和唐朝的“裸足朱禪”有所不同。舞者以为“神魂”附体，拘而不惧，杀当长歌，一副大义凛然的气势。

仇远（1247—1326），字近仁，号山村民，钱塘（杭州）人，宋末以诗名，工诗词绘画。元大德中，仇远为溧阳州教授，存有《金渊集》、《无弦琴谱》诗集。他的《三月二十六日书所见》诗言：“从来赛社说金渊，鼓留钲旗隘市廛。地上鬼神行白昼，夜中风雨洗青天。妖氛旱魃驱无迹，和气欢声兆有年。车马纵观儿女事，老夫闭户读韦编。”

仇教授笔下的赛社与陆知县笔下的“除妖”，性质完全不同。一个是从驱鬼

祈丰的民间赛会来描述，一个是从妖孽惑众的角度来斥责。两人相隔不过几十年时间，但“妖”不仅未除，而且愈演愈烈，公然上街游行，尘隘市井，由昼到夜，和气欢声。击鼓吹笛（与孟郊之述一辙），摇铃扬旗，昼行鬼神，夜雨洗天，妖魅无迹，丰年有兆。“从来赛事说金渊”，这金渊为溧阳旧称，伍子胥过昭关，行乞濂水畔，溧阳史姓义女给予壶浆，为守信诺抱石投江。子胥伐楚返吴，于濂江投三斗三升金瓜子，以祭贞义烈女，是为金渊。由仇远诗可见，当年溧阳的赛事祀会十分兴盛。县志载：“元时，溧阳俗喜赛会。”而傩舞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又盛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元初，诗人蒋时中有《过赵明王庙》诗两首：“咚咚社日枫林鼓，旌旗飘拂神鸦舞。池藕无花岸草荒，只有斜阳自今古。”“古城西风吹袷衣，下马一访真王祠。断碑有字不可读，汉家旧事无人知。”此处的赵明王应为赵禹，据《金陵志》称赵为土地神。唐中和二年（882）乡贡进士林云所撰碑记，叙赵禹为汉人，死后封神立庙。蒋诗里的咚咚鼓乐，祭祀社日，旌旗飘拂，神鸦乱舞，与古傩仪式无异。神鸦，溧阳人称“放铙”，类似烟火炮仗，绑在竹竿上，发射入空。该仪式至今沿用。

溧阳人严瑄，元至正十三年（1353）进士，他的《史侯庙》一诗，也道出当时祭祀的风俗：“一方祭祀传荆俗，千古衣冠出汉家。春雨落花沾鬼蝶，夕阳高树噪神鸦。”这里的荆俗，应为楚国别称，战国时溧阳曾属楚，其风俗深受其影响。

关于溧阳古傩的踪迹，在繁史浩帙中时隐时现，时贬时褒。清雍正四年举人宋辰，曾任广西融县知县，他撰写的《后除妖记》中有一段关于傩面具的记叙，十分引人注目：“城中有五猖庙，厥状狰狞，奸民借以生半。弃产媚鬼，络绎不绝。又，邑有前马村，民居稠密。相传宋时，湖荡夜忽有光，探得二木箱，中贮奇形异状木雕傀儡若干，陈芮二姓各分其半。每年春杪，科前迎赛，奔走若狂，相沿已久，日增月盛。宰牲聚饮，费甚不费。”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宋时的傩事，已有“奇形异状木雕傀儡”，春天时分，赛社主人“奔走若狂，相沿已久，日增月盛”。“唯前马迎赛俗终不改”，该记后两句诗曰：“傀儡由来自昔传，华光作福赛年年。”

泛舟史海，溯源觅流，溧阳之傩事自唐至宋而元，流传有序。其虽常常被妖魔化、另类化，常常处在被绞灭、铲除的边缘，但它还是顽强地潜伏下来，以不同的载体传承下来。这正如那黑暗里忽明忽灭的火把，照亮了历史渐进的道路。

忠烈杨邦义

1985年春日,我和大舅周镜泉同赴南京雨花台,去祭拜一位宋朝忠烈。

电大三载,行将毕业,当写论文以充滥竽。致电大舅询之,他思索后答:“有一个人可以写,他曾任溧阳知县,后任建康通判,是一位民族英雄,事迹可歌可泣!我原打算写戏的。”他说的此人就是杨邦义。

大舅供职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对儿童文学、戏剧有研究,与国学名师徐复、常国武交好。为增加我的感性认知,特要我赴南京,去实地拜祭一下。

雨花台西山的一处僻丘,有一碑一冢,碑文为“杨忠襄公剖心处”,读来触目惊心。杨邦义为何人?又是谁将他开膛剖心?

公元1127年,金兵掠徽、钦二帝而归,史称“靖康之难”,北宋亡。是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改年号建炎,是为南宋。

南宋初,金兵的马蹄继续践踏中原的沃土,烽烟四起,生灵涂炭。宋高宗赵构登极之初,曾起用主战派丞相李纲,似乎做出抗战的姿态,而李纲又任用宗泽、刘光世、韩世忠等将领,率军抗金。赵构多疑,为抑军权,又设立御营司以统控军队,命副宰相黄潜兼御营使,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兼副御营使,造成牵制、监视抗金将领的局面。

在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面前,宋朝廷迅速分化为以李纲、宗泽为首的主战派,和以黄潜、汪伯彦为首的投降派。而昏庸的高宗表面上主战、骨子里求和的矛盾心态,左右着南宋江山的动荡摇摆。在外患日深、朝廷朝夕难保的民族危难关头,是屈膝投降、苟全性命,还是不惜牺牲、忠义爱国,成了检验宋朝大小官吏的试金石。

杨邦义(1085—1129),字晞稷,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安县)人。他生于“世以儒学相承”的家庭,父亲曾登进士第,但在邦义出生前五个月就去世了。父亲

早逝，母亲就让三个哥哥事农学徒，全力培养邦父，全家省吃俭用，生活清苦，但在邦父没满十六岁那年，母亲又离开了他，兄弟们相依为命，邦父十分敬重兄长。

庐陵(今吉安)有忠贤祠，祀欧阳修(1007—1072)。童年时代的杨邦父常去祠中，对欧阳文忠公的道德文章颇为仰慕，这对他的一生都有深刻影响。

《宋史》记：“杨邦父，博古通今，以舍选登进士第，遭时多艰，每以节义自许。”“邦父少处郡学，目不视非礼，同舍欲坠其守，拉之出，诤言故旧家，实娼馆也。邦父初不疑，酒数行，娼女出，邦父愕然，疾趋还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责。”

宋杨万里《诚斋集》记，杨邦父太学七年，“苦心嗜学，言行忠教，必以古人自厉”。北宋政和乙未(1115)年，他“赐第还乡”拜见诸兄，情真意切，乡人郭孝友撰文赞曰：“予嘉杨氏友其季而不伐，恭其兄而不忘，是可振颓俗矣。”一时传为乡里佳话。

杨邦父“举进士入官”后，“历婺源尉，蕲、庐、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阳县。”(《宋史》)元《金陵新志》和清溧阳志记载，知溧阳县时为“靖康(建炎)元年十一月”。

知溧阳期间，杨邦父廉洁奉公，生活上粗茶淡饭，夫人亲自缝补炊饮，家庭负担较重，但下属有难他总是解囊相济，毫不吝嗇。他为人刚正不阿，从不巴结逢迎上司，但十分关心百姓疾苦。溧阳是个鱼米之乡，但地方久苦苛政繁赋，百姓生活贫穷。杨邦父到任后，实施改革弊政的措施，“均征徭”，减轻百姓负担。对犯罪之人，“先教化后刑威”(《诚斋集》)，得到地方的好评称许。

杨邦父体格魁伟，神色明秀，待人接物，温和文雅，遇事有“万夫不能夺”之志，坚毅果断，又足智多谋。

县志载有杨邦父智平“周德之乱”一事。“时江宁府禁卒周德叛，囚其帅宇文粹中。县卒有起应之者，邦父谕止之不听，至旧县劫巡检为魁。邦父出狱囚贩私茶者赵明，谕之曰：‘尔所结多里中豪能，纠集杀贼，贯尔罪且官尔，明请遣往！越日，得众如千人往。擒贼，邦父悉斩之，以二渠报府，县人获安。’”《宋史》云：“会叛卒周德据府城，杀官吏。邦父立县狱囚赵明于庭，欲诛之，因谕之曰：‘尔悉里中豪杰，诚能集尔徒为邑人诛贼，不惟宥尔罪，当上功畀爵。’明即请行，邦父饮之卮酒，使自去。越翼日，讨平之。”元《金陵新志》云：“设方略围捕杀之，贼以故不得逞，卒就擒。”

此事说明杨邦义颇有智慧谋略，能利用地方势力平定暴乱，求得一方安宁。他任知县其间，“三年盗不入境”。面对金兵南侵的险恶局势，杨邦义“训民为兵，五里一墩，号令期为，明信而肃，枹鼓一鸣，遐迩毕集”（《诚斋集》）。他的举措，深孚百姓之望，以致当他调离之时，溧阳乡亲“惟恐其去”、“倾邑请留”，以致他走后，“邑人德公，肖像祠之”（《诚斋集》、《嘉庆县志》）。

因平乱有方，杨邦义“事闻于朝，差通判建康军府事”。是为建炎三年（1129）九月。这看似提擢的好事，其实是把他推到了生死的边缘。此时，金兵大举南下，南宋岌岌可危，建康（南京）朝不保夕，让杨邦义去协防城池抵抗金兵，无疑是放到火堆上去烤。

《宋史》载：“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仆射杜充为御营使，驻劄建康，命刘光世、韩世忠、王玘诸将悉听充节制。”赵构拍拍屁股自扬州抵建康逃临安，留下将领抗战但又要听御营使节制，那么杜充又是什么样的人物？“充性酷而无谋，士心不附。渡碭沙，充遣陈淬、岳飞等及金人战于马家渡。自辰至未，战数合，胜负未决。王玘拥兵弗救，淬被擒，王玘兵遁，充率麾下数千人降。”历史总是开着相似的玩笑，昏庸无能的君主任用溜须拍马的奸臣，而精忠报国的良将总是被压受制，最后折戟沙场，血洒疆土，以身报国！当然，其中还有卑劣小人的公报私怨、见死不救！

《金陵新志》记：“三年，兀术入寇，渡淮薄江，师于东采石。时宰相杜充总诸道兵，留江上，左显谟阁待制陈邦光守建康，李柷以前执政为户部尚书，供馈饷。充闻虏至，出其军六万人列戍江南岸。居数日，虏知充无斗志，遂渡江，江上之军皆溃。充与幕下降，北兵入建康。柷先降，邦光欲弃城去，不果亦降。”金兵不发一箭，渡江夺城。赵构的宠臣们竟是如此模样！六万守军，不战即溃，没有斗志，只有降心，这样的战局不败才怪！

刚刚到任两个月的通判杨邦义，在这国难当头、生死攸关的关头，该何去何从？

杜充见势不妙，曾率残部欲出水关逃遁，为百姓所拦截，干脆举旗投降。《宋史》记：“金人济江，鼓行逼城。时李柷以户部尚书董军饷，陈邦光以显谟阁直学士守建康，皆具降状，逆之十里亭。金帅完颜宗弼既入城，柷、邦光率官属迎拜，惟邦义不屈膝，以血大字书衣裾曰：‘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

《金陵新志》记：“独邦父力拒不从，大书其书裙曰：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以援其仆曰：持此以见吾志！吾必死矣。梹、邦光愧谢，犹强拥邦父上马与郊迎。兀术见，则使拜，邦父叱曰：我不降！何拜？亟遁归，卧于家。”

在一片投降声中，杨邦父以血书明志，见金帅拒拜，足显其志气其骨气！

“明日，金将张太师谕邦父，授以旧官。邦父以首触阶陛曰：我已志死，何多诱我为？为金将惊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奈势不可何，第归省思之？邦父退移书其将曰：世岂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动者？幸速杀我！无义留我！又明日，金人设宴，梹、邦光坐堂上，乐作，召邦父立庭下，邦父瞠眦梹、邦光，叱曰：天子以汝拒贼，不能抗，乃俛首求活，已不若犬豕，复与共燕乐，尚有面目见我乎？金将有起取纸，书死、活二字，佯协邦父曰：无多言，即欲死，趣书死字下，我乃信！邦父跃起，夺吏所簪笔掣纸书字曰死。敌相顾色动，又使引去。明日，再以见兀术，又不胜愤，遥望见大骂。兀术怒，使人疾击，挺杖交下，骂不绝口，遂杀之，剖腹取其心。”（《金陵新志》）

《宋史》如是记：“翼日，宗弼等与梹、邦光宴堂上，立邦父于庭，邦父叱梹、邦光曰：‘天子以若捍城，敌至不能抗，更与共宴乐，尚有面目见我乎？’有刘困练者，以幅纸书‘死活’二字示邦父曰：‘若无多云，欲死趣书死字’。邦父奋笔书死字，金人相顾动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父，邦父不胜愤，遥望大骂曰：‘若女真图中原，天宁久假汝，行磔汝万段，安得污我！’宗弼大怒，杀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

面对金帅的威胁利诱，杨邦父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既赴国难，一心求死，肝胆热血，令那几个位高骨软、贪生怕死的降将无地自容，无颜存世。

杨万里《诚斋集》记杨邦父忠烈不移，舍生取义一段，更为生动，可引互补。叛将强拥邦父郊迎，见兀术邦父不拜，并“僵卧不起”，陈邦光害怕极了，上前谎称：“通判原来就有头晕眩的毛病。”金兀术见状，令人“掖出疗之”。兀术后还派与杨邦父亲近的官员前去诱降，云：“你家境清贫，现长兄年迈，寡嫂无依，五个儿子尚年幼，一个女儿未嫁，一大家全靠你生活。他们跟着你远在这千里之外的异乡，如有不测，你叫他们依靠何人？你就不为家人着想吗？再说，国家之事已到这一步田地，你不投降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杨邦父答：“你所言都是人之常情，难道我就无情无义吗？但在这国难当头之时，家国不能两全，我决心弃家报国了！”

你就不必多言了。”

《建康集补遗》之《褒忠庙》也有记录，当杨邦义怒斥金兀术之时，他的侍从陈大伯举臂掷击兀术，惜未中。金兀术恼羞成怒，将两人杀死。时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事闻，杨邦义的忠烈之举震动了南宋朝廷，乃“赠直秘阁，赐田三顷，官为敛葬，即其地赐庙褒忠，谥忠襄，官其四子”。“绍兴七年，枢密院言邦义忠节显著，上曰：‘颜真卿异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孙，邦义为朕死节，不可不厚褒录，以为忠义之劝。’加赠徽猷阁待制，增赐田三顷。”（《宋史》）忠臣壮烈捐躯，厚褒封荫又有何用？昏君当自省！

杨万里赞邦义曰：“公其德行修于家，称于乡，信于友，为县大夫思治于百姓。至于以身殉国，立天下万世臣节之端，凌霜贯日，非一时适然也！”杨邦义死后，在雨花台附近为他修了“褒忠庙”，庐陵忠贤祠为其列位。同乡文天祥童年就去拜谒过，见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等事迹肖像，叹曰：“歿不俎豆之间，非夫也。”人间正气，世代相传。

《诚斋集》记，建康失陷之前，曾有人劝杨邦义弃城而走。他说：“我是通判守官，理当守城。如遁，百姓何从？当共患难！”此时，他守寡的二嫂还由他抚养，于是他让侄子驾车载其嫂奔溧阳避难，自己留下来与城池共存亡。

《嘉庆县志》“始迁”篇载：“杨昭文，溧阳令邦义子，邦义擢判建康，兀术攻城，急以昭文嘱侄孺文奔溧阳。邦义死事，子孙遂世居於此。明代杨刚、杨绍皆其后裔。”现溧阳城北东西杨庄、新基村、枢巷村之杨姓，大都为邦义之后。后见一资料言杨巷之杨姓，亦为邦义后代，家谱应有记。邦义之后，忠烈之裔，引以为荣也。

县志曾收杨邦义诗两首。其一《金濂吊贞女歌》云：“溧山兮苍苍，濂水兮汤汤。中有贞女，饮水茹霜，于焉击漂，维濂之阳。遭壮士兮苦绝粮，赈穷不惜倾壶浆。所处既以义，安能计存亡？幡然捐佩入不测，下游九土从英皇。耿幽光兮贯白日，凜正气兮摩穹苍。呜呼！世无李太白，此女终弗扬。遗风奕奕，山高水长，可以敦薄俗，激忠良，千古万古谁颀颀！”

溧阳史贞女舍身取义的事迹，深为杨邦义赞叹。是这片山水孕育了这位义女，日月同光，正气凜苍，山高水长。但如没有李白的诗赋，贞女也许就埋名乡间

了。金濂贞女，激发了杨邦乂这位县令忠良，他后来的抗金忠烈之举，岂不是史贞女之遗风？诗言贞女，却恰合诗人之身世，异哉！妙哉！

其二《寄从弟鱣堂》云：“从前我亦慕耕桑，世故驱人起北窗。昨夜梦归惊邂逅，羊裘和雪钓桐江。一片长江滚滚流，此生何日逐归休。秋风准拟劫人耳，何待霜寒始索裘？”这首寄给堂弟的诗，写出了杨邦乂归隐耕桑、和雪钓江的心愿，同时对官场上无休止的争逐，以及秋风劫耳、寒气逼人的时局，产生了思归之心。但后来时局的变幻，再也由不得诗人的意愿了。

时梭匆匆。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再读那篇“论文”，实觉浅薄。大舅已仙去十多年，只是乘公交车去雨花台读杨忠襄公碑之事，仿佛昨日。常国武先生尚在，亦年迈。大舅仙逝，他前去石子岗送行，一路我陪侍左右。他的学识，他的书法，见于报端，人称“国学大师”。

常念忠襄公之烈，真可以“敦薄俗，激忠良”，千古万古美名扬！

沙涨村里“偃”和“普”

溧阳城北郊有个沙涨村，石阶石鼓，老屋老墙，处处沉淀着一种古朴宁静的气息。

沙涨村西，有一片古树蓊郁、修篁茂盛的坟地，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合刺普华墓”，也是偃家的祖茔。墓园内有明代宰相偃斯墓碑，神道旁有文臣武将石刻翁仲四尊，另有石虎、石羊、石龟趺各一尊。还有尚书亭一座，乃元代尚书偃哲笃和明代尚书偃斯父子俩的纪念亭，亭内有三副柱联：“千古丝纶分国事，百年礼乐属春官”“父子两尚书久著平陵世胄，兄弟七进士咸钦海内名家”“忠贞孝恩荣三节，祖父孙崇祀千秋”。

沙涨村有一百多户偃姓，二十余户普姓。偃和普，都是原“百家姓”里不曾有的姓，虽列入《续百家姓》，但人数稀少。那么，合刺普华是谁？偃姓和普姓和溧阳有什么渊源？他们来自何方？

清嘉庆县志记：“高昌郡公忠愍合刺普华墓在县北沙涨村。《元史》本传：幼习畏兀书及经史，记诵精敏。预平山东贼，世祖召给宿卫，历官高山铁冶都提举、行都漕运使。伏阙言：漕米覆损，勿责偿舟人。阿合马愤之，出为宁海路达鲁花赤，迁江南宣慰使，改广东都转运盐使。讨平陈良臣之乱，奏罢按察使脱欢。会欧南喜叛，图上山川形势及攻取之术，与都元帅等分兵搃之。未几，右丞唆都兵征占城、交阯，属护饷道，北至东莞博罗二界中，遇剧贼欧、钟等，众寡不敌，遂遇害。后赠户部尚书，谥忠愍。《世玉集序》云：死后封高昌郡公，改葬溧阳。”

高昌郡的功臣，畏兀儿族的传人，怎么会葬到江南溧阳的呢？

合刺普华的先祖叫噶欲谷，是突厥民族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约公元650年出生于中国境内，曾事骨吐禄、默啜两可汗，享寿甚高，《旧唐书·突厥传》记载有他的主要事迹。他因助唐讨伐安禄山叛乱有功，被唐皇封为“忠武王”。

合刺普华的父亲叫岳璘贴穆尔,《元史》记载他是一位文武皆善的难得人才,既能跟随成吉思汗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又能从皇帝翰真之请,训导诸王子,从而受到元太祖的嘉奖。岳璘贴穆尔共生十子,合刺普华排行第八,他从小随母居住山东益都(济南),其父任官内地,教授他许多畏兀儿族典籍和儒家学说,他“性警敏,诵辄不忘”。合刺普华后来随叔父撒吉思,参加了平息李璘叛乱的军事行动,受到器重,先后任商山铁冶都提举和行都漕运使,在元朝初期深得忽必烈的赏识。后为左丞相阿合马迫害,任广东宁海路达鲁花赤和江南宣慰使,这都是正三品和正二品的官职,可见其地位之高。后来在讨平陈良臣之乱中,合刺普华运护军饷至东莞山中,遇欧、钟劫饷,他慨然曰:“军饷重事,退宿误国,可乎?”“率先力战,矢竭马创,格斗倍数十人,气益厉,兵寡为所执。贼欲奉为主,公大骂之,遂遇害。”时年方三十九岁。元世祖忽必烈于延祐元年(1318)十一月授予合刺普华“通议大夫、户部尚书、上轻车都尉”称号,追封“高昌郡侯”,后又加号“守忠全节功臣,谥曰忠愍”。

合刺普华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偃文质,次子越伦质,女儿忽都花。他遇害时,子女尚幼,随母暂居叔父独可理普华家(江西南昌)。偃文质以家族祖籍所在地的“偃鞞杰河”(今蒙古国之哈尔和林)的“偃”字为姓,以示不忘祖籍祖宗,从此百家姓中又多了一支姓氏。

偃文质在乾隆本《溧阳县志》中有记载:“偃文质,字孟彬,其先畏吾人。父哈喇花为广东都转运使,死王事,谥忠愍。文质幼慧,日诵数百言,重以母教之严,俨若成人。十岁割股疗母病,时以父忠、母节、子孝为三绝云。年十六以荫监益都滕县,历官广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帅,所至破贼清狱,民赖以安。后以言事不报,遂弃官归。移忠愍及夫人榱改葬於于溧之沙涨里。寻除吉安路总官,有旨。虑囚广西,还。归老溧阳,至元六年卒,追封‘云中郡侯’,谥‘忠襄’。”

偃文质生有五子,名玉立、直坚、哲笃,朝吾、列篾,元朝廷祐后每三年一科,五人皆登进士榜,“五子一侄皆成进士,其第旧有五桂坊,今尚存其名”(《乾隆县志》)。一时传为美谈。

偃哲笃之长子偃伯僚逊,元至正五年进士,任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于公元1358年避乱入高丽(今韩国),时高丽恭悯王“与逊有旧,由是待之甚厚,赠第,封‘高昌伯’,后改封‘富原侯’,赐田富原”。其五弟偃斯,元末任嘉定知州,后

效忠明朝，受朱元璋委派出使高丽，赐王金印、诰文。归国后升为户部尚书(1374年)，后改任礼部尚书(1380年)，为明朝制定了公侯受勋和官阶制度。偃氏兄弟，也留下了中韩历史交往的一段佳话。

元明两代，偃哲笃一家有“兄弟六进士，父子两尚书”之美称，成为历代科举取仕制度的特例。

从偃文质作为偃氏始祖开始，偃氏居人广有散布。江西南昌、安徽和州、福建建阳、韩国庆州、台湾地区都有偃氏的身影。其中韩国一支，是偃伯僚逊官任期满想返回祖地溧阳，因“红巾”兵乱，交通阻断，受高丽国王盛邀而赴异国定居。其五子同行，长子偃长寿，明初时已官任高丽国宰辅，朱元璋知此事后，才派其叔父偃斯两度出使高丽。后来偃长寿和五弟偃眉寿多次奉命出使明都南京，偃伯僚逊去世，其五兄弟将他的遗骸送回溧阳，葬于祖茔。2003年、2004年，韩国庆州偃氏分支后裔派代表前来溧阳寻根认亲，扫祭祖墓。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讲了偃家，该讲普家。

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溧阳府改升溧阳路，普姓始祖沙里的威出任第一任溧阳路达鲁花赤(掌印官)，后其后裔就居住沙涨村。沙里的威之子普颜不花，元进士，平章、山东行省，在山东益都任达鲁花赤，遇张仕诚屠城，全家十多人殉难。普颜不花之子普皆，字尧臣，以父名第一字为姓，始有普姓。沙里的威墓在沙涨村(已毁)，普颜不花墓在润州(镇江)，普皆之子普仲渊之墓在溧阳茭山。

偃文质原居江西龙兴(南昌)，因与普家有兄弟亲属关系，曾来沙涨村购置土地，告老寓居后，迁父母骸葬于此地，从此沙涨村成了偃普两家的祖居之地。因此，沙涨历来有“先有普家，后有偃家”之说，只是偃家人多兴旺，普家人数较少而已。

2004年4月，深圳大学偃正才先生送我一本《偃氏宗谱考略》，乃云南姚安偃映飞先生编著，记叙了偃氏的渊源和流徙。正才先生也是位族谱热心人，四处搜集资料，四下联络族亲。回想起本人也有偃姓同学，细脖凹眉，相貌有异，可见其外表似为汉化，而血液里仍有畏吾儿先祖的基因。

远眺沙涨村，与江南乡村并无二致，但村上的姓氏族人，却隐藏着一段珍贵的民族迁徙、融合、生存、发展历史。本文所述，仅皮毛而已。庆幸的是，沙涨合刺普华墓，1998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升为省级，成为溧阳为数不多的文保宝地。

建文帝逃亡过溧阳

溧阳景区南山竹海中有一景点,叫“明代官道”,往上有“一脚踏三省”之石碑。此地应为横涧李家园的桃树芥所在地。块石铺道,山路盘曲,竹径通幽,涧鸣清泉。翻山即为安徽广德界,不远处又是浙江地,因有“鸡鸣三省”之说。

山路应为昔时官道,竹木山货由此出入,脚夫行旅由此经过。未开发景区时我曾几游桃树芥,乃竹木堆场,有兄弟俩看山护林,人迹鲜至。

现游客到此,导游都要讲,此为明朝官道,当年建文帝朱允炆由南京出逃,就是经此道到安徽境内,再去浙江等地。那么,此说有无根据?

建文帝去向,乃历史悬案。

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立子朱标为太子,继承皇位。惜朱标英年早逝,乃又立长孙朱允炆为储。洪武三十一年(1398),71岁的朱元璋过世,明惠帝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乃明朝第二位皇帝,时年21岁。

朱允炆当皇帝,引起四叔燕王朱棣的不满,于是举兵南下,攻打南京。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打金川门,明廷主帅李景隆打开城门迎燕王大军。朱允炆见大势已去,下令焚宫,带着马夫人和儿子跳入火海自焚。

对于建文帝之死,历来都有疑问,传言种种,版本众多。《明实录》记载,万历帝问内阁首辅张居正:“闻建文当时逃逸,果否?”张居正回答很巧妙:“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悉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出走,后云游四方,无人能知者。”

那么建文帝下落究竟何处?云南、福建、湖南、浙江都称有其踪迹。其实,朱棣也一直怀疑建文帝没死,四处探寻,杀人无数,还派郑和下西洋打探,可谓煞费苦心。

清嘉庆《溧阳志》卷十六“纪闻”辑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史仲彬等拟之《浦

江》曰：族忠孝可居，夜分足痛难行，微明觅舟至仲彬家，同载八人：程济、叶希贤、杨应能、牛景元、冯淮、宋和。余皆散走，期以月终再晤。取道溧阳，依叔松隐所不纳。八日始至吴江之黄溪奉师居所，居之西偏曰‘清远轩’。时帝已薤发，故称师云。”

这里记叙了建文帝出逃经历，同舟八人皆有名，据说本来护驾的人有二十二人，可能船坐不下，还有人多目标大。“取道溧阳”，说明了逃亡路线，而叔史松隐之“不纳”，县志上认为松隐之人有误，年龄不符。或许是族叔？或许是同音？不得而知。

志中所记史仲彬又为何人？

史仲彬(1366—1427)，字文质，号清远。明洪武二十四年曾主政户部，建文四年擢翰林院侍读。史仲彬生前曾有《致身录》一书，详细记载了他的经历和建文帝出逃经过。书开篇有“东吴史仲彬自叙”，故有自传之例。

建文帝对史仲彬较为信任，曾“遣往衡山，告之即位”。史仲彬也以敢言耿直著称，曾上疏均江浙赋役，被采纳。朱棣起兵北平，靖难之役燃炽，明廷官员害怕动摇。“时燕藩已称兵两月矣，昌隆(尹昌隆，监察御史)手疏面奏，劝上让位守藩，廷臣愕然。彬执笏麾之曰：‘天下乃太祖之天下，非皇上所私授者。一人逆命，遂举而授之，尤而效之，又何以焉！选得募兵，今日急务，臣窃魏国公保辉祖，忠义性直，智勇绝人，以当一而燕可平也。昌隆狂言惑世，请速加诛！’”他廷斥尹昌隆为奸党，反降主战，并推荐良将。建文帝答曰：“人臣之义，当以仲彬为正。昌隆素有敢言之气，其勿为罪。”一言示其懦弱。

据说，朱棣兵破金川门，情况非常危急，翰林编修程济从奉先殿后取出一只铁箍箱子，对建文帝言：“太祖所嘱托，太孙有难，开篋有救。”打开一看，内有袈裟、度牒各两套及剃度用具。建文帝削发披袈裟，潜逃出城，与史仲彬等随臣会于神乐观，在道士王升处住了一夜。恰好有史仲彬一船来南京，于是乘船出逃。那篋中据说还有朱元璋手绘的出逃路线图，由太平门(鬼门)水沟潜出城，经溧阳逃往浙江福建。朱元璋起兵之时，曾屯兵溧阳攻打南京，所以对路线十分清楚。

这段描述，有点戏说，但亦合情理。

史仲彬是吴江盛泽黄溪村人，原籍亦应为溧阳。史家在京杭运河南岸，建文帝在此隐居，改清远轩为水月轩，并亲题匾额，大概暗喻人生为水中之月。他于

明永乐二年、五年、十二年，三次到史家，找史仲彬办事。宣德二年(1427)，史仲彬因抗税被诬，死于狱中。宣德九年，建文帝四到史家，给仲彬之孙取名鉴。仲彬子晟取出父嘱存之《致身录》，朱允炆感叹半天。据称，朱后死于吴县穹窿山。

明崇祯十一年，史仲彬九世孙上册朝廷，请求为祖上“从亡”一事昭雪，后祀嘉兴乡贤祠，清康熙三十五年入苏郡名贤祠，谥忠献。

史分正野。鄙人以为，正史不可全信，野史不可不信，从《致身录》记载来看，叙述史实、经历、路线均非凭空杜撰。诚然，对此书很多学者持非议，认为史仲彬此人未进过仕。溧阳县志据史家谱系认为史松隐年龄不符。但野史补正史之缺。建文帝之身世连张居正都说不清楚，何况后人？县志能载途经这一段，雪泥鸿爪，总算是一点痕迹。哪怕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好。

按正史言，封建皇帝都不会亡国灭朝。按野史说，我们有了那么多探究的话题。何不存一说？乐也！

葛彦敬谏溧阳马

说起溧阳和马，风马牛不相及。

溧阳地处江南，貌属丘陵，田产稻麦，水出鱼虾。少崇山峻岭，缺广袤草原，和马匹“浑身不搭界”。现在偶有人牵马行走，必引大众注目，北方动物，南人稀罕也。

但打开地图册，却有许多村落地名和马有关：马场、马场里，马塘埂、马山芥、马井里、马台头……让人感到蹊跷不解。

溧阳，确实曾是养马之地。

作为金陵门户，京畿要地，溧阳马政始于元，盛于明，衰于清。奚渭民先生曾有文说：“蔡东藩在《南北朝演义》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柏直狗，虽老能打猎；溧阳马，虽老似骏马；徐娘虽老，仍富有风情。”这说明，溧阳马古时就有名。

古代征战，马匹是主要打仗工具。藏马于民，作为战备之需，这也许是个妙策，但却加重了百姓负担。江南水土不适合养马，溧阳既没有草长水丰的牧场，平民又缺乏养马的经验。据志记载，明洪武初年(1368)，溧阳民充马丁养马定额为7319匹，其中小马1970匹，母马5349匹。明弘治时全县有马场75个，养小马1971匹，母马5349匹；到弘治八年(1495)，改养小马170匹，母马680匹。按当时规定，每两匹马一年就要交纳一驹，当时有沙涨、横山、龙兴、梅园、古县、大石、社诸、冶山等马场85处，养马人要是完不成马政，就要被罚宝钞700贯(折白银700两)，使得不少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面对苛刻马政，百姓苦不堪言。谁也不敢违抗朝令，弃养马匹。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重压之下，溧阳偏偏出了个“愣头青”，好听点叫“义士”，冒死上书，跟皇帝叫板，陈述江南马政之病，为百姓申诉正理。

明初，溧阳明义乡(今新昌一带)人葛彦敬，于洪武七年三月二十日，跑到皇

宫前上书给朱元璋,说:“伏睹诏书内一款,民间利病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昔尧舜茅茨不翦,土阶三尺,投珠于谷,抵璧于山。汉文帝却千里马,晋武帝焚雉头裘,莫不以恭俭爱人,名垂史鉴,万古称贤!恭遇陛下德冠三皇,功齐五帝,尊为天子,统摄王侯,威镇九边,富有四海,臣等不胜雀跃之甚!今大明国号已定,奈何故元苛政犹未尽除。每年马不生驹,追偿宝钞七百贯,民受赔累,卖产者有之,售妻鬻子者有之,乡村大小悲哀动地,有司坐视不敢上闻!臣以愚戆冒犯天颜。抑百姓者,国家之根本;人君者,万民之父母。百姓近为马钞追逼,颠连无告,如赤子堕水火,仰望父母手援以全其生。盖江南寄养官马,田地狭窄,税粮重大,无场牧放,不能以时群盖,故马不生驹。臣不避斧钺,为民驰救,伏望皇上全父母抚育之深仁,布造化生成之盛德,革除故元之苛政,拯救小民之残喘。”

不知这封书信的真伪,至少从内容上看葛彦敬是个读书人,有学问,也许做过官。信开头先封皇上的嘴:“你颁发的诏书说,为了老百姓的得失可以直言无罪。”然后把皇帝捧了一番,德冠三皇,功齐五帝!接着笔锋一转大明江山已坐,但元朝遗留下来的苛政却在延续,那就是马政,一年不生驹要罚宝钞七百贯!老百姓赔不起,只好卖儿卖妻,悲哀动地。马政官员坐视不管,也不敢向朝廷报告。我是个愚昧戆直的人,冒犯天颜,冒死上诉!皇上是万民之父母,要救子民于水火当中,江南无场放牧,又有粮税,所以马不生驹是有原因的。近来百姓为马钞追逼,民不聊生,我冒杀头之罪,跪望皇上施以仁政,革除苛刻马政。

这信写得言辞恳切,击中时弊,合情合理,感天动地!最可贵的是这种为民请愿、冒死相谏的勇气!在那个年头,一不小心惹怒了天子,是要掉脑袋的。那么,葛彦敬有没有“感天”呢?

朱元璋接到这封“人民来信”,接见了这位“溧阳人民”：“奏上,太祖召见,谕之曰:‘生受你也,依准所奏,令后两年一驹。’乃赐光禄寺酒饭,赏宝钞二锭,以偿路费,遣之归。其后马政又递有减折。”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葛先生蒙幸圣恩,饭酒招待,又赏宝钞路费,皇恩浩荡矣。关键是马驹问题得到解决,一年一驹改为两年一驹,地方百姓松气一口!此时的朱皇帝,可能是新政始治,还能听得进老百姓的微言,大概也是想树一个“明君亲民”的形象。

此后,各级官员纷纷反映马政问题。洪熙年间,夏忠靖上书:“臣在江南,见养马百姓搥膏剥髓,以偿官餉,况官员可令养马耶?”隆庆年间,议马匹减少一半,

交民间牧养,给草料银两,养马之患得到缓解。当时,溧阳官府马场有八十五处,周围都建起了矮墙,建造了马舍,马场边界地和民间牧马地,听从百姓垦荒种地,按三等税收收税。这样大大减少了马政给百姓带来的逼迫和盘剥。

《嘉庆县志》载:“溧阳在明初为京畿属县,是以令民养马,太仆掌之。水土非宜,科条复重,立法之始固已病民。厥后迁都北直,而南畿马政犹未革除,屡经减马折价,展转已数百载。国朝尽革敝政,自康熙初徐一经作志已云,场邻马户既不可问,斯民之休养生息,利乐无穷,亦其一端也。”

溧阳马政,烟消云散。溧阳骏马的蹄声,曾经踏碎过江南的一池春水。

我们不应忘记为民请愿的新昌人葛彦敬。据记载他的孙子葛廷玉也是位正直好义之人。乡中邻里有什么不公不法之事,乡民们都要先问:“葛某知道吗?”溧阳人言:上代传下世也。

戴庆祖与“土木之变”

京津冀雾霭茫茫。

高铁列车，像穿越时空的快梭，撕开雾霾的笼罩，跨过长江黄河，向北方进发。

明亮宽敞的车厢内，有一行特殊乘客，他们神色轻松又略带凝重，行李不多却与众不同——镜框、画轴、香炉、酒盏……他们的胸前都佩戴着一枚金属大徽章。有好奇的乘客问：“你们戴的章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戴字，我们是戴氏宗亲会的。”

溧阳、宜兴两地戴氏宗亲会一行八人，会长戴法生，八十三岁，戴华敏、戴阿保、戴耀中……策划良久，行色匆匆，组团北上。他们要去寻找、莫祭一位他们的先祖，一位忠烈的明朝良臣，一位从溧阳走出又归葬故土的民族英雄。

深秋的华北平原，影影绰绰的白杨高耸在旷野。车窗外掠过的景物，像时空掠过的历史，稍纵即逝。历史的迷雾，包裹着神秘的气息，等待着人们去揭开帷幕，探究人生过往的舞台上那曾经上演的惊心动魄的剧情。

南站、西客站、莲花桥，德胜门、昌平、居庸关、八达岭……我开着车，一路向北。“记者”和“司机”这两个称谓，对我而言均不称职，但我甘愿顶着这两项任务，向京北驰行，向怀来进发。太行山脉的险峻疏朗，一扫京城寸步难行的拥堵带来的烦躁。秋色正浓，秋光澄碧，秋阳西沉。

看到官厅水库的标识，看到离呼和浩特仅一百多公里的路牌，心情莫名地辽阔凄凉起来。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

二

溧阳戴氏，源远流长。

戴庆祖在《溧阳戴氏旧谱序》中写道：“有慈八公者，于唐德宗时来至平陵。邑南三十里曰举善镇，乃舟车相接之所，公暨二嗣君于此贸迁有无，克济山谷之民，其地遂以戴埠名焉。后卜居镇南四十里曰铁山，子孙蕃衍，耕读相仍。”唐德宗(779—805)时，戴氏祖先慈八公避安史之乱，南徙到溧阳举善镇，这里是山区与平原交接之处，山货竹木从这里上船运输，故有码头。慈八公和两个儿子在此做起贸易，举善始更名为戴埠。可见，戴氏是戴埠的开埠先民。

宋度宗(1240—1274)时，有戴统官至临安司空，因襄樊围急而直言，得罪奸臣贾似道，被阴谋陷害致死。他的儿子戴万因惧怕祸及，于是扶送父亲的灵柩归葬铁山(今横涧松岭村)，后来传下了“尚书坟”。

宋元之变，兵荒马乱，戴氏子孙星散，谱牒废坏。

到明朝洪武年间，戴慈后人在溧阳南山松岭村已生息了五百多年。其十八代孙戴敬(1353—1434)，携妻带子迁居到今胡桥一带。戴敬在古渎暂居过，以放鸭为生，享年八十一岁。他娶妻易氏，生子良祖、庆祖。据传戴敬生前看到古渎对河村一块地常冒青烟，就嘱咐儿子死后要葬那里，后来儿子们把这事忘了。戴敬死后，出殡时棺材由胡桥运往对河村，路过那块地时，晴朗天空突然乌云滚滚，雷电交加，送葬人员只能停柩避雨。半个时辰，雨过天晴，当人们来到棺材前，发现已被泥土没埋过半，慌乱中大家用木棍想撬起棺柩，突然棺旁有一只红顶鹤一飞冲天！接着又有一只展翅欲飞，被人们无意打伤了腿，但还是高飞而去。风水先生惊呼：“天葬啊！这是块风水宝地啊！活地啊！戴家后代要出能人做大官了！但代代要有跛脚瘸子……”

戴敬生长子良祖(1379—1462)，享年八十一岁，其子戴升是官路村戴氏先祖，次子戴冕为鹏程村先祖，三子戴晨为大山下先祖，小子戴昱为牌楼村先祖。戴敬次子庆祖(1400—1449)，字继光，号蒲青，又号成趣，官至太常少卿，乃本文的主人公，也是戴氏宗亲跋涉几千里奔波前来拜祭的先人。

传说，代表美好的愿望。史实，代表朝代的兴衰。感谢戴氏一脉的信任，让我能触摸到远去历史的脉搏，嗅到烽火连天的硝烟，听到漠北奔突的嘶吼！因为

我的手上，也捧着沉沉的一枚“戴”氏徽章，在秋色暮色夜色的渐变中，慢慢融进戴氏的一行。

三

我们是从历史教科书中知道“土木堡之变”的。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落的也先太师以明政府不答应和亲与减少赏赐为借口，分兵四路，大举攻明。“兵锋锐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长期松弛涣散的明正统边防，在瓦剌悍将强兵、金戈铁骑面前不堪一击。

大同前线败绩不断传到北京，司礼太监王振怂恿英宗皇帝御驾亲征，全然不顾边关不治、战况危急的局面。年少气盛的正统皇帝朱祁镇仓促下诏，上阵亲征，引起举朝震骇，纷纷上疏劝谏。英宗意气用事，下令一日后起驾，命兵部征集50万大军从征。其时“秋暑未退，早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涩，土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但朱祁镇和王振这两位昏骄君臣一意孤行。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日，明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出居庸关，经土木堡，行阳和，驻大同，见一路“伏尸满野，众益寒心”，加上连日风雨，人困马乏，只得于临大同的第二天下令班师。太监王振想邀皇帝退兵时经过他的家乡蔚州，“驾幸其第”以显威风，后又恐兵马众多，“损其乡土禾稼”，致使大军迂回奔走，徒费时日，给瓦剌军提供了时机。

八月十三日，也先追兵袭明军后部，朱祁镇派兵将应战，皆被“杀掠殆尽”，无一生还。八月十四日，明军由宣府撤至土木堡驻扎，土木堡地势高耸，正当敌冲，且无水源，堡南十里外有河，已被敌军占据。明军饥渴交加，全无斗志，也先兵分道进攻，将御营团团围住。正在正统皇帝束手无策之际，也先遣使入明营议和，并假装后退，在明军移营就水之际，瓦剌铁骑突然呼啸而入，长刀猛砍，明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一时，兵士相踏，刀光四闪，箭矢如蝗，马嘶人呼，血流成河，尸体“蔽野塞川”。

混战中，明皇随从大臣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都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五十余人皆战死，太监王振亦死，英宗朱祁镇被俘。

土木一战，明军损失惨重，五十万精锐部队死伤过半，正统皇帝成为瓦剌也

先阶下囚,标志一个皇朝的结束,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成为历史上一个转折点。

土木堡之战,也称“土木堡事件”,“土木之变”,是我国明朝史上非常著名的战役。那么,它和溧阳戴氏又有什么瓜葛呢?

四

天擦黑,我们一行九人分驾两车,由京张高速怀来口下,转 110 国道,右拐就到了土木堡村。

土木堡“宾馆”其实就是个过去的“大车店”,歇脚的大多是跑运输的长途卡车司机。大门口,一位敦实憨厚的“大叔”在迎接我们,他叫司全福,是这次祭奠活动的联络人。

土木堡“宾馆”里的菜不奢华,除了豆腐,就是鸡蛋。开房五间,加上夜宴,总金额六百多点。

吃完饭,老司又张罗明天祭奠之事。打电话联系买鲜花、买水果、买炮仗……我开车去怀来县城,陪会长他们买东西。花店关门了,来回转悠到大棚买黄菊两盆,水果若干。回到住处,已近午夜,疲惫躺下,隔壁司机们聚赌的大呼小叫不时袭来,让人难以入眠。

早晨,大家收拾停当,去村上显忠祠祭拜。

显忠祠位于土木村老年活动中心院内,明代景泰初建,祭祀土木殉难的诸位大臣,计文官 46 人,武将 17 人,内官 1 人,共 64 人。该祠堂明万历年间重修,清初毁于战火,康熙、乾隆年间两次重建。民国时军阀混战,祠内灵牌被焚,后日本侵略军又破坏祠堂。“文革”期间,显忠祠东西厢房、大门、二门均被拆毁。现仅存三间正殿,一块诗碑和有关显忠祠的三块石碑。

走进残存的显忠祠,正殿两侧抱柱分别悬挂木板楹联一对,上联为“古老尚余哀,兵溃不堪论往事”,下联为“诸公应自慰,君存何必问微躯”。殿内正面横列砖砌供桌,供摆放诸位英烈牌位。三面墙上,画着土木之变大臣的灵牌和姓名,好多已斑驳不清,据说是民国时当地百姓所绘。

显忠祠老了。历经五六百年的风雨沧桑、烟熏火燎,满目的颓败已找不出当年兴盛的影子。只有殿廊东西山墙上镶嵌的清代诗人的砖刻,在隽秀的笔画中

透出一点文脉的延伸。

阳光,越过古旧的窗棂,照亮了昏暗的殿堂。在左侧一块木板上,我们欣喜地找到第十位忠臣的信息:“戴庆祖,太常少卿,赠太常卿,溧阳人,乐舞生。”

戴氏宗亲为这次远程祭拜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戴庆祖的画像喷绘成大幅的中堂,悬挂在正厅,溧阳后陆戴氏宗祠和戴庆祖牌坊的新石,都拍摄成彩照用镜框装饰,放在供桌的正中。菊花、供果摆上,香炉蜡烛点上,白酒满杯斟上,戴法生会长祭天、祭地、祭诸位忠良之臣,更敬先祖戴庆祖遗落在这土木之地的忠魂英灵!他准备了多时的祭词,朗读时还是激动得时断时续……戴华敏的致辞情真意切,表明了对先祖事迹的追思和前来祭祖的意义。司全福先生代表土木村民致了热情真切的答谢辞。大家敬香跪拜,表达对忠臣先人的缅怀和悼念。鞭炮响起来,召唤六十多位忠臣和无数将士的英灵前来相聚……

作为随行人员,我激动地说:“我们一行奔波几千里前来祭拜溧阳忠烈戴庆祖的英灵,非常有意义!这既是对英雄忠良的一种崇敬,也是对戴氏祖先的一种膜拜!土木之难撼山河,碧血丹心震乾坤。感谢土木村人民还能保留显忠祠给后人,戴庆祖作为民族英雄,精神财富是大家的!作为溧阳人,我们应该为他而感到自豪!”

五

明永乐年间的1400年,戴庆祖出生在溧阳西郊的胡桥村。

戴庆祖是怎样进宫的?据家传,他的外公是负责皇家礼仪的官员,时常将三岁的外孙带在身边。外公在宫中主持宣诏,小庆祖在一旁学腔,久之声音洪亮,偶然被永乐帝发现,知其聪慧过人而荐入太常学习。

明宣德四年(1428),戴庆祖初任太常寺赞礼郎。宣德八年任太常寺丞,为制定皇家礼仪法规颇有建树,皇上赐书九册为嘉奖。正统十年(1445)升为太常寺少卿。

据《戴氏名人传》记载,戴庆祖为官廉洁,生活清贫,连英宗皇帝也知其“家贫”,曾出资为其兴建宅第。他为人正直,和同僚王一居等人鄙薄宦官王振,不与其交往。王振报复欲置于死地,庆祖坚贞不屈。这均是“野史”,但《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上,曾记录正统八年二月二十三日(1443年3月24日),太常寺丞戴

庆祖、王一居等人，擅自于寺后掘坑取土，拆砖阶开门户。“事闻，上怒曰：朝廷盖造文武衙门，壮观京都，庆祖等敢尔妄作，锦衣卫擒系之，令悉复旧规。都察院仍出榜于各衙门禁约。既而锦衣卫以事完复命。上贷庆祖等罪，住俸一年。”在文武庙后大动土木，被锦衣卫捉拿现行，皇上得知下令张榜公示其罪过，记下这笔错账，停发俸禄一年。庆祖等可谓惨矣。这里面有无个人恩怨，就不知道了。

土木之变，戴庆祖护驾北征。在瓦剌军冲来之时，“公拥驾北行，两手挽圣上，据不释贼，刃交下，公骂贼，不屈贼，支解其体，蹂躪以没”。庆祖公是位壮烈汉子，护驾过程中一介文弱礼官，只有以口代剑，怒斥吼骂，从而触怒蒙古军士，将其五马分尸，处以极刑。后家人前往土木堡寻尸，在尸骸遍野、白骨累累的战场，哪里还有庆祖遗骨？仅在绳索上找到一些头发和指骨……后人将其和衣冠一起归葬姥山（今仙人山西侧）。

戴庆祖的墓有神道，尚书王直为他撰写了碑文。

清乾隆、嘉庆县志在“忠节”一辑内，均有关于戴庆祖的条目：“戴庆祖，自号成趣翁，由太常赞礼郎历升少卿。正统己巳扈蹕北征，死于土木之难。朝廷嘉其忠，赠嘉议大夫、太常寺卿，谥忠节。遣官谕祭，录其侄升为都察院照磨。”

明景泰元年（1450），戴庆祖被迫封为太常寺卿（正三品），赐国葬，建祠立坊。明成化十三年（1477），应天府巡抚周忱督建庆祖忠节坊，题请谥曰“忠节”，崇祀乡贤。忠节坊有石刻联：“殉土木难兴志在春秋同光日月，识圣贤心看忠留柱石永立乾坤，”背面有“碧血丹心”匾额。在原学宫左面，另有“戴忠节祠”，门上有“昭代忠良家庙，平陵节孝宗祠”对联，清康熙年间祠塌，嘉庆八年移建铜锣巷。

戴庆祖死后，其侄戴升立为嗣子，封都察院照磨，后于成化四年晋升为大理寺左评事。

忠节坊于乾隆年间重修，洪杨之乱牌坊受损，戴氏后人戴瑛、戴廷杰集资重建。记得我们小时候，在今高静园前一直有牌坊耸立，只是不知是忠节坊。1968年前后，因开拓城中河，牌坊拆除。2013年，在溧阳、宜兴戴氏宗亲会会长戴法生的主持下，在后六村重立了戴庆祖忠节石坊。

关于戴庆祖墓，市文管办有文：“位于溧城镇大山下官路村石壁崖山南侧，发现一座疑似为明代戴庆祖墓，墓穴已不存，仅存残石龟一只；发现另一座疑似明代戴升墓，位于大山下官路村青龙山南侧，墓穴已不存，仅存残石马和残石龟各

一只。”

戴庆祖曾为家乡溧阳泰清观请得《道藏》贮存。如今，寺观《道藏》早已不知所踪，正如那光宗耀祖的牌坊墓道，斯人已去，斯物难觅。

六

司全福骑着他那辆电动三轮“宝马”，带我们参观土木堡遗址。

昔日刀光剑影的战场，今天早已是村舍连片、玉米摇曳了。张家口最大的高速公路枢纽的建造，已将古老的地形地貌，改变得无法辨别。

老司告诉我们，土木堡在元、明、清三代都是朝廷的重要驿站，村中现存的土堡为船形，乃“土木之变”后重建，时间为明景泰五年至万历四十五年，历时163年。我们来到残存的土木堡遗址，只见民居杂间，土壁塌废，枯枝虬劲，玉米待割。哪里是掩埋忠臣遗骨之所呢？前来瞻仰祭拜的戴氏后人，只能每人捧土一撮集起来，带回家乡祠堂供祀了。

老司和我说，联络“土木之变”后裔的工作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积极在网上发帖，联系散落各地的忠良后人。溧阳戴氏的这次长途祭拜，也多亏了这位热心人。读到小学六年级的司全福，原是位铁路工人，铁轨铺到这儿，他在土木堡住下了。一个月三千出头的退休工资，几家儿孙都指着他接济。通过自学，他完全成了明史专家，对“土木堡之变”的经过，他烂熟于心，已写成论文为王振“翻案”……那天夜深，他在铺上为我画着“土木之变”的路线图。听到我们不能去鸡鸣驿，马上回家拿来相关书籍。听说我要写戴庆祖，他毫无保留地拿出研究多年的资料……

老司的微信名叫“司员外”。研究文史，他完全是个“编外人员”，而熟知文史，他完全是位地方专家。他说，祭拜“土木之变”先人，你们是第三家，王家来人了，鲍家来过人，戴氏为第三，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追思先祖，缅怀英烈，不忘祖宗，教育后人。

土木堡的原址已是湮没在田野中的断垣残墩。我从地上捡起一块从土墙上剥落的卵石，其形状像极石头的堡垒。那玉米田的深处，也许就埋着像戴庆祖一样的捐躯社稷的无数忠骨！

司员外发来消息：“人老了，想留点东西下来。”是啊！留什么呢？没有什么 是亘古不变的，除非文字、文化、文脉。

溧阳名士史玉阳

埭头史家，溧阳之望族。彭马史狄周，地方五大家族之中，数史家最为显赫。

史家名人，数不胜数。从东汉史崇封溧阳侯，繁衍至今，有“天下史姓出溧阳”之说，大部分姓史者，都是埭头史家之后。历史上，官位最高者，当数史貽直。“三朝元老九州督”，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功德最著者，当属史玉阳，“富甲天下”的他乐善好施、见义勇为，百姓为其立生祠，实为一代名士。明嘉靖太仆少卿史玉阳，退江湖之远忧其民；清康雍乾三朝宰相史貽直，居庙堂之高忧其君，地位不同，经历有异，但都是人中翘楚，地方乡贤。

明嘉靖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严讷(1511—1584)，江苏常熟人，他为玉阳公撰了长传，可谓概括了其一生德行。兹录如下：

玉阳公，溧阳人也。溧阳盖有汉溧阳侯史崇塚云。侯四十四传为赠给事中慎斋公，又传为光禄少卿知山公后。光禄娶於王，生际，字恭甫，是为玉阳公云。今海内诸史，多苗裔於侯，在溧阳者号多，菟财世世，连棚接踵，为江南甲族。光禄为给事中在南京谏舍时，魏国庄靖公镇南京道，遇给事中，意气洋洋，魏国初傲视之，既而英杰待之。给事中方丧王孺人，未继，魏国因以女妻给事中。给事中据要路，年才弱冠耳，家世饶，魏国贲送其女，又甚盛。给事中素任侠自喜，至是尤好豪举。而玉阳公为舍人则已有才子称，后以太学生奏艺于鲁司成铎。鲁公，故南省元，意藐士独魁，磊一史生试辄置。史生首他日又以所撰著，为太史崔公所赏识，玉阳公文誉于是籍籍。嘉靖乙酉举於乡岁，壬辰第进士，除礼部精膳司主事。礼部虽省曹，其地清峻称外翰，进士拟缺，必用高等，而玉阳公以儒雅见推。居郎署间，所与天下才望殆尽，名日蔚起。

会吏部遴考功，属咸曰：史君阅人多，望且宿宜，遂令居人伦地。故玉阳公徙考功，为考功有声，又徙文选。选格滞且清者，坐关节子，而玉阳公既自富方幅，不逐贿，才又通敏，选遂清。一时居顷之，皇太子出阁有诏，择东宫官属，近臣中数贤有才，又多屈指玉阳公者。于是与前太史唐公顺之、罗公洪先等，一日同被荐，玉阳公官遂改春坊清纪郎，兼翰林侍书。而士有请谒失意者，竟论止其进，玉阳公坐是免归家居，常深念富贵者人之所最，触争蛮战，宁甘僇辱亡其躯，而不为衰息者，过享之则身必危。在昔范少伯知足以知止矣！而史载其去越适齐，三致千金而散之，非迂也！今予官为郎，虽非臚仕，而其先有事产埤之禄，窃惧不克胜，吾将为少伯乎？乃绝意仕进，去其家几百里阳羨山中，近少伯所尝扁舟泛湖处，考卜盘桓之。庐为重堂曲阁，高廊四注，杳渺如列仙之宫，而居之，其迹日深以藏。而人之慕声光於典谒者，自贵游以迄，山人海客，水浮陆驰，日杂遝於其户。玉阳公皆揖而进之，致馆致积，饗飧醴牢鬻菹醢之物毕具客。即弹铗而歌，无倦色。既辞归，又腆赠。君子曰：玉阳之於客也，真不愧古平原孟尝！而玉阳公自是顾愈益富，而愈益好行其德。

嘉靖甲午、乙未，圻内民数被灾荐饥，玉阳公发其家红腐餉有司者，动以万计。庚申、辛酉，实尤甚，至亲驾跋，履民蒿莱，间物色甿饥者饲之，生活老稚，视昔较众。天子以抚臣奏旌其门。溧阳之墟有壤淹者焉，弃不治，玉阳公行见之则计曰：此可以耕而贮谷其间，异日，为賑民地乎？乃捐粟若干，佣顛额民数百，深其淹为池，畚淹之土为田。凡得田若干亩，岁得粟若干石，因竖仓贮所收入，早潦有备，名之曰：救荒淹。其经制掣画委折，具唐太史所为记中。夫今天下多弃壤，苍莽不可深计，而溧阳以玉阳公故，皆化沴为沃，固知人力有遗漏也！乃抚臣有周公者，亦下令置仓，郡邑乡社如玉阳公指，实轸东南灾沴也。玉阳公即先民将顺输三千金相其役。周公去后数年，海公至，海议凿吴之淞江，其德意犹之周公，而人情难与虑，始惮而有繁喷。

玉阳公又輓谷数万石，树赤帜其地为收族，作义庄、作家塾；为风民，葺溧阳学，作嘉义书院、新泉书院，院与学皆瞻以田，费亦不下若干千金。故事民间质邸，大邸主例不偿民。质玉阳公邸，在溧阳者质号直

万金！顷岁不幸，而民皆以例故，不敢言偿主。玉阳公独谓：民贫故出质，今质丧将愈贫！吾不忍民之限於例而噤不敢言也！具偿之。人谓所失者万，而偿复万，即富亦太损，则皆私寿玉阳公。玉阳公爱人，里中人有逼於艰厄於疾疫者，或称贷玉阳公，玉阳公必赈以财。乃其后贫不入，玉阳公则又取其券付之火。玉阳公挥斥赀如贖土，每如此。以其故，车骑所至，丐请填塞。而仙释诸家、名山道场、津梁古迹，有没于靡芜、沦于瓦砾而不即治者，则其费千金若五百金数千金，必之玉阳公焉！去国游士、穷途羁旅、筐舂釜夺、憔悴踣躅，莫可控吁而皇皇焉欲急抵者，必之玉阳公焉！龟荚日者、青鸟望气诸家，焦神极能、怀术幸试、借书邮以、为摈介而重糈是图者，必之玉阳公焉！而玉阳公於一切糜至概弗拒。岁所投畀刀布货物，视三散千金或过之！然是时海宇泰宁无事，玉阳公即博施，徒与民便利，不获以其身及其家，所出输葵藿用於朝，而廊庙亦以玉阳公老在江湖，久不省之矣。

嘉靖甲寅、乙卯间，会日本彝起东南，守臣力不能攘扞其涂肝脑，吴越闽广间日甚。驯欲窥白下，玉阳公闻之，捫然奋曰：世无弦高卜式，纵彝至此！谁谓际徒长犬马齿，不能为国家出死，力效标末之功，今民束手坐受彝屠刃耶！乃即出千金购四方梟俊，训以控拳搏戟，坐作止齐诸阵法。可用矣，因遂率之与彝鏖於震泽西，败之。是役也，玉阳公盖几殆不救。他日，又有彝七十余，酋者雄杰号不制，自浙抵苏，转斗而南，经趋石头，犯郊门不克，又舍而东下，次於旧溧阳城。玉阳公率师迎之，战不利，没其敢死士三十有四人，彝亦战惫疲走。玉阳公竟督兵追斩之。时讨贼兵四集，官无馘粮，或以语玉阳公，玉阳公即又漕米五千餉，克济於是。抚按臣皆以其功闻，上曰：朕实嘉际忠义，其徙际尚宝卿加四品服色，盖金绯也！玉阳公登拜，益感激上，思殄彝矣。乃岁丙辰，彝向导渠魁徐海者，寇平湖，遂巢穴之。我师讨之者，有议燹荡，持不决。会玉阳公来，咸欢曰：史公师中丈人，宜就咨进止。玉阳公竟蔽前荚，及兵进扬燎，彝望见突窳，而玉阳公兵从左右翼击，歼彝尽。督抚及纪功宪臣复闻之，上愈喜，以史公年高犹矍铄，能冒矢石制胜，然志不在勋，伐矣！第进徙贰太仆卿，於家不令视马

事，而子继则录为锦衣卫百户。

玉阳公建坚固傲倪，慷慨为人，又孝谨笃其懿亲，少孤育於大母王、继母徐（即魏国女），遂终身衔戟报德，力竭生死焉。而挺身赴光禄之难，疏雪最哀恳，几卒哭之，性几灭。宗人遍遐途，有贺吊使必迁。岁时上溧阳侯冢甚虔，即风雨弗爽亦弗使人代其瞻宗。则急贫者其造子弟，则先茂异者，尤惬人心云。前部使者当其生时，尝以其所有助於学也，令博士弟子即学宫祠之，固以酬之，亦因以风厉其欤！

养斋子曰：曩余仲子澄有女，玉阳公命锦衣聘之为孙妇。今两家子女虽各夭殇，而史与余家实有婣媯之谊焉。玉阳公惠顾余，余尝接之，见其貌恂恂烟幅，外鲜衒饰，若无以异於人者。而其所挟资至倾动天下，凡人累千金即溢满汰侈招尤。玉阳公以甲科美臣居天下殊，货能废兴运干，不动声气，而销人之伎，竟以敌忾扬勋，跨腾风云，令搢搢游谈者以为称首。窃为其逢辰幸之，既而间其在太学时，天下熙熙皆蔽精利禄，而玉阳公独簞笈，后先游王湛二先生门，其学铺腴啜醇，融碍释滞，然后知其居润屋有道，如子贡得闻教於孔子。然者，范少伯不足道也！不然，人之富埒，玉阳公者亦有矣！独其名誉日至於朝、宣之上，歌颂四达於编蓬下，何为者耶？故为著之，令世稊馷膺粲，豢酣於富，祇自雄植，而不知有君与民者省焉。

严讷撰《明太仆少卿玉阳公传》，较为详尽地叙述了史玉阳的一生。是我们了解其生平的一手材料。传记先写家学渊源，写其父知山公也是“任侠豪举”，家世饶盛。有“才子”之称的史玉阳，师出名门，撰著为太史所赏，因得连连提拔，名声渐起，但遭小人上书诬论，受到牵连，免归家居。于是他绝意仕进，学范蠡扁舟泛湖，看中阳羨山居玉女潭，建庐堂阁廊，深藏其迹。没想到名声在外，游客纷至，史玉阳不厌其烦，对每位访客都好酒好菜招待，走时还要送上盘缠礼物。他真是古代的孟尝君再世。

嘉靖旱灾，方圆千里遍地饥民，玉阳公捐钱万计赈灾。又开救荒滄，以工代赈，得田千亩，得粟千石，设仓贮备，以防旱涝。

史玉阳又捐谷数万石，在滄内设义庄，作家塾，建嘉义、新泉两书院、修葺县学。遭遇旱灾，有贫民佃户卖地卖房，根据旧例只能以低价出售，而玉阳公

照样予以补偿，费用过万。乡人有因病急需用钱的，他一定借予，如还不起债他一把火烧掉借据。由于他乐善好施，经过之地乞讨者塞道，有名胜古迹没钱修缮而弃毁的都是他出钱。有落难旅人缺少盘缠的，都来找他。有算命卜卦、身怀绝技而走投无路的，都由他资助。他好像来者不拒。

嘉靖年间，日本浪人起事东南，守备的官兵无力抗击，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深受其害。倭寇还窜到南京骚扰，史玉阳听到消息拍案而起：“这世上没有本事能人了吗？怂恿倭人嚣张！我史际马齿徒增，不能为国出生入死，但不能看着平民百姓坐等倭寇的屠刀！”于是，他出资聘请四方枭雄俊才，训练拳法刀枪和作战布阵，等准备就绪，马上与倭寇鏖战于（苏州）震泽西，旗开得胜！过一阵，又有倭人七十多个，由浙江流窜江苏，侵犯南京不成，东下又到溧阳旧县。史玉阳率乡兵迎战，出师不利，损失敢死队员 34 人，但倭寇也疲惫不堪。玉阳公追至宜兴全部斩之。当时讨倭官兵四集，但无兵粮，向史玉阳求援，玉阳拿出 5000 石米，以济官兵。皇上得到消息，嘉奖其忠义，升官职尚宝卿，四品官服。丙辰年，倭寇又犯徐海，聚集平湖，官兵讨伐之时，对到底要不要火攻烧荡，犹豫不决。这时，史玉阳率兵赶到，大家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史公是通晓军事之师，问他怎么打好了！史玉阳没有贸然进攻，他让士兵举起火把佯攻，倭人以为烧荡，四处逃窜，史玉阳指挥兵士从左右两侧夹击，尽歼倭寇。皇上见史玉阳老骥伏枥，冒死上阵，不为功名，只为杀倭，升他官职太仆卿，免马事、荫子锦衣卫百户。

史玉阳为人慷慨大方，为亲孝顺报德，一直侍养大母王氏和继母徐氏，父亲去世，几次哭至昏死。族人有婚丧之事，不管远近都要派人贺吊。每年的祭祖上坟，风雨无阻，勿让人替。因捐田助学，学宫为他建造生祠。

史玉阳之德行，“誉于朝、宣之上，歌颂四达编蓬史下”，实乃人中之杰，邑中名士矣！

作为退居赋闲的史玉阳，能忧天下百姓之忧，担朝野抗倭之任，赈灾济困，捐金助学，富不忘本，乐不思蜕，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这位乡贤名士，我们可以冠以许多荣誉称号，“慈善家”、“水利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园林家”、“道德模范”、“抗倭英雄”……但这些虚名又有何用？正如嘉靖皇帝的那些封赐，不过是装饰门面的贴金而已！

我们要学习史玉阳居富仁义的修为和精神。

史际尊礼捐学田

说起明代溧阳地方历史人物，史际应有浓重的一笔。

史际，字恭甫，号玉阳，明代光禄大夫史后之子，居夏庄。“少从王守仁、湛若水游，既入南雍，受知於鲁铎”（《乾隆县志》）。王守仁，即明代大儒王阳明，在思想、文学、哲学、军事上多有建树，古代尊称为孔、孟、朱、王。湛若水，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历任礼、史、兵三部尚书，和王阳明同时讲学，各立门户。鲁铎，明国子监司业，提升为南京祭酒。史际所从之师，均当代知名鸿儒硕学，这对他的一生影响颇深。

史际孙史致爵，在文中曾有对祖父的记叙：“幼时往见阳明先生，辄叹以为大器，嗣后每见必加奖掖。迨蒙甘泉先生进为入室弟子。”能受到大儒们的器重，史际当有异禀聪颖也。“嘉靖十一年（壬辰）登第，授礼部精膳司主事，调主客，改吏部稽勋文选司，又改右春坊清纪郎兼翰林院侍书。为忌者所中，乞归”。（《嘉庆县志》）。有名师指点，有父亲荫佑，有进士及第，史际应是鸿运当道、仕途光明，但可能提升太快，能力太强，为忌者所中伤，因为何事？志书没记。“乞归”，远离官场，归隐乡间，这多少有点无奈。一定是有事伤了史际的心，他才跳出宦海，退庙堂之高，居乡野之远。

陈名夏在其《史氏诗序》中言：“吾邑史氏，在嘉隆间号为极盛。系前所称，皆史氏所有；系予不足道者，皆史氏所无。是以史氏之名甲天下！至于今不衰云。史氏始于汉封溧阳侯，自晋魏而下，代有显者四十余传。而为给事知山公后、太仆玉阳公际，实大其家。玉阳公既成进士，任吏部文选、特转翰林侍书、清纪郎，会免归用计，然策致少伯之金累聚累散，好行其德。”

陈名夏这里说的“极盛”，有一段描述：“富贵家簪缨蝉联之盛，第宅如云如革

之美，歌钟宵旦，不绝于耳，宾客杂遝，环献薄技，童仆于指，呼诺当前，中朝贵人，莫不嘘吸相左右。此亦人世之所健羨，以为大光荣矣！”《嘉庆县志》也说“际豪富甲天下”。按理，有钱有势的玉阳公，当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享受豪富之奢靡人生了。

史际不愧是王阳明的门生。他的一生，好行其德，好行善事，尊礼尚义，造福一方。

乾隆《溧阳县志》言史际“置义庄义塾，修明伦堂，浚跃龙关，捐田二百亩资贫士诵读，今置祠学宫以示报也”。嘉庆志载马一龙《祠记》亦言：“太卿史玉阳……疏凿水道如法，玉阳更益附郭膏腴田二顷，以瞻学需。”志记“太仆少卿史际捐资开通（学宫）泮池，西引穿城之水，东迤学前塞旧下关，而於东南开关曰：跃龙，以出之复於泮池。西首增设一桥”。捐田助学出资修宫，史际为兴县学不遗余力。“开浚跃龙关河，重建明伦堂，割腴田二顷以瞻贫士，复建新泉、嘉义两书院，以待四方游学之士，当事为立生祠於学，以示报也。”（《嘉庆县志》）这段历数史际兴学功德的论述，令人肃然起敬。

溧阳教谕林楚曾撰《学田记》如下：

世言古今人不相及，岂其然哉！楚自家食时，即知玉阳史先生好礼乐施，旧矣！壬戌秋署学于溧，睹其含德之容，若所谓深不可识者。及稽学政，则有史家赈米在焉。盖先生尝辟救荒渰也，岁入米六十石以赈贫生，行之十数年矣！尚未置学田时，窃疑之。既亲炙日久，先生信楚之拙，若放鹿可以托国者。一日致书云：愿于总户内分其学田二百亩、送米六十石至学，以给膳，又积其余，以充科举賸行之费。今为久远计，易以负郭美田六十四亩五分二厘，又拨管塔庄一百三十五亩四分八厘，以足前数，乞为记之，以垂久远。于是知先生虑事悠深，昔之迟迟，盖有待也。计价值千余两租入，视前则倍矣！即报书云：昔范文正公得南园之地，阴阳家谓：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至今甲于东南。先生易其近且美者以为学田，即文正之用心也！乃推广德意，自给膳賸之外，凡月考茶卷、岁

给油烛，概学成均被之，著为定规，以图可久！然则文正奋乎百世之上，而先生兴起乎百世之下，其鄙宽薄敦，有大功于名教均也。孰谓古今人不相及哉？遂上其美事于耿文宗先生，致币以谢，命楚为文纪其事。仍令诸生修德励行，以期不负！楚不敢以不文辞，乃稽首颺言，曰：凡我诸士，其知二先生作人之盛世心哉！玉阳先生助汝以育德之资，文宗先生助汝以成德之报。一以为慈养，一以为义方，念兹罔极，庸可负哉？然修德励行，无事他求，即自善处贫富者师之耳！文正之穷也，读书醴泉寺，朝夕一粥，断齋数茎。及为相，尽出禄俸以广济众，身家之贫如故焉！玉阳先生长世宦且丰盈若此，其自奉菲薄，无异寒士。至于施舍，虽万缗不惜无他。古人有云：能推食与人，不畏饿者也！赐之车马而辞，不畏徒步者也！夫人苟怀畏饿畏徒步之心，则一介之微，犹生系吝，安能富贵贫贱视之如一若是哉？诸士之于赈给也，能无可以取、可以无取者乎？使无超然之志，而计较于斗筲之间，是即斗筲之辈也！其负罪于二先生，不亦深且重哉！虽然，又窃有告焉。广文先生，诸士之则也。以人治其则不远，独不思旧租废置之由乎？以前某先生出纳施予，无以惬众心，而招物议，以致租归于县，至今有余议焉。兹呈得请，犹惧或如前，且虑学田委于草莽也。于戏！凡我同寅惟求善，则以永传二先生之盛心，则吾与二三子均无负焉耳矣！无使后之议今，犹今之议昔也！

这篇写于明嘉靖四十五年仲春的长记，详述了史玉阳捐学田二百亩、米六十石，作为县学生员的伙食和赴考的路费。刚开始，史际久没动静，林楚心存怀疑，岂不知史公是将近城的良田置换掉原来的学田，每年有田租千余两可用于教育经费，是以前的几倍！可见玉阳公“虑事悠深”，用心良苦！富甲一方，却不骄奢侈靡；舍财捐助，费万缗无异寒士，史际的慷慨，令人钦佩！

陈名夏言：“（玉阳）讲学则构嘉义之院，分产作族人，予粟食诸生……诸方外、释子、羽士所不能为者，率归玉阳公。然玉阳公抱材以老，实郁郁不得试！”此言一语中的。才高八斗，郁郁归乡，唯以行善为任，难怪要为其立生祠于学宫。

这在古时,也算是莫大的荣誉了。

明万历戊午年(1618)孟冬,有玉阳公之孙致爵撰《重修庠生玉阳先祖生祠记》,兹录如下:

尝闻祀典以崇德报功、垂世教而淑人心也。故功德及于一方者,一方祀之。古有乡先生歿而祭于社之说,又《周礼》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其义远矣。后世庠序中有乡贤祠或仿佛近之。今我先祖玉阳公之专祠于县庠之左也,诚以有功德于黉校,非是不足明报耳。緬维先祖,幼时往见阳明先生,辄叹以为大器,嗣后每见必加奖掖,迨蒙甘泉先生进为入室弟子,益体认良知之学。然谓悟必先修,故一以力行为重,居恒念言子游为孔门高弟子,而我南方学者所宗仰也!学道爱人之语,迄今彪炳。惟是爱人之义有二,养以厚其生,教以正其德。翳比师儒令、长事令,我虽居闲,无责于世乎?顾助师长,以淑惠邑之子弟,我力犹能任之。爰于嘉靖乙卯捐金鼎建明伦堂,俾诸文学讲礼课业有地,自兹而汇征贤路,彬彬盛矣。犹未也!谓学者以治生为急,不有以少资其生,何以勗之修德砺行,使中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也耶!继复捐膏腴田二百亩,以贍合学子矜,凡给膳赉行之外,又有月考茶卷、岁终油烛之类,咸得被之。当是时,适楚侗先生为学使者,亟致书敝称谢,且谕弟子无负德,意为谆谆,而部使者复以我祖有造于庠序不鲜,命博士弟子即学宫祀之,洵崇德报功之义。先是祠中肖貌,祇具私居之服,众以为言。会岁壬子,不肖爵奉差旋里,瞻谒之,顷觉祠宇倾圯,乃命工缮修,敬以旧像移置淦中嘉义书院。盖先祖设膳田以给来学,而币聘同年龙溪绪山先生讲学其中也。新像式具冠带,望之俨然有道气,象严文靖公云。尝接玉阳其貌,恂恂惓惓,幅外鲜銜,饰若无所异于人。及后先游王湛二先生门讲其学,铺腴啜醇,融碍释滞,然后知其居润屋有道。而钱绪山先生则曰:玉阳子惟日与同志游衍,涵濡并进,此道使后世子孙与乡之子弟世世知所法。程至泰和欧阳宗伯则曰:君子志学致道,其所务盖有大者焉,而不以穷达为增损,兹非君所自待

者耶！凡此时名卿巨儒所称述，足以识我先祖生平梗概矣。不肖爵愚钝无似，不足阐扬祖德，第既常阅诸名公琬琰，又嘉义书院有乡闾俊秀及四方担簦负笈者至，供膳俱优。我祖日与子弟容与其间，陈诗习礼，更相切磋，弦诵之声、俎豆之事，雍雍穆穆。而作人盛心于邑庠，尤汲汲加之意，所谓厚生正德之遗爱、古贤士大夫之余风不在是耶，且也力尚躬行，秉德必以仁义，仪人必以忠孝。虽生长世宦，其自奉菲薄，不啻寒士。盖标准既正，斯流芳弥远耳！学祠尸祝，永享明禋，垂世教而淑人心，端赖于此，因纪岁月，用述所闻志之贞珉，若夫扬历清华，尽职官守，恤灾捍患，种种徽猷，各有纪载，兹不备陈云。

史致爵的这篇“重修生祠记”，记叙了其祖父玉阳公的求学经历、修学道行、捐学功德，论述了古人“养以厚其生，教以正其德”的教育理念，阐述了“秉德必以仁义，仪人必以忠孝”的治学道理。玉阳公捐建明伦堂，使教学有地；延请名师，使教学有方；捐助学田，使教学有资。“标准既正，流芳弥远”，此种功德，“永享明禋”！

溧阳嘉庆志的“学宫图”上，过文德桥，进儒学门，崇圣祠西有“史玉阳祠”。从明嘉靖到清嘉庆，时过三百年，玉阳祠尚立学宫，供学子瞻仰。

福建林士章《史太仆生祠记》云：

昔庚桑子得老聃之道，居於畏垒三年。畏垒大穰，民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於贤人之间，而生祠焉。所谓乡先生者，其若人之侔与。玉阳史先生，汉壮侯裔也，居溧阳为世家，嗜义乐施，建明伦堂，置学田，辟救荒滄，散金数万，以靖南饷。天子褒义晋秩，所谓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者，先生有之。视之畏垒大穰，未可后先，溧之士民，欲俎豆之旧矣！岁壬戌，予伯兄德春来兹署学，有言：城治一水中分，风气不萃，民居靡宁。若移南关于东，开通泮河，拱挹而东注，不惟形势委蛇，且舟楫便安，邑之利也！伯兄以费广役烦，未可轻动。先生闻之，遂捐金数百两、米数百石以相事。阅五月功成，阖邑欢腾，咸争诵之。前日，俎豆

之心,至是遂决,乃相与构宇设像,且欲托诸国史以传。於是司训芮君文美、顾君元定、庠士包生思学、蒋生来凤、狄生斯东,走书征记於余。余尝薄曹邴氏,居邹鲁之乡,不能成其德让,至使人化之,多弃文学而趋利。今先生以德义教育其乡人,乡人怀之祀之,如庚桑子然。然则居先生之乡、蒙先生之泽者,固当以先生之心为心,慕尚风义,而趋利者远,苟徒以其名而已。吾恐庚桑子之不释然于老聃者,於先生独能晏然哉!先生讳际,字恭甫,别号玉阳。壬辰进士,官吏部,入为翰林待书,以褒义累晋太仆少卿。

至今,学宫生祠早已灰飞烟灭,但史玉阳富不忘本,“自奉菲薄,不啻寒士”的助学精神,世代弘扬传承!

史际义开救荒澹

明代甲辰、乙巳、丙午(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年间(1544—1546),江南连年旱灾,赤野千里,塘湖干涸,民不聊生。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号荆川,武进人,著名散文大家,被称为“嘉靖八才子”之一。他在《救荒澹记》中记叙:“余亲见其乙巳之灾,流莩遍野,民之不忍为盗贼,而自经死。与糜其子而食者,日几何人!”不忍为贼而上吊,饥饿难忍而食幼子,如此人间惨象,哀绝人寰!

面对罕见天灾,史际没有闲视,他马上开展赈济行动,以仁爱之心、慷慨之举,救灾民于旱魃之中,缓饿殍于濒死边缘,其举可赞,其德可嘉。

《乾隆县志》载:“际发廩以济者颇众,并捐粟垦治沙涨澹,存活数千人,名曰救荒澹云。”

《嘉庆县志》载:“沙涨澹,一名澹塘,明嘉靖间吏部主事史际所开,以工代赈,重堤复沼,灌溉一方,邑中水利之役,莫大于是。”“仍岁荒旱,赈粟万石,又凿救荒澹,俾民以力易食,全活万余。”

以工代赈,以力易食,这样的赈济方式,不知是否玉阳公的发明。但如此规模的兴修水利、救灾济民的行动,没有一定的气魄气度、财力物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唐顺之《救荒澹记》写道:“嘉靖癸卯至乙巳,东南荐饥。溧阳史君恭甫既三捐谷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赈,而饥者犹不给也。邑故多澹汇水,其沙涨澹,在邑西北十余里。潦溢旱缩,不障不陂,弃为旷土,久不可又。君既隐民之饥,则计之曰:古盖有兴役以救饥者,吾试行之。且夫岁冈土荒,民不足于食,而有余于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为有余也!吾今日出粟于廩,而异日取粟于澹,是吾以故粟为新粟也。人力地利两易而各得,不亦可乎?”

这节写史玉阳在捐粟赈灾乃杯水车薪之时，思索怎样开辟济民于饥的新出路。以力易食，以粟换粟，这是放眼长久的想法。

“乃度滄之东南隅，广长各三百五十丈，可潴可防，测水以准而疆焉。遂请于官，募民兴工。民携老弱，就役者踵至，民环堤而茭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给米二升、银一分、薪一束。时米贵甚，民以半米易麸麦而杂食之。计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栖於堤者，突烟饭飶，列舍相接，蔚然如处村落之间。日出则畚者、重者、筑者、掾者、汲者、爨者，蚁附於堤上。夜则妇子饱哺，嘻嘻而卧，又晏然如在乐上，而忘其为流徙饥馑之时也。”

治滄三百五十丈，工程浩大，而募民兴工之举，功德浩荡。民工不仅自己可以饱腹，家人也可以充饥，长堤之上，又恢复往常生气，炊烟突起，妇子皆乐，在灾年能有如此景象，不易哉！

“其始因滄之底深之，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环之为堤，堤之外又环之，为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深之，为北池，而实其东西陲以通中池之水。半北池之土更筑北堤，又於外堤外并滄，三面而沟之，出其土更筑小堤，以捍滄之暴雨。内堤之内三面为池，出其土高筑之，以为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毕功，而麦适登，民讙然散归，曰：史君活我！最其费为银若干两、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计，所全活若干人。共垦田四百余亩，为圩者三，潦则水碍堤，不得坏田。旱则引堤内之水灌田，可四千余亩，并滄而田之家，多赖以济。自是百年，沮洳郁为沃壤，水降土升，不相溷渍，各效其职，以宜地产，萑藿既去，生我稻粱，堤之隙地亦树蔬豆，缘堤荫池，夹植榆柳，池中蓄鱼虾蟹蚌螺，赢生生不涸。於是即其地立为义庄，岁计田与堤之入与池之鱼利，易谷可得千石。岁储之以备荒岁之赈，一不给家用。”

史玉阳筑滄，挖池蓄水，出土围堤，堤池相连，沟池相通，圩可防洪，池可灌

田。垦田四百，浇田四千，旱涝保收，年入千石。弃地成沃壤，荒草变稻粮，堤上种蔬豆，池中养鱼虾，这也许是兴修水利的样范！

“君又将筑书舍其间，以待乡之来学者而未及也。先是君之父给事君，尝出粟三千石赈饥，抚臣上其事曰：史后行义可嘉，其加服色。而君复继先人之志，故取‘嘉义’二字为坊额，而更名其澹曰：救荒澹。以其邑人进士缪君所为纪实，来请记。”

建嘉义书院以待乡学，开救荒之澹以济乡民，子承父义，史氏传统。

唐顺之在阐述了一番礼义民生后，叹曰：“今观史君所为，而益信古之所谓利与富得民者，其不为迂阔也。然古之所谓主者，皆与长人之责，而世其禄、食其责，既无所诿，而禄又有可藉，故行之则易。君既居闲，无所责於世，而织豪皆割已之有，乃殚力经营，若家人之矧然者，以是知君之为尤难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兴起礼俗，而有裨於国家休息生养之效，岂小也哉！余既自以其无力，而有感於史君，乃乐为之记。史君名际，嘉靖壬辰进士，磊落多才略，尝为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其施诸家者，如此云。”

史玉阳是位退官居闲之人，无责无禄，可以坐渡旱荒，无视黎民，过自己优厚的富裕日子，但他好善乐施，捐粮赈灾，开澹济民，以工代赈，救人过万，又为地方的水利农田做了大事好事，功在百年！而那些尽享高官厚禄的老爷们又做了些什么？志载：“太仓沿海大水，（际）运谷二万石抵崇明、嘉定等仓助赈，为时所资。”可见，史际的义行不限溧阳一地，赈灾不分乡邻。

溧阳才子马一龙，撰有《澹塘记略》云：“澹塘，一名救荒澹，邑有此自玉阳氏始也。塘在沙涨澹，东南澹水土乃得堰，其四围为之。幅员方里，广斥千亩，深池阜地，经画其坦者为田池，上横径四十八步，下测一丈有奇，中为两洲，水三绕之，形如日字。田间於池，内外共四百亩，池中计洲五分地之一，皆隆中而四望。前一洲建嘉义书院，祀朝列大夫如山公后，盖以昭示国恩，享有功德者也。院缭以垣，垣外治蔬圃，垣以入，门庑堂奥、厨积厩厠，及文人游艺、骚人偃息之所，凡若干楹。门引前蹊径，田间一道属于南，稍东迤之，又南出焉。大石梁跨池南北，屹然四柱，石上扁曰：行义可嘉，既圣谕褒美朝列大夫者，书院之名本於此。后一洲，四面绝行径，惟清风万竿，翛然物外。闻其幽深处，有元房石室、药炉丹灶，玉阳於此谈服食冲举之事，不知其然否。澹塘岁输出谷千四百斛，于县官以备赈

济，官料米亩十有六升，池鱼四时，可鬻一万觔，地之树随丰歉为盈，缩合二者之产，膳书院费岁有余。羨塘成於嘉靖乙巳，其前一年旱，其年又旱，江南赤地千里，流离死亡，枕藉道路。玉阳出粟五千石、银五千两以招之，远近穷民聚食，而佣者数万计，赖以全活焉。”

马一龙将救荒渚描写成了人文景区，令人神往。今日之救荒渚，称沙涨、方里、后桑园一带，早已是沃野一片，民居村落、工厂楼房杂间，要寻找“日”字形的池堤已不见踪影。圣旨石桩也好，嘉义书院也罢，都只能在记文中略知一二。但史玉阳义开救荒渚的创举，后人不应忘却！

史际抗倭保家乡

明代中叶，倭乱猖獗，给江南地区带来很大破坏。倭寇烧杀抢掠，如入无备之境，江浙闽百姓惶惶不安，深受荼害。

溧阳史际募敢死队，亲临杀倭，连战告捷，实乃隐名之抗倭英雄。

日本的“战国时期”(1467—1573)，内战频繁，社会崩乱，一批武士浪人因得不到土地，生活困难，于是聚合当起了海盗，驾船出海，沿高丽到中国东南沿海，一路焚掠抢夺，为非作歹。同时又勾结沿海土匪流氓奸商，深入江南富庶地区危害百姓。

明军形同虚设，军队腐败，军官贪污，军人逃跑，已无战斗力可言，虽然朝廷一直喊整顿海防，肃清倭乱，但对倭寇之害束手无策。

史际坐不住了，“甲寅、乙卯间，倭蹂躏东南。际募敢死士，邀击於邑之旧县，追卸之太湖，寇为却。抚按臣上其功，晋尚宝卿。丙辰，复率家众捣倭於平湖，升太仆少卿，荫子锦衣世袭。际乃功成不居，辟园圃以自老焉，祀乡贤。子继书以征倭功，授锦衣卫百户，升指挥僉事。万历丁酉，倭乞封，朝议剿之，继书奏愿屯田天津为犄角，会倭遁，功未竟”。

这段《乾隆县志》的描述，史际招募敢死队员进行抗倭，在溧阳旧县和太湖、平湖三次剿战，捣倭有功，朝廷封官荫子，史际辟园养老。

《嘉庆县志》有记：“(明)甲寅、乙卯间，倭寇深入，际练乡兵数千，邀击太湖洞庭山，寇却走。寻犯应天，破溧水，流劫至溧阳。际复率敢死士邀击於旧县，寇败东奔，追战宜兴之太湖，寇歼焉。事闻，起擢尚宝司卿。丙辰，官兵集平湖剿寇弗克，际复率家众往，火攻徐海，军功最。再擢太仆寺少卿，荫一子锦衣卫百户，仍子世袭。际功成不居致仕，归老有园亭山水之胜。卒，祀乡贤。子继书以荫官累迁至堂上僉书管事，赐飞鱼服，告归尝助祠田五百四十余亩，先后赈荒金粟钜万。

万历二十五年，朝议屯田天津以备倭，继书奏捐己产，率众往，并海直沽田。以劳卒京邸，子致爵袭职，累迁至指挥使，致荫文华殿中书舍人，出为广西布政司理问，改知兴业、昭平两县。兄弟各捐祠田百亩，出粟千石助赈，闻於时。”

这里的记述详备了些，史际是“练乡兵数千”，自己训练了抗倭队伍。溧阳乡风崇文，但尚武之士不在少数，脾气耿直，骨气铮硬，要与日本浪人武士打仗，没有点真功夫是不行的。“敢死士”估计是立了生死文书，舍命保乡。“邀击”，肯定是地方有倭难，乡亲们来邀请“敢死队”去杀敌。先战苏州（洞庭山），二战旧县，三战宜兴，复战平湖（浙江），连连告捷，可见这是一支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队伍！特别是平湖一战，“官兵集剿寇弗克”，可见明朝的正规军多么的无能！倭寇一般人数不多，“集剿”的官兵人数不少，这样的仗都打不赢，还要仰仗“溧阳史家军”出马！“际复率家众往，火攻徐海，军功最”。平湖离溧阳不近，史家军长途奔袭，证明队伍已声名在外，四处“邀击”；火攻倭寇，说明史际颇通军事，有勇有谋。

陈名夏在《史氏诗序》中写道：“嘉靖倭大入剽掠，徐海其通倭之点者，总督巡抚廷挨会剿，未克。而玉阳公方家居，号召拳勇，教以作止击刺，身亲行间，出囊饷士，士皆怒愿战。一败之于旧县，再败之于皂林，尽歼焉。以故，寇大创不复登岸。胡公上其事于朝，晋官太仆，谓史乡老，乃官其子若孙世锦衣职。嗟乎！如玉阳公者，功名富贵，盖可忽乎哉？”倭寇入侵，高官们挨个在朝廷上奏告剿灭，可却没法平克。作为一个闲职在家的旧官，史际主动承担了抗倭重任，一为保地方平安，二为灭倭寇贼人之气焰。他“号召拳勇”、“出囊饷士”，实则就是雇佣一支“敢死队”。“教以作止击刺”，说明史际颇通军事武术，“身亲其间”，亲自上阵指挥杀敌，对于一名进士出身的文官来讲，文武双全，难能可贵！平倭有功，朝廷再三奖掖，史际却愿终老乡间，也许是他早已看穿官场腐败、宦海沉浮；也许是他离不开故乡山水、家中井亭。

嘉靖剿倭，历时十年，人皆知戚继光、俞大猷之功绩，却鲜闻溧阳史玉阳之勇谋。

从史后到史际，从史继书到史致爵，一家四代捐田出粟，助赈救灾，功德无量，善始善终。而当流寇入侵，地方有难，史际又能仗义奋起，战之屡胜，实乃抗倭英雄，地方贤能！

陈名夏感叹：“史侯封溧阳至玉阳公，盖大其子若孙，流传枝叶，咸祖侯史。”

濼水钩沉

“史氏二千余年，名族天下。史氏水源末本，其道德文章，世以为训云”。

史际抗倭，已成往事。但过去溧阳乡间杨庄一带，常用一种小舟名叫“漾白只”，也叫“漾辟只”，狭长头尖，中隔数仓，属蚱蜢舟一类，灵活灵巧，在水中穿梭快捷，可用作捕鱼采菱，亦可数舟系连，运货送人。因小舟有七八仓板，上岸竖起又是登城越墙的梯子，一舟多用，水岸两便。据说，这就是史际当年抗倭的发明。

史际雅筑玉女潭

玉女潭，在宜兴湖滏镇阳泉村。“玉潭凝碧”，为荆溪十景之一，徐悲鸿之父徐达章有画：幽岩绝壑，灵湫邃谷，琼树悬岫，亭立山堦。老翁执杖，缓行拱桥。两士扶栏，相谈甚欢。荫藏书舍，启窗闲读。潭名玉女，不见佳人。胜景仙窟，何人而筑？

久闻玉女潭名，三年前独自驾车前往。莲子山边，游人稀少，建材杂陈，似在“开发”。进园心静，树木蓊郁，怪石嶙峋，整个山是一整块“太湖石”，令人叹为观止！寻到潭边，空无一人，水深映翠，岩劈窟幽。潭边有断垣，上镶清光绪《玉女潭碑记》青石：“潭何名玉？因玉自天成，无关人工穿凿也。潭何名女？因女阴，此水不见天日照临也。”天生玉女，自然清心，幽雅绝色，潭影照人。一片树叶悠悠从天而降，落在石上，微风一吹，又飘碧水，漾出层层波纹，乱了天光云影。

断岩的潭壁上，有“玉潭凝碧”四字，不知为何人所书。清澈潭水，不知从何处而来，又将流何处而去。呆坐潭边，心静思远，不忍离去。

出得门来，想找点资料，与门卫老头相谈。老人言，他姓王，附近村上人。他说，他们一村人都姓王，是从别处迁来看皇坟的。这玉女潭附近葬着皇帝的母亲。玉女潭原来属于溧阳史恭甫，听老人们讲，溧阳史家原在丁山川埠有专用码头，当年是坐船到码头，换马骑到玉女潭。

我听后大吃一惊。

史恭甫就是史玉阳，这玉女潭难道是他来筑？可溧阳离得这么远，他怎么会来此修园？我将信将疑。找到女导游要资料，她说解说词正在印，让我留下电话。

没过多久，接到一位许先生的电话，他说，玉女潭正在开发，苦于不知史恭甫到底为何人。

两年前,我再赴玉女潭,车上坐着史氏研究会会长史火生。我告诉他,宜兴的玉女潭是你们史家的祖产,是玉阳公开凿,直到光绪年间史家还在与附近王家打官司,要求归还老祖宗的地产。

我们在潭东的竹林里,找到一处墓地,村人说这就是“皇坟”。墓被挖开,棺木外露,估计为窃贼盗掘。我肯定地说,这应该就是史玉阳母亲的遗冢了,年近八十的史会长很是激动。

一年前,玉女潭开发处一行七八人专程来漂,其中有许小飞先生。我带领他们去了埭头史氏祠堂,查阅史恭甫资料,史会长热情接待。据说,后又来过一次。

这,就是我和玉女潭的一段因缘。

闲言少叙,让我们来探寻一下史玉阳与玉女潭的因缘吧。

玉女潭在唐朝时就有名,户部侍郎陆希声、滁州刺史李幼卿,就常来此游玩,并留下诗文。出身陕西的李幼卿修“玉潭庄”别墅,托常州刺史独孤代为照管。唐宪宗时,礼部尚书权德舆钟爱玉女潭,称其为“阳羨山水为首”,遂举家迁居宜兴。

那么,邻县的隔绝人寰的灵山秀潭,怎么会进入史玉阳的视线的呢?

“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与史家交好,他与唐寅、祝允明、徐渭四人,都曾因玉阳之父史后之邀,到过溧阳夏庄的红泉书屋,每人都留下了诗篇。史玉阳筑玉阳山庄后,邀文公来过,并留下一篇长文,详述“玉女仙居”的山水形胜,前因后果。他写道:“玉女潭在张公洞西南,相去不三里,而近相传玉女尝修炼于此。唐以前名贤胜士多到此游览,而李幼卿、陆希声盖尝居之,一时酬唱篇咏流传至今,有以想见其盛也。嗣后,湮塞不通,人鲜知者。溧阳史恭甫葬母山中,土人有以其地售者,恭甫喜而得之,乃疏土出石,决浚导流,剝辟蠲刈,尽发一山之胜。”

文徵明的长记,将史玉阳筑玉女潭之经过起因,交代得一清二楚。

玉女胜景,分“玉阳洞天”和“玉潭凝碧”两部分,瑶台、盘玉隈、普贤峰、集灵谷、会仙坛、三珠洞、一线天……明代诗人万士和赞曰:“映树层层翠,含云片片阴,壑余声杳杳,山拔气森森。”奇山怪石,灵岩碧潭,是为灵魂。《玉女潭碑记》云:“玉女之灵,相传至今千百年矣!或谓有玉女修炼,或谓有鱼神出没于此。”我想,玉女之胜,奇在山,幽在径,灵在潭。进山庄之门,有石碑刻文徵明《玉女仙居记》长文,约二千一百多字,描绘之细,形容之胜,词赋之美,言辞之切,让人有“李

杜诗篇在前头”之感,谁还敢噜苏喷言!

明代学者、嘉靖进士、工科给事中陆燾(平原)(1497—1551),在应玉阳公之邀游玉女潭后,有长诗《玉阳洞天歌》,兹录如下:

玉阳主人蓬莱客,谪降人间人不识。林泉肥遁乐有余,胸中养就烟霞癖。倾囊买得荆溪山,地偏景绝非尘寰。王维有笔莫能写,灵运有屐难跻攀。玉阳洞天一泓碧,灵物潜藏深百尺。传言玉女洗头盆,华岳移来古时迹。白云缥缈亭榭高,来仙馆近来仙桥。峡拥虬鼉形怪异,坛蹲神虎声咆哮。亭亭石笋质类玉,风霜剥尽莓苔绿。云是女娲补天馀,化作龙孙在山麓。巨灵断断昆仑根,置之波面如浮云。一片影落碧潭底,夜深误被馋蛟吞。滩头古树碧玉色,老干参天撑斗极。霜皮鳞皴四十围,犹有唐人旧题刻。西风满峡琪树秋,飞泉溜雨鸣天球。期仙磴上少延伫,开笼放鹤东坡头。两石并立形颇怪,俨似双仙临下界。当年米芾若再世,命取袍笏定行拜。巉岩巨石如像形,嵯峨磅礴由天成。瑶台即是神仙境,何须跨海求蓬瀛。千树梅花万竿竹,仿佛孤山与淇澳。武公遁老两高风,旷世乃能踵芳躅。崇冈回报如玉环,山隈屈曲如玉盘。虚堂明敞列八卦,长廊延袤纵大观。洞门深闼天竺国,观音岩下桥横石。但知野色过时分,不道尘凡回首隔,重重异境无穷边,游人不惜青鞋穿。平泉未许并奇绝,辋川难与争后先。山水从来予酷好,梦想此景不可到。令人怅望心茫然,漫赋狂歌聊寄傲。

陆燾的长诗细述了玉阳洞天的“景绝非尘寰”外,开头两句颇为经典:“玉阳主人蓬莱客,谪降人间人不识。”借景写人,把史玉阳比作谪仙,凡夫俗子认识不了其面目,这也与主人空怀抱负、寄情山水的人生暗合。陆燾在官场上也因挺直敢言,而“廷杖下诏狱”,他虽“早入词馆,颇负盛名”,“研心经史,学问宏博”,最后不得“念母乞归”,“母没,未终丧而卒”。他与史玉阳同好山水,同病相怜,不得志的处境,只能是怅望茫然,狂歌寄傲了。

陈名夏言:“江以南名山,如句曲仙馆、玉女潭上,诸方外释子羽士,所不能为者,率归玉阳公。然玉阳公抱材以老,实郁郁不得试!”此言一语中的也。

溧阳陈继儒在《逸圃记》中写道：“荆溪玉女潭，自溧阳史太仆玉阳先生疏土剔石，映带之以名‘蓝精舍’，其雄与善权、张公二洞相鼎足。”清代诗人潘宗洛《玉潭凝碧》诗云：

曲涧淙淙别有泉，忽于山曲见深渊。
一泓秋水翻碧天，万树春容冱谷烟。
照影石潭尘自洗，留云松壑意多元。
高崖静处纹如縠，玉女何年驾鹤还。

史玉阳好游山水，他的诗传世不多，录其《喜日泛舟登焦山》一首：

春江新霁泛轻舟，石磴凌云古寺幽。
松阁仙风飘客袂，竹炉僧供入茶瓯。
海潮浩渺金鼈涌，天堑长流玉印浮。
百世情惊怀隐士，道人正拟筑丹邱。

春日泛舟，古寺凌云，仙风拂衣，炉供茶瓯。潮涌金龟，焦山印浮，羡慕隐士，炼丹筑邱。史玉阳向往的真是仙风道骨的世外生活吗？文徵明言：“恭甫以粹美之质，具有用之才，不究于时而肆情邱壑……夫其志先在山水之间而已哉？昔谢康乐伐山开径以极游放，柳子厚发永柳诸山而著为文章，皆以高才弃斥，用摅其噎郁不平之气耳！”知史际者，苏州文璧也！

文徵明《玉阳仙居记》如下：

玉潭仙居记

明·文徵明

宜兴诸山，铜官、离墨最巨，其次穿石山，峻截不如二山，而岩窦虚窾，湍濑联络，窳突瑰谲，最为奇胜。而张公洞最有闻。玉女潭在张公洞西南，相去不三里，而近相传玉女尝修炼于此。唐以前名贤胜士多此游览，而李幼卿、陆希声盖尝居之，一时酬倡篇咏流传至今，有以想见其

盛也。嗣后，湮塞不通，人鲜知者。溧阳史恭甫葬母山中，土人有以其地售者，恭甫喜而得之，乃疏土出石，决浚导流，剝辟蠲刈，尽发一山之胜。幽岩绝壑，灵湫邃谷各为标表。而兹潭实首发之。潭在山半深谷中，停膏湛碧，莹洁如玉，三面石壁下插深渊；石梁亘其上，如楣而偃。草树蒙窳中，流黑不可测。石上微窍，日正中，流影穿漏，下射潭心，光景澄澈，俯而挹之，心凝神释，寂然忘去。潭之濬有坻，即坻为台，其上曰“玉光阁”。阁成而潭之胜益靚以显。潭之巔有“灵应亭”，灵应云者，山中尝旱，祷于潭而雨，因为亭以识。潭四周无隙，水伏流而南出于岩山之下，汇为小池，玉洁不流，为亭，其上曰“凝玉”。“凝玉”之西，渊泓洄洑，其流渐驶；别疏一渠，激其流。北出行乱石间，缘石旋转，可以流觴，曰“流觴屿”。凝玉之南，古榉一株，根柯郁蟠，硃瑰如石。独孤及诗所谓日日思琼树者，即此。其下，湍瀨滌洄与树映带，曰“琼树湍漱”。“玉轩”在焉。湍流西下，折旋而南属于湾，碕石累累如龙马下饮，如砥柱中矗，水奔注激射如斗。再折而东，水益驶，石亦益奇，夭矫如虬蟠，如鼉奋，飞流喷薄溅沫成轮，声震荡如行峡中，曰“虬鼉峡”。左右石梁曰“沸玉桥”。逾“沸玉桥”而北，地多美箭，间以江梅曰“梅竹隩”。琅玕所听玉窾在焉。及北偃，潭如初月，曰“生明池”。绝池为梁，曰“隔凡桥”，隔凡而上则“玉阳山房”也。中为“玉虚堂”，周堂为八室，室三楹。依易卦为面势随方，署名曰纯阳、曰中阳、曰初阳、曰循阳、曰明阳、曰通阳、曰来阳、曰升阳；自升阳北出，地渐高且广，盖山之麓也。因山为台，圯爽层出，陟级而上，延阁九楹，前施轩槛，可以肆目，曰“大观廊”。廊之后为丹室，又后为“云著台”，台方三十丈有奇，始筑台而著生也。又其后为“环玉冈”。又“环玉冈”东下出云著台之左曰“澄观楼”。其前为“上元祠”，又前为“东冈别馆”、为“护云庄”、为“仙寓”。“仙寓”之南为“来仙桥”，由“环玉冈”而西转出“玉潭”之后，“聚祠奠”焉。曰“玉清祠”，祀玉女也。祠右隙地，白砾累累散卧松竹间如群羊，曰“初平林”。西行百步，巨石盘踞，环匝如墉，曰“盘玉隈”。自“盘玉隈”西上，绕出山椒有亭，直太湖缥缈峰曰“缥缈亭”。亭下怪石林立，鲸鸾兽伏，競为奇壮。嘉木出石罅，一本七干，挺特修耸，与石争秀，曰“琪树峡”。“琪树

峡”之西为“集灵谷”，又西为“飞云洞”。自此上下登顿缘石径而行，径尽出于山脊，平壤空旷，甃以文石，曰“瑶台”。负台为室，曰“超然宇”。宇后群石掀舞，如花叶骈植，联延如睥睨，曰“芙蓉城”。石之尤奇者：曰“天成碑”、曰“小仓弁”曰“青骡岩”、曰“三珠洞”、曰“二姑”、曰“双仙”，皆以状类名。而“二姑”、“双仙”之间有“期仙壑”。由“期仙壑”而东下二百步，为“文殊峰”，又东为“普贤峰”，观音岩在焉。山自“环玉冈”而下，左右盘亘，蜿蜒不绝，总若千亩，其中台榭楼阁祠宇栋梁凡三百有一。林思岩窳可名者二十有三。他细琐不暇计者不在也。以其地在“玉女潭”之阳，因名“玉阳山”。而标其前曰“玉阳洞天”。“玉阳洞天”之东境之可纪者四，“金晶岩”最胜。岩去玉阳五百步，轩揭如垂石下煮，巉岩如断脔，深广十寻，其中石壁奇峭，水出壁下雪，平流两崖，交错如织；濒水石坻，可罗坐十客，水环之如块。岩石晶莹，日射之绚烂如金，故云“金晶”。“金晶岩”之东稍南曰“佛窟”。窟阒邃深中空，洞可居。别窳尤深，秉炬而入，诘屈不可穷。其北为“回阳洞”，玉潭之水至是回流而南，故曰“回阳”。“青鸟砚”在焉。其上有“留仙桥”。逾桥而东为钟窳，水激其中，声洪如镛也。“玉阳洞天”之西境之可纪者四，“泷湫”最胜。湫去玉阳数百步，在积石之下，渊潜澄湛微类“玉潭”。悬艇而入，中空如室，石皆下垂崦岵岬岨不可名状，其后石壁插水，壁尽处有穴可容小舟，欹仄以入，中空如室而通明虚敞。石尤奇丽，缘石而上得穴甚隘，偃偻而入，转石室之上，中空如下室。石柱合抱，色正白如玉，曰“玉阳洞”。比“泷湫”尤异胜。“泷湫”之西曰“水犀洞”，水足胜舟，而石壁幽峭，石上有穴通天，故曰“水犀”。其水潜行而南。出于南洞磐石之下，石平衍可坐。水萦之如浮，曰“浮磐”。“浮磐”之南为“君阳洞”。洞凡三穴，最后一穴稍深，曰“白龙藏”。三洞相属，石皆穿漏，如蹄股交峙，水泻其间，湍激若龙揭水趺行。可环游出入，彼此呼啸，与水声相杂，亦一奇也。水自“凝玉”而来，东西互流，至此凡百折，乍盛乍微，或浮或伏，而其流皆出于“玉潭”。石自玉潭而来，或隐或见，亦皆绵延相属，其间松桧鞭楠，幽兰灵卉，藂生萼被与水石相蔽亏，周游其中，若去尘寰历异境，既违复合，若穷而通，绮错绣绾，不出里区，而群景毕集，殆

造物者效奇呈异独媚于兹，以成一方之胜，如此，夫自清浊肇判，流峙攸分。而是境已具其前来暇论。考之唐贤篇咏“玉潭”之外，他固未有闻也。由唐至今八百余年，始自恭甫发之。岂天网绝景，必待其人之贤而胜者而授之耶？恭甫以粹美之质，具有用之才，不究于时而肆情邱壑，搜奇抉异，发幽而通塞，俾伏者以显，郁者以申，而无有所蔽。夫其志岂在山水之间而已哉？昔谢康乐伐山开径以极游放，柳子厚发永柳诸山而著为文章，皆以高才弃斥，用摠其噎郁不平之气耳。或谓恭甫类是而实非也，恭甫恬静寡欲，与物无忤，而雅事养生，解组后得此用以自适，而经营位置，因见其才，初非若二公有意于其间也。虽然，二公在当时或有异论，而风流文雅，千载之下，可能少其名乎？呜呼！地以人重，人亦以地而重，他时好奇之士，游于斯，乐于斯，庶几有如恭甫者。

马一龙其人其事

马一龙，是位溧阳家喻户晓的人物。

关于马一龙的故事，上点岁数的人张口就能讲出好多段子来：“马一龙挂画”、“马一龙赌东”、“马一龙的出客被”、“马一龙请客”、“马一龙抬粪桶”、“七十二次出棺材”……在1989年的“民间文学溧阳县资料本”里，关于他的“机智故事”就有二十一篇之多，可见其影响力。

说马一龙是位传奇人物，一点不为过。他的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爱好捉弄人，他的扬善惩恶，使他的故事在茶馆坊间、村间街巷流传了数百年。他既是聪明过人的智多星，又是给人难堪的“促狭鬼”；既是主持公道的大先生，又是才高八斗的大学者。家乡百姓把他理想化、风趣化、平民化，多少寄托了生活的色彩和正义的向往，这也是民间口头文学的特色和珍贵之处。

那么，真正的马一龙是位什么样的人？

马一龙(1499—1571)，字应图，号孟河，溧阳别桥马家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曾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他是位文家、书家，他博闻强记，工诗善书，为文当世名流，为书纵逸潇洒，书文都自创一体、别具一格，为时人和后世所重。溧阳的胥渚、别桥、茶亭、城南等留下他多处碑刻和碑拓，其中保存在别桥中学的《重修广惠庵记》为省级重点文物。

他是位孝子、才子。为父申冤、泣血上书，为母弃官、守不远游，是为孝。遗《玉华子游艺集》二十六卷，仿唐白居易乡老聚谈留《耆社记》、办山林八节，县志载《毁淫祠记》、《建阁记》、《青龙洞记》、《滄塘记》、《玉华山小洞天记》，是为才。

他是位热爱家乡之人，对本土的山山水水足丈目测，多有美文。他是位热心农耕之人，写下了较早的农业专著《农经》。

他恃才傲物，受人排挤。他体弱多病，一生清贫。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家

财万贯、气傲志扬的风流才子，而是一位屡不得志、饱经风霜的落魄文人。

马一龙是一本书，一本明代的古书。我们似曾相识却又陌生，我们偶尔邂逅却又睽违。

溧阳《乾隆县志》“人物”条记载：“马一龙，字应图。父性鲁，自给谏出知寻甸府，以夷蛮诬系狱。一龙时为诸生，走长安上执政书，辞旨凄恻，执政悯之。岁戊子中式顺天第一，阅二十年成进士，由词林升南司业。念母许年高，请告归。龙少负才名，卓然以文章名世，字学遵逸，入能品。建祠堂、置义田，一仿于古，并建尊经阁，尤为胜举。有《游艺集》传世，祀乡贤。”

溧阳《嘉庆县志》将马一龙归于“孝行”一辑，在叙述其为父申冤之事后，言：“二十六年一龙登第，馆选授南京国子监司业，以母许年七十八老且病，五疏乞归，乃允之。卜筑玉华山馆，著述其中，卓然以文章名世，书法迻逸，深入能品，又善立胜事，如仿古建置祠堂义田，及重建尊经阁之类，并为时所称，祀乡贤。”有意思的是，乾隆志上的“附说”言：“按溧之耆旧以事母孝而不欲仕者，有光禄丞陈奭，暨其孙兴国判樊龄，又德州知事吕钟、余干主簿汤有伦、库官曹璋，皆舍鸡肋而亲菽水，方之马太史之宦成勇退者，尤不易矣！故附之。”父母在，不远游，弃官归里侍亲恩，在溧阳是有传统乡风的。而对于马一龙来说，花整整二十年才从一个举人考上进士，刚刚当官又急流勇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明万历甲辰年(1604)十月，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书、马一龙门人鲁同亨，曾为先生的《游艺集》作序，这是我们了解马一龙生平的一手资料。“余师马孟河先生始为诸生，上书为父寻甸守碧溪公白冤状，词旨凄婉恻切，世宗感悟，寻甸公得从未减，一时名重京师。是年，先生以太学生举顺天乡试第一人，海内皆知有马先生，名由此益重。然数奇，凡七上春官始成进士，而先生年且及艾矣。诸公卿皆以先生名重，特破年限，选读中秘书。先生既拜命无几，复以母许春秋高，请急归，终许之。世不复出，后免丧而次如北，补官翰林检讨，执政而下多推毂，先生无所不敢当。而先生故该博，尤熟国朝掌故，国有大政不议，大臣咸咨先生，一言以决。其为文直摅己意，原本六经，不屑为汉唐以下语。行楷尤精绝，乞言乞书者屡常满户，长安中几为纸贵。词林诸君子皆拱手避谢，以为不及。然先生既以才高为侪辈所忌，而性故伉直，不能效世俗为俯仰，间以持议忤当事者，遂不能容于朝，检讨踰再考，出为南司业，而其意尤未厌。先生遂见

机引去，都人士皆为公正发愤，先生泊如也。归卧玉华山中，闭门谢客，读书谈道，诱掖后进，其著作日益富。居十年即世。”

鲁同亨的“序”，使我们了解了马一龙的“为官生涯”。

马一龙因上书申冤而名重京师。明嘉靖戊子年(1528)他以太学生身份考取乡试第一名，是为解元；他的叔叔马从谦考中嘉靖辛卯年(1531)顺天解元，比他晚了一科。原在溧阳县衙左边有“叔侄解元坊”，是为荣耀，传为美谈。马一龙名气日重，海内皆知。令人没想到的是，本该青云直上的一龙先生却连考科举不第，以致“七上春官始成进士”，是年嘉靖丁未年(1547)，而马从谦早他十二年(四科)已高中了。由此可见，马一龙的仕途并不顺畅。

虽属大器晚成，朝廷诸公卿十分看重马一龙，打破年龄限制(时年他已38岁)破例选他做读中秘书，这也是一种礼遇了，如按部就班，定当高升，但马一龙上任没多久，就以母亲岁数已大，无人照料为由，请求急返家里。辛辛苦苦考了二十年，中进士封了官，却要弃位侍母，不知是因为对官场的厌倦，还是桀骜不驯的性格所致。

母亲去世，马一龙北上，补官翰林检讨，也是不错的差事。官场上多圆滑行事，执政以下的官员遇事推诿扯皮，而马一龙敢于担当。他熟悉朝纲掌故，凡有国是大政商议不决，大臣们都来向他咨询，他往往一句话就成定论。

马一龙写文章直抒胸臆，推崇六经，遣词尚古，不用汉唐以后的词语。他的书法行楷精绝，向他索文求字者常常宾客满门，以致洛阳纸贵。而词林高手对马一龙也是拱手相敬。

马一龙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以致招来同辈忌恨，而他却性格耿介伉直，不学世俗点头哈腰、阿谀奉承那一套。他因为坚持自己的意见主张而得罪权贵，终于不能容于朝廷。在政绩考核中被免检讨，赴国子监任南司业，而权贵们还不肯罢休。马一龙见机就辞官返乡，都门里正直的人都为他感到愤怒，但他却淡泊如旧，归卧玉华山中，读书谈道，开馆授学，提掖学生，他的著作也日益丰富。过了十年去世。

马一龙的生平，志载不详，史录不多。幸有其后人马震伯、马巽翰等，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553)刻印了他的《玉华子游艺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他生平、思想、艺术的一手史料。

溧阳嘉庆志“集部”，载《玉华子游艺集》有二十六卷，其中：《髻年溪上上稿》二卷、《弱冠湖上上稿》二卷、《读书湖上上稿》四卷、《读书江上上稿》二卷、《秘书馆中中稿》四卷、《翰林院中中稿》二卷、《国子监中中稿》二卷、《林下下稿》五卷。

龙困浅滩遭虾戏。也许正是马一龙的恃才狂狷，正是他的多才多难，才给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提供了素材，才使他的故事代代相传，流传不息，这也是当年的权贵们和落魄者所始料未及的。

历史的舞台，演员都为过客，故事皆是过往，笙箫管笛，燕语莺歌，都似轻风过耳，倏忽消失在岁月的空间。

马一龙的俗与雅

马一龙是位大俗大雅之人。

俗，非庸俗也，而是乡风习俗之称。马一龙效古人之风，召集七十岁以上的乡老，让他们回忆一下过去的乡风乡俗，并记录下来，一方面记住历史的风俗习惯，一方面留得传统的优良品德，这也是他开明开化、深入民间的采风活动。

马一龙在《耆社记》一文中说：“嘉靖庚申（1554），孟河马一龙归自国子司业，卧疾玉华山。山中惟野蔬雉鸡，相对田峻村竖，尔汝忘形，时强力策杖，循溪径觅老成，久考论农事，盖冬一日遂有此会。其日乡饮酒礼，尊尚年德，故窃其意为之。方里中年七十以上共二十有四人，虽不及香山洛英晋申功业之盛，而布衣藿食，平生无大过，庶几治世之良会亦无忝也。吾童时尝见前辈长老，犹皆淳朴近古，追想其风，如隔别世界。因就诸社耆，请各陈五十年前所记一事。”

马一龙辞职返乡，隐居玉华山，喜拄杖沿溪去拜访村老，讨论农桑。一个冬日，他召集七十岁以上的二十四位乡老，款待饮酒，按年纪分尊次入座，老人们大都布衣粗食度日，也谈不出什么治世良方，只要求他们各自讲五十年前记得的事情。

二十位乡亲父老所言，归纳成几句话：世风日下，古风不再，贫富悬殊，贵贱有别，长幼不分，礼义丧失。淳朴近古其风，恍若隔世。

马一龙总结：“一龙曰：吾少不记五十年事，记中所闻，诸公喻我矣！今昔殊习，吾三犯焉：居广大而服华美、弃徒行而安车马、志古人而不免时俗之趋，鄙哉！龙也！”对照古风民俗，马一龙自喻犯了三条错误，住得太大穿得太多，不肯走路要靠车马，有心学习古人又受不了时尚风俗的诱惑！该鄙视的人，我一龙算一个啊！

玉华山耆社之会，虽比不上唐朝白香山（居易）的群英聚集，但马一龙能礼待

乡亲，亲近民间、倾听民声、追寻民风，这在一个重官轻民、重文轻农的传统社会中，确是非常不易之举。

溧阳民俗有“四时八节”之说，四时易懂，那八节又作何解？那就是马一龙和溧阳乡绅名士根据节气时令的不同，依据地方风俗不同，在八个地点由八人做东而兴办的雅事。

马一龙《山林八节会约》云：

节者，时节也。两四时故八周，岁而有四时，四时而有八节，盖循环错综，一气往来，进退消长，四时代谢，敛发流行，八节分布，万物所以生长，权藏以成岁功者也。

节分八地，胜地也。城市即溧阳县治西南诸山，环聚于此，上受五堰之水，下接荆溪，洮湖东潴，丫岭北交。归得园在下庄史宅之傍，光禄卿史翁所筑也，叠石为山，凿土为池，杂植松竹花卉，参差出台榭。

方丈山在句容县界承仙乡，九龙回拥，八面俱方，高可数千尺，广延二十里，上有芝田鹤圃、龙池丹井。文笔峰南极插天，华阳宫后屏联境，下有玉垒云洞之奇，潢溪泉石之幽。

盘龙堰在玉华山，旧名檀石桥，志云：檀石桥下有盘龙堰是也。青龙洞万山之水会而交流，黄金山百陇之支横而内止。

独秀山在洮湖之右。大涪山在湖水心，平地突起，四无脉络，故曰：独。万顷玻璃，一螺中立，故曰：涪。

救荒塘在沙涨滄中。尝岁大祲，民饥而死，不可胜数。玉阳公出粟万石，招集四方之无食者开滄，筑岸为塘，所活数万余人，固以名之。前谓尚德行者，以此塘宽千亩，中建嘉义书院。

玉女潭在宜兴县东南五十里，由蜀山罨画溪七八里经至潭上，潭在山半中，深莫可测，水流穿山腹，窍而洞出，复从他山潜入，盘旋数山，又出之飞崖半壁，倚天列嶂，四围如城郭，真福地洞天、神仙之居也！

地属八主，贤主也！太仆卿玉阳史公际归得园、救荒塘、玉女潭之主也。长沙尹未庵钟公应宸附之，春日赏花，时宜游行归得园，外再益后村百果园，主以光禄丞南谷陈公夔，北沙杨公一凤于斯，茂对芳辰，追

欢两地，岂非太平行乐、毋失其时者乎？少参环溪狄公斯彬，城市之主也，灯节可三日，故环溪主十五，鸿胪丞南塘彭公若思主十四序班，三溪彭公若年主十六。宪副吾从子震章，独秀之主也。漳州别驾、月山吕公充介、鸿胪丞凤桥史公隆，为大浔主。吾一龙为方山、玉华二山主。其间或专主或联主或再三主，因地与时、地以其便、时欲其畅耳！

主设八席，饌席也。曰：杀牛羊猪鹅鸡鸭鳞。介曰：果枝圆桃枣柿栗莲芡。曰：蔬葱韭菊芥芹姜。

会约对宴请的规格、数量、器皿、桌椅、长幼、尊卑都做了详细的规定，甚至“请柬”的尺寸、字数、内容都一一列出，更有趣的还列八禁：“禁奢侈，如金玉锦绣相多。禁喧哗，如夸谈闻胜、刺刺不休。禁谑浪，如巧语伤人、层见叠出。禁讥议，如论劣他人长短、时事得失。禁浮诈，如搬弄套子，无真意。禁骄傲，如幼不逊悌、与有挟而高亢者。禁妄诞，是不知势、不顾礼义、邪僻自是、阴私执拗，舍正路而不由也。”这八禁还缺一禁，可能是马进士当时没有数过，但这几条很有针对性，都是文人进士，都曾任官一方，都是地方乡绅，均有声望，不立点会约规矩，相互攀比，相互攻击，肯定会出纰漏。

山林八节，马一龙都有节名和赞词。

一、观灯会 上元观灯会，灯光共月光。月光照天下，灯光照一方。太平好时节，万姓仰君王。（略）

二、赏花会 花朝赏花会，花开尽桃李。桃李在公门，客子入门喜。入门喜相逢，山中十一子。（略）

三、修禊会 上巳修禊会，修禊方丈林。林中有泉石，松竹霭繁阴。曲曲泉石间，羽觞定流斟。（略）

四、竞渡会 端午竞渡会，龙舟双踏行。包黍沉江水，为吊楚屈平。古人不在世，千载垂令名。（略）

五、乞巧会 七夕乞巧会，世传牛女期。年年隔河水，一见长相思。既为夫与妇，此身应唱随。（略）

六、泛月会 中秋泛月会，荡舟玉阳湖。湖光共明月，良夜意何如？明月入我怀，湖光与之俱。（略）

七、登高会 九日登高会，玉女潭上山。山高几千尺，人在霄汉间。（略）

八、踏雪会 冬至踏雪会，瑶花散六出。风吹鹧鸪裘，胃粟寒气入。有酒莫停斟，杯罍劳饮啜。（略）

八会之中，既有民间传统节日，如观灯、竞渡、乞巧、中秋、登高，也有文人雅趣兴会，如修禊、泛月、踏雪、赏花等。马一龙的“山林八节会约”，既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明代时俗图，也是一份珍贵礼仪图，是研究明代民俗民风和文人风尚的珍贵资料。

大雅是俗，俗极即雅。马一龙俗到平民、雅到士绅，大俗大雅，是为人中之龙也。

孝子马一龙

马一龙是位孝子。

万事孝为先，这是中国之传统，而恪守孝道的马进士，事迹格外感人。

溧阳甓桥马家的祖先应为马训，扶风人，晋朝元帝时任南海太守，曾经随皇北征，后迁居溧阳西庄，子孙繁衍，代代相传。

马一龙的父亲马性鲁，字进之，号碧溪居士，生于明成化五年(1469)正月二十一日。马性鲁之父马清，为征仕郎、质庵府君，娶王氏，性鲁是其第四个儿子。生性鲁之时，马清之父已卧病在床，他以星相术推算所生孙子后，大喜道：“振兴我家的后人，靠这个伢儿了，可惜我来不及见到他了！”性鲁生下八月，其母王氏抱他靠在桂花树下，有巨蛇从树中舒其首，以舌舐他的眉间，他啼哭起来大人才发觉，走避之，而那蛇突然就不见了。人们都以为是件奇事，同时也想起了老人之言。

成化六年，马一龙的外公许琼和外婆谢氏，金坛人氏，生下了第五个孩子，是为其母。

马性鲁天性聪慧，博览闻记，读五经诸史，攻古文，擅长草书。他在甓溪广惠祠读书，时年十五岁。有老僧教授小徒《莲经》，性鲁只是看了一眼便掩卷，老僧说：“梵语不好理解啊！”性鲁答：“我只是能记而已。”僧认为他怪诞，取经中语句挑问，性鲁背诵不止。老僧拜倒他脚下：“你是佛子前身又出世啊！”乡里一时传讲此事。

马性鲁十八岁时赴考，因其父和考官有隙，屡试不第。二十一岁迎娶许氏，后到三十一岁，生马一龙。他一直考到四十岁尚未中举，已历七科二十年。直到四十三岁那年，始为书魁第一，后登科入仕，胪传同进士第五名，授兵科给事中。马性鲁“涕泣不止，年辈皆亦感动”。

兵部五年，马性鲁以考核优等补廩浙江温州府平阳县，平阳处在浙闽之间，地广滨海，性鲁在这里兴教办学，“一时文学之彦为浙称首”，后又调署开化，他巧妙平息沙金之争，劝民归田；再至福建延平府顺昌县，他毁淫祠、兴学校、修邑志、筑古桥，邑人祀于名宦祠。五十四岁春，马性鲁转河南汝州太守，仅过半年，又接受铨司选调，因“词气不惬彼意，遂迁云南曲靖府同知”。那年三月，马性鲁返家探亲，马一龙劝阻父亲远行，都一把年纪了！父亲说：“这次远任，虽是铨司排挤，但我不仍是皇上授权的命官吗？何况天下没有不能相处之地，也没有不可教化的平民！”他毅然带上几位僮仆，单车长途赴任。

嘉靖五年，五十八岁的马性鲁迁任寻甸知府。寻甸原是“土夷为守”，到明成化年始设府，“治廨草创，诸所不备，人文未开，俗尚争斗”，马性鲁上任后建学校、衙房、教坊，改变少数民族强悍之风。

关于“寻甸之乱”，嘉庆溧阳志是如此记录：“土酋安铨雄据一方，性鲁抚之稍顺。适僉事某督税过急，铨遂举兵反。某与性鲁以状闻于当事，兵备副使周奎率兵讨之，所至纵杀，民转附贼。城陷，夹辅指挥王升战死，性鲁被执。铨意在杀奎，奎因委罪于性鲁，以邀变逃避等情上闻，诏令巡按御史体勘。一龙时为国子监生，赴阙疏言：‘周奎诬陷臣父，伏望憐臣罔极之思，哀哀于阙下；悯父无辜之杀，载载于天涯。收臣下狱，敕都察院提臣父来京，三司廷臣重复面审有无虚实。朝廷固有公法是非曲直，天下亦有舆论。臣未敢仰渎九重之听，但恐荒远孤臣不能如山西大狱，上则亏天地造物者之德，下则寒边方守土者之心，外起猥人轻视汉官之志，内成奸吏倾陷善人之谋。父成歿齿，冤臣抱整天恨！此所以不避斧钺愿为父死以求伸也。如父罪果实，奎言不诬，臣请并戮，以谢天下！’时嘉靖七年三月也，一龙复具以冤状上书宰执，当世韪之。未几，性鲁病瘴死于滇。二十六年，一龙登第，馆选授南京国子监司业，以母许年七十八老且病，五疏乞归，乃允之。卜筑玉华山馆，著述其中，卓然以文章名世。”

关于父亲惨死云南，马一龙记曰：“（嘉靖）六年，丁亥，考五十九岁，在云南任土夷长。安铨者，旧官之子也。拥鼠数万，雄据一方，其地虽入国版，多不纳税，时纵部落掠夺，官府莫能禁。考蒞政即作文谕及，覆顺逆祸福之故，令二生持至铨寨，铨即倾心从二生诸府，优礼而还。铨自是税颇来归，盗不窃发。僉事某者，以督税至，欲得铨为充囊计，乃谓考曰：安土官非公不至也！其族负固自宋元抵

今,可令我一见之,亦按巡美盛耳!考因召之见。某暴缚于庭树,大挺笞数十,需黄金宝玉累千!考闻急入让,某始以积逋下铨狱,追征实己地者。铨并啣考以为卖己,诒而请曰:逋税积累岁,必释铨还家,时日可完矣!既去,即举兵图杀某以报,然犹迟疑考之恩礼所加,不忍发也。某以铨及状移文兵备副使某,‘铨逆显张,抚之不听!’考亦牒闻当路,某率兵讨铨,随所至纵杀,反为铨驱,所未附者归之奋。城陷,考夹辅指挥之升与铨接战,升被杀,左右执考见铨,铨仍称恩主,释之。考大呼,示以朝廷恩威不当反!铨曰:杀某即已!趋至兵备道索某,不获,遂忿恨横僂某。某知事势不利己矣,竟委罪于考!考不平,疏闻于朝。”

马性鲁宰寻甸,采取的是安抚怀柔之策,头领安铨已归顺纳税。岂料某僉事以征税为名,让他诱骗安铨来庭,捉住后绑在树上杖打,其目的是借公谋私,勒索财宝。谁知由此激怒安铨,回去即举兵造反,要杀掉僉事。僉事急忙招来军队讨伐,其兵士一路又滥杀无辜,终于激起少数民族的反抗。寻甸城被攻陷,王升被杀,性鲁被抓,但安铨仍称他为恩主而放了他。马性鲁大声责问安铨:“朝廷对你如此恩威为何还要造反?”铨答:“我只为杀某僉事而已!”某僉事见势不妙,将事情全部责任推到马性鲁身上!马不服,于是上书朝廷辩解。

马一龙继续写道:“七年戊子,考六十岁,在云南听看安铨事,手书示不肖赴京面溯并白执政者。正月,家僮抵家时,病尚不能步,携得书大愤恻,谋于外兄史恭甫贷金三百,以二百金援例入太学,以百金充路费。乃得诸阙,上书极论某不法。考亦连疏辩奏,功罪始定。夏五月,考复寓书不肖,其略云:‘闻汝在京百出心力,此虽孝,愤所激,策之下也。尝梦遊驷马桥,遇一异人,授以金泥帖,其上云云:同科三进士,两世四魁元,应在汝耳!何不努力进取科名,以慰老亲万里之望?’奉命惟谨,甫得荐名录文,十月捷报至云南,考已卧疾就药,观得震章应试中式,又得不肖顺天乡试报,肆恶者稍稍修复和好,妣亦处之自如,若罔经失得者,其宽仁如此。”

马一龙为救父申冤,写下了《代父请狱疏》,“为自请质狱,以申辩父冤事,臣父某蒙圣恩授云南寻甸府知府,因地方夷獠作孽、兵备副使周奎将父诬陷激变逃避等情状章”,愿以自己性命担保,恳请“洗雪一二”,可谓孝心感天地也!

他又撰写了《上宰相书》:“区区以某一父,不足为相公惜,所足惜者国家之典刑、天下之公议耳!”“惟冀相公为天下国家惜之!使父不当仲业之一笑,得完首

领于牖下，不孝龙尚得北面而晨昏，则父虽不得为忠臣，尚可明其不忠之诬；龙虽不得为孝子，亦不至于不孝之罪草草而死也！昧死上言，不胜殒越之至。”同时，他还写了《上执政书》：“生父老而囚于狱，母衰而病于家，某御冤而待死于阙，一家三命，四散飘零，天下无有孤苦惨悲之事而过于此者！”长篇大论，可谓字字泣血，句句催泪。父亲远在边界蒙冤待刚，一龙作为太学生，只有用手中一支笔来辩冤救父，其心其情，感天动人！

马一龙自幼体弱多病，科举又屡试不第，母亲是他的主心骨，是他的守护神。他考中进士不久，就上书乞归养母，这在一般人不能理解，不是自毁锦绣前程吗？但马一龙辞意已决。他的《乞恩终养疏》写得十分感人：“奏，马恳乞天恩，比例赐归侍养事。臣伏睹大明令内一款，凡官员父母年七十之上，许移亲就禄侍养，如果父母老疾、去官路远，户内别无次丁，方许亲身赴京面奏，揭藉定夺，钦此。臣母许氏年七十八岁，身患半身不遂之疾。六月二十六日，义男自原籍到京报说，臣母因臣远离，旧疾创甚，臣在数千里外闻之，寢食不安。臣受国家作养三十年，才虽弩钝，复蒙圣恩，选授今职。遭际如此，有志者谁不愿借尺寸之阶以进。但臣母生臣一子，臣又无子，家中别无次丁可以调理汤药、扶持起居，此令臣来就试，诚望发身以事陛下，不意衰老之年兼以疾甚，日夜思念，望臣回家，生见面目。臣知母年与疾至此，非有骨肉至亲在傍，真如喘息相通，谁能诚心揣中所欲？一失其宜，则朝夕不保。此臣所不能帖席而下咽者也！然荷国厚恩万倍于母，岂敢顷刻忘于其心，不图报效，而顾欲自遂其私情哉？惟陛下以孝治天下，平日所以教臣，及臣所以有负于里者，道莫大于君，亲事莫重于忠孝……臣恐求忠未得，而圣世间先有此不孝之子，将无所容于天地！安可一日立于圣朝也。况臣之精力未衰，而母之余生无几。”他以母已耄耋之年，半身不遂，儿子远行，母病加重为理由，加上自己是单丁一子，所以乞归侍母。不想效忠不及、事亲不孝，所以响应皇上“以孝治天下”的号召，回乡陪老母。上疏写得言辞恳切，合情合理。

为母病乞归，马一龙还写了《上宰相书》：“某自闻母病消息，奔走上疏。”“今日母病将亟矣！家中别无亲暱堪以朝夕，张目四盼，无一骨肉在旁延死命而托后事，未有孤苦惨悲而过于此者！”“伏惟大赐矜怜，愷切重辅，得早一日驰归，生见老母，惠莫大矣！书上，不胜愿望恐惧之至。”

孝悌传家，孝道治国。马一龙作为一位尽孝的儿子，他尽力了。为父申冤，

他冒死上疏；为母老病，他辞官乞归，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别桥中学有马一龙书《重修广惠庵》碑刻，居中有一大字十分醒目，那就是一个“孝”字。

马一龙母亲许氏活了八十四岁。在家六年多时间里，一龙竭尽孝侍。老母腰足冷痛，他和姐姐们日夜抚摩。冬日，邀请族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与母亲欢聚玉华山庄，百方奉欢。收获季节，马一龙老母到场园上率妇女们打稻，一龙和众多侄儿拿着扫帚箩担走到前面，以增加欢乐气氛。老母笑道：“你今年五十多岁了，还像细伢婴儿恋母啊！”马一龙一方面很高兴看到母亲开心，一方面又担心无人能替代他的角色，久待在家，不能为国出力。

母亲去世，一龙写道：“妣生不肖，其恩出于胎腹之间者，至再至三，其爱护慎至，犹不忘于既死之后。不肖痛念，至此屡绝，又至此不敢不强力图存，以承永诀之语。”

马一龙曾撰写了《考妣年谱》，详细地记录了父母的生平往事，许多细节虽寥寥数语，却栩栩如生。不忘养育之恩，不忘舐犊之情，马一龙所做的，又有几人能做得到？

才子马一龙

马一龙是位才子。

他“卓然以文章名世，书法迻逸，深入能品”，吏部尚书、门人鲁同亨言：“先生应运而生，负盖世才，使得及时柄用，久于其位大之，不难建夔皋之业，其次四方文武壮猷垂声竹帛，皆其余事。乃晚始录于有司，虽官清华，然不得以文章施于论道、经邦之际论世，怜才者有遗憾焉。”

盖世之才、文章卓然、书法能品、洛阳纸贵，对一位读书安身立命之士，评价够高。但也许正是马一龙的才高气傲，受人排挤，不得为当朝重用，这似乎是历古朝代才士的共同命运！

打开厚厚的《玉华子游艺集》，我们读马一龙的政论、文论、学论文章，深为他的博学多才而钦服。

马一龙的《学说》共有十篇，一篇散佚。他从各方面论证学说与学者的关系，充满机智哲理。他认为学者有“骨子学者”、“面目学者”、“皮肤学者”之分，“性命，骨子也；文章，面目也；技艺，皮肤也”。提倡“心穷性命之源、手握造化之摺身兼人物之能，技艺自然皆备”。他言道：“学术坏于战国，经义坏于汉，诗坏于唐，文坏于宋，习尚坏于今。”作为学者，必须“观天地求其法象，观阴阳求其造化，观鬼神求其隐微，观日月求其昕明，观四时求其变通，观寒暑求其消长，观一气求其循环，观万物求其生育，观六合求其贯彻，观三才求其参赞，此即所见以为学者也”。

在《劝学歌正》中，他言：“学也者，道之觉也，德之聚也。劝以厉其志，夫欲觉道以聚德者也。”表明他对学者的要求和看法。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写了《论蒙师》、《读性理书》、《说四书》、《读易》、《读书》、《读礼》、《读诗》、《读春秋》、《杂论》诸文章，结合自己的心得，批阅剖析，直言不讳，直抒胸臆。

礼仪，处世之规范，处人之规矩，马一龙对此研究精湛，涉猎颇广。他在《叙

议》开头言：“叙曰：名正则言顺，人存则政举。议所先也，莫大于宗子。”他详尽地列出了“宗子”、“宗长”、“宗相”、“宗祠”、“宗课”、“宗直”的议论，并关照“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在《祠堂议》中，他对宗氏祠堂也做了周正庄严的规定：“祠堂之建所，以奠先灵性神威，以其瞻后昆而兴孝思者也，然必庙貌严器数备礼仪中而后为。”接着，他对“祭议”、“群宗合庙”、“祭田”、“义田”、“恒产”、“义塾”、“冠婚丧”、“尊卑长幼”、“务本崇厚”、“茔墓”、“继嗣”、“田地货财”、“谱系”、“名字同行”等等，制定了详细规矩礼仪，真可谓用心良苦，议事无所不尽。

对祭祀孔孟的文庙，马一龙又撰《文庙礼乐配享议》，提出“今日议追崇典礼而不追崇典乐，又岂非千古之疑”？“高明配天乐之清明也，博厚配地乐之广大也”。要求春秋祭祀，以正清音。

对于治学读书，马一龙也有自己一系列见解。在《翰林院读书说》中，他提出：“学以博文，文以明道，道以悦诸心”，“故名实不可偏废，文与行不可不兼取，顾上人之风之靡，然偃矣！”这些论点的阐述，是颇有超前性、实践性、科学性的，学以致用、名实相符、文行结合，反对读死书钻纸堆，这在几百年前的明代，是颇具前瞻性的论点。在《读文章正宗书事》一文中，他提出：“文以载道者，尽入孔笔。后世续圣人志者，不当更出诸其上。正宗及取晋文秦穆以前，《左传》之文为词命，其亦异于孔子矣！”对儒家典籍正宗之求，标准甚高。关于求学学规，马一龙在《申明学规八条》中定曰：“定监历以为士准、正学业以端士习、修废坠以兴士志、时饷给以资士修、遴官属以谨士模、追逋员以裕士养、公荐举以激士行、一政以典训士礼”，对于太学生的礼食住行养修做出了细致而严格的规定和校训，是研究明代学制不可多得的史料。在《务本书馆学训》中，他对学者明确提出了要求：“修身为立业之本、明道为修身之本、尽性为明道之本、知天为尽性之本、原气为知天之本”，“余尝掌教成均，思以此悟天下之有志者，而多病归老，今以此与从我者共之志之在！”作为曾经的国子监司业，他对学生的期望，尽在学训之中。

马一龙的诗，用词平白，意境深远，朗朗上口，直系心胸。他作诗不喜用典，不喜繁缛，不喜造作，不喜绮丽，有香山之风韵，有工部之风骨，时又有太白之豪宕。

《松》：“乱枝抱月龙含珠，长丝裹天仙作庐。只恐明堂缺栋梁，长柄大斧来公

输。”以松自喻，大有栋梁非吾莫属之志。《老桧》：“高树高百尺，老干老如铁。岁寒照后凋，可比君子节。”一前一后两诗，可知前年少气盛，后老于世故，直白无忌，直指性情。

归隐，是高士的追求，也是马一龙诗的主题。如《幽居》：“车马门无客，柴荆我有家。短墙低过竹，茂草乱鸣蛙。瓮牖寻常月，盆池四五花。幽栖足吾兴，长啸生云霞。”《静悟》：“柴户绝人迹，汤火常不烟。一石临溪水，清光上下天。拂衣坐溪石，吾意亦悠然。长丝系钓竿，得鱼已忘筌。”诗人对远离人间烟火的栖居，仿佛很享受。

马一龙写有大量的纪游和酬答诗。《登惠山观第二泉》：“惠山长流惠山麓，上有清风半山竹。洞门桃花何处寻，仙人只在白云谷。”《双溪》：“君不见黄河之水来昆仑，万里一泄分乾坤。又不见长江之水发岷首，三峡直走敷浅源。千流万派不足数，天地阖闢开西门。中国燕秦与吴越，南北对峙为朝昏。”前首惠山写得空灵空濛，后者写得气势如虹。《送友人》：“桃花春水逐江流，长江路遥不尽头。花前有酒且为别，江上无风莫放舟。孤舟一别人千里，两地相思春复秋。回首五云天漠漠，不知何处是皇州。”《送胡人器》：“送君远登河上梁，寒烟衰草望中长。平生不下半行泪，此日空回九曲肠。岁晚相逢又离别，年来多病易悲伤。春风拟泛西湖柳，好将桃花慰子长。”江上别友，执手泪眼，半是多情，半是多病，马一龙的离别诗情真意切，以情动人。

作为“文章天下闻”的名士，马一龙还写下了大量的疏、铭、书、文、状……，像《乞养病疏》、《辞免有司去皂状》、《澹塘记》、《东野序》、《耆社记》等，都充分体现了他学识的博精深广和行文的辞意通达。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长篇文章《九边图记》是十分难得的有关守国戍边的真知灼见，还有《说倭夷答林邑宰》，是江南抗倭的珍贵史料，还有《东封纪行》，是他经燕赵赴齐鲁到泰山封禅的经历，也是我们考证明朝地方建制和疆域划分的真实记载。

马一龙的书法俗称“龙蛇体”，飞龙走蛇，狂放不羁，结体奇崛，笔势奔突，点划随性，大小不一，其实应为“梅花体”，花开花落，朵朵各妍，不着墨规，性灵随至，看似无序，实有传承。在溧阳别桥中学有《重修广惠庵碑》，是地方上现存不可多得的其书法精品。笔者在友人家中曾见其《千字文》拓片，功力深厚，结构夸张而不失法度，笔墨放肆而个性盎然，在临黄庭坚的基础上，自有自己的风格。

濼水钩沉

城郊胥渚狄斯彬进士坊，曾有马一龙小楷遗存，一笔一画，中规中矩，秀逸其外，灵涌其中，证明他的书法功力非一日之临池而得。

马一龙曾言自己“马子踈狂不羈，与人落落难合”（《太霞墓碑》），也许正是桀骜不驯、狷介狂放，才造就了他艺术上的天马行空、与众不同，造成他仕途艰难、落落寡合。这也正应了“舍得”这句偈语：有舍才有得！

马一龙的才学，令人叹服。他是一本书，一本值得深究细品的书。

农学家马一龙

有人说马一龙是位农学家，因为他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农业专著——《农说》。

《农说》是不是第一部专著，我没有研究，不敢妄下结论。但马一龙作为一名长期居住农村的读书人，关心稼穡、注意涝旱、注目良莠、倾心丰歉，是其关注民生、谋得温饱的天性使然。

马一龙有《志农》诗一首，表明他对农业为本的重视：“莫厌身居畎田中，古来治道本于农。欲成尧舜君民志，须尽艰难稼穡功。出作入休总帝力，五风十雨愿年丰。太平无事人人乐，击壤讴歌处处同。”以农为本，治国之道，圣君皇上，应知耕种收获的艰难，只有农业五谷丰收，太平盛世才能人人快乐。诗写得平易近人、言简意赅，这也许正是马一龙写《农说》的缘由。

《农说》序言曰：“孟河子曰：力田养母，此吾今日第一义也。父忝仕宦，不肖与国家居，贫无所取，备以供甘旨，皇皇然不能一朝宁处也。”“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而他图贾人之利，率为世途。闾阎之间，力倍而功不半，十室九空，知道者之所深忧。就田庐作《农说》一章，以示傭人，书生言过文致，逐条更为详说。好事者多来索书，因命工刻版，布诸乡人之有志于农者。”

《农说》主要是作者以“阴阳”学说来论述耕种，涉及农时、土壤、灌溉、育苗、治虫、除草等农作环节，从而得出“谷不足则食不足，食不足，则民之所天不遂。物之可贵如此，苟非顺时调护，何以得之？农者当知自力矣！”马一龙为什么写《农说》，他在文章开篇就言：“农为治本，食乃民天。天畀所生，人食其力。”

除此以外，马一龙结合农作实际，写下了大量的关于农业的论著，如：《论归闲田》、《论水旱为备》、《再论湖田复状》等，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办法。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马一龙的农本思想和悯农情结。这在重仕轻民的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忧旱》：“山田望秋雨，阴云生四林。锄禾莫休歇，天无绝人心。西家不举火，东邻米如金。但得年岁丰，何愁湖海深。”

山区农民为旱困扰，天天祈盼秋雨降霖。突然林间生起阴云，大家心想天无绝人之路啊！手里的锄头还不肯停歇，肚中的饥饿阵阵袭来。大旱之年，米贵如金，多少人家揭不开锅了！但愿今年能多收点粮食吧，哪怕雨下得再大也愿意啊！

《田父》：“六月雨正好，秋禾青满田。昔时忧旱魃，今日兆丰年。远水鸣鱼鼓，荒村起暮烟。莫嫌征税多，借债了官钱。”

六月下雨，秋禾满田，驱走旱魃，盼望丰收。水流鱼欢，荒村有了炊烟。官府的税赋可真多啊，他们可不管你是丰收还是歉收，田父只好先借债去把官钱缴了。诗作真实地反映靠天吃饭的农民的艰苦悲哀，一方面要为天发愁，一方面要为人犯难。

《十月乡村》：“十月乡村里，萧然俗不侵。野纡霜菊净，客少径苔深。汤饼年年节，寒衣处处心。暮天砧杵急，黄叶下枫林。”

这是一幅十月乡村民俗图。青黄不接，秋风寒起，枫叶飘零，吃着汤饼过节，想到要加衣裳了。河边又响起阵阵捣衣的棒槌声，冬衣要洗晾上身了。

《郊行》：“地瘠多凶岁，家寒近好邻。今年饶雨水，愁绝去年贫。”土地的贫瘠造成了歉收，家中的贫寒幸有好邻相济。但愿今年的雨水肥沃，好弥补去年的亏欠。

《喜雨示老农》：“雨水上田沟浚平，禾苗出水满田塍。农人歇耕陇上坐，牧子骑犊村前行。暮起山云曾未约，飞迥鸥鸟却多情。好怀且自逢时乐，漫把金尊向庸倾。”

雨水充沛，沟壑苗青，劳作的农夫坐在田埂上歇晌，放牛的牧童骑着停耕的牛犊赶紧去吃草。山那边暮地起了阴云，看来又要下雨了，鸥鸟翻飞低掠徘徊。欣赏着一幅乡耕喜雨图，作者举起酒杯，自斟自饮，自我陶醉。

对农民同情，对丰收的祈盼，是马一龙诗中的精华：“嗟彼锄禾人，谁肯念辛苦。一年望有秋，十熟才得五。安得竹林下，使之各所得。”（《避暑吟》）在《织妇

叹》中，他对农村妇女的辛苦和官吏的重徭苛赋，写得十分动人：“织机重织机，手理机上丝。织成双线布，只恐输官迟。朔风起重阴，御之无完衣。一身不足惜，儿女良可悲。今日复何日，县令相公谁？叫嚣绝夜吏，灯火安杼机。轻徭薄赋叹，主息仰可资。都云今有袴，不道昔无襦。”农妇一天到晚在织机上劳作，还是怕跟不上官吏的催促。北风吹起冬将至，身上却没有御寒的衣服。自己挨冻不足惜，年幼的儿女们怎么办？年复一年，县里官吏都叫嚣着催交，只好夜里也继续织布。一天到晚喊轻徭薄赋，哪知老百姓的疾苦？生活开销都靠这张织机，你们只知我们有开裆的裤子穿，却不知连短袄也穿不上啊！

在《蚕妇吟》中，作者也真实地反映了采桑养蚕艰苦，和对不劳而获者的不满：“东风采桑，维陌之阳。短枝沃若，长枝远扬。东风伯劳，蚕眠甫饶。攀彼筐筥，爰涉于郊。东风杜宇，蚕眠正起。再用之燥，有比其绮。东风丝橐，我来孔暘。为公子裳，君侯之章。”

重农、力农、知农、懂农、悯农、惜农，作为农学家的马一龙不仅具有农业知识，而且有民生意识，他将《农说》刻版发布，惠及农民，这是他造福地方的大功德。

“玉华子”马一龙

马一龙《病居玉华山》诗云：

旧时卜筑玉华山，茅屋因依可数间。
荒径古苔闲长满，茂林高鸟倦飞还。
远无车马临门户，静有琴书对药栏。
不是社中诗酒伴，莫令白日扣松关。

玉华山是马一龙辞官隐居之地。在此他精心构筑，利用地形地势巧妙安排，既垒砌了他避世守静的安身之处，也建立了他读书究学的安命之所。

他在《玉华山小洞天记》中云：“乃见天宇似另一世界，与尘凡隔，非复喧嚣之境矣。地甚不广，倚洞为轩楹，诸物充牣，食饮起居，自成一家。村轩前凿半月池，种青蒲畜赤鲫，名卉佳果杂植池上。曲栏石鼓并陶埴之类，处置栏内，可坐可凭。酒酣而倦，推砚抛书。投琴散局，席地裊草，展足一鼯，鼻殊快意。土阶上下，垒太湖石，奇峰卷云，悬岩滴雨。后凋之木，解语之花，上丝下苓，昼开夜合，莺啼燕语之声，叹息韶光去以消歇。见月落参横之景，梦寐翠羽下而喇嘈是非，厌弃金谷而思媿罗浮者乎？”

马一龙是位筑园高人，他的玉华山居，依自然之韵，奏山水之曲，是文人仙境，非凡间之居。

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大多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往往把进忧退忧的情绪和满腔的才华，寄情山水，寄托自然，修身修行，消遣时光，消耗梦想。其中，有无数的愤懑和怨气，有无尽的感伤和无奈，都在时间的流逝中淡化，都在山林的野逸中淡忘。

马一龙卜筑玉华，又何尝不是如此？

其《山中八首》诗（节选五首），颇能代表他身居山野时的心境。

一

山中种竹已成林，曲径周围十里阴。
茅屋半藏云以外，石梁宛在水中心。
虽非蓬岛有仙住，总是桃源无路寻。
自苦平生知己少，清风明月结交深。

二

山中结庐深且幽，野人常与鹿豕游。
世间有物总吾类，身外无家何所求。
忽忽流光又一日，扰扰浮生空白头。
林卧悠然观化理，不知胡蝶是庄周。

三

山中闭门读古书，古人今人竟何如？
羲皇之上有大道，仲尼以下无真儒。
一身安用作私计，万物总然归太虚。
请看旧时王谢第，朱门华屋尽丘墟。

五

山中不与外人通，我自耕田为老农。
种药最宜新雨后，看花长过小桥东。
欲招梓里陶元亮，相访鹿门庞德公。
虽是古今时世异，高风千载与吾同。

七

山中常不服衣冠，岂是书生骨相寒？
名教所居皆乐地，太平无事有闲官。
花前举酒邀明月，台上吹箫引紫鸾。
此意与人知未得，但将白发共君看。

马一龙在山居中植树观花，耕田读书，过着陶渊明一样的世外桃源生活，他似乎很享受这种高风亮节的隐士生活，“病后身轻能跨鹤，白云随处是吾家”。虽年岁大了人老了，他心中的不平却并没抹去：“山中常不服衣冠，岂是书生骨相寒？”最后他讥讽地发问：“借问当朝贤宰相，用人行政近何如？”

用人用材的偏颇失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痼疾。历朝历代，当朝权贵都喜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的小人庸人，而烦刚正不阿、直言相谏的忠臣君子，这是历史的悲哀，是国人的不幸，也是国运的不幸。官不能尽其职，人不能尽其才，这是制度的缺失，是封建的茶毒。马一龙胸怀不满，去官隐乡，直到“留连光景无多日，去往乾坤此一躯”之时，才向当朝宰相责问“用人行政”（他没法诘问君王，那是杀头之罪），此时此刻，他的耿直狷介、正直磊落，表露无遗！令人叹服，令人尊敬！

马一龙还写有两首玉华山之诗：

九日与南村诸老登玉华山

九月九日九老会，野蔬野饮野人家。
远来何处白衣酒，同醉此时黄菊花。
岁到雪霜见松柏，春如桃李自繁华。
可怜头上乌纱帽，不比风流晋孟嘉。

九月九重阳节登高，不知是否那场二十四位耆社老人的采风？还是山林八节九老的聚会？野菜野外野餐野趣，醉倒在黄菊下。满头白发如霜雪，再也戴不了乌纱帽了，但年老的风流雅集，登到高处能看到古人的风范，看到人生的过往。

玉华山筑八角亭

寻得盘龙堰上湖，天留此地与狂夫。
山围四面如城郭，水绕孤亭在画图。
未剪春萝花自发，欲酤美酒鸟先呼。
只缘野老闲来往，犹带红尘到碧芜。

马一龙有《盘龙桥记》：

玉华山西有檀石桥，桥下盘龙堰，古志其载也。堰今千百年，上复

之桥，即水所从，下湖□□当狭隘，阻塞水道。每山水暴涨，桥以上溪岸泛滥，田皆为巨浸。爰相其宜移建于此，增置耳。门益甚高广，合受青龙洞诸山之水泻而下流，堰之田不圯矣！功有功于堰，堰得复古，古之名称美且久焉。美于堰者，自古传于今，而今之传将只其后桥，当介其名，以并美耳。

一座盘龙桥，马一龙生怕其古名湮没，重点介绍与盘龙堰之美，他对这里的古建筑是十分珍爱的。

马一龙觉得玉华山是上天留给他的一块宝地，四面是山，水绕八角亭，野花盛开，鸟啼引路，往来有村老，带来尘世的消息。

晚年，马一龙在玉华山又筑“君子亭”，他记道：“玉华山构亭竹间，取名君子者。清风高节，竹与君子有之，斯名称情常恐主人不与也。平生爱松竹，种松竹非山土不宜。其年冬得玉华山栽松，计明年竹醉，日可移竹也。”“竹初笋，构亭，亭成笋再竹，竹藉主人护持。亭以竹名，美微音翕，清天韶骇，虚淡魄流，影云壁堕，倩竹若有知，以所报主人者。”“草木无知，且解人意，人心本灵，不爱富贵繁华，即可见谅。”

将亭建在山竹间，取名君子亭。性本爱松竹，清风见高节，此乃马一龙的品行追求也。

马一龙常自称“玉华子”，他是把自己彻底融入这片山林之中了。

马一龙的赤子心

明朝嘉靖年间,朝廷改溧阳税赋漕运至无锡,引起地方的不便和不满。过去官运,主要靠水路,以往溧阳属京兆(南京)管辖,可由陆路向西近二百里抵达,如改迁无锡,由水路绕行十分不便。

牢骚也好,议论也罢,谁能改变官府之主张?有一个溧阳人站了出来,仗义执言,直指弊政。

马一龙《论溧阳改迁无锡兑运》写道:“如今溧阳交兑改迁于无锡,不知何故也?旧溧阳起运钱粮、军民交兑,俱在城南水次仓,正统至于今,未之有改。近因运官一人与邑吏论耗小隙,谎言河道浅泄,惑乱当道,遂有此变耳。窃谓,古称溧阳为濑江,今虽世久堙塞、渐成涂畚,却非山邑钜陆飞輶之地。其水深可以浮载,不待言语面谩也。果改迁,便于上下而有利,前此何无一人谋及之?”

作者行文单刀直入,击中利弊,指出溧阳的兑运一直由城南水次仓起运,自元代至今未变。至于为什么要改迁,只是因运官与县官因为运输损耗上的事,有了点小意见,运官就向上谎称河道太浅,不便船行。溧阳古称濑江,河道虽因时久淤塞,但水深完全可以载船,不要信口胡言。如果改迁有利于官民和运输,为什么偏偏从前没人提出过?

“夫以一人私忿,而奔走十万生灵,以快其意,又将遗祸于无穷,必仁人君子所不忍也!龙固溧人,虽家居力食之夫,而经国之猷未尝一日忘于其心。适见此事,有所疑惧,故论著五宜四不利三便之说,并图运河远近顺逆之势,请择于下执事者。”

此段为作者心声。自己虽已退野,但民生大事不能不问;明知图一时之快会招来无穷祸害,但舍一人而谋十万乡亲利益,豁出去了。这就是马一龙,一片赤子之心的马一龙。他提出的“四不利”是:

“一、改迁不利于民。溧阳为京兆属邑，由陆道而西二百里抵留都。中取二道，南出溧水，北出句容，皆不通舟楫。由水道而北二百五十里至京口大江，中间经过金坛、丹阳两县，是运船常所往来处，又由水道而南九十里至宜兴，又一百二里至常州，常州折而西北至丹阳八十里，又八十里通于江岩，复南向至无锡，则取苏杭去路矣。欲转运漕，须复逆常二百四十程，方与前道合。”“自溧阳水次仓抵无锡，皆广河巨浸，民船单弱扁窄，不兑风波飘溺、盗贼劫掠，非如官军运船行泊有纪律，可无虞耳！”

“二、改迁不利于军。溧阳粮至无锡，安得大仓广场可以居积晒扬？不过两舟相遇，漫寻河傍隙地，相为授受耳。”

“三、改迁不利于官府。应天都总，羈候于运漕督府之门，究其失事根因，当职者不能辞其责也。”

“四、改迁不利于国家。国家天下运道，如人身血脉自有生。”“溧阳水脉，北接金坛，直距大江，西受宣歙诸水，未尝断绝此流，通元气以环抱金陵者也。”

马一龙认为改迁不利于国家，不便于地方，不益于百姓，于是提出了七条整改意见，句句中肯，条条实用，不啻是改革之良策。他这篇“论”，是我们研究明代地域、河运、漕输、水系的珍贵资料，证明马一龙并非是只会吟诗喝酒的文士，而且是位治政有方的能人。只是他冒死上书的策论，不知有无得到昏官庸吏的采纳？

马一龙作为乡贤名士，梓里有重大活动，都请他动笔作记，县志称他“善立胜事，如仿古建置祠堂义田，及重建尊经阁之类，并为时所称”。县志还记载了他写的《毁淫祠札》、《祠记》、《建阁记》等文章，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查根溯源，考史究实，都是文章中的经典。

马一龙对家乡的名胜古迹也喜游历勘察，多有诗文结集。

他为狄斯彬居住的胥渚“东野堂”作序，有句云：“青山在屋，流水到门，花木阴森，鸢鱼飞跃，闻宫钟之声，陟独乐之境，恍乎翠华云壁之乡。”用词优美，描绘精湛，仿佛一幅江南仙居图。

溧阳有春草池，为谢灵运洗砚之处。马一龙《南塘记》云：“塘为谢灵运梦生春草处也。千百年之间始得贤者继其名声，信天下名物必有神灵呵护，非其人可为主，则不肯轻授。今南塘主人较灵运才华气概虽为后先，然谢氏皆天资过高，

又承乃世遗风，多豪宕不羁。南塘学于阳明之门人，其孝友端方之实，实固足以盖灵运文艺。”此南塘主人，应为史玉阳也。“尝吾童子时，偕群儿浴，没溺其颠，水底蹠泥过彼岸，起若有前拽者”。回忆童年南塘戏水，作者记忆犹新，对此感情更不一般了。

《登丫髻山绝顶勒石》是马一龙写的一篇游记，情文并茂，生趣盎然，性灵流露：“是日风柔气和，天色开霁。”“佇屹石望东南诸山，尽如在大洋中涌出青螺数点耳。近山村落，红白花见绿树杪，渐远渐隐。洮水万顷，日光下闪闪动鳞甲。遥拟金陵，当在赤山之右，勾曲横亘后屏，测之，其峰岩差高。樵人谓可见钟山宫阙、大报恩寺浮屠金顶，则予未之能辨也。又谓南峰巨石雨过辄放光如白虹，属天予跼巨石，亦惟顽块，岁久雨水洗刷明净。天雨乍霁，日色旷射，他处尚有云障，故见此石独明，谓之光也。岂真石蕴刻琮、上通天气者乎？后人不省，将疑巨宝，掘土凿石，以为兹山之灾日。亭午，山庵野僧以果茗宾进，且说山中多虎不宜留，向晡遂归。”

丫髻山在瓦屋山北，是溧阳、句容的分界山，因形若古人丫髻而名。马一龙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登山可见洮湖碧波，如天气好，甚至可以看到百里之外的钟山和报恩寺金顶。山上有巨石，笔者认为其放光是日照所至，并非蕴藏什么宝贝。其时山上多虎，不宜久留。而溧阳有虎之信息，约在六十年前，横涧李家园曾猎虎。于今，虎踪已绝迹久矣！

马一龙另有一篇《杀虎行并序》，很有意思：

“新昌之山有毒兽，其名菸菟，兽之猛者也。夜匿林莽间，时出食民家物，遇之，虽途人亦伤。令尹怒，遣猎夫操刃矢张网追杀于山下，获其三子焉。玉华山人见其事，甚喜，山人志在幽谷，所居多木石荆棘，每当明月之夕，角巾芒履，曳杖逍遥，真为洞天无何有之乡。然虎狼出没，常惴焉，不快意。今已殄灭其族，狐狸之群不为忧矣！”

马一龙还有一篇有名的游记《游青龙洞》：“青龙洞极其玄深，务悉奇巧，石开天窍……珠壁联粲，断处复续，合而还分，削玉荆扉，采华丹幌……”“尝廿年前宿于洞中，令工镌‘奇石’、‘龙洞’、‘会仙馆’七字文，又偶兴一小绝。今所存独‘会仙馆’，文刻堙没，想石脂生长混其迹矣。洞中石纹似龙鳞，而其势蜿蜒虬蟠，委蛇宛转皆龙形，此得名所由。志谓：有巨蛇居其中，因以名之，当是附会其说。”

二十年前，镌刻诗文渐被蚀没，这是石灰岩酸蚀的结果。而时间刚流逝五百年，青龙洞于前几年灰飞烟灭，不复存在。采石的硝烟，弥漫了溶洞的天穹；炸药的威力，崩飞了青龙的身躯。贪婪的本性，愚昧的索取，使今人和后人，只能在一龙先生的美文欣赏青龙洞了。开山取石与历史名洞，孰重孰轻？无人回答。

史贞女是溧阳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也是最有名的贞烈女子。马一龙《史氏女》写道：“一女三十不移天，独出闺门去击绵。路上逢人筹白食，江边抱石赴黄泉。媿心何事身轻死，然洛应知母老年。李白文章满天下，又将贞节世间传。”

马一龙的诗很有趣，他不像许多诗人一样去讴歌史氏女的贞烈，而是反问她为什么这样以身许死，你难道忘了家中还有老母没人侍养？李白写的瀨水贞女碑铭传遍了天下，贞女的节操也众人周知。抱石投江就是为此？

和凌惟孝晓发瓦屋山(二)

一

上下山蹊险，始知行路难。
病兼弩马钝，寒觉袭衣单。
早起日初出，幽探兴未阑。
高人成世隐，家在白云间。

二

缓行迷故道，一径两峰开。
露宿人皆病，村沽酒可来？
深山高士隐，古寺乱云埋。
傍晚天心月，悠然入我怀。

探幽瓦屋山，露宿衣衫单，冻病了又起早走在山路上，打酒的人不知来了没有？马一龙和友人不知寻找哪位高士而来，瓦屋古寺已埋淹在一片乱云之中。只有晓月挂在天上，皎洁如在我怀中。历史上，写瓦屋山的诗不少，李白就曾写过，但马一龙的“晓发”诗，很有自己的特点。

《游茭山》一诗，马一龙写得轻松风趣：

青山十里尽楼台，万竹山房双径开。
春日看花红药乱，故人送酒白衣来。
神仙第宅无烟火，太史文章半草莱。
野老未曾通姓氏，相逢谓我谪仙才。

菱山是溧阳旧名胜，青山十里，楼台处处，这里似神仙府第，却已荒芜。前代文人凿在石壁上的文句，已一半埋在草莱之中。野老一见作者，就说他有李太白之才，这让马一龙既惊又喜吧？也许，他的大名早已久闻乡里，村夫野老也已猜到来者是谁了。菱山，多奇石，今也化为水泥或灰烬了。世事沧桑，马司业再聪明过人，也推算不出五百年后的人事吧。

马一龙虽因仕进而离开过故土，但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溧阳这片土地上。他非常了解故乡，熟悉故乡，也热爱故乡。他为我们留下许多本土的风土人情、传说掌故、游记诗文。他是一位赤子。

让我们再来读一篇他写故乡的文章吧：“吾溧土无异产，吴楚分界，迎伍牙、天目大山，合宣歙潯，为五堰之水，而注之百渎，盈具区。震鼓播逆，反挟海岛，常抱金陵。溧中居，盖吴楚山水壤接，亦大江以南阴阳交会之地也。……人多憨直，不易挠屈，是以真性根气，二者寡移。家有老父老母，耄耋期颐，井邑之间，齿发足指。自吾落职史馆，来耆社，集一里中男子，处七十以上、九十以下者三十人，实他邑未有，既奇之。今岁春上，乡大夫以山林八节之会修禊于方丈山。”“耆社，山林两会中逸民遗老，总总如此，岂非山川精英、博大钟气在人，故孕毓多贤，富贵寿考，虽世情中变，而天道栽培境土之内，当书之以纪风俗，传为盛事。”（《彭母双寿叙》）

马一龙与史玉阳

马一龙和史玉阳是表兄弟。

先让我们读一首《秋夜与恭甫史表兄城外独步联句》：

有容能来不待招，(史) 城门殿帙步清宵；(马)
彩云捧月光莹，(史) 白露横江秋气高；(马)
今日河蒙吴下士，(马) 旧时颠旭酒中豪。(史)
狂魔顿起冯虚思，(马) 谁驾长空万里桥。(史)

秋高气爽的月夜，两人漫步在清辉满野的城外，看天上彩云追月，地上霜露横江，一股凌空飞驾、直冲云霄的冲动油然而生。此诗应为两人早期之作，两位表兄弟独步城外，阐述前程，也不顾城门已经关闭，年轻人的朝气豪气四处飘逸。

史玉阳应试登第，马一龙有《玉阳第祥桂和瓠川宗子韵》一诗：

太霞金阙玉阶长，仙子还逢白面郎；
天上已传回轭种，珮中犹带辟寒香。
名芳九府神仙传，色映双龙日月光；
秋风欲下梧桐树，云里高飞小凤皇。

史玉阳辞官返乡，筑玉潭山居，成为“山林八节”聚会住处，马一龙常来往，多诗提及。

柬史玉阳

世绶谁能解，幽情众不知。
秋风金马疾，夜月玉潭虚。
寂寞违时好，纷华有此居。
不忘轩冕贵，野性近多迂。

九日与玉阳、吏部杜、宜兴冯亚宰、苗少宰登高

九月九日寒气来，与子同登玉女台；
马首青山摧不去，云中白鹤唤常回。
莫歌宋玉悲秋赋，且画陶潜赏菊杯；
不识姓名何处客，一时相见亦怜才。

马一龙怀才不遇，史玉阳辞官不仕，两人的际遇相同，性格相投，往来频繁，唱和较多。

中秋承史玉阳招余泛月谢之

我爱苏子瞻，秋夜游赤壁。
所识虽多人，相从止二客。
水波动微风，东山出明月。
此兴方浩然，杯盘已狼藉。
往事不可追，今人尚如昔。
岂无佳节候，可使志意适。
吾志在江湖，吾意在今夕。
今夕是何夕，八月之望日。
远随飞仙驾，饮之沆瀣液。
浩渺泝流光，逍遥泛莲叶。
爽气入我怀，长啸发清峰。

在《玉潭行寄玉阳史表兄》一诗中，马一龙写道：“玉阳仙人乘白云，直上玉清上帝君；自言少小便闻道，眼看富贵如浮尘。”“玉女还居玉潭上，青山笑人空自忙。”

中秋赏月，举杯邀客，泛舟湖上，兴致浩然。志在江湖，意在团圆，暖酒入肚，爽气入怀，长啸一声，把世间的不平 and 压抑全都喊出来！富贵如尘，青山长在，玉女依旧，只是人在世间空忙。作者表现出遁空出世、逍遥方外的情绪，也是对不得志的一种宣泄。

方丈山出游玉潭仙居即赴太仆卿玉阳史兄登高之会

入山绝凡境，出山怀坦途。
少喜纵飞骑，老欲乘安车。
安车不可得，负乘良自吁。
荷有同心者，相期遗尺书。
南山去北山，所隔百余里。
白云深万里，知君此中居。
君居南山下，北山寄吾庐。
岂无飞仙驾，可以凌太虚。
劳形促车马，尘足且驰驱。

刚刚游览完方丈山的马一龙，又接到史玉阳寄自玉女潭的请柬，赴重阳登高之约。年轻时会飞马纵驰，老了只能靠车马了。南山、北山相隔百里，隔不断同心同意的兄弟情，恨不得坐着仙鹤凌空而飞去。虽然旅途劳顿，还是来不及洗尘就策车赶往玉女仙居。年老的马一龙和史玉阳，一份兄弟情贯穿了一生。

晓发荆溪赴玉女潭

云山在前径，晓发溪水滨。
驾言玉女潭，其中有高真。
洞天一何遥，真人一何神？
神仙居洞府，杳然迷空津。
不知刘阮居，入山竟何人？

再入玉潭仙居

山绕清溪水绕山，寻山问水到松关；
白云尽在林深处，黄菊半开篱落间。
方讶地灵成洞府，忽闻仙乐出尘寰；
隐居不是陶弘景，圣世能容傲吏闲。

这两首诗都是写玉女潭景致的。神仙洞府，真人仙居，世外桃源，隐居宝地。但史玉阳不是方外道士陶弘景，圣上怎么能容他如此悠闲？傲吏，不受欢迎不得重用啊！后诗的最后两句，画龙点睛，切中时弊，似扬实抑，入木三分。

马一龙与史玉阳都是官场失意的才子，晚年只能寄情山水，纵情自然：“十年不负青山约，今日同君坐翠微。”（《玉潭山房呈刘纯庵年兄》）“仙人鼓瑶琴，高山共流水。”（《水西洞刻呈史玉阳》）

史玉阳七十大寿，马一龙在《书海屋添寿图代作寿史玉阳》诗中言：“南高百尺松，北高千尺台。长丝入云鹤羽白，吹箫时有飞仙来。借问飞仙是何人？云中忽见双旌开。仙人头戴芙蓉冠，却乃是我玉阳老，翁与群仙宴罢瑶池回。”

在《太卿玉阳史公古稀寿序》中，他对史玉阳的人品功绩大为褒扬：“孝友爱行于家，忠义直谅著于朝，仁厚恺悌孚于乡。”“捐粟数万大裨，饿孚不横于道路，每岁活累千百人。乡里之夫无食者待以为饮，四方之士无财者望以为助，公皆无少难色，亦无恡心。往年师旅之兴，输饷督府，义勇再出，殪首夷王，捍灾恤患，济国所需取，诸宫中不纪其功在朝廷。天子屡诏褒锡，进阶荫子，其名在天下，不啻儿童走卒皆知司马相公者。岂非当代一人！”

马一龙曾撰文记之，其父遭冤，他向史玉阳借金三百，二百交太学之费，一百作路费赴京申辩。他平时生活拮据，难以维持，史玉阳年以百金助之，使他能养母糊口。一介书生，除了满腹经纶，常常囊中羞涩，幸有表兄接济度日。因此，传说中的马一龙，与事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马一龙与史玉阳，兄弟加知己，这种文情、亲情、友情、交情贯穿了两人的一生。

竹林柬史玉阳四兄

一

清风竹林下，悠然思此君。
此君旧知己，相见莫可频。
绿杨下溪水，溪上多野芹。
野芹犹可采，野人不可亲。
何况在君子，翛然远世尘。

二

清风竹林下，此君与之俱。
六月不觉暑，清风其何如。
膝上横素琴，悠然怀素儒。
去天只尺五，其行胡次且。
愿扳北山驾，一顾南阳庐。

溧阳奇书《濂江逸史》

光华中学一退休教师托学生带给我一本影印书，名叫《濂江逸史》。上题“民国岁次丁丑仲春月周亦政堂珍藏”款，确为珍藏也！

查1993年《溧阳文史资料》第十辑，省溧中老师谢志忠对此书有详细研究。他言“溧阳市图书馆珍藏《濂江纪事本末》一书，一卷本，竖版本刻线装书，无标点，用干支纪年。开头的《自序》部分缺少一页。作者周廷英，溧阳戈旗里人（现马垫乡歌岐村），字光升，号一明道人。作于乙酉年孟冬（1645年）。书的中缝印有‘濂江逸史’四字，故溧阳人一直称为《濂江逸史》。现在此书在溧阳仅存两本，另一本为私人所有”。

询市图书馆所藏此书，馆长宋国忠答缺首页，亦应是民国版本。两书对照之下，页码内容如出一辙。因此，该书的正页封面就叫《濂江逸史》，而《濂江纪事本末》则是书正文开头所言。因此，可以推测，该书在清初始刻时叫“纪事”，而民国重印时改为“逸史”。

谢老师言“溧阳仅存两本”，不知是否包括送我书的那位孙老师？他手中的刻本应为全本。据说，我国明清史研究专家谢国桢教授藏有本书的抄本。

清光绪《溧阳县续志》卷十六“杂类志·纪闻”记：“《濂江逸史》一卷，明末周斯撰。斯字盛际，又号二安，家戈旗里，与侄廷英字光升，崇祯间同游邑庠。”这里的记载应有误，该书是周廷英所写，书中明白无误有记，周斯此时“削发入闽”，为何出此差错？“当朝人读不到当朝史”，该书在清朝为禁书，光绪编史者难以读到，所以出现谬误。“兵燹之后，惜无传本。”这又是一误，民间尚有存留，应是周家亦政堂传人私藏了下来，到民国丁丑年重新刊印出来。

1911年辛亥革命时，溧阳旅外同乡史幹等编发《濂江报》，十六开报纸油印，就曾连载过清代禁书《濂江逸史》。

以上是版本之探。那么,《濂江逸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它究竟反映和描写了溧阳什么样的史实呢?它又有何史料价值呢?

—

《清史研究》第一辑曾作编者按:“(《濂江逸史》)全书按时间顺序写,记叙了自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江到十一月,削鼻党起义首领潘茂被杀害于南京止,溧阳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大事。其中以削鼻党为名的的溧阳奴变,反剃发斗争,以及地主阶级的抗清起义等等。”

小时候常听外婆念叨一段“唱春词”：“正月里梅花香喷喷,李自成造反遇到兵。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上,满洲人打破北京城!”幼时懵懂,现在想起,唱词里描述的正是明末清初、甲申之乱的一段历史。

1644年,李自成起兵推翻了明朝。第二年,清军渡江,南明弘光小朝廷覆亡。溧阳县令李思模召集乡绅商量应对之策,结果是收买潘茂守城抗清。“以苍头潘茂为城守甲长”,李思模夜里逃走,潘茂实际掌握了溧阳军政大权。

潘茂乃彭家奴仆,也是管家,得主人欢心宠信,官场上也多有结交,加上手中有家丁武装,所以官绅委以重任。他上任后,不思抗清,却率徒众抢劫全城,民众不得安宁!

溧阳举人彭旭,富有民族气节,募兵南山妙如寺,宣布起兵抗清。“甲申之变,邑人彭旭、史泽、史太乙、史顺震、陈刚、陈叔美、蒋舒、蒋云卿、蒋育生、钱国华、马英如、徐茹英、杨原镇、王立本、狄奇节、周重、周在公等恸哭於明伦堂,谋起义。”(《溧阳续志·卷十六》)

1645年6月21日,潘茂之弟潘珍成立削鼻党,江宁、镇江、常州各处竞相效仿。鼻,江南称家僮为鼻。削鼻,废除之意。

6月23日,潘茂以溧阳户口册籍降于清。

6月26日,戈旗(歌岐)义民周重、生员陈刚,召集周姓百余人,歃血盟于家庙,两人倡义于渡济桥之伍公祠,率众会合,起兵抗清,浪洋等地闻风而动。史泽、史太乙诛杀削鼻党缪大、杨三等二十八人于侯庙。

7月9日,浪洋人打溧阳城,不克,败还。7月12日,彭旭会同周重、史洋、陈刚、浪洋人攻围潘茂,分攻四门,因清骑兵途经援潘,又遭失败。8月1日,清知

县朱正色上任。原明代副总兵钱国华先攻下郎溪县，又于8月24日三攻溧阳城，因轻敌，又有内奸出卖，钱战死。10月22日，长荡湖义兵、金坛蒋云卿联合攻打城内潘党，大战于冯家桥，削鼻党损失惨重，被杀二百多人，但城仍未攻下。

潘茂、潘珍勾结清军，对浪洋、歌岐、南山、胡桥等进行血洗，“凡村落反平昔有隙者，皆劫掠殆尽”，“杀伤无数，积尸如山，流血漂石，所掳子女千人，杀伤甚众，河水为之壅而不流”，对溧阳地方百姓造成惨重伤害！

8月14日，潘茂“受清职归溧阳”，是其用劫掠得到的财物赴京贿赂而得。但因他杀掠无度，民怨甚深，乡绅向清廷告状者很多。清政府权衡得失，派张成功查获潘氏兄弟，于11月11日“大索潘党”，执潘茂、潘珍，由总兵张尔蟠解至江宁府斩首。

二

《濂江逸史》记叙的一段史实，有言“削鼻党起义”，有言“潘党造反”，其影响波及江南一带。

甲申(1644)五月，金坛有潘某发动奴变，成立“削鼻班”，“自称主帅，高牙大纛，意气甚扬，啸聚凡数万人，而以朱绍基等五人为五虎参谋……未几邑令练兵，设计擒潘朱等六人，骈斩于市，群奴乃不敢逞，此甲申僮奴之初变也”。金坛人于墉著有《金沙细唾》，记录了此事经过。

陈其年的《迦陵文集》卷一曾记：“江南濂阳于申酉之际发生僮变。彭氏家有位潘姓奴仆，旦日大置酒，会其属曰：人姓之生，得无管骂足矣，天幸乃有今日，则相与揭竿起。”

明代江南，士大夫蓄奴之风大盛。奴仆有失地农民，也有像潘氏兄弟这样工于心计、投机钻营的“豪奴”。他们充当主子爪牙，“专恣暴横”，有的甚至能左右主人。

清《广阳杂记》曾记：“东吴尤重世家，宜兴推徐吴曹万，溧阳推彭马史狄，皆数百年旧家也。”潘茂虽身为彭家奴仆，其身份绝不是一般农民所能比拟。周廷英在《濂江逸史》开头写道：“有彭氏仆潘茂者，素暴恶，市井狗屠辈悉聚食于其家，而彭氏主人又纵之为爪牙。前县尹金和必欲置之死地，赂邑宦陈献策得释。”可见他既有泼皮恶霸之嫌，又是彭氏(天锡)看家护院的爪牙，即使县里捉拿要斩

首，竟有本事贿赂宦官开释。这可是社会恶势力之代表人物了，绝不是一个受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的形象。

“溧邑之祸，起于潘茂，而茂之恶，养于彭氏，而成于思模。彭氏能制茂，茂必不敢乱，思模能弭乱，必不用茂为甲长。”周廷英的这几句感慨，是颇有道理的。彭氏养虎为患，既害了自己，连家产被其掠夺，而且害了一方百姓。

“自思模去，邑既无主，茂因偕其党肆掠，城中无宁居。”潘茂一旦当上“城守甲长”，不思抗清，却开始抢劫掠夺百姓，可见其本质上是流氓加土匪。而让这样的人主持守城，则是溧阳的悲哀！

从6月9日李思模挂职潘茂为“城守”，6月23日，时间仅过去14天，“茂自知不容于邑，遂以溧阳户口册籍，同故戴巡捕降于清，自陈守城功。乃益横行村落，除起义之处，鲜有不被害者”。“于是，人人思啖茂之肉矣！”对内如狼似虎，对外奴颜婢膝，这样的人渣嘴脸，我们并不陌生！在民族大义面前，潘茂一脸奴相！

其后，潘氏勾结清兵，“遂分掠浪洋、戴埠等处，烧其庐舍，掳其子女，杀伤者甚众，河水为之壅而不流”。“茂既去，珍遂率领众大掠各乡。珍性尤鸷，凡村落富室及平者昔有隙者，皆劫掠殆尽。”“而溧邑之财，半归潘党矣。”潘茂对抗清义兵进行疯狂杀戮，“焚劫戈旗里，而杀伤殆尽矣”！联合清骑兵千余，屠南山一带百里，还有胡桥义笪村、吴家塘、塹口、长荡湖一带，积尸如山，惨不堪言，给溧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潘茂的降清，完全是以个人升官发财为目的。他四处行贿，买官求安，并追随清兵滥杀无辜，为虎作伥，如此丑恶行径，与所谓的“农民起义”、“僮仆反抗”毫无关联，理应受到历史的谴责。

三

《濂江纪事本末》的作者周廷英，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资料。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溧阳有同类书籍出现。

作为一介书生，他也是出于一种道义和责任，记录、采访、撰写了明末清初这段特殊时期的历史。在“自序”中他写道：“纪事本末者，一明道人感愤之所为作也。一邑之书不足行诸世，而顾晓晓焉，所以存一邑之功罪案也。”既是感愤之作，又知可能不足行世，只是想保留县邑的一段功罪历史，没有一种正义感和责

任感是不行的！此书幸亏在民国时重刊，不然真不能“行世”！

周廷英言成书之经历云：“余自邑侯李亡去，即窜大泽间，昼得侧耳往来人言，夜则燎麻书之，凡一事本末，必详诘再四，诚惧刀笔杀人，重余罪祸也！八月既望，余始来里中，以前所闻，质里中父老，俱不谬。”这段记叙，证明作者对“纪事”的认真和详细，恐怕刀笔杀人，有愧史实。对于这段史实，“倘无一书表记，后人不久以构难罪诸贤哉？”以文记事，以书纪史，这是初衷。“余因是益信此书之不足以行世，而一番论列，正不可少，遂缮写之，以示同志。”虽然明知此书可能传不下去，但知道这段历史记载不可或缺。也正因为周廷英的这种执着，我们才得以窥视地方上一段奇史，溧阳才得以保存一部奇书。

溧阳旧时有俗谚：“彭马史狄都做官，乌龟王八都姓潘！”“彭马史狄周，不如潘家一条狗！”据说，这是诸姓间的对骂调侃。

笔者外公家是歌岐周家，外婆在小时候就告诉我们：“黄墟人的拳头，敌不过歌岐人的笔头！”当时懵懂不解。读了《濂江逸事》，始恍然大悟，黄墟人姓潘，歌岐人姓周，黄墟为潘茂故里，歌岐为周廷英老家。

世事沧桑，历史与姓氏无关，姓氏与善恶无关。只是处在历史关头的人物，在演绎着历史的故事。这如用简单的“阶级论”、“成分论”来剖析，是不够严谨科学的。

历史的过往，如滔滔濂江，默默东去。濂，激扬而石多的浅水，飞溅出浪花水珠，汇集成历史的江河。

周廷英看到了，他也做到了。蘸着濂江的水珠，他写下了“逸史”，记叙了一段地方轶事和史实，完全是出于知识文人的良心良知和责任感。仅这一点，他就是后人的榜样！

戏曲名家彭天锡

说到彭天锡，恐怕知道的人不多。

明末山阴才子、小品大家张岱(1597—1685)，在其《陶庵梦忆》中对彭天锡有几处记叙。

《彭天锡串戏》：“彭天锡串戏妙天下，然出出皆有传头，未尝一字杜撰。曾以一出戏，延其人到家，费数十金者，家业十万缘手而尽。三春多在西湖，曾五到绍兴，到余家串戏五六十场，而穷其技不尽。天锡多扮丑净，千古之奸雄佞幸，经天锡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设身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皱眉视眼，实实腹中有剑，笑里有刀，鬼气杀机，阴森可畏。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磊砢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实珍惜之不尽也。桓子野见山水佳处，辄呼‘奈何！’‘奈何！’真有无可奈何者，口说不出。”

张岱对彭天锡的表演，可谓赞叹有加，心服口服！首先说他的串戏都有传承，非是杜撰，而天锡为学一戏，“费数十金”，证明他家产殷实，非是一般穷戏子出身，“家业十万缘手而尽”，也不是一般的公子哥所能消费得起、潇洒得了的。彭马史狄周，在溧阳五大望族中，彭排在第一，总有缘由。当时江南园林之最佳的夏林园，就是天锡公的祖产，绝不是虚名。

对于天锡所扮丑净角色，张岱不吝笔墨，对其面目之刁、心肝之狠、口角之险的奸雄扮演，一一道来，举手投足，眉动眼神，刀光剑影，鬼气杀机，令人汗毛凛凛！一个演员，能把观众带入“设身处地”之境，是要有点真本事的。那么，彭天锡为何有如此演技？“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这才是小品文的着眼点！

明社即亡，张岱、彭天锡之类的富家子弟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有人说《陶庵梦忆》是明代遗民对时代灵魂的召唤，对亡明的招魂，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明末清初，彭家所遭遇的“家奴之变，削鼻之乱”，可能使天锡一家倾家荡产，“申西间沧桑变更，世居西郊大厦悉遭兵燹。太翁天锡先生客游在外”（《彭氏家谱·寿州学正孝廉葵若彭公传》）。朝代的更迭，使彭天锡这样锦衣玉食的世家弟子失去很多，只能把自己的学识、见识、曲识，融入戏中，发泄到舞台上，演绎在角色中。

彭天锡应该不是位专业演员，只是位“串戏”的“票友”。在旧时，戏子是“下三流”行当，是难为上层接受的。而天锡“五到绍兴，串戏五六十场”，可能一为爱戏入骨，一为排遣郁愤。张岱亦未把他与“艺人”相待，过往交谊，均为雅士。

《陶庵梦忆·不系园》：“甲戌十月，携楚生住不系园看红叶。至定香桥，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东阳赵纯卿、金坛彭天锡、诸暨陈章侯、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伶陈素芝。余留饮”。这里的陈章侯，为名画家陈洪绶。“是夜，彭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此处对彭天锡的串戏唱功，连写两个“妙绝”，可见他不仅演技了得，而且唱功不凡！调腔戏，也叫掉腔戏，是明清流行于绍兴用帮腔与滚调演唱的剧种，彭天锡擅唱此剧，可知他滞浙时间不短。

在《陶庵梦忆·刘晖吉女戏》中，张岱写道：“彭天锡向余道：‘女戏至刘晖吉，何必男子！何必彭大！’天锡曲中南董，绝少许可，而独心折晖吉家姬。其所鉴赏，定不草草。”

由演戏、唱戏到赏戏，张岱对彭天锡可谓推崇备至。比之天上明月，炉上好茶，不仅想片刻享之，而且要“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可见珍惜程度之深。可惜当年没有录像设备，不能传之后世，张公子也只能徒叹“奈何”。

张岱和彭天锡有知遇之交，但却犯了一个错。溧阳籍上海戏曲史专家蒋星煜撰文言：“张岱说彭天锡为金坛人，大可商榷。”根据现有的史料，彭天锡应为溧阳人无疑。

彭天锡之子彭旭，字旦兮，在《溧阳县志》中有记，与同邑陈名夏、吴颖、钟鼎均为复社成员，又和马世俊等结“十三子文社”，两人又是儿女亲家。

彭旦兮在《原建法轮寺碑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辨轩）和尚南游来予邑，惟予先大大父凤泉公见而敬异之，为筑庵夏林家园。”后来庵小香客多，方在彭氏祖茔金鸡山麓、唐时废刹上重建法轮寺。由此可见，彭天锡之父为彭凤泉。（见《溧阳彭氏宗谱》）

《彭氏宗谱》在《史太孺人传》中，有“天锡公元配”一注，文为“翰林院侍读马世俊撰”：“太亲母史孺人，金沙御史企愚公之女，太学生天锡公之配，孝廉旦兮年亲之母也。”此处称天锡公为“太学生”，我马上致电蒋星煜前辈（95岁）请教，他说，太学生应为国子监毕业生，不能随便称呼，即今称大学生。张岱言彭天锡“一肚皮史书”，由此寻到佐证，可谓一个“发现”矣！

马世俊写道：“孺人幼秉其教，虽女异于男，而端方实相肖，及归天锡公，富而能俭，贵而能勤，治家秩然不紊。夏林园亭甲于江左，邻邑有力者谋得之，其议已成。孺人闻之，勃然色变，归告于亲，兼鸣之通族。悉以簪珥衣饰，并十余年辛勤节省者，不日贖还，而豪家亦唯唯不敢复争也。自是有女中须眉之号！及生旦兮，或谓天锡公数代单传，幸生一子，姑息之爱，常情不免。”“余长子有为孺人孙子婿，读书孺人家，时日已久。”

这里记载了夏林园一段轶事。彭天锡“家业十万缘手而尽”，邻县有豪家欲买夏林园，协议签好了，但史孺人勃然而出，变卖细软，凑齐积蓄，贖回了祖产，不愧女中豪杰！她对独生子旦兮也不溺爱。“严气正性，勉之力学，不少假以颜色，凡延师择友、睦邻敦族，事事必循礼法。卒使旦兮隽南榜、享盛名，皆孺人督之力也”。

在《寿彭太亲母史孺人七十序》一文中，马世俊有记：“天锡太亲翁豪尚甲於江上，宾客如云，母为中馈无怠。宗族乡党，咸得其欢心。及旦兮之学成，名立四方，问字者踵至。旦兮但与酬接于翰墨，而一切供亿馈遗之费，皆母氏主之。”看来，有其父必有其子，父子两人均为豪游善交之辈，幸得女主人操持家业有方也。

张岱言彭天锡为“金坛人”，或事出有因。马世俊言：“金沙与溧接壤，宗派尤近。”彭旦兮母为金坛人氏，马世俊、彭旦兮少年时都在金坛读书，两县有洮湖相接，界域相连，很难区分。彭天锡客居越地，由太学生沦为“串戏”客，也可能好面

子，含糊其辞，概言“金沙”。

“串戏”，旧时演戏亦称“串戏”，而彭天锡应有“票友”至“角儿”的演变，开始可能是偏爱，后来可能“下海”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溧阳彭氏宗谱》中鲜有其记。“戏子不入谱”，“倡伶下三流”，于是其子有传，其妻有传，独不见天锡公之传。

族谱中《彭葵若(旦兮)传》中言：“太翁天锡先生客游在外，忽焉讣至，葵若哀毁不欲生，迎柩归家，丧葬尽礼。”彭天锡之死于何地？死于何事？不知。“忽焉讣至”，就是死得很突然，讣告死讯突如其来，“迎柩归家”，肯定是死在异乡。

马世俊《匡庵文集》有《祭彭天锡太亲翁文》，有注为“乙酉”(1645)，即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呜呼哀哉！翁之逝於湖上也。余以避兵入山，不获迎翁丧于道路，既又不获哭翁灵于丧次。翁嗣君卜其宅兆而迁翁之灵，余又不获尽执绋执紼之礼，乃欲为文以稍报翁平昔知爱之意，而笔不忍下也。”此处言明彭天锡“逝於湖上”，是哪处湖？杭州西湖？绍兴鉴湖？

“翁性豪逸不羁，恢谐调笑，万夫辟易，如孔公绪议论：嘘枯吹生！余虽不善谑，而接翁之谈论，则不为之称快不止。翁意喜接天下贤士，如李元礼，座中皆名流，庞刘诸公坐百尺楼，相对不知何者分主客。余虽不知名，而侧翁之几席，则不为之尽欢不止。”这一段言彭天锡的豪放爽朗，喜交名流，而“恢谐调笑，万夫辟易”，是证明他的风趣，有“嘘枯吹生”之本事，则不是一般的能说会道了！马世俊此时的“称快尽欢”，不知是否包含“听曲聆戏”？或是曲笔表述。

“翁量不多饮，而好与知己相酹酌，如崔宗之白眼举觞，青莲、左相诸君一呼数斗。余虽不嗜饮，而闻翁之呼召，则不为之强醉不止。翁才最奔宕奇纵，文章乐府，流布人间，如傅修期上马击贼，下马可草露布。余虽不能诗文，而观翁之题咏满墙庑，则不为酬赓亦不止”。这是写彭天锡的酒风文品，量不大喜豪饮，诗不少则满墙，一副豪士做派。

“呜呼哀哉！翁之谈论其可复接耶？翁之呼招其可复问耶？问翁之几席，则已上赋玉楼矣！问翁之墙庑，则已落月屋梁矣！平昔之与翁善者，或扼腕愤嗟，或支颐叹息，而亦念此何时哉？人民城郭之是非，风景河山之变易，彼挈瓶灶走

“西东而营营朝夕者，何不达也！”

关于彭天锡的死因，一直是个谜。“逝于湖上”到底是自沉于湖以守气节，还是为兵乱所杀于湖？这里的“扼腕愤嗟”、“支颐叹息”，虽然讲得婉转，但愤愤不平之气洋溢！后面两句，则有点“声讨”之意：人民百姓东走西谋生，挈瓶担灶逃难，这点生机都不能保障吗？

“乃翁之生，则徜徉於吴越之间，五湖烟水，啸歌言怀，带甲满天地，而不曾累翁胸次。及翁之死，方与碧云彩霞变化摩荡，朝昆仑而夕溟渤矣！而区区愤嗟叹息，又何足为重轻欤？余友葵若闻翁变，扁舟辞母，挂布帆意去，扶棕远归，若不知有兵戈道路之警者！是虽葵若仁孝不可及，而亦未必非翁灵所致也。翁有嗣如此，又何籍於余所言乎？呜呼哀哉！”

彭天锡来往于江浙之间，“啸歌言怀”，可是“串戏”的别称？“翁变扁舟”，彭且今不顾路途遥远，挂帆去接回棺槨，而其时烽火四起，兵戈塞道，可见孝心可嘉也。马世俊开篇言“避兵入山”，后又言“河山变易”，再言“兵戈之警”，由此可见，彭天锡应死于崇祯末、顺治初之年，离“乙酉”相隔不远。

马世俊另有《湖上邀云阁怀故人彭天锡旧寓》诗：

故人诗酒在湖头，安得重来载舫游。
我独邀云坐高阁，君如吞月赴中流。
抚琴自积古今恨，挂剑翻成吴楚秋。
何敢再询戎马讯，只兹离别已深愁。

此诗载《匡庵诗前集》中，其“君如吞月赴中流”句，类似李白醉酒揽月采石投江之说。蒋星煜先生言：“我认为彭天锡十分可能是清兵南下金坛、杭州、绍兴一带时，和祁彪佳一样，自沉于水的。所以在祭文中就含糊其词了。”这当为一说。但既然自沉于水，应为舍身守节之举，为何在张岱文章、彭家族谱、马氏祭文中均不见记录？而马诗中的“古今恨”、“戎马讯”，又像是抗清被杀，只是不见片言只语也。

彭天锡死于清兵渡江的乙酉左右，死于湖上扁舟，死于远离家乡的异地，但

死因不明。马世俊的隐讳避藏，欲言又止，蒋星煜认为“与政治有关，当无疑问”，是有道理的。

在《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一书中，郑志良先生撰文《晚明著名串客彭天锡考》，对彭天锡的生平、家世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一、彭天锡的父亲，彭尚德，字景明，号凤泉，生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卒于天启二年(1622)，任光禄寺署丞，升福建断事。彭天锡的母亲李氏出自宜兴芳庄望族。彭天锡的妻子为光禄寺卿、金坛人史弼之女。他的母亲、岳父家皆为当时显宦之家，他是家中独子，生活奢华、出手阔绰，不足为奇。

二、彭天锡在晚明时期交友很广，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如户、礼两部尚书倪元璐有《题彭天锡像迁赞》，名士祁彪佳有《夏日与吴二如、彭天锡、浦长卿诸友集渔胜楼，次彭天锡韵》诗二首。阮大铖有《同虞来初、冯犹龙、潘国美、彭天锡登北固甘露寺》一诗，从中可见彭天锡与当时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冯梦龙亦相识。

三、彭氏夏林园约始建于弘治年间，此后绵延近两百年，一直到康熙年间，彭天锡孙儿辈还拥有该园。钱谦益曾言：“江南称园亭之胜，以溧阳彭氏为第一。”王世懋《游溧阳彭氏园记》极写夏林园之胜：“兹园之名不闻天下，则在僻壤故，而彭氏子孙亦以僻能久有兹园也夫。”彭旭之子彭怀古，字采南，继为夏林园主人。“园之名胜，闻于江左。自伍山至于葵若，历世俱单，然号称极盛。采南承七世遗烈，良田绣错，甲第连云，僮仆数百指，婢妾数百人，服饰器用之华，梨园声伎之美，见者目眩心惊。”(《溧阳彭氏宗谱》卷四十《太学馨符彭公传》)

彭家在甲申、乙酉之际，虽遭兵燹，但到彭怀古手上已渐恢复。彭怀古处世之风颇类其祖彭天锡，亦好戏曲，并蓄有家班，方中发《濂江唐五聚邀游夏林，主人出家僮演剧，欢饮竟日，同董班若及家仲兄作》云：“十里河村画舫轻，桑麻绕舍雨初晴。板桥香径亭台影，曲巷疏篱鸡犬声。尽日笙歌忘战伐，百年松桧想升平。醉归多谢沿堤月，不惜清光送入城。”(《白鹿山房诗集》)

四、《嘉庆县志》卷十《选举志·例贡监》中有“彭应瑞，字天锡”记录。而《溧阳彭氏宗谱》卷十六《十三世表》载：“应瑞，字天锡，行一五七，景明公子，居城西。

万历己丑七月初三日生，顺治乙酉九月十七日卒。”由此可知彭天锡生于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卒于顺治二年(1645)乙酉，享年五十七岁。谱中又记载彭天锡“钟鸣鼎食，座客恒满，似乎田文、郑庄。山介水隈，吴歌楚舞，不啻习池金谷，以视家藏金穴而犹锱铢琐屑、鸡鹜争食者，亦霄壤矣。”

五、《溧阳彭氏宗谱》卷四十六《诗存初集》中有彭天锡诗三首：

莫愁湖夜眺

锦城西郭静，沙外庾公楼。
树影团僧舍，云光护鹭洲。
山随晴色变，月傍水痕浮。
兴到忘归晚，寒风薄客裘。

晚江

风卷微波生绣纹，古村烟火出榆枌。
山光远近连天舍，柳色阴晴隔岸分。
孤桨独摇斜岭日，片帆遥逐渡江云。
牧童骑犊年归鹭，两两惊飞落后群。

芥中晓晴

斜谷春残绿满林，万山飞雾作轻阴。
雨声夜过西岩急，云影朝屯北壑深。
石下沙平添虎迹，峰高树杪出泉音。
悠悠客思浑无定，寒薄微风吹素襟。

六、彭天锡与阮大铖交往密切。在阮大铖的《咏怀堂诗集》中有多处提及彭天锡，他们之间情谊非同一般。阮是晚明著名戏曲家，在戏曲上造诣精深，彭与他交往甚密，因为爱好相同。但阮大铖名列阉党，南明弘光朝掌权时迫害东林党人，后又降清，政治上弄得声名狼藉。南明晚期，彭天锡应是阮大铖的座上客，阮派他去拉拢名士，以培植自己的势力。彭曾为阮做说客，招抚武进薛案，这成了

他历史上的污点,以致后人隐晦其言行,不便直说。

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二十二抄录张岱文后有按语曰:“此则《彭天锡串戏》与《柳敬亭说书》,为同时绝技,而今人知有柳,不知有彭也。”后世的讳言,使彭天锡的生平都弄不清楚,他是顺治二年(1645)九月十七日死于杭州,应是清兵攻占杭州之际,死于乱兵之中。

彭天锡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的豪放广交,他的声情并茂,他的一肚史书,他的一肚山川,都体现了他别样的人生。可惜晚年与阮为伍,辱没了声名,但这不应抹杀他在戏曲史上的艺术成就。戏如人生,人生如戏。通过不多的史料我们可以为他小结:江苏溧阳人氏(非金坛籍),彭家世袭之子,太学苦读之生,文章乐府高手,恢谐调笑能人,啸歌吴越之辈,豪逸不羁之风,声情并茂之艺,出神入化之技,明末戏曲名家!

彭旦兮的“抗”和“仕”

彭旦兮的一生，亦如其父彭天锡一样，颇为曲折复杂。

改朝换代的波涛汹涌而至，明末的学子文士们像一叶扁舟，忽而推上浪尖，忽而跌入谷底，命运在风浪中变幻莫测。到底是兴亡抗争，还是薙发归顺？到底是隐而不仕，还是仕而苟活？对每个人都是考验。

彭旦兮号葵若，是取之《庄子》“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之句，由感而自号。户部浙江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诸定远为其作传曰：“幼岐嶷敏捷，弱冠采芹大江南北，知名之士无不与交称善。然意气自负，偶遇几微不平，言论，辞色间不为炒屈！盖其性然也。”

善交际广结友，意气风发个性自负，听不得不平言论，这活脱是天锡公的翻版也！

“壬午举于乡，文名益著，兼善汉隶八分，吴梅村、萧尺木常称之以为‘韩择木、蔡有邻不是过。’”彭旦兮的汉隶写得好，萧云从曾说“旦兮汉隶之学甲天下，将以易得数十幅为晚年摹式”。吴梅村(1609—1671)，字骏公，明崇祯四年榜眼，太仓著名诗人，他们能将彭旦公的隶书比之唐代书法大家韩愈、蔡有邻，可见十分看重。

“明季溧邑绅士文会犹未盛，葵若纠同人严条约，初立名声社四子，后广为濼渚十三子”。由此可见，“十三子文社”彭旦兮是发起人之一。

“生平最好聚书，凡经史子集，无不藏积其间。字有讹谬，必为之校正，分类收贮，编成卷目，坐拥百城”。真正是个饱学爱书之士也。

“申酉间沧桑变更，世居西郊大厦悉遭兵燹”。（《传》）“中罹逆仆潘茂变，积书万卷与华屋俱烬”。（《溧阳县志》）清兵南下，明社即亡，彭旦兮丧父焚居，突遭变故，痛不欲生。而其时溧阳有“削鼻党”之乱，为首者正是彭氏僮仆潘茂、潘珍。

溧阳马垫乡戈旗里周廷英，字光升，号一明道人，在其《濂江纪事本末》一书中写道：“溧邑之祸，起于潘茂，而茂之恶，养于彭氏。”“彭氏能制茂，茂不敢为乱”。这里的彭氏，应为彭旦兮其父彭天锡，养虎为患，助纣为虐，潘氏乘明末群龙无首，占城掠池，侵扰乡里。

《濂江纪事本末》多处写到彭旭图兴复、攻潘党之事。“举人彭旭，会生员周在公，募兵图兴复。旭，字旦兮，豪迈慷慨，每负笈走四方，凡知名士，旭未尝不与之交。为文简质古肃，必宗秦汉，壬午荐于乡。旭尝与其友宋其武论时事，宋涕泗横集，旭为之击辑，誓清中原。甲申五月，读哀诏，哭毕，时陈名夏方北归，亦与焉，旭正色叱之，名夏唯唯而已”。宋其武即宋之绳，其历尽千难万险方回老家，彭旭和他议论国变，发誓反清复明。而陈名夏因降李自成，其时也在老家避难，尚未北归，彭旭对其变节之事“叱之”，陈亦唯诺。

“至是，闻南中陷，旭倡起义，在公从焉。募兵于南山之妙如寺，各捐资为饷，而溧邑于是浸浸义起矣！”南明弘光朝不堪一击，清军渡江，彭旭举帜起义，招募兵士于南山，号召捐资为饷，周廷英言：“大丈夫之鼓动拔起，其致志固远矣……旭以孝廉，无权势之可借，义风振发，思欲戮力神州。在公布衣耳，破家殒士，与旭为倡和。两人功虽弗彰，志则与古人比烈矣。”“有旦兮，而诸绅士益将汗流浹背哉！事虽不终，君子又乌可以成败律也？”对彭旭的募兵起义予以高度评价。

“六月甲寅，戈旗义民周重，聚兵图兴复”。生员陈礪、张普“两人倡义于渡济桥之伍公祠，俱率众来会焉。其他如浪洋等处，亦嘒嘒乎闻风举事矣”！由此可见，彭旭大旗一举，溧阳反清之火燃炽，百姓纷纷响应。

“庚午，举人彭旭会义兵周重、周在公、史泽、史太乙、陈礪及浪洋人，共谋诛潘茂，逐围其城。旭因家奴横行，又因浪洋战败，愤甚。即驰报重等起兵，刻日抵城下，先谋诛茂，兴复梓里”。“茂赂清人攻旭、重，旭、重兵不能支，溃去”。彭旭起义，攻城围城；潘党守城，略清掠地，这在《濂江纪事本末》中记叙较详，只是后来一直没有彭旭的记录。

“丙午，清较科举。明生员史忠琇、费达、杨垂青等五百余人应试，遂髡其发”，“时高尚不屈者，有蒋种芳、周斯、周廷英、芮城、马世杰、马世俊、周其韬等数十人”。这场科举考试应为清朝首次，时间为1645年10月。其中的史忠琇、费达均为溧阳“十三子文社”社员，芮城、马世俊、马世杰亦是，而这里又没提彭旦

兮，他去了哪里？

清顺治二年，陈名夏降清，先任吏部左侍郎，不久成为吏部尚书，乃汉人的第一个尚书。溧邑强汝询在写“芮城传”时，提到彭旦兮当时曾率同学责骂名夏，可见其血气方刚。后来，陈名夏南下，芮城乘轿去见他，要求解救释放彭旭，并提出先见一面，名夏一一照办。其时，清政府可能因彭旭反清复明的义举而逮捕了他，关押在狱。陈名夏还是念旧情的，从中斡旋，保住了旦兮性命。

彭旦兮待母亲很孝顺。“事母史孺人尤孝，问寝视膳，朝夕有常，色笑依依，壮年犹孺慕。时例孝廉多作令，且有进秩刺史者，葵若独曰：吾母已老，吾不敢远宦！惟广文地近可为，于是秉铎云阳者两年”。

关于彭旦兮的出仕，老母在不远行，可能是一个借口，蒋星煜先生查阅遗民方文《涂山续集》卷二，有《为彭旦兮母夫人寿》：

濂上彭君别十年，暑中访我青溪边；
形容较衰兴亦减，独有故旧情依然。
问君何之指江县，俯就一官羞满面；
自言有母七旬余，家贫无以供珍饌。
且喜朱方是比邻，遍舟迎养不艰辛；
三牲三鼎寻常事，争似湖山鱼笋春。

这里已道明，彭旦兮的“俯就一官”是因为家有七十多岁的老母要供养。经过“兴复起义”和“潘党之乱”，彭家已是家贫如洗了。他虽然满面害羞，但“节气”填不饱肚皮，他也只能到邻县屈就小官了。

方文《涂山续集》卷四，还有《送彭旦兮之任丹阳》：

仕宦今无一可为，商量只有广文宜；
身闲不废尚书业，禄薄长称秀彦师。
况近家园将寿母，每参江郡得新诗；
故人舟辑频来往，方物从君取料丝。

彭旦兮的出仕,可能是和方文商量过的,虽然是“尚书”之才,但为了养母只能挣取点“薄禄”了!蒋星煜先生认为彭旦兮出山是“万不得已,为了生活,为了供养老母亲,那么勉强可以俯就学官,主要是教书,和政治的关系还比较远”。

方文入清后以贩药为生,认为出仕“无一可为”,是气节自守的义士,但对彭旦兮的举动,还是能理解的。

“庚戌,闻太孺人变,即日奔归,附身附棺,极尽其诚,勿之有悔!枕块读礼,延执友芮城同作《礼记通识》。服阙补寿州学正,患脾疾卒于官”。孝道已尽,仕途也短,彭旦兮这位名士,生命也在矛盾纠结中谢了幕。

《彭氏族谱》中“彭葵若传”,有《伯庵佚闻纪》评价其人生:“葵若赋性高岸溪深,不肯下人,尚意气,广交游,四方之客至者如归,以是多为延誉。良田名墅,足畅厥怀,虽故第灰于火,而夏林堂榭新构恢於旧。待族人持正不阿,有争难力为排解,扶危济倾常若不及。此传所未载,附识之。”关于彭宅和夏林园,应为潘党焚烧,后彭旭能“堂榭新构恢於旧”,那可不是件易事!夏林园后归潘氏,又归马家。狄曼农(学耕)在画跋中言:“园地在吾溧邑南门外偏东三里许,予幼时已荒烟蔓草,兵燹后更不堪复问矣。”此跋写于光绪元年,可见清末“江左之冠”的夏林园已是“灰飞烟灭”了,很可能毁于洪杨之乱。

彭旦兮作为明复社成员,作为明代举人,作为兴复义士,作为地方名士,最后迫于生计,为清廷服务,内心的挣扎痛苦可想而知。正如后来于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中了状元的马世俊,不肯骑马戴花“游街”一样,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总是蒙着一层“隔世”的阴影。

马世俊曾有《临清和彭旦兮韵》一诗:

春归已在客归前,万里河流万里烟。
古镇鸣锣千舫集,短亭落照片帆悬。
笛声暗度江南曲,柳色新裁灞岸篇。
却笑征衣尘未洗,闲心不及鹭鸥眼。

春去春回,客归客留,万里长河,万里孤烟。江南旧笛,灞岸新柳,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命运之舟,在时代的大潮中,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彭旦兮和夏林园

溧阳城东南角有一村落,叫“花园头”。

明明是一村,却有一个“花园”的名,为何?恐怕许多人说不出根由来。村上人多姓彭,又是何为?

清江西同知狄学耕在画跋上曾记:“按彭旦兮,名旭,明末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家有夏林园,园中古木为江左名园之冠。主人亦好事,喜招致名流,丰采照耀,一时无不知夏林园古木者。园地在吾溧邑南门外偏东三里许,予幼时已荒烟蔓草,兵燹后更不堪复问矣。”由此可见,花园头原为“江左之冠”夏林园所在地,乃彭家花园也,彭旦兮在时名流聚集,声名遐迩。

马世俊曾将“夏林古藤”排“溧阳二十胜”之第七:“夏林去邑南五里,溧多名园,夏林为最。太仓二王记此园系江南第一。古藤绕树,如龙蛇起伏,不可端倪。”

太仓二王,有画家王时敏、王原祁祖孙,有王鉴、王翬称“四王”,也有“王汉舒、王时翔”诗词“二王”。不管哪“二王”,都是清初名人,能称彭氏夏林园为“江南第一”,那绝对不是奉承之词!

嘉庆《溧阳县志》“园林”一栏,头一条就是“夏林园”:“夏林园城东南五里许,大可百亩,前明彭氏世有之。溪桥崖阁,点缀清华,尤以乔松寿藤、取径幽折擅胜。王奉常世懋尝记之,佥宪王遂东直推为“江左第一园”,后属潘氏,日渐荒颓。今为马氏所有,惟宜山一堂岿然独存,余不可问矣。”

王世懋的《夏林园记》写得十分详细,描绘精微。时值仲秋,王想去宜兴善权、张公二洞,有人推荐顺路的夏林园。“石门一状如关,又如梁,制甚朴野。过此柏屏萝经,又十余武折,而得大除山堂峙焉。堂甚宏丽,前凿方池,周以石栏,芙蕖披纷。其山之一,余以为即奇弗能当、弗能视也!”“水际大松十余株,

秀色参天，老藤缠之，臃肿支离，与树无别。蟠若潜虬，怒若攫龙，挂若饮猿，盖园最胜处也。”“前瞻则远山隐约，后盼则松竹拱抱，亡论园中所有，即此亦足令人乐而忘返。”“主人自其祖进士谦儿时已有兹园，园可百许亩，且七十余年祖及孙世增修之，则园之松又余年胜，即贵介王孙倾巨万货为之不能聚致宜，余之啧啧于兹园也。然园之名不闻天下，则以在僻壤，而彭氏子孙亦以僻能久有此园也夫！”

江南第一园林，经几代人的修葺增补，才得佳绝，而正因它偏僻无名，才得以保存。

汤宾尹在园图上题跋：“夏林竹树蓊葱，掩天辟日，即绕树之藤，争雄乔木，非数百年物不能。”“果能寄心区外，游思尘表，久暂主客俱可相忘，亦足消人间较量竞忌之俗心矣。”

一处园林，能让人忘却尘世，抛弃纷争，洗涤俗心，这该有多大魅力！马世俊有多首诗写到“夏林”，可见他是常客。

《同杜蜕斯分体咏夏林古藤》

偶来同问圃，遂得展良晤。
名花盛颜色，奇探不暇顾。
苍藤高百尺，绿崖搅老树。
跻攀有余兴，歇桥倩竹渡。
虬蟠忽下垂，夭矫翻空翥。
日月似乍暝，风雨还深护。
行来势欲翘，坐久倏生悟。
古者定穷搜，萝薜欣所遇。
凿径疏溪流，渐见林塘路。
岁月知几何，枝撑尚如故。
独喜凌霄姿，相看慰幽素。

诗人由古藤凌霄，倏悟到人生的际遇，不爱观名花，偏好赏苍藤，欲飞的翅膀好像古今的梦想，虬劲的姿态仿佛岁月之沧桑。

马世俊《夏林》

一、书屋

绮窗屈曲绿阴交，积翠盈畴远岫包。
燕雀高飞如共贺，鹤鹑暗愧未成巢。
花间石影频窥榻，竹里泉声欲近庖。
第宅更新余不羨，羨君卜筑在衡茅。

二、复道

平桥流水欵篱门，仄径中分似两园。
乱叶侵苔埋屐迹，高林落翠染衣痕。
欲窥草阁疑无径，将到桃源忽有村。
客主送迎同一静，啼来百鸟不闻喧。

三、假山

欲往名山愧未径，天然梁榭自成形。
阴森径转斜穿洞，窈窕峰迴已坐亭。
笑问松杉忘历日，冷看苻带锁寒汀。
漫敲金石呼孙绰，何事攀梯扞翠屏。

四、三岛

灌莽沉沉一径开，澄潭怪石共萦迴。
只疑二士山中去，不信三神海上来。
藤叶暗遮归鸟路，藕花争上钓鱼台。
欲传此地潇湘景，谁是当年云梦才？

书斋是诗人所羨，复道是游人所迷，假山是祖孙所乐，三岛是人间仙境。诗人对夏林园的钟爱不可谓不深。

马世俊《夏林步韵》

疏竹高梧水港斜，何妨卜宅即浮槎。
重来燕子惊新箔，误入渔人问落花。
奕向东山谁赌墅，尊逢北海欲忘家。
不贪世外三珠树，且种园中五色瓜，

夏林园既是神仙第宅，又是人间仙境。舟入水港，误进桃源，忘记家在何处。

陈名夏《宜山堂闻歌》

赤日不知暑，千章夏木清。
宜山堂上客，莫作艳歌行。

宜山堂是夏林园的主体建筑，也是宴请宾客的场所。陈名夏此处提及的艳歌，不知是否戏曲？昆曲？戈阳腔？戏曲在当年可是“小曲”，难登大雅之堂，而彭氏天锡，是明末戏曲高人，陈可能暗指此事。

任端书《夏林古藤》

藤身无岁年，屈若苍龙蟠。
青天落风雨，白日吹阴寒。
我欲此陶暑，挂衣层林端。

夏林树木阴森，是避暑的好地方。连任进士这样的文人，也想光着膀子，在此陶醉度夏。

文人吟咏夏林园的诗文颇多，像张纳陛的“暝色横江树，松声入夜闻”；彭充秀的“柳静莺啼稳，溪回燕去斜”；陈珏的“最忆宜山堂上宿，五更欹枕听松涛”；都是佳句，都是赞叹！

据狄学耕记，夏林园到清光绪年间已荒废，而嘉庆志记该园曾为潘氏所得，后归马家。彭潘两姓，明末有纠葛，当专门阐述。

夏林园，一代江南名园，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高松古藤、曲径水巷、菱荷

苕草、假山石梁……只存在于文人的诗文中。农田村舍、工厂车间、水泥民居、柏油马路……“花园头”的百亩方圆，找不到名园的一点踪影。沧海桑田，桑田沧海。

有人，在不断地打造人间仙境。有人，在不断地毁灭理想梦境。循环往复，所以，有的人称“神”，有的人叫“魔”！

惜哉！夏林园！

彭旦兮和马世俊

明末，社会动荡不安。甲申之变，清兵入关，马阮主政，一次次风云变幻令人惶惶不安，无所适从。遭遇变故，痛不欲生，陈名夏如此，宋之绳如此，彭旦兮亦如此。

彭旦兮，名旭。乾隆《溧阳县志》“文学”条记叙：“彭旭，字旦兮，少有奇志，家素封。能孜孜於学古，奉母史孺人训，读书攻苦，期为大儒。弱冠补诸生，为文有大家尺度。崇祯壬午举于乡，负重名，为人伦师表。中遭悍仆之变，积书万卷与华屋俱烬。游浙东，归理故业，仍教授丹阳。将母色养，志不少挫，母丧服阕，补寿州学正，勉强一行。孤舟江上，长苜斋中，儒官良苦，无何，病脾卒。生平与芮城为理学友，吴颖、马世俊为诗文友。家变后购求遗书，虽残编断简，皆索而补之，令复完好，其善交嗜古有如此。”

彭旦兮家境优裕，崇祯十五年考中举人，按理是前程似锦，名重一时，但却因“悍仆之变”而倾家荡产。关于“潘党之变”，将另文详述，这里想谈谈彭马之谊。

彭旦兮和马世俊是诗文之友。

彭马两人都是溧阳“十三子文社”成员，作诗论文，相互唱酬；读书科考，相互鼓励，情同手足。

马世俊《送吴见末、费古心、彭旦兮同学北上》：

灯花昨夜对书檠，晓岸看君独远行。
角缆黄云牵日色，挂帆白浪走雷声。
关津画鹢随鸿渡，村店寒鸡带马鸣。
珍重故人离别意，遥天万里共阴晴。

诗中三人，均为社友，北上何事？可能是科考。送别之意，珍重之情，虽然你

们要去万里之外，但天情即心情，同阴共晴，同喜共悲。

马世俊《送友南归，兼怀吴兰雪、史晓瞻、费古心、彭旦兮、唐公闲、赵理之诸友》：

出户飞尘拂帽簷，君归不畏朔风严。
半肩幙被随书笈，一路斜阳映酒帘。
过眼秣华霜叶脆，惊心箭镞雪花尖。
故园亲友如相忆，为报衰年白发添。

一首北上，一首南归，同为怀社友之作。荣华富贵，过眼云烟。官场即战场，惊心动魄。故乡的文友如果问起，就说我年衰徒添白发，老了。

彭马之诗唱，彭诗鲜见，马世俊有《和彭旦兮原韵四律》四首：

一

长安日色锁烟霏，野曝何时得献君。
应诏董晁能对策，封侯绛灌不论文。
楚江月伴吹箫冷，燕市风和击筑闻。
怅望□□非夙昔，南山归梦近雷殷。

二

皂囊奏事漫辛勤，数载江南无稻蕘。
故老千家谈战伐，荒田一寸未耕耘。
铜盘恩断高天露，铁骑尘迷古塞云。
闻道朱门尽纨袴，肉貂藉地醉红裙。

三

大宛天马色纷纭，极目难空冀北群。
泽畔九章俱欲涕，国门一字竟何云？
尘生白发儒冠贱，浪起黄河驿路分。
投笔从戎非所志，出关空自慕终军。

四

路旁烽火尚贵贵，莫问抑揄笑语纷。
旧日品题羞再别，近来诗章已三焚。
小狐欲济忧濡尾，瘦马无人肯相筋。
目断公门桃李树，不知春色向谁芬？

和诗应写在崇祯末年或清初，战争的烽火，使百姓涂炭，民不聊生。江南无稻，荒田无耕，朱门纨袴照样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的不公，文儒的贫贱，使作者想投笔从戎，焚书操戈！从马世俊的诗中，我们可能体会到一介书生的凄凉悲哀。“秀才遇到兵，有理讲勿清”，“宁做太平狗，不作乱世入”，这些文人的辛酸郁闷，也许只有在和彭旦兮的诗唱中发泄一下！

彭旦兮和马世俊有联姻之好。

马世俊写有“启”，《丁亥春二月，儿子宥完室，寄彭旦兮亲翁启》：“恭惟门下簪纓奕胄，膏火十年，申以盟誓。忆癸酉之三冬，重以婚姻；记戊寅之五月，既以朋友而联亲娅。”“遂卜三春之吉，占百世之缘，欲洽鸾音，敬通雁使”。“此时合两姓亲知之好，顾鸞鹄而同巢”。

由盟友而成亲翁，马世俊甚是欣慰。“余与旦兮同研席之欢，毕婚嫁之事，其欢爱之情，骨肉无以过”！（《寿彭太亲母史孺人七十序》）“以旦兮之才华声誉，即取人间之富贵以娱其母，方如拾芥之易”！“旦兮母犹余母也！余以一第官京师，母闻之必喜！余有子为母孙婿，今能代余觞母，见之又辄喜”！从这些诉说中，可以感到彭马两君情同手足，亲上加亲。

马世俊对彭旦兮评价颇高：“盟兄飘然高尚，守此素心，夙无宦情”。清初，彭旦兮和芮城诸人不顺满清，不肯易服，彭旭曾经组织过抗清活动。因为在关于芮城的记载中，有他坐轿主动去拜访陈名夏，请其释放彭旭之记录。而马世俊迟得功名，高中状元后不肯骑马游行，徒步回寓。这些举动，可能都是“反清复明”的影子使然。

马世俊《寓越寄彭旦兮亲翁》

到处哀笳不可闻，积年泣别为斯文。
我来鹜岭吟秋扇，君向兰溪携片云。
吴越山川千古丽，蠡员忠孝一江分。
相思未忍言儿女，烽火连天炤夕曛。

烽火连天，哀笳遍地，身在外乡，鸿雁传书。两人同在越地，都不忍心问儿女的消息。此诗应为明末作，彭马两家虽未联姻，但已定亲，所以称“亲翁”。

马世俊《送彭旦兮亲翁还南》

黄河天际泛轻舸，复向洮湖慰寤歌。
聚散几年还侣昨，行藏此去定如何？
人将白发亲松菊，家近青山爱薜萝。
莫指江帆重回首，秋来满眼雁鸿多。

《戏作水车图为彭旦兮亲翁》

少壮追随若弟兄，老来犹忆旧山盟。
车轮不逐红尘转，日向虚亭过水声。

少年兄弟，结盟乡里，转眼已是白发。聚散仿佛昨日，江帆又将挂起，家乡的洮湖渔歌、青山松菊，在等待游子的归来。人生如车轮，时间像流水，滚滚红尘，隔不断鸿雁声声，隔不绝兄弟情深。

彭旦兮有书画之友萧云从，亦为复社盟友，和马世俊亦是好友，书画过往，是为佳话。

萧云从(1596—1673)，字尺木，号于湖老人，安徽芜湖人。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姑熟画派创始人。1638年和弟云倩加入复社，与东林党相呼应，同魏党、马阮做斗争。明亡不仕，游历山川，赋诗作画，诗书画三者合一，被誉为“神品”。萧云从的代表作有《太平山水图》，对后世及日本画坛影响颇大。

清顺治十一年(1654)，萧云从自元旦开始，花了二十七天时间，画了一幅山水长卷赠给彭旦兮，被后人称为“神卷”。萧云从在画上题跋道：“旦兮道盟别四

年，今春蒙其过访，快惬晤怀，而索余画山之兴不减于昔。然余亦老惫，百务俱捐，而此事断不能已！自元旦风雪，键户融冰，便搦管续墨，随意成卷丈余。以黄公望瘦树山石为之纵横，润之以马远泼墨之法。矜慎自娱，乃尘之旦兮。鉴中谓旦兮汉隶之学甲天下，将以易得数十幅，为晚年摹式。解鱼目贷明珠，所获虽多，余亦太狡猾矣！甲午正月廿七日区湖弟萧云从识。”

这段跋很有趣。萧彭一别四年，旦兮过芜湖相聚甚欢，彭“索余画山水之兴不减于昔”，证明早就有过书画往来。萧虽年老事多，但对彭的请求必须答应，于是在元旦的风雪之日就融冰研墨，闭门作画，随兴画了丈余长卷。萧谦言：“我这是自娱自乐，请旦兮鉴赏后束之高阁。旦兮的汉隶天下第一，他答应送我数十幅，供我晚年临摹。以鱼目换明珠，你说我有多狡猾？”

马世俊后在此卷上题长诗《庚子春二月既望为旦兮盟兄题》：

曳来一卷秋山色，松风谡谡飞黄叶。
逶迤渐见有人家，门掩寒屏千万垒。
石路萧森杳然去，板桥正在烟深处。
何人策杖偶相从，茅舍恰邀流水住。
青天百尺开芙蓉，苍岚紫霭霏濛濛。
岩头灵乳落岩半，轰雷喷雪当晴空。
巖壑层峦藏古寺，丹梯绀宇排幽翠。
林影能吹过客寒，钟声不唤山僧睡。
崦嵫中断两崖开，清溪碧涧自潏洑。
欸乃忽闻深谷响，漾舟疑是武夷来。
路转前峰如欲失，归帆数片衔斜日。
枉麓迴汀一径通，萦滩踏渚千村出。
远势苍然望更悠，分明陆地接瀛洲。
三岛苍茫何处是，九疑瓊礎不胜愁。
夏林主人摊书读，万丈参天绕云屋。
谁倾墨渾起烟波，芜湖野老萧尺木。
布袜青鞋三十年，兴来时写旧林泉。
伤心凝碧王摩诘，况是江南风雨天。

我今闲拭乌皮几，咫尺庭须穷万里。
题诗主客共掀髯，眼中之人皆老矣！

马世俊的题诗，言萧尺木为“芜湖野老”，三十年布袜青鞋，暗指萧隐居不仕，以书画自娱。他还有一首《寄区湖萧尺木》：

险语高文久寂寥，鬼才轧茁悔镂雕。
春秋终始非三传，词赋兴衰岂六朝。
丝入苍黄难可变，字成玄白总堪嘲。
江南笔战如风雨，名士无过读楚骚。

此诗为萧尺木的屈才抱不平，也为明末社坛笔战风雨感慨，书生名士，高文鬼才，掩门读《离骚》，本性难改啊。

关于萧云从为彭旦兮画山水长卷一事，尚有余兴。此“神品”后为溧阳胥溪狄氏所得，江西知县狄学耕曾作题跋：“此卷系先伯父进斋公收藏旧物”。“子渔二兄以余有画癖，出此卷畀予以云：萧真迹世不多见，重以先泽留遗，爰同球璧。庚申大劫中竟随身携出，幸逸灰烬，岂非鬼神呵护？使名物存于世耶！”此跋题于同治庚午，至于怎么会有彭家流至狄家，不详。

狄学耕之子狄平子，有“民国第一文化人”之称，他创办“有正书局”，首次把珂罗版印刷术引进中国，并刊印了大量中国古代书画名作，其中就有萧云从的这幅长卷。马世俊有“舒卷云烟”大字，亦得以留存。功德无量。

彭旦兮和马世俊，盟兄亲翁，一生至交，同声同气，皆是乡梓骄傲！

溧阳“十三子文社”

明末天启年间，溧阳有“十三子文社”，入社之人多是地方文坛翘楚，他们文脉相通，文气相投，文章相交，文社相聚。十三子中大部分成为科举骄子，国家栋梁，社会贤达，乡间高士，一时传为佳话。

“十三子文社”的成立，并非偶然。晚明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但文社却格外活跃。其时文学社群的数量达到鼎盛，形成派别林立、思潮纷呈、百家争鸣的景象。文社大都推崇“尊经复古”的宗旨，表达激扬气节、崇尚德行的愿望，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联盟性，对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学影响颇大。

溧阳十三子文社人员为：史忠琇、吴颖、钱士伟、唐明猷、史燧、赵纶、马世杰、马世俊、费达、芮城、彭旭、彭新、史洽闻。

史忠琇，字冠卿，县志记他“为诸生，文誉鹊起，屡试冠军。顺治辛丑乡贡，授经五十一年以终，弟子遍大江南北。邑中马世俊、董粤固等皆其门生也。生平风节自励，前明天启时，魏珣生祠遍海内，邑有丞望风旨议及者，忠琇与同学生费良佐力斥之，事遂寝。”这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按“屡试冠军”而言，考个功名是没有问题的。他偏崇尚风节，过问政治，反对县里的拍马者建魏忠贤生祠，结果落得“授经五十一年以终”的下场。他的学生状元马世俊倒是为他争了口气！忠琇是个孝子，“年十六父病，衣不解带，目不交睫，侍汤药数月不少懈，里中以孝称”。（《乾隆县志》）

吴颖，字见末，“八岁通制义，兼工诗古文辞，方孟旋尝延之校选，登顺治九年进士第，授刑部主事，迁郎中，疏称‘刑狱至重，律无正条者，毋得刻深，以意傅法，其初辞具，毋得株引滋漫’，世祖嘉纳焉。恤刑福建，裁五阅月未，减罪犯千余人，擢知潮州府，多惠政。会以从师海上，猝中寒疾，谢病归。筑西畴草堂，日有吟咏，邑中碑版多出其手。知县王锡琯署其门曰：濼江文献”。吴颖是位法律专家，

他的奏疏使“株连九族”的酷律有所松懈。归隐后，著有《溧阳志》十二卷、《闻史》十二卷、《史轮》十六篇及《金陵往哲录》等，应该是研究地方文史的力作，惜散佚鲜见了。笔者曾在京城国子监孔庙的进士碑上，寻找溧阳籍先贤，见“江南溧阳吴颖”之名，亲切亲热。

史燧，字旭初，顺治六年进士，授广东驿传兵巡道。“时大兵往定两广，两广藩、臬由部郎推升，监司、郡守用新进士，州县官用贡生，并随军赴任，盖异数也。七年十二月，克定广州，各官进城受事，道员主军马，调发夫船，动以千万计，燧先事区处，供亿无误。以学道教职员缺，请用琼州府属官未赴任者，署府县教职，籍故明博士弟子亲试之，得程可则、方殿元等，士心大安。当是时，广东佐杂官不由部选，听两藩委用。巡检自署，或称守备，或称都司，交结营弁，侵夺县令，燧稍以法裁抑之。又奸民投营诬告人逋负财物，辄追给破产，名曰：土充。燧一切论如律，上之巡抚，众妘敛戟矣。”县志详述了史燧宦迹，广州筹粮，赣州督饷，京口守城，德州运兵……因缉寇、修城诸功，被清世祖召见。后因贬返乡，捐祖祠祭田二十三亩，并修辑宗谱及文献全集等。老年的他交友二三，粗茶淡饭，不喜应酬，朴实平淡，于六十二岁终。

赵纶，字理之，本县秀才。“生力学深，于文研穷理蕴，能发先儒所未发。几所著述，经经纬史，与史忠琬、马世俊、芮城诸人，为濂上斯文翘楚。其设教，先本行而后文艺，四方学者翕然宗之。甲申后隐居不出，卒年八十一。”赵纶所为，皆是晚明社人之风范，讲力行，重气节，究学问。

马世杰，字万长，与弟世俊同以文学著名江左，时称“二马”，“方之机云溉洽云”，比作陆机、陆云和到溉、到洽两兄弟。“世杰，顺治八年岁贡，以耳疾恬於于禄仕。教授南山中，键户著书，为士林宗仰。时亦赋诗饮酒，徜徉林下以卒，著有《欲斋集》。”天不吝才，世杰偏偏耳聋，不然溧阳或多一状元也。

马世俊，字章民，“八岁能诗文，及为诸生，屡试第一，海内知名，七应乡试中式，顺治丁酉举人，辛丑进士。廷试称：王者天下为家，不宜示同异，必尽捐满汉之名，俾精白一心，以成至治。见宰辅长揖不拜，而庐唱第一。无舆马仆从，徒步归寓，都人传为佳话”。马世俊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七试举人不得，好不容易中了进士，廷对时又批评皇帝老爷！见宰相不跪，考中状元徒步回舍，一切都是个性十足，不同凡响！马世俊应是十三子的骄傲，也是溧阳人的骄傲！因为他是邑

中唯一的状元郎！

费达，字于章，“少承父良佐家学，与兄逵互相师友，文章气节卓然冠诸生。登顺治九年进士第，授户部主事。榷税九江时，师旅络绎市舶，或壅不行，前后任皆因此坐困。达至，简科条、剔奸弊，调剂官商，公私称便，改榷浒墅亦如之。擢郎中，假归葬亲，哀毁庐墓。年甫及艾，不复出山，手携一编，至老靡倦，邑中有大举，每极力维挽，众咸倚赖。生平济困扶危，未尝有德色，雅量能恕人过，处横逆怡如也。卒年七十三”。著有《砚读堂诗文集》。

芮城，字岩尹，又字长恤，“读书过目不忘，日诵二百余页”。“志在立行，崇祯末以诸生肄业南雍，尝游神乐观，考证图籍、祭器、乐舞，慨然有所建白。而明社为墟，东西立国，乃独叩学使者，致诸生以归，是年三十矣。或问其故，长恤叹曰：一成一旅，正庙堂薪瞻之时，而上则选伎征歌，下复黜货树党，四镇不和，疆场多垒，功名乎哉？忧方大耳！由是学耕山中，足迹不入城市。后名夏贵显，还求一见不得。惟与汤泰亨往来，质疑考异天人性命之旨，各阐宗儒扁奥间，为诗歌以自娱，出入风雅。会海寇入犯江宁，厚币聘长恤，峻却之，不污伪命，人服其高节，隐居数十年而终。著有《匏瓜集》等。”芮长恤是位典型的明末文人，头不顶“清”天，脚不入城市，一生不易服，不易主，高风亮节，受人尊敬。

彭旭，字旦兮，“幼奉母史训，读书攻苦，期为名儒，弱冠补诸生，为文有大家尺度。崇祯壬午举於乡。旭声望夙重，为人伦所仰”。曾补寿州学正，生平与芮城为理学友，吴颖、马世杰为诗文友。

史洽闻，字远生，忠琇子。少负异才，为督学金兰识赏，弱冠为人师，修脯所入，悉以奉亲，于嗜好泊如也。早卒。

钱士伟，字伟仲；唐明猷，字王叙，曾与宋之绳交往结社，都是邑中学子。

彭新，字于民，御史彭遵琦之子，崇祯十五年举人，临清知州。

历数十三士子，金榜题名者，独占鳌头者，宦迹显赫者，隐而不仕者，命运之不同，造成结局之各异。明社将亡，时局动荡，社会之急剧更替把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乱世之丧痛迷惘，并没有改变他们求学探理的初衷，没有改变他们报国安民的追求。

溧阳的“十三子之社”，应该在晚明的社群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地方而言，文人结社，英才杰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高士芮长恤

溧阳状元马世俊曾有《望瓦屋山怀芮岩尹》一诗：

北湖亭望处，此日尚浮云。
瓦屋成高筑，平岚净远氛。
阴晴峰变化，俯仰气氤氲。
为忆东山卧，苍苍不可闻。

诗人站在北湖亭上，眺望高耸于浮云之上的瓦屋山，岚气滤净尘氛，峰峦阴晴变幻，云波诡谲动荡。为了不像东晋隐士谢安出仕一样被世人耻笑，友人甘愿一生默默无闻。

诗，看似写景，其实内涵深沉。那么诗人思念的芮岩尹是谁？他有何德行值得马状元感怀？

芮城，字岩尹，乃农家子弟。他天资聪颖，幼时随父路过村上私塾，听到学童读书声，才一遍就能复诵如流，其父惊讶，赶紧送他就学。果不其然，芮城补县弟子生员，后又以诸生肄业于南京国子监。

明代末期，社会动荡不安，流寇四起，兵燹逼近。江南半壁江山却是貌似晏清，笙歌箫管依然。一群名士文人盛修坛坫，相互标榜，拉帮结派，风花雪月，苟且享乐。芮城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他仅参加了溧阳历史上有名的“濼上十三子会”，和当时地方上学子名士马世俊、马世杰、赵理之、吴颖、彭旭、史燧等人，“合社讲学，以忠孝大节相切劘”。

甲申之变，明社即亡。芮城痛心疾首，“偕诸子哭临县庭”。尔后又有消息传来，南京城为满人破，朝臣或逃或降，惶惶不可终日。芮城十分悲忿，恨自己一介

布衣，未获以身殉国。他愤然作《沧浪吟》赋数十篇，“且歌且泣，彷徨泽畔”，闻者莫不为他的气概气节所感动。

明亡，芮城弃诸生名分，更名长恤，字蒿子，“闭户绝交游，数十年不入城市，遂终于家”（溧阳强汝询语）。社稷更替，江山易主，作为一介书生，改变的是朝代，不变的是气节。芮城“隐居荒野，幅巾裹发，终身勿变”。真个是头不顶“清天”，服不易前朝，高风亮节，在当时“十三子”中，又有几人做到？

甲申之变，清兵入关，江河不废，泥沙俱下。洪承畴、钱牧斋这般名士宦官纷纷变节应时，真个“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值得一提的是邑人陈名夏，他和芮城的一段交往，颇具戏剧性，耐人寻味。

陈名夏于明崇祯年间科举榜眼及第，可谓人中之杰，官至明廷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福王时，他一度投降李自成，被定为逆贼。清顺治二年，陈名夏又降清，做了清廷的吏部左侍郎，不久升为吏部尚书，可谓因变生变，变中升迁。芮城对名夏的“亦污伪命，则益悲忿”，“而又惜同学的守节不坚，为桑梓玷也”！在降李之后，朝廷曾追捕从逆者，陈名夏逃回溧阳乡里，曾去拜访芮城。芮城躺在床上，面壁而卧，问：“君主亡了，你还不死，还有何脸见我？”名夏跪在地上哭诉：“我曾几次上吊寻死，不幸被救下，误了时节。”芮城厉声相斥：“为什么不再死殉难？你赶紧走吧！我都不忍心再数落你的罪状了！”

清初，许多明末的士子文人纷纷俯首称臣，以各类文赋吹捧歌颂新的统治者，竭尽巴结攀附之能事。而芮城毅然脱下国子监诸生服，归隐乡野，独行其志，这是他与诸子不同的地方。后来，陈名夏官至中枢尚书，他始终没忘家乡有个满腹经纶的同学，几次派专人来招聘芮城，许以功名利禄，但都被一一拒绝。

同是十三子同学的彭旭，也是位热血的学士，他在陈名夏变节时，曾率同学攻击责骂之，后来因抗清起义被地方官吏捕入大狱。这时，陈名夏正好奉皇命巡视江南，芮城听到消息便乘轿前往。到了行署，他不进去，叫侍卫通知陈名夏。陈听到芮城来访，喜出望外，立即拱手相迎，忙问何事可助？芮城坐在轿中，连布帘都不掀，隔帷而言：“想向你我要彭旭哇！”名夏立即答应从中斡旋释放彭旭。芮城又言：“还求你让我见他一面！”陈一一应诺兑现，芮始返回。斥陈约陈，一进一出，两人两事，波澜迭起，品德操行，窥见一斑。

在乡里，芮长恤“躬耕读书不废著述”，乡人有请见者，他要选择而见之，客人

谈及学问和农事，他应答，如讲其它杂事则闭口不言。有在外当了大官的亲戚旧友来访，他皆拒见。

芮长恤学问颇深，强汝询言：“先生颖悟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稍长，于学无所不窥。是时，姚江之学盛行，先生独以朱子为宗，笃信深造。虽不与世儒辩得失，然籀籥峻固，圭角分明。”曾经有一个商贾拿了一本“二十一史”，专挑里面的生僻之句来考芮长恤，谁知商人一说句子，他应声就答出自哪卷哪页，惊叹之时，商贾灰溜溜走了。一天，来了位怪异的僧人，说远道而来，久闻芮处士的大名，要来讨教学问。于是两人“博辩罕对，比推七十三甲子，溯历元”。僧人大为叹服，拜在芮长恤脚下，言：“我原是明崇祯朝的名进士，现隐退做了和尚。”在拜服了芮城后，悄然退去。可见芮城当时已名传大江南北。

溧阳名士彭光斗在记叙了芮长恤的传奇故事后，又记道：“城之学博而能醇，经史疑义考证尤精，具载《匏瓜录》。他著述尚广，多散佚。半为人更名。”强汝询也记道：“先生歿后，遗书稍稍传抄。余所见者《周易大象传解》、《大学讲义》、《中庸顺讲纲目分注拾遗》。道光中尝刊行，遭乱板毁，《匏瓜录》及文集皆未刊，又有《礼记通识》、《论语通识》、《四诗正言》、《春秋思问》，求之未见。”可见芮城当时著作颇丰，惜未刊印传世。

溧阳图书馆藏有一套清光绪十三年刊印的《匏瓜录》，乃馆存不多的古籍之一。我有幸得以翻阅，泛黄纸页，抚之心手皆颤。书有长恤自序，同里后学强汝询撰《芮岩尹先生传》，目录有《周易》（上下）、《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上下）、《大学中庸》、《孟子》、《纲目书法》、《杂记》，共计十卷。实乃国学经典，作者对儒学研习之深，令人钦佩。

芮长恤在《匏瓜录》自序中写道：“匏瓜录者，蒿子之所录也。蒿子生孤僻之地，秉中下之资，遭变易之世，浮沉侪俗者，近四十年矣。宗周既灭，幡然归来，摈绝名利，焚弃词章，稼圃之余，端居闭户。取四子、九经、通鉴纲目、周程张邵朱子及其他诸儒析理论事之书，次第读之，探求寻绎亦复有年。”一种乱世之时的归隐无奈，一种闲居苦读心得的由来，尽现笔端。“默然窥见古人之用心，以此忻喜自负，忘我穷愁，深恨归计之不早也。扶今追往，重惜居诸昼有为、宵有业、坐有见、行有思。戴笠而出，若有一书焉，随之皆出；荷锄而归，若有一书焉，与之俱归。既久而志愈笃，志愈笃则功愈专，功愈专则外慕益希，而物诱亦愈寡。春华落尽，

秋实孤呈，然后知五经四子之言，真如日月之照临。向之则明，背之则晦者。”书生读书之乐，书生读书之迷，书生读书之悟，娓娓道来，启人心智。

芮长恤在《匏瓜集》卷十“杂记”中，有一段论叙李白之言，让人振聋发聩：“太白仙才杰气，当世无匹，然一失足于永王璘，遂没身不振以死。有识之士咸笑之，以为太白才有余，而惜其节之不称也！”“吾观士君子立身用世，有正气，有客气。不淫不移，威武不屈，此正气也。草芥俦列，傲睨王公，陵轹贵势，此客气也。正气者，常伸者也；客气者，幸而伸、不幸而屈者也。”“太白生平，皆客气用事。”这里，芮长恤对李白的变节耿耿于怀，没有给谪仙一点面子。面对朝代更替，面对大事大非，面对变节品行，他是没有一点余地的。明言太白，暗指呢？

失命事小，失节事大，古代高士的风范，在芮长恤身上体现无遗。归隐乡野的苦寒寂寞，几乎湮没了这位学者的身影。《芮岩尹先生传》云：“先生销声匿迹，唯恐人知，其贞介殆过（亭林、杨园）二公。自吾乡人而外，鲜有能举其名氏者，没已二百年。”“呜呼，使先生不遭世变，出所学以诲斯人，其所被当何如哉！”

芮长恤十分钟爱家乡，钟爱族人。“长恤幼时，应童子试，或于留都，或于句曲，每遇他邑他郡之同族者，必询其出于何公？居于何地？分当何世？归而告之近族，相与识之。虽未即从事于谱，而志实有待。”他在芮氏永思堂族谱上序言：“先辈有言，五世不修谱，比于不孝！”敦促族人要手足相识，繁衍相认。

后人在县志中曾收芮长恤诗两首：

和宋稚宏

宋十二稚宏过访，归而以诗见寄，次韵答之。

寂寞犁锄三径荒，德星何日映虚堂？

蒹葭浥露怀人意，鹤鸪嘶风败国香。

前此褒弹良可废，方来出处不须商。

三升酒尽君言去，依旧菘芦对夕阳。

和木末和尚

有明鼎革之统薙鬓为僧，自号木末和尚。

征士囊空贯酒钱，远公拾隐虎溪边。

世中世外堪同调，只恨相逢未定天。

诗中的木末和尚为宋之统，明亡后削发为僧，遁入空门，隐于庐山虎溪边，因排行十二，故称宋十二。时代的动荡不安，天气的阴晴变化，使有志有识之士感叹不已。出家的出家，归隐的归隐，偶然相逢，只有赊酒对饮，痛诉衷肠。分手之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寒鸦嘶鸣，风败牡丹。回首人生，残阳如血，生不逢时的寂寞，一个人慢慢品尝。

举人彭光斗说：“余童年谒里中乡贤祠，见芮先生名哀然首列，心窃异之。而读其文，访其生平轶事，乃知先生固以处士终者也。夫先生之志节，骄骄若此，设早通显于世，成仁取义，当媲倪马诸公，并光国史，宁仅以处士俎豆一乡哉！然吾意陈公有知之，转悔不为处士也！”

吾颇会彭先生之意。长恤隐乡，保全志节，赢得了大家尊敬。名夏高升，当了宰相，最后丢了脑袋。世事难料，时运难测。人生的变幻，是孩童手中的万花筒。

读马状元诗，眺望瓦屋山，我分明看到那山道上，蹒行着芮高士荷锄而归的身影。

塾师汤筑夫

江南乡风，耕读传家。耕得食，读进仕，晴耕雨读，尊师重教，是沿袭千年的习俗。万般皆下，读书唯高，并不是吃饱了饭无所事事玩的风雅清高，而是无数贫寒学子摆脱现状出人头地的一种向往，一种途径。

自隋朝大业三年(607)开科取士，到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终止科举，一千三百多年间溧阳共产生 185 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共计六位，也算是文风蔚然，人才济济。

说起探花陈名夏，邑人无所不知。但若问起名夏之师是谁，恐怕无人知晓。透过功成名就、荣华富贵的名仕人墙，我们看到一群游走乡间、默默无闻的塾师。他们满腹经纶，饱读诗书，以私塾课徒，收取束修为生，甘守清贫，教书育人，甘为人梯，乐于奉献。

汤筑夫，乃塾师也。

汤筑夫原名霖美，后改名帝賚，别号野同，社渚镇高里村人。家谱记述他“少颖异，读书数行下。年十八补博士弟子，即能为古文诗歌”。按理说，这样一位“擢控贤掇，崖异杰出”的才俊，在科举道路上应是一帆风顺，不日金榜题名应如囊中探物，但事与愿违。

赴府试中，汤筑夫目睹考场营私舞弊、权钱交易之丑陋，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写了一份“陈情表”，“指斥当事受贿鬻名诸劣状”，结果被考官责为“中伤”，功名废黜。后来，他“七试南国竟不遇，时咸为之称屈焉”。正直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年少气盛的冲动，换来的竟是“名落孙山”，众人称屈喊冤又有何用呢？一纸陈情出恶气，一世不任何讲理？但汤筑夫并没有太在意，也没有就此风花雪月，游戏人间。他的品行，缘于其父，正所谓“家学渊源”，有其父必有其子也。

汤筑夫父名顺耕，讳春阳，字和甫，他“磊落魁伟，通达世故，而制行端方，发

言晓畅，有应变不滞之才”。他对下代教育甚为重视，“延名士于塾，课诸子若孙，诱进以仁义，而消融其荡闲轶检之思，故三四两君声满艺林，为士流翘楚”。顺耕公曾考取过功名，却弃官不任，“少尝补邑椽，达于掌故。县令王公重其才，于群椽中独加爱焉。两考隶天，官将给士省中，以亲老不赴，曰与其违膝下，去千里以求升斗，曷若承欢朝夕之为愈也？即弃去。归养晚年，徜徉里中，日对宾客，弹碁执犖，醉则击缶而歌，知命安时”。这样一位淡泊名利、安天乐命的父亲，对儿子应不无影响。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汤筑夫考场失意，“然名日益著，才日益高。越数岁，复补邑庠，教授生徒，尝数百千人，多至抡大魁、膺显爵者”。他“生平好引掖后进，一经品题辄成佳士”。“澄怀博物，多士羽仪，先达陈名夏、李青先生等皆受业门下，相继抡元。”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都倾注到培养学生之中，可谓是一代名师也。

陈名夏在《汤筑夫先生传》中写道：“筑夫先生年既老，将归隐新安天都峰之下，一时识知欲尽……夏师事先生十年，悉其生平著作数十万言，当在魏晋间。尤难其贫而好施。”“夫先生少不治生产，家所余悉以推诸兄，孑然治百家之言，为一时长者。每俭衣蔬食，急人之厄，义形于色，此深足难者。”族传也言筑夫先生“性至孝存顺，歿宁动不违礼。兄弟贫窘，辄分囊金遍给之，无毫发私。朋友与交久笃爱，人有饥寒困苦、易子弃妻者，必多方赈卹，完其室家而后已”。

汤筑夫先生在句容讲学，一天携“二十余金”回家乡。走到袁村，看到路边有一对年轻夫妇执手痛哭，一副生离死别、依依不舍的场景，一位老翁在边上责骂。先生忙上前问起缘由，那少年说：“因家里穷，欠了富人的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媳妇抵债还钱！心里实在难忍夫妻永别，所以两人痛哭。”先生又吃惊地问：“那老人是谁？”少年郎答：“是媳妇的父亲，因贪图钱财而逼女儿改嫁！”筑夫先生闻言，掏出身上带的银两，全部给了那少年。一起回家的朋友劝他说：“给他一半就行了！”先生答：“他因为欠债无奈而卖老婆，以后还要生活。如给的钱仅够还债，而不能安排生活，那还不如不给！”他坚持把钱悉数给了那少年，并嘱咐说：“你不要问我姓名，以后来（句容）城中，有困难我还会接济你的！”这时，在一旁的老者也羞愧难当，连声道谢！

陈名夏在记叙此事后感叹：“嗟乎！先生真仁人哉！先生少慷慨，凡存活者

不可胜纪。及老矣，贫且甚，犹能道路间活一夫一妇，愧一老，而忍者且始得其实，无市义心，终亦有济，无倦施心。先生真仁人哉！”

两句“真仁人哉！”表述一段故事，发出一段感叹。陈探花的感叹还不止如此：“李太白上裴长史书云：以三十万立散维扬。苏子瞻以五百缗下居阳羨，老嫗夜恸，置券不受金而去。夫世之人得失一金，牵毛发、割肺腑，胶胶动色，狺然争之，而有所不顾，何其愚也！太白、子瞻弃三十万、五百缗如屣，岂不诚毅然称大丈夫哉？虽然两先生者，得名于时甚蚤，虽风尚高洁无所取，然人争附之，以致此三十万、五百缗或易易耳！”他认为，作为一介书生，一个塾师，平时不会挣钱积蓄，仅以蔬菜布衣度日，做到仗义疏财，“卒尽与之、空橐而归”，乐施好善如此，“深足难者！”比太白、子瞻更显不易！

汤筑夫作为乡邑塾师，并没有因自己的学生腾达而享富贵，一生清贫，乐于助人，是值得钦佩的。他“奖进后辈，董率郡材，勉子弟以诗书，教族党以仁让。此尤其表，表足纪者，典型不再”。

为人师，为人表。以汤筑夫远去的背影里，我们可以读懂“师表”两字的分量。

陈名夏与《石云居文集》

陈名夏，字百史，出生在南渡镇强埠雀干村。

雀干村介于原强埠乡、上沛乡交界处，离芝山不远。芝山多洞天，有诗云：“岩洞三十六，鬼斧劳雕镂。”“芝山本神奇，暗然若隐士。”陈名夏留恋故乡，他在《石云居文集》中就将“芝山”作为籍贯称谓。

关于陈百史，乡间流传他不少故事。如说陈母贤慧，待人和气，一位浙江来的风水先生念恩，帮陈家在老虎山上择了宝地，于是就生了陈名夏。名夏家里很穷，父亲只好将他送到姑母家念书，书馆设在上沛蓀糠庵里，先生很是喜欢聪明的名夏。到了夜里，蚊子咬先生而不咬名夏，先生知道这个学生不是凡胎。每到天黑，姑姑总看到名夏肩上一边有一盏灯，就知道侄儿会有大出息。蓀糠庵的菩萨残破，陈名夏许愿，只要金榜题名，一定为菩萨重铸金身，后来，他果然中了探花，当了宰相，于是就奏请圣上拨了款子，为菩萨铸金身。谁知当时官府雁过拔毛，层层克扣，铸金菩萨的钱结果只够铸铁菩萨了。20世纪80年代末，当地农民从泥地里挖出一个铁菩萨头来，重十八斤三两，后被县文管会收藏。

传说，乃口头上的野史。作为乡邑为数不多的“宰相”，陈名夏乃乡人心中的骄傲。

县志记载，“陈名夏，字百史，少有大志，能文章，好交游，为诸生时已名重天下”。陈名夏在《石云居文集》卷二《自题石云居制义序》中写道：“予十岁即知为制举业，从里中所得所艳称‘南宫第一人’稿而好之，手自抄录，朝暮成诵数年。”他从邑人汤筑夫先生学习，有督学看到其文章，“大为称许，以为有宣城、会稽之风”。汤先生和昆山顾宗伯友善，于是带陈名夏去拜访，顾又将他推荐给礼部侍

郎西安方孟旋。方看了名夏文章，“大喜过望，谓予文韵胜于词，法胜于才”。陈名夏因此又拜在方的名下。方孟旋虽为礼部侍郎，公卿贵族对他尊敬有加，但对自己的学生却十分爱护，一日不放松教诲。他曾感叹得到陈名夏晚了！相见恨晚之情洋溢于师生之间。

方孟旋去世，陈名夏又回乡里。“予独好为高洁绝俗之文，知己甚少，孑立里中，形影自叹。”此时，金坛、太仓等地文人争相设社，相互标榜，陈名夏不屑与之为伍，但几次的科举考试却又以失败告终。有人张扬自己的文章，名夏讥笑此文都不及好友芮岩尹之一二，因此也就得罪了那帮社坛“主持”。

陈名夏游幕山东侍御褚君俾，教诸子学习。他授唐宋大家文章，每一篇千余言，大家都称赞他。出外数年归来，宗兄文友们纷纷为陈名夏的科考出谋划策，有的说这样好，有的言那样好，结果，甲戌年他又名落孙山。这时，有个叫童仲虞的乡人还修书羞辱他，陈名夏也不去争辩，不去反击，还是像从前一样的交往，后两人相见甚欢。因此友人言名夏“伉直，有古人之风”。

科举的屡试不第，使陈名夏“为孝廉久，连不得志于南宫，则思放游山川，以发其胸怀。溯九江，登黄楼，窥樊邓湘沅之遗风，烟波浩渺之势，作为文章行止转侧，若不经意。一题在案，叉手数武，立挥而就，予最苦于文乃流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名夏厚积薄发，只待一举成名矣。

清褚人获《坚瓠补集》曾记录，阎古古恃才傲物，从不夸人。崇祯壬午年（1642），他与陈名夏初识于苏州虎丘，遂惊其才华，预言必中科举榜首。果然，第二年名夏即以会元、探花及第。

关于这场考试，陈名夏也有一段描述：“癸未，项师于场中得予卷，定为予文。或曰：陈子以先辈体立言久矣！岂其然耶？项师曰：知陈子省矣。其后拆卷，得予名，一时大喜，呼声直彻门外。嗟夫！予何足当知遇，然项师以文章能信予如此，诚不可知也！”由此可见，陈名夏的科举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十年磨一剑，随着阅历的丰富，文章也形成风格，阅卷字观其文就识其人。“文章之道，师友之功，积数十年之勤苦，非漫然为之，可以求一言之合于道也！”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古代科举之悲欢喜乐，于名夏身上体现淋漓。

二

陈名夏文集《石云居集》县志上记有三十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的清顺治三年刻本为十五卷，而《四库全书》记为文十五卷，诗七卷。

名夏自序云：“予著古文辞凡十余卷，甲申之变，流落馆中无一存者。乙酉居长安，偶得序记若干篇，辄付梓。”该书成于顺治三年三月，陈名夏书于“五云堂”，有其阴刻名章和阳刻“大学士章”。文集十五卷，卷一至卷三为“序”，卷四为“记”，卷五为“传”，卷六为“铭”，卷七为“墓表”，卷八为“碑文”，卷九为“祭文”，卷十为“论”，卷十一为“议”，卷十二为“说”，卷十三为“疏”，卷十四为“跋”，卷十五为“书”。其文体之完备，文辞之绚华，文思之纵横，文脉之贯通，文识之渊博，文才之彰显，不愧为“江南才子探花郎”之风范！

除官场文士应酬之作外，陈名夏为乡邑写的几篇序记铭书，颇具文史价值。

《史氏诗序》是陈名夏为溧阳史家诗集所做的序。“玉阳之鲁孙史君鼎，以文学为邑令，贤而能文，尤长于诗，乃前刻知山公、玉阳公园君诗及都指挥使云津公诗，附君诗于后，予读而序之。欲天下读史氏诗者，知史氏二千余年名族，天下史氏水源末本，其道德文章，世以为训云。”

簪缨世家，盛宅如云，歌钟宵旦，宾客杂还，童仆众多，人世健羨，这是百史笔下的史家。“吾邑史氏在嘉隆间号为极盛”，“史氏之名甲天下，至于今不衰云。史氏始于汉封溧阳侯，自晋魏而下，代有显者四十余传”。他着重介绍了史玉阳的功绩：“太仆玉阳公际，实大其家，玉阳公既成进士，任吏部文选，特转翰林侍书清纪郎。”玉阳公“致少伯之金，累聚累散，好行其德。救荒则壤汗莱之滄，讲学则构嘉义之院。分产给族人，予粟食诸生。江以南名山，如句曲仙馆、玉女潭，上诸方外、释子、羽士，所不能为者，率归玉阳公。公抱材以老，实郁郁不得试！”“史侯封溧阳，至玉阳公益大，其子若孙，流传枝叶，咸祖侯史。”

《陶家祠记》是陈名夏为乡祠写的记文：“予邑陶氏，自汉世徐州牧陶恭祖谦，破西羌功封溧阳侯，子孙因家焉。恭祖墓即今大石山麓，石马或欹堕荆中，乡人不敢樵牧，望而敬之。”他在记叙了陶氏的迁徙沿传后，对姓氏宗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宗法不立则族属无纪，族属无纪则子孙散处如路人。祠之立，所以寄宗法于千百年之中，而使千百世之子孙咸知所本也！”“陶氏族属散处，未有恭祖特祀。

先是清祀于乡不果，乃于西门之左，宅屋数楹，老树数株，皆数百年间物，遂祠恭祖侯。”而祠堂既成，“溧阳之陶，实为陶始，可以感而兴矣！”

汤筑夫乃名夏之邑师，对老师，陈名夏在其“传”和“墓志铭”中详叙师生之情，读之令人动容。“筑夫先生，溧阳桂寿里人也，姓汤氏，初讳霖美，后更帝赉。邑人皆称为筑夫先生。先生少颖异，读书数行下，年十八补博士弟子，既能为古文诗歌，岿然崖异，不苟同于时俗。”当年，在府试中，有邑令作弊，“暗用关节，通于京兆”，“就试者，莫不哗然，指令劣状。”汤筑夫连考试作文也顾不上，立马草书一“陈情表”，又赋一诗：“浥风满毂吴牛健，踏月空尘冀马闲”，对其进行揭露。邑令迁怒于筑夫，以“诸生好谣歌”中伤他，罢黜其功名。而此时友人怕事，无人担当同慨，有的甚至意气横厉，不肯伸出援手，先生愤而改号“无朋”，以显其志。汤筑夫虽然失意仕途，但他的学问却为大家认可，“名日益著，学日益高，既满秩，亦旋悔当日失此高材生”。史知先生便请他在县学为诸子师，教授邑庠。数十年下来，他的学生有一百多人做了大官。汤筑夫文章“以王瞿为宗，尤恶时人工巧偶丽之习，凡为文斤斤尺度不问，而知为先生弟子也”。

汤筑夫“七试南国竟不遇，然皆知先生非不能于文者”。但他“尤好宠后进，苟有一言合乎道，必津津向人道之，惟恐不为人所知”。知无不言、诲人不倦的品行，值得尊敬。待家人，他尽孝尽义，有亲人去世和先人忌日，他“流涕满面如婴儿”。兄弟贫窘，他倾囊相助，朋友有难，他无私帮助。以致自己食宿都照应不到。“乡里有饥寒苦困、去妻易子泣告先生者，多方卹之，务完其室家恩爱而后已。”有一天，汤筑夫在去南郡道中，碰到一对少年夫妻痛哭流涕，一老翁在一旁叱责。他上前问其为何，那少年回答因家贫欠了富人债，要将老婆卖了还债，妇人不忍离弃而哭泣。他又问那老翁何人？少年回答是老丈人，因贪利而要女儿改嫁，说完又痛哭起来。汤先生二话没说，拿出全部盘缠给了少年。边上一友人劝阻：“给他一半好了。”先生说：“他因欠债而弃妇，是为活命。如果这点钱只够他还债而不够他活命，还不如不给他。”先生把身上的钱全部给了少年，嘱咐说：“你不要问我姓名，若来城中还会救济你的。”在一旁的老翁也羞愧难当。再三道谢！“嗟乎！先生真仁人哉！先生少慷慨，凡存活者不可胜纪。及老矣，贫且甚，犹能道路间活一夫一妇，愧一老！”陈名夏由衷地感叹。这件事，后被载入溧阳《光绪续志》中。

辛巳之岁，陈名夏要远游楚地，汤先生来他家送行，运河之上，泊舟扬帆待航。

先生说：“你早日归来，我岁荒年老，要早点回来还能见上一面。”两人黯然伤别。陈名夏返乡，先生已经去世了，“一时邑人士莫不流涕，芮子城独拜墓长号！”悲哉！

三

明崇祯朝癸未(1643)科，溧阳一榜出了两个鼎甲，即榜眼宋之绳和探花陈名夏。

宋陈两人同邑同科，后又联姻，亲如兄弟，情如手足。

陈名夏的《寄宋其武年兄书》，因两者关系甚密，非同一般，所以言谈直接，言辞恳切，言情真挚。可谓是一字一泣，一句一泪，应是后人研究陈百史生平经历和心路历程的重要史料。

“去岁南归，苦心绝少知者。日望年兄来里门为我解嘲，不谓人言如沸。生平相厚，善称父子，游皆掉臂不一顾。嗟乎！交情交态，古今不可复问者多矣！近从弟一身见之，是以仰天椎心，泣继以血。”书信一开头就写作者返乡的困境窘境，人言如沸的讥议，不屑一顾的鄙视，使心在滴血。“嗟乎！如弟者，尚何言哉！”有口难辩的苦痛，仰天长叹也。“窃伏自惟身名俱全，上也，次则名辱矣，或有察其心神者，下此则身名俱辱。”

在陈述甲申之变时，名夏写道：“仆前朝迁官，十日，与阁中争迁徙，不听。与江北争权宜，又不听。与司马商城守巷战，如木偶人，毫未见省。而仆之力殫矣。已而中官持我泣，迟我有所为，又不果，乃决去于贼势众盛之时，此年兄所知。”可见，李自成军攻城之际，陈名夏也想作为，但大势已去，他又做不了主。“九门兵刃相接，乘间跳身，寄命如发，伏行城野，夜以为昼。幸天假余息，归见老父一面。”大难不死，逃脱一命，幸归故里。但他的气未喘平，仇敌纷纷攻击他，官吏又前来侦捕他，老父亲死也不肯离故土，陈名夏抱着儿子想托孤，但小儿哭着要母亲，他只得走上逃亡之路。

“亡命江湖间”，无钱无友，邑捕蹑追，陈名夏如丧家犬，龙游、括苍山、太姥山，从越入闽而豫章，从武昌假道麻黄，仅在一亲戚家停留三日，又经固始折而颍州，上睢州渡河到大名府，“嗟乎！自七月至十一月，步行万里，涉虎豹之穴，凌蒙茸之经，百里无人，毒雾阴崖，跼跼欲堕。既入楚豫，狐兔横走，蓬蒿执戈者抢掠行客。仆越布单衣，面目黧里，幸而无猜。”万里逃亡，九死一生，此时的陈名夏，

只想乞得衣食，埋名北山。“仆至河北，网罗不及，即当委身，事之李贼”。孰料风云突变，清兵战太原、战关中、渡江南，数月间平定李军。名夏“入京甘为五云旧书生”，无奈“朝廷宠锡来归之义，突予以佐铨之任，隆恩莫与为此”。但他很矛盾，也怕孤立，更惧责难，“都城内外稍稍知仆表里，他日或不貽知己羞。但南辕北辙，往往而是，孑立无援，恃有方寸以报国家。因而众怨不小……仆偷生当世，便思尽职，诚足以发大君子之一笑！而仆前事既不为所谅，又不能枯槁效一行。受恩新朝，若更懦下，无束修之意，益无愧矣。仆是以区区明告年兄，冀兄遇父老子弟，宣明此意。他日蒙恩赐归里巷，尚可追随贤者。兴言及此，弟不能禁失声矣”。名夏在此一方面坦陈心迹，一方面为乡里的怨言而痛心疾首。时局多变，使他屡遭磨难；一降再降，使他身名俱辱。乱世求生之本能，使他的辩白虽显苍白，却也发自肺腑。

书信最后，他劝宋之绳：“濂上及江南，年兄科名最著，将终为孤臣耶，抑有志济世耶？抚按奉行催文，必督促赴京，新朝尤恨观望。年兄当先驱车来，毋使人得关口也。”这一点上，陈名夏看得很准，宋之绳后来还是做了新朝的官。

《石云居文集》中尚有陈名夏写给溧阳状元马章民（世俊）的信：“燕矶别有六载，而兄丈文章日系仆怀。读《茅山》诗，如共策仗于三峰之上矣。”“今得兄丈为后贤，不患有美弗传也。闻读礼为怆然，尊公先生盛德和风，邑中前辈之遗。古道日远，后人何所瞻仰？”由信看出，马世俊当时尚未高中，而两人书诗来往颇密。

四

陈名夏寄友人书信中，与旻昭为最多，有七封。

旻昭应为其同姓族兄同学，亦曾任“侍御”，后归隐乡里。名夏和他的关系甚近，书信直抒胸臆。

“甲申国难，延为家难。独能破悠悠之口，以白弟苦心者，兄与苍舒数人耳！天下方羨陈氏有两君子，而弟遂婴多口，滨死莫救，伤哉！一日三阶，何以塞责？贼人不死，何以迟回？避贼潜逃，何以得当图报？乃南人不知我心，必杀之为快！兄左右史阁部，泣陈本末，使知申包胥必复楚而鲁连不帝秦。阁部感动，涕下沾裳矣！兄之骨肉弟也，岂待言说哉？”

这封信是陈名夏陈述心迹的重要信件，众人的不解，旻昭的泣陈，自己“申包

胥必复楚而鲁连不帝秦”的隐衷，在此得到印证。后世学者陈寅恪和吴梅村之论述，不无道理。

在另一封信中，名夏写道：“弟与兄同学同志，经历患难，知爱耿耿。兄独行山径，对坐天空，木脱时耶。弟亦老矣，人言之后，闭门日多，痛悔前此，役使知识，不能讨抉本源，毁誉浮动，将未安稳受用，将谁欺乎？”他把儿子托付于旻昭，在教导培育之处，多有关照：“儿子来侍左右，愿更切切，以其亲见患难，又闻因果之事。”“儿子性浮动不常，好驰马试剑，好高谈阔论，摇摇如不系之舟。幸有学道种子，不断闻人归向，亦复作念。大兄令之侍侧，或可内逼，促为沉实也。其师须择一老而有品、严而有学者，专一课字义，不在文采。弟远隔数千里，此子成败，全在今年。其书室当在僻处。”慈父面目，事无巨细，可谓用心良苦。“父母皆下世，能见父母方是孝子。见父母能断除一切嗜好妄想，求见父母不可，然断除而非断深，求见而终不见，此处困苦自知。恨昨岁长干，虚度好日，典言及此，发一恸矣！儿子开岁省母，嘱彼无外交游，无他记诵。但迫切学道，毋如弟事后追悔！可耳？”长幼有序，尊严有别，陈名夏的一片苦心，于信札中表露无遗。

有泪轻弹是丈夫，无情未必真豪杰。陈名夏官场沉浮，命运多舛，但舐犊之情，子女亲情，在他信中道来，却情真意切，字字催泪。

《祭亡儿鲁臣》云：“呜呼！长子鲁臣，生于壬申二月，我在南，亡于癸酉十一月十二日，我始来北地。两地乖违生死，未及一见，痛哉！忆娶汝母时，予伶仃在外，形影子然。方怀汝，我即南去，闻举汝，汝大父母喜，汝嫡母喜，汝长二姐亦喜！乡里豪强作难，予未及来见，致汝归。”从文中看出，鲁臣为妾生，但是第一个儿子，名夏却因逃亡在外未及见上一面。“（癸酉）十二月之二日渡江，十日过淮泗，诸山道路劳苦。宿桃山，夜梦汝向我泣不已，初未识面，以鲁臣呼之即应！汝年甚幼，岂遂能怀我耶？及过汝母家，果不见汝，索见汝，云：病甚！恐予悲也。再四周问汝，则云汝歿矣！痛哉！汝生母葬汝于北山之原，汝幼而殇，又弗克归葬汝于高曾父母之侧，令汝魂魄何存所依附？汝勿悲，天地幻化，人生草露，长老何存，贵远何益？汝虽幼，然能言语矣，能步履矣。其母怨我之生死弗一见也！汝母明岁可南归，当遣人视汝墓，视汝外祖及舅氏。呜呼！汝有知耶？汝无知耶？我思汝耶？我不思汝耶？痛哉！”

这篇祭文娓娓道来，像对亡儿轻语，又是倾诉。长儿未见一面即逝，自己的

无奈，亲人的埋怨，从字里行间慢慢渗溢出来。特别是桃山托梦一段，锥心裂肺，神来之笔。结尾设问，一字一泪，想必作者当时是涕泪湿襟，笔蘸泪书！

《示儿书》是陈名夏写给儿子的家书，里面陈述其六女的夭亡，同样是痛彻心扉，感人至深。“十月间，汝六妹竟以痘殇。此女三岁能怀父母，能使诸母得其欢心。殇之后，举家痛哭！前年五官之痘，与今六妹痘，皆是元气虚弱，有药莫救，以此泪眼欲枯矣！汝兄弟成行，我何苦为一女伤悲如此？但痛念人言被拘之时，汝妹日倚门而呼，及蒙恩释，喜跃抱我颈！如此天性孝爱，岂不是有夙根之女？又自伤年将五十而不闻道，虚糜官俸，毫无补益于人世。而生平积聚愆尤，以致降罚儿女，得此奇疾，目中罕见，尤不能不涕下沾裳也！寒来有此伤心，日见衰老，告归之念益切，将激切陈情矣。汝六弟幸得笑语，稍破愁城。”

三年之间，陈名夏痛失五儿六女，皆因痘殇，他泪眼哭枯，日见衰老，想起官场的尔虞我诈，大有归隐辞官之心。他把儿女的早歿，归根为自己的积怨无能，内心深处对过去的作为有自责的痛楚，不便明说罢了，这也为他后来的“复明衣冠”廷辩，自取灭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我想，当时陈名夏如能“激切陈情”，抛弃官俸，率家南归，樵牧芝山，也许不会落得人头落地的结果。也许，这已由不得他了。命乎？

五

陈名夏位居庙堂之高，故乡情结却系得很紧。回乡省亲之际，“数言邑中形势，皆蒙采听，以为可行”。当然，京官言事，县官敢不听？

《濼上水利议》是陈名夏少有的关于溧阳水利建设的建议。“敝邑之水与苏松稍异。苏松之水宜泄于江湖，敝邑之水宜蓄于湖。吴淞江宜承太湖之水以出于海，独敝邑之水宜承伍牙、广通及四十八港之水，以行于支河而不遽出河，何也？”“西乡从山诸乡，皆给仰于三塔滄之水，古所谓梁成湖也。滄水泛，则洼田围埂皆败，滄水泄，则长河生尘桔槔无所施，而西乡之民田子粒不登矣！此非独西乡也，即东乡一带至县，自县治以至宜兴接壤之所，亦少润泽。”他在分析了水患之源后，又说：“梁湖之水自伍牙，注而下通镇，注而下皆总聚埕口。埕口直泄水而无安顿之处，是以潦则破败田埂，冲突激射；旱则焦枯如火，蝗蝻易生，岂非不蓄之为害乎！”他建议埕口是水的出入口，宜筑堤置闸，抑其流蓄。“水之宜曲而

不宜直也，水之宜长而不宜涸也……而邑中数百年以来，独不知蓄壑口之水！”
“况壑口不可不蓄，举邑人皆知其有利而无害，皆知其利于西又利于东。”

从当时的水利形势来看，陈名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的建议不无参考价值。

《灵官疏文》中，陈名夏写道：“吾邑素健武喜斗，然颇信巫鬼，奔走祷祀靡靡矣。诸名山大川，或以时典替最虔事者，莫如野祭：貌狞恶，执刀斧环跪，肃肃向人，则称曰将军！纓络瑱珉明昧，凝缟柔曼，易与村里老妇乐从。尸祝则称曰天妃，或称水母，或称曰某女子。遇令时，操豚蹄豆觴，前致辞，恐稍稍阙失，阴受谴罚。”他无意中记载了民间祭祀的场景，像今天社渚、河口一带的雉文化，尚保留昔日传统。

“欧冶子铸剑于平陵石屋，俗传冶山者是已。冶山旧植梵宇颇闳丽，不识始何代，今所藏云磬，犹唐式，或者唐兴有此名？然不可考矣。”陈名夏的《冶山疏》是较早记载冶山（石屋山）的文献，“山多奇树千百本，爪牙阴森而飞动，如张盖执戈状。人至其地，罔不清肃。愿弃人间从之老焉”。“数百年来，民至老死不识兵火。问昔时，按剑之雄心，争盟之劲智，费值百万冶铸神物，左干将，右莫邪，陆刺虎豹，水断蛟龙，侈哉！今皆已莽荡杳冥，星移物换，不可复见矣”。

纵览《石云居文集》，陈名夏之才毕显，陈名夏之情呈现。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读书人，一个饱受世态炎凉的“畸形人”，他的经历和心态，在其文中信中表露坦陈。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也好，斥其多变、责其失节也罢，陈名夏终究是个凡胎俗子，只不过是历史的变故让其走上舞台，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也不情愿的角色。他内心痛苦挣扎，乡人亲友对他的鄙夷，失去儿女的切肤之痛，万里逃亡的惶惶不安，这些苦痛，不是常人所能经历承受的。

陈名夏的一生，大起大落，大波大折，大喜大悲，最后以悲剧收场，令人扼腕叹息！他的才情，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千百年间，邑人如百史者，寥寥乎也！不是拔高，非是美言，设身处地想想，你将何为？钱谦益、洪承畴、吴梅村、宋之绳都事新朝了，何谴名夏一人呢！他只不过是多降了一个李自成！连清帝都不计前嫌重新启用，我们后人何必耿耿于怀呢？何况，他为民为国也做了不少事，他为家为乡还留下不少文。

斯人已去，濂水长流。千秋功过，自由人说。

这就是历史。

名宦陈名夏

陈名夏是个非常复杂之人。

谓之复杂，一为其经历，一为其性格。清嘉庆《溧阳志》在介绍他的条目后，加了“谨案：国初宰臣，事具史馆，非民间所能详考也”。干脆避重就轻，搁置起来。一位名重一时的宦官，一位被皇帝处以绞刑的宰相，一本县邑的乡志怎样来评价他呢？

陈名夏在明崇祯六年（1633）乡试中癸酉科举人，又过十年，他以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三名的优异成绩，登上了科举场上“探花”的荣耀金榜，从一名江南寒士蜕变为朝廷宦官，授翰林院编修，升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他的奏折对章颇合皇帝心意，按理说真是前程似锦，前途无量。

天逆人愿，时运弄人。“正月里梅花香喷喷，李自成造反遇到兵。崇祯吊死煤山上，满洲人打破北京城”。这是外婆在我小时候经常念叨的“唱春”词，却是一段历史事实的再现。

陈名夏高中功名没几个月，甲申（1644）三月李自成的起义大军攻陷北京，改年号“大顺”。大顺开始以“免税三年，不杀一人”相召，许多明社官员纷纷依附，陈名夏也投降称臣。孰料李自成有心接收崇祯的妃嫔，无心打理前朝的江山。四月，清兵于山海关击溃李军主力；五月，清军入驻北京。世事的突变，让世人无所适从。

清顺治元年，马士英、阮大铖拥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世称“南明”。他们对有旧怨的“复社”人员打击报复。当时陈名夏避乱乡里，又只得避仇而北逃，来到河北正定。保定巡抚王文奎得知陈名夏的下落，将他推荐给清世祖。清朝甫定，急需人才，世祖马上召见了名夏，让他官复修撰，不久又升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溧阳旧志曾称陈名夏“知无不言，勇于任事，开国大政多发其端，尝革铨选之弊”。清军定江南，怎样在南京设官，宦众说纷纭。名夏言：“国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不当如前朝称都会，设官如诸行省。”世祖马上采纳他的意见，颁旨执行。可见他的治国方略在清初是颇受重视的。顺治三年(1646)，陈名夏因父丧归乡，朝廷离不开他，“命夺情任事，请终制，赐白金五百，暂假归葬，仍给俸贍其孳在京者。”顺治五年，清廷为笼络汉臣，初设六部汉尚书，授名夏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八年，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在六部尚书中，只有陈名夏和刑部党崇雅后来拜为相，可见朝廷之倚重。

宦海沉浮，云诡波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陈名夏虽身为重臣，权高位显，但福兮祸所伏，他几番因劾论死，虽侥幸逃脱，但终被处死。

名夏拜在睿亲王多尔衮门下，曾受提携。他与多尔衮亲信、满族尚书谭泰是密友。顺治八年夏，有御史张煊弹劾陈名夏结党营私，铨选不公。谭泰袒护名夏，反指张煊诬告，将其论死，另一御史盛复选被罢官。谁知由夏到秋，谭泰就因参与多尔衮政变而被诛。九年春，顺治皇帝复命大臣查处名夏的罪状，定论为“徇私植党，揣摩执政意旨，越格滥用匪人，以迎合固宠”。陈名夏开始“厉声强辩”，“辩甚力”，但亲王大臣纷纷诘难，形势一边倒，他感到辞穷理屈，便涕泪俱下，哭诉当年“投诚有功”，恳求免死。顺治帝说：“此辗转矫诈之小人也，罪实难逃！”但他有言在先，凡与谭泰有牵连的人，都不株连问罪，为不食言，才免名夏一死，但免去职位，仍享俸薪，发落正黄旗，与闲散官一起随朝，悔过自新。陈名夏惊心动魄，逃过一劫，可见官场步步惊心，朝雨暮雪，瞬息万变！

顺治十年，不知是名夏悔过有效，还是皇帝发了慈悲，复授他为秘书院大学士。这时，吏部尚书的位置一直空缺，侍郎孙承泽上奏折请皇上恩准让陈名夏兼任。顺治指斥孙以侍郎身份推举大学士，不合体统。但嘴上这么讲，第二天顺治就让陈名夏任了吏部尚书，可能一因怜才惜才，二因缺才用才。

顺治经常到各部走动巡视，经常告诫大臣：“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陈名夏有时强辞顶撞皇上，顺治告诫他：“你别忘了犯过的错误，自己要多反省！”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皇上召群臣议总兵任珍罪，大家都指责任珍嗜杀成性，百姓皆怨，应将其关押重处。而陈名夏却与陈之遴、金之俊等臣持异议，为任珍辩解，“巧饰欺蒙”。皇上发怒，要论名夏等人死罪，后从宽发落，改为削官二级，罚俸一

年,但仍供原职。

陈名夏确是“知无不言,勇于任事”,连皇帝老儿都敢得罪,这许是和溧阳人“拗头倔脑”的硬头脾气不无关联,但应知此乃宦宦之大忌,逃了初一,难过月半,过了十五,难逃月底!陈名夏虽官为臣极,但在劫难逃,人头落地,终有一日!

关于陈名夏的死因,乡里流传一则故事:百史陪皇上下棋,一阵风吹落棋子,滚到皇妃娘娘脚下,陈百史趁拾子之时顺手捏了娘娘的脚,娘娘一惊,皇上问何事?陈巧答:“风吹棋子落,错摸娘娘脚。”皇上言:“陈爱卿你好巧!”棋局散后,陈百史就被亲王绞死了。明日上朝,皇上查问陈爱卿哪里去了?亲王说:“你昨日不是说陈爱卿好(巧)绞吗?他已被绞死了。”

间巷传说只为笑谈,陈名夏的死却另有其因。顺治十一年,大学士宁完我上奏对陈名夏发难:“名夏数次欺蒙对他的赦免宽恕,而且还暗藏着罪恶祸心。他曾经对我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其居心叵测,他的儿子掖臣,横行乡里,士民怨恨。后来移居江宁,侵占官员园宅,收受贿赂,名夏明知故纵。他身居吏部尚书,破格提拔私交赵延先,给事中郭一鹏上疏揭露,他便要加害郭,被刘正平阻止。他的姻家浙江道员史儒纲,因犯法被罢官逮问,陈名夏却一定要为之官复原职。给事中魏象枢与他也是姻亲,犯事连坐,理应降职,陈名夏也仅以罚俸处之。结党营私,由此可见。作为大臣,执掌公文,一字轻重,关系公私,之所以签上姓名,以防推诿。陈名夏曾在公文上涂抹一百十四字。皇上曾严诫官员结党,名夏擅加涂改,欺蒙圣上的事这么多!请圣上原谅我陈述事实,对他依法制裁。”奏书上呈,皇上召集廷臣与名夏对质。陈名夏对历数罪状一一辩驳,诸疑皆虚,却偏偏对“留发复衣冠”一条供认不讳。经宁完我和刘正宗当庭共证,指证罪状皆实。顺治这次动了杀心,没有犹豫,只是将砍头改为绞刑,也算是最后的恩赐,给名夏留个全尸。

陈名夏的言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留发复衣冠”这分明是“反清复明”之举,这怎么可以由一个清朝的重臣嘴里说出,又当庭承认呢?他这不是把绞索往脖子上套吗?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感慨地说:“夫百史辩宁完我所诘各款皆虚,独于最无物证,可以脱免之有关复明制度之一款,则认为真实。是其志在复明,欲以此心告诸天下后世,殊可哀矣。”

胡晓明先生的《文化江南札记》记叙更有趣:“盖棺论定,陈名夏依然是一个

志在反清复明的奇士。所以,《清史稿》最终将他放到《贰臣传》中去写。”“这个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清初朝廷中伪装最久、做官最大的明朝‘间谍’。江南文化的深不可测,正由这一类人体现出来。”

清诗人吴梅村感溧阳陈名夏之事而作《伍员》七绝:“投金濑畔敢安居,覆楚奔吴数上书。手把属镂思往事,九原归去遇包胥。”他借伍子胥、申包胥之典故写名夏,也写自己。钱牧斋的《金陵杂题》第二十三首,也以《左传》浑良夫数遭免死,终遭杀戮之事,写陈名夏有志不成,抱恨而没,不如自己老归空门。

陈名夏的复杂,是一个不易解的死结。他“成了一个既非清廷忠臣,又非明室孽子,既可哀复可叹的畸人”(《文化江南札记》)。奇人也罢,畸人亦罢,终有来路,终有去处。

鄙人陋见,名夏之悲哀,终为时代之悲剧。他的多才,造成了他的多变。先降大顺,又降大清,贰臣乎? 佞臣乎? 气节上,他矮人一截,返回乡里,见老同学芮长恤,被奚落责问,长跪相泣。后贵为臣相,仍为长恤和乡亲所不敬,冷言冷脸。我想,名夏心中的痛楚,难为他人所解。乱世求生,新朝求官,实乃人之本能本性,亦可谅解,随风使舵之徒,亦非百史一个。令人不解的是他的“勇于任事”,顶撞皇帝,率性而为,得罪了这么多的臣子! 为官之道,理应变通,他却又认死理,不变矣! 天不灭名夏,人亦灭之!

陈名夏不应是“明朝隐匿在清廷最大的间谍”,他潜伏得不够深,应对得不够滑,处理得不够奸。一句话,他不是那块料! 他尚存点忠节的良心,尚存点文臣的气息,尚存点传统的骨骼,虽然,表面上他已与仁义忠良背道而驰。短短几年,他屡遭弹劾,几度脱险,不幸万幸。与宁氏的廷辩,他烦透了,他爆发了,他看穿了,他放下了! 他承认了罪行中最重的一条,其实无异于自杀,他想以自己的行为告白:名夏其实也是个有气节的人,只是生不逢时!

陈名夏的死因,也许,只能如此解释。

溧阳彭光斗在将芮长恤和陈名夏比较后说:“然吾意,陈公有知之,转悔不为处士也!”

呜呼! 芮长恤处士善终,陈百史命丧官场,世事无常,孰对孰错?

嗜诗好游宋臣熙

嗜诗，雅事也。好游，亦雅事也。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诗与游，正合此言。

李杜以诗传世，徐霞客以游闻名。溧阳宋臣熙，论文论游，其行其举，一点不输他人。

乾隆、嘉庆县志记：“宋臣熙，字缉峰，又字尧咨，幼穷经，不屑屑章句而疏通大义，生业万历初，知县事。帅兰纂修县志，延之考订。以贡生知新安县，简静而廉洁，当事拟诸傲，遂以诗自废，扁舟载石以归，贫如诸生时。后官荆王藩邸，亦以诗文相倡和，闻于时。子劼、孙之绳别有传。”

从这段简介可以看出，宋臣熙读书不穷究而通大义，曾被聘为万历县志的考订者，证明他对地方史事颇为熟悉。后以贡生的身份当上了（广东）新安知县，简朴喜静廉洁，但在很多方面倨傲不让，因为诗而被罢免，于是小船载石回家，一贫如洗；后来又荆王家任职，仍诗文唱和为乐，闻名于时，有儿子劼和孙子之绳（溧阳榜眼）。

这里讲到“遂以诗自废”是怎么一回事？史上有因写诗而丢官的吗？

宋臣熙从小“颖敏异群”，他的父亲玉峰公以“学行冠邑”，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因此“训之甚严，历十四、五，《十三经》正文熟烂背读，不遗只字”。他从小就是个“神童”，有一位孙先生为爱女择婿，路过宋家门口，让他出来看看，一见他就觉惊异：面圆满月，玉晰可念。于是就和他试对，孙曰：“风过庭前，吹落黄花金满地。”宋对曰：“霜飞野外，染成红叶火烧林。”先生大加赞叹，又曰：“向阳庭树，孤根得意暖初回。”宋对曰：“坠吹井梧，一叶伤心凉已入。”孙先生更加喜欢，心想稚童就这么吐语不凡，他日功名不是可见乎！于是当面就把女儿许配于他，那年宋臣熙才九岁（娃娃亲也）。

宋臣熙十八岁那年，县院两试皆冠军，入校屡试第一，“弱冠吃廩”，“每有大制作，必笔是属”。与当时马一龙、史玉阳等先生相交往，水平相等。然而，辛酉科考，一二场入围，考到第三场，“书策目越格，遂堂贴不入卷”。写考试题目越格，当场作为废卷处理。“一邑为之嗟遗珠云”，一县的人为他可惜！直到四十岁才入贡生，五十多岁才入选得广东新安令。可谓仕途多艰也。

新安地僻近海，百姓多以渔业为生。按照旧例，一艘渔船入海捕鱼要交纳一金，县令方才让其启航，因此一年知县可得金三千两（银）。宋臣熙到任后，想到渔民入海命悬一线，勇闯蛟窟，怎么忍心袖纳他们的血汗钱？他说：“民，我子也。我子贫无恒业，至以性命出没风涛中求衣食，为之长者忍袖其金乎？”“悉捐之，民皆感泣，然自此公无一钱入矣！”百姓“谣颂遍于四野”（见《墓表》《行略》）。可见，宋臣熙是位体恤民情的清官。

宋公“工古文辞”，“积学励志行，能文章及古近诸体诗，尤工书法”（《丧叙》、《墓表》）。新安县“讼简，公庭雀罗多暇”，衙门清静，公事简少，偏偏宋县令是位“诗歌尤癖嗜”之人，于是“与乡之高贤、诸生之隽异者酬唱”，“性落落，寄而结社吟诗”。“公又好诗歌，而讼庭无一事，每独坐堂上，搯颊苦吟，胥吏皆匿笑罢去。时问邑诸生，有能诗者乎？曰有，则揖其人，人与赋诗”。

呵呵，真有这样的知县！嗜诗如命，结社酬唱，独吟不算，还要揖人！哪里有一点县官的架子和模样！衙门无事，你也拉党结派，拍拍马屁嚙！果然，出事了！

“其于当事礼币不能无省略，索瘢无可得，遂以‘引一方民社寄而结社吟诗，罔知民瘼’！又云：‘文学甚裕，政事稍疏。’”，“上官岁逢迎，须财贿，无以献。上官怒目，曰：尔出身明经也，敢尔”！宋知县惨矣。渔政蓄金你不入，上官财贿你不出，虽然“大索公罪状，无一得及大计”，但上级领导还是用公考语告了他一状：“文学甚裕，政事稍疏”，吏部遂下文，“左迁郴州学政”，一县之令乌纱泡汤。县长做不成，调郴阳当了教育局长，算是客气了。

宋诗人哦，诗歌不能当乌纱，不能当饭菜！五十五岁熬了个县令，容易吗？吟诗没关系，你也坑坑百姓捞点银两拍拍马屁走走上层啊！得罪了上级，后果很严重。此时，跟着他的父亲已八十多岁，儿子尚小，“为令仅及期，囊不名一，父老为据百金，治行李”。走时空空的行囊，没有雇一个老乡来抬金银挑行李的。“去新安之日，囊无一钱，新安民相聚号泣，醪金百饮”。老百姓舍不得你走何用？那

百饮的酒钱还是大家凑的。百饮解离愁，作诗了吗？

因诗丢官，天下奇闻。但宋公并不消沉沮丧，照样优哉游哉。

罢官迁任，“先生意甚适，闻西粤多奇山水，不以此时往游，将谁待乎？适奉其父入桂林，度苍梧、九嶷、潇湘、长沙，酹酒招屈贾魂吊之。浮洞庭、江汉，尽揽撷三楚之胜。而与诸子若孙袖书诵诗蓬窗中如故。”“府君好天下名山水，以广右山水为舆图奇绝。奉王父，携不孝辈，买舟迂道，万里抵家。凡所经粤西之山，峭拔瑰怪，水之激湍澈渟，楚南北江湖之浴日吞天，城邑楼阁之遗墟壮丽，父祖子孙共为凭吊题咏。人人指目为迂，不屑也！”“公买舟纤道，行万里抵家。凡经两粤三楚，山水峭拔奇丽、浩淼动荡、可喜可愕之处，公上奉老亲，下携令子，停桡登临凭吊，益赋诗，得佳句即长吟自豪。家人或相笑，谯议之曰：公以好诗失上官意，今奈何尚好之？公亦笑曰：此非尔所知，我失上官意不在诗。”

宋公真是洒脱，遭贬返乡，理应愁肠百结，唉声叹气，他倒好！买舟顺游，时不我待，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遇名胜古迹要凭吊赋诗，得佳句还要长吟空嚎！而且是陪父带子，祖孙三代一起作诗“发痴”，难怪别人要笑话这一家“迂”人！积习难改，诗痴不改！

但还是那句老话：诗歌不能当饭吃，当钱用。

“当舟至桂，资斧告罄矣。即解束带并先妣簪珥，镛之供朝夕。过肇庆，买三尺许一石压舟，比之刘宠一、钱清献清风两袖，真后先一辙。著里党目者，五十年无闲言！”“舟至桂林，资斧竭，乃解己束带、脱妇簪易米。过肇庆，水急舟空不能行，乃载石三尺许压舟以归”。

典束卖簪，不弃诗游，仓空无米，买石压舟，宋公，真君子之游矣！

贬官郴阳，理应“改过自新”了吧？不然。“郴饶山水，先生乐之，日群其门弟子袖书诵诗如故。”“盖郴亦名山水窟也”，“课艺之暇，啸咏名岩壑间”。荆王待宋臣熙不薄，但想到老父春秋八十，“事有不可知，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从斗筲之役乎？遂上书自免”。弃官回家，“荆鄂诸胜，归舟必经，一一履目，著于诗歌。”有《缉峰诗集》传世。

宋臣熙返乡后，“生平于家人业未之问，惟是与乡父老戚执话农桑，较晴雨”，与诸生讨论古句，不易前好，直到后来临终，他呼侍姬拿过大笔、佛珠、扇面握在手中，并告诫子孙：“吾生平无长物，长物止此！”“续闭户读书，必当有成！”“吾家

书种，尔等勉之！”读书人之肺腑言，令人动容。

历史上，孟东野任溧阳尉，时年五十有五，他文人武用，心存不满，于是骑驴携童，流连射鸭塘，苦吟作诗，被县令告状，俸禄分去一半，养家糊口难以为继。

溧阳宋臣熙，年亦五十有五，以贡生选县令，衙门清闲，赋诗为乐，免除渔利，得罪上官，却洋洋自得，买舟畅游，卖簪买石。真个嗜诗如命，因诗丢官，钟情山水，书种诗痴。

两位先贤，不谋而合，以诗果腹，寒馁自知。诗与官，孰重孰轻？孰近孰远？孰热孰冷？孰无孰有？

宋氏父子与如园

宋臣熙嗜诗如命,《溧阳古诗选》有其诗两首:

《春雨桥》

城心跨水一梁悬,水落舟胶篙不前。
断石倚崖遗篆迹,桥成记自赤乌年。

《如园即事》

老去空杯壮佩觿,四方无志艺疏畦,
拥书认字眸嫌眊,咬菜逢根齿怯齶。
棋着适情忘胜负,杖携信步任东西,
酒酣岸帻临风啸,惊起栖林鸟乱啼。

春雨桥即中桥,现叫东风桥,是溧阳城中心连接东西的要梁。宋公此诗是记载此桥的重要史料。

《如园即事》是作者晚年的心境的坦露,人老空怀少年志,只能在家侍花种菜了。看书字迹模糊,吃饭连菜根都咬不动,下棋只为度光阴,拄杖散步也是信步转悠。只有一样东西没有改掉,酒酣耳热之时站在高处吟啸诗作,但有谁来听呢?只是惊动了树林里的栖鸟,乱飞乱啼。

如园,宋家花园,是明末清初溧阳的知名园林,嘉庆志载:“如园,在东门外三里,明万历间新安知县宋臣熙就其地位,置树石,规作栖游之所。子太仆卿劼踵事增成之。池馆清幽,饶有物外趣。”东门外三里即崇庄巷一带,有前宋、后宋村,皆是宋氏聚居之地。这里记叙较为客观,宋臣熙任新安令清贫如洗,返乡养老只

是种树规划，园筑主要有宋劼增修而成。“吴颖少时尝往谒，见其独坐深树，俛观流水，意淡如也。园中清瑶阁最先成，图画一壁，丹青焕然。其读书处颜曰：欣有堂，后复建一堂曰：载石，陈继儒书额。始臣熙罢令，尝载一石归里，后为新安人所得，劼赎归，实之堂前，以示不忘先泽。又有春信草堂，此则劼子之绳赴部会试时建立，以志期望。吴学濂作县志，园已荒废云。”

吴颖，顺治进士，官至湖州知府，对家乡景物多有诗咏。他去如园拜见宋劼，只见他在树荫里俯看流水，心静如流，意淡如水，仿佛当年的边塞马嘶、甲申兵燹、东海惊涛、拼死水战，都化作柳烟清溪，牛哞羊啼。人生苦短，落花流水，世事如梦，岂能如意？如园，如水，如石，如景，如物……归隐的闲适，掩映着孤独的身影，多少有点壮志难酬的酸楚无奈。

陈继儒乃乡绅，书法有名，写匾额“载石堂”，肯定有乡味。只是一事不明，宋臣熙罢官回家，在广东肇庆买三尺石压船，怎会落到新安人手中呢？是否当年没钱付舟费而以石典质？此处有宋劼赎回一说，七不离八是如此了！吴学濂是乾隆县令，曾编志有传，他说如园已荒废，看来此园仅传三代而已。

如园先有“清瑶阁”，有壁画丹青，焕然夺目。有“欣有堂”，为读书之处；有“载石堂”，为纪念宋臣熙载石归乡而建。另有“春信草堂”，这是为宋之绳科考而建，而之绳果然高中，成了“榜眼”郎。宋劼还有诗《新葺茆斋》：“绕篱开竹经，临水葺茆居。日与幽人共，年来世态疏。轻风低弱柳，细雨长新蔬。爽气时窥牖，香清读道书。”临水竹径，弱柳新蔬，闻香爽气，幽居读书，这样的环境人生，怎么还能惦记世态的炎凉呢？

宋劼还有《久病掩关园中答吴见末》诗：

蜗庐四壁不支关，乍展新诗喜破颜。
 百岁太平鼾鼻过，一时今古转眉间。
 园林漫说敦真赏，翰墨聊为学赋间。
 病里深愁何处寄，篮舆强上看秋山。

蜗居家徒四壁不用设门关，打开新诗开心得喜笑颜开。年老的岁月在鼾声中渡过，古今岁月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如园修得真可欣赏了，书法练得只为学

习诗赋。久病之中为寄信发愁，坐着用篮子做的肩舆，攀着爬上山去看秋色。诗中所提吴见末，即本邑吴颖，顺治九年进士，授刑部郎中，年少时曾去如园拜访过宋劼。

明代本县人虞许，万历壬子举人，曾任永丰知县。他的《如园清瑶阁成》诗写道：“青青百个松，中有一高阁。飞甍无璇题，涂墍谢丹雘。返照埤垠衔，归云梁栋落。主人独卧游，尘迹鲜踟躅。松风凄以清，瑶响林之薄。入琴歛山水，吹剑神干莫。秦箫台上鸾，乔笙月下鹤。近聆祛幽蕴，远听荡喧愕。兹非扬子亭，解嘲可无作。”

清瑶阁高耸在一片松林之上。飞檐彩甍，红墙丹顶，夕阳返照，晚霞落梁，主人游憩其间，与尘世很少走动了。松风凄清，林响瑶琴，山水合韵，剑鸣神响，箫笙鸾鹤，聆听幽远。宋公就不要谦让了，此阁不是扬雄的亭子那么简陋。

明人谢天选有《过如园载石堂》诗：

螯簪天琢玉嶙峋，拂拭风尘见旧纹。
秀色一堂岳双雨，寒光千里九江云。
曾浮轻棹陪公纪，更得新铭写右军。
他日定成佳话柄，郁林遗事有清芬。

如园里奇石嶙峋，岳堂灵秀，一定会像苏州园林一样流芳传世。

清初诗人陈允衡有《宋柴雪太史招泛园池即事》诗两首：

—

桃源一水曲，莲社数花开。
但觉人间远，相从画里来。
舟回轻似叶，树合碧于苔。
客主闻长啸，新诗待汝裁。

二

频年恋红友，今日念苍生。
属望趋装意，殷勤别墅情。
远山看画手，流水载琴声。
更有溪云色，随人到凤城。

此诗前首写景，后首写情，桃源里的画境，远离人世尘嚣，但你又要赴任了，希望把家乡的溪云景色，带到京城里去，不要忘却。

宋之绳有一首写如园的诗《次陈伯玘过如园有韵》：

空天浮赤日，梧竹覆高凉。
安稳枝三匝，逢迎水一方。
展诗生静气，和墨散幽香。
明月还期赋，君才倍谢庄。

这是宋之绳和陈允衡的诗作，写得谦和。陈允衡，字伯玘，江西人，在扬州、金陵从事编辑之事，与名流钱谦益、王士禛有交往，曾来溧小住，与马世俊、马伯绳等有唱酬。

关于如园，宋家三代人为之付出许多。宋臣熙规划设计，宋劼动工修筑，宋之绳完善修葺。作为地方名园，访客颇多，宋氏亦颇器重。宋劼字号如园，宋之绳文集称《载石堂尺牘》，可见父子俩对此园的钟爱之深。

“他日定成佳话柄，郁林遗事有清芬。”谢天选的预言，前一句对了，后一句没了。溧阳作为江南富庶之地，园林在明末清初曾盛冠江左，但终因战事频发，兵燹人祸，均已灰飞烟灭，化为瓦砾良田。

我在崇庄巷度过童年，前几年曾几次踏郊寻访如园遗迹，除了池塘乡径、稻麦桑麻、曲河堤埂，已没有一点园林的踪影了。高耸的清瑶阁、欣有堂、载石堂、春信草堂……只能从诗文中相见了。

只是恋着那块肇庆压仓石，不知去了何方？许是村妇捣衣的塘埠石？还是农舍砌房的墙脚石？抑或是富家仓廩的收藏石？

如园，如梦。

文武双全宋拱宸

宋拱宸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初改名献，后因张献忠之故，上疏乞更名“劼”，“恶同贼也”。那为什么更名为“献”呢？“崇祯十五年以前，公奏疏当上意，凡奉诏旨曰：宋献！”既然是皇上赐的名字就好好用吧，偏偏又出了个撼大明江山的张献忠！一个人名字都要皇帝钦定，还要打报告申请更改，有意思吧？

宋劼“幼颖悟，天姿绝人，承祖父积学通德之后，宗族皆以醇谨著闻，公独英杰倜傥，才气发舒，奕奕不可遏！”他小时随父亲宋臣熙从新安返乡，“以纵观西南诸高山大湖，峯崖澎湃，奇形异状，恹惚诡俶之气，益张大心胸，结轡为文章，文章满天下矣！”可见行万里路之重要。

宋劼文章写得好，却又偏好军事。“时边疆事渐急，公为诸生不甚爱帖括，独爱兵法，讨论边事得失。”他“万历癸卯举人，六试礼部不第”，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溧阳离京都南京不足三百里，他时常去结交贤豪长者，与有文武之才的茅元仪很是谈得来。茅元仪家贯百万，招天下名士著《武备志》献给朝廷，后得官总兵，宋劼也随之入了京师。“公留京师久，所交游多建牙握重兵者，益习知兵略及边塞事。抵掌奋袖，面谈若可，即见之施行。又往往先事决胜负，多奇中。京师诸公卿益耸异之。”近朱者赤，谈军论兵，宋劼似有天分。

“而是时大学士高阳孙公承宗方兼兵部尚书，督节视边，稔知公，且元仪亦在孙公募中为心腹，孙遂疏请公以中书舍人赞画其军事，从督师至宁远，即以通马市功诏赐中金貂冠。当是时，公才名震天下，而魏忠贤党駸駸用事，有欲邀公以非常之过者。公深自韬戢，遂奉新安公讳里居。”为尚书重用，督师通马市，才名天下闻，不料却又被魏党中伤，于是索性回乡陪父。

朝廷召回，宋劼却因父丧而迟归。后赴陕西、山东为官。庚午年，有岛守刘兴治称乱，他奏诏过海，“以计抚辑”，连连升任。这时，孙承宗又起用他督师巡

边,但又为嫉者中伤,正好母亲去世,他丁忧归家。但魏党并没有放过他,以“奔丧不待,院批浮躁”,连降二级。乙亥年,补赵州知州,又调昌平州,却又被人以“忤守陵”弹劾被罢。壬午年又起用永平府、兵部、登津、芜湖为官,并有中金彩币之赏赐,升为太仆寺少卿,但没多久,明朝就灭亡了。

宋劼有著作《如园诗集》二十卷,《还莱始末》数卷,其中有《过海纪略》一卷,叙事称奇。“公督饷至东江岛,帅刘兴治称乱。公将以便宜击擒之,掣于枢辅。公自羊城长生岛从蛇岛,舍大舟,浮轻舸大洋中。一日一夜,扬帆疾行一千五百里抵关门,夜半遇大飓风,天海洞里,桅舵俱折,人人以为必死,而公得无恙,竟督师受方略。又一日一夜,从觉华越大洋,行二千八百里,抵登州。他舟尽覆没,而公独全。此公忘身报国之奇节伟行,其尤著者也。”(《行述》)

宋劼在任山东监军佥事之时,“招徕朝鲜臣,入贡道梗,为疏题改贡道,鲜国一时效顺旧例。贡使入於道,臣厚有馈遗以劼,为改贡道故。其馈视昔复有加,劼皆不受。鲜国以此致感,听约束恐。”“劼密遣使通鲜国,鲜知劼复来海上,大喜。随密遣大将林庆业,卒偏裨一十八人投,疑许为具粮,助筑南关岭,复南四卫。已刻期举事,而国变告矣。时劼正募海师及集舟粮于江上,弘光立,同诸臣迎贺。奉命改海为江,升太仆少卿,仍监芜(湖)采水军。复以韩家墅、李贰泗战功升一级,奉旨准令三代诰命。乙亥,南都陷,弃官归田。”

招来朝鲜入贡,这是宋劼的一大功劳。明朝将亡,原来的贡道全为清兵所据,因此只能更改贡道,而面对使者的重馈,宋劼不肯收受。直到大明王朝的最后关头,他还派密使赴朝,为朝廷募集粮食,并集粮舟江上,水战立功,可谓力挽败局于末端,贡献身心于一朝,可歌可泣!

关于宋劼一生,他儿子宋之绳的学生,清初文学家计东在《故明太仆东卿宋如园先生暨配张淑人行状》中言:“以一孝廉崛起田间,出入兵间者二十余年,负气胆决,频万死不悔,晚益能自奋于功名,位至卿寺,且以寿考与国同存亡,岂不异哉!识公者皆推服公胆气盖天下!其论兵家奇正虚实,彼已诚伪,若语家事。使公得稍稍遇时,管乐岂足哉?惜乎时之穷,至此极也!虽然公之胆气实本忠孝至性,迸激不能自己。史迁所称:‘出万死不顾一身之计,赴公家之难’,非侥幸冒不测、急功名者比也!”

宁则安邦治国,战则捐躯沙场,何谓文士,何谓战士,宋劼是也。

乱世榜眼宋之绳

明代崇祯癸未年(1643),出现了溧阳科举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最为辉煌的一年。那年,高登廷试一甲的榜眼是溧阳宋之绳,探花是溧阳陈名夏。而当年的一甲一名状元,是武进的杨廷鉴(冰如)。一个县进三鼎甲的二、三名,这在历年的科举场上不多见,可见溧阳文风之蔚然。

风起云涌,时事骤变。谁也没有预见,金榜题名之时,却是命运多舛之际。朝代的更替,把这些天之骄子、人中俊杰一下推到风口浪尖,任凭狂风撕扯,浪涛扑击,从而演绎出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身处乱世,壮志难酬命难保。贫困交加,躬耕家园病煎熬。榜眼宋之绳的一生,值得探究。

—

关于宋之绳,县志上记载:“宋之绳,字其武,号柴雪。初从父劬游燕,才名甚著,登崇祯十六年进士第,廷试第二人。甲申之变,祝发匿僧舍,为逆者所获,投井不死,得南还。时南中马阮用事,之绳避地浙西。入国朝以荐补侍从充日讲官,擢中充。丁酉主试顺天,有知人之鉴。辛丑出为江西参议,勤于政事,士民呼为好官,大僚甚重之。康熙丁未裁缺,政仕囊橐萧然,同官周其资斧。以积劳得疾,抵家三月而卒。为人豪爽而清飭,交满天下,尤与黄冈杜浚善。笃于宗族,好奖后进,衣冠怀之。存诗六百余首,书画俱佳。有《柴雪诗钞》、《国雅集》、《载石堂尺牍》行于世。”

县志所述大概,读《载石堂尺牍》,内有宋之绳自编年谱,及与师友信札,言之切情之深世之变事之曲,仿佛历历在目。

宋之绳万历四十年(1612)十一月初三出生于北京西城之红桥,他的父亲宋

劬当时在京城读书已有三年，其张、金两夫人没有生育，听说城西有庙求子甚灵验，就带着两位夫人去祈子，当年金夫人就生下了宋之绳。

宋之绳七岁开始跟着表伯吴伯伦读私塾，学骈对时就有“鱼吞月影，蝶舞风光”之句。己未年冬天，尚书贺中冷来看宋劬，和小之绳对“杨柳岸晓风残月”，他应声答“芙蓉际初日轻霞”。贺尚书大加赞赏。八岁，由表兄马又如训练他作八股文里的“破承起讲”，开始读“先正诸文”。

九岁那年，宋劬因孙相国之请任中书舍人。宋之绳的五叔死前四天，他去看望，五叔揣摩他的头哭着说：“你从小聪明，相貌特别，凡是佻家（男孩）我都喜欢！你日后必然兴我宋家一宗，要看待你寡婶和兄弟和我在时一样！”五叔有之纶和之絃两个儿子，之绳情不自禁大哭而退。

宋劬公务繁忙，但不忘带儿子拜访名士文人。丙寅年之绳到句容赴童子试，因出疹而告退。己巳年五月回到溧阳，邑试已过，县令丁墨岩特为他补试，堂文写完，甚为赞叹！但赴院试不利。

天启寅午年（1630），宋之绳娶史夫人，五月赴府试不录，心情郁闷，“自念弱冠不能青衿，心实伤之”。宋劬来信劝他：“好驴马不入队行！已援例北雍矣！”七月，他寒疾发作，几次濒危，九日始愈。明年（辛未）八月，他又因划舟落水而得病，腰股之间不能屈伸。后又患湿疾，“跬步不能成行，自分作废人矣”。几年一直读书郊园，乙亥年与钱伟仲、陈五百、唐五叙等十人结文社。其间他异地读书，几试不第。

己卯年四月，宋之绳的次子元正与陈名夏的女儿联姻。元正本来和溧阳进士杨文中女儿订婚，杨女先逝，正好陈名夏回家，“探花”女就嫁“榜眼”儿了，当然，这是后话。

庚辰，崇祯下谕旨，凡十二、十三年通过乡、会两试的士子，都要在发榜后补试骑射。这可能是为打仗做准备。但这下可苦了宋之绳，他正好南下而失去了补考机会，只得重在石城南京“鸥天馆”继续读书。辛巳，蝗虫肆飞，旱灾又至，粮食匮乏，他赴杭州拜访朋友严氏四兄弟，斗米日升，物价飞涨，宋之绳困在武林。严家四兄弟虽贫穷，还带着蔬菜和壶酒，款待宋之绳，并题诗跋句，乐无虚日。

癸未，宋劬被任以山东佥宪、监四镇水师，宋之绳送父至潞河。八月，会试顺利，廷试阅卷时，考官将宋之绳试卷定为第十一名，皇帝亲自定为第二名“榜眼”。

九月，授翰林院编修，与状元杨冰如、探花陈名夏一起入宫。崇祯帝上朝，宋之绳和好友尚木两人侍班，一时成为京师红人。

二

时隔一年的甲申二月，李自成、张献忠破潼关，占三晋。崇祯帝召集部堂詹翰（部委办厅）朝廷大臣商讨平乱之事。宋之绳主张撤回边关守军，集中守卫京城，当时诸臣都表示支持这意见。于是朝廷发令执行，但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军队除唐通一支队伍撤回外，其他都来不及守卫京畿了。

三月十七日，宋之绳和平怀兄刚到史南湘、金吾许处坐下，就听到李张大军已兵临城下了。十八日一大早，宋之绳到同年史趾祥家，想邀杨冰如一起到朝阁去听消息，两人冒着大雨而行。至朝，陈名夏也来了，他已是户兵两部官员。宋之绳认为，京城城守坚固，但城内情况不明，怕兵马横驰，人心惶扰。在这紧要关头，各衙门应该无论文武百官，都登上城墙划地死守，不要仅依靠禁旅官兵！然而，他的意见遭到宰相大臣的竭力反对，许多人摇头说：“皇上的意思只许警卫内侍登城，外来部队都不许涉足，何况其他人乎？”宋之绳见状，极为苦闷，回到家中痛哭痛饮。他骑马飞驰到阜成门，看到城楼上并没有什么守备防御，只有炮声隆隆而已。途中碰到工部的申维宁，他刚送干粮从城上来，骑在马上对宋之绳喊：“事不可为矣！奈何？奈何！”宋之绳含泪而归，时已黄昏。

十九日黎明，宋之绳到陈名夏寓所，约一起去方密之、杨冰如处。路过长安街，听到路人纷纷耳语：崇祯皇帝已于十八日三更时，六匹快马飞出正阳门了！这时，同馆姚若侯正好骑马而至，宋之绳和他一起去追魏相国的马队。姚若侯对魏相国说，今天这种形势，只有请皇上把皇宫里所有的人马分布在城上，城里的人心才能安定！魏闻言唯唯诺诺。他们哪里知道崇祯此时已吊死煤山、身殉社稷了！

宋之绳仓皇返寓所，见李军已进城，拿着刀枪在沿街抢骡马，叫骂声不绝！宋之绳此刻心想，崇祯帝如果南驰，我冒死也要追随！于是跳起身来急急取过书桌上先祖玉峰公的《行实》一卷，交给杨妾藏在身上，并命令她说：“如果你们能活命，拿着这书去见我宋家人，就说我死了！生死就此诀别！”这时，友人向远他来了，带着宋之绳逃走浣花庵，由四川籍僧人友苍给他剃发。同在这里削发的有方

坦庵学士、张金吾先生、蒋瑶星户部，四个人相视而泣，伤心不已。

次日，李张官兵四处张榜捉拿崇祯朝官员，宋之绳几人哭泣不敢出声。过一会儿，有班役传话说：“贼军并不是针对下官，各位都可以回去了。”大家都说：“这是狡黠欺诈也！要人人自己出来，则全部擒捉起来！”果然，不出三天，崇祯官员朝士全部被捕，宋之绳亦在其中。二十五日，两个李兵押解宋之绳、姚若侯、赵前辈等五人，走到乾石桥，突然命令大家坐下。赵对宋言：“我们要死别也！但临难要从容不迫！”三人可谓殊途同归，于是大家袒胸相视，互书姓名于胸，以便家人能寻到尸体。赵前辈有笔在袖，正在寻找水研笔，兵士又用刀相挟而行。三人各自分开。

宋之绳被押至阜成门一间土室关起来。同囚一室的是王慧生中翰，有四个兵士围守，凶狠脏垢而不可近。关了四天，也不见有头目来审，看守的兵士稍有松懈。宋之绳假装上厕所，来到院中的辘轳架井旁，俯身一看水很深，便急不可耐地望东叩拜宫阙，望南叩拜亲人，仓皇踊身而投井，一心想快点死，猛力往下坠——口鼻里进水呛得要命，接着耳朵进水好像有声音在瓮中，一声巨响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投井是在午后，等宋之绳醒来，已是掌灯时分了。只见自己躺在炕上，边上围着一群兵士，恶狠狠地围着他，说：“我们好意相待不杀你，你倒反而要杀我一窝铺啊！”原来宋之绳投井时，水激有声，正好有一士兵牵马在院外，听到声音有疑，急呼同伙到井边，已不见人影，只见一件衣服两只鞋子在地上。一兵取来梯子，用绳子系好斜放到井中，离水面尺许，兵顺梯入井，宋之绳突然浮了上来！士兵急忙去抓头但顶上无发，抓不住！于是又放绳下来，结住他的双臂，上面的人一起拉了上去。此刻的宋之绳已口眼紧闭，不省人事，兵士将他倒置地上，先吐水后出血，背到室中手脚僵硬，直到晚上人才苏醒，而士兵责骂声不绝于耳。这时，王中翰在边上估计人危险了。宋之绳醒后说：“我只求一死！你们救我出井不让去死，为什么要辱骂呢？”兵说：“你死了不足惜，我一窝铺怎么办？”原来，一窝铺是十个士兵，一个头目。如看守一个人，让其逃走或死亡，一窝皆要获罪。这夜，兵士看管更加严厉了，天蒙亮，他们就去报告宋之绳寻死的情况。宋心想，这下可以一了百了矣！不曾想到的是，那头目听到他不愿投井而又是个穷人时，竟下令放他走！但当他要走时又叫他回来，那长官说：“你先坐我家宅之

中!”于是二个士兵挟掖着他到一处空房里。已有一老翁先在那里,询问一下才知道是大司农傅东渤。傅公见到之绳十分惊喜,安慰他说:“这是那头目的旁舍也,他先捉我,但说不杀老人,命我住在这里。你怎么会来此的呢?”宋之绳告诉傅发生的一切。傅公说:“从此我们或许会有逃脱的机会,但只能听天由命了!”

休息了十余天,那长官突然叫宋之绳出去,对他说:“我之所以仍留你们,恐怕你们一出去被别的营所抓去,现在没事了,可以回去了!”原来,李军开始慌张撤退,因东方有急而自图救援了。宋之绳回到家中,关门闭户躲了十几天,而李自成部下又窜回城中,抢掠居民,敲门砸窗声四处响起。他只得和吏部的吴震九潜藏在崇国寺三天,吴此时也披着袈裟了。到三十号,李部火焚宫阙及各衙门,然后撤走。五月初一,宋之绳和吴震九各归寓所,住了十几天,带着家口出城郭。十五日到了通州,坐船南下。沿途盗贼群聚,一天要遇十多次警报。一行人垢衣跣足,十分狼狈,方坦庵、林任先、杨纫林、杨冰如、史南湘诸君,情况都差不多。

路上走了三个月,才渡长江。宋之绳没有回老家,到建平(郎溪)山中居住很长一段时间。后父宋劼督师芜莱,顺便归里,他才回到溧阳过年。

三

春天,送走父亲,宋之绳又到山中居住三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时,马阮主事南方,大兴冤狱,杀害无辜。有一叫周昌晋的,揭发宋之绳“从贼漏网”,阮大铖恫吓宋劼,要他带儿子归案。宋劼回答:“我儿削发自全,耳清目明!”不理阮那一套。阮大铖怀恨在心,加上孔昭和宋之绳有前嫌,伙同周昌晋一起诬陷诋毁,要捉拿之绳。

恰逢江南沦陷,宋之绳赶紧避难深山,由建平到宜兴,绕道入广德,到姐家夏氏居栖。这时,土匪四起,他又逃到孝丰之泽边村,村上人都姓潘,虽不认识宋,却毅然收留他,住在龙坞山庄,虽饥寒不免,但潘姓人对他安慰倍至。这年秋天,溧阳南山大乱,宋妾杨氏和母亲、姑姑住在山里,被箭射伤至死。之绳听到消息,写文章遥酹杨氏:“吾难友也!自事余,惟食贫作苦,故心哀焉!”

龙坞山到泽边村有三里地,山阶曲折险峻,危峰高磴,与世隔绝。颓败的土墙内有古屋三间,整天不见一人经过此地。陪同宋之绳的有学生孙中怀、邵心甫,还有一个童仆。夏叔和兄弟们常来慰问,山下潘姓村民时常送粮上来,得以

饱腹。环山三十余里，都有土匪，独泽边一村耕读照常，之绳得以安顿。有通消息，依靠建平的僧人戒月。冬天十月，张夫人病，父亲来信让归，宋之绳离山而返。

丁亥年春，宋之绳赴扬州、泰州访友，又到南京与石社的旧友相聚。八月，父亲宋劫去世，如园又遭盗贼光顾。他居住溧阳城中，与吴颖、彭旭、李长公、钱士伟、唐明猷等人吟咏交往。过一年己丑，重访杭州，严氏兄弟已在乱世中逝去两个，唯与子问话旧，涕零不辍。五月弟絢去世，之绳病在虎丘，不能回家治丧。十月，大母张夫人又去世。

宋之绳在自传年谱最后写道：“不孝绳生三十八年矣！前此大病不死！为贼执赴市戮不死！赴井不死！归途迂回土寇锋镝中三千里不死！奸人含沙颛速不死！避山中死虎、死寇、死饥时时死，不死！既历险艰苟全性命，乃三年之内怙恃靡瞻，雁行永断，一身百戚，天意可知，不必忧能伤人！此子恐非永年物矣！虑一旦沦歿，有怀未宣，故含哀苦次，略记生平，质言不饰，概言不详，粗举大端，以公知我继此而犹存，则编年不妨再续，若其歿也，生前墓碑此足述矣！己丑十月廿三夜孤哀绳自跋。”

这像是作者的“绝命书”，又像“墓志铭”。历经万难，躲过百死，苟全性命，在三年内亲人又一个个雁行远去，一身百悲。他忧虑的不是多难，而是万一死后自己身世经历没有人知道，从此可能永远担上“从贼贰臣”的失节之过！所以，刚刚三十八岁的人，说起了“断头话”，记下了“编年事”。

荣登榜眼，侍奉皇帝，这可谓士子的人生之巅。遭遇乱世，颠沛流离，这又是文人的苦痛悲哀。欲死不成，苟活无趣，从峰顶跌落谷底，巨大的反差扭曲了人生的轨迹。宋之绳的几个“不死”，读来令人胆寒心痛！三十八岁，人生的黄金季节啊！

四

宋之绳的自谱写至己丑，但人生并没结束。

他儿子宋圃(震升)在跋里写道：“呜呼痛哉！此先君子自谱其年也，而遂搁笔也。忆尔时先君子居张太夫人丧，每于寒风吹柩，残月催钟，时命我执烛侍，握管疾书至回环身世艰苦危疑之际，辄复投笔浩叹！嗟乎！我将弱冠犹不识父意

之悲也。迨夫事与心违，病由感集，则已丑之后之所以不再谱也。丁未迄己酉，痼疾沉绵，我辈尝以续编为请，先君子曰：休矣！吾不任笔墨矣。汝辈复不文，其以托诸及门乎？呜呼！先君子岂果不任笔墨哉？此其意良苦矣！”

这段话，道出了宋之绳写年谱的苦衷。后面出仕清廷，他搁笔不肯再写，为何？总觉得“贰臣”不光彩啊！个中苦酸，从康熙年间同邑眷弟施闰章和门生太仓周肇写的跋记里，我们可了解一二。

清世祖登基，下诏让大家举荐隐逸人士，陈名夏等人再三劝宋之绳出来做官，他总是以病疾推辞再三。后来迫不得已，才赴京城，路上船行了半年。到了朝廷，清廷让他官复原职，任皇帝的侍从讲筵，天天陪着清帝。按理这对他是莫大恩赐了，但宋之绳“意常不自得，又不能以病免，浮沉久之”。心里的疙瘩解不开，陪侍新帝也不开心。

丁酉年，他主持顺天乡试，因同考官违法，世祖帝怒，祸及之绳，后查下来他没有问题，得免株连。辛丑年，宋之绳任南昌参议，他“清节自励，官廨萧然如僧舍”，“以廨舍为林藪，以吏人为海鸥鸟矣！视事罢则焚香把卷，数与余酒坐言田园。余赠诗曰：不觉头俱白，相看说故园。盖实录也。”（周肇《跋》）在南昌为官，他没带妻妾陪同，仅随身带了一只竹箱而已。后因病痛难忍，辞职回家，连路费都没着落。

宋之绳解官归田，如愿以偿，常与吴颖作诗互咏。但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斯人已去，斯文长留。宋之绳和陈名夏两人，虽贵为榜眼探花，又是联姻亲家，但一个因病先逝，郁郁不得志；一个因官惹祸，丢掉了脑袋。早知如此，还不如稼稻穡麦，种菜事蔬，安稳在溧阳东门外的家园里喝喝茶，写写诗，当个普通的小农民，不也优哉乐哉？

世事难料，人心不测。守田园之野则思荣华富贵，居高官厚禄则念桑田菜畦，何有足时？

宋之绳和《载石堂尺牋》

载石堂是宋家花园“如园”的一所厅堂。为纪念宋臣熙自粤返乡、载石压仓而筑。《载石堂尺牋》是宋之绳与亲友书信往还的集子。

宋之绳门生周肇《跋》言：“公生平较勘经史，丹黄钩贯，具有渊旨，不下数百卷。学者有所请益，不自秘惜，率以相授。在馆阁时制诰诏册诸文不存，稿所著惟书牋最多，亦最自喜。雅妙隽逸，在苏黄之间。所为诗规模剑南，时自出机杼，渊永新秀，无凡语。其种树灌园、田间往还诸疏，及闲居兴感诸咏，尤公所注意者也。”

宋之绳有《柴雪诗钞》六百首，另有《国雅集》，但他偏喜尺牋，其中尤以田园疏咏为好。

对于甲申之变，宋之绳投井未死，活着却有切肤之痛：“自甲申以后，此身苟活，原不算得是个人！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自家憎嫌，自家苦恼，何人知道？此即至亲骨肉，难以相告！”（《寄金母舅》）“不孝绳患难余生，君亲两负，置身天壤，无颜自存！”“仰悉空山道履，苦节能贞，行路难，无家欢！盖老师均伤之，不孝绳所用饮泣相思，无由告语，而茕茕荼毒，自顾多哀，粘壁枯蜗，摧霜腐草，唯有抚心悲咽！”（《复丁墨岩》）

生不如死的苦楚，扞心自责的悲哀，跃然纸上。

对于同道盟友，宋之绳言辞坦露心扉，情真意切：“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若为弟预道者，夜月虎丘，正令我终身怀想耳！”（《答彭云客》）“一月以来，弟魂魄离舍，已如行尸。到南见报，始得再苏矣。弟今年已四十，老年兄转眼亦五十，即使两人俱百年，亦止能集聚其半耳！那堪相忆之苦？弟意在早图相机，故乡风物犹可徜徉，老年兄或不责为发狂也。”（《与某同年》）“弟以腐草，得拂春风，八年契阔之怀，慰藉欢忭，非可言喻！”（《寄白东谷》）“暮春集聚，骨肉蔼然。教之诲之，饮之

食之，在兄无所不周，顾受者倦而施则无穷，此谊真镌肌难喻耳！”（《与九畹兄》）“两接手翰，情意殷隆。年社翁不遗朽断，此谊乃古人所少！读大刻，如《秋风赋》之高朗，萧森兴怀；《六代二友说》之和平忠厚，逼入昌黎。文章道义，备见其全。”（《寄陆处实》）“弟废锢乡村，无从得达，然此心萦系不可言也！忆昔杯酒笑谈，靡问晨夕，舟中马上，接肘连袂，何分尔我？而一经睽隔，渺矣山河，能无望烟树而兴思乎？”（《寄杨五爷》）

辞官还乡，宋之绳一心躬耕，播种灌园，自食其力。孰料天不顺意，旱灾凶悍，民不聊生。可怜一介榜眼，沦为耕夫，为田事而发愁，为收成而操心。即使如此，他还不忘向乡藉官员申诉，反映灾情。

“称贷无门，然后归。归时犹冀农事可望，不意自夏入秋，更无雨泽，焦枯流烁之状，四境所同。至不肖乃若有倍惨者，躬耕可为，而不可为，奈何！奈何！仰食之辈不能减一人，而有一人则有一人之怨望。歌利王割截肢体，亦不能饱无数饿鬼。救荒无策，共贫无人，自尔以来惟独坐忧烦，遂百病俱作。”（《与家右之》）

出外借钱没着落，就指望田间收成了。谁知道天旱无雨，惨了！躬耕可为，要天下雨不可为！家中吃饭的人一个不少，救荒之策没办法，只能独自发愁忧烦，所以百病齐发！苦哇！

“暮春奉别，遂复新秋。奇暑奇凶，民命如线。弟惟闭门深念，以循待毙之分。”（《与黄石公》）

“家乡存饥，死徙将尽，控告无路，切身之痛也！盟兄居都下，应念里闾。公郎来自能切切道之，留意救此一方。弟所百拜而恳者矣。”（《寄吴见末》）

“盖吾邑去岁奇荒，孑遗无几。倘非署公如水之清，如母之慈，照烛其隐，噢咻其生，里老子弟何以得留余喘？”（《为张署公寄陈百史》）

带信或寄信给京城为官的吴颖、陈名夏，反映溧阳旱灾之重，控告无门，百姓逃荒，民命如线，心情之急迫，言辞之恳切，尽在信中。

文赋书法，宋之绳之长也。耕地收种，宋之绳之短也。即使为农，他也自得其乐，虽然有点无奈，但无憾。

“月初多居小园，目睹荆芜，更无禾黍，因思自食其力。为躬耕计，园东有地一亩，向来种花红，因以风露不透，频年不实，斫斫之种桑。此法莫详于湖州兄，千万弃一日工，为我细问种法，大抵一亩可种若干株？买价若何？于何地买？何时种？

不嫌琐碎示之。若得秾阴有日，与兄植杖盘桓其下，亦是佳事！”（《寄夏竹孙》）

花红，溧阳佳果也！据说原产苏州，盛产溧阳，现已稀有。宋之绳要砍果种桑，一连发问，一窍不通，书生之憨态可掬！桑未种，却又遥想树大成荫了，真正文人之态之思之貌也！

“日率童奴刈草锄麦，浚渠编篱，以此自试，期于渐近自然，故黧黑形容，不堪复对人世。”（《复张瑶星》）“弟一意躬耕，浇菜刈草，日率童奴从事，野田风日之中，亦是一乐！年兄何不一帆暂过，与匡山、赤豹同来，藉草看我畦塍间功课乎！”（《与萧伯闇》）“今年屡空，所望在明岁二麦。弟自种得十一亩，皆青青可观矣。忍饥而耕，顷复自笑：人孽气未断！为此口腹，而终日手足不停，疲倦欲死！不知者，以为此世俗营营产世者流；其似知而不知者，以为犹愈于丧心涂面，而肯自食其力。然在学道人视之，则俱属多事。由此观之，毕竟是学问不到，乃为有身所累。惭愧！奈何？”（《寄孙鲁望》）

稼穡稻黍，挖渠编篱，田野之风，自有乐趣。饿肚种田，指望收成，还要邀友来看田间功课。手脚不停，累得要命，还要顾及书生面子。信牍读来饶有趣味，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弟自秋入冬，寂寂野外，耕田凿井，以度荒年。齑粥并日，未尝不佳。自计生年，四十有一。自仙佛而外，上而王侯将相，无其福，作剧贼，无其才，卑而为乞、为偷，无其志。然而一生所尝辛酸寒饿备矣！荣华鼎盛之事，耳之所闻、目之所见、书史之所传，虽不躬亲之，亦知其概矣！营营终日，却是何为？何物是死时将得去？岂不淡煞笑煞？”（《与于御君》）

人生的感悟，言之绝矣！书生的悲哀，参之深矣！

宋之绳《载石堂尺牍》共收书信 152 札，其中杨冰如五札，陈名夏四札。因关系非同，给这两人之信言语直率，较少客套。而给陈名夏的信札，因是亲家，文字更为真切。

《寄陈百史》云：

“三月十九日荷年嫂夫人雅意，已令二儿完姻。弟之惭愧万状，非可以言语形容。而嫂夫人宏度相涵，感愧愈觉无地！贤女端慧俭勤，寒门何修得此！饮泉饭黍，必推本源，知相公家教之足为世楷也！”

去岁督台公祖推相公之分，滥举弩劣，本拟勉自驱策以赴盛典，奈风痹夙症

自去冬增剧，左股至踝如割如锥，惟僵坐少缓。行一步，立一睫，顷筋骨间若掣裂之者，必伛倮蹲伏而后略定。夜卧少熟，挛痛亦然。”

前段叙两家联姻，自家寒门，愧对亲家。又赞新妇(儿媳)贤慧，相公教育有方。后段叙自己风痹病加剧，坐卧难安，所以没能去京城参加亲翁就职盛典。

“值此奇荒，菽麦不饱，安望珍药？唯有委之于命！如此奄奄之状，与死为邻。顷督台复以檄催，业具呈本邑，求其以病状转申，若可支持而自沦弃，其非人乎？邑友相视者，弟语之曰：病人不能北首！”

“托病观望，为有故也。弟若丝毫萌念，是其心已死，不必复来幽谴。自揣行尸木偶，万不能与朝参末班！与其支离狼狽受过，还不如皈命投诚求和，公力为之地，使安残喘于田野床箦间，则拜赐等于生我！”“唯相公哀怜而曲全之，不胜叩头祈祷！至如穷饿困苦，此前生已定之事，弟今安之，相公从此亦不必俯念弟于数千里之外也。百拜缄书，万祈垂照死罪！”

此前段讲家乡奇荒，吃不饱肚，无从医药，只能听天由命。虽然陈名夏一遍遍发来公文催促宋之绳入新朝为官，但重病之躯，不能从命。第二段表述心成死灰，痹病缠身，恳求陈放他一马，等于生他！富贵在天，贫贱由命，相公从此不必挂念我了！从这口吻里我们可以读出，宋之绳当时因病守节，不肯出仕新朝。对陈名夏的好意并不十分领情，有“饿死不食清朝粟”的味道。

在另一封给陈名夏的信札中，宋之绳详叙病痛之苦：“相公所以悲悯开示于弟者，言皆切至。弟即狂悖冥顽，宁不知自惜性命？并仰体相公曲为生全之念，奈肢体痛楚，时时发作，其对人谓日日卧不能起，此不可以欺相公。然十日之内必七八日委顿，两髀至踵，两肩至腕，每一处肿痛，则遍身寒热，昼不得食，夜不得寐，一身之内，无可告语。随身指使一二蠢童，其妇人则皆有夫者，应对俄顷，复飞扬而逝。以风湿之故，医谓不宜在卑渗处卧起，故独居一楼。或日中痿惫，或夜分痛号，常至寂无人答，如此已一年。虽安之，然苦亦备矣。七年前南中娶一妾，不欲以病人误彼，前年遣还其父。今遂孑然，儿子五人，最幼者同在荒园。病中无聊，一为相公述之，以见即无小草之缘，亦思奋飞汗漫，以破寂寥，而患苦缠绵，势不自由，今所恃以保延余喘者，相公应不待弟辞之罄也。翘望依依，楮不得尽。”

这应是宋之绳南归后的书信，风湿病应为痛风，痛不欲生，无人照应，实在是可怜可悲！陈名夏虽一再召他进京为官，但身体实不如人意。从此信看，面对亲家

的“开示”，他也思“奋飞”，想出仕做点事情了，事实上此后病情稍缓，他赴京就任旧官，又升江西参议，清廷还是看重他的。无奈病魔缠身，告病还家，三个月就去世了。

宋之绳的书信，颇重亲情。在《寄杨五爷》一札中，他写道：“幼女流离北地，三兄费尽心力护持而南，此种情谊古人亦不多见！弟之感荷，难以言述。念其母从弟五年，备尝艰苦。殒身锋镝，哀愴难名。得此息犹存，将来可以延一脉，则天之不负苦人也。”这个女儿，应是和杨妾所生，杨氏和母姑死于溧阳南山土匪之手，剩了一脉血肉，宋之绳感谢离乱中散失的女儿，得到杨五爷的照应。

在《示子圃》一札中，充满着生活情趣。“我无内助，所以下人乱做，毫无经理。汝辈有家之始，可对汝妇说，宜明我意，莫厌叨叨！古人云：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牵木断，水滴石穿。又云：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后将安继。总之，妇道以早起为主，凡事自家经眼，则不大差矣。汝妇是明白人，只我为汝辈虑，不得不多说几番也。从明日起，当令汝妇支持。”作为一名慈父，对新婚儿子，宋之绳要开导一番。一些话又不能直接和儿媳讲，要早起，要节俭，要支持公公的意见。史夫人死后，宋之绳未续弦，所以新媳要会打理家事家务。看来自古至今，传统不变，父爱无改。

宋氏后人杭州宋一洲曾在拍卖会上看到宋之绳扇面一帧，书法率性老到，不愧翰林手笔，现已罕见了。其时，宋之绳书画就负盛名，索者络绎，这在他的书信中常有记叙。“三诗录扇头，请教！”（《复汤调甫》）“凉履兰扇附往，诸未一。”（《寄严之问》）“率书申谢，兼附扇刻呈教老先生。”（《寄张蘧林》）“粗扇一持，奉见远意，殊可笑也。”（《寄陆处实》）“附闻以慰，一衣十扇，聊见远怀，诸未一。”（《寄杨五爷》）“制扇一握，寄供挥翰，小华墨一挺，藏之有年，并奉馆阁之用。”（《寄吴见未》）秀才人情，薄纸一张，文人交往，友情为重。

《载石堂尺牋》是宋之绳去世十年后，由其三子宋淮（苍舒）收辑遗稿而成。它是我们研究宋之绳生平的一手史料，也是了解明末清初社会更替情况的珍贵实录，更是研究溧阳地方历史文化的宝贵文献。

让我们以宋之绳《与蔡靖公》作为本文结语吧！此全信仅二十一字，为最短，精彩！“村庄蒿满，破壁尘多。得大笔，遂觉焕若神明，何快如之！”

宋晋和《水流云在馆诗钞》

母亲在东门外崇庄巷的新庄小学，当了一辈子的老师。

新庄小学，设在原宋家祠堂。小时随母读书，记得校门口有两个硕大的石墩，中间圆空可以插旗杆，后来才知这叫“雀杆”，是旧时考取功名名人用来宣示成绩用的，譬如举人之类，也类似进士牌坊。

那时的学校还有一间走马楼，门窗上都刻着精美的木雕，方正的罗砖铺地。稚童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古老的回廊，传出去很远。校后有大讲堂，堂里有戏台，粗大的木柱，高高的椽顶，使大堂看起来宽敞高深。礼堂前有两棵老桂花树，枝繁叶茂，绿荫华盖。办公室前左右花坛上也有两棵老桂树，虬劲苍老，横卧似龙。每到丹桂飘香季节，几里路外可闻馨香，沁人心脾。

校园西边，有坟莹一冢，高土垒壅，常常是顽童们玩耍的“滑滑梯”。孩子们都知道，这叫“宋晋坟”。“文革”期间，楼拆堂毁，宋晋的坟被掘，据说里面有扇一把、玉一件，并无厚物。随葬品上缴到县里，宋晋的那套官服，被近村一位疯子穿着舞行，孰料风一吹，呼啦，化为乌有。

往事如流水。清光绪《溧阳续志》记载：“户部侍郎宋晋墓，在宋公祠西坟园。”宋国祥、宋国瑞为双胞胎兄弟，都是母亲学生，家院门额上有“耕读传家”砖刻，估计是祖上所遗。国瑞曾说，他们是宋晋后人，那年平坟掘尸，他去拾骨，宋晋骸如婴儿，估计在世时个头不高。

一日，母亲家来一位不速之客，称宋国庆，乃国瑞、国祥之弟，言有事请教“邓老师”。他道出一段揪心往事，情真意切。在“文革”破四旧热浪中，一切“封资修”的东西都要毁之而快，作为一名热血红卫兵，他主动烧毁了两幅先祖宋晋之像。此像不是用水墨油彩画成，而是用小米粒般大的油彩漆片粘贴而成，立体感强，栩栩如生。他后来寻遍各大博物馆，都没有找到类似的绘画。

宋国庆已从大庆油田退休，在上海女儿家安度晚年。但每当想起年少时的冲动无知、不谙世事，他就痛心难忍、愧疚不已，感觉对不起列祖列宗。怎样来弥补自己的过错过失呢？他想到家中还仅存两卷先祖之书，乃《水流云在馆诗钞》（一册1—3卷，二册4—6卷），“无页码无标点”，“文革”后还曾作为“文物”参加过县里的展览。“我想把书重印出来，供有识之士重读研究，邓老师，你看行不行？”他交给我两本诗钞的复印件。我后把此集交给杭州宋一洲，他是宋氏后人，也是崇庄巷一脉，是《宋氏宗谱》的研究者。

没过多久，宋国庆来电，诗集重印好了，让我取书。拿到重印《水流云在馆诗钞》，见其“说明”称：“复（重）印《水流云在馆诗钞》，仅为纪念先祖，抢救祖先遗传佳作，以为后人详读，学习研究。部分印书分发先祖后辈、宋氏族裔，也望有关学术院校、博物馆收藏。”“翻印出版《水流云在馆诗钞》不是商业行为，而是表达对离世先人的一种亲情、思念和敬仰，凝聚一种宗亲情结，表达一种感恩、敬祖的意识。”

我拿到书后，分送溧阳档案馆、溧阳图书馆存档保存，展览借阅。另有文史诗词爱好者，亦赠之。

抚书忆昔，曾在宋晋先生的墓冢上玩过“滑梯”。那黄土坚硬发亮，不知踏过多少学童的稚履。后生不知这坟里躺着的是何等人物！

宋晋，字锡蕃，号雪帆，生于嘉庆壬午（1802）十二月二十六日，死于同治甲戌（1874）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三岁。

宋晋的父亲宋绪，六岁失怙，祖母“尽质所有以营丧事，昼夜力女红，以十指以出”。宋绪年刚弱冠，家益不支，母亲只得带宋绪到儿女亲家长沙彭畅园家去学刑名之学，以谋生路。宋绪“生而颖异，六岁就塾，不烦督课，课书目数行下，年十二《十三经》俱成诵。复手录《国策》、‘史汉’以授”。宋绪“日治公牍，夜究经史，操行危厉，遇事一归平恕，于是当道翕然称之。聘问者，踵相接也”。彭畅园“甚喜”宋绪，作媒史贻直的侄曾孙女，让其娶之。“后从彭芝音先生游，博览群书，苦心研究，大殖，制艺之外，尽阅诸经义疏，解诂精确，骈文诗赋，浸淫汉魏，一时曹偶无不敛手称服，文誉大起！嗣应济宁孙寄圃节相之聘命。”（《行述》）

宋晋“幼随其父乡贤公绪客诸侯”，“孙寄圃相国玉庭，深器之，时相国诸子均

随侍官舍读书，晋与同学，于文章经济，靡不窥见本源，又饷闻相国与赠公商榷诸大政，尤熟于经世之务，故其生平果敏沉挚，磊落光明”。（光绪《溧阳县志》）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宋晋考中二甲第二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丙午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大考阅卷官。后又任光禄寺卿、礼部左侍郎。宋晋为官，“通籍后由翰林洊历清班，累迁至户部侍郎，先后分校顺天，典试中州，得人称盛。历充阅卷大臣、文渊阁校理、功臣官纂修、翰林院撰文、实录馆总纂、咸安宫总裁、国史馆副总裁”（光绪《溧阳县志》）。虽然仕途并不顺畅，常为琐事所累，但他“平居谦益，平易近人。若无可无不可，至众议盈庭是非所在，则毅然不为苟同。事无纤巨，凡有关国计民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连劾不职封疆及贻误军务大臣，极陈各省蹂躏情形，并筹划攻巢机宜，一岁之中，章数十上”。这样一位“犟头”，能不得罪人？大吏大臣，连连弹劾，但宋晋又是位“尽职莫如荐贤”之人，一时的名公巨卿都由他“平日以应求贤诏”推举，如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漕运总督袁某、安徽巡抚、湖北巡抚、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晚清这么多重臣名将，都由宋晋一人先后举荐，得到重用嘉纳。

宋晋历官礼、吏、户、工诸部，常常受命危难之中，督乡团、查鸦片、修陵寝、葬文宗、守仓场……为“三朝知遇”，鞠躬尽瘁。而大清随八国联军之入侵，已是气数殆尽，行将就木，凭他努力，也是枉然！在任吏部右侍郎时，他又兼户部左侍郎。“户部尤专司天下出纳，目击度支浩繁，综核每岁入不敷出，昕夕焦思，欲酌济盈虚，主持大计，以图报称任，事凡九阅月，而心血亦从此耗矣。”（《行述》）他又好急人所急：“吾生平喜为人谋，急人之急，不遗余力。”任团防大臣，“每丙夜进封事，文宗揽衣视奏，称善者再，翌日交廷臣议，多报可”。（光绪《溧阳县志》）

宋晋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天子震悼”，封妻荫子。其事迹入《国史馆列传》。为臣，他受尽委曲，吃尽苦头，是位良臣。

《水流云在馆诗钞》是光绪丙戌（1886年）刊印的。

序者王景澄写道：“公受累朝知遇，其经济大略施诸政事，不仅以词章显，即以诗而论，亦标新立异，自成一家人。”“公之胞弟叔元观察哀辑遗稿，分为数卷，曰《武林集》，曰《担囊集》，曰《濂上集》（前后），曰《胸阳集》，曰《春明集》，曰《潞河

集》，曰《沈阳集》，共古今体诗数百首。其间情随境迁，境随时变，叙家世、纪游历、观山水、酬朋好，舟车所至，宦迹所经，欣戚悲愉，悉寄之于诗。虽清奇浓淡，不拘一格，而总归于性情之正。方诸古人，当与李杜诸名公颉颃，岂寻常吟风弄月之士所能拟议哉！”

诗钞分八集，如王序所言，大致为山水纪游、舟车宦迹、朋好酬唱之作。愚不懂诗，但对宋公之《濼上集》却情有独钟，只因那份厚实的乡情，浓得化不开。

宋晋对家乡的景物十分熟稔，描述中饱含深情。“偶然涉目总关情，十里郊原宿雨情。”（《有感》）“此邦合号水云乡，是处山村近泽梁。沙岸过时蒿脚软，麦芒疏处豆花香。地偏无碍茶多种，书永才知事渐忙。谷口相招清话久，归途回首好山光。”（《舟行偶作》）

水邦云乡，吾家溧阳。泽梁边上茭蒿白未熟，麦田疏处蚕豆花香，荒坡僻地上多种茶树，山村谷口桑麻话长。诗作平易上口，贴近生活原味。

“携锄挈网唤归休，十里平畴积藹浮。村树月移疏见屋，麦田风起夜生秋。市深灯火通人语，地僻濼梁即胜游。笋味才过蚕豆上，为农心事傲封侯。”（《初夏城外步月》）

月移树屋，平畴起霭，麦田生风，灯火人语。才尝过南山的春笋，又吃到初夏的嫩蚕豆。为官封侯的生涯，还不如携锄挈网的耕渔。这正如诗人在另一首诗中所言：“万户侯不如千亩竹，万顷田不如一椽屋。人生富贵等浮云，手把奇书还自读。”（《题杨钟英课子图遗照》）

宋晋的田园诗清新自如，清白如流，清爽怡人，其中不乏佳句。“柴门积雨长莓苔，桑鸠频呼转费猜。”（《春暮归自越中》）“溪头杂树飞红雨，屋角垂杨补绿云。”“灌罢园疏怯晓寒，加餐野味数登盘。烹茶酿酒俱粗解，识字耕田亦大难。”“乡村小住翻如客，却话生涯类转蓬。”（均同前题）“麦穗时拂衣，竹箨不碍步。登舟放归棹，背山屡回顾。”（《即事》）“碧梧阴里晓风凉，竹簟横陈觅睡乡。午梦觉来消渴甚，西瓜好为沁诗肠。浓桑堤畔竹箫声，牛背横骑得得行。”（《消暑词》）这些诗句都以家乡为背景，写出了江南风物的韵趣特色。

写亲情如乡情，宋晋也是高手。

“定省高堂乐自如，傍无杂事称闲居。书频寄父称无恙，食每呼孙问有余。”（《春暮归自越中》）父母对子孙的牵挂在心，只能频寄书信回家说在外一切都好。

回家省亲父母高兴自如，每到吃饭一直叫孙儿“多吃点！多吃点哈！”这份亲情，发自肺腑，仿佛可见饭桌上祖父母给孙儿夹菜的场景。

《随家大人抵里省亲》：“白首歌行役，区区将母情。传书闻警病，飞棹迫宵征。相见喜无恙，前言犹胆惊。呼孙依父坐，絮语忘樵更。”母亲思念儿孙，为见一面谎称“病重”，诗人飞舟日夜赶返，心急如焚，但见面知老人家身体无恙，转急为喜犹惊魂未定。赶紧叫过孙子挨着父亲坐着，亲切地问长嘘短，绵绵不断，都忘了天色已是几更了！此情此景，此诗此句，感人至深。亲情胜过万金和万户侯啊！

《闺人生女诗以慰之》：“得来豚犬徒供笑，妄想麒麟我亦愁。努力劝卿加餐饭，未妨生女胜生男。”这是一首十分有趣的诗作。本想生个儿子却生了个女儿，看来要被人笑话了。夫人可能恨自己不争气，而茶饭不思，诗人劝慰产妇：身体要紧，多吃饭菜！谁说生女不如男呢？女儿胜过男孩！对一个“妄想麒麟”的父亲来讲，“未妨”劝妻，未免勉强！在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盛行的旧时，生儿生女能一样吗？诗人把生了女儿后的亲情和心态，写得活灵活现，让人忍俊不禁。

《溧阳古诗选》曾选宋晋诗《除夕前二日同狄荆门乘雪至仙人山，口占六首》，是他写家乡景物的代表作。“偶谢尘缘访竹庵，四山飞雪泻寒潭。”“信有人间行路难，每于捷径见争端。”“地偏始觉佛天尊，静里参禅悟六根。”“话到芋香茶渐熟，半天风雪不关门。”“雪压群峰破睡容，浑疑仙境绝人踪。”仙人山是西郊胜景，有碧露禅师创建的崇隆寺。诗后自注：“将借寺舍读书，”看来是寻到了一个清静之处。

宋晋还有《元日登文昌阁拈香，口占二律》：“高阁登临兴倍清，烟霞都助目纵横。五更灯火连城曙，四面溪山积雪明。”新年一大早登文昌阁，给文曲星烧香，可以一览古城风貌。“心香岂为微名祝，每忆征书迫远征。”诗人来拈香并不为功名，想起乡试、会试一到，又要远离家乡，心中恋恋不舍。

宋晋还想去千华寺一游：“石径月来窥竹籊，雪溪冰裂涌莲花。明朝共出南城去，为访山僧试煮茶。”（《东缪南卿游千华寺》）他大概听到友人讲了千华寺僧降猿伏虎、池涌冰莲的故事，也想去喝茶谈天。

宋晋有《过东坡先生洗研遗迹》一诗，是这样写的：“飞语伤人最不平，崖州远谪叹浮生。剧怜洗研归来日，犹有文章感圣明。”诗是写苏轼一生遭遇，但在诗注

里有“在仙人山”之说,让人眼睛一亮。东坡买田丁蜀,归老毗陵(常州),没见有来溧阳的记载。沧屿园有“谢朓洗研池”,志上有记,而“东坡洗研池”在宋晋诗里言之凿凿,注明地点,难道是东榆西樺,搞错了人头?而作为学富五车的进士郎来讲,不应张冠李戴的呀?惜无旁据可证。

王景澄言晋公诗“与李杜诸名公颉颃”,但宋晋自己诗言:“贤如靖节心能远,诗到宣城首共低。今古依然同宇宙,才名宛似隔云泥。”他是很谦和的。沉浮宦海,耗心官场,屡贬屡褒,殚心竭虑,这是宋晋的一生,“舍南舍北两三家,路绕池塘一径斜”。“客来妇为开新酿,坐久童稚扫落花”。也许这般有景有情、有趣有味的田园生活,才应是人们向往的。

一本诗集,引出一段往事。不堪回首,迎来古诗重印。宋国庆是位有心人,也是位有良心之人。他请人对先祖遗诗进行了译注校点,拿出微薄的养老金重新刊印,化解了心中积郁的块垒。正如王景澄《序》所云:“读其诗,益仰慕其人,犹得于篇章间瞻其风概,不可谓非幸事也!”

水流云在。水是水,流非流,云是云,在不在?昔人已去,今人常思:我怎样面对古人?不去面对古人,何谈未来!

宋晋先贤,爬过您的坟,失礼!胡评您的诗,失礼!顿首。

胥渚狄氏诗书传

清初思想家刘献廷说：“东吴犹重世家。宜兴推徐、吴、曹、万，溧阳推彭、马、史、狄，皆数百年旧家也。”城南彭家、甓桥马家、埭头史家、胥渚狄家、歌岐周家，溧阳这五大姓氏，诗书传家，晴耕雨读，世家巨族，人才辈出。

狄平子曾言：“余家自宋高宗南渡时，始祖讳英公，以国戚护驾南迁，遂由卫辉改籍溧阳。”

狄英，溧阳狄氏之祖。嘉庆《溧阳县志》第十三卷“始迁”中记载：“狄英，字天秀，天水人，随宋高宗南渡。举贤方正，任江浙省副使，开府溧阳，致仕，遂居胥渚里，今狄氏祖也。”

溧阳姓氏，大都由南宋迁徙而来。相对于东汉始迁的史氏来说，狄氏尚属“年轻”。

胥渚，地处溧阳城邑西北，乃水陆交通便捷之地。胥渚、胥泊，都是狄氏聚居之所，地名应与伍子胥有关。子胥亡楚奔吴，过昭关，昼伏夜行，翻乌鸦（伍员）山，乞食濑水史贞女，吹箫吴市，在溧阳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和地名掌故。胥渚，应为子胥泊舟之地。

过去胥渚村进城，须经双桥，沿河便是码头街。码头街是城里商铺集聚的繁华之地，因水运码头密集而得名，而这条狭长繁忙街巷的铺店产业，大都姓“狄”。

嘉庆县志“纪闻”记载：“邑西北里许有双桥，两水之胜，村居如画，明唐寅尝作横幅，妙绝于时。狄氏世居其地，曰：东野。”“双桥如虹”为溧阳八景之一，笔者小时候无数次行走双桥，长条麻磨石，铁栏杆上有铁狮子，两桥中间有歇脚凉亭，桥墩为石砌尖刀型，以便洪水流泄。我们看到的双桥，应为明清修缮后的遗物了。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胥渚桥，石拱如月，石阶浸绿，每次坐船

经过，都要仰望桥中那龙头探珠的石雕。双桥、胥渚桥都拆除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湮没于历史的潮流之中。

明朝溧阳才子马一龙，曾为狄氏族谱作序曰：“野郊外之地曰东主邑也，狄子居焉。而建之堂，堂野也，乡人称之为东野，居士名堂也。狄，邑巨姓也；东野，狄之良也，故有学士之章焉。”“其风有莘之风也，其象传岩之象也，贤人之所居也。将及而瞩之，青山在屋，流水横门，花木阴森，鸢飞鱼跃，闻宫钟之声，陟独乐之境，恍乎翠华云壁之乡。一龙曰：堂在斯，狄氏其昌乎！《易》曰：同人于野，吉。《传》曰：谋于野，则获。狄子之谓也。其昌不在其身，在其子孙。”（《溧阳县志·纪闻》）

马一龙从胥渚之风水环境，论述狄氏书香文脉之渊源，独乐之境，云壁之乡，子孙必昌。马一龙与胥渚狄斯彬为同好，交谊深厚，在携“二三子”一同村游后，写下了自己的感慨。笔者亦曾携江如福、吕正立二三子同游胥渚村，见东野堂大厅尚存，已属奇迹。在村头惊见一屋角有长条石，上有马一龙小楷，精绝罕见，惜碎成几截。询问村民，言余物已填墙基，乃狄斯彬牌坊之遗。我急告村书记，赶紧收之东野堂啊！孰料，过时询问，言已失窃！不知去向。令人捶胸顿足，悔恨多言也！

王日曾在《古照堂诗集·传》中言：“先世南宋时狄英，由贤良方正仕至江浙副使，遂家溧阳，厥后以隐德不仕者数代。”朝代更替，科举不兴，使注重气节的世族汉人崇尚隐逸，不愿出仕。而溧阳狄氏真正兴起则在明时。狄进云：“余宗先世以诗书起家，有明之季，人才蔚然。”

明嘉靖年间，溧阳狄氏八世祖狄钦赠奉政大夫，九世祖狄泮任太医院判，说明狄氏由此已走向政界宫廷。

九世祖狄冲，字仲虚，号春溪，嘉靖二年（1523）进士，任江西清江知县，因考绩最佳，升任贵州独山知州。到任后迁移州的治所于白岩山，他笑言：“我做秀山时，梦中得玉石章一枚，上刻白岩山人，看来这次迁移是天意了！”于是他就将此作为别号。在管理苗民头领闹事过程中，他不管朝廷抚臣自治杀戮的命令，单独乘马带两个老兵深入苗区，平息了事端。后调任武定、瑞州，打击地方豪强，剿灭盗匪，使地方得以安宁。升任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他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后患病死于任所，家中只有半月俸钱，连后事都是工部尚书何诏给他

料理。狄冲著有诗集《春溪诗集》四卷，死后奉祀乡贤祠内。

十世祖狄斯彬，字文仲，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行人，升为御史。他曾与同乡同科进士马从谦(马一龙叔)一起弹劾宦官杜泰贪赃，反被诬为诽谤。马从谦廷杖致死，狄斯彬贬谪边境任宣武县典史，不久提升为南京兵部主事。时值倭寇犯南京，狄斯彬向上面呈方略，长江中下游没有发生恐慌。地方不法之徒横行劫掠，慑于狄斯彬的威信，消踪敛迹。后升为本省参议，辞职返乡，编写《山居野志》，实为县志的底本。他还写有《赋役》一书，斥责苛税，减轻了全县人民的赋税。他著有《皇明律诗类钞》二十四卷，《地理正传》八卷、《稽命集》十卷。有趣的是，狄斯彬还被写进了《金瓶梅》一书，称其“为人刚且方，不要钱，问事胡突，人都号他做狄混。”此虽是艺术与史实虚构而成，但足见狄斯彬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狄同燿，斯彬子，字宿甫，嘉靖辛酉(1561)举人。他居家尽孝，出仕则为民请命，减赈办学，明察善断，淳谨称职，政绩斐然。在知交河县时，惩办拿土地送给皇亲的人，收回土地三万多亩，减除贫民十之六七赋税。鼓励农民努力耕作，多栽桑、柳、枣、栗等树木；在各地办社学，有时亲自跑到学校给学生讲述经义。一年多后，治理走上轨道，政绩显著，被调往河间县，又改任大城县，治理更加努力施行，一年多后死于任上。

狄臣华，字君实，同燿之子。万历二十二年举人，在乡至孝，对祖父斯彬遗妾以礼相待；对老师赠物赡养。授湖州教官，升广西崇善知县，该县军饷甚重，百姓不堪重负，臣华改为折色，省去费用上万两。在任上倡导赈饥，平反冤狱，兴建学校，讲授艺经。升为代理左州，实行救荒防盗，治理见效。后因母病不能返家探视，忧思成疾，死于任所。

十四祖狄云鼎，有《古照堂诗集》传世，高风亮节，诗文扬名。

狄云鼎有二子，长子桃，次子李。孙狄凌云被赠为徵仕郎内阁中书。曾孙狄以清，秀才，乡试第一解元，博学而有文才，有《砚楼诗稿》二卷，重孝行，有义行。

狄继绅，字阆仙，别号雪衿、以清子。乾隆十八年顺天解元，授内阁中书。他秉性清正，不随俗流，不求仕进，辞职归来，主讲芜湖书院。不久返乡，在小楼上读书写诗，罗列图书史册，“几研可鉴，久之不起”，年六十九卒。他在京师时，曾借住法源寺，寺中有海棠、丁香盛开，他置酒招客，与好友诗人董潮、王文治、管千

珍等在花前饮酒作诗。后来，众人散去离京，狄继绅请长假，徒步跟随一二布衣饮。不久，自己辞职。有老友书至，偶一作答而已。狄继绅有《选斋诗钞》，失传，县志选有《屏风山寺》、《辩泉》、《过沧屿园》等八首，其诗淡泊安雅，远怀孤寄，“沉绵慷慨于言外见之，如其为人”。

狄敬，字文止，号陶邻，顺治六年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赴陕西夏阳巡视河道，适遇太行山东发生骚乱，他抵御安抚，切合时机，十分得当。战争过后旱灾疫病发生，他力求免去捐税，赈济灾民，活人无数。不久到湖广巡视学政，肃清弊端。升任潼关参议，抚兵息民，他曾对人言：“为政在于亲行，不欺心。”后辞职回家，择地建宗祠，族中无力婚葬者，赠予财物。他平生无书不读，精通《尚书》，曾著《衍义》，得到学者尊奉。陕西、湖广的名宦祠和本县乡贤祠都祭祀他。

狄亿，字立人，号向涛，狄敬子。幼时聪慧，过目不忘，善于诗书，成年时全国闻名。康熙十三年进士，在翰林院任官时，高丽使者慕其名声，希望见一面，狄亿拒绝私下交往，只给其看一幅肖像，使者恭敬地题诗两首，叹息而去。期满散馆，改调他职，他托词辞职，回家在一座小楼上坐卧四十年，不与官府来往。他学识丰富，才能高超，却甘愿隐居，性格高致。

狄字，字苍成，聪明过人，专心经史，十七岁考中秀才，康熙三十八年拔贡顺天乡试，考取举人。授徐沟知县，尚未到任就去世。为人孝友，平易近人，救济弟弟遗孤，接济贫困夫妻。著有《禹贡注》、《猎古斋稿》。

狄颺，字霁岩，乾隆七年进士，教习咸安官，遗有《霁岩诗稿》。狄兆奎，乾隆四十八年举人，擅长言辞，著有《蔚斋集》。

狄宽(1711—1791)，字思载，乾隆十年进士，历知凤阳、望江等县，升凤阳府水利清军同知。专心研究图籍，尤熟史事，续编《史学提要》。

狄尚綱，字文伯，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清史稿》有传。他为官关心民生，兴修水利，做了许多好事。

狄梦松，字文涛，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历任编修、左中允、山西正主考、湖南学政、贵州粮储道。袁枚《随园诗话》收有其诗句。

狄学耕(1820—1899)，狄继绅孙，字曼农，别号稼生，一号叔子。其年十七补博士弟子员，同治初年(1862)宦游江西，任都昌、南丰、赣州等地知县。敏而工

濂水钩沉

文,善画山水,名闻同光年间。嗜吟咏,善交游,富收藏。他著有《种石轩诗》,“生平酷嗜书画,耄而不倦,藏弄元明国朝人遗册极多”。

明代文徵明以为:“诗书之深,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簪缨世家也好,诗书传家也好,要有多少代人的培育扶植,要有“上代传下世”的风气熏陶。洪亮吉提出望族的三个标准:以功德显,以文章著,以孝友称。溧阳狄氏科举兴族,诗文传家,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文化家族,也是地方姓氏望族。

狄云鼎和《古照堂诗集》

《古照堂诗集》是溧阳图书馆馆藏少有的几套古籍之一。

诗集由作者狄云鼎“八世孙狄葆贤(平子)敬题”，两卷中共收诗作三百八十余首。庚申(1860)之劫，溧阳因“当金陵之冲，被祸颇烈，文物荡然”，狄氏家藏历代诗文遗稿仅《古照堂诗集》得以幸免。直至己巳(1929)冬由其九世孙狄维恂以钞本寄给狄平子，有正书局于次年五月得以刊印。狄平子在《跋》中言：“先严在日，每以古照堂诗版无存，引为深憾。弱冠侍侧屡亲闻之，厥后三十余年勤求不获。己巳冬日，从姪维恂忽以钞本寄沪，焚香拜读，悲喜交拜，亟付剞劂以永泽。庚午五月刊竣，敬书数语，用志颠末。”

狄云鼎是位明末遗民，入清后绝意仕进，民族气节使其隐逸乡间，以读书作诗自遣。《溧阳县志》仅以“孝行”记其德行：“狄云鼎，字符甲。性恬退，不乐荣进。而奉母至孝，承颜顺志三十年如一日，母歿丧葬尽礼。季弟少亡，妇孀无嗣，云鼎为立嗣，并析产与之。”寥寥数语，以孝行掩其诗名。

溧阳进士吴颖作《诗集叙》曰：“吾姻翁良瞻狄子，孝友纯笃，敦诗书，饬名检。既工举子业，得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凡古文辞莫不阅中肆外，而尤善诗。每于登临眺览、酬答友朋，或花晨月夕、击钵飞觞，兴会所至，辄挥毫吐词，亹亹不倦。至于海桑播迁、生死流离之际，尤极缠绵悱恻，如见其低徊往复、不能自己之衷。读之一唱三叹，殆最得性情之正，而不失风雅遗意者。”吴颖与狄云鼎是亲家，也是明末清初的溧阳名士文人，他对其诗集的评论，切中要旨。明清鼎革之际，满汉文化冲撞，许多溧阳的高士宁愿终老乡间，不与满廷合作。在“海桑播迁，生死流离”之际，只能低回悱恻，借诗寓情抒怀了。

王日曾，字伟度，溧阳人，康熙庚戌(1670)进士，官江西督粮参政。他在狄云鼎《传》中，叙述了其生平：“时父讳承心，亦早亡。公母孙氏，寡居茹苦，督课甚

严。公率弟云锦、云灿读书，夜分不辍，孙孺人篝灯同坐，不稍假词色，公知母孺人意，益自刻砺。年二十游县庠，与族遊圣同有名诸生间，既又与吾溧名宿吴蚩雪、陈芝山、芮岩尹联社西园，课艺谈诗，互相敬乐。嗣是才望日隆，一时名流上元顾与治、京江潘木公、高淳邢孟贞诸君结社三山，邀公主盟坛坵。公亦乐以文章表见于世，益复根柢经史，阐扬礼义，日手古人书画，夜晦明奉，为诗友一艺之成，必求有合，而不出之苟且，故自时艺以及诗古文辞，悉为一时所推重。”父亲早亡，母督学甚严，狄云鼎年方二十就有名于县诸生间，而又与吴颖、陈名夏、芮城等结社西园，切磋诗艺。当时各地名流慕其才名，推举他为三山社盟主，狄云鼎的诗文书画又为一时推重，可见他绝非等闲之辈，前程似锦如花。岂料天有不测风云：“而运际沧桑，地遭兵燹，先生壮志，遂置之荒烟蔓草间矣。”时势造英雄，时事毁才俊，朝代的更迭，让狄云鼎、芮岩尹诸君，埋在历史的荒烟蔓草之中。

狄云鼎恃才傲世，面对清朝的拉拢，不屑一顾：“庙堂需才，檄催赴部，郡县敦迫公委曲，坚辞不就。至康熙庚申，邑令芦院裴公，高其行，宾于乡，届期称疾未赴。因署其庐曰：白云秋月。亦见其品之高洁，可望而不可即也。”

清咸丰元年，狄云鼎十九世孙狄进，在《古照堂诗集》后作跋云：“良瞻公生于万历二十五年，与其社友岩尹芮先生同庚，蚩雪吴先生同案。两先生俱工诗，而芮先生更以气节掩其诗名，公慕芮诗，尤重芮志，故芮不以诗著，而公亦不以诗著。余少时闻公之能诗，未获读公之诗也。辛亥清和公五世孙南溪公示余，余浣薇庄诵，反复再三，觉颀顽岩尹，概于诗见其志，不可泯也。”

作为前明遗民，狄云鼎清高自律，气节高洁，对一些应变趋势、投清变节之人，充满鄙夷。其《雪中桃花叹》中有句云：“小桃得意春风暖，昨夜花开光宛宛。自谓梅花太瘦生，红罗堆里红情满。”“孤篁压倒尚含翠，小红竟作泥中灰。此时坠落岂天意，贞脆由来各自材。”“红颜妩妩本非贞，到底梅花称老质。寒欺冷压终自香，雪里作花复作实。始知草木有本性，桃叶桃根岂终极。”诗句借桃骂红，借梅贬桃，借篁赞节，借寒称香。对趋炎附势之“春暖小桃”，贬之坠作泥中灰，始终不如草木有本性之坚守。在另一首《新样妆》里，他借有名素娥的青楼女子，比作那些变节投机之人：“倾国倾城人共许，新样梳妆咸自多。明眸皓齿嫁何人，高格风流人自呵。为怜时世追心赏，手绾双髻心揣摩。落梅坠马慷来妆，不忍见此心如何。终留古道照颜色，窥镜照艳影婆娑。”

作为读书人，报国之志难以实现，心中的惆怅愤懑常会溢于笔端。狄云鼎壮志难酬、寄情山水的诗句，读来鼻酸。“浮云西北是神州，独立高歌不散愁。婀娜兰苕当砌绿，飘零杜若野塘秋。风烟满眼频看镜，身世关心悔下楼。石濂溪头新涨阔，欲携蓑笠趁间鸥。”（《南楼》）“吁嗟我生年半百，头发种种欲变白。自谓痴顽欲胜人，到老贫穷但有骨。一生衣食不自知，呼癸呼庚遭强活。手持一卷向青天，短歌微吟意悄然。”（《吁嗟行》）

吴颖在《古照堂诗集叙》中言：“夫诗以言情也。情本于性，必有肫挚笃斐之忱，而后发为温厚和平之什。故天子采风问俗，大夫赋诗见志，咏歌虽细，足征性情心术之微焉。”

狄云鼎虽一介书生，却也心慕刺秦荆轲之壮烈，“为国报仇并雪耻”，“白衣冠色壮山河”。虽然谋刺未成，倒也名垂汗青：“羽声慷慨人千里，命轻义重将如何。秦庭一声虹贯日，秦王胆寒殿洒血。事虽不立志辛酸，至今易水悲风结。”他倾慕命轻义重、视死如归的荆轲，壮志如易水东逝，悲风怒号，但气贯日月，声震朝野。诗人之性情志气，见于咏歌之中。

吴颖“叙”曰：“良瞻博观纵览于诸家诗，无不诵习，而尤得于栗里、少陵二集，平居尝谓予曰：栗里诗而节者也，少陵诗而忠者也。言为心声，人未有品未端而吐辞能合于道者。”

狄云鼎与溧阳诗友的答酬诗，篇章不少，表现出深厚的乡谊友情。

吴颖是狄云鼎姻亲，两人酬唱往来较多。“寻幽出西郭，径转凤凰桥。柳锁莺啼堇，堂开燕语娇。埧麓寻旧盟，金石契新招。德醉忘归路，行行问晚樵。”（《西园访吴见末、马万长晤芜阴张子来初》）诗写得生动有趣，由胥渚至西园，曲径途经凤凰古桥，一路柳莺娇燕，春风扑面。寻找昔日社坛盟友，约定金石之契，老友新朋相见，难免饮酒作诗，只是醉得忘了回家的路，只能边走边问晚归的樵夫了。诗中马万长，为马世俊兄马世杰。《酬吴潮州蚩雪原韵》中有“旷代才华问孰过，宏词才读起沉疴。花前丽句樽中得，马上新诗月下驮”之句；《叠韵赠吴见末》：“世事看来都是幻，漳河黄土魏时铜。”“习习轻风来自东，清时寒食冷场中。”吴母做寿，他又有《寿吴母八十二首》：“黄山飞雪松枝老，葭律吹灰日影长。闲苑板舆儿作赋，高门小至弟传觞。”

芮岩尹是和狄云鼎同庚、同气、同好、同隐的好友，诗集中有《春日郊游怀芮

子岩尹》：“曲岸传觞吾独咏，高情看竹许谁同？幽人一望无寻处，明灭孤烟万壑中。”诗人看竹，气节高雅，曲岸独咏，觅无知音，高人何处？万壑孤烟。春日郊游之时，怀念同好，孤独之情尽现诗中。在《立秋日芮岩尹家游圣小酌分韵口号二首》中，诗人写出了两人相处的欢悦：“老去未册沽酒兴，暑余还觅作诗缘。当杯不与公荣饮，下榻常为孺子悬。更喜双清初月上，草堂相对共谈元。”“棋枰零落茶声旧，笔砚荒凉秋思迟。好检吟怀听蟋蟀，今宵风月要君诗。”沽酒作诗，月下论古，下棋喝茶，秋虫私语，吟怀索诗，文人高士苦中作乐之趣，跃然纸上。在《春夜对酒邀岩尹作》诗中，他有“阮籍本非途上士，王戎岂是竹林人。狂歌白眼非无为，闲盼青天独有神”之句，大有抗清复明之志。在那首《答岩尹作》中，狄云鼎将隐士的感叹伤怀，写得真切动人：“愁心感故乡，独立望斜阳。试问同袍者，春来梦几场？”

彭旦兮也是溧阳反清复明的文士，与狄云鼎过往从密。《同李小有过彭旦兮园亭看菊》：“琴消陶令酒，书薄右军鹅。谈笑忘归去，斜阳淡薜萝。”《春日旦兮招集吴见末、钱盟可、杨元修、炼师进石和尚及予斋中茗饮，限韵赋诗二首》：“诗朋禅侣陌西东，此日梅花臭相同。”《和旦兮西宫春怨三首》：“风辇不来人自立，双双燕子坐雕梁。”“春风挟瑟洞门开，明月无声照绿苔。”“玉殿深沉宫漏催，春宵无梦望初回。”

狄云鼎绝意仕进，甘守清贫，幽居乡村，对家乡的景物多有描写。吴颖说他“独杜门寂处，养母教子，时以其情之不能自己者，发之于诗。陶与杜之襟怀既兼而有之，宜其诗之淡简恬愉者，有得于陶；凝炼精深者，有得于杜。盖其志，既非芬华之所能动，则其诗自非世俗之所能道也”。

狄云鼎笔下的溧阳景物有沧屿园：“院锁侵扉雨，凄凉掠树风。”“舫屋半临流水曲，虚亭独倚钓鱼矶。”“为问凤凰池上客，锦帆游处几回题？”

湖荡庵：“行行登觉路，天地一浮杯。”“树里波声远，东湖一半开。”

文昌阁：“高阁风来一面迎，白云溪畔草还生”“虚槛朝云窥玉座，上方金磬散孤城。”

双桥庵：“双桥虹影三川汇，十笏斋房一径开。”

屏风山寺：“城南车马晓阗阗，共访招提渡小川。梵磬欲霏林外雨，禅龕谁觉梦中缘。”

夏林园：“晴日疏林笼薄烟，宜山亭馆湛池边。”

广法寺：“琤琮流水韵如弦，一路行吟到古禅。山色入楼看佛地，经声满院落花天。”

菱山：“徯徊重访三生石，怅望还瞻五里桥。”

西寺：“寻诗更过碧云僧，路入寒林竹覆藤。”

大坏山：“万顷湖光散夕岚，雕栏曲径影澄潭。”“禅房寂寂茶烟冷，独夜题诗月一龛。”

在《古照堂诗集》中，农村田园诗般的吟哦最为生动。

村居

倏忽阴晴变，村居读楚骚；
故人虚厚禄，寒夜忆终袍。
对镜心仍在，看云意自高；
掩关无客到，一任长蓬蒿。

村居(二)

十亩溪边宅，萧萧少俗喧；
春洲满芦叶，平野接山根。
种柳垂门碧，栽桑带屋暄；
不才甘养拙，独坐更何言。

秋日村居

小桥飞木叶，秋水映柴门；
稻熟疏篱外，舟闲弱柳根。
鸡豚多社酒，婚嫁只邻村；
相见无苛礼，农桑好细论。

狄云鼎好梅，常以梅花自许。诗集中以咏梅为最：《梅花，用柳州韵二首》、《老梅二首》、《梅花落》、《梅花咏答邢孟贞二首》、《梅花艳句》、《红梅二首》、

濼水钩沉

《梅花水仙二盆》、《斋中咏梅》、《雨中观梅》、《雨后对残梅二首》、《和唐人咏梅九首》、《梅》、《梅花引》、《听雪楼梅花二首》、《遥咏听雪楼梅花二绝》、《听雪楼梅花五绝》。梅花凌雪，冰清玉洁，也是诗人的象征。正如王日曾在跋中所言：“至于功名之会，趋焉若惊，谁复砥砺廉隅、甘为恬退者哉？吾故于公之为人，详著其孝友之诚，出处之义，以垂休无穷。百世之下，闻其风者，庶几顽廉懦立也？”

让我们用狄云鼎《漫兴》诗作为结束语吧：“身世梅花里，徜徉又一年。闲心随懒性，愁事作诗缘。竹屋清灯夜，茶香白屋篇。何须山鬼愁，一笑自悠然。”

袁枚与溧阳

南京宁海路南师大校园，岗峦起伏，草木茂盛，被称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这座由美国人墨菲设计的中国古典式园林建筑，原金陵女子学院，由庚子赔款建造。校园正门，有大石上书“随园”两字，这原是何家园林？

与随园有缘。我大舅曾供职南师大，原家住五台山腰，后造屋五台山下，拆迁至南阴阳营。这里留下我童年许多的记忆。随园，随家仓，包括南京大学校区，清代都应属一个人的私家园林，他叫袁枚。

风流才子，诗人大家、仓山居士、随园先生……袁枚充满传奇才情的一生，使他享有许多的名衔称号。那么他与溧阳有什么瓜葛因缘呢？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钱塘(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改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七年后辞官，居于江宁(今南京)小仓山随园，他是诗坛主持，为性灵派领袖。卜居随园，他筑园林精舍，闭门潜心著作，有《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随园尺牋》、《随园随笔》和《子不语》等十多种。

袁枚与溧阳关系密切，这里有他的恩师，他的亲家，他的诗友，他的诗书。

一、袁枚与史贻直

袁枚是史贻直的学生。

史贻直，字徽弦，号铁崖。康熙三十九年三甲第一进士，年仅十九。他初授检讨之职，再任云南主考，督学广东。雍正元年(1723)升内阁学士，署两江总督，后擢升御史、巡抚、户兵两部尚书。乾隆时，他历任湖广、直隶总督，升户、兵、工、刑、吏五部尚书，九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十一年又加太子太保。袁枚诗称他为“六部尚书九州督”，史所未闻也。

清廷对史貽直十分优厚,使他一生享尽荣华富贵。乾隆二十一年(1764),他八十一岁逝世后,谥号“文靖”。

袁枚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曾从史貽直学满文,“乾隆五年,天子命刑部尚书史公教习庶吉士。枚习国书免课,而公命拟奏疏一通,褒许甚盛。嗣后趋函文,不待启辄入,得与闻本朝文献,仁庙、世庙两圣人所以致太平之隆兴,与公生平受知恩遇,谈洋洋盈耳”。“后十年枚再拜公於赐第。时公已作相,而枚起病入都。公教之曰:闻汝宰江宁有善政,诚不负所言。惜杜牧之未免风流耳,远到者宜戒也。”

袁枚在其《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中,详述了他与恩师的交往,并记载了老师的生平履历:

“公讳貽直,字敬弦,号铁厓,系出东汉溧阳壮侯。世居湖埭里,徙夏庄。父夔,官宫詹,以文学清望伏海内。公贵,赠如公官。公十岁能诗,十八举京兆,十九登进士,入翰林。”在介绍了史貽直的宦迹后,他讲了年羹尧尊史并辇、凯旋进京和清世宗“昼日三接,咨询优奖”的荣耀。“公生而徇道,神识超妙,周巡六曹,出入九镇,又复六十余年。”“故公为政行己,无心宽猛,耻矜苟廉,一以持大体、安社稷为务。”接着讲史公戍兵台湾、改委本标;西安屯仓、军民受赈;平息苗乱、擒魁悉散;“督直隶半年、结事九千六百余”等政绩事迹,讲世宗赐先帝“鹅黄蟒衣、四团龙补服”之恩宠。“公清标玉立,眉目如画,举止详华,靴尘不沾。衣圭袍褶,式皆内裁。性强记,尤善清言,虽庄语危论,必多譬引,饶风趣。”早朝前,诸王贝勒、文武百官都立于宫门柳下,环听铁厓公讲“三朝旧事,耆臣言行”,“下风倾耳,闻所未闻”。

乙亥年 1755 年,史貽直因为儿子奕昂调动给巡抚鄂昌写信打招呼,被皇上劝休于家。“公出学舍后,未尝家食。至是乃得扫坟墓,到儿时钓弋处,召族人数千,分俸置酒,为二疏故事。里中负簞笠者,见公乡音如故,媻睦有加,咸匆匆奔趋,来看真宰相。”这段记叙,生动地描述了史貽直贬官返乡的情景,少小离家,没再吃过家乡饭食,没上过祖宗坟祭扫,这时终于如愿。他还是一口溧阳话,在公堂里摆酒席款待上千族人,老幼还分有红包。家乡的农夫乡亲,只是在戏台上见过宰相角色,听说史貽直回来后,都急匆匆赶来看看真宰相是个什么模样。“乃未几而天子南巡,仍召公入阁矣。”“公少时撤金莲烛成婚,中年督两江开府乡里,

晚年再宴鹿鸣琼林，周科目六十年之数。天子赐诗赞美，祝太后万寿，入九老会，图形内府。近古以来，所未有也。”

对于恩师，袁枚赞叹有加，感叹不绝。“天生公来，作百官表。表上头衔，公身可考。”他在《文渊阁大学士史公貽直》一诗中写道：“唐时显庆辂，皇宋夸物在。一凤鸣虞廷，雍容六十载。《周官》三百六，历历皆所司。唐区十五道，各各驻旌旗。开口姚元之，放手杜黄裳。瑕瑜不相掩，才力堪低昂。奏诏教翰林，我拟策一通。谓有陆贽直，而兼长沙忠。万金何足感？一言长在心。仰止《一品集》，封敖涕泪深。”据言，乾隆七年（1742），袁枚因史貽直所教满文考试不及格，被外放江南任县令。但他对史尚书的褒奖之言，一直牢记心间，所以对恩师也是充满敬仰感激。

袁枚在其《随园诗话》中，还记录了史貽直的几段轶事，生动地反映了其人其行。“卷七第九十六”条：“溧阳相公为大司寇时，奉旨教习庶吉士，到任庶常馆，而此科状元庄容可以在南书房，故不谐诸翰林来。史公怒曰：‘我二十年老南书房，不应以此给我’。将奏召之。彭芝庭侍讲为之通其意甚婉，遂为师弟如常。彭故史公本房弟子，而庄又彭公本房弟子也。庄献诗云：‘绛帐自然应侍立，蓬山未到总支吾。’”“溧阳公馆课，出《春日即事》题。同年管水初一联云：‘两三点雨逢寒食，廿四番风到杏花’。公擢为第一，同人以‘管杏花’呼之。公七十寿旦，某庶常献百韵诗。公读之，笑曰：‘把老夫做题，也还耐得百韵；可惜无一句搔痒处，都是祝嘏浮词，不敢领情。’盖公总督八省，兼顾六卿故也。记许刺史佩璜有句云：‘三朝元老裴中令，百岁诗篇卫武公。’余有句云：‘南宫六一先生座，北面三千弟子行。’俱为公所许可。”

诗话卷的四十一条云：“李桂官与毕秋帆尚书交好……毕中庚辰进士，李为购素册界乌丝，劝习殿试卷子，果大魁天下。溧阳相公，康熙前庚辰进士也，重赴樱桃之宴，闻桂郎在坐，笑曰：‘我揩老眼，要一见状元夫人’。”其风趣调侃，原形毕现，令人捧腹，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不同的史宰相。

史貽直死后，袁枚一口气写了四首《哭溧阳相公》吊唁自己的恩师。

（一）

三台星坼上公嗟，中旨遥闻恤典加。少着宫袍才出学，老依黄阁当

归家。殊恩乡里曾开府，佳话琼林再看花。六十六年享天禄，人间何处说荣华。（公溧阳人，总督两江）

（二）

相业原如海样宽，圣明时际见才难。六卿印绶身全佩，七省旌旗露未干。潞国晚年同辈少，千秋上殿小车安。（奉旨，肩輿入紫禁城）朝廷此日亡元老，华夏无人拱手看。

（三）

追随函丈爱风标，领袖神仙冠百僚。绛帐横经传六艺，秋灯感旧说三朝。清谈浏亮能霏玉，品服详华最称貂。（公裘衣六十箱）回首后堂如隔世，哀丝豪竹雨潇潇。

（四）

一见相如赋《上林》，推袁到处比南金。许为国士言犹在，不荐彤廷感更深。花落尚存含露态，山颓永断出云心。史官尽写哀荣事，那识羊昙泪满襟（诏举阳、马，公欲荐枚不果）

诗的前三首，备叙史公所享的荣华，第四首写史公对袁枚的器重，到处推荐他，但未能奏效。虽然自己“永断出云心”，但回想往事，还是泪湿衣襟。

多年后，袁枚来到溧阳夏庄，给恩师上坟。《谒史文靖公墓》：“手拱莘繁当束修，先登华屋后登丘。九原尚想师随会，一疏曾经识马周。盖代勋华云影在，满堂丝竹水声愁。知公泉下犹怜我，如此英年也白头。（公为已未馆师，乍见喜曰：“如此英年！”命拟奏疏一通，夸为第一。）

手捧野花闲草权当供奉的学费，袁枚登府拜冢给老师上坟。想起当年初见喜称英俊少年，一通奏疏夸为第一，今天先生你要可怜原谅我了，“如此英年”已是华发白头！

岁月如梭，师生情重。

二、袁枚与史奕昂

袁枚与史奕昂是儿女亲家。

史奕昂，字颀甫，史貽直的二儿子。乾隆六年副榜，一品荫庇。官至兵部右

侍郎，任拔贡朝考阅卷官，享二品衔。史公貽直子三人，长子奕簪，官翰林；次子奕昂，官广东布政使；三子奕环，官潞安知府。可谓官宦世家，簪纓显贵。袁枚的八女鹏姑嫁与奕昂之子，相与交好，常有往来。

史奕昂曾到过随园，他的《甲辰暮春访简斋太史未遇，随园留饮十二韵》诗云：

绿竹脩疏处，幽人室在焉。入门穿径曲，拾级到堂前。结构依岩壑，图书杂简编。造庐人已远，款客嫂能贤。庖室调珍味，茶铛起澹烟。洵称安乐地，最喜蔚蓝天。坐久忘喧矣，窗开更旷然。山高林郁郁，池曲水涓涓。塔影凝眸回，禽声到耳便。轩斋无俗韵，城市有林泉。济胜君犹健，年衰我自怜。此来天作合（余迎銮召对，时面奉论旨，在江宁祇候），欲去且留连。

此诗应写于乾隆四十一年左右，因为三十年史奕昂升为兵部侍郎，因言获罪，给三品衔回乡，后恢复二品官职，正在是年。亲家外出，奕昂受到亲家母的热情招待，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到随园，所以详细地描写了亲家的外景与内设。

袁枚几次赴溧探女，与姻家过往。他有诗《宿溧阳史少司马红泉书屋二十四韵》（公讳奕昂）：

小住红泉馆，分明绿野堂。姻家新里第，夫子旧宫墙。拔地烟峦起，盈阶兰芷香。半空开月榭，曲径置风廊。丛桂黄云满，修篁碧玉凉。标题多翰墨，照耀尽天章。屏列花为障，桥横石作梁。相公曾结构，司马更裁量。瑞室堪成颂，龙门孰敢望！我来春正好，公喜远迎将。面目争先认，鬓眉各老苍。卅年如倾刻，万事感沧桑。何幸丝萝托，兼夸宅相良。（外孙生才八日）诸郎都好我，排日各持觞。酒器三江俸，图书七宝装。（银杯镌“两江清俸”，架上御赐《图书集成》）当官谈旧政，余事问家常。作楷争磨墨，题笺屡启箱。更深僮半睡，坐久夜全忘。风蜡烧方炽，骊歌唱又忙。衰年心耿耿，后会事茫茫。门外帆将挂，闺中话正长。女儿留阿父，一日抵千霜。

此诗写得朗朗上口，情真意切，实有白乐天之风格。袁枚不愧为诗坛盟主，描景状物信手拈来，写人叙事由感而发。性灵之作，实情真也。

红泉书屋，在溧阳夏庄，原由史貽直叔父静海县令史普建造，后由史南琛商议转让给堂兄史奕昂。史貽直乙亥南归，常在祖居“聚顺堂”侧的园中休息。乾隆四十一年，史奕昂遇赦任广东布政史，星夜赶往京城朝见皇上。此时正遇文靖公八十寿辰，设宴庆贺，他在父亲身边十天，史貽直非常高兴修整红泉书屋，详细地提出了具体计划。癸未冬，史貽直去世，史奕昂在营造墓地之时，用半年时间打理书屋修缮，并将原“秋树亭”改为“白云亭”，以表对父亲的纪念。

红泉书屋选秀才朱彝尊题匾，华亭王鸿绪题亭。“丛桂轩”南面建厅事三间，两旁挂上雍正皇帝赐给相国的对联：“坐石吟新月，临流纳晚凉。”门头上是乾隆皇帝赐的“绿野颐和”匾额，室中藏有乾隆皇帝赐给的《古今图书集成》万卷。这就是袁枚诗中详叙的书屋场景及经历。

袁枚与奕昂，三十年未相聚，“面目争先认，须眉各老苍”。外甥生下才八天，袁枚应是来“张监生”（看婴儿）的，史家一家人都十分热情好客，排着队请他吃饭饮酒。争着磨墨请他题书写字。相聚苦短，行船挂帆，女儿舍不得老父速归，再三挽留，一日千霜。

袁枚做客红泉，在其《诗话》卷六第三十七条中曾记一事：“余，故史文靖公门生，而其子抑堂少司马，则儿女亲家也。壬寅二月，访抑堂于溧阳，席间出文靖公《玉堂归娶图》，命题。画美少年骑马行，亲迎礼于扬州许氏。事在康熙庚辰，公才十九岁，至今八十余年矣。抑堂笑谓余曰：‘亲家当日亦系翰林归娶，何不归娶人题《归娶图》乎？’”史图上多前辈题诗，袁枚题四绝，为《题史氏家藏文靖公〈玉堂归娶图〉》：

相公归娶大罗天，此事依稀八十年。赖有丹青作图画，荣华留与世间传。

相见宫花插满头，珠帘十里下扬州。少年恃有天人貌，不控香车控紫骝。（卷中画公骑马）

卷中诸老尽题诗，（谓徐葆光、郭元舒诸先生）读罢风前有所思。六部尚书八州督，尔时花烛可先知？

愧作彭宣拜后堂，绝无衣钵继安昌。算来只有归迎事，曾学黄梁梦一场。（枚乞假归娶时，公为代奏）

看到相公的归娶图，袁枚想起当时“如此英年”，入选翰林，告假归娶，还是老相公代为请的假。酒酣耳热，亲家打趣要他这个“归娶人”题老师的《归娶图》，于是画卷上又多了四绝。

江宁、溧阳，现在一日数往，昔时交通不便，往来不易。袁枚风雅，想将前辈名流的笔墨集观成册，于是致信亲家，索取史家遗作。史奕昂回信，有《寄简斋亲家书》如下：

久未接随园音问，正深驰想。小春十日，忽捧朵云，大慰远念。弟春夏患疟，百事俱废。八月又因遣嫁幼女，忙冗殊甚。目下为七十五岁所举小儿种花，屏却一切酬应。此固老年自取之累，亲家闻之，未免笑我多事也。亲家林下康强，集观前辈名流翰墨，极属风雅。但先祖笔墨，竟无存者。先君书法超群，不肯作字，仅存家信数封，珍藏以示孙子，未便赠人。止有先曾祖太史公书法一册，割爱奉上。又先太岳陈文简公书册一本，世南先生书一本，一并奉寄。非如老亲家之风雅知音，不轻与也。再，弟家居虽老，工课不敢稍懈。附寄临《乐毅论》、《兰亭》二种，《送行诗》一首呈教。诗、字皆不足观。以年近八旬，不用眼镜，而临此小楷，未必不与七八龄童子又观场一次相似也，特此敬复。

简斋公索史氏书作，奕昂竟没有家父文靖公之书法，仅有家信，于是将祖传的书册和虞世南的书册奉上，真是天大面子！非老亲家，不轻与也！同时寄上的，还有侍郎公亲书的小楷，老眼昏花，不易哉！可见两亲翁之交情。

岁月如流水，逝者如斯夫。匆匆十四年过后，袁枚又一次来到溧阳，看望女儿和外孙。他写了《到溧阳看鹏姑，再宿红泉书屋作》：

十四年前宿婿乡，余温犹在旧眠床。入门最是伤心处，不见欢迎白侍郎。

侍郎闲话每三更，头触屏风耳尚听。今日萧萧白杨下，可怜莺语尚丁宁。

欲看园林似旧无，女儿指引外孙扶。桃花对我嫣然笑，似识前来一老夫。

诸郎排日饮衰翁，盘盏银光射眼浓。上有两江清俸字，分明即是孔愷钟。（文靖公曾署两江总督）

鹏姑才似女相如，健妇持家绰有余。记否当年灯火夜，替爷数典替抄书？

安世侯传二百春，更闻天上降麒麟。翩翩喜见佳公子，三试都为第一人。（谓元圃世讲子锡畴新采芹。）

衰年临别意绸缪，借看图书又上楼。绝是飞鸿怜爪迹，闲花野花尚勾留。

三宿红泉酒未消，春风吹雨湿征袍。回头尚有关心事，未奠乔公一太牢。（未扫文靖公墓，此心缺然。）

袁枚隔了十四年再来红泉书屋，最伤心的是亲家奕昂已去，不能来迎接他了。旧床留余温，闲话到三更，新莺鸣老柳，物是人已非。园林依旧，上次来外孙才八天，现在已会扶着他逛园了。史家人一如溧阳人的好客，大家仍排队请吃饭。家里的餐具都是史宰相留下的旧物，上面还印刻着“两江清俸”的字样。八女鹏姑忙里忙外，已是操持家务的一把好手，但她在灯火下帮爹爹翻典抄书的情景，仿佛昨日。史家是簪缨世家，科举场上总有才俊折桂。转眼又到了分别的时候，连闲花野草都牵衣绊脚挽留老客。不忍让亲友看到惜别的浊泪，借口看书又上了楼台。短短的三夜，酒醒何处，春风春雨吹湿了离别的衣衫。诗人心中还记挂着一件憾事，没能去文靖公恩师的坟上祭拜一番。

袁枚这七律八首依然是语言简白，情浓意浓。可见作诗为文，重在为情，无病呻吟的造作，卖弄学问的据典，都不及发自肺腑的亲情友情的抒发，来得感人。

史奕昂去世后，袁枚为亲翁作传《少司马抑堂公传》：

公讳奕昂，字颀甫，号抑堂。相国文靖公仲子，由一品荫生中式，乾隆六年辛酉科顺天副贡，历任刑部山西司员外郎，迁湖广司郎，中出为

山东兖沂曹道,调运河兵备道。

乾隆十六年黄河决豫州,自阳武建瓴而下,穿张秋之挂剑台,势汹汹不止。议者或欲塞台口、或欲拍麦田下流。公曰:上源不断而徒治下流,无益也。为今计宜联豫东两省为一局,先塞阳武咽喉,乃从事于东弃故渚,开新河筑两堤如翼,遇水北行,则河力自退。如其策,水患果除。会有旨命协办南河石料济宁,乏船,借粮艘之停运者载石以往,他省协济之石未到,而东省葺事独先,高堰工程得以保固。

十九年甘省准噶尔不靖,调署甘肃布政使,办理军需。旧例兵四名经过处,供穀烝一席,健儿呼呶,州县苦之。公奏官兵原有口粮按站支給,请飭州县改所供为牛羊乾脯,俾兵且食且走,免稽行程。上可其奏,自泾至肃共有二十余站、尖宿五十余处,大兵所过井邑肃然。皋兰令奉军府严檄,限五日解送羊毛织袋三千,煌遽不知所出。公命各典舖将质押民间粮食袋,借出记数,事毕发还。不三日得袋四千余,供用不乏。时皋兰、平秦等属,米价腾涌,并酌量平糶,借给籽种。其各台车骡马匹,兵过日即以次卷撤,归给商农、民大和悦。

二十年补福建按察史,履任后捕获巨盗刘良福、游艳艳等数十百辈,盗风敛戢。南州积贼范某,素有拳勇,历任不能擒。公访知贼颇孝,乃拘其母以招之,范果出请死,许以自新,俾缚群党以赎,范涕泣叩头去,迨任满不再犯法。闽省哨船隘甚,仅容兵五六名,不足以资巡緝,因援照粤东之例,设大哨船,增拨弁兵,按月轮巡,以靖盗原。奏入,奉旨交部议。叙有邱廷华者,奸同舍生至死,事属暗昧,诬引他人,狱已具矣。公钩距得实,力争于大府省,释无辜而置廷华於法。又以文庙彝器多所残缺,爰照式增修,并绘舞佾歌诗图,令诸生肄业一时称复古焉。

二十五年擢广东布政使,尝谓藩司之责,首先用人,乃严察府厅州县官,其首领佐杂,亦就所见知,区为四等以闻。钦奉朱批,折留览。粤中塘汎之在水口者,每多侵剥,即改用青砖亦易坍塌,奏请各用本地土石砌筑,价廉工省,易於责成。又省城之南建有南海神庙,岁时致祭典极隆,但由省至庙必经海程七八十里,每遇巨风间作,往返难以刻期。访闻有陆路可通,惟一二倾仄处宜勘估修治,且便于居民之赴省佣趁者。折上,奉朱批:好!具见留心,着照所议行。二十七年奏,向例官员

具结，请封于祖母与母，下声注“系室女，并无再醮违碍”等语，“再醮”二字，人子所不忍言，既称某人室女，以礼聘娶，则非再醮，已属显然，请节去此二字。得旨嘉奖。

粤有棘闱湫隘，容人不多，公捐廉增广号舍，应试者骤益四五百人。琼州举人某请咨会议，吏因需索不遂，故损原详用印处，稟请驳回。独念琼海往还不易，批令完补以藩印盖之，吏争非旧例，更名他吏办给。次日出行，有持香跪道者，询知即请咨举人，并廉得前吏胁索状，人服其明。

二十八年，丁父忧。服阙入都，擢兵部右侍郎，充拔贡朝考阅卷官，昼日三接，圣眷益隆。公亦以家世大臣，遇事感激，多所建白，不避嫌怨，同官忌之，构以蜚语。蒙恩赏给三品卿衔回籍。四十一年，上幸阙里，诣行在叩见，赐复二品原衔。五十六年卒，年八十，罢官后杜门欲扫，不与外事。有楼三楹，藏赐书万卷，朝夕披览。葺红泉故园，莳花种竹，啸咏其间。虽高年犹临帖作楷，神似晋唐，子孙以素纸乞画者，随意作山水与之，笔墨苍老，有题赐五孙锡年画帧诗一章云：“视息林栖无个事，闲来翰墨好相亲。尚余一事夸豪富，写得青山与后人。”以余俸葺祠宇，周族党人无间言。家居二十余年，叠次祝厘迎蹕，必蒙召问，温语从容。五十年与千叟宴，恩赐稠叠，赓歌赋诗，有“归向田园夸艾耄，纷排赐物几人肩”之句，士论荣之。

枚添叨姻谊，诸公子乞传於余，爰牖陈始末，祇以纪其行事出处，无取夸张饰色，以炫后人也。

赐进士出身翰林庶常散馆知县前江宁县题升高邮州知州世姻愚弟钱塘袁枚顿首拜撰。

袁枚为史奕昂作传，主要记叙了他的政绩，如治黄河、办石料，甘肃办军需、福建智擒盗、广东捐学舍等等，有经有历，有名有姓，有事有实，有大有小，有功有奖。史虽曾一度受圣上恩宠，但终被同官忌伤、蜚语击中，被贬乡里，于是杜门读书，莳花种竹，临帖作画，聊以度生。

袁撰史传较为平实可信，没有拔高渲染，过分粉饰。“无取夸张饰色，以炫后人也。”袁枚直白相告，直截了当，在表现出文人本真的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憨实可爱。

袁枚与溧阳，有割不断、理还乱的血缘亲情。他与史奕昂，应是超越儿女之亲之情的亲家。

三、袁枚与彭光斗

袁枚与彭光斗是诗友。

彭光斗，字贲园，号退庵，乾隆十八年(1753)选贡，二十四年顺天举人，署理福建建安知县。他博涉经史，兼擅诗词，著有《云溪草堂诗钞》九卷、《云溪草堂文钞》十六卷。晚年隐居南郊，题书斋为“小歇处”，乡饮三推大宾，享年八十六岁。他的诗对家乡溧阳山水多有描绘，足迹野旷，醉心诗赋。

袁枚与彭光斗是如何认识的呢？袁枚《诗话》“补遗卷二第四条”记叙：“溧阳彭贲园先生，素无一面，寄《云溪诗集》见示。有笔有书，亦唐亦宋，不愧作者。佳句如：《雨阻淮上》云：‘春气勒堤柳，水光团野烟。’《舟中》云：‘长河欹枕过，片月贴帆飞。’《剑津》云：‘早知神物终当化，何似丰城便水埋？’《无题》云：‘月展璧轮宜唤姐，风吹池水最干卿。’皆妙。又《接家书》云：‘有客故乡来，贻我乡里札。心怪书来迟，反复看年月。’只此二十字，写尽家书迟接之苦。先生名光斗，出仕闽中。”

袁彭两君，因诗相识，书信往来，多有唱和。

彭光斗有《寄呈简斋先生》诗：

蓬瀛仙客渺人间，小滴尘寰炼玉颜。天遣别开诗世界，公还厌话旧朝班。六朝人物东西晋，一壑云山大小山。闻道十洲游览遍，悬知归卧掩松关。

心似牟尼舌广长，仙家端爱住清凉。勾当风月排吟卷，管领湖山作道场。一岁乡人甘北面，(光斗长先生一年)十年彼美望西方。何时得放青溪棹，排闥抠衣奉瓣香。

该诗被袁枚收入《续同人集》中，另还录彭诗《寄怀》一首：“早登芸阁曳华裾，未老投林兴有余。非佛非仙宁作我，无今无古自成书。人间清福消难得，天外文心妙莫如。不见香山称教主，批风抹月尽蘧蘧。”

彭光斗不仅自己寄诗给袁枚，而且还推荐友人的佳作。《随园诗话》补遗卷八第六十一条记：“溧阳彭贲园先生，因余有《诗话》之选，寄其友京江许万扬(介

山)诗来。”

袁彭两人，诗来和往，神交已久，无缘谋面，相见恨晚。一直到彭光斗八十三岁，袁枚“急买溧阳棹”，两位好诗之人终于见了面。

袁枚《舟中寄彭贲园先生》：

彭夫子，负异才，清矐炯炯明镜揩。偶见随园诗，倾衿诵百回。仿佛任华推李白，孔融思伯喈。书来苦道愿相见，自伤衰颓愿屡乖。闻说先生八十有三岁，我当兄事何疑哉！急买溧阳棹，笑划江水开。路离君家八九里，我尚未到君先来。手扶筇竹杖，脚曳双青鞋，仙风道骨颜如孩。形病神不病，齿衰身未衰。野王二老既相遇，谁为浮丘说洪崖？欲把四十年事一口说，要将八十一家文字同编排。相约诘朝到君室，擘兰烧锦饮百杯。谁知天帝惊，有意相遮碍。道是昌黎《二鸟歌》，业已骇真宰；更有青田《二鬼行》，凭空发光怪。那堪更使文星聚，镌残造化大难耐。急命雨师风伯起波涛，淋浪格断彭衙界。只许君推袁，不许我访戴。我如南海礼佛人，一见观音不可再；君如鸡黍款茅容，枉自钦迟将客待。马行淖而蹄伤，舟冲波而帆败。此情耿耿海同深，后会茫茫年各迈。愁肠转轳轳，老泪瓢巾带。只好高歌杜甫诗，九原泉路交期在。

这首长诗，表达了袁枚对彭光斗的一片真情。两位过八老诗翁，一直书信往来相约见面，但道路苦长身体苦衰，未能如愿。在彭八十三岁之时，袁枚终于乘船由水路赴溧阳专程拜访。彭光斗知道袁枚要来，不顾体弱多病，拄着拐杖走出八九里路前往迎接。两人一见如故，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诗，像要把积蓄胸中四十多年的话和八十一家的诗论全部讲完。到彭家两人痛饮百杯，通宵达旦。谁知天帝怜才，大风大雨骤然降临，像要留住访客。两人心里很清楚，见面不易，再见更难，垂垂老矣。分别时，马伤蹄，舟败帆，都不肯前行。情深如海，年各已迈，愁肠百转，泪湿巾带。只好高歌杜甫的诗，相约黄泉之下再相会。

彭光斗有和诗，抄录如下：

先生旷代之鸿儒，九苞蕴采含智珠。弱冠名腾入中秘，翱翔兰署暨石渠。天宠奇才姑小试，俾膺民社来江湖。惠政群歌顾健康，清风不减

范莱芜。现宰官身试游戏，辞香案吏赋遂初。遥指仓山孕灵秀，急营小筑安琴书。吾爱吾庐洵乐地，山花山鸟供清娱。名齐凿齿传四海，行蜡阮屐周寰区。迄今寿考届八秩，精神不与龙马殊。试问先生何所癖，憐才爱士实若虚。苔岑异质常满座，葑菲野味充山厨。即如斗也素守拙，荆州未识徒嗟吁。辱公嗜痂频齿及，聊寄敝帚供扫除。先生不鄙情益挚，邮笺恳款手足如。古云知己胜感恩，己无足知感亦愚。只祈邂逅见一面，三生愿遂幸不孤。今春伏枕方苦疾，喜闻玉趾临蓬庐。披衣急起走迎候，握手话悵病欲舒。狂飈肆虐淫雨骤，乍逢旋散仍回车。来朝急选赐华东，长歌千字何瞿瞿！为言此别艰后会，九原相订誓不渝。读罢凄然顿掩卷，淋漓涕泪沾髭鬢。斗虽早死骨未朽，祝公百岁善保躯。

长诗前写袁枚声誉才情，写自己寄诗相识，两人遂成知己。只希望两人有生之年能见上一面，在病中得知袁枚来访，彭急忙从病榻上披衣而起，出外相迎，一握手病也轻了许多。两人相见，再约黄泉相会，老泪涕流，自己早走骨头还在，但愿袁公长命百岁。

两位诗翁，成就诗坛佳话，相见就是永别，相约九泉之下再谈诗论赋，誓不失言！八二翁拜八三翁，江宁府到溧阳邑，不为别的，只为诗情！

诗人长寿。袁彭相见，又过两年，袁枚写《溧阳彭贲园先生八十五矣，闻其健在，喜寄以诗》：“芳讯传来喜欲颠，鲁灵光殿尚归然。东方著述三千牍，彭祖家风八百年。屈指谁为天下士，比肩同地作行仙。急书诗箒风中寄，当作钟期未了弦。”袁枚得知彭光斗还健在，称其为彭祖家风，天下双名士，地上两仙翁，他急忙写了一帧诗扇寄上，像是钟子期俞伯牙千里知音之琴弦又奏起，余音袅袅，绵绵不绝。

有资料讲袁枚活了八十二岁，但从上诗看，他比彭光斗小一岁，至少活了八十四岁。贲园先生寿至八秩有六，著作等身；简斋先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不知两位后来在另一个世界相聚过否？

四、袁枚与溧阳诗人

《随园诗话》卷六四十五条曰：“余在杭州，杭人知作《诗话》，争以诗来，求摘句者，无虑百首。”

作为乾隆诗坛盟主、性灵派领袖，袁枚的声望和号召力非同小可，文人争以

诗赋相寄，以能被摘录为荣幸。后居江宁，诗稿如潮，袁公乐此不疲，是为雅事。

《诗话》补遗卷七第六十五条记：“溧阳狄梦松梦中得句云：‘众鸟归来托，繁林得所天。’初不解所谓。后会试场题与前诗意相合。韵限‘天’字，即用梦中句。试官以其诗暗合圣意，遂入选，旋官翰林。”这是一段颇有趣的记录，溧阳诗人狄梦松，梦中得诗亦“繁林”，会试考题韵限“天”，卷上即用“梦句”，却正合考官及圣意，这不是“天意”？相信狄公不会是杜撰之说。

狄梦松，字文涛，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历任编修、左中允、山西正主考、湖南学政，改任贵州粮储道。

《诗话》补遗卷八第六十一条，有彭贲园推荐诗作：“又，九十三岁沈培龄（文楼）《燕山寺》句云：‘夕阳人散邮亭冷，夜月僧归石径孤。’《石屋山》云：‘紫电已飞炉焰熄，青山常在霸图休。’俱清妙可存也。”

沈培龄，字家耄，乾隆十九年岁贡，父沈元炼，进士，曾修《溧阳县志》。沈培龄承继家学，诸生时就闻名，任泾县训导，学生遍城乡，九十四岁时去世。《诗话》所选句，都为咏乡之作。

《诗话》补遗卷九第八条记：“溧阳王云谷，与余同寓苏州铜局，代主人杨仁山款待甚殷；诵其《咏秋月》云：‘八月西风夜气寒，桂花香冷露初转。中庭地白三更后，独鹤与人相对看。’可谓清绝，不食人间烟火。”

吴兆襄，字于麟，乾隆四十九年（1784）岁贡。他“老于文律，教授生徒有名”，“讯览群籍，工为诗篇，尝应试秋赋（乡试）到江宁，独往空山废苑间徘徊吊古，人莫之识也。偶游随园，赠诗袁枚，袁大欣赏，刻之《同人续集》中”。诗有“写到黄庭刚恰好，拈来白傅偶然同”，及“高座自修千古业，游人争看四时花”之句。袁枚回信称赞：“令我眉舞色飞，距跃三百！”

袁枚与溧阳，恒有不解缘。亲情师情，诗情友情，贯穿于他的一生。

史宅红泉书屋原有“红泉井”，下贮丹砂，取谢灵运诗意，由袁枚题字。前几年石井栏圈不翼而飞，袁才子留在溧阳的墨宝再难见面。痛哉！惜哉！

溧阳诗人集“别裁”

《清诗别裁集》是清人沈德潜编的一部清诗选本，选取清初至乾隆时作者九百余人的作品，共三千多首。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苏州人，乾隆时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曾编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著有论诗专著《说诗晬语》等。他选诗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为宗旨，以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为标准，所选作者的专集不少已散佚或失传，今天我们只有通过“别裁”得以研读。他的诗评也颇有水准，为后人研究清朝前期历史、文学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沈德潜作为“一生无他嗜好，惟孳孳矻矻于五字七字之中”的文人，选刊“别裁”共历时十六年，可见选诗之慎、评诗之专、刊诗之苦。

清嘉庆溧阳志“风俗”篇云：“溧阳县介江浙之间，其君子笃厚恭谨，恬静自得，艺文儒术蔼然相尚。其细民务本力农，淳朴质直，类知畏法，名儒胜士多。”“邑有李太白之英风，故其人多秀而文。”诗言志，文载道，溧阳自古诗人辈出。而在《清诗别裁集》之中，沈德潜共选了8位溧阳诗人的诗作，共计45首。其中宋之绳4首，马世俊3首，史夔16首，马世杰1首，彭桂9首，彭极1首，任兰枝4首，魏麟征7首。

一、宋之绳，字其武，江南溧阳人，崇祯癸未赐进士第二，清官翰林院编修，著有《载石堂诗》。

戊子人日寄怀陈南士

人日逢人少，相怜必故人。
乱多天未馱，老至岁难新。
尘雾荒村合，田庐鬼国邻。
与君生计拙，寂莫返吾真。

沈评此诗“起连用三人字，不见其佻，老至岁难新，工于造句”。

随躅杂记(其二)

车声方隐隐，夜色已苍苍。
山势开天险，河流接天荒。
人眠千嶂月，马啮万群霜。
行幄东南近，风清禁漏长。

梅 花

一年蜡枝几回看，待到花开惜到残；
漠漠冻云连近远，荒荒野月照清寒。
於人疏落如无意，写尔高空正自难；
记得遥山旧茅屋，破扉朽几一枝安。

沈评：“通体空写，为极熟题，开一生面。”

二、马世俊，字章民，江南溧阳人。顺治辛丑赐进士第一人，官翰林院侍读。状元对策随题敷衍者多，先生独侃侃直陈，不负所学。制义皆有根柢，何义门学士云：“我朝状元前刘后韩，公居其间，鼎足为三，非妄许也。”诗品亦清正不凡。

吴季子挂剑处

公子归吴去，故人知此心。
死生同白日，然诺岂黄金。
一剑竟何往，高台自古今。
君看碑上字，苔藓不能侵。

沈评：“不须名句，风骨自高。”

古 意

紫塞三千里，征夫去不还。
帘前新月上，似为寄刀镮。

陆 贾

莫问尉佗装，千金岂在眼。
请看马上公，何曾事生产？

三、马世杰，字万长，江南溧阳人，贡生。

秦 宫

阿房周阁百重环，美女充庭终日闲；
频望翠华终杳渺，亦如天子望三山。

沈评：“即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意印合秦皇求仙，便觉词意俱新。”

四、史夔，字胄司，江南溧阳人，康熙壬戌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宫詹公诗当时不必有赫赫名，然迄今读之，意足韵流，无一闲句闲字，得唐贤之三昧者也。台阁而不涉应酬，山林而不入寒瘦，足觐诗品。

横江词

落日临沧观，西风扬子津。
峭帆何处泊，愁杀渡江人。

采莲曲

拔棹里湖去，连堤种芰荷。
折来与郎嗅，香比外湖多。

塞下曲

明月中天秋气清，令严刁斗最分明；
前山夜半雕翎响，知是官军射虎行。

沈评：“易落唐人臼科，此能生新。”

无锡望惠山

九峰天半落，一棹夕阳过。
客为游山盛，船因载水多。
溪边高士宅，月下榜人歌。
好趁樵风便，轻船采芰荷。

史夔另有《长干曲》、《合涧桥步月》、《飞来峰》、《发京邑》、《陶靖节故里》、《弘济寺》、《高邮》、《林处士墓》、《淮安》、《凤凰山吊宋故宫》、《涿鹿道中望西山》、《赠李解元鄂君》等十二首。

五、任兰枝，字香谷，江南溧阳人。康熙癸巳赐进士第二人，官至礼部尚书，著有《见南诗集》。公出使安南，宣谕国王，使王知天朝恩重，拜舞感泣，此生平大节。诗亦典重有礼。

大相岭

肩舆历峻坂，力尽得跻攀。
冰雪明孤岭，风雪暗百蛮。
地应雄剑阁，天已近阳关。
旧说南征相，兵戈驻此间。

宿剑关

斜日下荒原，驱车宿剑门。
寒山风落石，残夜虎窥村。
断续京华梦，凄清独客魂。
古来设险地，兴败共谁论？

沈评：“五言律多从杜出，咏蜀中诗尤宜近杜。”

巴 州

深院严扃尽日闲，一年花事已全删；
情同笼鸟难舒翼，行似枯僧正闭关。
万里烟波通峡水，连朝云雾失涂山；
故园遥在春江畔，那得扁舟纵往还。

任兰枝另有七言《武侯祠》一首，沈评：“凭吊武侯，写出风云动色，忠魂如在，未并传出，帛竹之战，一门死烈，此前人未说到者，应与王新城定军山下作并传。”

六、彭极，字则冲，江南溧阳人。

得爰琴兄都门信

床头宝剑泣鱼肠，赋就三都价未偿；
绝不待人惟岁月，最难为客是风霜。
春山自洒啼鹃泪，慈母曾缝游子裳；
今夜挑灯应独寐，好将归梦绕高堂。

七、魏麟征，字苍石，江南溧阳人。康熙丁未进士，官翰林，出为邵武太守，有《石屋诗钞》。

短歌行和杜韵

寒日影黄云半白，天涯莽莽未归客；
边隅何日可罢兵，几处转输瘁邦伯。
羽林夜发秦关道，共言河陇居民好；
甲骑经过悉备餐，喜看蹴踏天山倒。

捕蝗

捕蝗捕蝗人簇簇，蝗飞蔽天引其族；
扬旗击鼓乱敲钲，奔走如狂沸山谷。
炎肌雨汗肠雷鸣，取蝗一斗当斗粟；
幸不入境驱邻封，彼亦天民忍遭酷。
谁云蝗多不食苗，苗食垂尽到草木；
复闻修德能弥灾，非止蝗生宜早扑。

送儿彪之沅江

我已无亲侍，儿行又远亲。
萧疏千里外，去往一家贫。
水阔风帆健，霜高候雁新。
沅兰芳可佩，极目楚江滨。

魏诗尚有《蛮子朝》、《于忠肃祠》、《人棠驿叠韵》、《量移曲靖叠韵》等四首入选。

彭桂诗九首，另文介绍。

《清诗别裁集》所选溧阳诗作，少数见载于县志、家谱，多数随着作者诗集的失传而湮没。45首诗，虽有沧海遗珠之憾，但毕竟是千挑万选之集。

斯人已去，诗歌长存，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长工诗人芮鑑

诗言志，歌咏怀。诗歌历来是文人墨客抒志遣怀的载体，与耕者樵夫、贩夫走卒无涉。

芮姓起源于夏，发迹于周，以国为姓。北宋末靖康之变（1127年），奉政大夫芮毓护驾康王南迁，后卜居溧阳前马村。毓生八子，以八卦取名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后子孙繁衍兴盛。

时间推至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芮离后裔十二世芮鑑，字公明，因家道中落，由蒋店经金坛，辗转至上黄耆绅黄裕斋家做长工。春种秋收，耕犁耙锄，长工之本分也，偏偏这位佣工不守本分。那听惯了鸡鸣犬吠牛哞羊叫的耳朵，总像在聆听着什么：黄府西宅里，私塾先生的教书声和学童的朗朗读书声，声声入耳。荷锄而归，他倚墙呆听；担柴歇肩，他凝神静思。有长工笑他：你也识字？你也懂文？你也吟诗？他无言。收工洗脚，他到私塾里请教先生，五言七绝，平仄韵脚。先生倒也并不见弃，见他好学，乐于授之。

某年春末，塾中出一命题诗：送春。先生一时兴起，言：芮鑑你也作一首。芮鑑也没推辞，拿笔立就《送春》一首：

怨风怨雨总成非，无雨无风春亦归；
蜀魂啼残花影瘦，吴蚕食尽柘阴稀。
樱桃红绽篱边熟，燕子黄消口角肥；
我亦欲归归未得，檐头常挂绿蓑衣。

流寓在外，欲归难归，风雨无阻，稼穡劳作，一种身世感叹尽在诗中。私塾先生读诗后大为惊叹，亟告东家黄裕斋：“这芮鑑哪是帮工的，实在是位诗人啊！他

既然孤身一人，无家可归，我虽然老眼昏花，却愿做个媒，请黄公将女儿许配他如何？”

黄东家也是个爽快人，摒弃门户之见，立即就答应了这门婚事。没多久，选定吉日，芮鑑入赘黄门，成就一段姻缘。

芮鑑后生六子：舒、良、平、铸、诚、治。其中铸、治两子过继黄氏。芮鑑的孙子畿、稷、思三兄弟均为进士及第，芮畿任监察史，芮稷任职兵刑两部给事，芮思任浙江新昌等县知县。铸、治后代也有两位官至同知，邑称“芮氏三进士，黄门两同知”，传为美谈。

长工吟诗，本亦奇事。而吟一诗即成东床快婿，则是天下奇闻。一赞西厢识才，二夸黄公豁达，三叹“诗中自有颜如玉”也。芮鑑为上黄支芮氏之始祖，其人其事，绝非杜撰，《芮氏宗谱》言之凿凿。余拜读后颇有感慨：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累世簪纓，安有代乎？人生在世，只见贫富，勿分贵贱，河东河西，平等为上。

诗人彭桂

清溧阳知县吴学濂，在“乾隆志”中言：“天下之大，古今虽远，人物虽殊，其励俗而维世，信今而传后，则一也。今溧邑近东南金箭之乡，表表出群者，岂系无人乎？”

溧阳素沐太白遗风，诗意盎然；寒尉孟郊又在此射鸭苦吟，诗风蔚然。江山代有人才出。彭桂，似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诗人。

《乾隆县志》载：“彭桂，字上馨，承家学。潜心经史，渔畋诸子百家。诗文浩瀚淹博，伸纸立就数千言。年十八，始拈帖括，为诸生。家贫，数奇杖出游，当世名公巨卿常以不得罗致为憾。会举鸿博，桂已列焉，剡以母疾辞，不许，陈情至再。巡抚慕天颜鉴其诚，为之疏请，乃已。性豪迈忼爽，敦义尚节。诗四卷，诗余六卷，已梓行世。”

传略虽简，却活脱描写出一个才人的性情。诗文浩博，立就千言，这是才气。倚杖远游，不攀权贵，这是傲气。辞试不仕，豪迈敦义，这是骨气。“遇风月清美，友朋燕集，流连寄托于诗歌琴酒之间，一往而莫能自止。”（《嘉庆县志》）这分明又是一种文气，一种逸气了。

彭桂出身溧阳世家。先祖彭星，清江人，南宋咸淳进士，授真州判官。元兵南下，随淮东转运使赵淮寓居溧阳。高祖彭谦，号茭东，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官至工部观政，家资豪富，为乡里冠，曾在春草池、白云溪等名胜地方筑屋建墅，闻于东南，“为人才气不羁，诗亦磊落自喜，直抒胸臆，生平未尝以制举业束缚”。父亲彭桢源，学识渊博，为时人推重，对长辈孝顺，著有《呆庵集》、《许闲斋文集》四十卷。

彭桂性情做派，像极高祖彭谦，但却没有先人的豪富。他三十岁丧父，只得“游幕四方，岁资其入以养老母。历楚粤，返逾江淮，遍涉齐赵幽冀之域，所至作诗凭吊，酣嬉淋漓。《登岱》一篇，浩浩三千余言，见者以为《北征》、《南山》之比；《旧院行》、《白沟河》诸作，或谓可上掩元白而近与吴伟业颉颃”。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可见当时彭桂的诗名已颇盛,人们将他的诗与元稹、白居易和吴梅村相媲美。“逆旅旗亭,传写不绝,以此名闻天下。”

清人沈德潜编的《清诗别裁集》,收录彭桂诗九首。作者简介写道:“彭桂,字爰琴,江南溧阳人。陈子山学士携爰琴诗见示,系钞本,属予选定删存四卷。催取甚促,因节录九章,终以不能多取为憾也!”写明集子仅取九首而引以为憾。

“游子倦行役,攀折畏险阻。宣歙尽山城,峰峦互撑拄。丛箐裹郡县,仄涧跨垣堵。兹岭何岩峣,悬道通一缕。峭壁插天门,裂石界地户。泉奔脚下雷,风啸空中虎。朗日眩神魂,旅人怯亭午。况乎我独行,缥缈入云雨。”(《出宣州过箬岭入歙州界遇雨》)作为一个出外谋生的游子,独自一人攀行在皖南山区,山高路险,泉奔风啸,一会儿朗日眩目,一会儿缥缈云雨,途中艰辛,尽在诗中。

在《扬州盐署为董江都故居,后有祠,遗井尚在,丁巳秋瞻谒感赋》一诗中,彭桂写道:“我兹瞻荒祠,三叹中耿耿。幸有遗井存,悠然自清冷。独来颭寒泉,对之涤心影。”沈德潜评道:“此种诗不同风云月露之作,而又不入于腐,所以为高。”在《夜饮阎再彭席上听孙良侯挝鼓歌》一诗中,彭桂描写鼓歌十分生动感人:“奋袖操槌将欲击,欲击未击手徐低。坐上先教众乐齐,众声杂作一声下。倏如蛰雷动春溪,鼓声如雷手如电。须臾迸激飘飞霰,管音何亮磬何幽。”沈德潜对此长诗感叹道:“迤邐而来,备极音节。后半借渔阳鞞鼓写流寇之乱,悲壮淋漓。末又结到不轻击鼓,真觉四座无人,目空一世。”诗写到此等境界,不易!也许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有异曲同工之妙也。

“蕉叶雨斜侵砚几,藤花风细落书床。”(《同苍符过王勤中怡老堂》)“空想大风歌沛邑,只余落日吊彭城。”(《和楚人李子鹄寄阎古古先生》)“肥马尘中孤客贱,严霜梦里故乡寒。”(《答怀阎再彭》)这些诗句,构思巧妙,用词讲究,作者功力毕现。

彭桂是位孝子。养母,他漂泊四方;思乡,他情真意切。在《建初弟来都省亲喜极有感》诗中,他写道:“相持莫下拜,拭泪认分明。讶尔颜何瘦,令余痛失声。饥寒留剩骨,患难得余生。乍见浑无语,那堪悲喜并。”诗写得直白深切,催人泪下。历经离乱,亲人相见都不敢相认,患难之余建初弟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相扶之时不禁痛哭失声!本来有一肚皮的话要问要说,悲喜交集之际却一句也说不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骨肉相聚啊!“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手缝衣乃母亲亲为,游子身上衣,染满了母亲的期盼,儿子的思念。沈德潜评曰:“弟传亲语,

劝归而已。与弟转并滞客途，倚闾之思愈切矣。此种是真杜诗！”

康熙十七年(1678)，地方当事推荐彭桂考“鸿博”科举，但他以老母七十四岁卧病在床为由，不去应试。巡抚慕天颜也为他上疏请辞，朝廷不允。彭桂又写信给慕巡抚道：“桂年三十，先人见弃，零丁孤苦，无以自存，遂徒步走数千里，缪以诗名为人罗致，于今十有八载。”“今距故乡仅两舍，音间时至，得以备知吾母之饥寒疾痛，母亦以其如左右，饥寒疾痛之可呼而告语也，两心差慰，四载于兹。”“老母今年七十有四，入春以来衰病奄笃，卧蓐不起，桂神魂失坠，祈神祇、倚汤药之不遑，尚何心于求名希进乎？”拳拳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不求仕进的孝子，只求“希报先人教训、慈母抚育之恩于万一。幸甚！感甚！”信写得字字泣血流泪，洋洋洒洒几千言，一片孝心青天可鉴！但其上疏仍未获准，彭桂只好打点行装进京，恰此时老母去世，他始料理老人的后事。

溧阳志记：“(彭桂)性豪迈伉爽，敦尚风仪，所交如朱锡鬯、施闰章、毛奇龄、阎若璩、梅文鼎、魏禧、徐乾学、姜宸英辈以数十，皆当世名流。晚年卜筑溧阳之秦公桥，手定所著其诗不下万首，存者独抄本《初蓉阁诗》十二卷、《赋论》三卷，又刊本《泊庵诗余》四卷藏於家祠。”

彭桂是当年《扬州府志》三个文学顾问之一，与当地诗人结社吟诗交往从密，他的多首诗也被收入此府志。作为一个作诗万首的多产诗人，他的作品流传颇广，我们不应遗忘这位乡贤。

彭桂之弟彭材，“八岁能诗，早弃举业，纵览古今，福建林茂之一见奇之。数年学益进，因更出游，足迹几半天下，遇名山大川、骚人才子之陈迹，辄凭吊，慷慨为长歌，顷刻千百言。与兄桂互相激赏。一日尽焚所著，端坐而逝，年二十八，独遗少作《菱斋稿》云”。

彭桂之父彭祯源，有《菱山别墅》诗：

铁马惊风骤短檐，西窗斜月一钩纤。
云生石砌闲侵屐，鸟避虞罗误入帘。
野服可裁墙有荔，湖苑堪煮豉无盐。
年来历尽风尘苦，到此应将名姓潜。

上代传下世，一门皆诗人。

平陵女诗人狄玘

男尊女卑，中国古来之思维定式。“女子无才便是德”，“头发长，见识短”，这些深入骨髓的传统观念，使女人们只剩下教子相夫的义务，家中的天井便是她们的天空，男人的脸色便是她们的悲喜。才情诗赋，似乎和女子无关。

乾隆《溧阳县志》的“艺文”辑里，记录有两位女子的诗作，一位是盛氏，一位是狄玘。盛氏连名也没录，注明“孝子潘天成妻，桐城人”，诗作为《送夫子南还扫墓并序》二首，时间为嘉庆辛未(1811)八月，“余夫子扫墓濂阳，报亲恩于罔极。”“芦花江上雨初晴，帆挂朝霞一片明。含露柳枝从北折，凌风雁阵向南征”。从北方南行，挂帆坐船，可见是由外地赴溧。“远传故国书千帙，净扫先茔酒几倾。何日扁舟随濂渚，苹蘩采得洁粢盛”。这几句写对濂渚故园的感情，颇为感人。

狄玘，诗注“玉川，闺秀”。志录其诗作三首：

赋得溧阳酒楼三月春

流莺百舌争啼晓，濂江三月春光好。
吊古寻今事已非，夕阳到处眠芳草。
酒楼昔日定何如，花柳寻春应醉倒。
只今春夜月还留，照尽人间兴废愁。
空有清晖堂下水，不关人事自长流。

此诗应由李白游溧写《猛虎行》而赋。濂江又是三月之春，只是物是人非事亦非。春月依旧，人间兴废。“太白酒楼”此时应由旧县移建在县城上水关上，醉眠芳草，花柳寻春，人间的流莺百舌，不废清晖堂下的濂水长流东去。

金濂吊古

三十春风与母依，壶浆原为浣纱携，
自甘白璧沉沙杳，岂望黄金压浪低？
木杓兜前花自落，伍牙山畔鸟空啼，
月寒华表人何处？一片垂杨拂墓齐。

这首诗写溧阳史贞女义救伍子胥之史事。贞女三十未嫁，与母相依，浣纱濂水，携壶浆义救伍子胥，守信诺抱石沉江，并不是曾想日后有“千金报德”。木杓兜村有史贞女之墓，伍牙山因伍员有名，月寒花自落，垂柳拂墓地，鸟鸣空山，人在何处？吊念史贞女的诗赋历代不绝，但由女诗人写古贞女，却别有一番滋味，一种细腻的婉约，一种淡淡的忧伤，一种思古的幽情，氤氲弥散。

石屋山寻欧冶旧迹

古木苍苍碧水流，犹传名剑响千秋；
藏将玉匣惊风雨，化去神光作斗牛。
术点蛟龙留楚泽，气吞泉石压吴邱；
只今欧冶归何处？十里春深杜宇愁。

石屋山有欧冶子铸剑处，至今留有石坑，自古有人歌吟。狄玘之诗，写得宝剑出匣，铮铮鸣响，全无脂粉之气。只是末句又多了鸟鸣空谷，春深添愁，思古人之未见，念天地之悠悠的愁怀，动人心魄。

女子之诗，能入选县志，当不同凡响。那么，狄玘何许人也？

嘉庆《溧阳县志》在卷十六“杂类志·纪闻”辑中记：“狄玘，字玉川，马班书妻也。少寡苦节，能为诗，著有《还珠》、《玉川》诸集，世无完本。旧县志载其有关邑故者三章，今仍录之。”

史炳《句俭堂集》卷四，有《马节妇狄氏传》：

节妇溧阳狄氏女，名玘，字玉川。幼从父读书，遂能为诗。二十归同邑马班书，二十五而寡，卒于乾隆四十三年，年七十二。无遗产，莫为

之后。久之，后一田夫贫不能娶，寻亦卒。

马生方疾，革妇手自进药。媪以其滓覆于庭，瞿然而呼曰：此一块非肉耶？生闻大疑，已取而视之，块然者肉也！目其妇色变而号，生亦号！且曰：以吾故戕汝，至是安用？生为一恸而绝。妇踊曰：天乎！向吾刳股已父疾，父弗知。今以啖吾夫，夫知之而恸，速之死！天乎！吾谁之尤乎？盖至是始知其前尝刳股于父也！

既寡居，益为诗歌，泣讽咏杂莫能辨，顾不能治生。既老，迺为塾师，七八岁小儿跳踉叫嚣以十辈。而会年饥，主人设食错糠粃。节妇惫甚，一日仆于道，或扶之以归其姪之适周氏者。其姪，余妇之母也，能姑之，事遂终焉。余尝寒冬至妇家，节拥竹炉哦诗，客至骤起，炉火爇其裙布，不辍于喟。余持其稿归，一昔而媪至，索稿甚急，曰：节妇梦盗，肱其筐稿不还，惑不可解也。

论曰：法者所以行化，而吏缘为奸？令鰥寡得直于公庭，奸安所售哉？节妇狄于法当旌，吏需百金，事莫之任。或盗鬻其田，不为过户，田亡而尸存。追呼者，有牵其袂欲与俱至官，节妇挥刃自斫其臂，救之，得不殊。

非常感谢史炳为狄玗立传，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形象非常鲜明的节妇诗者的背影。

史炳虽是从贞节烈妇这个角度去写狄玗的，但作为旧制度下的女诗人，她的生平可歌可泣。嫁夫马班书，才五年就守寡，一直到七十二岁去世，没遗产，没后人。其间改嫁一个娶不起老婆的农夫，但不久后夫又亡。从一个封建社会的女子角度来看，“克夫”的帽子是山一样重的。

马班书刚生病时，狄玗亲手侍汤药，家中佣妇倒药渣于院中，惊呼：“那不是一块肉吗？”马班书取过一看果然是人肉一块！惊观狄玗，她色变而哭号，马班书亦大号：“因为我生病，你割肉自残，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他因悲恸过度而气绝身亡！狄玗跳脚，呼号：“天啊！我过去割股肉医疗父亲的病，今天又割肉给我丈夫煎药治病，没想到他一悲痛反而加快病死！天哪！我有什么罪过啊，要这么惩罚我！”这时大家才知道她以前曾割股疗父的孝事。旧时陋习，以为割取自己身

上的肉做药引，能治愈亲人的疾病，是为孝道。

守寡独居，狄玘以写诗度日，悲喜咏讽没有脂粉气，莫能辨是男是女之作。但写诗不能当饭吃，人老珠黄，她以教书设塾谋生，一群七八岁的小孩嬉闹叫嚷，辈分相差多代。遇上灾年，吃不饱肚子，学生家长以糠粃招待作学费。狄玘老了，累了，一天出外摔倒路上，有好心人扶之以归。

狄玘的侄女嫁给了周氏，即是史炳妻子的母亲。史炳应叫狄玘为姑婆婆。他曾在一个寒冬之夜去看望她，见她正拥着竹炉取暖吟诗，看有客来访马上站起来，炉火溅到她裙布上，她并没有停止吟哦。史炳把她的诗稿带回去，没想到过一夜狄玘追来了，要稿很急，说：“我昨夜梦中遇到小偷，把我诗稿偷去不还，所以疑惑不解。”

史炳感叹，像狄玘这样的贞洁之妇，应当得到表彰奖励，但官吏没有。有不法者偷偷把她的田产过户卖了，她追到那人拖他去见官，那人不肯，她挥刀自砍手臂，幸亏求助及时没有落下残疾。

诗人狄玘，虽诗集散失，但其为人与作诗一样，豪迈不羁，大丈夫气十足。作为传世作品极少的女诗人，狄玘是应该在平陵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

溧阳状元马世俊

马世俊，是溧阳的骄傲。

作为本土科举场上的唯一状元，马世俊的出色，不仅在于他的诗文，而且在于他的个性。

乾隆《溧阳县志》中人物志“马世俊”是这样记载的：“马世俊，字章民。幼失恃，每岁时悲涕无间。八岁能诗文，及为诸生，屡试第一。淹贯经史，博极群书，海内知名。七应宾，兴志不少挫。顺治丁酉登贤书，辛丑膺传第一，捧宫袍，无舆马仆从，徒步归寓，都人传为佳话。对策称‘王者天下为家，不宜示同异，天下必尽捐满汉之名，俾精白一心，以成至治’。见辅政，长揖不拜，知无不言，其侃直如此。甲辰由修撰升侍读，分校礼闱，所得多名下士，尝曰：史官无他职，读书即其职。朝夕一编，送迎宴会多谢绝。丙午夏卒，朝士哀輓者三百余人。子宥扶棺归，萧然图书数卷而已。生平诗交之余兼工书画、赏鉴，家有二右之目，谓书右军、画右丞也。所著有《匡菴古文诗集》、《理学渊源录》、《十三经集解》、《李杜诗集注》。二子宥、容，别有传。”

马世俊于顺治十四年(1657)中举人，十八年(1661)中状元，其时他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科举场上，他一路艰辛，一路受挫。“马甸臣先生少时与陈石云(名夏)、宋柴雪(之绳)诸先辈于喁唱和，同治诗于濑上。既而石云、柴雪连掇巍科，独甸臣怀书未遇，郁郁不得志”(《匡菴诗集蒋超序》)。作为天才童子，七试乡宾而失利，同为乡人诗友的陈、宋在崇祯年间就金榜题名，马世俊整整晚了十八年才膺唱第一，其中的辛酸郁闷，其中的坚持不懈，只有自知！“而其诗以穷而益工，大江南北担簦问奇者踵相接也。迟之二十年始登贤书，辛丑年膺传第一，列侍从。”(《诗序》)

廷试对策，他竟然教导清帝“王者天下为家”，不应分满汉。见了宰相长揖不

拜，中了状元“独捧宫袍”，徒步归寓。为官知无不言，耿直如侃；朝夕一书，不参与迎来送往的宴请。这些都是马世俊个性的毕现。

溧阳籍文史大家蒋星煜曾有《不肯游街的状元》一文，言马世俊中状元后坚持不肯“游街”示众。“游行”一为光宗耀祖，二为报答恩典；他不听官员、同乡、同年的劝说，坚持“十里无归骑”，随随便便走回去，被一些大官员认为“怪僻而不近人情”。他在皇帝身边侍学，也不会巴结奉迎，官职最高是“会试同考官”。天天一书在手，“天下勿以科名而掩余诗，则幸甚”。一个视诗名重过官名的人，死后仅存几本“破黄历”，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彭宾燕在《匡菴诗集序》中云：“余闻之家旦兮云：嘉靖朝有马竹湖先生者，讳从谦，举进士官礼部，以召对撰文称旨，特擢兼翰林五经博士。后论相嵩暨内臣杜泰，廷杖死，直声震天下！今马章民，讳世俊，其曾孙也。章民忠义之后，自好负性，不屑屑与恒近为伍，以能文章名，困蹶诸生垂三十年。然其沉深婉恋、侘傺不平之意，往往见之于诗。”

马世俊为忠义之后，他的曾祖马从谦，也是位仗义执言、知无不言、丧命于言的“犟头”！

马从谦于嘉靖十四年(1535)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因治理黄河政绩卓著，擢升为光禄寺少卿兼翰林院五经博士，执掌皇帝文告(制诰)事。嘉靖帝笃信道教，奢侈浪费搞祭醮，马从谦屡屡上书劝谏，惹皇帝不满。后马又弹劾太监杜泰贪污和严嵩误国，被杜泰反诬诽谤，被令廷杖八十，发配边疆，孰料重杖之下丧命黄泉！因直言和正义罹难，马从谦值得尊敬。他生幼子马有骅，有孙中任，中任生子马世俊、马世杰。

马世杰和马世俊一样，“以文学著名江左，时称二马”。顺治八年岁贡，以耳疾不事科举，“教授南山中，键户著书，为士林宗仰，时亦赋诗饮酒，徜徉林下以卒”。

诗书传家，耿直传世。马世俊高中状元，写诗言“自愧才疏欲避名”（《听庐唱第一》）。这是自谦，也是实话。他的行为举止很多不为官场接受，不为官宦接纳，只因有其家传，有其个性。

考中状元不易。做一名有个性的状元，更不易！

马世俊的《不违农时》

在扬州古籍书店淘到一本《清代名人轶事》，作者为葛虚存，民国间上海会文堂影印本。其中有《马世俊时艺》（卷五·文艺）一篇，如下：

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谒芝麓司寇，司寇读至《而谓贤者为之乎》题后，比“数亡主于马齿之前，遇兴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贿终，而功名复以贿始。七十年以前之岁月已沦，七十年以后之星霜复变。少壮未闻谏书，而衰龄反同贩豎”云云。司寇泪涔涔堕曰：“李峤真才子也！”岁暮，赠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两。明年，遂状元及弟。贤哉司寇，非褊心者所能及也。

此段轶事，暂不论真伪，可见马世俊当年生活“落拓殊甚”，文章感人殊甚，连刑部尚书（司寇）都泪珠堕落，赠金八百。以才动人，以文感人，马世俊与芝麓尚书之间，无疑一段佳话。

在溧阳小书店里购得《明清八股文鉴赏》一书，其中有状元马世俊《不违农时·二节》，选自《钦定本朝四书文》，如下：

王者尽心于民事，道建而业斯隆焉。

盖必民事尽，而王者之心始尽也。自其始以观其成，道斯全耳。

孟子谓，夫凡民易于趋始，而难于图终，王者知其然也。先定其规模以从事，而轻重缓急，随序以施。迨其后，兴化政治，举斯民于三代之隆，而区区补救于目前，非所贵矣。大梁之国，田高土肥，池深木茂，其壤可赋，其泽可渔，其山可采，幅员千里，即以图王不难。然而物力耗

减，民气嗟郁。无他，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有由然也。

臣谨献其策曰，不可胜食者二，不可胜用者一。

盖为国之道，和则就理，疾则离焉，必使吾民东蜡吹邠，而后风化可几也。王者所以不慕速效而勅之于先。

治民之道，顺则易济，逆则上焉，必使吾民敦本茂质，而后诲谕可加也，王者所以不争霸术而重其所发。

夫君之于民，至阔绝也，苟以为吾心既尽，则又何不尽之有，矧其生有以养，死有以葬，民所求于君者，不亦可以已乎？

王者则曰，吾虽教民山不槎蘖，林不伐夭，而心未尽也，闲闲泄泄，取彼柔桑，而地利尽矣；吾虽教民尺计者市，寸计者字，而心未尽也，诸父诸舅，或佐乾餼，而物用尽矣；吾虽教民三时耕作，一时公旬，而心未尽也。丰年三日，中年二日，凶年一日，而天时尽矣。若夫上庠下庠，东序西序，即释耒而横经，岂我负而子戴，民之克进于孝弟也，非犹是教以养生，教以送死者哉。

今天下老者既不逢宽裕之俗，幼者复生当衰乱之时，寒利短褐，饥利糟糠，民之嗷嗷，新主所资也。是以叹无裳而讥采菽，衰世所以灭亡也。歌授衣而隆羞奇，盛世所以光昌也。王果有意乎此，则彼被润泽而大丰美者，岂独三晋之老成，两河之侠少哉！禹汤之王，兴也勃焉，其道不过如是。

右移民移粟之说，无论其后之不可继乎，其始先不足观也。

科举制是旧时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延用了一千三百零八年。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以“四书五经”的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程式一是题取经义，二是代圣贤之言，三是为对仗的行文形式。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沿袭了近五百年，其起、承、转、合无不反映出作者的逻辑思维，对仗行文需要语言功力。

科举选官，首先打破了“门阀世族制”和“世袭分封制”的特权，体现了民权思想，显示了平等原则。达到了择优效果，使那些出身贫寒、卓有才华、刻苦学习的学子有了出仕的机会，有了报国的途径，所以这是值得肯定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在马世俊的身上，得到充分的诠释。

《不违农时·二节》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是其七章中第三篇的内容：“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而马世俊这篇八股文不只就二节而立言，而是围绕这一章而展开的。他首先以“王者尽心民事，建道立业”为破题，以“民事尽、道斯全”为承题，以孟子言为起讲，再由“臣献策”入题，讲“为国治民之道”起二股，谈君民之求过接，以王者“三教”作中股，借昔言兴衰为后股，后“移民移粟不可继”为结语。

马世俊这篇八股文，沿袭了他廷对时“称王者天下为家，不宜示同异”的思想，向皇帝强调“民心民事”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实施方法，提出了“施仁政、行王道”的主张，希望“上庠下庠、东序西序，既释来而横经”的兴学尊经的风气兴盛，提高大众的思想道德水平。

清学者方苞评论这篇文章的结构说：“前半实者虚之，既无头重之病，中间攒簇一片，无限堆垛，都化为烟云。”

《匡菴文集》陈廷序言：“溧阳马子甸臣，余之遇之也盖已晚，读其殿试万言洋洋大篇，绝去对策比偶之迹，应与八家之文并峙千古！史馆六年，谢绝应酬，专心著述，一时名公巨卿靡不叹服，推为当代著作手！”

清代名儒何焯道：“我朝大魁，前刘后韩，世俊居其间，鼎足而三。”可见马状元在清代文人中之地位。

马世俊在科举上属大器晚成之人，其文章今已鲜见，录之以示对乡贤之敬意也。

马世俊和《匡菴诗文集》

溧阳籍文史专家蒋星煜曾说：“马世俊的著作有《匡菴诗集》、《匡菴文集》等等，可能已散佚，我至今未能读到。”感谢溧阳图书馆宋国忠先生，他借助电脑检索，给我送来厚厚两本马状元的诗文集，如获至宝，如入宝山，如沐春风。

《匡菴诗文集》为康熙刻本，其中《匡菴诗》前集六卷，后集六卷，《匡菴文集》十二卷，计二十四卷。诗文集的付梓，充满辛酸，印数较少，但国家图书馆有藏。

马世俊之子马宥、马容在《诗集识略》中写道：“先太史遗集，计藏稿、京稿凡三十卷，宥、容以家贫无资，不能尽梓，先梓京稿中之诗凡六卷。编次不敢妄为，先后惟叙年，校录始于辛丑，终于丙午，以一年为一卷。”“先太史古文诗全稿，篇目浩繁，尝欲手为删辑，分类成编，痛集未成而歿。宥、容拟次第付梓，而以砚田无积，惭愧未能。”

马宥在《文集识略》中讲：“先侍读公古文辞昔尝盈笥矣。兹所录者散失之余也。”“宥、容株守砚田，艰于刻费。丁未、戊申年先梓京署诗六卷，传诵已久，嗣后又梓前集诗六卷。兹刻古文辞，前后各为序目，不能条贯，编辑之余，不胜愧怍！”马容云：“先太史诗文集初名《容菴集》，后改《匡菴集》。”“兹集成全诗文共编二十四卷”，“余于先太史文集手录已经三次矣”。

一部诗文集，二子三次付梓，只因“株守砚田，艰于刻费”，其中不少已散佚。不怪宥、容两先生，只怪状元先生重文不重财，重书不重官，天天在皇帝先生身边侍读，你也捞点偏门赚点外快呀！天子那里小扇子拍拍混个巡抚总督什么的！光宗耀祖，恩泽下代，造园修宅，富甲一方，人家不都那么干的？穷清高、穷清白、穷清贫、穷清守又有何用？穷到连自己的诗文都无钱付印，这状元不是白考了！只是苦了你两个孝顺的儿了。

常听有人为自费出书而牢骚满腹，与马状元一比，你还有何脸发牢骚？

马容总结得很好：“溧邑前辈著述宋元以前罕见，故明数百年来其以古文词成集者，亦指不数屈。国朝自陈芝山先生梓《石云居集》后，寥寥嗣响。宋柴雪先生刻《载石堂诗集》、吴兰雪先生刻《菴羹堂诗集》，其古文俱未传。先太史《匡菴诗集》行世已久，兹古文一编表章殊亟，恐文章湮没，致后人有虽盛勿传之叹也。”由于种种原因，前人诗文流传仅见书目，连蒋星煜先生都叹未见“匡菴”。其实乡贤之作乃精神遗产，为我们留存了大量当时的社会文化信息，从这层意义上讲，马氏兄弟做了一件大好事。

《匡菴诗文集》由当时许多名家文士作序，仅这些资料，已十分宝贵。这些序言一方面畅叙对诗文的见解，一方面表述对作者生平艺术的评价，成为我们了解作者作品的一手材料。

马宥介绍：“序旧稿者芝山陈百史先生，芮岩尹、彭旦兮先生，金沙蒋闾然、周不伐先生，向已订录，兹未及重梓。”

马世俊对自己的诗，充满自信。我们先来读其“叙”：“余曰：子虽不第，诗必传！万长（马世杰）曰：从来不第而能传者，鲜矣！三百篇中，载野夫游女之什，自采风道废；而隐逸闲旷之伦，不假名公巨卿齿牙，必无传者！”“余幸得一第矣！余治诗已三十年，所赋皆山水性情，而于富贵薰灼语屏去无存者。刻余辛丑以后诗，天下勿以科名而掩余之诗，则幸甚！”

这是很有意思的几句表白。马世俊屡试不第，他自信自己诗能传世。马世杰则不同意，他认为《诗经》三百篇，多采自民间，如果不借名人高官之嘴推介，肯定不能传世。马世俊考得功名，贵为状元，他崇尚自然率直的诗作，摒弃了矫饰应酬的东西，认为如果天下知道他的诗名不是因为他的科名，则是最大的幸事了。

马世俊骨子里是位文人。

资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廷“序”言：“马子之文章，其流传海内者，盖不自今日始矣。其为诸生祭酒也，治诗文于江上，与同邑陈相国芝山、宋太史柴雪诸先辈，并树文坛旗帜。马子虽潦倒诸生中，而海内已有斗山之望，其时自命可传者，初不以科名显，及其为名孝廉也，召见乾清，两试午门，皆擢前列，惟时春雨瀛台，应制诸篇早已脍炙人口。迨辛丑膺唱第一，京师更有状元天下才之谣，则马子之文章，其以科名而益著者。”由此可见，马世俊的文名，早已流传，三十年科

举的拼搏，终以“溧阳三鼎甲”之首而名扬天下。

马世俊的“同里同学”、同社隐士芮城“序”言：“章民马子，少称异才，嗜古学，读书有得，至忘寝食。其为文，外明而内腴，自诗赋、传记、序论，擅美诸体，盖累累成帙矣。嗟乎！章民岂易及也哉！夫以一人之智力，求尽天下之学，以一人之学，求尽天下之善，非沉深穷理之士，必不能有所积。”“章民所以执卷而太息也！才如章民，深沉好古如章民，又当载籍极博、理学昌明之日，于以审同异而断是非，其为两汉唐宋以上之人之文也。吾于章民何疑焉？”芮城对马同学的积学积善、沉郁好古、深究理学、追摹汉唐，是颇为赞赏的。“文章盛衰之故，世为之欤？抑人之欤？”他的发问，实是为马世俊的诗文作铺垫。

华阳同学蒋超评马世俊诗云：“迨至五年之内三人长安，屡经御试，其应制诸篇久已国门纸贵。是甸臣之才之学天下其信为可传者，岂俟读书中秘时哉？余尝论仕宦之诗，台阁之气过盈，山林之诗，又未免流于寒俭。”“甸臣之诗不以穷达而殊，不以前后而异，有陶孟之冲澹，有高岑之劲拔，有钱刘之秀润，有王骆之庄贍，有温李之娟媚，诸体无所不备，而得力尤在少陵、太白。”“合匡菴前后两集观之，甸臣可藉以不朽矣。”这段诗评评价极高，马诗无台阁之气，免山林之寒，博采众长，必将传世。

杨应标评论马世俊诗作较为中肯：“岂知其一生诗思，积日而月，积月而岁，孤馆篝灯，池塘青草，灞桥风雪，无一日而不寢斯食斯也乎！”“读先生之诗，先生之性情见矣！先生之立品不渝，从可识矣！先生自序尝自谓必传，余即以先生之自信者，信先生也夫！”

溧阳同学、进士吴颖评论马状元：“邑里之中科名特盛，一时顿有三君：陈石云工于论议，宋柴雪妙于咏叹，匡菴兼有二家之长，独擅风雅。”在三鼎甲之间评议，独有见解。

同里同学、同社亲翁彭旭写道：“余与章民居同里、业同术，每嘉叹其诗，以为无体不备，而终不能举一家以形囿之，亦犹章民之志也！故序其诗不至阿其所好，而唯述两人平日学诗之指以归之，若其中情性之，有茹吐，气候之有浅深，异日全集成，以俟后之识者分别论定焉。”同学之情，同道之趣，同好之叹，溢于言表。

《匡菴诗前集》六卷计有诗 491 首，后集六卷有诗 323 首。《匡菴文集》卷一

濂水钩沉

为《论》，卷为二《策》，卷三为《表》，卷四、五、六是《序》，卷七是《记》，卷八乃《疏》，卷九为《祭文》，卷十乃《书》，卷十一是《题跋》，卷十二是《杂志》。

“不朽有三，立言居一，诗言志，心声也。心之所以而歌之咏之，原本性情，不假强勉，落腕脱颖，俾读者会心，想见大小浅深，无容掩袭，则立言岂易事哉！”
（《匡菴诗序》）

诗歌文章，源自性情，发自胸臆，来自生活，出自学养。马世俊的《匡菴诗文集》，洋洋洒洒，浅浅深深，是我们探究地方历史文化的一座不朽宝库！

马世俊的家乡情

《溧阳古诗选》是溧阳政协文史委 1987 年选编的地方先贤诗集，其中选了马世俊诗作 20 首，是选诗较多的一位作者。这 20 首诗作，大都选自县志，因当时局于条件没有《匡菴诗集》，所以难免遗漏了大量作者描写家乡景物风土的佳作。

马世俊的一生，和家乡血脉相连，和故土情怀相牵。他的诗集文集，大部分内容和溧阳有关，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已深深融进他的血液，流出他的笔端。陈敬“序”曰：“《匡菴全集》大抵多为布衣时所著述。”张芳斌“序”曰“太史燕邸文集，并昔年未遇时所著撰古文诗词，编为二十四卷。”马宥言：“侍读公苦心传述，惟在五经四子集解诸书，因讲学于邑龙门山、水西、屏山、石城长干寺、句曲茅山，凡三十余年。”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到，马世俊的生活轨迹大多刻印家乡，他对溧阳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了如指掌，成为其创作的源泉。

《溧阳古诗选》中的马世俊诗作，写了沧屿园、荷花庄、菱山、南屏山、铜官山、北湖亭、大涪山、天井山、盘白山、瓦屋山、芝山、青龙洞等溧阳名胜，还有很多佳作描述了地方风景古迹。

《过三塔荡，时有姑熟之行》

万顷烟浮发棹孤，舟人指树识前途。
澄潭火集知渔宿，远浦云生有雁呼。
小景已堪摹海峤，壮游何日遍江湖。
片帆便下渚湖去，明发雷峰醉百壶。

三塔荡早已干涸，但历代多有吟咏，清初时马世俊过此地还是“万顷烟浮”，现已是鱼池桑田了。

《青峰山》

青山矗立翠烟浮，攀石扞萝径转幽。
身在云端难见雨，客来月夕共分秋。
试猜绝壁应千丈，更上中峰第一楼。
安得巨灵挥叠嶂，茫然浩气涌齐州。

这里写青峰山高入云端，清幽叠翠，登临之后陡生浩气，挥斥山川，尽览神州。

《大箭山》

苾刍偏爱洁，佛性在丘樊。
径绝依危石，堂开近小园。
种松清客听，编竹扫尘根。
何似禅根静，皈依属普门。

大箭山是临近洮湖的山丘，有禅寺，诗注为“普门长老开山”；大环山为湖中岛，也有“普门寺”，这一片湖山丛林皆为普门法师开山修寺。诗写佛门清静，禅扫尘根。马世俊与佛界僧人多有交往，诗作很多。

马世俊有《怀山诗五首》，他在诗注中说：“一章怀巧石山也，去邑西三里，俗名小山。”“二章怀大涪山也，邑东四十五里，其形如笠，正则尝题为翠笠山。”“三章怀龙门山也，去邑西十五里，俗名大石山。”“四章怀南屏山也，山有金鸡寺，多古木，西与燕山相连，余尝读书其地。”“五章荷花庄也，余随先大人课耕之地。”这应是他在京为官之作，对家乡的思念，付诸山诗之中。“题咏何年苔藓没，登临长自倚斜晖。”（《巧石山》）如今，这些山景早已貌非昔比了。

马世俊是书画大家，他曾作《万壑云烟图》寄给儿子马宥，在上题长跋《观山歌》诗，气势磅礴，气度非凡，气息灵动。“曲径幽森山气肃，凉飍瑟瑟落群木。鸟飞不到人迹微，荒村遥傍深山麓。”“小桥策杖乱山中，欲买轻舟傍岩宿。山腰堕水水痕浮，水面浮山山影堕。”“古今自变山常在，兵戈岂逐山人鹿。雁荡峨眉有奇胜，地偏怜是人间隩。”长诗尽写溧阳观山的深邃高远，山石、瀑布、平湖、楫帆、人家、僧舍一一入图，使人羡慕这“神仙栖居何窈窕”之地。作者画作未见，但长歌犹如画卷，引人入胜，引人遐想。

马世俊后又写《后观山歌》，作跋言：“余画山水卷长丈余，题《观山歌》寄长儿宥，里人争传观，以为石田、征仲不是过。及次儿容有家报来，索画卷亦欲如宥，余笑曰：此兴至偶然，岂可再乎？秋九月余游西山不畅，因憾平生所游，展纸布景，忽复成卷，终观既忽复成诗，乃知诗画如山之有云，地之有泉，不知其然而然也。作《后观山歌》寄容。”此跋有趣，三丈余的山水长卷题诗寄给大儿，小儿不高兴了，也要父亲画卷不比哥哥差的给他，因为家乡人都争相传阅，以为比恽南田等名家都画得好。马世俊笑了，小儿怪他偏心，他哪里知道书画是要有灵感兴致的，怎可重复？铺纸濡墨，忽然来了情趣，复画题诗，寄给容儿。

“我无车马又无舟，旷然欲作山水游。闭门何处可登涉，砚底烟光向我浮。便写乔松十数树，悬崖复蹬多回互。飞淙百道听不穷，徜徉且缓寻山步。”“展卷如观千万山，掩卷却如山中还。卷山片石留不得，身在虚无杳霭间。”前后观山图我等无睹，不知是否如出一辙，或另布景描绘，但前后观山歌却一样动人，家乡山水的沟壑松石、烟霞岚气，尽在马状元的胸间脑海。三丈余的巨制，没有烂熟于心的观摩，是无论如何做不到“展卷如观千万山，掩卷却如山中还”的。

对于溧阳人文，马世俊也非常熟稔。

《读李白贞义女碑》

李白歌诗满天下，偶来独向沧江行。
醉看吴楚兴亡地，醒问壶浆女子名。
落木严霜飞古道，高楼皓月伴长庚。
断碑莫惜埋芳草，散作人间金石声。

史贞女义救伍子胥的故事，为历代文人歌颂。李白曾撰文刻碑，赞美溧阳烈女。马世俊去拜谒时，断碑已埋荒草，但太白的诗歌却似金石之声，流传天下。

《谢公澹》

池波吹粉壁，堂影入中流。
似识游鱼乐，忽闻鸣鸟幽。
花开千石丽，叶落半城秋。
车马曾经处，苔痕浑欲收。

《谢婆澹》

碧流环雉堞，小景对壶天。
老桧侵阶黑，繁花入座妍。
倚栏风飒飒，登阁月娟娟。
欲寄沧浪兴，呼朋共扣舷。

谢氏公婆澹，应在南城內，拟为谢家花园，紧挨城墙，池水为澹，有堂阁曲廊，有繁花苔痕，有划舟泛波。既为澹，面积不小，“叶落半城秋”，大约占了半个溧阳城。澹早干涸，现仅剩“谢婆园”之地名，古迹无存，新楼密集，再过数年，地名恐也无人知晓。

马世俊的诗作，涉及家乡古迹名胜的还有许多，如东寺、屏山寺、丫髻山、独秀山、凹潭芥、湖塘庵、大石山、夏林四首、青龙洞、燕山等等，他足迹所至之广，探究渊源之深，遣词造句之美，令吾辈惭愧！

马世俊的《匡菴文集》十二卷中，卷七“记”辑中，多有溧阳形胜人文记叙，十分精彩。

《登燕山记》写他读书水西，一直没空登临，后来风雨阴天历时十几天，才和同学一起去燕山。“邑志相问曰：燕山形如飞燕，故名。或指左翼，或指右翼，而岗阜旋折，首尾回互，莫测所向。余再历数峰，山风大作，见两翼如左右夹，疑欲乘余飞去！”“余始悟燕山之所以得名者”。他与同学一道议论着“遥峰叠翠，波光塔影”之奇，道出“君子之进于道”的哲理，“言未毕，两庵上人出竹径迎曰：茶熟久矣！余饮尽一盃而别”。由登山而悟道，“今日之游为不虚矣”。文章写得层层推进，步步为营，句句入理，景景有心。

《方山记》：“芝山之秀甲于溧，其西北一支为方山。山甚僻而童，人迹罕至。”《湖庵西禅堂碑记》云：“洮湖为三郡界，枕湖而居者，烟火相望。”《重修关帝庙碑记》：“溧阳寺林，惟南郊报恩寺为最古，寺始唐元和，名零陵寺，遗井尚在。”《重建广法禅寺碑记》：“环郭之东南隅，有三大刹，东曰广教，南曰报恩，皆历代久远不废，而西曰广法寺。”《晓园记》云：“余邑园林之胜，在郊外则彭氏夏林为最，在城中则史氏沧屿为最。”这些记文，都给我们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马世俊还撰写了《水西祠记》、《大涪山寺碑记》、《甘露寺募缘疏》、《屏风山佛堂募砖疏》、《屏风山楼募砖疏》等记疏，为我们保存了历史古迹和人文沿革的大量信息。作为当时的文化名人、诗文高手，他毫不吝啬地为家乡的美景善举、人文人物付诸笔墨，证明他有一颗热爱家乡的真挚的心。

《匡菴诗文集》是地方文化的结晶，许多消失湮没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摭拾。马世俊的家乡情，比南山高，比洮湖深。

马世俊的“忆”和“问”

读《匡菴诗集》中马世俊的诗作，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一种故土深情感人至深。儿时的童趣，少年的瓜果，地方的特产，乡邑的景物，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回忆中，在他的惦记中。这种溶化血液、深入骨髓的眷念，非一般附庸风雅之作所能颉颃。

放风筝，乡人叫放鹞子，是春天儿童们喜爱的活动。竹子做骨，薄纸糊翼，一线在手，任其逍遥。马世俊的诗却有寄托：

《放风鸢》

倩影惟凭风力催，纸鸢莫作木鸢猜。
群儿簇立看高下，幼妇停妆费剪裁。
岂候双凫随履到，似迟一雁寄书来。
客情如线同漂泊，望断乡情未许回。

作者看着天空随风而上的风筝，一群孩童在比划着谁家的扎得好、飞得高，这是新妇人停下化妆的手去剪裁粘贴的。这鹞子像一只寄书的鸿雁，姗姗来迟。漂泊在外的游子如同线系着纸鸢，凭借风力高高在上，不知能否看到故乡的山水草木？马世俊的构思十分巧妙，人家写风筝多是写童乐，他却写思乡。也许是他乡的纸鸢让他想起家乡的鹞子，同是凭风飘泊，却牵出一段浓浓的念想来。

思乡诗并不鲜见，但如果把乡间的瓜果作为思念的寄托，情趣或许不一样了。

《食瓜》

逶迤看蒂抱，历落尚花纷。
绛实神仙种，青门子母群。
三分悲晋国，四摘笑唐君。
喜见金盘薦，宾朋满座芬。

《扑枣》

纂纂柔条结，离离翠叶遮。
何当报以栗，浪说大如瓜。
三月昆仑熟，万年碧海花。
苦吟穷杜甫，扑取任邻家。

《剥栗》

如何棘围裹，翻得剖琼瑰。
树记周人社，园移汉武台。
妇鲁同枣贄，儿识傍梨栽。
租税山间足，封侯足道哉。

《探榴》

西域张骞得，河阳潘岳尝。
珠繁羞魏乘，惟重走秦皇。
眼送朱炎赫，牙分玉液凉。
红肤如何近，谁许锁千房。

瓜枣栗榴，都是乡间佳果。溧阳地产丰富，光瓜类就有几十种，水菜瓜、黄金瓜、花红、嘉庆子、棠下西瓜……枣类有白胡枣、红枣、蜜枣等；大栗有桂花栗，是全国的板栗基因库；石榴也有多种，粒粒赛珍珠。马世俊的诗没有停留在对佳果外貌口味形容上，而是追根溯源，从历史典故中去分述它们的由来，充分体现了他的学识和功力。如瓜说晋唐，枣言杜甫，栗自汉武，榴记张骞，这些都是珍贵的史料考据。

马世俊人到年老高中，身在京城，心在故乡。也许是童年的美食挥之不去，也许是北方的食物不对胃口，他的几“忆”，忆得动人，忆得深情。

《忆笋》

荷担山人欸竹间，玉芽才迸短篱初。
憐君留得春泥在，欲入云霄便不如。

竹笋是江南佳肴，鲜嫩爽口，每年初春都会上市上桌。笋芽刚刚冒出土，山人就锄出担下山去。不过春泥还在，竹根还在，高入云霄的明年还在等待。

《忆藕》

已喜芳心漾绿荷，尚存素节守清波。
相如但有金茎渴，不识江湖味较多。

绿荷莲蓬惹人喜爱，但一节节的素藕在泥中默默守着清白。富贵之人只看到金色茎枝摇曳，不知道那东西不好吃，江湖上藏着的美味多得很。

《忆蔗》

老忆儿童立市旁，樱桃未熟已先尝。
年来佳境频抛却，为说天家有赐浆。

甘蔗是孩童喜爱之物，可啃嚼，可榨汁，刨皮剁段，甜蜜的浆液顺着腮帮直流。透过诗作，我们可看到一个小孩站在甘蔗堆旁，等待卖主去皮榨汁、馋沫直咽的情景。

《忆桔》

每对秋风颂秋辞，霜高正及洞庭时。
乡心隔断长淮水，不忝红尘折荔枝。

此诗借桔写人，歌颂屈原的风节，《桔颂》随着秋风传诵，寒秋乡远，红尘桔黄，虽然比不过荔枝的富贵，却也是乡中佳果。

《忆芋》

雪桃以黍事非伦，枣栗相投不足珍。

御苑殷勤思豆麦，更传佳种到贫民。

宫苑之中，佳果不绝，枣栗不珍。但芋头倒是百姓可以填肚的食物，豆麦欠收，有此种植的好品种，可以渡过饥荒。诗人身在庙堂，心想贫民，是忧国忧民之人。

《忆菱》

烹葵剪韭楚人家，朱陆盈筐向水涯。

却怪采莲声未歇，菱歌偏傍夕阳斜。

农村的菜蔬很多，葵花韭菜五颜六色已经装满竹篮了。江南水乡还有很多的野味，那边采莲的歌声传来，赶紧划舟下水，还有许多的“野鸡菱”、“大肚菱”在水草中等着你。夕阳西下，采菱的吴歌隐隐传来，采菱的“长脚盆”划向彩霞深处……

《旧帙中又得芋一首，并载之》

不共园亭野菜挑，水耕滋味胜山樵。

老妻怜我三更读，自向炉头煮芋苗。

芋头生于水地，比山中珍味还要好吃。诗人读书深夜，老妻煮芋头给他当夜宵，炉火红红，情意浓浓。

马世俊的数“忆”，道出了他对家乡特产美味的思念，笋、藕、蔗、桔、芋、菱，都是乡间食物，都是惹馋零食。诗作忆出孩提的记忆，忆出家乡的味道。

马世俊对溧阳胜景一直牵肠挂肚，耿耿于怀。身在京城，有老乡至，他思乡心切，一一问之，诗作感人肺腑。“洛阳亲人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里是“溧阳亲人如相见，一片深情问乡故”。

“乡人来，感怀邑中旧游历诸地，伏枕一一问之”。

《问沧屿》（旧有孟郊蔷薇诗）

六龄识沧屿，能读孟郊诗。

尚有荒台在，游人非昔时。

作者六岁就游过城中花园沧屿园，已经能读碑上孟郊的《蔷薇诗》了。如今问乡人才知只剩荒台尚在，游人不比从前。

《问菱园》

自爱菱桥月，寻幽得小园。

欲询兴废事，桃李不能言。

幽园桥月，常在记忆之中。人世如园事，兴废两不知。问谁去呢？园中的桃李依旧争艳，但不会告诉你经由。

《问秦桥》

伯父海国所居，今其家已毁，而百丈沟水犹流入园中。

策杖人何处，难追少壮游。

多情是沟水，犹向故园流。

秦桥应为秦公桥，又称夏桥，因秦梓居住而得名。百丈沟从南山流出，经燕山、湾里、庄家、钱家，自西南而东北流入夏桥一带，又称“百里长沟”。诗人巧妙地借用两个地名，写出对故园的怀念，言简情深。故人已去，沟水长流。今天，这两处地胜也无闻了。呜呼！

《问甃溪》（祖居旧第）

旧阙枕溪水，高鲁累叶传。

独怜住尘市，翻买甃溪船。

甓桥马家村应为马世俊祖居，临近长荡湖，水网密布，溪流纵横。马家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住在都市里的作者，一直想买船返乡，重归故里。

《问西塘》(余母氏里)

山川所游历，皆侣雪边鸿。

独有西塘路，时来魂梦中。

走遍他乡的山川，皆是雪泥鸿爪，唯有外婆家的那条路，魂牵梦萦。

《问冢山》(先人墓地)

不忍望山色，松楸闲白杨。

天涯游子泪，莫问墓田荒。

冢山为溧阳、宜兴分界山，临近洮湖，风水极佳。山上松树杨树成林，祖茔却荒草丛生，只因游子浪迹天涯，不能前来除草壅土。

《问马塘》(余读书旧地)

胜友已云散，高楼谁复歌？

马塘风雨路，寂寞锁长河。

过去的同学好友都分散了，还有谁来高楼放歌？风雨兼程的上学路上，只有长河静静地依旧流淌。

《问湖荡》

正则兄所居，今正则已成古人。

湖上诗人去，村边树影闲。

惟留野田岸，僧屋二三间。

湖荡村上的诗友兄弟故去，村边的树影也没人来吟诵了。田野水边，只有湖

荡庵的二三间僧屋尚在。

《问水西》

丞相祠何处，荒荒对古村。
村边诸父老，能得几人存？

水西在城南，为宋丞相赵淮世居地。马世俊曾在此读书，过去的村上老人，还有几个活着呢？

《问芝山》

山是真名士，终身不卖名。
洞门春寂寂，闻说有人耕。

芝山是溧阳名胜，陈名夏就称陈芝山。能在这样的地方耕种，岂非桃源人家？芝山古人多诗，惜今炸山取石，不复存在。

《问崔芥》

予向欲择居其地，闻已为僧所得。
胜地堪投老，茅簷绕竹林。
空中谁卓锡，怅望白云深。

崔芥有千华寺，冰莲出井，仁虎驱恶。这里是养老的胜地，修身的胜景。

马世俊有《自题画卷》诗：“江南风景几时还，终日濡毫只掩关。问道长安车马客，相邀游我画中山。”他对江南的景物，是充满自豪向往的。故乡不能往回，只能寄情笔墨、画图疗思了。

马世俊的回忆询问，充满着对故乡的熟识和思念。他的诗作是乡间名胜古迹的诗化经典，是乡土教育的绝好材料，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研究。

马世俊的“妇叹诗”

古代的“闺怨诗”，自成系列。妇人的闺中怨叹，反映的大多是夫君远行、恋人不归、情人抛弃之类情感，多是倚栏远眺、帟帐孤寂之类的叹息，多是临水照影、睹燕思春之类的幽怨。封建时代妇女地位低下，男人好像是她们唯一的寄托依靠，一朝分离分手，哀怨之思之情之诗便绵绵不绝。

马世俊的诗集中，有为数不多的“妇叹诗”，写的都是劳动妇女的真情实感，是辛勤劳苦的真实写照。他的笔触，完全摆脱了纨绔子弟的娇情卖弄，洗尽了无病呻吟的粉黛铅华。他的“妇叹诗”，叹的是底层生存的艰难，叹的是农妇劳作的艰辛。

《蚕女叹》

何事迟迟至，春风动晓云。
游丝先拂袖，芳草忽笼裙。
呼妹为同侣，防人学使君。
提蓝归去早，不侣妇功勤。

《织妇叹》

蟋蟀鸣何早，飞蓬谢镜奁。
妾犹勤旧织，郎已问新缣。
暮色千砧动，秋怀万缕添。
鹊鸠任巧拙，筐积果谁兼？

养蚕产丝，乃旧时农妇的大事。春风刚拂，就赶紧铺纸养蚕，到田里采桑，叫

上妹妹同行作伴,以防有“野男人”骚扰。年轻的妹妹没心思采摘提篮早归,妇人一个人更加勤快地采着桑叶,家中的蚕宝宝等着吃哦!

养蚕结茧,剥茧缫丝,拈丝成线,抽线织衣。傍晚蟋蟀早早鸣叫,头发乱蓬已没工夫梳妆。妇人又在旧机上织衣,丈夫已在问何时能穿新绢衣裳了。入夜捣衣声已起,秋凉要添新衣。不管妇人似喜鹊那样勤快,还是像斑鸠那样笨拙,那筐里面的一堆丝线谁会帮忙缫织?

这两首蚕织诗,贴近生活,是江南农妇生活缩影。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细腻地写出了农妇的劳作,农妇的乡趣。

马世俊还有一首《织丝曲》:

新缫故缫妾不知,妾心恰似蚕初丝。
丝长丝短从伊织,只忆缠绵作藕时。

你喜欢新衣还是旧衣我不知道,只是我的心还和新蚕吐丝时一样。丝长短好坏是以为你织衣知道的,永远记得两人缠绵悱恻的花样年华。

这首闺妇诗写得很特别,织丝的妇人以丝衣暗喻,提醒丈夫:“我心依旧,如蚕如丝;郎心莫知,新衣旧衣?”

马世俊有《有妇叹》(除夕作)长诗一首,从妇人的角度,叙述侍奉丈夫一生的叹息。“有妇有妇守荒田,梅花一树照独眠。”“缙巾来归才匝月,良人出门何仓卒。书笈茫茫泛烟艇,今日奔吴明日越。闺中明月不同看,沧桑分散洮湖滩。波平浪偃一相慰,良人白发犹求官。”

男人忙于考功名,把妇人放在家里守田独眠,回家没有待上一月又奔吴赴越,已是满头白发还在追求功名。

“良人读书妇所知,五更冰雪自炊糜。”“良人应诏黄金台,飘零自举天涯杯。”“年年岁岁灯花下,正似梅花开复谢。有妇有妇天一方,且复怀君坐清夜。”

男人读书,妇人五更起身准备夜宵。到男人高中金榜,妇人只能举杯遥祝。男人出外做官,妇人和他天各一方,又重复独守空房。

这首《有妇叹》,平实生动,写出了—一个妇女为热衷功名的丈夫牺牲一生的经历,实在有诗人自己的影子在里面,有感而发。

《泰山妇人行》也是一首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诗作，作者在诗注中有“书酷吏传后”，他曾为清廷写史，看来也是有感而发：

泰山妇人吞声哭，自言家在泰山麓。
白昼不敢出门去，泰山之下猛虎伏。
山风起处声怒噪，前窜熊罴后麋鹿。
去年吾夫作虎脯，今年吾子葬虎腹。
便欲辞家择乐土，赳赳未行心畏缩。
君不见商君论囚渭水赤，
宁成一怒诛三族。
杀身岂肯全寡妻，破家无复存茆屋。
妇人犹在泰山下，终身辛苦守茆独。
吁嗟乎！
食夫食子留我身，翻谢猛虎何其仁！

这是一位泰山脚下妇女的血泪控诉，丈夫和儿子都被猛虎吃了，剩下她一个独守茅屋。猛虎伏在山下怒吼，还在等着她这顿美餐。她想远走他乡选择安乐，但心里害怕步履艰难。流亡可能要囚禁或诛灭三族，她只好孤独地一个人苦守这块恐惧伤心之地。猛虎啊，你真仁慈，吃了我的夫和儿，为什么偏偏留下我独受煎熬！我要谢谢你啊！

全诗平白如诉，仿佛一妇女在哭泣着自言自语。苛政猛于虎，酷吏比虎恶！泰山，其实也是中原的代名词，猛虎当道，恶吏肆虐，哪有老百姓安稳的日子？骨肉生死之隔，夫儿阴阳两别，只剩下一位孤独的妇人在山风中哀泣哭诉，这是多么悲惨凄切的一幕！

马世俊写妇女题材的诗，充满着同情、感叹、申诉、不平，言辞平白简练，句子朗朗上口，内涵亲切深刻。字里行间，有他母亲、妻子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感叹。在明清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个读书教书、考人考己的知识分子，实属难能可贵！诗歌明显受歌赋的影响，有白乐天、杜工部的遗风。

体恤民情，同情妇女，关心乡人，马世俊的“妇叹诗”值得赞赏。

马世俊的文友情

古人交往，意气相投，诗作酬唱，风流儒雅。

同学蒋超评价马世俊言：“甸臣嗜山水，喜投赠，集中所载大抵山川阅历、友朋赠答之作为多。”郡人张芳祇说：“太史初集称，前朝之季，锐意文治，四方敬应之士，翕然同声。”

马世俊与文友交往，情真意切，举几人为例。

一、与马世杰

马世俊和哥哥世杰，都是名誉江南的俊杰，时有“二马”之称，人喻之陆机、陆云两兄弟。马世俊兄弟俩手足情深，又是文友，有诗文往来。

《送万长兄北行》

江城霁色动骊歌，驿路初闻暂止戈。
桃李三春开白社，风涛百丈渡黄河。
名投玉署丝纶近，客上金台感慨多。
回首南云将有寄，凤楼佳句问如何？

世杰字万长，这可能是他北上考功名的一次暂别。路上的兵事暂已平息，可能是指明末清初。驿道漫漫，黄河汹涌，这次上玉署金台肯定是会有许多感慨，等候你有佳句寄来！

马世俊有《赋得我爱铜官好》一诗，注云：“怀万长兄。铜官，伯氏万长读书地也，邑南诸山，此为最胜，结庐未暇，旧游不忘。仆自冬徂夏，长为旅人，因念伯氏之啸歌，并怀兹山之幽秀，遂赋太白句以寄焉。高柯修竹，庶清荫之可分；碧涧舟

崖，羨白云之无尽。诗言志也，仆之谓矣。”

这首诗《溧阳古诗选》有收，但不知为何此段长注不见。李白曾有《铜官山》诗，后人疑为别地之作。马世俊怀念和兄在此地读书，茂林修竹，南山幽秀，曾一起结游啸歌。“岁月不可再，役役嗟微躬”。

《寿万长兄五十》

童穉肩随老大疎，石门相见雁声初。
花前兄弟一尊酒，膝下儿孙万卷书。
偶对白麟名早著，欲游金马俸无余。
莫疑宦达偏迟暮，高士于今半鹿车。

马世杰五十大寿，兄弟俩花间一壶酒。文名卓著的人即使无功名俸禄，留给子孙的也只是万卷书籍。但不要怀疑仕宦之路大器晚成，做个高士已经成功了一半。世俊写此诗时应该尚未高中状元，但对金榜金台还是充满了信心！难得有这股韧劲。

《得伯氏万长岁朝书》

才见乡人岁已除，春来又得岁朝书。
别离自觉鬓眉改，老大何堪子侄疎。
五载窗前无片雪，昨宵灯下梦双鱼。
池塘草色犹堪赋，怕向承明问直庐。

年底才见乡友来访，开春又得兄长的贺岁信，分别五年面容已改，不改的只是兄弟情深。

马世俊在《越中与万长兄书》中，感情十分浓郁：“兵火载道，游子得家报，喜忘饮食。来书以母枢为念，仁孝之意溢于言表。”马母死后未安葬已经二十年，世杰来信和世俊商量，弟弟回信：“弟愿兄协成此事，以慰亡母之魂！”

马世俊还几次为兄长诗集作序，在《伯氏万长子遗草序》中，他深情写道：“同伯氏治古今言凡二十年。凡所流阅文体迁变与天地沧桑等，不可究然。”“伯氏之

治文及诗，有华簪博带者，有角中羽扇者，有蹲甲穿札者，有雅歌投壶者，有朗星明霞者，有晓风残雪者，要其为体，则无不协也。”对其兄的才华赞叹备至，而世杰因耳疾不第，隐居南山，教书为生，亦悠然自得。命运不同，兄弟情契。

二、与芮长恤

马世俊《望瓦屋山怀芮岩尹》有句云：“为忆东山卧，苍凉不可闻。”县志上为“苍苍不可闻”，应以诗集为准。

芮岩尹，马世俊“十三子文社”同社好友，明亡后隐居瓦屋，终老乡间，是一位气节高洁的文人。马世俊的《匡菴文集》芮长恤（岩尹）曾为之作序。开头写道：“文章盛衰之故，世为之欤？抑人为之欤？”明社灭亡，芮岩尹改字长恤，在湖边边哭边吟《沧浪吟》，悲痛明朝之不存。

《读芮岩尹沧浪吟题赠》

抱膝山中一榻悬，读书夜半枕书眠。
沧浪吟罢心如水，月影侵阶霜满天。

山中高士，以书为伴，洁身自好，心如止水，月照树影，阶满冷霜，抱膝难眠，思如江潮。

《茅山白云观访彭葵若、芮岩尹》

山中访我友，路涉忘崎嶇。
一见破间寂，更与穷高深。
初雨林泉净，俯仰空人心。
岁时非永和，因寄无古今。
彭子出篋书，流览已开襟。
芮子颇好道，得闻圣贤箴。
清夜有遗思，不待晨钟音。
莫言分袂速，千里将重寻。

彭、芮两子，都应是世俊挚友，因朝代更替，他们走进茅山白云观，隐居遁世。茅山位于句容、金坛交界处，是道教的“洞天福地”，也是葛洪、陶弘景修炼的宝地。不顾路途坎坷，马世俊来看望老友，一见大家非常亲切。岁月流逝、朝代变更，但道教无古今之虑，亘古不变，两位好友纷纷向他讲述学道成果。雨后林泉清静，深山消人杂念。静夜睡不着觉，不待晨钟敲响就向友人告别。不要讲我去匆匆，虽远在千里之外京城里，我还会再来拜访你们的。

这里有一有趣现象：陈名夏、马世俊同为芮长恤好友，而芮对陈几拒不见，对马却亲切如故。应是陈名夏降清称臣之故？但马亦为清廷之官了啊。大概时间已经过十几年，情况不同而已？

《朝发浮山南，同戴霖生、李美士访芮岩尹》

朝发浮山南，暮宿方山下。
林间变颜色，霖叶赤如赭。
访戴情何真，御李事非假。
世态不复问，良禾在田野。
驱轸向高峰，晴云自潇洒。
我有素心友，抱褐歌虞夏。
卷迹爱幽独，微吟信高寡。
隔契五六年，芳襟久难把。
剥啄乍相视，踟躇不相舍。
呼酒正新醅，论交仍旧社。
故人且阔疎，何心问车马。
平莽动感慨，流泉足陶泻。
借言东冈陂，谁是独守者？

马世俊和戴李两位从长荡湖边大浮山，到方山去看望芮岩尹，访友的感情真挚朴实。相见不讲社会世态，只言田野禾苗。驱车登上高峰，潇洒自在开心。芮岩尹是我归隐的好友，独守高洁，幽居独处，虽然五六年没见面，一见拥抱着一起。想到分别，踟躇着十分不舍。喝着新酿的酒，谈论着过去结社论学的情景，

分开了这么久，无心去问归程。感慨的情绪像流泉奔泻，像芮子这样的守洁明志者，能有几人？

马世俊与芮长恤的交谊，应是邑中佳话。

三、与马伯绳

马伯绳，字正则，别号洮渔子，自号蝶翁。溧阳人，明朝天启年诸生，国变后隐居洮湖。工诗，善画山水，与马世俊酬唱颇多。

马世俊在《正则兄传》中，对马伯绳的一生做了详细生动的描述：“正则，讳伯绳，自号蝶翁，溧之诗人也。居城中春雨桥东，与余为再从兄弟。”把正则归为“诗人”、“兄弟”，言简意赅。

马伯绳九岁丧父，家境颇丰，光佣丁有数百人。母亲姓彭，也是大户人家。他喜欢游历宴会，家产日渐“衰废”。天启年间他读书虎丘，“吴中文学者与交遇，试辄不利。”曾跟胥溪狄汇川先生学诗，不久就超过了老师。马伯绳喜欢风水方舆，把父亲改葬宜兴锦山，并“筑舍守之”，耗费数百金。他一天天穷下去，“遂谢去绮统之好，而以澹约俭嗇为事。一布袍四五年不易，敝巾破履杂于众宾，由由如也！城居有小筑，颜曰：丸阁。朝夕吟诗，自娱而已”。一个由富及贫的公子哥儿、文人诗友，跃然眼前。

马伯绳曾随舅舅赴浙江衢州、桐庐、武林，“囊无所携，惟得诗数卷”。明亡后他隐居洮湖边上，只与几个僧人交往，足迹很少进城。他对仆人好言好语，像借来的一样。自己披蓑耕田，忙碌阡陌，田多荒芜。有人笑他：“你有房不住、有仆不用、有田不会耕，白忙劳苦有什么用？”马伯绳笑笑反问：“今朝天下，过去的朱楼华屋都化为灰烬，过去的王孙贵族都变成皂隶仆人，你就是杀了主人，他也不能给你封侯了啊！我自己种自己收，满足了啊！”他又说：“我有宅不居、有仆不使、有田不尽耕，不是说我的环境如此。我从小见惯了豪华侈奢，自命不凡，国变后什么都没有了，仅留一条性命苟活已经满足，还有什么过分之求吗？”

马伯绳身居湖岸，却与马世俊等诗友唱和欣赏，邮寄称诵。他“尤工丹青，缀花鸟有别致，丹阳姜姓刻其姓名于书谱中”。马世俊欣赏他的诗作。己亥正月，马世俊、世杰、伯绳三人“为山水盟”，先坐小船到宜兴善卷之麓，入龙池寺，雪花扑窗，松竹有声，三人各成百韵，达旦不休。又过一年冬，马世俊由北返乡，住在

岫云庵读正则的诗,当时正好县邑选辑“溧人诗”,但没有功名的人不能入选,马伯绳戏语:“我如果早死了,这选集中必然有一卷可看。”众兄弟大笑起来。

马伯绳死于庚子年上元日,年五十四岁,有子早夭,有女嫁史氏,还有七十四岁孀居老母活着。诸兄弟哭着在他的诗卷上留言:“雅音不再!”伤心啊!马世俊灯下流泪为他作传,也为我们传下一位栩栩如生的昔日溧阳诗人,溧阳才子!

《哭正则兄》

犹是当年锦里人,躬耕湖岸想遗民。
敲诗每欲追韩孟,避世何从问秦晋。
三尺短墙常近水,半床古字已生尘。
泉台此去重回首,只有堂前白发亲。

马世俊在《雪中遥祝正则兄五十》一诗中,有“母年七十子五十,祝君百岁何难及”之句,孰料仅过四年马伯绳就走了,伤心之处,溢于诗表。

马世俊曾有《赋得朝游北湖亭》一诗,后人有选,却丢弃诗注,今补上,可弥补兄弟两人胜似骨肉之情。“怀正则兄。北湖即洮湖,从兄正则所居也。行吟泽畔,时遇渔人,诗句浮沉,或同瓢隐,偶怀同气,一入市城。夏林草树,尝扳槛外之花;春雨烟波,独泛桥边之月。顾我征尘,羨其高致。北湖亭上,谁能白眼看人?瓦屋峰前,勿使青山笑我。情之所托,诗可以兴。”

四、与吴颖

吴颖,字见末,号长眉,清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至潮州知府。

吴颖曾为《匡菴诗集》作序,称马诗“庆贺之诗华而贍,赠答之诗悠而长,游宴之诗高而逸,怀思之诗迥而永,闲适之诗美而秀,讽谕之诗澹而深,感悼之诗哀而切”,评价忠肯,确为挚友。

马世俊也曾为吴颖文稿作序:“见末吴子,驰声名于天下,已近二十年。天下读书怀道之士,咸知有见末矣。”“余见里中贤豪者流,率澹寂寡交,誉闻不出于户。天下先知有见末,而里中士亦得游扬其声名于歌呼应和之间,则见末之为功于里不小也!”这样的评价,颇为推崇了。吴颖“论文结社于里中,诸子恂恂若将

不及焉！”世俊“幸见末与余同里，而余亦幸夙知有见末”。他对一个人的赞誉如此，鲜见！

《茅山答吴见末》

两宫香霭共霏微，独抚高楼音问稀。
剪柳好风随鸟入，妬梅残雪傍人飞。
仙旌一去笙箫冷，逋客重来猿鹤讥。
书到屋梁云正起，怀君百里赋调饥。

《怀吴见末》

问字常盈户，酬诗偶出关。
素交真似水，大隐岂须山。
雨雪来深悟，星霜识故颜。
如何天下士，杖履托田间。

五、与宋之绳

马世俊和宋之绳，同邑诗友。“平陵马甸臣先生，少时与陈石云、宋柴雪诸先辈于喁唱和，同治诗于濂上。继而石云、柴雪连掇巍科，独甸臣怀书未遇，郁郁不得志。”（《匡菴诗序》）但两人交往密切，友情绵长。

《和宋其武太史园居秋怀》

秋气来亭午，悠然费独寻。
千峰争远霁，一叶散庭阴。
水落荷根出，风迴竹屿深。
凭轩兴何限，知有白云心。

诗一共有四首，大多是借景抒怀，和唱助兴，是一幅幅生动的江南田园图。

《大石山宋氏桃圃》

寻芳历历问樵渔，枉渚迴汀理旧居。
置酒邀余桃树圃，歌诗赠尔荣花畬。
武陵溪畔陶潜记，大石峰头李白书。
回首闲云杳然去，轩车不到拜迎疎。

这里的宋氏桃圃，没明指，但据陈名夏《游大石山宋其武邀观杂剧答谢》一诗分析，应为宋之绳家业。主人备置酒席邀至桃圃，实在是个桃源人家好去处，大石山头有李白书的“壮观”两字，是宋时赵盱夫刊刻，闲云悠悠，车马稀至，歌诗互赠，文人雅事。

《宋其武先生招饮，偕李长公、汪我生、宗元齐、同誉姬席中即事》

欣逢故乡人，酌我故乡酒。
凉叶散墙隅，日影斜虚牖。
寝食共平生，渴饥复何有？
所嗟流光速，冉冉不相守。
青蛾映白发，眼前自好丑。
粗豪让少年，偃蹇甘衰朽。
我来樱桃初，我去枣实后。
家园无一字，妻子知存否？
情重语难申，感深意谁剖。
聚散顺史事，临歧更携手。

这顿酒应是在京城喝的，去了不少人，不知都是溧阳人否？一群故乡人，喝着故乡酒，感叹时光飞逝，白发丛生，年少的轻狂不再。家中没有音讯，不知老婆孩子怎么样了？话到嘴边，个中牵挂无人知晓。又到分手时分，时间太快，告别时一次又一次握手道“保重”。此诗应写在崇祯末年甲申之乱，宋之绳已在京城为官，马世俊尚未得功名。从“妻子知存否”一句来看，应是动乱岁月。写到宋之绳，多为“招饮诗”，看来他喜欢酒宴，难怪后来“痛风”病发，痛不欲生！

《送宋其武先生之南昌任》

客里情亲似到家，何期荣戟出京华。
我怀好句吟秋水，谁赋离情向晚霞。
南浦云光生碧岫，西江月影照银槎。
褰帷万里君家事，吴楚风烟路未赊。

此诗应为宋之绳赴南昌参议任之作，作者对他的赴任，充满离情别绪，同在异乡为异客，乡情胜过亲情亲。诗的后两句，其实是劝慰宋之绳，君子当以国事为家事，如身体实在不行，吴楚间家乡的路还是畅通的。宋之绳因痹风病，朝廷几招而不至，勉且赴江西，马世俊是有预感的，毕竟是几十年的老友了！

六、与陈名夏

马世俊与陈名夏的唱酬，诗集收得不多。

《送陈百史先生江上》

枫叶初飞古寺边，月钩恰向钓矶悬。
孤亭枕石心殊迥，绮阁临流景愈妍。
南国久违丛桂约，西风重上芰荷船。
为惭献赋遭逢拙，相送江天思渺然。

作者站在江边送别陈百史，秋月如钩，深秋红枫，孤亭绮阁，无心去欣赏美景。南下的折桂之约，坐上小船随江漂泊，想写赋送行又怕拙劣，相思的情感如江天一色。

陈名夏被杀，马世俊在甲午年写过《陈芝山先生哀辞》：

公之生也，濂水之湄。公之死也，燕云之市。公之文章，任一时之去从；公之姓氏，纪两朝之终始。呜呼！龙门瀛州，名足动乎公卿？华亭上蔡，祸乃延乎妻子？昔日之附公者，多轩冕之徒；今日之哭公者，仅布衣之士。呜呼哀哉！

哀辞简短，感情充沛，世态炎凉，人生无常，尽在哀叹中！文章一时，两朝终始，陈名夏的悲哀，是一代文人的悲哀！贵为相国时，攀附者达官贵人；死后哭你的，是我马世俊这个布衣！

文无长短，贵在情真。

七、与陈伯玘

陈允衡，字伯玘，江西人，曾在溧阳小住，是当时名流，从事刊印诗文集工作。

马世俊曾为之作“诗序”：“伯玘读父书，奋起为文词，所交者皆天下知名之士。其得于山水游从、杯酒流连、歌呼唱和者多矣！”“伯玘登千岩而俯万顷，旷然其有感于中。风景非昔，江山动人，则余犹愿策杖而随矣。”

马世俊曾有《答陈伯玘》信札，谈诗及人，谈古论今，谈先人马一龙和友人陈名夏，一连四封信，欲罢不能，可谓知己。

马世俊《秋夜同陈伯玘过灵雨亭》一诗中，有“石桥归路近，携手共依依”之句，可见两人颇为契合。

《彭园雅集和陈伯玘韵》

入户心从隐，看山眼易明。

溪边谁共笑，谷口尔躬耕。

榴火翻丹棘，藤花似紫荆。

孤舟维夕照，相送倍含情。

陈伯玘在溧，与一群文人诗友或如园或彭园，作诗雅集，唱吟酬和，好生快乐。夕阳西下，返舟解缆，笑语化作道别声。短暂相聚，终有一别，依依不舍，何处重逢？

人生就是如此，何处不相逢，何处不离别？马世俊的文友情，贯穿于诗篇，洋溢于人生。

马世俊的儿女情

骨肉至亲，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牵肠挂肚。

马世俊是位有血有肉的文人。读他的诗文，常常为他的儿女深情打动。少年失怙，他痛悼母亲，是为孝子。连年失子，他哀悼子女，是为慈父。掩卷泪垂，想问：为什么这么多的生离死别降落到一个人的身上？百般折磨、千般撕裂才是锤炼一名状元意志的前提吗？

一、哭母亲

马世俊三十岁那年，写过一篇《祭母文》，非常感人。“俊年三十矣，母之去世已十有六年。”十四岁，少年丧母，是多么悲痛的事情。

马世俊记叙儿时的记忆。母亲生下他后，请了一位姓许的奶娘。稍大点，他整天顽皮嬉戏，奶娘怕他的母亲，不敢索要果食，就对小世俊说：“你娘最疼你了！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怕！去要！”小世俊回答：“爷娘只有一个，我怎么能怕父亲的威严而利用母亲的慈爱呢？”母亲也看出儿子是个有个性主见的人。有一次，贪玩的世俊跑远了，回家母亲命他跪在膝前，用小棍抽。许奶娘在旁边笑着说：“细伢(小儿)知道你娘的厉害了吧？”母亲也扑哧笑了起来，让儿子起来。

世俊六岁入塾读书，每天一早母亲帮兄弟俩穿衣穿鞋。黄昏回来，看到母亲一个人在灯下给梨枣上糖，忙到三更，明一早要到集市上去卖。母亲把梨枣放在茶几上，命世俊、世杰背书，背得多的多吃。世俊贪多背书忘得快，所以吃的梨枣少。

九岁那年，世俊祖母去世。母亲服侍病中祖母三年，孝顺消瘦，尽心尽力。谁知十五(虚)岁那年，母亲竟然抛下小世俊去了。又过四年，许奶妈也走了。呜呼！痛可胜言哉！马世俊泣诉：“俊幸而为诸生也，母不知矣！俊幸而完室家也，

母不知矣！俊幸而有三子也，母亦不知矣！且俊不能谋生，卖文为活，稍稍自立，邑中之人无不知有俊者，而母独不知矣！呜呼！痛可胜言哉！夫十五年之前，俊尚未能事母，而母不知俊之解终也。十五年之后，俊知事母，亦有以稍慰母矣，而母又不知！俊又乌知母之于地下何如哉？俊所知者，教俊兄弟之勤耳，事祖母之孝耳，是母之苦辛俊皆知！而俊之稍稍自立，不得罪于母者，母独不知也！”

生死相离，阴阳两隔，一连串的知与不知，是儿子对母亲的哭诉禀告。母亲已长眠于地，听不到了。儿子想孝顺母亲，没机会了。儿子成家立业，母亲看不见了。儿子知道母亲的辛苦，但不知母亲地下可有知！层层递进，声声凄切，作者如泣如诉，读者感同身受。

马世俊在《越中与万长兄弟》中，和兄世杰商讨母亲入土为安之事：“弟思及此，魂梦为促，前书淳复，何如？何如！”“弟愿兄协成此事，以慰亡母之魂！”

在《嗟哉行》诗中，他注道：“冬十一月十日，合殡考妣于冢山，挥泪作。”

一

日离父侧梦见之，绕庭笑语如生时。
醒知死别已二载，丧车将驾惟空帷。
嗟哉兮！
山风发发吹红叶，素旒飞翻泪沾泥。

二

母死不葬三十年，一棺犹寄荒山边。
两苦风酸并作恶，梦魂漂泊何凄然。
嗟哉兮！
松楸未青碑未勒，母骨久冷儿心恻。

停棺三十载，不知是何风俗。是给父母合穴？是为选择良墓？从兄弟俩的信札中，好像后者为多。父母合葬，了却心愿。马世俊的祖父母也是停柩多年才入土，也许是不忍骨肉分离？世俊给世杰的信上言，我俩身体素质都不好，我可能寿命不长，所以要先葬父母。他一言成真，六十不到，随父母而去，惜哉！

二、哭寰儿

寰儿可能是马世俊第一个儿子，生下不久就死了，他十分哀伤，写诗六章记之：

一

寰兮初生，六月载暑。顾汝复汝，母氏罹苦。

二

亦既觉慧，亦既笑语。呼母为父，呼父为母。

三

寰兮遘历，朔风载寒。笑不汝闻，啼何其难。

四

亦既卜筮，亦既医祷。知汝无救，诡曰其好。

五

东园伐竹，南园吹笙。挈如游止，我心忧止。

六

南园种树，东园落子。送汝归止，我心颓止。

寰儿夏天出生，母亲吃尽苦头。他会笑会呼，父母不分。到了冬天，寒风凛冽，听不到寰儿的笑声，连啼哭声都没有了。心急如焚的父亲又去占卜，又去问医，但都说没法救了！回来还要瞒着孩他娘说：“会好的！”把儿子葬在东园。父亲的心像死了一样啊！

三、哭匡儿

马世俊写有《匡儿哀辞》，生动哀伤。

庚寅那年，马世俊读书金坛，梦中登上匡山，正好那时生了儿子，于是取名叫匡。一岁时，匡儿头生火痂，他娘为之百方求医才痊愈。马世俊数月不归，一回

家匡儿就笑着扑入他怀里，儿娘说，这细伢死过几回了！父亲抱着他到爷爷那里，匡儿欣然跃向祖父，祖父高兴地说：“这细伢不是我今世孙子，是你上辈子的旧识啊！”爷爷去世，匡儿频频抹泪。

癸巳春月，马世俊凿壁开窗，坐吟其中。匡儿嬉戏在他旁边，不肯离去。他娘喊，他答：“我陪爹爹读书，没做别的！”一会儿坐在父膝，看看云光渡窗格，一会儿看看燕雀飞集墙角。匡儿对父说：“去的是云，来的是鸟。”一点没错，马世俊开心极了。马世俊教匡儿两兄于夏林，听到他出痘，赶紧回家探望。这时是夏天的五望日，马世俊为匡儿作诗礼佛，祈求保佑。岂知才过三日，匡儿已永别。发痘之时，匡儿眼闭，世俊夫妇以为他睡着了，他则啼喊：“我看不见娘了！”痘发神散，他眼睁开了，母亲痛哭厨房，匡儿看到娘亲，连喊不止！

“呜呼！婴儿不解生死！汝目之乍开，岂知为永闭乎？”“汝祖素爱汝，泉下有知，自当提挈汝。但汝尚食乳未去怀抱，一旦舍汝母，将谁倚耶？生死之事，余所不知，而谓汝知之耶？余之生汝，仅作匡山一梦而已，哀哉！”

出痘生疹，在旧时是婴儿杀手。这么一个招人喜爱的孩子，几天之内就被夺去了幼小的生命，怎不令父亲伤心欲绝！

《哭匡儿》

一

我归而汝迎，我出而汝啼。

今见汝一出而不归，我何以为心兮？

二

饥而向乳兮饱则去，自拜自舞兮自笑自语。

故匿其身兮于屏于几，急而呼之兮应声曰唯。

三

忽仰口而向我，不问街头果，但问厨下火。

四

我有素纨，汝戏而副。佯笑不言，藏纨余侧。低首出门，望我颜色。

我佯怒汝，汝走而踣。哀哉！汝实多慧兮，痛填胸臆！

五

朝听邻家之儿啼兮，惊吾儿之复生！既而觉其非兮，呜呼！我何以为情！

一幅幅忆儿的场景，一个个稚儿的画面，在马世俊的脑海，挥之不去。

四、哭窠儿

马世俊写的哭儿诗中，以窠儿为最多。

《忆窠儿》

一

秋枕劳劳有所思，候门应怅父归迟。
一城柿栗无钱买，愁汝书堂罢课时。

小儿立在门口眼巴巴地盼着迟归的父亲，父亲看看满街的柿子栗子没钱买给儿子，要是小子不高兴了不肯读书怎么办呢？诗歌写得平淡中见深情，富有生活情趣。

二

卧病知何似，乡云望转述。
裁衣枕上读，索饭梦中啼。
老树迟春绿，深灯伴夜凄。
柴门无恙字，应寄石城西。

三

反畏家书至，其如旅梦频。
牵衣十指瘦，买药一钱贫。
病以庸医剧，啼愁老母嗔。
只因禽犊爱，日夜动吟呻。

窠儿在家生病，父亲在外挂念。梦中还向他要吃饭，贫穷人家多愁多病。怕见到家里来信，仿佛病儿十根细瘦指向他牵衣要钱，买药的钱也拿不出来，庸医把病越看越重，儿子整夜啼哭，母亲责怪父亲。禽犊都有父母之爱，想起来夜不能寐，叹气哀声。

《哭窠》(窠有弟，名胜，名匡，俱先亡)

洮湖兵燹起，生汝乱离时。
性只如黄口，才应近白眉。
相随吾哭弟，岂料汝非儿。
一一笑啼态，俱成死别悲。

窠儿之死，何病马世俊没说。但养他正好是兵荒马乱，估计是甲申之年。曾经陪着父亲哭弟弟，不曾想自己也成死别。

《梦窠》

骨肉归于土，魂气无不之。
重来认门巷，已及春风时。
不暇问儿病，且自忧儿饥。
两兄出门去，从容食枣梨。
昔年所读书，点画将重施。
熟视忽涕泗，梦中惊相持。
晓光扑窗来，儿去我不知。
宿草飞蝶粉，白杨萦蛛丝。
三秋犹足收，万古安可思。

哭完窠儿，又梦窠儿。春天里来认门巷，父亲来不及问他的病，只让他赶紧吃枣梨充饥。询问他读过的书还记得多少？笔画要重新教了。看着这熟识的面孔突然涕泪交下，惊醒才知是梦一场。曙光照进窗棂，儿子何时走的不知道了。绿草飞蝶，白杨绕丝，对窠儿的相思绵绵不绝。

五、哀招官

招官为马世俊女儿，有诗《哀招官》，注曰：“招官，余长安所生女也。自堕地后，未尝闻啼哭，见悬葫芦则笑不止。秀慧异常，终日举两手作斗鸡状，或攒眉学猢猻，备极可怜之态。病且笃，闻余履声，辄呼爹不正。”

自从悦影动门符，未有啼声到户隅。
举手逢人为斗拒，攒眉终日学愁猿。
此时梦里爹娘字，犹带前生慧命呼。
欲卜探环来世事，花前时系小葫芦。

六、哭定女

定女生下来之时，就有算命人讲“难养”。家里人听此言要溺死她，马世俊坚决地讲：“不可！哪有父母杀亲生子女的？”定女生下来多病，挣扎死亡线上数次。一次，马世俊从越中回家，进门也不敢问定女如何了，见侍女抱着一个女孩，相貌很秀慧，很会言笑，惊问：“这是谁家丫头？”知道是定女，很是喜欢。

定女头上生疮，治了很久才愈。好了三个月，娘病倒了不能喂乳给她，她则以出痧不发而殇！“呜呼哀哉！汝之初生幸不死，既而多病又幸不死，疮不愈亦可死又幸不死！何以至今日乃死也？”“岂欲枯父母之泪、裂父母之肠，故为此将死而生、生而仍死耶？”“余立风雨中，视尔穴，其穴旁之垒然者，非汝兄即汝姐也！汝伯谋聚土而筑之，勒石而铭之，呜呼！天下之变极矣！安知汝之先余而死者，非幸耶！”

一个悲怆的父亲，看着女儿的墓穴，边上不是她的姐姐，就是哥哥，马寰、马匡、马胜、马寰、马定……谁能承受得起这种生离死别？坟冢累累，都是幼儿稚女，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蓦然凋谢萎逝。风声，雨声，娘的撕喊哭呼声，侍女的嚶嚶凄凄声，声声揪心裂肺啊！

马世俊对定女说：“汝殡风雨中，墓土皆湿，则可悲矣！然较之系儿于树、弃儿于壑、沉儿于江之中者，不犹幸耶？呜呼！汝之幸则如此而已！哀哉！”这几句话真是声声带血、字字含泪！

马世俊是喜爱儿女的，老天作弄人，命运考验人，生活磨炼人，让他的幼儿稚女一个个离他而去，折磨着他作为一位父亲的亲情神经。我们了解他的舐犊情深，了解他的儿女情深，对了解他性格的另一面会有帮助。

幸运的是，马世俊还有马宥、马容两儿。“令千见、千赋能读父书，孜孜好学，并工于古文词，江上亦有第一流之目。”（《陈廷序文》）更为难得的是，“千见、千赋二子以能诗继先光后，刻其所藏”（《杨应标序》），使我们至今还能阅读到《匡菴诗文集》，这无论对于其父马世俊，还是对溧阳地方文化遗产，都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马世俊与“溧阳二十八胜”

溧阳地胜，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天目湖”和“南山竹海”为国家 5A 级风景区，每年吸引上千万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水甜茶香，空气清新，美食可口，也使这方山水成为江南少有的“长寿之乡”。

宜居、宜游、宜业，生活在“地枕吴溪与越峰”的千年古邑，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一种福分。

溧阳名胜，历代有志记、有图画、有吟咏。陈曼生在清嘉庆年间，请文友汪鸿画十四幅“名胜图”刊于县志，为后人留下昔日盛景，令人赞叹！

读《匡菴文集》，在“杂著”一辑，发现马世俊有“志溧阳二十胜”、“又志八胜”，兴奋不已，激动不已！在我们绞尽脑汁为家乡美景规划命名之际，马状元早已归纳考证，一一列出，这无疑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志溧阳二十胜》

吾里泉壑幽胜，唐孟东野绝爱之，而罕有识者。岂非诵陋之士不足发舒其奇也欤！余惟游，游览之理，譬若择交，未有不识一乡而能及国天下者？登陟所至，采二十胜，愿各赋诗以记。后世有同志，按迹而游，得称巨观，则今日觞咏寔始基之矣。

一、双丫叠嶂

丫山去邑北九十里，双峰并峙，最高峻。自足至顶凡十里。与句曲、金沙并界，两邑望之，势有轩轻，而余邑独望若总角，则丫山之名于溧尤宜。明初高季迪先生过而赋诗，先太史孟河勒石于顶。

二、瓦屋归樵

瓦屋山去丫山右五里，即唐李白登北湖亭望处也。山侧有峡，驱车其间，苍翠欲滴。

三、青龙洞壑

循丫山而左七里，乱石蹲伏，有青龙洞，深幻莫测，屏屋桥梁皆天设。先太史孟河镌书洞口，题为“第一洞天”。右白虎洞，险窄不可入，以故青龙独得名。临川汤显祖慕而来游，亦有诗。

四、洮湖渔唱

洮湖去邑东北三十里，为江南五湖之一。滢漾无际，渔网贾帆，随波上下，诸峰逶迤如画，真胜观也。环湖侧而处者，凡数万家，而蓼滩芦渚，多成阡陌矣。

五、岳潭竹径

宋赵淮御元兵于长荡湖岳山，其结寨处也。形家言：岳山秀甲于溧，卜兆其上者，多产贵人，而先太常竹湖公赐祭葬地亦在焉。山顶有潭，僧人种竹甚森蔚，登者俯湖光如练，超超有凌云气。

六、双坏帆影

坏山，孤立洮湖中是为大涪。舟樯夜行不辨远近，山僧树灯于顶，望以为识。去山半里许，又有小涪，烟笼相望，仿佛金焦。

七、夏林古藤

夏林，去邑南五里，溧多名园，夏林为最。太仓二王记此园林，系江南第一。古藤绕树，如龙蛇起伏，不可端倪。

八、南屏古树

南屏山，去邑南十里，两山对峙如屏，故名。山有新旧两寺，新寺系万历末年建，香火绝盛；旧寺则唐贞观元年所建，今之佛像犹其遗也。寺门列树皆奇古，夏日垂阴，望若深巷，杳然入胜。

九、同官飞涧

同官山，去邑南五十五里。竹箭之美，亚于会稽。山径苍凉可悦，居人缘涧而处。涧阔数丈，骤雨至，则水声溅溅，奔赴万壑，深山若有江河。

十、石岩深坞

由同官而上六七里，为石岩山。益深险，入者欲忘身世若桃源，然俗名桃树底。

十一、三鹤鸣云

三鹤山，去同官十里。志云：有三仙跨鹤而去。山高入云表，瀑之第一峰也。乙酉之乱，避兵者攀附如蚁，追骑不得上，多赖以全。虎豹出没，风雨幻冥。苟非遗世，岂可住哉？

十二、青峰耸翠

跨三鹤而北二十里，一峰矗立如柱，为青峰山。高十里，广则数武。明高帝题一绝句于顶，今勒石犹新。僧寮甚窄，登者凭栏而望，辄恐其坠。

十三、天井流泉

天井山，去青峰十里，乃瀑之奇胜也。山岩有流泉，如雨珠氍氍洒瓴甌。下俯平池，澄莹如镜，有好事者构一轩对之，轩甚小，有四人可舁之而动。登者见此泉即拟观止而返，天井在山顶，路陡不可上，攀蒙茸二里乃见井焉。井分大小二峡，小峡俗名一线天，大峡俗名仙门，状如城阙对峙，又如巨斧劈石，划然中开，高数十丈，广倍之。大峡中有一木，直起千尺，枝叶扶梳覆峡顶，游人坐其下，仰视如盖。

十四、护牙遗胜

护牙山，去邑西南九十里。山甚高大，周围亘百里，为广德州建平县。志云：伍员过此而坠马牙堕，山神救之得免，故又名伍牙山。形家云：伍牙为江南山祖。登其巅，望可数百里。

十五、双虹夜月

邑西半里，群流奔注，有双虹亘其上，月下望城堞烟火，与苍山相映带，亦郭外一胜也。自官吏送迎，设邮亭，置厨传，而此景反俗矣。

十六、大石龙洞

大石山，去邑西十五里。志云：有圣母产龙于此，龙每岁一朝，祷雨辄应。下有龙池，上有龙洞，洞即在大石中。唐李白有遗迹，邑人彭谦重镌之。

十七、观山峭壁

观山，去邑西五十里。乃盘白仙人修炼地，一名盘白山。明万历初，太后感梦而赐藏。山半有平址，俗云蔡中郎读书台，不知何据？绝顶峭壁绕三面，老僧尝依以结茆焉。黄山湖经其下，今湖已塞。

十八、方山石马

邑西八十里，界于溧水，有方山焉。松江僧印林飞锡此地，筑精舍甚丽。山有泉有洞，寺门有石如马，又有十八墩。俗传张道陵尝欲得此山，坐一墩，数之遂少一墩，及起，则依然如数，乃怪而舍去。此野人语也。

十九、芝山怪石

方山去五里为芝山，山无片土，似一巨石，镂空忽起忽仆，玲珑奇幻，巧匠所不能琢。共有三十六洞，非熟游者入其中，罕得出焉。有僧尝抱薪入洞，至深广处焚之，山外人见三十六洞皆烟出。邑令李光祖恒游焉，题为“濂江灵秀”。今为令者，如守藏吏，罕得与民相见于泉石间矣。

二十、沧屿平池

邑中之胜，独志沧屿，系晋谢公考槃处，故一名谢公渚。平池广阔而纡曲，可以运舟。山阴徐渭过此，题诗名《柳浪堤》。

《又志八胜》

一、金濂吊古

濂之滨，野旷而水平，相传伍员过此乞食，有浣溪女济以壶浆，员回顾，女即自溺。员后投金报之，即此地也。有一祠，荒凉颓塌。自李白作《贞义碑铭》后，而临流吊古者，前后不绝云。

二、渡济桥阁

城中文昌阁巍然，渡济桥亦有文昌阁，两阁相望。而南郊外园林苍郁无际，石桥正对阁门。邑侯题为“抚兴胜既。”来往风帆，下通二沈，登阁凭栏，亦旷览矣。

三、巧石仙踪

巧石滨，离城五里。舟从双桥行过，其侧望之，石势阴森，挽舟而

上,其山亦平坦。而山麓层层皆石,嶙峋万状,如从太湖飞来者。中有一潭,巉岩环绕,唐时有仙人道院,李翰林留题已失之矣。孟河公诗:“神仙第宅无烟火,太史文章半草莱。”石上大书,令人景仰。

四、三塔寒光

水之散漫,而为众流所聚者,俗名曰滄。溧有数滄,三塔其一也。昔宋周必大《吴郡录》云:“舟过溧阳,行七十里至三塔院,院在水中,元丰时刘谊作记三塔者,僧伽过江造塔,至此为第三耳。有寒光亭,可眺望。”今塔无存,院无存,亭亦无存,惟苍茫一片水耳。读必大录,可为三塔留一古迹。

五、竹墅沧浪

竹墅距城只隔一关渡,关而出,即墅门矣。万竹丛中绕一水,翼然临其上者,沧浪亭也。坐卧亭中,思所以题之,因叹昔人“水竹平分”四字之妙。

六、燕山松径

西郊外七里有山,其形如燕。堪輿家言:“县基从兹山发脉。”望其气势历落,而南屏、大石诸山,互相拱护,更觉雄伟。山下有一寺,迳径松声如沸,邑人喜从近地游,而秋初香火犹盛。

七、蘧苑旧址

蘧苑,吾家旧园也。中有读书台,下者为池,高者为阜。其地不甚广,而取径纡曲,修竹丛林,行之不尽。今为佛地矣。所惜者海棠一株,根柯数尺围,花开时如锦云覆屋,士女春游纷杂。老僧苦之,为伐其树,而游踪渐寂。

八、菱山别墅

是园皆有梅花,而寻梅者必于菱山,以其树古也。树古,则老干离奇,不独花之烂漫矣。园截山腰之半而成,层折高下,俱因山势。游人不独游园,兼之游山,登高四望,会心自远。

马世俊所撰“二十八胜”,山川灵秀,引人入胜,都是他亲自游历后记叙归纳,而非道听途说,异想天开,这就足证是“真山真水,梦中江南”。更为难能可贵的

是,马世俊还考证搜集了许多典故诗赋、民间传说、名人轶事,增加了这些地方名胜的文化含量,丰富了游览景点的历史内涵,非常珍贵!

令人扼腕的是,这“二十八胜”景,大多湮没消失了!或毁于自然,或毁于人祸。炸山采石、围湖造田、疏浚河道、砍树植茶、伐木炼钢、破庙拆寮……古人千年积累的文化宝地,古人访胜探幽的风景遗迹,抵不住兵灾的烈焰,抵不住狂热的洪流,没有了,不见了,永远地消失了!

时间,仅仅过去了三百多年!

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溧阳,我们常常为旅游资源的匮乏而伤脑筋,为旅游资源缺乏文化内涵而费心,为历史文化遗迹的消失而叹息!马世俊“二十八胜”风景名胜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旅游文化历史史料,提供了古代地方旅游的大量信息,提供了我们今天可以历数的昔日二十八个旅游景点。长荡湖、青峰山、桃树芥、石岩山(南山竹海)、读书台、贞女祠、燕山岭……这些山川还在,这些名胜尚存,我们怎样保护?怎样开发?怎样传承?

拜谢!马状元!

强氏三兄弟

苏州留园的一间会客大厅，挂有“世业重韦平有犹有为有守，天心资岳牧立德立功立言”之长联，书者落款为“溧阳强汝洵”，这引起了我的兴趣。苏州自古出文人，出书家，像名园中堂能悬挂的书联，一定是位当时的高人。

强汝洵是谁？

在光绪十三年(1887)刊印的溧阳高士芮岩尹(城)的《匏瓜录》一书中，有强汝洵为芮先生写的传，“籀籒峻固，圭角分明”，言简意赅，颇具功力。他自称“同里后学”，能为乡贤前辈作传，可见是当时有名望之人。

光绪《溧阳县续志》载：“强汝洵，字尧叔，一字庚廷。道光己酉(1849)以萃科贡成均，咸丰己未(1859)恩科中顺天榜。少而迈异好学，出于天性，博通经史，旁及方技医卜。百家述作靡不讨究，为文操纸笔立就。深博无涯涘，然不欲以词章记览声海内，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之所至不阻于俗，不疑于心。”作为饱学之士，他提倡：“圣门之教，博约而已。博不欲离约，不欲陋舍。”“德行为本，文艺为末。”

同治朝甲子(1864)冬日，当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从上海出兵，攻复苏州，急需天下有识之士。溧阳陈鼎推荐强汝洵，李鸿章安置强在总兵牙鼐处任职。此时的强汝洵已经多次放弃任职机会，几乎活不下去了，如果答应李鸿章的安排，富贵荣华似乎唾手可得，但他毅然不去就职。考中进士后，他到京“礼闱报罢”，就去辅佐山西按察使陈湜守戎处当幕僚，公文笺檄都出自他笔下，很受礼遇。

是时，清廷腐败无能，山西守备兵戎缺粮欠饷，镇守之将又恃贵骄恣，士兵涣散懒惰，毫无战斗力可言。陈湜带领三千湘军守黄河，捻军在河对岸的陕北之西的河自、河保到蒲解一带，两军巡堤相望。而吉州以上的二百多里，一到冬天黄

河就结冰成桥，厚二十余丈，车马往来如履平地，河道天堑不能成为屏障。强汝洵观察河防布置后，建议陈湜挑选精兵强将加强对吉州以上的防备，增筑碉堡，招募三千兵士严守。不然，山西的兵祸必然从吉州开始。陈湜听从他的提议，向朝廷上奏折，但没得到批准。丁卯冬，捻军果然由绥德往南返宜川，翻山至壶口，踏冰渡河，到了山西。陈湜因防守不力获罪，强汝洵归馆江南书局，到了苏州。后来朝廷选派他任赣榆县教谕，他又不去赴任，一门心思著书立说，不再介入政事。

后来，强汝洵年事已高，但治家有方，儿子中规中矩，看见的人不用问，就知道是强家之子了。他所交往的都是当世名士，落落数人。他曾对人说：“是是非非没有穷尽，于事于理不可为，不要盲目追随而要制止，最好自己知道就结束，不要让人知道。一个人越是淡泊名声，名声传得越远。身在田间却常怀天下之忧，这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吗？大儒要胸怀天下，如今的贤士能达到这境界吗？”

强汝洵卒于光绪二十年(1894)，时年七十一岁。他的著作有《大学衍义读》七十卷，《春秋测义》三十五卷，《诗集》六卷，文集八卷、读书记五卷、随笔二卷、《汉州郡县吏制考》一卷、《金坛见闻记》二卷、《女学内外篇》二卷，等等，可谓著作等身。

强汝谏，字彦吉，一字存斋。同治丁卯年(1867)举于乡，选拔为赣榆县训导，三年后改任溧水训导。“汝谏力学敦谨，不苟同于时，事亲孝，有欲以孝廉方正荐者，泣涕力辞。笃于兄弟，老而弥挚。”(《光绪续志》)强汝谏为人仗义乐施，凡遇到朋友有急难，倾囊相助，毫不吝嗇。如果自己没能力，也动员别人助恤，不避艰苦。

洪杨兴兵，中岁乱离，强汝谏避难到苏北兴化。江南一带成为洪杨军的重要据点，金坛、溧阳二城“被祸尤烈”，百姓得脱逃者万死一生，但流离失所，生计了无着落。强汝谏联合金溧两邑人士，向当时的漕运总督吴棠请愿，要求整顿收养难民。他又到苏北各州县躬请求情，请求妥善筹划，安置难民。由于他的努力，两县三千多难民得到济养安顿，暂养生息。

强汝谏两次参加礼部考试，均不第，生活越发窘迫。有素知他为人的朋友向官府特别推荐，委任知县之职，他竭力推却。后被选派任赣榆县训导。赣榆地方风俗剽悍，喜欢诉讼，土豪仗势与官吏横蛮，生员狡黠刁难，经常出难题为难学官。曾有姓董的生员被县役所殴打，向上告诉。汝谏接到投诉后，通牒给县令，

县令没有马上处理。汝湛又送去一书信：“一县之令如父母，百姓是子弟，而学士则是子弟中的贤者。县役则是仆隶，以仆隶凌辱贤子弟，做父母的该斥责谁？”县令醒悟，于是重重惩罚了县役，又把详情请学使勒刻于石，公示于众，使土豪刁士收敛行为。汝湛诲人不倦，百姓有一善必奖励，有一孝旌发匾额，乡风欣欣向荣。

赣榆的青口镇是海上渔船的聚集地，其地风气奢侈，世族婚丧嫁娶动不动耗费千金，而贫穷之人无承受能力。强汝湛同情体谅百姓，规定婚葬费用不得超过百金，改变浪费风气。当地的怀仁书院毁于兵火，汝湛与县令商量，重新规划建设，要求坚固耐用，影响久远。

改任溧水训导后，强汝湛教导学士应勤于学业。当时溧水教谕章某倡议重建文庙，但因与县令不和，被揭发中饱私囊，历经五、六年工程未完工。汝湛来后，召集乡绅董事商议，提出捐助者不能延误工期，必须年终完工，结果岁末工程告成。溧水自从明朝筑东坝后，良田被水淹没千顷，但粮赋一样上缴。强汝湛援引高淳豁免事例，上书请求以实际田亩征粮，他又实地调查详情予以证明，终于得到批准，减轻了地方负担。

强汝湛任溧水训导四年，死在任上，年仅 55 岁。赣榆士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请求祭祀在名宦祠，没被批准，百姓私下祭拜，感颂他为地方做的好事，设灵位在怀仁书院。可见为民做事，民心不欺！

强汝谔，字星源，“幼承家学，与兄汝洵、汝湛相师友，修己诲人，一以忠恕为准。清而不隘，和而不流，于学一宗程朱，深疾汉学”。“古文能阐发理学之旨，扶剔汉学之弊者，汇为一编，名曰《崇正集》”。“取古今说《易》诸书，择其合于孔义者纂辑之，名曰《周易集义》”（《光绪续志》）。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招聘他入书局，当时许多人对勘校书籍嫌烦，强汝谔说：“整天不做事而得饷得食，是非分的，不应该的！勘校不能松懈！”他以禀贡身份任校官，后选震泽县训导，在觐见诸生时必以礼相待，鼓励品学兼优，诫教不善行为，学士对他十分敬畏。六十四岁那年，强汝谔死于任上。

强氏三兄弟，都承家学渊源，都成饱学之士，都曾著书立说，都为有用之才。三人官品不高，均属“基层干部”，但操守高尚，不趋权势，为民造福，不计名利。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民，为老百姓办好事，乃为官为学之本。三兄弟之学之为，应为乡邑楷模。

下 编

平陵撫拾：

人文溧阳的璀璨风物

平陵书画渊薮

元朝《金陵新志》卷八“风俗”篇载：“（溧阳）其君子笃厚恭谨，恬静自得，艺文儒术藹然相尚。其细民务本力农，淳朴质宜，类知畏法。名儒胜士避地来寓溧上，往往乐其风土而定居焉。”

书画艺术，国之精粹。溧阳姜丹书曾说：“书画作品，是民族精神之结晶，亦即是国魂所附之基体，其内容，既与其他艺术品同样深刻，而其外表，更比其他艺术品格外显著。”

平陵书画，源远流长；笔墨丹青，根深叶茂。正如史侯祠中之进士松，苍郁古秀；正如报恩寺里的澄观井，深湛幽渺。涉渊泛薮，逸兴遄飞，睹墨思贤，读文仰哲，我深为乡贤们的才艺所折服，深为大儒们的墨宝而感叹。斯人已去，山水尚在，篆籀尚在，毫砚尚在，精神尚在。正如丹书先生所言：“且中国书画，最重品格，自古传至今日之珍品，必其作家之人格高尚，乃愈为后人所矜贵，故历代书画界之传人，不论在朝者在野者，要不外乎高雅清介之士。”

平陵书画，散佚于史籍之中，或毁于兵燹，或湮没长河；或有名无物，或存世难觅。除狄平子的有正书局出过的珂罗版《中国名画集》中，有不少其家传藏品及乡贤佳作外，再难找到系统的溧阳书画作品瑰集和评传，以致历代和璧隋珠，蒙尘掩瑜，以致先贤翰墨珍迹，漫漶流失。

笔者愚钝，胸无笔墨，妄论书画。只是翻书探史，按图索骥，雪泥鸿爪，吉光片羽，聊撰吾邑书画渊薮之万一。

史崇神道碑 原碑由东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撰，为骠骑将军、溧阳侯史崇而立，东晋时碑裂。后晋、隋、唐、明又重新刻石，放置史侯祠，碑文仍用前撰。

溧阳长潘乾校官碑 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立碑，宋绍兴年间出于高淳固城湖，时属溧水县。碑高 134 厘米，宽 77 厘米，呈圭形，上端有穿孔径 12 厘

米，有“校官之碑”四字。碑文赞扬东汉县长潘乾稟赋聪颖、德行弥高、为民减赋、构建学宫之功绩，书法为汉隶，结体“方整古厚，气韵沉雄”，用笔沉郁雄浑，古拙端方，字布满行格，不留空隙，实乃汉隶中不可多得之珍品。历代对“校官碑”多有研究，如宋洪适有《隶释》、王昶有《碑考》、洪迈有《夷坚志》等，清嘉庆溧阳志陈鸿寿也有长篇考证。此碑现存南京博物院。

蔡邕读书台 蔡邕，字伯喈，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琴家。《后汉书》载，邕因避宦官迫害，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据《金陵志》、《建康志》、《溧阳县志》载，溧阳太虚观东北（现大溪水库大坝西、观山北）有其读书台，历代有诗赋吊念歌咏。清康熙时有“蔡氏堂”，后毁，今山顶仅剩墙脚沟壕。蔡邕和蔡琰（文姬）在此度过了十二年时光，他斫焦尾琴，阅《论衡》篇，其书法艺术对地方影响深远。他的汉隶《熹平石经》为经典范本，创“飞白体”传笔法之先，写《笔论》、《九势》，被誉为“书法之祖”。这样一位大书家隐居溧阳，对地方文化恩泽流长，千古流芳。

史宪神通碑 史宪为晋时建安太守、山阴侯，由宣议郎史嶷撰立，原碑在诸吕村西面侯墓旁，明宣德年建宁知府史常洗碑得文 393 字，明嘉靖年文选司主事史际，从居民手中购得此碑，移立于史侯祠。

史仲漠神道碑 仲漠为唐朝贞观年（785—805）间人，碑立圻山墓前，由贾曾撰文，徐浩书丹，李阳冰篆额。宋朝知县陆子适把碑移至学宫，后碑毁于兵乱，元朝时只剩底座了。徐浩（703—782），绍兴人，工草隶，乃宰相张九龄的外甥，唐肃宗时皇帝诏令俱出其手，世称其书法如“怒猊扶石，渴骥奔泉”，“长于碑志，世所不逮”，他著有《书谱》，与颜真卿齐名，代表作为《不空和尚碑》。李阳冰在唐代以篆字名世，精工小篆，圆淳瘦劲，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对后世影响颇大。代表作为《三坟记》、《谦卦铭》等。

宋刻唐孟郊诗碑 唐贞元年间，“苦吟诗人”孟郊任溧阳尉，写下《溧阳唐兴寺观蔷薇花同诸公饯陈明府》一诗。宋崇宁五年（1106），知县李亘将诗勒刻上石，其子海民书写匾额题词，由唐兴寺僧智迪钮完刻石，并在西面走廊建造一轩，名“蔷薇”，轩的右面放置诗石。到了明正德年间，邑人狄冲在倒塌的墙草中发现此碑，迁移至史后的沧屿园，建“红香亭”。碑不久又倒塌，由史詹移居“太元居”，为之造“净香亭”，亭旁种上蔷薇。后碑为陈时泰搬至戴埠陈家祠堂。

唐刻石井栏 原在东门外报恩寺，为西门零陵寺旧物，宋朝搬移。井名为

“澄观井”，唐元和六年，澄观和尚，唐德宗时称“清凉国师”，由他置石井和石盆於寺。井栏刻“此是南山石，将来造井栏”等大字 91 个，古朴沉郁，肃穆慎密，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鉴定为“唐刻井栏仅存”之物。清嘉庆年间，县宰陈鸿寿、乡贤史炳等人，曾将井刻拓纸，编入《金石萃编补辑》之中。

看经寺诗刻 为唐徐浩书，原在屏风山，后为一读书人锄地获得。诗云：“祖德道场下，往来三十秋。白头方问法，朗月特相留。”久歿。

纳言像赞 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撰书。主要歌颂武则天时溧阳史务滋纳言的事迹，“呜呼！人方罗织，我独平反”。《行感》又称赞史务滋公正廉直的精神。该墨本过去藏在永州府同知浙江史在鑛家中。史在鑛《跋》云：“古人作字，每逢乐道胜事，往往笔力倍加。此卷翰墨淋漓，有龙蟠凤翥之势，盖鲁公之大节，既炳耀天壤。而纳言相业，又有古大臣风雨神默契，故腕下遒劲如此。余素未工书，漫为临摹，神致未肖万一耳。”

濂水贞女义碑 据《建康志》、《金陵志》所载，此碑由李白撰文，李阳冰书写，真是书文双绝。阳冰乃太白族叔，曾任当涂令，两人过往从密，李白三到溧阳，大多因访李阳冰之故。此碑是唐天宝年间李白应溧阳县令郑晏之请而作，诗仙还写有《游溧阳登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一诗。宋代碑已残，几经重刻迁徙，明万历年置于渡济桥堍。后移存宜兴市碑林内，现南渡木勺斗村贞女祠碑刻为宜兴碑拓刻。

重刻淳化阁帖 由宋太宗在淳化年间摹刻在枣木板上，拓出后赏赐给皇族及大臣，内容为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家的法帖，故后人称为“法帖之祖”。溧阳暨桥虞氏世传淳化阁帖石刻，由虞维夫人赵氏之陪嫁而来，南宋由丹徒迁徙至溧，存放在虞氏祠堂，乃“族宝”。据考为明末之物，洪杨之乱毁数块，现存 118 块，破损 71 块，基本保存完好。《淳化阁帖》全国现存仅西安、兰州两套，杭州孤山新发现残存，溧阳刻石应为五分之四套。上海图书馆典藏部主任、《淳化阁帖》考证专家仲威来溧考察，认为乃私刻精品，尚未面世的珍品，南刻中精美绝伦的作品，流传有序的书法极品。该石刻现存市文管会仓库，计划搬到别桥镇，建馆展览。

孔庙御碑 溧阳孔庙，重建于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位于城东南角(原印刷厂内)，是为学宫。清顺治九年(1652)，朝廷颁发孔子《大学》卧碑；康熙四十三年(1704)，颁“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1725)，颁“平定青海部落碑记”；

乾隆十四年(1749),颁“平定金川碑”;乾隆二十年(1755),颁“平定准噶尔碑”,都立在孔庙内学宫门前。清嘉庆七年(1802)还在学宫两侧树“德参天地”和“道冠古今”两石坊铭文,后均毁湮。2001年,出土“平定青海部落碑记”,为雍正三年五月(1725)刻置,乃“满汉文碑”,长3.6米、宽1.3米、厚0.5米,重达6.5吨。碑额龙腾戏珠图,全文1090字,“御笔之妙,天矩自然”,江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现存文物仓库。

溧阳溪山图 北宋米友仁绘。米友仁,字元晖,米芾之子,勤学好古,擅长书画。官至敷文阁直学士,画《楚山清晓图》,米芾将画呈送便殿。米友仁曾到溧阳游览,画此图流传于世。元朝陈旅在《安雅堂集》中有《题米元晖〈溧阳溪山图〉》诗:“宿雨散曾岷,林麓翳烟霏。遥山断复连,川上初听微。我昔困行役,溧阳秋未归。幽子乔松流,解后启郊扉。抚景正若此,别离嗟愿违。览卷遂终日,溪云欲生衣。”

清康熙丁亥年(1707),因米氏《溧阳溪山图》世久失传,常熟黄鼎给詹事史夔补画了一张。史夔作诗有“多情最是洮湖水,百折千回到县前。登临何处最销忧,谢朓青山李白楼”之句。“酷爱襄阳米虎儿,淡烟轻墨染淋漓。百年粉本凋残尽,点笔重烦老画师。”道出了重画溪山图的缘由,一时名流查慎行、沈宗敬等三十余人和之。

另据溧阳彭袭明记:“米友仁为吾邑新昌蒋仲常作《云水图》,真迹犹存。”

孟东野平陵图 作者图况均不详。县志载有赵孟頫诗《题孟东野平陵图》:“骑驴渺渺入荒城,积水空林坐自清。政使不容投劾去,也胜尘土负平生。”

朱熹诗石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程朱理学之圣贤,人称朱子。他生平到过溧阳,据传曾在[山]优昙寺读书,写过“宏开觉路”匾额和寺联(谈华清老人亲见);另有诗碣《赠山前巡检陈英》立于寨前,乾隆年间移至学宫乡贤寺内,嘉庆年仍存。朱熹还为史侯祠书写过“海岳堂”匾额。

高宗书卦辞帖 由宋高宗书乾卦,群臣书诸卦系辞帖,由秦梓刻。

高宗书兰亭修禊序 由刘岑刻。

孝宗书韩愈进解学临王羲之二帖 钱周材刻。

青卞隐居图 元王蒙代表作,立轴,为溧阳狄氏世藏,由狄曼农珍藏,有董香光(其昌)书“天下第一王叔明画”八个大字横列上方,是山樵最得意之笔。后传

其子狄平子，现存上海博物馆。狄曼农生平有两件珍藏，另一为宋《五老图册》，在江西都昌为县宰时，因保护黎民免受杀戮，被上官豪夺。狄平子云：“青卞图画树用浓墨，画山用枯笔，笔墨极显露，而雄浑灵奇，却无丝毫笔墨之迹，诚画苑上上神品矣。”狄家世居胥渚一带，富收藏，清嘉庆间县令陈曼生常携幕僚前去赏画品藏。

赵府三石 原在城南丞相赵葵宅中。“苍云”石为宋高宗所书，“忠义”石为赵葵侄赵淮所有。现高静园存高静石，左下角有书法，拟为宋理宗所书。苍云石原在平陵书院（实验小学），后建小学围墙时敲碎填埋。忠义石原在凤凰桥堍，不知所终。

重修广惠庵碑 由马一龙于明嘉靖三十一年书写。马一龙，字应图，号孟河，书法狂草脱逸，不受拘束，挥洒自如，乡称“龙蛇体”，实乃“梅花体”。他还曾书写过《桃花源记卷》等代表作，是明代书法名家。他写的“千字文”在乡间尚有拓传（笔者近于胥渚村见到一龙为同好狄斯彬写的牌坊，精工小楷，密布青石，功力非凡，实为鲜见。惜牌坊早毁，石碎数段，村民说有几段已填墙脚，剩几块闲置墙角。余指认后，逾数月，乡民告曰余石亦不知所终。吐血！同行者江如福、吕正立两君）。《重修广惠庵碑》残石现存别桥小学内。

吴门四才子 明光祿少御史后辞官回家，在下庄村建归得园，山水回环，楼榭交错。唐寅有诗《琼岛》，文徵明有诗《芸窗》，徐渭有诗《柳浪堤》，祝允明有诗《石床》。吴门四才子云集，皆艺事盛举也。书湮，幸诗存。另文徵明还为史后之子史际的玉女潭写了长篇《玉女潭记》，现在宜兴玉女潭有刻石碑，为后人所书。唐寅还曾为溧阳双桥画过一幅横幅，被称为绝妙之画。

竹墅园匾石 明朝彭氏所建，后归太仆史际。内有梁溪（无锡）王问书写的匾额“水竹平分”，有华亭董其昌写的“竹墅”两字刻石。马一龙曾写“云关”两字，刻石，嘉庆时尚存。

萧云从山水长卷 明末清初著名画家萧云从为溧阳彭旦兮所作。其画融合宋、元诸家，自成一格。自题：“以黄公望瘦树山石为之纵横，润之以马远泼墨之法。”用苍老的秃笔挥点，写秋山景色，苍劲而不险怪，沉着且显湿润。马世俊在此卷上有长题：“曳来一卷秋山色，松风濛濛飞黄叶。逶迤渐见有人家，门掩寒屏千万叠……”此画是萧云从从顺治十一年（1654）元旦开始，花了二十七天始完

成的丈余长卷，被称为“神品”。该画后为狄曼农收藏，他作跋云：“此卷系先伯父进斋公收藏旧物……其子渔二兄以余有画癖，出此卷畀予。以萧云从真迹世不多见，重以先泽留遗，爰同球璧。庚申大劫中竟随身携出，幸逸灰烬，岂非鬼神呵护，使名物得存於世耶！”狄平子后将此画刊印于有正书局《中国名画》之中。

红泉书屋联额 在下庄，是史贻直的家宅。“红泉书屋”由秀水朱彝尊书写，厅事门头上有乾隆帝赐写的“绿野颐和”匾额，“丛桂轩”两旁是雍正皇帝赐写的对联：“坐石吟新月，临流纳晚凉”。另有“红泉井”，石栏有史奕昂亲家袁枚所书三字，近年遭窃。

史顺震七种帖 为清史顺震临王羲之《兰亭集序》等七种，存放史家。

史鹤龄十种帖 为清史鹤龄临《孝经》等十种，存于史家。

彤管流芳碑 清嘉庆县令陈鸿寿书。曼生於嘉庆十六年宰溧阳，任期二届五年，此君乃西泠八家之一，诗书画印皆绝。公余辨砂器，聘杨氏兄妹到溧制紫砂壶，与友朋幕宾书刻铃印，制十八款式，把紫砂壶灌注文化素养，“雅玩”之余开创了一个“桑连理馆”时代。曼生在溧期间，是他创作最辉煌之时，一时名士雅集，名流咸至，郭频伽、江听香、屠倬、查梅史、汪小迂、钮匪石、史炳等文人雅士聚散往还，成溧阳历史上艺术辉煌之时期。陈曼生在溧还书写过多块旌彰碑文，均散佚。“彤碑”发现于鲍渚村，现存文管会仓库，为曼公在溧遗物之仅见。

五云多处石匾 里人史恩绵所书，款为光绪戊子冬仲。应为原文昌阁遗物，现存高静园盆景园。

大石山石刻群 乃西郊历代书法石刻之瑰集。怪石嶙峋处，最显眼的是李白书“壮观”两字，由宋淳祐八年(1248)赵盱夫刊刻，此书仅山西浑源悬空寺有存。另石洞上有赵盱夫书“龙洞”两字，洞旁有联：“过此一关，遗我百虑。”石壁上有明进士彭谦刻七律一首。高处有无锡殷某书于民国时期的“观自在”三个大字。另尚有历代刻石多处，漫漶莫辨。

平陵书画，浩如烟海，这里瑰集的仅是沧海一粟。世事沧桑，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或毁于人祸，或束之高阁，大多仅闻其名而难睹其物矣。余鼠目寸光，孤陋寡闻，沧海遗珠，挂一漏万。仅依据志书见闻，纪之，緬之，思之，叹立！而已。

溧阳书画俊彦

溧阳地胜,名士众多。书画俊彦,代有人出。沐洮湖灵气,驾青峰豪情,南山作笔,濂江当墨,胸中块垒,腕底巨壑,付诸尺幅,寄情丹青。

岁月匆匆,时光流逝。年年相似,物是人非。历代地方丹青名家,渐行渐远。欲识庐山面目,无奈资料匮乏,鲜有列传,实乃憾事。

今恭列家乡书画家数十位,乃多方瑰集搜寻之结果。姜丹书先生曾为晚近几位作小传,弥足珍贵。此外,尚有当代小城先贤几位,醉心笔墨,毋求显贵,亦当记列其中。

竹梦松,溧阳人。南唐曾仕东川别驾,擅长绘事,善仕女、宫殿、台阁等,绘画极为精妙,宋人郭若虚所著《图画见闻志》载其事。

刘岑,字季高,号杼山。原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定居溧阳。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生,卒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年八十有一。进士,累官户部侍郎,以徽猷阁待制致仕。博学爱士,工草书,纵逸而拘,盖有自得之趣。周必大跋刘季高帖云:“杼山老人笔精墨妙,独步斯世。”

赵葵,字南仲,(1186—1266),衡山人,宋京湖制置使赵方次子。曾历任滁州知州、兵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右丞相,封信国公。致仕后赐第溧阳。工诗善画,尤善画墨梅,有《杜甫诗意图》行世。

端木智,字孝思,溧阳人。与修明太祖实录,擢武库员外郎。《解学士集》述其事,工书法,明初获师事危素,在元大德七年(1303)至明洪武五年(1372)间,而在元泰定四年(1327)至明洪武二十年(1387)间,并之颉颃,三四十年间,遂空冀北,无以为比者也。

史常,字原亨,明溧阳人。幼年擅书法。明永乐年初,受朝廷征召,进京纂修《永乐大典》。十三年(1415)考中进士。授行人。持节出使王侯封国,不辱君命。

二十一年任福建建宁知府，以廉厚自守，官民皆心怀敬崇，称颂贤太守，后辞归。当时大学士杨士奇于一帧《墨竹图》题诗云：“至今犹有闽人说，廉惠何人继史君？”谢世后，入祀乡贤祠。著作有《宜乐堂文》，已佚。

马一龙，字应图，号孟河，另号玉华子。明溧阳甓桥人。明弘治十二年(1499)生，卒于隆庆五年(1571)，享年七十有二。从谦侄，云南寻甸知府马性鲁之子。国子监生，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南京国子监司业。因母年迈多病，五次上疏乞归。母丧服阕，出补国史馆检讨。三十八年分校礼闈、擢南少司成摄大司成事，辞仕归里。于方山旁建务本书院，又于玉华山(今后周乡)筑馆舍潜心著述，工书法，悬腕运肘，落笔如飞，评者谓书法一大变。工诗文，性情耿直，善为民事，有政声。著作有《农说》一卷、《元图大衍》一卷、《玉华子游艺集》二十六卷等。

蒋珙，字信国，明溧阳人。进士出身，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至仕浙江桐乡县，又官至湖广按察僉事。工诗文，善绘画。桐乡县志载其事。

史继书，字元乘，号云津。明溧阳人。生年不详，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仕锦衣卫指挥同知。喜读书，工书法，尝结诗社，雅歌投壶。又捐谷赈饥民，割田籍捐入学宫，贍济贫士。著作有《云津诗稿》一卷，已佚。

宋臣熙，字尧咨，一字缉峰，号起岩，明溧阳人，嘉靖十四年(1535)生，卒于天启四年(1624)，享年九十岁。二十岁补邑生，后任广东新会知县，为政简廉，曾废去渔舟入海纳金。岁时馈献，无以供上官，左迁郴州学正。改荆王府长史，不久乞归。绩学励行，能诗古文，尤工书法。以子劼累赠太仆寺卿。著作有《缉峰诗集》，已佚。

虞许，初名国儒，字两可，明溧阳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生，卒于熹宗天启三年(1623)，享年六十有八。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曾任永丰知县。任一年后离职归里，悠游林泉。擅古文辞，工书画。天启三年(1623)应溧阳知县董允升之聘，纂修县志，稿成未刊即去世。著有《溧阳新志》、《郎斋集》十卷，均佚。

吴颖，字见末，号长眉，另号茧雪。明末溧阳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生，卒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享年七十有九。明崇祯二年(1629)入复社，九年与本邑芮长恤、马世俊等结为十三子社。清顺治九年(1652)进士，授刑部主事，升郎中。十八年任潮州知府，随军出海患寒疾，告病归里，晚筑西畴草堂。吟诗著文，学识

渊博，有“濂江文献”之目；又善绘画，精山水画，与马世俊并称于时。吴氏命官时，断案慎重，不主苛严，重证据、重事实。著作有《史轮》一卷、《潮州府志》十二卷、《世书》一卷、《善易者言》一卷、《溧阳诗选》八卷。另外《闾史》十二卷、《溧阳志》十二卷、《茧雪诗稿》一稿、《菀羹堂诗集》二卷、《西畴文集》十五卷，均佚。

强锐，字止之，明溧阳人。以诗画闻名，家贫，未尝向人求助。稍有所得，即寄情于笔墨之中，画品清远绝尘，常用以赎酒。著作有《鹿庄诗稿》二卷、《考槃集》十二卷，均佚。

宋之绳，字其武，号柴雪。明末溧阳人。万历四十年(1612)生，卒于清康熙八年(1669)。享年五十八岁。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廷试一甲二名(榜眼)，官编修。明亡仕清，被荐任侍从，充日讲官，升右春坊右中充。顺治十四年(1657)主持顺天乡试，十八年以年例外补江西参议，勤于政事。康熙六年(1667)裁撤参议额，辞职归里。为人清正爽直，尤喜奖掖后进。工书法，又善画兰竹。著有《载石堂诗稿》二卷、《柴雪年谱》一卷。另有《载雪堂集》、《柴雪诗钞》、《鸥天馆集》、《寄颜轩集》、《国雅集》、《载石堂尺牍》等。

马世俊，字章民，一字甸臣，别号匡菴。明末溧阳暨桥乡马家村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生，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享年五十岁。明崇祯九年(1636)与同邑芮长恤等结为十三子社。清顺治十八年(1661)一甲一名(状元)。对策侃侃直陈，称王者天下为家，不宜示同异，时论伟之。康熙三年(1664)由修撰升侍读，充会试同考官。幼年聪颖，八岁能诗文，县学屡试第一，高中后，保持书生本色，不乘舆马，无仆随从，为官清廉，生平博学经史，好性理学，诗文清正，尤善书画，时有“二右”之名，谓书法如右军王羲之；绘画如右丞王维。山水好著巨幛，师宗诸法，自出机杼，耸拔夺目。著有《匡菴诗前集》六卷、《匡菴京稿诗集》六卷、《匡庵文集》十二卷、《登燕山记》一卷、《方山记》一卷、《茅山记》一卷、《宁州郡志》二卷；另，《禹贡注》一卷、《华阳游志》、《理学渊源录》等均佚。

马伯绳，字正则，自号蝶翁，室名：“丸阁”。明末溧阳人。明万历四十五年(1671)生，卒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享年四十四岁。明天启年间诸生。明亡后，隐居本邑洮湖畔。工诗文，善画山水，其画入丹阳姜氏画谱。著有《丸阁诗集》，已佚。

史顺震，字尔长，世袭锦衣卫。因子鹤龄封编修，因曾孙貽直赠大学士。他

临王羲之《兰亭集序》、《快雪贴》、谢安、米芾《书与跋》、《向太挽词》、苏轼《西湖诗》及《书评》共七种，放在族中。

史鹤龄，字子修，号菊裳。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他的文辞与书法都很好，小楷在《黄庭经》、《乐毅论》之间。皇上始开经筵，召集朝廷大臣考试书法，他得到第一。充任日讲起居注官。每次进入内廷写字，皇上亲临席前谛视，嘉奖不止，因此御案卷册多是他书写。皇上数赐貂衣蟒袍，享文臣之殊荣。他曾书贴十种：《乐毅论》、《孝经》、《醉翁亭记》、《前赤壁赋》、《清静经》、《论真书》、《论楷书》、《论小楷》、《论行书》、《论草书》，存放族中。

史夔，字胄司，号耕岩。清溧阳夏庄村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生，卒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享年五十有三。康熙二十一年(1682)殿试二甲一名(传胪)，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升编修。历官经筵讲官、詹事府詹事；三十八年(1699)主持两浙考试，选拔饱学贤能之士颇多；四十九年受命纂修《康熙字典》，居于第二位纂修官。深研理学，尤善诗文，又擅书法。乾隆十六年(1751)因子貽直赠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著作有《扶胥集》二卷，另有《佩壶》、《扈跸集》、《樟台集》、《观涛集》等，均佚。《清诗别裁》收录其诗多篇。

史咸，字子咸，清溧阳人。廪诸生。少习经史，生平喜书法，并收藏典籍与名人书法颇多。性正直、善行义，文能深思古朴，终身未中举，因子累赠朝议大夫。著有《三传分国》、《顾镜集》等，均佚。

宋辰，字应龙，号晓村。清溧阳人。雍正四年(1726)举人，选授广西融县知县，改六安州学正。擅长书法，又工诗文。曾参与吴学濂纂修乾隆《溧阳县志》。著有《渔山诗集》二卷、七律二卷、《石濂山人诗草》八卷、《黔游纪略》一卷、《黔游诗草》一卷，均佚。

彭竹亭，又名剑华，乾隆壬子年生，溧阳人。太学生四品衔，诰授朝议大夫，擅长行楷书。

史国华，字济寰，号竹甫。清溧阳人。生年不详，卒于乾隆六十年(1795)。由举人授国子监学正，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屡迁至吏部考功司主事、文选司员外郎，精熟官吏铨选。五十九年护从车驾至热河，次年病逝任上。喜诗文、工书法，多次任乡试、会试阅卷官。著作有《石淙山房诗》，已佚。

史澜，字晴江，溧阳人，工花卉、仕女。其山水宗清四王之法，尤善临摹，笔

墨清雅。

葛鏊，字云门，清溧阳人。乾隆四年(1783)生，卒咸丰十年(1860)，享年七十八岁。府学生。少年时豪迈不羁，熟读经史百家，喜古文诗词，精《说文解字》，工篆隶书。晚年笃志经学，研习顾炎武、陆世仪之书。咸丰十年(1860)歿于太平军攻溧阳时。著作有《禹贡注》，已佚。

潘砺襄，一名丽襄，字濂浦。清溧阳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生，卒于咸丰十年(1860)，享年七十三岁。家贫苦学，工书法。道光九年(1829)二甲进士。历官浙江义乌、湖南攸县、绥宁等县知县。改授徐州府教授，寻引疾归，闭门读书，不豫外事。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入溧阳，投河歿。著作毁于兵火。原著《治心格言》二卷、《菀湖集》四卷等，均佚。

潘恩简，字人文，清溧阳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经策详贍，考官取以进呈，选泾县训导，延青浦教谕，卒于官。工骈体文，好金石文字，喜篆刻。

宋鬯同，字奕长，宋之绳孙。读书一目数行俱下，善诗文，擅书画，仰摹太白，饮酒狂歌，千百字刻烛可待。所画兰石，潇洒生动，时人所珍。

强汝谔，清溧阳人，居金坛。同、光间禀贡生，为震泽县训导。善书法及墨梅。

唐墨斋，名翰，清溧阳人，同、光间在杭州候补巡检，曾权江山县驿丞。甚潦倒，以鬻画为生。最善画猴，求者踵门，然非穷至不能举炊时不动笔。银币一元画一猴，几元画几猴，若赠以半元，则于树石间现出猴之半面半身，得者弥珍之。题字学何绍基。

狄学耕，字稼生，号曼农，清溧阳人。禀贡生，仕江西知县。善画山水，同、光间著名。有正书局曾刊行其作品。收藏中有著名的《王叔明青卞隐居图》立轴，董香光题“天下第一王叔明画”八大字横列于上方。遗其子平子，世袭以为宝。

杨文蔚，字豹章，清溧阳人，光绪间秀才。善书法，兼能真草隶篆，流传多。民国初年卒，年六十余。

史清源，号翁，生卒年月不详，溧阳人，清代贡生。清末溧阳著名书法家，与常州书法家唐驼过往甚密。

王枢，又名良枢，字旭园，溧阳人。清末书法家，当时在苏、浙、皖等省颇具声望。

王缘，号云谷，清溧阳人。善山水，曾馆吴门(苏州)菊花亭杨氏。山水清疏冷隽，尝仿宋复古作潇湘洞庭之景。《墨香居画识》、《墨林今话》、《清画家诗史》有传。

罗人雄，字俊彦，溧阳人，光绪间禀贡生。榜书清腴秀润，脱胎于米襄阳、赵松雪。民国二十余年卒，七十余岁。

房光斗，字德君，溧阳人。善擘窠书，在颜柳之间。清末民国时有名，卒年约六十余岁。

唐光曙，名光被，字海菁，号霞轩。光绪禀贡生，博学笃行，善书法，清秀劲逸，在欧虞之间，卒年五十六。

强运开，字梦渔、号渔叟。溧阳人。清同治六年(1867)生，卒年不详。工书法，尤精于大篆石鼓文，能画山水、花卉，颇多逸趣，当时学者均重其书画。曾任国立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曾以三十年之精力，搜辑资料，深研秦石鼓文，并释文成书。

宋葆麒，字羲樵，溧阳人。光绪间禀贡生。擅行草，能篆刻。民国中期卒，得年五十余岁。

史国干，字哲夫，一作蛰夫。溧阳人。清光绪二年(1876)生，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享年六十五岁。光绪年间廪生。以塾师为业。工诗文，擅长书法篆刻，于诂学深研之，著有《六书综》三十二卷。

吴良澍，字溉亭，溧阳人。秀才。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毕业。擅工艺美术，为江苏第四师范工艺专修科及中央大学艺术科工艺组主教，颇多传授。生于光绪十年(1884)，1959年时已76岁。

狄葆贤，字楚青，一名平子；字楚卿，号慈石、狄平、高平子，别号平清居士，六根清净人。溧阳人。生年不详，卒于民国十年(1921)。诸生。戊戌变法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宣传变法维新。失败后与梁启超潜往日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返沪，参与唐才常正气会，从事新闻事业。光绪三十年(1901)创办《时报》，三十四年(1908)任江苏咨议局议员，宣统三年(1912)于北京发刊京津版《时报》，又办《民报》及有正书局。时誉甚高，后专攻佛学，尤善诗词，擅长书画。著有《平等阁笔记》、《平等阁诗话》等。《上海滩》(2002年第3期)载其悼史量才墨迹诗云：“一曲竟成广陵散，剧怜琴剑两清沉。卅年交谊付回首，长对西风泪满

襟。”常州白云溪上微波阁主人王春渠藏狄氏山水图一帧。

姜丹书，溧阳大溪乡刘家边村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生，卒于解放后1962年，享年七十八岁。光绪三十三年(1907)考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宣统二年(1911)毕业。三年(1911)赴京考试，获师范科举人。分发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习。后回故乡，又赴沪任上海艺专教授，转任中华书局艺术编辑主任，兼上海美专教育系主任，民国十七年(1928)任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教授。1949年后，任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直至退休，定居杭州，被选为浙江省美术协会副主席。著作有《美术史》、《美术史参考书》、《艺用解剖学》、《透视学》、《艺术解剖学三十八讲》、《丹枫红叶室诗草》、《敬庐山水画集》、《艺术论文集》等。

王炳章，字汉文，1877年生，晚清贡生。溧阳固萝书院院长，擅长书画。

陈半亭，原名殿荣，字恬荣，一字子颖，别号半亭、听雨轩主。溧阳前马乡前马村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生，卒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享年四十四岁。幼年入私塾，喜临香烟盒画片、《聊斋》绣像。后临《芥子园画传》，技艺大进。常独自于前马荡畔写生。年少长，宗师山阴二任(伯年、谓长)之画，又研习岭南二高(奇峰、剑父)，颇多心得。以宣纸为画，彩墨晕染，清新有致。所画飞禽走兽，翎毛草虫，栩栩如生，逗人喜爱，誉满全县。廿五岁后出游大江南北，足迹遍历名山胜景。1924年去沪上入郭沫若东方艺术研究会，专研国画，并结识王一亭、金寿石、程瑶笙等名家。又与同乡姜丹书、狄平子深研画艺，善博采众长，融为已有，汲古而化，形成独自风格。

钱松岩，溧阳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生，卒于1986年。工画，善诗词，擅长山水。作品清新隽永，颇具韵味。《近代名画大观》中由王念慈、碧梧山庄藏其画六帧。并在民国十四年(1925)出版，民国十三年秋(1924)作山水《荆溪晚归》、《溪山秋吟》、《西湖纪游》、《沧浪亭图》、《春江烟雨》、《秋山晚霞》、《松壑鸣泉》等。姜丹书先生评述他：“山水秀泊，能以传统笔墨写真景，努力于现实主义风格。”为新金陵画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江苏国画院院长。

黄金鉴，溧阳新昌乡淦西村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生，卒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享年三十九岁。幼年聪敏，家境清贫，高小毕业失学；后自学苦读，民国十七年(1928)考入上海中华艺术大学，1929年“三八”妇女节组织女学生游

行,反帝反封建,被捕入狱。1931年营救出狱,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党的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进行抗日宣传,年底率领一批青年到达南昌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1938年恢复党籍。不久,病逝于江西玉山县。

安仁,又用安忍,俗姓彭,名愈,字逊之,溧阳人。清末与姜丹书同考,得秀才。素有几分“憨气”,乡人呼“彭憨子”。曾著小说,署名“亚东破佛”。民国六年在杭州虎路寺出家。擅长文学,能画山水。抗战期间,受其子迎养,服俗装,但仍茹素。一日,无病,自言将西归,自沐身,易新衣,端坐示寂,年六十余。

姜半秋,名萼,字以行,溧阳人,久居上海。书法四体皆能,而尤工篆隶,駉駉入古,亦擅刻印。1959年时58岁。

杨百川,字秉恒,1892年生,卒于1976年。擅长书法,尤工小篆,作品曾经郭沫若审定送日本展出,并为日本书道界收藏。

杨木者(1902—1994),字熙纶,毕业于上海美专,擅长书画。

黄汝鑑,字士均,1905年生,卒于2003年。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爱书法,尤擅诗文,著作颇丰。

黄若舟(1906—2000),名济才,溧阳上黄人。上海美专毕业,善花卉,清秀有韵致,兼山水、人物、书法。1939年出版我国第一部介绍汉字通行书写字体的《通书》,后易名《汉字快写法》。1972年筹组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授。曾任中国美协,书协会员,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顾问。著有《花鸟画技法》、《中国书法教学》等书。

陈晓南,笔名晓岚,1908年生,卒于199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随徐悲鸿学画,曾任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曾留学英国,为我国铜版画教育先驱。

王永昌,1908年生,卒于1986年。工于书法,尤擅行草。社会贤达。

彭袭明,字宝生,1908年生,卒于2002年上海美术学院毕业。曾任中国书画院艺术系教授。著有《彭袭明书画集》等。

任苍生,1909年生,卒于1988年。苏州高中毕业。爱书法,工诗词,曾在溧阳县中任教。

程瀛(1910—1999),笔名秋木,早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从事教育,喜诗国画,擅工笔禽鸟。

邱行槎，字英环，1911年生。出生书画世家，应徐悲鸿之引介，入北平国立艺专学习，受教于李可染、王个簃等名家。1948年辗转赴台。

彭东昇(1917—2001)，自幼爱好书法，溧阳第一位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工小楷。

夏风天(1917—2000)，号壁角居士。早年毕业于无锡美专，擅长国画。

蒋洪泽(1921—2004)，笔名易之，原溧阳市政协副主席，溧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溧阳市书画院创始人。

王曦(1922—2002)，又名铭铨，笔名晨光。长期从事美术教育，擅长山水、花鸟国画。

狄兆俊，1923年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政治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酷爱书法。

戴新吾(1930—2004)，笔名东篱居士。原江苏省书法协会会员，溧阳市书法协会副秘书长，溧阳市天目湖诗社社员。

曹剑锋，1932年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宋贤珍，1934年生，著名油画家。195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学习油画，当过美术老师，在浙江省展览馆从事展览美术工作，后任浙江省画院专职画师。作品多次入选国展和国外大展，著有《蓦然回首——宋贤珍油画集》。

陈少亭，原名锁秀，字少亭，1935年生，195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受业于周昌谷、吴弗之、余任天先生。1986年正式拜陆俨少先生为师，为入室弟子。九十年代后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浙江树人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国美院艺术设计职业技术学院。现为浙江省美协会会员、陆俨少艺术研究院理事等。编著有《植物景观艺术设计》。

陈庆良，1930年生。原溧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溧阳市书画院副院长。溧阳市天目湖诗社社员。

朱迟，笔名夏子，1931年生，卒于2011年。天目湖诗社社长，溧阳市书画院副院长，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书画俊彦，人中之杰。平陵文风蔚然，文气盎然，挥毫泼墨之才俊代有人出。本文以前贤为尊，后秀不一列入。

史炳和《句俭堂集》

知道史炳，是因为知道他是清嘉庆溧阳县志的主要纂修者之一。

关于修志，史炳在《溧阳县志后叙》中说，嘉庆十五年，制府大学士松公拟修《江南通志》，先下文要求下属各县编修上报。当时的县令山东邹平人李葛峰到史炳家请他担任县志编辑，史炳再三辞谢，没有答应，于是退还了聘书束修。次年正月，在平陵书院设立了修志机构并开始工作。不久，钱塘陈曼生知县接任修志事宜，又托付史炳纂写编辑，并亲力亲为，审定去取，搜集研究，终于在嘉庆十八年六月编纂成书十六卷。

两任县令请其出马纂修县志，可见史炳一是文字功底颇深，二是对本乡本土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较为熟悉。

道光进士、安徽泾县知事赵仁基在《史恒斋先生传》中称：“（史炳）悉心编纂，三年始成。”可见嘉庆溧阳志的编写，史炳是有功之臣。

《光绪续志》载：“史炳，字恒斋，年十四游庠，十六举於乡，典试刘文清（墉）落卷得之，意为宿学，揭晓后知才弱冠，奇之！屡上春官不第，留京师与何道生、吴谷人、法时帆、胡果泉、王铁夫诸先生善，大兴朱文正（珪）尤器之，以咸安宫学教习，期满选兴化教谕。嘉庆己未知县陈鸿寿聘修县志，搜采精博，体例谨严，三年告成，士论称允。改泾县教谕，寻截取知县，辞不赴，任校官二十余年，以老乞归。著有《大戴礼正义》十六卷、《杜诗琐证》二卷、《句俭堂集》四卷行世。精音学，旁通泰西算术，尤工试帖，入《九家诗选》。”从这段记载来看，史炳十六岁就中举，但科考一直不畅，除任过教习、教谕等文职外，著作颇丰。

《句俭堂集》是史炳传世的诗集，共四卷，我们现有的读本，是民国十二年（1933）由其后人重新刊印，锡成公司代印。史炳侄玄孙史国楨在书后跋中云：“伯高祖恒斋先生，著述甚富，咸、同兵燹散佚略尽。而《句俭堂集》又仅残

孤本，卷尾且多蚀字，不绝如缕矣。其玄孙兰如昆季，予从兄弟也，欲重刊之，而累于贫，拟货产以从事，谋于予。予曰：鬻祖产以梓先著，被刘筠士、李复斋尝为世莫议之者，又何疑焉？予因力赞其事，并捐费助之，用底于成。予喜先生遗著之得广流传，而嘉兰如兄昆季之能述祖德而诵清芬也。爰缀数语于简末。”由此文可见，《句俭堂集》曾为孤本，由其玄孙史兰如兄弟变卖祖产而重新刊印，史国桢又助一臂之力，我们今天才得以谋面。此集在上海图书馆有藏。幸有湘潭萧建民先生复印转赠于我一册，得以拜读。

《句俭堂集》由汪克坝题书名，有序二篇。阮文藻在《序一》中言：“先生之诗之文，于其雄深瑰奇，极腾蹕起伏、出没吞吐之致者不论。第论其谨严谓之句、洁约谓之俭，可夫？”“先生十六举于乡，既困不得第，乃返求之《六经》百氏之言，观其贖、会其通，以明其理、养其气矣。”那么书名为何叫“句俭”呢？“所谓俭者，乃华之至，而故以少胜，无枝词也。”他评史炳的诗“则胎息于杜而取材于苏”，是颇为推崇的。

光绪《溧阳续志》主修者、金坛探花冯煦作序道：“去年，恒斋先生曾孙保奎，奉先生《句俭堂集》四卷诣予江宁，得之惊喜，盖距族父为予道先生时，且二十年矣。先生于学无不窥，而尤邃于畴人之业，篇中数有称述。”“而通之诗在东坡、放翁间，气足以持其志，辞足以称其物。视世之以叫嚣剽滑为诗者，蔑如也。”“予序先生集，既有怆于盛衰之故，且念翁名字翳如益愀乎？卹乎？感喟于无穷也。”得到遗集，惊喜。为诗题序，感叹！冯探花的感慨是文人间的相惜相怜。

赵仁基在为史炳作的传中说：“时会中丞宾谷方都转两淮，开题襟馆于邗上，延集四方名士，诗酒之会无虚日。先生与诸君唱酬，每一诗出，皆叹为探骊得珠，成至搁笔，才名噪大江南北！”可见，史炳当时的诗名才学，是远近闻名的。“（炳）尝曰：吾以书为命，安能一日废书？校阅之勤，至老弥笃云。先生律己甚严，而接物恒坦易，受人托，必尽力赴之。居恒不问家人生产，性善施济，或受欺，不与较，亦不言前后。作教必勉诸生以稽古敦行，务为有用之学。出门下者，卒成奇才。”

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以书为命，史炳，是一位读书人。

《句俭堂集》中的乡土风物

《溧阳古诗选》中曾选史炳《太白酒楼》、《沧屿园》等诗八首，在他的《句俭堂集》中，还有不少溧阳乡土风情味十足的诗作，值得欣赏。

唐尉孟郊，在溧阳弯弓射鸭，有射鸭堂遗存，史炳有《东野射鸭堂》诗：

公不能，身骑恶马弯强弓，南山射虎称人雄。
复不能，射雉如皋相媚妩，闺房老作闲男女。
五十头颅进士科，凄凉宦迹溷渔蓑。
兴来射鸭浑儿戏，尉即负公公奈何？
平陵旧郭投金濑，野鹭群飞远天外。
荻叶争翻画楫忙，竹枝奚取雕弓大。
自言此事无是非，守令闻之怒且嘻！
他无可坐正坐此，假尉来兮宜蚤归；
当时毕竟名流重，如此荒唐才减俸。
半俸分来长苦饥，双凫拾得成何用？
县尉虽卑非散官，昌黎乃叹酸寒恨。
公未得巧宦，法不弋高官，
但射鸭后死，江湖有散人，
数言凭吊最伤神。
玉溪官，不挂朝籍，长吉无年东野贫。
君不见，陆浑之尉亦穷措，
自不三公又谁怒？惆怅千年江水旁，
落霞依旧飞孤鹭。

这是一首追忆孟郊任溧阳尉的诗，写寒尉五十中举，宦迹凄凉，消极上任，于平陵投金濑处弯弓射鸭。县令发怒，减其俸薪，另聘“假尉”，使孟东野陷入饥寒之中。诗中充满对孟郊怀才不遇的同情，惆怅如江水滚滚，只有落霞与孤鹜依旧。

史炳对农村的作物景致颇有感触，他笔下的植物草木，信手拈来，写得栩栩如生，充满感情。

桑

陌上移栽老屋边，不堪三宿况年年。
红蚕饲罢鸠初醉，长记绿阴江上天。

竹

琅玕洗净手镌诗，谁斫青光寄楚词。
烟雨年深低地碧，出墙高是乍抽枝。

柳

飞花飞絮可怜身，我亦天涯寄迹人。
苦学香山诗纪岁，一枝嘉庆六年春。

柳、竹、桑，都是诗人常写题材，而史炳却能写出新意来。桑叶饲蚕，蚕丝结茧，在斑鸠一声声的催促下，年年生长的陌上桑绿树成荫。翠竹是入诗赋词的养料，一场烟雨过后，低碧的竹枝一夜高过矮墙，正如那抽条的诗兴，勃发盎然。柳飞花，诗人联想到自己浪迹天涯，似飞絮飘零，学着白香山纪岁的诗，这年是嘉庆六年的春日。

写家乡风物特产，史炳也是深情款款，言之有物，言之有意。

金瓜

击绵人去水如烟，瓜子黄金出地年。
谁把金犀还种出，烂红低压积篱偏。

诗注云：“溧阳投金濑，子胥报贞女处，相传土人耕得瓜子金者。”这里记叙的是史贞女义救伍子胥之事，在溧阳可谓家喻户晓。

扁豆

络纬丛丛带井栏，更穿鹿眼作蛇蟠。
茅檐过尽黄梅雨，那得朱藤一树看。

壶芦

年年依样画难同，寂寞邱园瓠落中。
长柄于卿千底事，不如米价问江东。

丝瓜

染得青丝露不收，暮蛩篱落又新秋。
老来满腹经纶出，已抱空枝忆故侯。

麻

女桑枝上绿周遮，仿佛苕溪陆羽家。
莫听江南旧时曲，劝栽白苧不栽麻。

这些风物诗，清新自如，借物咏怀，由物及史，颇见诗人功力和苦心。

史炳还写有《宋词看牡丹》诗两首：

一

如园非复旧池台，载石堂犹面水开。
要识郁林风韵在，尺三花是手亲栽。

二

难忘崇敬赏花时，雒下风光搅梦思。
今日春晖酬不得，鞞红开近鬓边丝。

如园是东门外宋家花园，后由宋之绳居住。宋词应为祠堂建筑，后改为崇庄巷新庄小学。史炳去拜访时，已是景换物移，只有载石堂还在，三尺的牡丹是主人亲手栽种。以前的风光，已似往日旧梦，春风不再，人已老矣。

史炳与陈曼生

史炳与陈曼生是两位有知遇之恩的文友。

史炳(1762—1833),字黼士,号恒斋,溧阳人,乾隆丁酉年(1777)举人,任咸安宫教习、兴化县教谕,肆力于经史古文,曾主修《溧阳县志》。

关于修志一事,史炳在“后叙”里曾言,县令李葛峰曾登门委以编辑重任,他“固辞不获命,乃尽却书币束修之仪”。没有答应而坚持推却。“钱唐陈曼生明府继之。明府阅览达识,著作之才,宾朋又一时英俊也。顾辱始终托付于不材,复为审定去取,而假以岁月,俾得从事蒐讨,以十八年六月成书,十有六卷。”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二十九日,四十四岁的陈曼生任溧阳县宰,他一上任就部署修志之事,并再次聘请史炳出马。这次史炳没有推辞,一为曼生之才学打动,一为曼生之宾朋吸引。

陈曼生宰溧阳后,修县志、兴书院、置名石,建书斋“桑连理馆”,设陶艺“阿曼陀室”,公暇之余尽为艺事,吸引了一大批当时顶级艺术家前来雅集,如郭频伽、江听香、改琦、钱杜、汪鸿、钮树玉、查梅史、屠倬……开创了嘉庆年间溧阳历史上的文艺盛举,也开创了他自己创作上最为丰硕的“桑连理馆”时期。

史炳与陈曼生的交谊,应是文人之交、艺事之交、同好之交。

史炳曾有《题陈曼生明府(鸿寿)〈种榆仙馆图〉》诗:

种榆夹城钱可选,种榆丛霄珠成串。
谪仙亦向微尘游,邃馆奚须群玉见。
无倦堂开一岁余,甫田莠拔桑麻铺。
种榆一树鬻百本,何减昔时龚大夫。

“种榆仙馆”应为陈曼生钱塘时的室名，嘉庆九年(1804)曼生师友阮元曾题《种榆仙馆图卷》诗，有“仙人仙馆敞未扃，十行高树围虚亭”，“仙人馆中睡不醒，一梦下堕一百龄”，“粉阴古社春风餐，馆中书卷甘石经”之句。阮元(1764—1849)，号芸台，江苏仪征人，督浙江时曾设“诂经精舍”，著作甚富。陈曼生曾以书记员身份游阮元幕达十二年之久，所以阮元是他的恩师，由其为《种榆仙馆图》题跋，属师生之文谊。

史炳题此图，应在曼生赴溧任知县之后的一年多，即嘉庆十七年(1812)后，因诗中有“无倦堂开一岁余”之句。嘉庆溧阳志“公署”篇记：“无倦堂，在厅事东，宋乾道中知县喻安中建，久废。国朝嘉庆十七年，知县钱唐陈鸿寿书原额，悬之三堂。”所谓“无倦”，宋朝程迥有记：“无倦，盖朝夕治事之所也。示勤于政，靡有怠忽之意。”曼生重书此额，有尊古励己之意。

“谪仙亦向微尘游，邃馆奚须群玉见。”此两句应写李白曾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来到溧阳一游，映衬桑连理馆的文人相聚，群玉璀璨。应该说，陈曼生对史炳是非常看重的，因为能在《种榆仙馆图》题诗之人，能有几个？

史炳还有一诗《寄题陈曼生明府〈桑连理馆主客图〉》：“仲镇宰溧无嘉宾，谪仙来游宰不文。人才会合古难必，胜事今见横图新。”仲镇是南宋绍兴年间溧阳知县李荐孙的字，他宰溧时没有嘉宾前来，而谪仙李白第一次来溧阳，县令对他态度傲慢，一副没有文化的样子，李白在《游溧阳北湖亭》一诗中写道：“游子托主人，仰观眉睫间。目色送飞鸿，邈然不可攀。长吁相劝勉，何事来吴关？”把一个小人高傲无礼、无知无识的县宰写得入木三分。史炳由古及今，感叹人才相聚会合是件难事，而在桑连理馆，陈曼生明府却把文友们聚合的盛事绘之于图画。

“陈侯逸气青云驾，俯仰乾坤同传舍。百代光阴过客看，奚论三宿曾桑下？”陈曼生的文逸之气驾腾青云，俯仰乾坤天地如同人世旅舍。世事沧桑，光阴似箭，诗仙都曾遭人白眼，匆匆人生，何谈什么名人名师？史炳对陈曼生的评价极高。“要知翰墨皆前缘，诗杂仙心尽证禅。”前世有缘，桑连理馆才会相聚这么多翰墨高手、诗人仙客，吟诗作画，论道参禅。

“太邱道广政不颇，岁稔民乐无催科。”史炳对陈县令的吏政颇为赞许，夸他像古代太丘县令陈寔一样，治政清平，深得民望，岁熟民乐，无吏催赋，颇有政绩。

该诗应为嘉庆十九年后作，因为曼生十六年到任，修志三年，史炳“改泾县教

谕”，故诗中写“自来山城山万里，登眺信美离忧忡”。他人虽在安徽泾县山城，心却在溧阳桑连理馆中：“想见官斋琴酒会，中山人兮远奈何！”

这首诗为“寄题”，是史炳应陈曼生之邀题写？是史炳看了图以后有感而发？还是陈曼生寄图请他题写？不得而知。正如《桑连理馆主客图》一样，我们只有从文字诗题中去揣摩原作的构画了。

史炳和陈曼生的交谊，留给后人的资料并不多，但从两幅图题之诗来看，相互尊敬、互为唱和、相互欣赏、念念不忘，是两人之写照。

清道光十九年，安徽泾县知事赵仁基在《史恒斋先生传》中言：“丁忧归，主讲宜兴蜀山书院，多所造就，士人皆自幸得师。”史炳自己有《蜀山书院作》五言长诗：“蜀山夫如何，蜀客大已歿（东坡欲买田于此）。流风被来学，讲堂起突兀。”他曾主讲蜀山，令人浮想联翩。

桑连理馆文人雅集，曼生招杨彭年兄妹赴溧阳制壶，是不是史炳从中穿针引线，介绍良工？有待发现。

史炳与曼生文友

史炳在《桑连理馆图记》中云：“溧阳县署之西斋有桑二本，樛枝上交，殆数百年旧物，世莫之纪。嘉庆辛未，明府钱唐陈曼生先生始命其斋曰‘桑连理馆’，吴江郭祥伯来游寓焉，于是幕中知名孙蔚堂、江听香、裘茶雪、周松泉、张晴崖、高西泉诸君，相与哦诗绘图，以纪其事。”

百年古桑，连枝盘根，原本寂寂无闻，却因曼生的到来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桑连理，连理桑，相扶相携，相酬相和，一时溧阳官署里文风蔚然，星光熠熠。

曼生学生高犀泉在《种榆仙馆诗钞》书后记：“（曼生）辛未自赣榆移任溧阳，得追随官廨。一时旧雨沓来，郇贤之聚，坛坫之张，有《桑连理馆主客图》纪事……”

曼生文友，新雨旧云，聚集桑连理馆，而史炳作为本地举人，又是县志主修，与这批文人墨客吟诗作画，题图唱和，不亦乐乎。“今明府以文章气谊闻天下，群贤毕集，而此数百年旧物，亦适赖是以有传，朋盍簪，桑连理，虽各出于事数之偶然，是乌可以不志？”（史炳《桑连理馆图记》）

史炳有诗《元和僧澄观石井栏歌，和郭频伽、江听香兼柬钮非石》，笔者在《唐井栏的前世今生》一文中有述，不再赘言，只是诗中所记人和事想啰嗦几句。

郭频伽（1761—1831），名麐，字祥伯，江苏吴江人。擅书画，工词章，著《灵芬仙馆全集》，是曼生最为亲近文友之一。江听香，名步青，钱唐人，工书画，为曼生幕友。钮非石（1760—1829），名树玉，字蓝田，江苏吴县人。善书画，精金石，曼生聘其编《续金石萃编》。史炳诗中记载，在发现唐澄观井栏后，他和曼生这三位文友前往拓石，“井阑题字偶勿毁，毡椎榻本世则无。剔藓剜苔始我辈，更窥寒碧深跣趺”。曼生曾有记，招钮非石拓唐井，是要编入书中。

史炳注为“嘉庆甲戌作此诗时方大旱”。时应为嘉庆十九年（1814），陈曼生赴溧阳任刚好四个年头。大旱之因，一为雨水少，二为江断流。“中江上流

最苦旱，罔修塘竭空暴巫。”史炳注道：“《前汉书》地理志，芜湖下云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羨入海。据此则中江必经溧阳。自明嘉靖中于高淳增筑下坝，芜湖之水涓滴不能东下，而下坝逐为中江之上流，溧阳旱灾尤甚矣。”他认为明代下坝的修筑，使长江改道，造成芜湖下游的大旱。面对旱情，郭君狂饮斗酒，汪君寄兴求雨，两人写“长谣”来发感慨，一生专注水利，面对旱情却束手无策。三人面对唐井，只能幻想“安得此泉忽涌出，平地化作千百渠”。由拓井想到浇园，良好的愿望是一致的。此诗应“柬”寄钮非石。

同年，史炳作《甲戌七月旱，平陵书院玉兰作花，柬钮非石、郭频伽》：

一

秋阳铄朱火，惊此玉雪枝。
谓是蓂蒿花，妙明澈心脾。
素荣间绿叶，绝胜春开对。
其香亦较淡，宛然幽兰吹。
本草有四季，木兰与辛夷。
去秋不再花，乃是新春移。
今年得地力，春花秋复滋。
物理倘如此，何用妖祥推？

二

鲁史异则书，李梅有冬实。
陋哉五行传，事应极纤悉。
往岁生嘉禾，今秋开木笔。
天机谁能窥，地纪略可述。
万古中江流，东奔其区疾。
煌煌水利书，祇忧东郡溢。
岂知最上游，早辄渊底出。
自夏倏徂秋，闵雨但赤日。
百草将其腓，此花奚独茁？
餐英饮朝露，何以充秭秭！

三

闲云夜频出，冉冉东南岑。
织女既左顾，牵牛复前临。
洗车当得雨，服輶当得阴。
阴雨殊未卜，忧来不可任。
永怀二三子，夙昔多好音。
小雅云汉意，离骚香草心。
蕴真契必合，即事感易深。
太息不在兹，俛仰成孤斟。

平陵书院（现实验小学前身）是史炳修志办公之所。嘉庆甲戌夏，赤日大旱，书院内的玉兰花却盛开了，淡香沁脾，玉雪缀枝，绿叶素荣，秋花不再，新春移栽，得到地力的滋润，花开花落并不是灾丰的征兆，而是四季的更替。往年嘉禾抽条的时节，今年因大旱只剩杆条了。中江的断流，使河底朝天，赤日炎炎，百草枯焦，独有玉兰茁壮开花，它朝饮露餐，和禾秸不一样。夜幕降临，牵牛织女星挂在天上。老农盼雨，把龙骨水车洗了一遍又一遍，但阴雨天不知何时能到，让人忧愁这水车派不上用场。一直怀念郭麐、钮非石等昔日好友知音，一起吟诗挥毫，意投情合，感情深厚。叹息一声你们几位不在溧阳，举首低头间不见身影，我只能一个人自斟自饮了。

史炳另有《题郭频伽（麐）〈神庐图〉》：

黄庭有庐苦炼神，以神结庐弹指新。
华岩楼阁底真幻，大地虚空风水轮。
如此岩扉致不俗，明星艳珠霞润玉。
要知山海仲参军，更买良田意始足。

这是给郭麐作《神庐图》题的诗，仙境神庐，华岩楼阁，有炼神用风水轮炼珠玉。山海不俗，但不如人间的刀耕火种。

郭频伽在溧阳画有《濂上归装册》，史炳又在上题诗曰：

邗上分衿向十年，越凫楚乙指遥天。
 榻来彭泽寻元亮，要吸中江当酒泉。
 对客挥毫仍白眼，将人磨墨各华颠。
 如何桑下裁三宿，归计匆匆下濂船。

史炳与郭麐应是老文友。清中叶曾(燠)宾谷升两淮盐运使，开“题襟馆”于邗上(扬州)，延纳四方名流唱和，与宾从赋诗为乐，一时海内名流觞咏无虚日，成为嘉庆年间的文坛盛事。史炳当时以诗名名噪江南，他与郭麐应相识邗上，所以一别十年，越云楚雨，没有相逢。郭麐“时来访陈曼生明府”(诗注)，两人得以相见。而郭氏的酒量大得可以喝干中江，挥毫作画仍是“白眼对客”：郭麐少有神童之目，一眉莹白如雪，故有“白眉生”之雅号。但墨落到纸上就是华彩纷呈、狂放不羁了。在溧阳官署住了三夜，“时寓县署桑连理馆”(诗注)，郭麐匆匆从接官亭下船，由濂江归去吴江。“归装册”到底是郭麐一人所画，还是文友乘兴显艺的册页，不得而知了。

嘉庆十六年(1811)十二月，溧阳骑尉浦承恩作《桐阴坐月图》，史炳作记云：“骑尉以诸生蒙世职，来摄溧阳都司，好客，工为诗，有堂三楹，居厅事之左，作图寓兴。邑侯陈曼生题曰‘桐阴坐月’，而仆为文记之。”“仆方承修邑志，叹旧书于文武职官，纪载殊略，展此图，重骑尉之风流足传，又深惜前人之无述也。”

孙廷，字蔚堂，工诗词篆画，善制仿古笺纸，乃曼生溧阳幕僚。史炳有《赠孙蔚堂上舍》诗：“侧闻零雨句，秀出如子荆。”“榻来云游会，两载平陵城。”“春晚坐孤馆，巷无车马声。”一写孙廷的才情和刻苦。“晓临清晖堂，念昔两三友。”“通塞虽殊途，素心谅所耦。诗成风雨急，竟夕独搔首。”二写对诗人的思念之情。

史炳与曼生文友的唱酬题诗，多收在其《句俭堂集》中。秀才人情，薄纸一张。诗情才情，孰重孰轻？作为“桑连理馆”中的一员，他见证了陈曼生及嘉庆年间文友们的过往雅兴。

曼生壶与溧阳景物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千年古邑溧阳迎来了一位新县令,一位文人县令陈鸿寿。

曼生诗书画印俱精。他书呈八分,天趣盎然,篆隶笔意高古,师古不泥古,自创一格,历久弥受人重之。画山水著笔不繁,鲜有精工细描,却是意境修远,逸气扑面;画花卉兰竹空灵奇妙,一花一叶信手拈来,却成逸趣。金石用刀如用笔,写石如写纸,为西泠八家之一。曼生作诗如书画,讲究自然天趣,不屑于字句,宗太白之洒脱高放,自有峭拔秀逸之风范。

宰溧六年,贵为县令的曼生,没改文人之习性,谈笑有鸿儒,往来皆同好。故旧纷来,新友频聚,群贤毕至,宾朋满座。花间吟诗,桑下作画,谈古论今,品茗酬唱,自得文人雅士之乐趣。个中缘由,一为曼生的好客,一为曼生的声名。

出身贫寒的一介书生,得一县之尊,曼生是十分珍惜的。他并没有玩物丧志,荒废吏务,而是勤勉有加,兢兢业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难能可贵的。他清正廉洁,“以催科事迁上官,强直不屈,卒纾民于艰,众咸指为强项吏”。对上,他是“犟头”;对下,却是体恤关爱,“廉明勇敢,卓著循声”。创文学,写《平陵书院碑记》,提倡兴学,奖掖后人;修邑志,搜采精博,体例谨严,以求“不负此邦人士”;他捐俸禄重办县邑育婴堂;嘉庆十年(1814)溧阳天旱大灾,他“活人无算,治行为当时第一”、“办赈之善,为大江南北之最”……

曼生宰溧近两任,是位好县令,溧阳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溧阳,应该说是曼生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快乐的六年,书画艺术达到巅峰,治印也是佳作频现。著作有《桑连理馆诗文集》……更令人称道的是,他深入涉及了另一门“金石”艺术——紫砂。“嗜壶成癖”的曼生自创“十八式”壶形,将诗书画印熔于一炉,让砂壶成了他艺术创作的新载体,从而

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

大儒阮元曾评价他的门生：“曼生工古文擅书画，诗又其余事矣。”诗为余事，壶更为余事也。笔者认为，曼生制壶，实为“玩”壶，犹如今日之“陶艺手工课”，随兴而来，信手而制。只因其才艺过人，天资聪慧，一“玩”玩出了名堂，“壶随字贵，字依壶传”，倒成就了他的“百世流芳”。

值得一提的是，曼生是个有心之人。他“宏览达识，著作之材”，对溧阳的文脉史料、风情古物了如指掌，烂熟于心；更何况他对这片土地一往情深，眷恋倾心，这从他的别号“洮湖长”中可以体味。曼生制壶，借景移情，托物造型，唐井栏便是范例。但深究细探，曼生壶与溧阳景物的渊源不为个例。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原乡人，笔者在啰嗦一通曼生的背景后，愿以陋知拙见，作抛砖引玉之用。

曼生砂壶，多见以井栏为模。井与壶，本有不解之缘。井水泽民，壶水养性，都为盛水之物。由井至壶，自然而然。据壶史专家潘持平先生言，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陈鸿寿艺术研讨会上，展示的二十二把曼生壶中有六把为井栏式，可见曼生和他的幕僚对井栏情有独钟。

一、唐井栏

现在溧阳市区的凤凰公园内，环境幽静，上盖四柱圆亭，旁有文字说明。

该井栏最早置于西门城外的广法寺（今溧阳宾馆一带），后改名零陵寺，唐代称澄观井，为澄观法师所置，宋代后井栏又移至东门万泰村报恩寺内。石井栏刻勒 91 字，记载了置井栏和石盆的年月日和供养者，难能可贵的是记载了匠人储卿、郭通的祭赞词。澄观井在《金陵志》中也有记载。

澄观法师是颇有来头的高僧，他是华严宗的集大成者，被唐德宗授予“清凉国师”称号，世寿 102 岁，历顺宗、宪宗等七朝，颇受尊重。他的诸宗融会、禅教一致的宗趣，对中唐以后的佛教界影响很大。由一位国师赐井栏与石盆，可见当年的零陵寺非同一般。如今井栏犹在，石盆不见。但无独有偶，在今天目湖镇观山脚下，有南朝梁代简文帝下诏建的“招仙馆”，宋朝更名“太虚观”，内有古井一口，石盆一只，井栏形与唐井相似，可作佐证。

唐井栏质地为“麻菇石”，壁有孔，无绳痕，潘持平先生认为是寺院法器。曼生井栏壶与彭年水盂将石刻铭文一字不漏镌于砂器之上，众所周知，不再赘言。

只是潘先生与我谈及，南京博物院那把曼生壶存疑，壶铭上的偈语“将来造井栏”误作“将来作井栏”，好多资料都随此说；而原井栏石刻为“造”而非“作”。曼生何等人也，不会错一字。上海博物馆也有一把唐井栏壶，壶铭为“造”字，没错。闻此言，我翻阅嘉庆县志原文，又实地观井，发现确如潘说，一字之差，一字之师也。

二、竹簧古井

位于竹簧镇东梅村，也为唐井。井栏为半圆形蘑菇石两节重叠而成，栏高0.3米，内直径0.5米。

南京博物院藏“半球壶”，彭年制，曼生铭“梅雪枝头活火煎，山中人兮仙乎仙”。该壶如一圆球半，形若拱穹，与古井相似。竹簧位于溧阳北山片，有与句容、金坛接壤的瓦屋山、丫髻山。壶如井貌，铭切地域乡情。溧阳种茶，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北宋常州太守溧阳人周绛，有“绿笋晚烟梅雨夏”之诗句。山里人在下雪天煮茶品茗，暖身清心，仿佛神仙。

三、汲古泉

在现埭头中学校园，井栏原坐落在膳厅旁，全校师生饮用此泉，泉水终年不涸。

埭中原为史侯祠，为祭祀东汉骠骑将军、溧阳侯史崇而建，曾有祠屋数百间，祠前甬道原有石人、石马、石桥等物。现仅存仪门石柱四支，材质为花岗岩，立柱竖书篆联一副：“汉庭爵士分封远，宋室龙章赐号新。”仪门中轴线北为灵雨坊，墨瓦镂脊，是为旧构。原祠有汉代班固撰写的碑文，有明代大学士杨士奇的“水色山光明栋宇，溧阳独有古侯祠”诗碑，第三进“海岳堂”横匾匾额，为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所书。史家为溧阳望族，颇有渊源。

“汲古泉”为青石井栏，形制不大，井刻为行书大字，至今清晰可见。嘉庆《溧阳县志》载，此井为北宋遗物，宋代崇宁（1102—1106）年间，天旱祷雨灵验，有泉涌出。古井栏现置灵雨坊东侧草坪间。

曼生“高井栏”壶乃仿此形制，壶铭“井养不穷，是以知汲古之功”，与井刻如出一辙。汲古，乃双关语。井泉供养百姓，取之不竭；学问汲涉古典，源源不断。学问如井泉，知古而思今，无有穷尽，功不可没。

四、红泉井

原在溧城镇夏庄村，清康熙年间（1662—1721）静海知县史普，号红泉，在家乡筑“红泉书屋”，三间楼房，旁有井名“红泉”。青石八边形井栏，有对孔，栏高0.53米，口径0.35米，井壁上有行书“红泉”字样，乃大儒袁枚所书。红泉书屋为史家园林，三朝元老史贻直对此十分眷念，清皇也多有赏赐。“丛桂轩”两旁有雍正皇帝亲笔对联：“坐石吟新月，临流纳晚凉。”厅事门头挂着乾隆帝赐的“绿野颐和”匾额，乾隆还恩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贮藏书屋，可见皇帝对史宰相的恩宠。

岁月沧桑，“红泉书屋”夷为农田，更加让人扼腕的是“红泉”井栏不久前为不法之徒窃盗，身在何处，不得而知。

《阳羨砂壶图考》曾录曼生壶拓款：“注以丹泉，饮之延年。老曼铭，频伽书”。丹泉，即红泉。有文析丹泉即朱砂泉，饮之能延年却疾，此为一解。殊不知溧阳有红泉古井，与书屋为伴，自是沾了文气。饮丹泉延年，读好书亦能延年。一个“注”字，一个“饮”字，曼妙无穷，注为灌输，饮为吸收，红泉添书香，延年以寿长。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乾隆进士，江宁知县，也是曼生的同乡钱塘人士。他与史贻直是儿女亲家，有《宿红泉书屋》五言诗四十四句，其中有“标题多翰墨，照耀尽天章”、“作楷争磨墨，题笺屡启箱”等句，指出红泉书屋的荣光和文盛。而贵为“三朝元老、六部尚书、九州总督”的史贻直，一生享尽皇室尊宠，这在清代官宦中实属少有。

曼生宰溧，与史氏素有往来。修志的兴化教谕史炳，对他赞赏有加。曼生铭里的“丹泉”，自有多层含义。

曼生壶铭中的溧阳景物，还有两条也值得辨析玩味。

1. “试阳羨茶，煮合江水。坡仙之徒，皆大欢喜。”

其“合江”为何江？在何处？有文析合江在四川南部，为赤水和长江汇合，水质清冽，煮茶甚佳。此说恐不妥。江南多名泉名水，难道煮茶沏茗的水要远赴边区汲取？铭文虽为虚指，但于情于理都很牵强。

合江何在，就在溧阳。溧阳西南部有条大河，叫胥溪，据说是伍子胥为攻楚而开凿的世界上第一条运河，始于高淳东坝，由中河流入县治南双桥。西北部有

一条大河叫濂水，也叫濂江，起于上兴埠的曹山，后经前马荡、北山河至北双桥。县治北有别桥河（今丹金溧漕河），从昆仑港口出北双桥，与南双桥水汇合。因此溧阳县治西郊乃三江汇合之地，有南北双桥架于河上，成为县治佳景。嘉庆《溧阳县志》编撰史炳在汪鸿绘的景图上题诗：“灵胥西来，醉白东逝。试眺双虹，江湖满地。”三水合流，流经县城，继续东下，直奔荆溪。县城有上水关、下水关，水由护城河绕团城分流，经夏桥流入宜荆界内。古谚有“宜兴溧阳，终究不长。东坝一倒，一淌平洋”之说，可见宜兴与溧阳山水相延、唇齿相依的关系。

试阳羨茶，是用不着去千里之外的地方取水的。曼生的“桑连理馆”东侧和北边均是三水并流的合江，近在咫尺，煮沏邻县的佳茗，甚为合适。曼生铭文的贴切，理应如此。

2. “春可供，供茶事，谁云者，两丫髻。”

此为“古春”铭壶。关于“供春”是人名或茶事，潘持平先生认为“供春”乃“送春”，是用茶事来进行的一种仪式，正如“迎春”一般。“谁云者，两丫髻”，有文云供春乃婢女，故梳着两只丫髻，此为一解。笔者认为曼生另有所指。

溧阳西北有丫髻山，秀峰高耸，好像双髻。曼生主编的县志上记载了明代溧阳才子、国子监司业马一龙写的《登髻山绝顶记略》，文中记叙了作者登丫髻山顶，东北可望洮湖波涛，往西据传可见金陵大报恩寺宝塔的金顶。诸峰如大海青螺，山村渐隐渐现，绿树枝头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另，魏麟征的丫髻山诗曰：“宛如神女列双髻。”

丫髻山为溧阳、句容的分界山，古时为赴金陵的“国道”必经之处。山民素有种茶、品茶、赏茶之习俗。曼生深谙民风，壶铭隐喻：“又到了供奉春天的季节了，人们为采茶、制茶、供茶而忙碌，这是谁告诉你的呢？看看那茶垆满坡的丫髻双峰吧。”

曼生制壶，托物造型；曼生铭壶，借景抒情。溧阳的景物，给了曼生以创作灵感，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研究。

“桑连理馆”今何在

溧阳城市中心的新华路，南通南大街南安桥，北接新华桥码头街，东临城中河石驳岸，西靠原公安局窑货行，是贯穿城中南北通路的要道。

在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的繁华里，很少能有人把这里和过去的县衙、县署联系起来。只有夹在水泥楼房缝隙中间的那棵银杏树，依然保持着二百多年的叶荣叶落，顽强地见证着小城的沧桑变化。记得我们小时候，这参天白果树有好几棵，修路建房，剩下这孤零的一树挡在老公安局的门口，影响警车的出进，至于为何留它没砍掉？不知道。也许，这棵树有神灵佑护吧？

陈曼生主持修撰的嘉庆《溧阳县志》，在卷一的“公署”一栏曰：“知县署在城内西北隅。唐天复三年创始，宋绍兴十八年知县施祐重建，元州县署盖仍之，明太祖吴国公元年知州王琳再建，林公庆复始为正堂。洪武二十八年知县卢何生修，正统三年知县邬璠又修。天顺元年火，知县李溥及僚属捐俸倡建，耆民助之。万历三年知县徐缙芳修葺。国朝康熙、乾隆间亦屡有修建。”

一座县署，从唐末到宋元明清，后到民国，一直未动迁，只是修葺，这也是奇迹了。如今，早已看不出旧署的规制与格局，但从濂水河边观察，该片地基明显高于他处，属人工夯土砌石而成。

嘉庆十六年(1811)，陈曼生于3月29日任溧阳县宰，是年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意气风发之时。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十年前拔贡(1801年)，朝廷考以知县用，分发广东岭南，但因“丁忧服阙”而没有上任，奏请留任江南，当了一段赣榆代理县令，“补溧阳县”。大概是因为前任李葛峰调动，有了空缺，溧阳离钱塘相对近些，所以他的赴任属“临时调配”。

嘉庆溧阳志载：“古连理桑，其下两本，一本在县署，一本在丞署，中隔墙垣，椽枝上合，高可四丈许，数百年旧物也。”一棵数百树龄的古桑，高达十几米，又隔

壁而生，枝叶上合，被曼生视为嘉木祥物。“桑连理馆，在三堂西。嘉庆十六年，知县陈鸿寿命名庭桑连理馆，故也。”文人县令，与众不同，刚上任即觅得癖斋雅馆，风流本性也。其实，在县署庭院尚有另株古桑：“若木亭，亦在县署偏东……亭前有乔桑，百余年物也……今古桑犹挺立焉。”汪鸿绘《县署图》中，连理桑十分醒目，“桑连理馆”亦有标注，曼生设的“拜石轩”也有标明，而“若木亭”和古乔桑却没有绘注。可见，桑连理馆在曼生和文友们的心中，是颇有分量的。

溧阳，自古重农桑，“新昌丝绸”名闻遐迩。有硕桑挺立县署，地利也，古迹也，吉兆也。

“桑连理馆”时期，是曼生生活、创作、政绩最为惬意丰收的时期。“在溧阳任上该是陈曼生最为意气风发的一段人生纪念，曼生逸事於此也极矣。”^①在连理桑的荫佑里，曼生批阅公文、判断狱案、审编县志、研墨挥毫、创制砂壶、宴朋会友、题跋唱和……“（曼生）廉明勇敢，卓著循声，创文学，修邑志，办赈之善，为大江南北最。”^②“历任繁剧，治事精敏，折狱如神。溧阳岁饥，设法赈济，活人无算，治行为当时第一。”^③“君吏事精敏。溧阳岁饥，振贫劝分，民不饥死，治行为一时冠。以催科事连上官，强直不屈，卒纾民于艰。众咸指目，以为强项吏。”^④爱民如子，敬民如父，赈民于饥，济民于困，这不是每个县吏能做到的！而为了上缴的科事税赋敢于为民抗争，不屑顶撞上司，“犟头倔脑”的县令，世所少见！

曼生好客好友，始终如一。郭麐言：“曼生故家贫，以书记游幕府……所居新桥，室宇隘陋，而四方知名之士无不踵门纳交。觞酒豆肉，座上恒满，缓急叩门，至典质借贷以应。及仕为令，士益争往归之，至署舍不能容，已各满其意以去。而君特持廉，不妄取一钱，但自节啬而已，然未尝过为弊衣恶食，以缴名徇时好也。”^⑤“新桥老屋赁于其邻，客未常满，孰为主宾。逮牵丝而入仕，自海馗而江滨，旧交之过从，新知之慕用，其趋若水，其来如云，莫不倾襟以接，倒篋以尽。游谈者藉其声华，枯槁者资其膏润。乃欣然而白歉意，以为款洽之不尽。”^⑥

盛名之下，有朋来兮。生性豪迈热情的陈曼生，待友都是酒肉相款，宁可自己典当借贷。有了古连理桑这片荫蔽，旧交新知，若水如云，以至官舍都容纳不下。“旧雨沓来，郇贤之聚，坛坫之张”^⑦。他倾襟倒篋，资其膏润，不愿以“弊衣恶食”款待任何一位朋友，宁可自己“持廉节啬”。

连理桑下，名流萃集，群贤相聚，琴棋书画，诗酒花茶，酬唱往来，声名远播，

交相辉映。

关于连理桑，曼生文友多有描述。屠倬有“嘉树同根阴连理（署有连理桑，百年物也）”之诗句，查揆诗云：“虬桑撑晴空，仰视不见顶。闻之百年人，生已讶修挺。下有屋数椽，僻处得闲冷。玉山草堂宽，蓝田厅壁静。（桑有两枝，其一在县丞署。）骈枝援引臂，交柯驾宛颈。”“此时汝老桑，婆娑抑何幸。桑如以臆对，离合良可省。”^⑧屠倬有《连理桑歌为曼生作》诗，其中有句：“陈侯异政传濠上，惠泽及人人挟纊。官斋忽睹连理桑，车盖童童兀相向。其高十丈大蔽牛，女墙离立跨两头。岐分嘉荫落丞署，坐看东西纠结如双虬。朝阳夕阳遮两面，六月炎威扫庭院。”

嘉树古桑，荫天蔽日，自曼生宰溧，赖以有传。溧阳史炳《桑连理馆图记》云：“嘉庆辛未，明府钱塘陈曼生先生始命其斋曰：桑连理馆。”“今明府以文章气谊闻天下，群贤毕集，而此数百年旧物，亦适赖以有传。朋盍簪，桑连理，虽各出于事数之偶然，是乌可以不志？”

嘉庆年间的文人群贤，书画名家，聚集到古桑之下，于是便有了《桑连理馆主客图》。

“主客图”为孙延、江步青、周松泉、高日浚绘第一图，改琦、钱杜、汪鸿等人重新添绘。为什么会绘此图？郭麐《桑连理馆主客图记》说得很清楚：“于是感念云萍，俯仰今昔，思前贤同晏一室之言，苟不有纪录，曷识苔岑，乃合同人托之绢素，按图即事，可得而记焉。”郭麐对图中所绘人物做了详细描述：坐榻年长者钮非石、对石作拱者汪小迂、持觥将饮者史恒斋、坦腹持杯者查伯葵、侧从剥核者陈仲恬、对坐赏碑者赵北岚、屠琴邬，中庭调鹤者释懒堂、拈花者郭频伽……其中，“长几钜研、和墨申纸、作擘窠书者，图之主人陈曼生也”。“司茗具者埴埴之工，曰杨彭年，其制茗壶得龚时遗法，亦无使其无传也。”曼生作为图中主人，不是以正襟危坐、判卷审案的县令面目出现，而完全是一副书家的面孔架势，文人县宰的性情跃然纸上。杨彭年作为制壶之工，能列入“主客图”群贤之中画出，是相当不容易的，一表明曼生文人圈之开明平等，二说明彭年的制壶技艺颇为圈内人赏识，郭麐不愿他默默无闻，勿传后人。

《桑连理馆主客图》应成画于嘉庆十九年（1814）六月，图中所记三十四人，到次年三月又重画补记。郭麐作《桑连理馆主客图后记》：“主客图经始于甲戌六月，时

方作粉本，先为述其略。越岁三月，重过濂上，则烟墨茶铺，粲然大备，盖余去后，适钱君叔美、改君伯韞同客桑连理馆，与汪君小迂点笔其成之，选树帖石，调铅杀粉，牵拂掩染，如穆羽之和，而图于是断手焉。主人念聚散之多，感离合之不常也。为补前记所未及者若干人，而以其地之奇石有名称者凡九，并图其上，属余为后记。”后记又补记十九人，可谓宾客盈盈，星光灿灿。

“主客图”在曼生文友中颇有影响。

钱杜《陈曼生桑连理馆图》：“问君官舍傍，十丈青桑枝。交柯结连理，盘屈双云螭。疑是太古前，裂地穿之而。庭雀不敢巢，神兔呵护之。使君开轩馆，扫径支山篱。窗横玉玲珑，帘映青琉璃。焚香绿阴合，理牖清风吹。午倦移胡床，吏散张琴丝。我曾偏舟上，正及春深时。悠然入图画，秀色沾须眉。图中有主人，纱帽风前欹。兀坐笑不言，树下方题诗。”

陈文述因曼生索诗，写了一千五百字长诗，题“主客图”：“家曼兄官溧阳，署斋有连理古桑一株，大合抱，数百年旧物也。兄葺其旁屋为‘桑连理馆’，旧雨过从者宴集其中。钱松壶、改七芑为作主客图，频伽、辛萝为文纪之。”“君来官溧阳，五年逮今兹。地既美清淑，民亦安恬熙。政成幸多暇，余事举亦宜。舍东古桑树，百年谁所遗。异条实同木，瑞蝶生华滋。其高云百尺，其大云十围。朝鸣双鹤翔，暮宿双翟翠。”

钱诗和陈诗，都盛赞在桑连理馆文人相聚的友情、才情、图情。

关于曼生才情，陈文述总结得较为精辟：“君工古文章，唐宋寻端倪。纵横陋绳尺，元气深肝脾。君诗多兴会，天葩扬芳菲。诡奇托李贺，冲淡宗严维。君长尤在书，颀颀汀州伊（墨卿）。隶法古碑版，篆法古鼎彝。下逮楷与行，祖繇而宗羲。篆刻古绝学，刻划君能为。妙语在吉金，盘匱与鼎彝。近更嗜六法，颀颀黄与奚。东南此坛坫，先后相驱驰。”

诗书画印，曼生驰驱坛坫，名闻嘉庆。

桑连理馆时期，陈曼生作为“七品之官，百里之宰”，是他人生最为愉悦、创作最为丰产、宾朋欢聚最多的时期。《行书枯树赋卷》、《设色花卉册》、《壶菊图》、《孙夫人墓志铭》等一大批代表作均在此时完成。此后虽擢升河工，但疲于公务棘手，仅五六年光景就病逝任上。

在桑连理馆的五年多里，“政成幸多暇，余事举亦宜”的陈曼生，公暇之余玩

起了紫砂泥，“创意造型，范为茶具，艺林争宝之；得其一枚，珍逾拱璧，至今称为曼生壶”^⑨。香港艺术馆藏“乙亥铭直腹”壶就有“桑连理馆制”字样。笔者也从宜兴一位藏家手中见过一把“延年半瓦”壶，底款清晰为“桑连理馆”。暂且不论壶之真伪，敝人认为“桑拿连理馆”款壶，应为曼生壶之早期作品，因为“阿曼陀室”尚未“出炉”，暂借斋名一用。但我们千万不能认为该款壶的烧制就在桑连理馆内，县衙重地，琴棋书画玩玩无妨，如砌窑添柴、制坯烧壶，恐怕曼生乌纱难保！上司巡查、官员来往，清廷的戒律是十分严酷的。何况县令这顶官帽，陈曼生得之不易！

“阿曼陀室”到底在何处？“壶烧龚春窑”，杨彭年是运回丁蜀烧壶，还是在溧阳当地砌窑？曼生壶到底烧制了多少？这些曼生壶谜，笔者探寻了多时，尚未找到确凿证据说明问题，只有待以后史料的挖掘来揭开谜底了。

查揆在离开溧阳十年后，又一次归舟路过桑连理馆。“濑水弄激湍，临流玩清影。一别已十年，重来如俄顷。”他见官署还在，斯人已去，水似回肠，怆然而作。

人生须臾，转眼百年，又是百年。古连理桑早已不见踪影，那子立的银杏，不知是否桑连理馆的旧物？那幅《桑连理馆主客图》也是杳无音讯，我们只有从简短的诗文中，去揣度图中主人客人的风貌。

自唐以来，官廨依旧，只是换了主人，又换了客人。“不知其孰主而孰客也？”郭频伽叹息道。

“桑连理馆”时期，是嘉庆年间溧阳历史上的文艺兴盛时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知是陈曼生造就了连理桑，还是连理桑成全了陈曼生？对于桑连理馆，曼生算是主人，还是过客？我想，作为一个溧阳人，不管他是主是客，我们都不应忘记曼生。

几年前，宜兴陶协史俊棠会长带大师、专家一行十几人，前来拜谒“桑连理馆”，我充当向导。汪寅仙大师低声提议：“这地方应该立块碑，告诉大家这里是原来的县衙！”那天，我是主人，他们是客人。

郭麐在《桑连理馆主客图后记》中的几句话十分精彩，借来作为结束语：“夫主客宁有定哉？谓我主者，我谓之客。曼生之官于斯土，主焉？可也。诸君之来于斯土也，客焉？可也。自有此邑，即有此官，而官之去留于此邑者，不可以数

记,则官斯土者亦客也。官斯土者,不可以数计,则凡亲戚私昵、友朋宾从之适来适往于斯土者,更不可以数计,则客之中又有客焉者也。”

【注释】

- ① 曹清《从〈清代学者象传合集〉上造像讲起》
- ② 蒋宝龄《墨林今话》
- ③⑨ 叶衍兰、叶恭绰合编《清代学者象传合集》
- ④⑤ 郭麐《陈曼生墓志铭并序》
- ⑥ 郭麐《祭陈曼生文》
- ⑦ 高犀泉《种榆仙馆诗钞》跋
- ⑧ 查揆《笈谷诗卷十七》

“唐井栏”的前世今生

上 篇

徐立君从宜兴长乐弘陶庄寄来一份珍贵史料。他新近觅得郭频伽的《灵芬馆诗话》，其中卷六有这样一段记叙：“（溧阳）邑多古迹。有零陵寺唐井栏铭一，今名报恩寺。其文曰：维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五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沙门澄观为零陵寺造，常住石井阑并石盆，永充供养。大匠储卿郭通以偈赞曰：‘此是南山石，将来造井阑。留传千万代，各结佛家缘。尽意修功德，应无朽坏年。同霏胜福者，超于弥勒前。’前凡九十一字，笔划遒劲，有颜柳家法。澄观亦诗僧，昌黎所谓道人澄观，名藉藉者也。”

余大喜。一喜郭麐这位曼生的挚友，在其诗文中竟对“唐井栏”有如此详细的记载；二喜其记铭文与原石刻文一字不差，恰九十一个；三喜对其书法有精辟的评介；四喜获知澄观也是位诗僧，连韩愈都称赞他，当时已是声名藉藉。

在《灵芬馆诗话》之四集卷七，又见《零陵寺唐井歌》一首：“新秋访古城东寺，有物磊魄留墙隅。苔皴藓蚀风雨剥，尚观文字存模糊。元和六年岁辛卯，五月戊中盈詹诸。沙门澄观为常住，造此石井盆与俱。南山之石大坚好，问谁琢者曰郭储。五言如赞亦如偈，传千万代永不渝。大书深刻笔浑厚，字体仿佛颜欧虞……”“因思古时物力易，造此一井良区区。犹书年月记谁某，意垂久远传规模。古人作事多不苟，一念千载如须臾。此中往往有奇士，惜哉托迹于浮屠。寺名屡易盆已失，何况长缚双鹿庐。老衲胼胝牧豕唾，昔何郑重今何芜。我来班草偕客坐，久旱渴欲吞江湖。且分一杓供茗战，已备石铍支砖炉。”

呜呼！读此长歌，不禁泪眼婆娑。非是矫情，实为“唐井栏”多舛的命运和离

奇的遭遇而感动!

郭麐,字祥伯,号频伽,江苏吴江人。与曼生相交三十年,亲若兄弟,知心知己,曼生生平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曼生宰溧期间,他经常往来勾留,对溧阳的人文历史、风物古迹十分了解。从其诗话来看,写了许多关于溧阳的景物旧事,可见其对古邑的研读勘踏不是浮光掠影、道听途说,而是有深入的研究。在曼生《桑连理馆诗文集》失传的遗憾里,得阅《灵芬馆诗话》,如饮琼浆,如获至宝。值得一提的是,频伽还是“阿曼陀室”的主创人员之一,曼生壶的刻制,与他密不可分。

那么,郭麐诗中提及的零陵寺唐井栏,其来龙去脉如何?它与陈曼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曼生宰溧六年,与唐井栏结下不解之缘。

在陈曼生主修的嘉庆《溧阳县志》“杂物”辑中有记载:“唐井,在东门外报恩寺。井栏刻云:维唐元和六年……案《金陵志》:西门零陵寺有澄观井。今澄观井刻乃在东门报恩寺,岂唐时此寺为零陵寺之别庵,并造二井耶?其徙报恩寺于此,乃宋代事。”在卷十六“杂类志·疑辨”一辑中又载:“报恩寺井,唐元和六年零陵寺僧澄观于石栏刻字,今尚可辨。俗呼秦公井者,或宋秦梓及焞尝施功德于寺中,而世俗漫称之。若以为开自宋时,则误矣。又案《金陵志》注:零陵寺临街石井,亦元和六年刻字,即今西寺也。今山门外有古井一口,麻沙石栏,正与报恩寺石栏同,而形模殊小。僧云别有断石栏,其上刻字,久已失去,未知即元和所造否?不可考矣。”

由嘉庆志我们看到,曼生对唐井的渊源、刻字、迁徙、年代,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和考辨。在此,有必要对志中提及的人物澄观和秦梓做个简要介绍。

澄观,俗姓夏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他“遍寻名山,务求秘藏”,游历甚广,博学多识,儒佛俱通,撰《华严经疏》20卷,被称为华严经主。澄观曾为唐德宗讲《华严经》,被授予“清凉国师”称号,此后各朝他亦很受尊重。澄观死后,唐文宗为此“辍朝三日”,宰相重臣全部“缟素”,并为他树碑。这样一位“国师”级人物,与溧阳零陵寺有何瓜葛?曼生文中称其为“寺僧”,或许澄观曾在此住持或挂单,史料暂无从考辨,但从置井栏石盆并勒刻铭文来看,把工匠姓名、岁月时辰、颂词唱偈都记录得如此详细,可见澄观

与零陵寺因缘非同一般。

秦梓，字楚材，南宋奸臣秦桧之兄。他幼有大志，登进士榜后知宣州、湖州，曾出使高丽。靖康之难，他力主战，草《北伐之辞》六百余言，志存恢复，奋不顾身，忠义之心溢于言表。建炎三年十月，岳飞在宜兴张渚大败金兀术，屯兵广德，秦梓作为太守“捧敕劳军，留宴军中，则潜然殒涕，愤然有请缨之志……”高宗赵构与秦桧偏安一隅，岳飞父子被害，秦梓愤然避祸，一叶扁舟，全家隐居到民风淳朴的溧阳，“遁溧邑下桥报恩寺左”；过了五年，“卜筑下桥，为子孙业”。下桥又称秦公桥，是秦梓为民做的功德。他在百姓中有很好的口碑，所以有人把秦家附近的报恩寺里唐井称为“秦公井”，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许此井亦是秦梓出钱所掘，只是井栏为唐。秦梓有长子名焯，其后代世居溧阳上黄尚典村和宜兴英墅一带。

曼生对唐井栏情有独钟。众所周知，在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都藏有“仿唐井栏壶”，而壶壁刻铭与零陵寺唐井基本相同。只是“上博”井栏壶外形为“高井栏”，但壶铭中的偈语与原文一字不差。“南博”的那把型制与唐井相仿，只是偈语为“此是南山石，将来作井栏”。其“作”字有误，应为“造”。陈曼生的县志和郭频伽的诗文中，此字都为“造”，从治学训诂的严谨角度讲，两公制壶刻铭是不会出错的。正是“古人作事多不苟，一念千载如须臾”。所以，宜兴潘持平先生对“南博”井栏壶存疑是有道理的。

无独有偶，“上博”和“南博”还同时藏有杨彭年制的“仿古井栏”水盂，铭文与仿古井栏壶相同，但此处的“将来造井栏”就对头了。但两只水盂同署款“道光壬午云楼为少峰书”，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难道是双胞胎？彭年一口气做了两只？笔者认为此“双胞胎”的真伪，尚待鉴别。孰是孰非，暂别定论。从另一角度讲，“双胞胎”唐井栏壶、盂的出现，佐证了此类器型乃“曼生”风格的“范本”，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唐井栏”在曼生紫砂时代的地位。

在《名人翰札墨迹》中，收有陈曼生于嘉庆二十年十月五日给陈遵（吉甫）的信札。信中谈及补辑《金石萃编》一事，因“以原稿相付”，曼生专招钮非石来溧阳“搜访排次”，并要求：“足下所得凡在前编外者，乞以目录见寄如寿处，所无再当奉求钞示原文，以资补入。兹寄去国山碑一、校官碑并释文一、溧阳唐井文一，乞誉收，余须觅得续寄也。”

信札中提及的“国山碑”为宜兴东吴名碑，“校官碑”乃东汉溧阳名碑（现存南京博物院），而曼生把唐井文也拓去辑录，可见他对此的重视程度。这与他自嘲“平生笃嗜金石，人皆嗤我迂”（“癖印书生”印边款）是一脉相承的。“余性好游览，每逢名胜之处，登山跻岭，摩挲古碑，考据金石文字，乐而忘返垂数十年。”（“几生修到”印款）这就是活生生的曼生，一个嗜好金石艺术的文人县令！

曼生宰溧，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史炳。

史炳，溧阳人，乾隆丁酉（公元1777年）举人。任咸安宫教习，兴化县教谕，曾受陈鸿寿之聘撰修本县县志，因此和曼生交谊匪浅。他对曼公是非常钦佩的：“陈侯逸气青云驾，俯仰乾坤同传舍。百代光阴过客看，奚论三宿曾桑下？”（《连理馆主客图》题记陈曼生明府）

在光绪《溧阳县续志》卷二“杂物”辑中，记“元和僧澄观石井栏，在东门外报恩寺”。录史炳《石井栏歌》一首：“有唐澄观好事徒，泗洲筑塔干云衢。揭来溧阳零陵寺，井栏深刻欵偈俱。何年移置报恩井，圜经大小量悬殊。想当甃成乏井收，西郊旱至烦百夫。别有沈泉逼僧厨，作功德水超黄庐。宰官时代竟茫昧，吊古事事堪长吁！……”“井栏题字偶勿毁，毡椎榻本世则无。剔藓剜苔始我辈，更窥寒碧深踟蹰。郭君酒狂渴欲酈，江君勤雨托兴孤。示我长谣发远慨，生平水利筹三吴。中江上流最苦旱，罔修塘遏空暴巫。龙尾车胜鸦尾车，匠巧其奈川源枯！恒井之桶便井汲，裁供茗饮浇园蔬。安得此泉忽涌出，平地化作千百渠。辙中相濡一穷鱼，作计润物吾其迂。”

读此长歌，我们可获得不少信息。当年唐井栏从西郊迁至东寺，动用了百人之劳，而井栏与井圈相去甚远，因而被弃之一旁。所幸的是题字未毁，作者和郭频伽、江听香等人一起“剔藓剜苔”，并“毡椎榻本”。这与郭麐的“唐井歌”所言甚合，“有物磊砢留墙隅，苔皴藓蚀风雨剥”。史炳感叹“吊古事事堪长吁！”郭麐悲问“昔何郑重今何芜”？对照两首同一题材的“长歌”，气息相通，叙事述状相同，应为同时同历同为之作。可以想象：抛弃于报恩寺墙角一隅的唐井栏，长满了苔藓青泥，曼生幕府中的几个友人发现了它，盘腿趺坐，剔剜去青苔绿藓，并拓下了铭文。这是多灾多难的唐井栏一次邂逅，一次际遇，一次重生！

从史炳、郭麐的两首“唐井栏歌”来看，嘉庆十九年（1814）的大旱，给江南带来了大灾难，中江上游枯竭断流，使先进的龙骨水车也派不上用场。这也给上任

三年的县令陈曼生带来了难题。曼生壶中多有“井栏”之具，应与“求水”有关，“汲古”井栏壶也好，唐井栏壶也罢，都在溧阳有实物样范。无论是“久旱渴欲吞江湖”的郭君，还是“安得此泉忽涌出，平地化作千百渠”的史君，在诗歌中都焦虑地表现出一种良好的愿望。

下 篇

1978年金秋的一个丽日，溧阳东门外的黄家村来了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女子，四处向老人们打听：“村上有古井吗？”

她叫汪青青，是县文化馆的文物管理员。那年九月，她参加了省文博专业的专职培训。回来后，她查阅县志资料，发现“唐井栏”很有历史文物价值，但其实物具体在哪里，已不知所踪。根据史料记载的线索，她开始了寻访。

我国著名金石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先生，在其所著的《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言：“唐之井栏题字，仅溧阳零陵寺元和六年一刻……”南京博物院原副院长宋伯胤，也曾打听过唐井栏的下落。早在1957年4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将“石井栏”列为省二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改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有了，物在何处？如何保护？好像一直无人打理此事。

零陵寺原址在现溧阳宾馆所在地，时属西门外。澄观和尚于唐元和六年（811）置井盆，当时溧阳的县治尚在旧县，那是汉唐两代的县治。一直到唐天复三年（903），因“安史之乱”等原因，县治方迁现溧城镇，其间相隔92年。由此推断，当时的零陵寺应为名寺，远离县城五十多里的寺庙，能得“国师”赐置，可见非同一般。

宋元祐五年（1090），报恩禅寺从旧县迁建县城东一里处（今马垫黄家村），其时因零陵寺已毁，井栏移置报恩禅寺内。不幸的是，清嘉庆十一年（1806）报恩寺大殿和千佛楼被烧毁，这在曼生到溧阳任职前五年。仅仅几年间，唐井栏像一件年久的古物，虽侥幸躲过火灾，但已被弃墙角，幸得郭麐、史炳、江听香等人的发现。时间又过去一百三十多年，日本鬼子一把火，焚毁了报恩禅寺残存的建筑。但许是应了井栏石刻“留传千万代”、“应无朽坏年”的偈语，唐井栏却又逃过一劫！但幸存下来的它却像被人遗弃的一件旧物，渐渐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

汪青青找到唐井栏时,它已埋在黄家村荒野泥地一农民的自留地里。报恩寺荡然无存,唐井栏仅露口沿,耕作的农夫当它歇脚石,有时装锄头钉耙当它紧樨石,刈羊草的孩童当它磨刀石。这令汪青青心疼不已,爱莫能助的尴尬揪人心肺,剩下的只有奔走呼号,尽管声音太小。时间又过去四年,到1982年,经县文物管理办公室申请报告,省文物管理部门同意并拨出专项资金,决定对唐石刻井栏进行挖掘保护。

汪青青利用考古专业知识,对深埋于泥地的井栏小心翼翼地挖掘。井栏出土后,用稻草等物包填,请搬运工装吊到板车上,十分谨慎地运到“文物管理办公室”。那时的文物仓库是借县二轻公司的,在交通路36号,井栏暂放于此,后又搬至楠木厅。剔泥去污,大家发现一千多年前的唐井栏为麻菇石制,造型古朴,口内径86厘米,口沿宽11厘米,腹围408厘米,高54厘米。井肩部有鼎足式的三个眼,每眼直径5.5厘米。井腹侧表面刻有铭文21行91字。虽经日晒雨淋、风化土埋,又历兵燹人灾、寺易迁徙,石刻铭文仍字字可辨,雕刻工艺精细高超,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但是,井栏腹部已有一道斜横裂缝,仿佛是千年沧桑留下的印记,仿佛是千年磨难撕开的裂痕!

1986年,省石质文物保护专家、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奚三彩先生应邀到溧阳考察了唐井栏。1987年5月,汪青青在奚院长的指导下,对唐井栏的裂缝进行了化学加固。1992年,经省文物管理部门的同意,由溧阳市政府出面协调,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与市建委密切配合,将唐刻石井栏移至新建的凤凰公园,并建仿唐石雕凉亭加以保护,树牌介绍井栏的来历。这样一方面充分利用文物资源价值,供游客观瞻;另一方面较束之高阁、藏之秘库,更有利于保护石质文物。这个做法受到国家文物局和南京博物院专家的称赞,提出此经验值得推广。

采访汪青青,她很坦然,也很淡然。她说当年挖井栏时,发现井栏和井壁不符不配,这就肯定先有井,后配栏。我心头一动:这与史炳描述的“圜经大小量悬殊”不正好吻合吗!她又说,从井中淘出了很多罐罐坛坛,考证下来都是宋物。我想:这与史料也正契合。这位为溧阳的文物考古做出过贡献的女子,后任文化馆馆长、文联副主席,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她是常州下放知青,曾是我初中时的舞蹈辅导老师。她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第二故乡,现在已退休了。如果说要为“唐井栏”写点什么,怎么能缺了这位“汪老师”呢!

郭麐在“唐井歌”中曾说“寺名屡易盆已失”，看来至少在嘉庆年间，澄观的石盆已不知去向。笔者有福，在一次偶然的走访中，发现了石盆的影踪。至少形制、石质是同时代的产物，“南博”的专家也曾予以认可。那盆也是明珠暗弃，日晒夜露，中间已长荒草矣。历史为何往往惊人的相似！怎样使石盆物归原地，与井栏重新聚首？我至今没想出个办法来，只因人微言轻也。也想扯嗓疾呼，又恐弄巧成拙，物重人惊，藏之匿之，卖之贩之，则永无天日矣。

一只井栏，埋藏千载曲曲折折轶事；一段故事，内蕴古今离离合合情愫。唐井栏的前世今生，也许可写部戏出来。呵，又在痴人说梦也。

笔者为撰此文，又一次来到濂水河畔、三江合流的凤凰公园。寒塘残荷，纤竹弄影，玉兰苍郁，枯草冬青。林中一声声、一阵阵鸟儿的欢鸣，给这寂寥的公园带来了生气。石亭高立，唐井静卧。黑黑黢黢、麻麻坑坑的井栏，像一位走过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的老僧，在这里打坐禅定，在这里敛息安歇。我不忍心打扰它，因为它已承受了太多，承载得太重。

这就是全国唯一的唐刻石井栏。这就是“国宝”级的石井栏。我双手合十，为它祈愿，为它祈福！

彤管流芳

曼生宰溧阳县，从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二十九上任，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月卸任，历时五载。光阴似濂江之水，汤汤东去，时过两百年不到，曼生在溧遗迹几乎荡然无存，影踪难觅。诗书画印壶，仅见史册书籍，实物本邑未见一件，实为憾事。庚申之乱，辛亥之变，军阀之役，倭寇之害，内战之燹，“文革”之祸，毁掉的岂止是曼公之遗呢？岁月更替，天灾人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如狄学耕在曼生手札跋云：“曼生先生以书画篆刻擅名一时，成庙末年宰吾邑。家藏墨迹及手制曼壶不下数事。庚申大劫尽掳去。”

历数曼生文物，溧阳仅见“彤管流芳”碑矣。该碑发现于1999年9月溧城镇鲍渚村，青石质，宽194厘米，长56厘米，厚19厘米。正面书“彤管流芳”四个行书，落款为“钱塘陈鸿寿”；背面行书“旌表儒童汪承德之妻宋氏之坊”，款为“大清嘉庆十八年十一月谷旦陈鸿寿”。该石应为贞妇牌坊之物，坊毁石存，沦为沟渠踏步，幸为人识，告之县文管会，始避湮毁之厄！

曼生在任五年，或褒奖义行，或彰显孝节，旌表题额为数不少。如为乐善好施的保州同知宋绪题“德被桑梓”额，为出粟以赈的同知衔陈是金题“谊笃本支”额，为输粟助赈的沈淦题“万金捐济”额，为戴耀奎题“好善不倦”额，为吕武题“善周桑梓”额，为陆文瑜题“品端行优”额，为胥渚耆宿狄梅麓写“敦厚周慎”额。曼生以一技之长，为吏治的募捐赈济作旌奖表彰，文艺功夫倒也派上了用场，实乃文人明府也。只是题额或石或匾，至今化作云烟，仅在光绪续志中得见题记。

彤管流芳，取《诗经·邶风·静女》句，原为旌表妇人之德行。彤管，何尝又不是笔墨之称？曼生遗额，独此一块，冥冥中契合其书艺流芳百世也。

心仪“彤管流芳”碑久矣，一直无缘谋面。同在小城，心存遗憾。与挚友上海李维伦兄磋商，着手延请高手拓石，存档保管，以传后人。策划良久，得到溧阳文

化局领导首肯，市文管会协助，又得长乐弘陶庄徐秀棠大师、徐立先生相助，2010年5月15—16日，沪上碑拓顶级大师赵嘉福携两弟子来溧，先在凤凰公园展拓唐井栏澄观刻石，又在图书馆市文管会仓库摩拓“彤管流芳”石碑。

唐井栏为曼生器重之物，曾招钮匪石专程来溧，拓纸后编入《续金石萃编》；郭频伽、江听香、史炳等人曾在荒草残寺中发现了它，“剔藓剗苔”、“毡推榻本”后作诗以记。近两百年过去，唐井栏风化日剧，磨菇石凹凸不平，字迹模糊，细观才能辨析。井圈为圆制，拓纸很难，上海图书馆碑帖部邢跃华、张品芳两位高手，弓腰屈膝，伸宣着墨，拓帚轻叩，臂挥汗落，拓本过程十分细致，十分费力。更让人感动的是赵大师，按坐不住，兴致所至，亲自操帚，竟双膝跪地，曲身细拓。其白发飞雪，大恙初愈，其情其景，感天动人。众人劝阻，其笑曰：“面对唐代国宝，不跪不成敬意！”

井栏拓片，坑坑洼洼，麻麻点点，皱皱皱皱，模模糊糊。千年风霜雪雨之侵蚀，字迹不晰。但澄观气息还在，刻石古风犹存。拓之存之，也是一个时期的见证。

彤管流芳坊额，存简陋之库房，因博物馆待建，暂委身于此。石碑为青石，厚实敦重，难以抬翻。只能屈就几位专家弯腰费力了。上海图书馆碑帖部主任仲威先生也自始至终参与，诚表对文物对曼生的一份敬意。秀棠大师携公子徐立、弟子史小明、史学明专程赶来，到现场观摩商榷，大家相见甚欢，言谈切合，合影留念。

秀棠大师后有题记云：“曼生壶同好者上海李维伦与溧阳邓超先生，策划后于庚寅2010年5月16日，约邀海上拓表名家赵嘉福先生并弟子邢跃华、张品芳至溧阳文管会仓库，手拓清陈鸿寿彤管流芳匾额。抚拓之时，吾等在场，赏全过程，一饱眼福，敬其高超技艺，特作题记。岁次庚寅端阳，秀棠于陶庄。”

文化传承，当得益于有心人、热心人。上海李维伦与溧阳素昧平生，凭对紫砂的痴迷和对曼生的崇敬，数次力邀海上名家赴溧考察，费心耗资，乐此不疲。两天拓石经历，文人交往切磋，皆为趣事雅事，也是一段佳话。

犹记几年前，宜兴紫砂行业协会史俊棠会长，率紫砂陶瓷大师、文史专家一行十七人，拨冗来溧考察曼生遗迹。我有幸得以陪侍全程，介绍桑连理馆旧址、唐刻石井栏、汲古泉井栏、宋高静石等文物。得以结识徐秀棠、徐汉棠、汪寅仙等

诸位大师,得以与曼生紫砂文化结缘,得以有日后面聆大师、专家教诲的机会。自此习撰曼生研究文章数篇,在《宜兴紫砂》、《无锡文博》、《书法》等杂志上发表。

后来,海上名家童衍方先生携夫人在丁山壶艺壶史专家潘持平和上海李维伦的陪同下,专程来溧考察曼生遗迹。在唐井栏前,他接受电视台采访,对曼生艺事、溧阳风物予以高度评价。承他看重,特地携带曼生题“日落余霞尚满天”书画册页给我上眼,内有汪小迂画,曼生、郭麐等书法真迹,更有桑连理馆一群文人墨客的联袂杰作,珍若拱璧,满目生辉,令人惊叹!该册页画于濂上,今重归故里展读,翻抚之时,仿佛时光倒流,又回桑连理馆时代,诚如溧阳史炳诗云:“陈侯逸气青云驾”,“想见官斋琴酒会”。

海上闻人陈鹏举先生由维伦兄邀至濂上,我陪观唐井栏,陈先生后题记有三。其一曰:“存世仅见之唐刻石井栏铭,溧阳邓超著文叙之甚详,前生今世,资质形貌,俱阅之如亲炙。庚寅四月初三,海上维伦邀上图赵嘉福率弟子张品芳、邢跃华至溧阳拓此刻,见之心中撼戚戚,拳拳九十一字,若星斗横空,漫漶若上清之庆云。辛卯三月初十陈鹏举敬题。”

其二曰:“清陈曼生宰溧阳,记唐井迁徙甚详。其知交郭麐《灵芬馆诗话》,录铭全文。维伦心倾紫砂,自醉曼生,即及唐井。庚寅四月初二,倩赵嘉福先生拓石于溧阳凤凰公园。唐井规模,须臾千年。虽苔皴藓蚀,偶于他处,寒碧跼踖,犹见不朽大心也。庚寅榴月陈鹏举敬跋。起跋时,有雷声,二十二日。”(节录)

陈长跋三曰:“下笔突闻初雷之声,此为命耶。余编《北溟有鱼》册,忽闻维伦倩赵翁嘉福于溧阳拓唐井栏。井者,故乡也。李白《静夜思》冠绝唐诗,前者亦即井耳……此井栏造时亦是辛卯五月,竟和我同年月来世。又,井栏于宋时迁溧阳城东报恩寺。秦梓于岳飞去后,迁居于此。秦梓为秦桧之兄,心肠竟与岳飞同。时称此井栏为秦公井。余名取自飞字,似又一合……井栏类星斗迁徙,如须臾永年,莫以悲喜。平生垒块,如天地肝胆,岂可轻言起止。曼生姓陈,亦是我家姓氏,有缘矣。越千年文字不灭,石未烂得,文字亦如斯。庚寅五月二十二日陈鹏举书于银杏碧桃斋,时雨霁。”

原上海书画院院长江宏,也为唐井栏题“香风犹存”四字。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书篆家刘一闻先生,在拜谒了唐井石铭后,特写了长跋:“辛卯岁春,谷雨时节,予与内子士泓并鹏举道兄,应邀维伦伉俪同游宜兴溧阳两地。是地古

来淑景清丽，百民富庶。尤溧阳位处中江之南，昔以春秋名仕伍子胥渡江事，而益隆响世间。此后则更延人文之盛，相称于时矣。至有幸者，当日彼地邓超君引领往瞻，曩次第于零陵报恩两寺、今座置于凤凰公园之唐代井栏石刻胜迹。唐井之刻，距今已千百十年，其栏之铭，虽风雨剥蚀，然无碍文字灿灿异彩。此诚《灵芬馆诗话》所云：‘一念千载如须臾，意垂久远传规模’矣。吾辈真眼福也。唐代井栏洵国之瑰宝，文化剧迹，信其事者，为一代神明所寄。有道宜今宜古宜风雅，此世世永不朽歿之迹，当犹可记也。海曲刘一闻书于沪上嘉平堂东窗西案，时将端午候。”

清嘉庆溧阳志编撰者之一、咸安宫教习史炳，曾言知县陈鸿寿“宏览达识，著作之材，宾朋又一时英杰”。郭频伽也云曼生“四方知名之士，无不踵门纳交”，“及仕为令，士益争往归之，至署舍不能容，已各满其意以去”。“旧交之过从，新知之慕用，其趋若水，其来如云，莫不倾襟以接，倒篋以尽。”“昼判案牍决疑狱，夜接宾客恣清谈。万间广厦万丈裘，士林争识韩荆州。”曼生宰溧，名士纷沓，文人骤集，应为邑史上璀璨夺目之一页。一为其声名，一为其仗义。

溧阳自秦置县，城池迁徙，朝代更迭，时县时府，忽大忽小。铁打衙门，流水官员，又有几人能青史留名？曼生至今为人所重，愈久愈重，不为官名，只为艺事。史上有千百个县令，世上只有一个曼生。这也应了一个真理：当官一阵风，文化千秋重！

彤管流芳，芳泽后人。

感谢曼生。

曼生别号“胥溪渔隐”疑辨

古人字号，乃别名雅称，或由地名风物延伸而来，或由闲情逸致感慨而发，或钤于诗篇画卷，或题于行馆书斋。

大凡介绍曼生生平的文章，都云：陈鸿寿，字颂，又字子恭，号曼公、曼龚、夹谷亭长、胥溪渔隐、种榆仙客、种榆道人、西湖渔者等。“陈侯三绝画诗书，印制还追秦汉初”，作为文人雅士，曼生别号与其艺术创作相连。“文章政事足千秋，循吏儒林合两收”，作为清吏儒令，曼生别号又与其宦迹吏治相关。

在曼生众多别号中，有两个拟与溧阳地名有关，一为“胥溪渔隐”，一为“洮湖长”，其中胥溪渔隐几成定论，广为应用，似乎无可争议。笔者作为一名业余“曼迷”，在搜集整理、学习探究曼生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此号大有蹊跷，拟是伪称。直白点讲，就是曼生根本没有用过“胥溪渔隐”此号，而此号另属他人！此言非危言耸听、信口雌黄，各位看官专家且容我剥壳见笋、抽丝现茧，做一番真伪辨析。

一、关于“胥溪”

胥溪，又名胥河、伍堰河，由高淳流向溧阳。古长江到安徽芜湖，一分为二，其中一条濠江经溧阳至宜兴到太湖。春秋时期，伍子胥为伐楚运送粮草兵员，组织吴国数万民夫人工开凿疏通河道，整整用了六年时间开挖了这条全世界最早的运河。

伍子胥在溧阳留下许多传说遗迹，其中有苏皖交界的伍员山，有他由楚投吴时泊舟的胥泊、胥渚，胥溪为其地名之一。

二、关于“洮湖”

洮湖，又名长荡湖，位于溧阳、金坛之间，曾被列为古代五湖之一。据传春秋时范蠡助越灭吴后，曾携西施游过洮湖，明代溧阳知县符观写有“洮湖风急龙帆开，此地曾闻范蠡来”之诗句。长荡湖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唐代诗人张籍有《长荡湖》云：“长荡湖，一斛水中半斛鱼。大鱼如柳叶，小鱼如针锋，浊水谁能辨真龙？”

三、关于“洮湖长”

嘉庆十六年(1811)，曼生于3月29日任溧阳县宰。作为地方长官，他刻有“洮湖长”之印，并在书画中屡用。

曼生行书七言诗：“归去南湖弄小舟，石桥东畔数家秋。碧梧影里人吹笛，红藕花中月上楼。”是他在到溧阳不久的辛未初冬所写，落款就有“洮湖长”之印。而他的另一七绝行书诗轴：“扬子江头趁暮潮，瓜洲驿火照停桡。舟中仰面看北斗，枕上卧吹碧玉箫。”铃印也是白文“洮湖长”。洮湖长一印，也被古今曼生印谱所收录。

曼生挚友郭频伽在《灵芬馆诗》中写道：“吾友洮湖长，广矣太邱道。结交皆名流，一半已苍老……”可见“洮湖长”为曼生平时常用之号。

四、关于“胥溪渔隐”

曼生字号，大多见于其诗书画印题跋落款，那么他用过“胥溪渔隐”之号了吗？查遍现有的曼生诗画印集，没见他盖过此印。仅见的一例，是《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一书中，在第72页上海博物馆藏的《花果册》第八开“梅石图”上，有白文方印“胥溪渔隐”。在2007年新出版的《陈鸿寿篆刻》(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书中，收录了这方印章。

细品此印，疑窦丛生。

疑问一：时间。上海博物馆藏曼生《花果册》，共12页，其第八幅“梅石图”上，有作者题记：“拟杨补之梅花法，而以万先生一笔石佐之。万先生名个，八大山人之高弟子也。曼生并记。”落款印章为“曼生”朱文方印，图左下角有“胥溪渔

隐”阳文方章。此《花果册》画于1810年，众所周知曼生于1811年才由赣榆代知事调任溧阳知县，难道曼公在赣榆时就知道溧阳有条胥溪，并镌刻闲章了吗？这在时间、地点上都不合情理，对不上号！

疑问二：内容。曼公书画中有“西湖渔隐”、“西湖渔者”等题跋，也曾为人镌“西泠钓徒”之印，都是他对钱塘的眷念和一种散淡谦和的表述。“胥溪渔隐”则不然也！诗言志，印言趣，难道一名未上任的县令，不思为国效力、为民做主，先有归隐渔樵、放马南山之念？要知出身贫寒的曼生仕途并非青云得志，他对县宰这份差事是十分看重的！同样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曼生行书七言联“隔竹见帘疑有鹤，卷簾开画更无人”中，他用了白文“溧阳令印”，而且盖在其名章之上款。由此可见，“洮湖长”、“溧阳令”与曼公当时的地位、身份、心境相契合，而“胥溪渔隐”则格格不入！

疑问三：印风。曼生作为西泠八家的后四家，用刀如用笔，写石如写纸，方圆离合间，游刃有余地。张缪在《种榆仙馆印谱题词》中说他“铁笔有力绝虎牛，真能嘯傲凌沧州”。浙派印风，影响了中国篆刻一百多年，曼公功不可没。

曼生治印，不用冲刀，喜用切法，结体自然，乃见天趣。比较《花果册》之“胥溪渔隐”印，无论是字的结构和用刀，都与曼生有异。曼公有一“江湖渔长”印，其“渔”字上部结构交代清楚、曲刀有致，而册页上的“渔”字就显简略；下部四点也有明显差别。另有一“婕隐”章，其“隐”字下部“心”字刻法，也与册页相去甚远。由此可见，“胥溪渔隐”白印虽似“曼印”，但在刀法、过渡、交代、结体诸方面，都有不同，显得功力不足。

疑问四：钤盖。纵观曼生画作，其盖印颇为讲究，一般都是常规的右上角写题记，下落款盖印。也有左上角题记并钤印的，但一般都随题记而行。偶然在左下角盖一名章，已属鲜见，而在“梅石图”左下角盖一闲章，仅见也！

史海钩沉，云山雾罩，啰里啰嗦，说了许多。各位看官专家要问：你说“胥溪渔隐”非曼翁之号，那么怎会出现在其画册上呢？此号又是谁之号？

打开问题之锁的钥匙，就在《花果册》之“梅石图”上。各位请细赏，在“胥溪渔隐”之印下，还有一枚收藏印章：狄曼农鉴藏书画印（朱文）。也就是说，这本册页的旧主，曾是一位叫狄曼农的收藏家。

狄曼农何许人也？他与曼生之间又有何种渊源？

五、关于狄曼农

有关狄曼农的生平事迹,我们知之甚少,但即使在古迹史料的寥寥片语中,我深悟:这是一位研究曼生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人物!

中国美术教育的先驱之一、著名美术教育家、画家姜丹书,溧阳人氏,他在《姜丹书稿》中这样介绍同乡狄曼农:“狄学耕,字曼农,清同治、光绪间(十九世纪)人。善画山水,富收藏,王蒙《青弁隐居图》即为所藏。鉴赏家。”除此,我们还知道他由科举而仕,曾任江西知县,光绪二十五年《溧阳县续志》载:“狄学耕,字稼生,禀贡江西候补知县,权都昌、南丰知县,升补同知。”

狄曼农是位诗书画印俱佳的文官(这一点颇似曼生)。上海朵云轩公司曾拍卖过他的画作《蓉湖禅悦阿曼忆图》,画上为梅花仕女,人物纤弱柔美,栩栩如生,颇有吴门唐寅之风韵。此画作于同治壬申年(1872),题“小阳春后二日濼上漫农题”,朱文印为“濼上漫农”。曼生作画,多幅署名作于“濼上”、“濼阳”,此属溧阳之别称也。有趣的是,曼农的曼字,写法与曼生如出一辙,可见狄学耕是有意学曼生的样。此图中钤有多方印章:“溧阳狄氏枫香山馆(朱)”、“红巾翠袖搵英雄泪(朱)”、“狄氏种石轩印(白)”、“念我意中人(朱)”、“只可自怡悦(朱)”等。朵云轩同时拍卖的,还有狄曼农的一幅书法诗轴。

狄曼农还好篆刻,他有“石癖”之号。刻有“爱画入骨髓”、“嗜好与俗殊酸咸”、“我是识字耕田夫”等闲章,另有“平陵狄学耕”、“溧阳狄学耕”和“狄未子曼农”等名章。

那么,曼农与曼生间到底有何关系?

从年龄推断,曼农与曼生相差不远,仅为一辈之差。而狄家和曼生的渊源,由来已久。彭马史狄周,溧阳五大望族,狄家的声望与家学尤为突出。

上海博物馆藏有曼生庚午纪年画册,应作于赣榆任上。其上有一开后人题跋:“睿庙末年,先生作宰吾邑,篆刻书画,冠绝一时。吾邑与宜兴接壤,先生公余之暇,取蜀山陶泥,制为茗壶,加刻八分,吴门传为雅玩,予祖及父皆承先生赠楹帖并茗壶。兵燹后,茗壶日少,几等球璧。余于流离播迁中,篋中尚存茗壶一事,好事者攘夺之而未能也。乙酉冬初,画估携此册至予处索重值,予以先生之画不可多得,急收之,以为世宝。暇时辄取所藏曼生壶及隶书楹帖与此册摩学观玩,

籍以乐余年云耳。”落款为“丙戌灯节后十日，溧阳狄学耕曼农甫志于双江湖之种石轩”。

这是一段十分有研究价值的跋文，它告诉了我们许多重要的信息：一、曼生制壶“取蜀山之泥，制为茗壶”，证明制壶是在溧阳，“桑连理馆”在溧阳，“阿曼陀室”也在溧阳！二、曼农的祖父和父亲与曼生有文人之交，曼生曾送隶书楹联和砂壶给狄家，曼农一直珍藏着，即使在外做官迁徙，也未散失。三、曼农不惜重金收购了曼生的庚午纪年册，连同其他的曼生文物一起珍藏，作余年之乐。

在《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一书的第164页，有一篇《陈鸿寿及其紫砂壶艺相关问题研究》的文章，为我们抄录了狄曼农在庚午纪年册上的题跋。作者在评论这篇题跋时，有“姑妄听之”、“这些说法不一定完全可靠”等说。笔者认为，在研究曼生的资料较为匮乏的前提下，狄学耕的题跋，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笔者有幸，在狄曼农的又一画跋中，发现了曼生与狄家交好的新线索。

明末清初著名画家萧云从(1596—1673)，字尺木，号默恩。他在顺治十一年(1654)元旦那日开始，花了二十七天时间画了一幅一丈多的山水长卷，送给溧阳名士彭旦兮，被后人称为“神品”。狄曼农在此卷上题跋：“此卷系先伯父进斋公收藏旧物。进斋公善楷法，能鉴别古今碑帖书画，所藏最富。陈曼生、江听香诸君时相过从参考，一时有米颠、顾痴之目。归道山后，收藏多散佚，子渔二兄以余有画癖，出此卷畀予以云：萧真迹世不多见，重以先泽留遗，爰同球璧。庚申大劫中竟随身携出，幸逸灰烬，岂非鬼神呵护，使名物存于世耶！闲窗敬展，如睹杯棬。同治庚午长至日狄学耕曼农志于都村官廨之见山草堂。”白文方印“狄学耕印”，朱文“曼农”，朱文“晚晴堂”。

从此跋文中我们可了解到，曼生与狄家关系非同一般，由于狄家收藏颇丰，而曼农伯父进斋公又是鉴赏家，所以作为文人县令的陈曼生常带幕僚前去观字画赏收藏。狄家世居的胥渚、胥泊村就在城郊，离曼生官廨仅几里之遥，过往从密，礼尚往来，都属雅事。

狄曼农在此画卷上后来再次题了跋：“按彭旦兮，名旭，明末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家有夏林园，园中古木为江左名园之冠。主人亦好事，喜招至名流，丰采照耀，一时无不知夏林园古木者。园地在吾溧邑南门外偏东三里许，予幼时已荒烟蔓草，兵燹后更不堪复问矣。晴窗展卷恍然，为志数语于后。光绪纪元长至

后六日曼农甫。”白文“学耕”印，“狄未子曼农”朱白印。

这段光绪后跋由画思园，由园思人，语气与曼生庚午纪年册画跋相似。这两段画跋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研究曼生生平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

说了这么多狄曼农，有的看官专家又要责问：狄氏收藏的曼生之物今何在？你说的萧云从的画跋从何而来？在此，我们不得不引出另一个重要人物——狄平子！

六、关于“狄平子”

曾有文章言狄曼农和狄平子是同一个人，非也，实乃父子！

狄平子(1872—1940)，名葆贤，字楚青，号平子。同治十一年(1872)生于江西，原籍溧阳城郊胥渚村，其父狄学耕。他是清末民初的海上闻人，曾于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时年22岁，但他无心科举功名，力图维新救国。

狄平子曾参加“百日维新”，后避祸日本，继续和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兴中会”联系，寻找救国途径，奔波南洋、日本、上海等地，募集军资，发动反清起义。光绪二十五年，他与唐才常回上海创立“正气会”，策划起义，为此他卖掉了家中世藏，作为活动经费。后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杀，狄平子幸得逃脱。

起义失败后，狄平子回到上海，投身于新闻出版事业，先后创办了有正书局和《时报》。《时报》成为上海唯一一份华人报纸，与《申报》、《新闻报》等洋人办报三足鼎立。狄平子的有正书局，是我国珂罗版印刷的创始者，影印碑帖书画，像《三希堂法帖》、古戚序本《红楼梦》等，其中还出版印刷了中国历代经典书画作品集，为后人保存了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

萧云从山水长卷影印本，就出自有正书局的出版物《萧尺木山水神品》中，其中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画集保存下了的长跋和他的书画作品，还有狄曼农的许多书法题跋，虽是影印之物，却成了后人十分宝贵的艺术文史研究资料。有正书局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版有《陈曼生花卉册页》珂罗版，虽是黑白影印，但可能是曼生画册的最早印刷品了。狄家祖孙三代和曼生缘分不浅！

狄平子多才多艺，擅诗书画，富收藏，精鉴赏，这一点狄家几代人一脉相承。据说，他的度藏后多为上海博物馆所得，不知包括那些曼生书画珍品否？

七、关于“胥溪渔隐”之结论

东拉西扯,说古道今,话归正题。胥溪渔隐之号不属曼生,那为何人?

在曼生《花果》册之“梅石图”上,有“胥溪渔隐”闲章,下有狄曼农的鉴藏印,笔者窃窃揣测,“胥溪渔隐”之号,应为狄曼农之属!

此言一出,肯定有看官专家棒喝!做学问要讲真凭实据,哪容你瞎猜测也!

噫嘻!天助我也!笔者又获一狄学耕之诗作书法册页资料,且容我将其抄录两段与各位大人同赏:

诗一:

胥溪东去接洮湖,云水微茫入画图。
已辨生涯归舴艋,久拼姓氏托菰芦。
投金濂古丛祠废,洗砚池荒旧宅芜,
是处沧浪堪濯足,故乡风景已模糊。

诗二:

张帆容易卸帆难,久涉江湖心胆寒,
三径已拼荒茂草,百年易尽走弹丸。
朱轮华毂情厚淡,画卷诗篇兴未闲。
从此扁舟堪散发,春来准备钓鱼竿。

在诗二前有一题目:冬仲三日引疾得允再题二律。而压题赫然有一朱文方印——“胥溪渔隐”!

行文至此,笔者不想赘言,“胥溪渔隐”之谜豁然开朗,结论自然大白也。

八、余言

说实话,对于曼生“胥溪渔隐”别号之辨证,笔者是矛盾的。作为一代名士县令,以其作宰的地名为号,这不是一个溧阳人、一个“曼迷”引以为豪的事吗?何必要费尽心力去论证否定它呢?但学习与研究文史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就是

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里面掺杂不得个人的喜好与感情。

一个别号,引出一番探索,引出一段佳话,也引出诸多前辈大儒先贤,为此,我满足了。想说明一点,因才疏学浅,加之占有资料有限,我的论点可能是大谬!因此由衷地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指点迷津。如能提供相关的论点论据,拨乱反正,则是一个业余“曼迷”之大幸也!

我期待着。

曼生与溧阳名石

陈曼生曾言：“余性好游览，每逢名胜之区，登山跻岭，摩挲古碑，考据金石文字，乐而忘返者垂十余年。今一官匏系，无复曩时豪兴矣。”（“一醉一陶然”印跋）

作为一位对金石有“嗜痂之癖”的印人，作为一位刻石如走纸的篆家，作为一位好游览重考据的学者，作为一位知千年古邑的县令，陈曼生自然不会对溧阳的名石熟视无睹。

在嘉庆溧阳县志的“县署图”上，二堂东侧有“拜石轩”建筑，北有“听雨亭”，西北有“桑连理馆”，仪门后有“戒石亭”。戒石亭位于堂前甬道正中，嘉庆十六年，曼生刚上任，就重书了题额并刻石立碑，内容应为勤政为民、戒贪戒恶之类。在县署里设“桑连理馆”作书斋，那么“拜石轩”到底拜的是什么宝贝石头？

嘉庆十七年（1812）十二月，曼生文友乐钧自金陵途经溧阳，过访桑连理馆，在曼生画《濼上石民图册》上题诗。

为陈曼生大令题濼上石民图册并序

我来拜石山房住，一石端严对庭树。
石缘有德石不孤，此外云根出无数。
城东废圃屯苍云，上刻光尧双篆文。
先时幸脱未動手，不与艮岳埋烟氛。
尚闻郊坛有卧石，赵相园林此遗迹。
双桥忠义名最高，十丈嵯峨照晴碧。
其余五石立奇古，半出荆榛半尘土。
移从射圃置讲堂，石不能言应色舞。
或为九石庆遭逢，各还面目开心胸。

同人使君图画里，墨花更比苔花浓。
米老研山犹不朽，清风况比郁林守。
品题留与万人看，五岳真形复何有。
受民如石民不欺，以石为民君不私。
或作濼上石民诗，他年九石为穹碑。

乐钧(1766—1814)，字元叔，号莲裳，江西临川人，嘉庆六年举人，曾游曾燠等人幕府，估计此时与曼生相识，著有《青芒山馆集》。他诗中提到的“拜石山房”里的一石，应是“独立不惧石”。县志记载：“在县署，嘉靖乙丑教谕林春斋题铭。旁有拜石轩，嘉庆己已知县李景峰题。”

乐钧在诗序中有注：“图列九石：一忠义石，在溧阳郭北双桥；二郊坛卧石，在城外；三苍云，在平陵书院后圃，篆刻‘苍云’二字，传为宋高宗笔；四‘独立不惧’四字行书，无名款，类明人书，在县斋拜石山房之前；五玉玲珑；六松文人；七小研山；八廉石；九芝云。凡九石自忠义石外，非花石纲之所遗，即宋丞相赵葵园林中物也。后五石新自都阆射圃移至平陵书院友石斋前。”

由此可见，曼生《濼上石民图册》上画了溧阳九块名石，关于这九块名石的来龙去脉，值得我们探究一番。

宋丞相赵葵，在溧阳城南有别墅叫“晚香堂”，由宋理宗亲笔题写。他的侄子赵淮，在县城北面有宅，时称赵氏南北二府。溧阳教谕仇远曾赞赵家“一门一品而今有，三世三忠自古无”。袁正在《城南赵府遗址歌》中写道：“君不闻，宋未亡，相公赐第耕溧阳。又不见，宋已危，运使力竭难扶持。”前一句写赵葵，后一句写赵淮，叔侄两人都是宋朝的名臣。宋理宗时，赵葵官至枢密使，拜相刚一年就上表退居溧阳，以度晚年。侄子赵淮，官至淮东转运使，以忠义著名。

赵府三石，一是“苍云”，原在赵葵府中，明弘治年间，知县符观把石迁移到都察院行馆，即后来的平陵书院。石上有篆字“苍云”二字，相传是宋高宗所书，理宗时赐给丞相赵葵。二是“高静”，相传也是宋高宗题字，与苍云石一起赐给赵葵。明知县符观移置在凤凰桥堍，后来有传言说该石运往北方，船行遇风，沉没在扬子江上。三是“忠义”，原在北坛，是赵淮府中的旧物，按乐钧之言，该石为宋朝花石纲之遗。明成化年间，知县熊达移放在都察院行馆，即原来的金渊书

院。后来，凤凰桥堍的高静石丢失，明万历年间，知县李光祖就将此石移至填补。

赵府三石，弥足珍贵。溧阳彭光斗《苍云石歌》言：“间代君臣同一癖，不宝金瓯宝顽石。”宋高宗、宋理宗赐的名石，“千夫辇运来轩墀”，来之不易。时过境迁，宝石遭弃，宋皇所赐名物，埋没于荒草废址之中。“同时拜赐有三石，高静沉沦忠义颓。只余此石岿然在，转徙由入翳草莱。”曼生将三石画于图册并妥善安置，是功德之事。“诚将此意呼石语，石亦点头知有主。”

《濼上石民册》中的“玉玲珑”石，高七尺多，有大小洞穴几十个，中空相通，曲折深透可爱，石上有旧刻三个篆体字。“松丈人”高与“玉玲珑”相等，该石修长，表面好像老树披甲，形如枯松。“小研山”石高五尺多，也有洞穴。这三块石应为太湖石，形状漏瘦透皱。嘉庆十七年，陈曼生将这三块石头放置平陵书院的西斋，并在西斋门额上题写“友石”二字。三石原弃城南，不知何时冷落荒郊，曼生将两无名石题“松丈人”、“小研山”，像寻找到了三个失散多年的石友，在书声琅琅的小院落里终于有了栖身之地。

“郊坛卧石”在南坛，形状不详。第八石“廉石”和第九石“芝云”，未见志录。《濼上石民册》未见传世，我们只有凭想象去揣摩欣赏了。

关于赵府三石，忠义石原为赵淮北府旧物，明成化年间，知县熊达移放都察院行馆，即原来的金渊书院。乾隆《溧阳县志》有记：“金渊书院之忠义石，苍秀奇特，凛凛有生气，海枯山移，忠义终不磨灭也！或云高静已为人载去，遇风沉于扬子江。万历二十六年知县李光祖移忠义石于桥畔，今尚存。”

金渊书院即平陵书院前身，乃今实验小学旧址。据实验小学老教师回忆，在修小学围墙之时，将一块大太湖石敲碎做了墙脚石。当年谁也不去管它是什么宋代名石，只是将封建遗孽派上了正当用场，总算是废物利用。可怜一代名石填了墙路，永无出头之日矣！由此推断，此石应是“苍云”。

关于“高静石”，明知县符观有《高静石铭》：“晚香有堂，崇斯怪石。维高维静，宠锡奎画。兴替靡常，偃然荆棘。维时徙立，休光犹昔。”志记高静石沉于扬子江，但现溧阳城中“高静园”内有高静石一块，为太湖石质，高 2.5 米，宽 5.3 米，细观上有刻字“高静石”，“宋理宗”等字样。此石原放在现老灯光球场旧址的宝塔湾烈士陵园前，后移至今园内，园因石而名。只是不知这石上刻字内容真实与否？

曼生《濼上石民册》上的九石，现仅存“高静”一石子立，其余八石，不见踪影。“我为九石庆遭逢，各还面目开心胸。同人使君图画里，墨花更比苔花浓。”溧阳九块名石能遇曼生，亦是机缘，“石缘有德石不孤”，移置讲堂，画入图中，品题观赏，其痴迷石头之癖，似乎不输米癫。

在后来的《桑连理馆主客图》中，曼生与文友“而以其地之奇石有名称者凡九，并图其上”，可见对溧阳九块名石之喜爱和倚重。

曼生爱石，将石视作邑民。“受民如石民不欺，以石为民君不私。”这才是他为官一邑、造福一方的功德，也是文人县宰的真情的写照。

“陶宝图中出新意”

——屠倬笔下的曼生壶

春雨敲窗，灯下枯坐，书案上的石瓢壶里溢出茶香。聆听古琴，翻阅古籍，心溢古意，展卷已忘尘世。百年前的曼生藏在字里行间，让人苦苦搜寻，让人孜孜思量，总想能一睹真容，对晤三言两语，解开历史谜团。

曼生壶的定义是什么？它有标准器吗？曼生到底在哪里制壶？他亲自参与吗？“阿曼陀室”是什么？在哪里？曼生壶选泥在何处？

一系列的问题，惹人迷思，费人猜度，这也许正是曼生和曼生壶艺术魅力的神秘。

随着《桑连理馆诗文集》的失传，曼生留给了我们太多的谜。时空虽然仅隔一百多年，但我们还是感到茫然。只有另辟蹊径，从其亲友的诗文中搜索，力图求证一二。

屠倬(1781—1828)，字孟昭，号琴坞，晚号潜园，浙江钱塘人，和曼生是同乡密友。他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江苏仪征知县，官至九江知府。屠倬“夙智早成，质行独绝”，工诗文，长书法，能绘画，篆刻专宗曼生，虽险劲不及，但苍浑过之，见重于时。

在清《续修四库全书》辑中，有屠倬的《是程堂诗集》。集中多有和曼生、郭麐、查揆的诗文唱和，其中《横塘夜泊送陈曼生同年》、《种榆仙馆图为陈曼生同年作》等诗，可见他与曼生诗酬唱和，交情匪浅。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是程堂诗集》封面篆字由曼生题写，落款为“嘉庆十九年秋八月”，应在溧阳任上，郭麐、查揆两人分别为集子写了序。

在《是程堂诗集》卷十四出现了《洮湖晚望》、《溧阳访陈曼生同年却赠》、《连理桑歌为曼生作》等几首和溧阳有关的诗。屠倬为何而来？因公差而来。在《洮

湖晚望》一首的“洮湖取道由金沙”注释中，写有“时奉节相檄，委查阅南北八营军装库贮”。屠绰何时而来？应是在他仪征知县任上，在《溧阳访陈曼生同年却赠》的“邻封那限江南北”一句中，有“溧阳、仪征苏宁两藩司分隶”之注，大概应在嘉庆十九年八月，曼生题诗集篆字之时。

在《是程堂二集》卷一之十三页，赫然发现令人为之一振的长诗，现辑录如下：

陈曼生同年赠新制陶壶数事，各系以铭，刻画精好，携置行篋中，终日淪茗相对，赋诗却谢。

篷窗啜茗终日坐，自出风炉煎活火。
偏提手自斟酌之，重自陈侯昔贻我。
知君胸有太古春，土坯转出栗玉温。
规模自足撰壶史，肯访龚春时大彬。
沉沉闪色兼栗色，贯耳提梁具精式。
东坡石铍故自佳，我却少愁宜汲直。
其余古样皆朴致，陶宝图中出新意。
选泥合是赵庄山，秘传尚说金沙寺。
雕镂五字铭故姬，读君款识尤瓌奇。
陈三呆子仿钟帖，何似先生沙画锥。
锦绋包里光螯眼，手注春芽不须拣。
桃花水试历下泉，压到碧瓷官字碇。

读此长诗，欣喜不已。可以这样说，这是我目前见到的曼生密友对曼生壶描写最精到全面的一首诗，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信息：

一、壶铭：曼生赠屠绰“新制陶壶数事，各系以铭，刻画精好。”这说明曼生壶上大多刻铭，“重自陈侯昔贻我”、“雕镂五字铭故姬，读君款识尤瓌奇”。“陈三呆子仿钟帖，何似先生沙画锥”。这里的陈三呆子，作者注道：“明陈用卿制陶壶，款仿钟太傅帖，人呼陈三呆子。”而在《阳羨茗壶系》和《阳羨名陶录》中，都有同样的记录：“陈用卿，与时（大彬）同工而年技俱……俗名陈三呆子……款仿钟太傅

帖之意。”这说明曼生的壶铭款识，与陈用卿仿的钟帖仿佛，在传承上有创新。同时也言明曼生亲自刻铭钤款，参与到砂壶的制作之中。

二、壶式：对曼生壶之款式，历来众说纷纭，“十八式”、“二十式”、“三十八式”，莫衷一是，暂无定论。屠诗中难能可贵地为我们介绍“东坡石铍故自佳，我却少憨宜汲直（注：石铍、汲直皆君所赠壶名）”。由此确定，石铍、汲直皆是曼生壶式。“贯耳提梁具精式”、“偏提手自斟酌之”，这两句与石铍、汲直壶式也前后一致，呼应吻合。

三、创作：曼生制壶，非凭空臆想，非闭门造车，而是通古融今，传承有序。“秘传尚说金沙寺”、“肯访龚春时大彬”、“其余古样皆朴致，陶宝图中出新意”。这几句说明曼生对紫砂壶制作的历史沿袭、名手特点、古传款式等，有过精心的研究。明朝周高起的《阳羨茗壶系》和清乾隆年间吴騫的《阳羨名陶录》，对砂壶的创始、名家、款识都有记载，曼生及其创作班子肯定对此专著有所研究。或许当时尚有“陶宝图”，曼生在汲取前人创作的基础上，注入自己的艺术构思，独创新款，自出新意，把紫砂壶的创制推上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这一切的基础，源自“知君胸有太古春”，故屠倬预言“规模自足撰壶史”，艺术造诣的积淀，终使曼生壶名垂壶史。

四、选泥：曼生壶选用的泥料，一直未有定论。屠诗中的“选泥合是赵庄山”，应是确切道明泥料产地的宝贵资料。周高起在《阳羨茗壶系》中记述：“嫩泥出赵庄山”，“石黄泥出赵庄山，即未触风日之石骨也，陶之乃变朱砂色。”吴騫的《阳羨名陶录》也有同样的记载。这证实赵庄山确是明清时期砂泥的主产地。

在上海博物馆藏的“曼生庚午纪念册”上，溧阳狄曼农在跋中有记：“吾邑与宜兴接壤，先生公余之暇，取蜀山陶泥，制为茗壶，加刻八分，吴门传为雅玩。”曼壶泥取蜀山，与屠诗所述一致。蜀山、赵庄，一脉相延，同属丁蜀。曼生在考察了泥矿后，选赵庄山料，运至溧阳制壶，基本可成定论。

五、烧制：曼壶的烧制窑址，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谜。是在溧阳当地烧，还是用船把壶坯运至丁蜀烧？未见有史料诗文详述，所谓的“阿曼陀室”也未见有详细的记载，这有待今后文献史料和实物考证的发现。笔者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探寻。溧阳的窑史十分悠久，商周、春秋即有陶器，往远推，社渚的神墩遗址为六千至七千年的马家浜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陶罐陶皿。溧阳烧壶的外部条件应

没问题。只是在没有找到确切的曼生壶烧制窑址之前,我们不能妄加定论。

屠诗中的“土坯转出栗玉温”,形象地为我们描述了制壶的过程,而按下的“沉沉闪色兼栗色,贯耳提梁具精式”,分明已是烧制完成的砂壶了。从土坯到成壶,屠倬目睹了整个制作过程。我们不妨做个大胆推测:转做土坯和烧制成型,曼生壶的制作全在溧阳!

六、包装:以前的曼生壶研究,从没有人论及包装。而屠诗的“锦绉包裹光螯眼”,却确实让人眼前一亮!曼壶在馈赠时,都用锦缎厚绸包裹着,闪光耀眼。溧阳历来为“丝府茶乡”,新昌产的丝绸名闻遐迩,制成包裹砂壶的外包装,一来防碎,二来易携,三来美观,真乃相得益彰!也只有曼生这样的文人想得出来。

对于曼生和曼生壶,其实我们知道得并不多。

凭空猜测和武断定论,都不是学术研究的正常途径。真相,往往存在于坚持不懈的探索当中,这就需要有耐心,有静气,有毅力。

篷窗啜茗,炉煎活火,桃花水沸,春芽沁脾。手提“汲直”,斟之酌之,怀思陈侯,赋诗却谢——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屠倬,为我们留下了珍贵史料的诗人!这首长诗的描述,应成为我们研究曼生壶的重要佐证!

《南画大成》中的陈曼生

上海博物馆刘一闻先生在《陈鸿寿的书画创作》一文中言：“清代众多书画家中，能够集书法、绘画、篆刻及壶艺于一手的，唯推钱塘陈鸿寿。”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林业强言：“（曼生）书法行、草、篆、隶四体皆精，隶书结体奇崛，笔法劲爽。他的绘画多作没骨花卉，笔墨酣畅、生趣盎然。陈氏篆刻则远宗秦汉，近师浙派西泠八家之首丁敬、黄易等，切刀跌宕自然，浑厚峻拔。”

曼生书画，结集不多。民国时狄平子的有正书局曾影印过他的《花卉册》，乃溧阳狄曼农之旧藏。后上海书画出版社于2000年又重印过其《花卉册》。200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出版了《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一书，瑰集了三家馆藏的曼生书画精品。其中书法有隶书联4副，行书联8副，行书轴9幅，扇页4帧，跋文1篇，手札2函。绘画有挂轴3幅，菊壶图页1幅，花果册1册，花卉册2册。2010年5月，由唐云纪念馆出品、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曼生遗韵——陈鸿寿砂壶、书画、篆刻艺术》付印，内有西泠印社、唐云纪念馆藏的部分曼生书画壶印。

1997年，日本林田芳园编辑的《陈鸿寿的书法》，由二玄社出版问世；另有小林斗盒编辑、二玄社付印的《陈豫钟、陈鸿寿篆刻》出版，这两本书辑曼生书法篆刻较细较全。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笔者从一书家手中接过厚高等身的大部头书画大集——《南画大成》，共四大盒，一盒三大本。该书和《墨迹大成》一样，由日本株式会社兴文社于20世纪30年代用珂罗版印行，该书煌煌二十二卷，搜罗上至唐末、下迄民国的绘画作品六千三百余件。“南画”一词出自董其昌，开山始祖为唐代王维，是以文人精神为内涵，以淡彩、水墨为特长的画派。

在《南画大成》第二卷“兰竹菊”一辑里，第170页，有陈鸿寿画的《兰竹石》

图，长线条勾勒出山石突兀，坡生幽兰，叶茂苞绽，似有馨香扑鼻沁脾。一杆细竹摇曳迎风，阔叶生姿，舞出画面。此图构画奇妙，文气盎然，看似逸笔草草，实则风骨毕显。落款为“家素翁法为保之大兄属曼生弟鸿寿”。第二卷 303 页，有陈鸿寿和余锷合作的《梅竹》图扇面，梅开朵朵，枝干横亘；竹杂梅间，叶张茎舒。有“西斋仁兄嘱，曼生写竹，慈柏补梅”题跋，曼生的竹浓淡得当，茎叶似刀，十分刚劲，落笔不多，却在扇页上栩栩生辉。

在第八卷“山水扇面”辑第 1229 页，有陈鸿寿山水扇面一幅，巨岩苍苔，有石桥相连，画面上山峰如笋，列数排阵，画面中有两峰并耸，山顶平坦。奇峰怪石，如柱如笏，远近高低，浓淡勾勒。题跋云：“曩过贵池，曾有此境石敕，殆由斧凿而成坠柱，则天工非人力也。为晓湖甥拟之。曼生。”刘一闻先生曾言：“陈鸿寿山水画创作一向不多。他的山水画大多是笔墨稀疏着墨无多的水墨一路。”此幅山水扇面，确是不多见的佳作。

在第十五卷“长卷一”辑中，第 2176 页有曼生《墨兰图卷》：坡生兰草，石隙花开，老树虬劲，苍苔点缀，长叶妙蔓，蕊吐幽香。密处浓重，疏处飘逸，笔墨无多，空谷无声。长卷题跋：“嘉庆七年壬戌十月十又四日，北归次邗上，重访文光先生七峰草堂，翌日索作此幅，以意为之，不值大噱也，钱唐陈鸿寿并记。”后有陈莽庆跋曰：“此吾家曼生遗墨也。曼生与予同岁生，少同笔研。予成进士，奉职词馆，曼生亦以拔萃科，应廷试，同寓都上，相得益欢甚。旋试令粤东，遂别去。卷末自记为壬戌十月作，正其南下时也。曼生于艺事无所不能，予尝许为‘铁笔第一’，字次之，诗画能又次之。于画无所师承，纵笔所之，语姿态横出，由生胸次，高旷天秉，绝人遂张，超脱畦逸。兹曼生归道山已十稔矣，此卷流传友石鱼兆同年处，出以示予，风雨之怀，不能自己，辄为题识，数语，搁笔惘然。道光丙申六月，坛苍陈莽庆书于山鸥为客之斋。”再有光绪十五年九月李嘉宾题跋：“今睹农山世文所藏先生跋陈曼生墨兰，临风披卷，于邑久之。曼生画品，备见跋语，不再费赞。”（略）

陈莽庆跋颇有嚼头，两人从小同岁同砚，一同应试，先后考上，而看到曼生长卷，已是其去世后十多年的道光丙申（1836 年）了，他忍不住在题跋时数次流泪，不能自己。他认为曼生篆刻第一，书法次之，诗画又次之，而其画姿态横出，由此见，胸次，高旷天赋，超脱绝人。这对“艺事无所不能”的曼生，也是一句中肯的评价。

在《南画大成》第二十卷“题跋卷目录”一辑中，第125页，有《恽寿平拟古册》题跋，一为王翬，一为杨晋，一为陈鸿寿。曼生题跋为一首五言诗：“不可居无竹，萧然对此君。苏文亦贗作，得此扫千军。曼生病后。”书法老辣随性，但笔力稍弱，大概是晚年病后体力不支之故。对恽寿平，曼生极推崇，其花卉蔬果之没骨技法及设色，均得其神韵，故其有“得此扫千军”之赞。

《南画大成》二十卷第222页，有王学浩《溧水聊吟图卷》，曼生用八分书题图，落款“郑乡二兄属题 弟陈鸿寿”。该隶书一如曼生之独特风格，简古超逸，柔中见刚，圆中见方，文雅从容。关于此画题跋，曼生族兄陈文述有长诗题上，在后记中云：“郑乡二兄以画卷自南中寄来索题，是夕寒甚，小饮薄醉，因剪烛对雪书之。塞北江南，相思万里，增几许怅触矣。甲秋子嘉平初九夜，云伯陈文述书于都门太平湖上百一山房寓斋。”跋中郑乡二兄应为顾廷纶，他亦有长诗题图。另外，在图上题诗的有阮元、朱为弼、铁保、金蓉镜、潘飞声等人。而其中几位都为当时鸿儒大学，图由曼生题字，足见对其书法的倚重认可。

《南画大成》成书于1935年，重印于2004年，正如编者所言：“珂罗版印刷品，尤其是《南画大成》、《墨迹大成》这样较早出现的书画总集，在中国传统艺术的收藏、鉴赏和研究方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研究陈曼生的学者来说，曼生的书画较为散佚，有的束之高阁，难得一见；有的藏之深宅，偶露真容，缺乏一本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全集。日本学者在这方面是走在前面有功劳的，使我们能从浩如烟海的书画传世之作中，找到曼生的艺术遗存。笔者孤陋，窃以为喜，可能贻笑大方矣。

赘言一句，喜欢曼生，诗书画印，皆要研讨。时下以壶为重，则因曼生壶珍若拱璧也。人为艺魂，艺为壶魂，但愿更多的人喜欢曼生的艺术，而不仅仅是砂壶！

西泠林老话曼生

戊子冬日，我接林乾良先生寄自西子湖畔的明信片：“曼公于政文、艺事皆有大作为。壶、印、书、画尤属千秋文物也。”其笔迹苍劲而抖擞，遥想一位望八老人，握一管不听使唤之笔，一划一颤，一丝不苟，心头顿生敬意。

与林老相识，一切皆因曼生。由杭州书画家宋一洲先生介绍，我两度走进老浙大横路那条狭弄，叩开旧居陋室那扇木门，向林先生请教关于曼生的点点滴滴。林老的博学、虚怀、富藏、热忱，让人感动不已。

林乾良先生号印迷，生于福州，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中医学者。弱冠负笈杭州，与印结下不解之缘，治印七十余年不懈，曾拜陆维钊、沙孟海、韩登安、吴弗之等名家为师，书、画、印均有较高造诣，时人称“西泠五老”之一。他潜心研究印学，著作颇丰，有《印迷丛书》、《中国印》、《中国第一名社西泠印社》、《西泠八家研究》等数十种。林老富收藏，藏印之丰，不但列浙江私家之首，全国也属一流。有人问他共有多少印，他笑答“五个齐白石”。齐氏自称“三百石印富翁”，林氏当为千百余方也。他还任西湖、龙渊及美国三印社名誉社长，在美国、加拿大办展办学，桃李满天下。

对一个无名小辈的来访，林先生竟做了案头准备，厚厚的一摞关于曼生的资料，让人眼睛一亮。其中一本泛黄的《陈曼生书札》，正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旧物，由溧阳狄平子编印的珂罗版，跋为其父狄曼农所撰，书札为狄家世藏。此册我曾在研究曼生的文章中提及，今睹实物，心潮难平。谈及曼生，林老目露仰慕。他说：“西泠八家，丁敬为最早，曼生为最好，当排八家第一！”我闻之一震。林老话锋一转：“此话是西泠印社原总干事长韩登安先生说的。登安师对曼生最为倾倒，认为八家中彼最‘放’，风格最强烈，也最为浙派印之典型。当年陈秋堂即叹曰‘一种英迈之气，余所不及’。”韩登安的三个“最”与陈豫钟的一

声叹，也许正是对曼生艺术地位的一种肯定。

林乾良藏有曼生刻“诗狂石作笺”和“叶以照印”章两方。

“诗”印石极旧极佳，包浆莹然，纹理细腻，印面为“诗狂石作笺”，以汉朱文出之，端正之中兼有流动，气韵非凡。转折交会之处，笔画交代之端，每作浑厚处理。“其鹤膝燕尾之态，不难察和，浙派印之佳作也。”边款三行，一为隶书释篆，二、三行草书：“丙子初春月望日，作于种榆仙馆中，陈鸿寿。”曼生诗文书画，皆以资胜，才思过人的他“为诗不事苦吟，自然朗畅”。郭频伽曾说：“曼生才艺可了十人，诗宗太白、长吉，洒然而来，不屑于字句，而标致自高。”可见他的“狂”是有底蕴的放，不是轻浮的故作姿态。曼公有《种榆仙馆诗钞》和《桑连理馆诗集》若干卷，后者惜未行世。曼生艺事，总以英迈豪放为归，其甚者，难免流于狂野。此印自称“诗狂”，以“石作笺”，真正气势非凡之豪言也。

与林老对晤，我言及心声。曼生对溧阳是有功的，宰邑两任，兴书院、修县志、建育婴堂，大旱之年“赈灾活人无算”……我们怎能忘了他呢？惜其《桑连理馆诗集》失传，我们无从考证他在溧阳工作生活六年的细节，但我从其书画作品中也能读到他“诗狂”的形骸：“酣热无俚，与小迂、春萝纳凉桑连理馆，对谈兴发，急呼童取纸，信笔画数幅，殆知风雨骤至，相赏狂叫，旁若无人……”这不正是一幅“诗狂石作笺”的画图吗？图中人物呼之欲出，狂态癫状历历在目。濂上六年，应是曼生最“狂”的六年，最快乐的六年，也是他艺术达到巅峰的六年！

“叶以照印”为青田旧石章，纯出浙派白文，神旺韵流，自是佳构。边款两行：“戊午二日，曼生为东白先生作。”锋芒外露，肌骨内充，气势纵横，以拙朴胜。曼生认为：“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时见天趣。”林老说：“此言和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有异曲同工之妙。若从艺事，俗固不可，太熟亦不佳，需带几分生方妙，此为曼公揭示之真谛。”此印刻于戊午，即1798年，嘉庆三年，曼生是年31岁。

林老又言：“曼生不仅长于治印，还精刻竹。”我想起《竹刻脞语》中的一段记载：“余曾见许小岩观察有一烟筒，以竹为之，半刻梅花，乃陈曼生所画。其下半刻铭款云：‘曼生自铭并刻’。”

言及曼生壶，林老兴趣盎然：“西泠八家中只有曼生涉及了另一门艺事——砂壶，这也是他一生的佳话！曼生的多才多艺在砂壶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陈

氏宰溧阳时，制作紫砂壶甚现古趣，当时即见重于世。西泠印社前辈唐云，曾藏数把曼生壶，秘不示人，我获观其二把。后我搜求三十年，至今不得其一，可见是稀罕之物！”

关于西子湖边唐云纪念馆里的“八壶”，许多人慕名而来，却又不得与“八壶”一晤，甚至一壶不见。林老说：“八壶成了国宝，入了库房，难得一见了！馆址太小和安全保卫都是原因。曾有一位日本著名印人来访，说如果八壶要在东瀛，那得专盖一个大大的陈列馆供瞻。可见曼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说到曼壶在国际上的地位，林老又讲起另一件趣事。在加拿大省亲，林老走进一家华人的古玩店。店老板是位老华侨，问客从何来？答大陆杭州。店主问你们杭州有个陈曼生知道否？林答知道呀，会刻印、书画。店主说你知道他还会什么吗？林答：做壶。那老板的眼里顿时放出光亮来，说自己藏有曼生壶。林老提出一睹，老板言不在店里，珍藏在家，要看可明日上家里看。林老脸露难色，因为不住多伦多市，女儿家距此有4个小时车程。走出店门，陪同的学生见老师有憾意，问：您想看吗？林老说：想！翌日师生两人又驱车赴约，果见老华侨家的曼壶，惜已碎成三片，用白泥黏合而成，圆形，林老怕有闪失，也未上手细察，也未留影。“等我下次省亲，一定去仔细辨认观察”，林老肯定地说。

“溧阳是块宝地。两位为官的浙江人到了那里，一个德清的孟郊留下千古绝唱《游子吟》，一个钱塘的曼生传下千古珍品紫砂壶，这都是缘分啊！”我想，能够以向林老请教，不也是缘分吗？临别时他拿出墨宝两幅，让我任选其一。我厚脸取其独创的从砖文与汉印中悟出的“一条香”体书法：“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的，吾等上下而求索，为了两百年前的一位县令，为了紫砂史上的一段佳话。

“民国文化第一人”狄平子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狄平子是一位应该让溧阳人感到自豪的人物。

维新人士、反清勇士、新闻出版家、社会活动家、诗人、评论家、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佛学家……这么多称号冠在狄平子身上,一点不为过。因此,有人称他为“民国文化第一人”,也非过誉之词。

—

狄葆贤(1872—1941),字楚青,号平子,别号平等阁主、六根清净人,原籍溧阳杨庄胥泊村人。

姜丹书先生在《狄平子先生行略》中介绍:“狄氏,溧阳望族,聚居于西门外胥渚、胥泊一带,既庶且富,又多贤才,平子先生乃其族中之硕彦也。”“幼随宦江西,其父学耕公曼农,为江西赣县宰,政声卓著。先生生长于南昌,故操南昌语,而乡音反濡涩焉。”

狄平子幼年随父亲狄曼农生活在江西,光绪二十年(1894)考中举人,二十一年留学日本。他自幼聪慧,工诗善画。青年时关心时事,结交京城贤俊,追随康梁,主张维新变法。康有为公车上书,他也名列其中,是康门唯一的江南弟子。

姜丹书言:“盖光绪二十四年,所谓戊戌政变时,先生与康有为、梁启超辈同志,主张政治革命,吁请慈禧退居,还政德宗,故当时有保皇党之目。詎料牝鸡酣于司晨,满朝权奸,遂挟之而兴大狱,举世震惊,所谓戊戌六君子因之杀身成仁,而先生与康梁辈逃亡日本,得免于难。”

狄平子在日本时期,与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成员有联系,结识了谭嗣同密友唐才常,筹划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光绪二十五年(1899)两人回国在上海创立“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到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四川各省活动,联络志士,

救亡图存。

作为“中国议会”的干事，狄平子不惜变卖家藏珍贵字画，用作活动的经费，购买军火，毁家纾难，一心为国。自立军起义失败，狄平子正运一批军火到汉口，仓猝突变，他好不容易逃出虎口。

上海博物馆现藏有曼生紫砂壶和书法花卉册页若干，均有狄曼农题跋，这批文物，应为狄平子变卖旧物。

二

武力救国不成，狄平子图强之志不变，回到上海后，他便投身到新闻出版事业，走上了另一条以笔作枪的救国之路。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支持下，狄平子于1904年6月12日创办了《时报》。当时，上海有两大报，一是《申报》，为英国商人于1872年所办，另一报也是外商所办的《新闻报》，《时报》要想立足报界，必须开创革新之风。狄平子宣称：“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时报》开创报界多项改革之先河：聘请陈景韩为主笔，革新体裁，开辟“时评”专栏，抨击时政，切中时弊，深得民心。首创对版式，办专电，创特约通讯文体，开辟报纸副刊《余兴》，一系列的创新办报形式，深受读者欢迎，获得社会共鸣。因此，发行量与日俱增，竟然与《申报》、《新闻报》“三分天下”，分庭抗礼。此后，《时报》又陆续开辟教育、实业、妇女、儿童、图画、文艺等专栏，全国大小报纸竞相仿效。胡适称之为“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

狄平子以独特的眼光大力提倡小说，开了报纸登载小说的先河，所办《小说时报》成了晚清新小说的有力推动者。1911年，他又在北京办《时报》京津版，后又办了《民报》，从而使报业扩大到南北各大城市地区。

狄平子创办了有正书局，首先采用珂罗版影印碑帖书画，共搜印《中国名画集》多达38辑，许多珍稀古籍得以印刷保存。如《三希堂法帖》、《戚本红楼梦》、《聊斋志异》秘本、曾朴《孽海花》、《梅花落》等等。狄平子由此被称为“文化界第一人”。张謇颂曰：“《时报》以时字揭名海内，创始时固尝为报界革新巨子。”康有为作诗云：“此是中华文明事，思古幽情不可遏。”“应知万方豪杰士，爱国情深斯正则。”（《门人狄楚卿所印帖数十本远赠却寄》）

溧阳姜丹书赞曰：“(狄平子)宽解后回国，创办时报，为民喉舌，主持舆论，开发民智，厥功甚伟。因办报馆，连营印刷事业，而印刷事业中，最称首功者，为中国珂罗版之创始人也。”

三

狄平子为人热情好客，交游甚广。《时报》和有正书局在上海望平街(现名山东路)，门庭若市，宾朋满座，难免影响工作，于是在报馆二楼特辟休息场所，名息楼。

息楼在近代报业史上意义非同寻常。经常出入期间的大多是苏沪名流，新思想、新观念在这里碰撞，纵论天下大事，交流书画技艺，成为上海三大社会名流经常聚会的地方。在息楼里，酝酿过不少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大事，如史量才、黄炎培等在此发起了江苏教育总会。

“掌故大王”郑逸梅写道：“《时报》馆旧址，隔壁是有正书局，也是狄平子开办的。除印行碑帖外，并出版《小说时报》、《妇女时报》、《佛学丛报》等，《时报》附刊名《余兴》，刊载滑稽讽刺作品，刊载后不发现金稿费，而是赠送有正书券，有数元的，也有几角的，可以凭券取书，好在所出书很多，如《梅花落》、《空谷兰》、《火里罪人》等都是，那《戚本红楼梦》也是有正书局所出的。”“《时报》馆址在沪市福州路望平街口，是一宝塔型的建筑物(四凶横行时，宝塔型被拆毁，成为寻常的平顶屋)，后又为扩充计，添造新屋。”

狄平子在弘扬佛学文化上也是功不可没的。1912年他创办《佛学丛报》，宣扬佛法，是为中国第一份佛学刊物。1913年创办《佛学日报》，1918年创办《觉社丛书》，有正书局先后出版经书佛像达730种之多。1914年他举荐并资助月霞法师开办华严大学。1931年，朱子桥发现南宋《磻砂藏》孤本，狄平子派摄影师前往西安拍照，影印出版。他还和叶恭绰、丁福保等人在上海成立影印宋版藏经会。他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位佛学文化的推行者。

四

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里，有一篇《回忆狄楚青》的文章，介绍了狄平子的生活情景。

狄平子的夫人姓陈，出生于杭州世族人家，颇为贤惠，却一连生了六个女儿。狄平子常说：“古人有言，盗不偷五女之家。我有六女，可以无忧了。”

狄平子有位如夫人，生了一个儿子，但狄平子却不喜欢他，说他愚笨。其实此儿人颇规矩，只是老实拘谨一点。

狄平子很喜欢他的小姨子。小陈女士聪慧有才，貌亦佳丽。起初瞒着夫人，后来就别置金屋，密叶藏莺，被夫人侦知后大为不悦，但木已成舟，只好听之任之，况且又是自己妹妹。

狄平子与小陈女士生下一子，玉雪可爱，聪慧出众，举家欢庆，宠爱有加。此子未到三岁，专门请了一个年少婢女看护。一日婢女上楼取火油生炉，抱着小少爷，孰料火星溅起，满地是火，爱儿与稚婢逃避不及，同罹于难。

祸从天降，狄平子大病一场，报馆事务都难得打理。数年后，小陈女士也往生去世。狄平子写了长长一篇的悼文，恭楷精印，中述禅理，语多解脱，文中称陈女士为“定师”，古今罕见。

史量才曾兼任《时报》主笔，息楼成为他步入报业生涯的起始地。后来接下《申报》后，史量才瞒着狄平子挖走主笔陈景韩，狄对史恨如切齿，从不谋面。史量才遇刺发丧那天，狄平子亲自前往吊奠，送一幅陀罗经被。包天笑问狄有无挽联，他叹口气道：“人已逝世，冤亲平等，还造此文字罪过？”

上海流行汽车，许多朋友劝狄平子坐汽车，他说：“汽车常常撞死人，我们报上不是常常责备坐汽车的人吗？以佛家言，亦是一种罪过也。”后来他为人说服，居然也坐起汽车来，但刚坐进车口中就喃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三关照司机“开慢点！开慢点！”后来汽车撞了一下，挡风玻璃碎了，他面部受到微伤，说：“这回是菩萨保佑，”从此不再坐汽车。

郑逸梅先生记录狄平子轶事一件也有趣。有一年，有正书局出售大批湘妃竹扇，狄选取了最大材料，制三尺多长的大扇一柄，托笈扇店特定巨幅的扇面，配好了带到吴湖帆的梅景书屋去，索湖帆为画山水。不料扇面展开，梅景书屋的画桌还嫌不够。凑一桌半，才得动笔。这时叶遐庵正在座，湖帆的墨笔山水，一气呵成，狄氏就请遐庵正面写字。遐庵蘸着浓墨，写儿拳似的大字，连真带草，生动飞舞，狄氏大喜。湖帆问他：“这样大的扇子有什么用处？”狄答道：“挥拂时自有大王之雄风，又可当作手杖，若有暴徒犯我，我就把它作为抵

抗的武器，一举三得！”吴、叶两人听得大笑。

狄平子是位重情义、懂情趣的文化人。

五

狄平子是清末民国年间的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也是艺术书籍印行流传的有功之士。

姜丹书先生说：“先生于科举，虽得小功名，而无意进取，一生抱民主态度，努力发扬文化，故终身未入仕途。然学识宏富，雅擅书画，尤精于评鉴，家藏既丰，过眼尤多，自光绪季年，创设正书局，专门印行珂罗版碑帖图画的以及有关艺术书籍，无虑数千百种，流遍寰球。人民国后，诸家竞相仿制影印书帖画册，以促进文艺之发达，皆先生提倡之功也。”

在《南画大成》中，有狄平子题跋评鉴数篇，书法精到，评审精密，鉴定精当。

在朱耷《应真渡海图》上，狄平子有三篇题跋，用小行书写，首篇言：“戊辰夏日，某画估携此卷来，索值千金，余审为焦山定慧寺物。”他讲了此画的内容，来历，言明他和定慧寺僧相识，而此画又是八大山人罕见的工笔人物，决定买下。过了数日，以百数十金购得，其画已损破，重新装裱。落款为“戊辰九月，溧阳狄平子”。二跋又感叹一番，三跋为七绝一首：“去往随缘无挂碍，分明十八好同参；破夏自忿重泛海，深秋禁足且还山。”“佛制秋月禁足，以此卷归还定慧寺，题一绝，狄平子。”

在恽寿平《拟古册》之上，狄平子又题写了长跋：“南田画当时已名贵，以此贗本最多，其结构精密者、摹仿形似者之作更不胜指屈，惟疏散若不经意之作，摹仿者亦较少，此册虽金笈不易受墨，然墨气活泼，神彩飞动，确为铭心妙品。己巳五月，有人从北平来携至吾斋，因喜为题记，溧阳狄平子。”又题：“郭频伽为孙古云题此册时，乃嘉庆己巳，至今年己巳，两易周星。此一百廿年中不知若干人展玩读赏，其所展玩叹赏之若干人，均已不知何往。而书此画者题者笔墨之迹光彩如新，笔墨玩在，则其人亦何尝不在？然则果属生耶？死耶？亡耶？大可参究。遗墨当前，触目菩提，观此册者，幸勿当面错过。平子又题。”

王翬的《仿燕文贵江岸图卷》为狄家旧藏，狄平子展卷题跋四篇：“石谷此卷作于康熙甲子，乃康熙二十三年。先君得此卷于南州，为同治甲子，乃同治

三年，至今岁甲子，已四易周星矣。得画之次岁乙丑，重付装池。先君正拟题志，适李文芋仙、赵君执叔、缪兄芷汀偕来，文芋欣然援笔代为题记，而署先君之名，记中所谓二三朋好，即文自谓与执叔、芷汀也。先君每谓芋仙，虽有疯子雅号，而风趣颇可人，此亦一端也。又谓当时三君均定此卷为石谷画中之神品，如或以其题款失落为可惜者。乃画估所求善价之见，收藏家与赏鉴家均不应有此。今展此卷，如闻庭训也。民国甲子冬月，狄葆贤谨志。”

跋二：“鸟目山人生当清季盛时，得遍览各收藏家之唐宋名迹，尽力临仿，以此画笔精能直接元宋，诚可谓有清一代画史中臣子矣！然复人定为能品，不以神品许之者，以其少超逸之意也。此卷临燕文贵江岸图，与平时所作迥别，意超笔逸与文贵原本难分轩轻，即作宋画观可也。乙丑冬至前二日，狄平子题于宝贤龕。”

跋三：“元明以来，仿古者惟求神似，神似固自然，神似而形不似，至唐宋人之面目遂全失。而江湖式之，亦乃充塞于宇宙间矣。必也如此卷者神形俱似，庶几古人遗则不至所记。次日又题。”

跋四：“余题云林《怪石丛篁图》，长句有‘麓台欽笔过伶岩，鸟目摹仿失潇洒’二语，然对此卷与麓台仿仲圭小幅，应自检二语之失当。除夕灯下又题，狄平子观止。”

在另一幅王翬的画作《溪山霁雪图卷》上，狄平子题了图名，又有跋言：“此图贗迹颇焉，大都墨色浓带，用笔粗俗，在皆伪作也。此卷为颜韵伯藏，笔墨精妙，清灵绝俗，推为耕烟画中精品，世之赏鉴家当不河汉斯言。狄平子(章)平等阁审定(章)”

《南画大成》是第一部中国绘画作品大全，共二十二卷，搜罗上至唐末、下迄民国的绘画作品六千三百余件，其资料来源为中国民间年间印行的珂罗版美术书籍和大量公私收藏。而作为珂罗版印刷引进第一人，狄平子功德无量。民国年间珂罗版影印图籍为盛，对于书画的欣赏、鉴定、研究，乃至文物修复，都具有开创性的珍贵价值。溧阳杨庄胥渚村狄兆福老师家，收藏有正书局影印出版的康有为、翁同龢、左宗棠等人书写的对联，赵之谦、张子清、石樵等人画的山水花卉条幅画册近百件，也是有收藏价值的艺术珍品了。

《南画大成》的题跋，大都是名家巨匠，如董其昌、文徵明、沈周、祝允明、徐

渭、朱耆、郑燮、髡残、文彭、王原祁、吴昌硕、吴湖帆等历代大家，狄平子在其中有四幅题评鉴赏，可见其收藏、品鉴水平之高。

溧阳籍书画名家、美术教育先驱姜丹书先生，对狄平子的书画艺术、品藏功力有精彩的描述：“至于晚年，浮生俗务，概行屏弃，礼佛以外，诗画自娱。藏品中，有黄鹤山樵画《青卞隐居图》一帧，董其昌题曰：‘天下第一王叔明’，视同瑰宝，某年日本开南画展览会，征品及此，先生躬自护持而去，躬自护持而归，其珍重可知。又有马世俊山水横披一帧，曾出品于民国十八年教育部主办之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世俊字章民，号甸臣，吾溧清初状元，佩文斋书画谱有小传。其作品高隽，唯传世者极鲜，吾于此以得增眼福为幸。”

狄平子的书画俱佳。曾见他书联“到眼大江横去路，出门芳草没遥天”，虽为印刷品，笔墨酣畅，笔力透纸，有传统翰林之风范，又不失个性之灵动。他曾为亡妻作《竹石图》，题诗道：“六根解脱有通灵，珍重明珠不染尘；我自昏□等顽石，廿年愧伴素心人。”题款为“六根清静素心人”。画上顽石立坡，数杆秀竹斜支溪畔，似有清风吹拂，图中自有凄凉之气溢出，表达对亡妻的思念之情。

笔者曾在溧阳藏家手中见狄平子画山水册页，八开，构图奇崛，用米家山皴，画法有传统根基，又有鲜明个人风格，令人啧啧称绝。

丹书先生曰：“（平子）先生之画，清逸秀润，唯颇矜持，不轻为人作，故其作品流传人间者亦不多，兹访得为伍守恭君所写册页两开，足觐诗书画允称三绝。”

六

狄平子，平陵之子也。

他虽没有在故乡生活过，但桑梓之情十分浓郁，乡土情结十分深厚。1931年和1934年家乡溧阳发生严重水、旱灾，狄平子与溧阳人陈复、姜丹书等在史量才的《申报》上连续刊载募捐事宜，筹集救灾物资人。他作为沪上大慈善家，捐出大笔粮款，奔走募款，救家乡百姓于水火之中。《溧阳县旱灾赈济纪念塔》载：“其个人具热忱者，则以沪上闻人狄平子、史量才二善士，情关桑梓，输款尤多。”

姜丹书在《狄平子先生行略》中云：“先生同治十一年壬申生，长余十三岁。余于光绪三十三四年间，始识先生于南京，时先生为谘议局议员，余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学生。晋接之下，方得瞻仰风采，恂恂如也。然余于十四五岁，在乡塾

读经时，早震先生名。”“先生中年以后，笃信佛学，种种善举，乐于参加，故乡遇有请赈募捐等事，无不赞助，而于镇属五邑旅沪同乡会及溧阳旅沪同乡会，亦曾尽力，岂但一乡之善士，直一国之善士也。”“民国二十八九年间，年望古稀，卒于沪宅。余曾代表溧阳旅沪同乡会而往吊焉。子景明，留学美国大学农科，蔚然成材，从事生产裕国，未可限量。余生也晚，知先生浅，不足之为传，乃琐琐追叙其行略如是。”

狄平子病逝，沈恩孚作《挽狄楚老》联：“好古数藏家，书画流传，众口齐称平等阁；维新推老辈，沧桑感喟，九原方见中兴年。”传播文化，投身维新，这正是狄氏功德所在也。

《平等阁诗话》与《平等阁笔记》

溧阳新时代印刷厂的许治平先生，送我三本线装书，说是有位本地人在旧书摊上购得，拿来要求翻印，也不知是何等宝物。

三本新印线装书不厚，一为《平等阁诗话》，一为《平等阁笔记》上下两本。“诗话”和“笔记”都分二卷装帧，作者署名“平等阁主人著”，难怪让人疑惑，不知书的“主人”为谁。“诗话”后扉页上印有“上海望平街有正书局，每部四角五分”字样；“笔记”则印有“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发行。平等阁笔记上下两册，定价大洋四角”字样，还有“总发行所：上海望平街、北京厂西门有正书局；分发行所：南京奇望街、天津东马路、苏州都亭桥有正书局”，并有“版权所有”压花大印。有趣的是，“笔记”的前后扉页和背面，分别印有“晋帖”、“敦煌石室秘赞”、“汉碑”、“唐碑”、“宋碑”等书目广告，标明价格，都为“珂罗版印”，“上海有正书局发行”。这些实例，都为我们了解上海有正书局和珂罗版出版物，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

更难得的是，“笔记”两册上，有许多毛笔的批改之处，有错字，有删增。难道是书的主人之为？还是某位读者即兴？令人浮想。

《平等阁诗话》和《平等阁笔记》作者为狄平子，曾分别载于《时报》和《小说时报》，后结集出版。由于两份报纸在上海有无可匹敌的传播力，两书的连载引起广泛反响，影响很大。

《平等阁诗话》于1908年6月15日出版，分上下两卷，共计一百五十余条。选录诗人近百人，主要是清光绪之后的诗作，也有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以及金圣叹、王雨岚、许海秋等人的诗。另有词话十五条。

《小说时报》在登载“诗话”时言：“此编乃平等阁主人荟萃今人之作、搜罗往昔遗篇，汇集成书，名曰‘诗话’……读之可以消遣怀抱、抒写性灵。又书中每遇名贤著作，必略述其事迹，加以评语，使阅者尤有兴趣，询有裨益于吾人身心之书

也。”狄平子搜罗甚广，涉及到晚清旧体诗歌几乎所有流派诗人，梁启超、谭嗣同、罗瘿公、黄遵宪、王闿运、陈三立、郑孝胥、陈宝琛等都选到其中，没有门户派别之偏。他用传统的诗学观念和审美情趣，对诗作进行品评，记录了不少文坛掌故，具有较高的文学、史学价值。

1921年，胡适受狄平子之请参加《时报》馆新楼落成庆典，他后来撰文道：“《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对于现代诗人的介绍，选择很精。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文学兴趣。我关于现代中国诗的知识差不多都是这部诗话里引起的。”

吴其敏言：“《平等阁诗话》凡所载录当世诸家之诗，足以表明个人卓然眼识，在晚清同类著述中，狄氏的《诗话》扶华摘菁，盖亦足以独立矣。”钱仲联说：“自范当世以下，去取确当，新旧两存，其在当时，影响颇大。”

《平等阁笔记》约写于1902年，在《女报》、《时报》上曾登载。民国三年五月十五日《小说时报》登广告云：“此书曾在《小说时报》按日登载，其中有论哲学家，有论宗教者，有论文学者，有论字画者，见解超绝，融洽新旧。又，庚子之役纪载亦极为详尽，风会升降，时局变迁，有可睹焉。兹以各界纷纷函索，特汇成帙，首尾衔接，开卷了然，诚一般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

叶圣陶曾在日记中载：“又购《平等阁笔记》一集。《平等阁笔记》为近人狄平子（葆贤）撰。多论佛，旁及书画美术，灯下读之，觉此心湛然空明，至为难得。”

《平等阁笔记》中对八国联军入侵掠夺北京的庚子纪事，做了详细的见闻感受，记录了作者见到的“可悲之境、可愤之事、可怜之人”，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对于“中国必亡论”，他以佛家之言推论：“吾决吾国必不遽亡”，呼吁“吾国之于宗教道德上努力为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笔记”中，狄平子有关溧阳人物轶事，有如下记载：

先君子生平最宝爱之画有二：一为王叔明《青卞隐居图》立轴，有董香光书‘天下第一王叔明画’八大字横列于上方。在华亭当日，已推重如此，诚山樵平生最得意之笔也。一为宋人画《五老图册》，自宋元以来，名人多有题志于后。此二者，先君子皆不肯轻易示人。

同治初年，先君子宦游江西时，王××以道员权贛臬，闻而知之，欲

夸《青卞图》不得而啣于心。岁戊辰，先君子授都昌宰，邑俗强悍，迺两大族械斗案起，不听弹压。王乃藉词委某某道员，先后带兵驻邑境，相持年余，至欲加乡民以叛乱之名，而洗荡其村舍。先君子以死力争，王乃属某道员讽以意，谓若《青卞图》必不可得，则《五老图》亦可。先君子叹曰：因一画而杀身破家，吾所不惜！《清明上河图》之前车，吾固愿蹈之！决不甘以己心爱之物，任人豪夺以去。惟因此一画，而或至多杀戮无辜之愚民，则吾抚衷诚有所未安，不能不权衡轻重于其际也。于是遂以《五老图》归之，事乃解。向例上官蒞境，州县供给一切，谓之办差。而军事为尤甚，其费则邑宰任之，综计此事所费，已不下二万全矣。

至光绪癸巳甲午之间，其子××侍御以此册售之盛伯祭酒，后幅又加有胡曾左李诸氏之题志，今尚在祭酒家。惜余游京师时，未得一见，为憾事耳。

狄平之父亲狄学耕，字曼农，以科举宰江西。狄家富收藏，清嘉庆时，溧阳县宰陈曼生常带幕僚前去品赏字画，并赠以对联、砂壶。狄曼农在曼生花卉册页上有题跋。此篇关于《五老图》的记叙，对曼农的爱画如命，对道员的巧取豪夺，对曼农的爱民胜爱画，写来十分生动感人！官场的黑暗，文人的无奈，看来有其渊源。

“笔记”中还记有轶事一件：

吾溧有周孝子，传者忘其名，为人佣工以养母。偶母病，孝子赴市购药归，见邻居火发，巷口已为火封，其家直在火窟中。孝子乃奋身跃入，越火屋两重，竟负母出。以势论之，宜万无生理，而孝子衣裳发肤，竟无纤毫灼痕，可谓奇矣！据孝子自云：当跃入火窟时，心中但知有母，不知有火，入后便觉淡淡之焰遇我即避而已。此与某笔记记载某孝子遇火，独力举其母棺出屋外者，同一异事。或曰：此有神助也！

余谓：术上士亦能吞火，及能赤足行火上者，彼偶凝其神尚能使火顿挫其威势，况孝子之纯然至诚乎？前记有云：火由心造，自亦可由心灭，此理最易明。其神非他，即自心是也。盖孝子之心力最坚强，故所

感应亦最昭著。

孝子救母,不畏烈火,精神可嘉,然毫发无损,实属奇迹。狄平子的评述也有理,一心救母,目中早已无火,不是因为有神助,而是一片孝心的力量使然。

《平等阁笔记》内容丰富,涉及谈佛论道、人生平等、志怪异闻、书画评论、文字改革等等,有许多超前的启智之见,有许多忧国忧民的时政之论,足见狄平子是位致力文化的智识之士!

报业巨子史量才

20世纪初,有两个人是值得溧阳人津津乐道的,那就是当年中国新闻报业界的两个巨头,都是溧阳籍,他们一个叫狄平子,一个叫史量才。

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望平街,狄平子创办了《时报》,与老牌的中国第一张中文报《上海新报》和1872年问世的《申报》三足鼎立,成立中国人第一张独立办的报纸,成为我国报刊业、出版业的改革先驱。

时过八年,1912年9月23日,史量才以12万两银子买下了老《申报》,经过苦心经营,使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他也成为现代报业的巨子。

也许是平陵的沃土种下了文化的基因,也许是濠江的碧波滥觞着文明的渊源,溧阳人的后代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写下了出版业和报刊业的奋斗史,也写下了民国时期的新闻、文化的奇迹!

我们通过历史的片段,来了解一下史量才。

—

1880年1月2日,史量才出生于江苏省江宁县杨板桥村。他原名家修,中年更名量才。父亲史春帆,长年在外走街串巷,贩卖药材,后和人合伙在上海松江泗泾镇开了昇泰和药铺,43岁才中年得子生下家修。

史量才从小天资聪颖,师从宿儒戴葵臣,学业大进,1899年考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两年后在上海育才私塾、兵工学堂、务本女校等校教书。后来得到明校小学校长黄公绶馈赠的2000元庄票,在短短四十天内自办上海女子蚕业学校,成为我国第一所女子专科职业学校。该校不久迁到苏州,改名为浒墅关江苏省立蚕桑学校。

史量才办事雷厉风行,干练精明,由此可见一斑。

二

史量才和狄平子的相识,中介人是王培孙。

王培孙是同盟会会员,狄平子受康有为和梁启超委托,从日本潜回上海办报,经常到育才私塾(后改为南洋中学)找王培孙叙谈,告知他要在望平街办一份保皇党机关报《时报》。在场的史量才从而认识了狄平子,并成为后来《时报》息楼每日必到的常客。1908年,口才文采俱佳的史量才兼任了《时报》主笔。

三

1905年,史量才与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了江苏教务总会,专门研究教育工作。后他又监督上海至嘉兴的铁路施工,深得大实业家、清末状元张謇的赏识。

包天笑曾在《晶报》上刊文《追忆史量才》,说:“史量才办事有决断,各方咸器重,张謇尤为倚重。史量才有今日,固由其才气志气之足以自展,张謇之功不可磨灭。”

曾有人问张謇为何如此器重史家修,张回答:“我是量才录用。”自此,史家修改名史量才。

四

史量才以为,国家要兴盛,文化是基础,新闻为前驱。他终身以“新闻救国”为理想:“新闻家,国医也。”

《申报》创刊于1872年,直至1949年休刊,历时七十七载。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为股东兼经理。

著名新闻工作者恽逸群曾说:“史量才一身兼舆论权威、金融家、实业家,又是‘社会领袖’,他憧憬着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希望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坚分子。”

在史量才的主持下,《申报》从一份日渐衰落、困难重重的报纸,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化设备和良好业务的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群体的中心。

五

1911年是辛亥年，也是史量才的幸运年。

那年4月23日，他中年得子，欣喜不已；同年他又得佳人沈秋水，可谓双喜临门。

沈秋水原名沈慧芝，原是四马路青楼上的三朵花之一，她聪慧伶俐，色艺双佳。初遇恩客丹徒人陶保骏，后又遇有良田三千、米店若干的富家子弟钱有石，史量才则是她棋盘对手、琴上知音，沈秋水暗生爱意，并未表白。

一日，来了一位京城贝勒，对沈慧芝一见钟情，将她赎赴北京。谁知，不久贝勒爷得病身亡，慧芝忍受不了王府的辱骂，逃回上海迎春坊。熟料陶保骏北伐归来，将带来的巨额军饷交慧芝收藏，他去见上海都督陈其美，在都督府被当场击毙！慧芝惊恐之余，连人带款一齐委身于史量才。

史量才纳娶慧芝后，为其易名沈秋水，后入住史府，称为太太，主持家政，出面应酬一切。原配夫人庞明德被称为南京太太。

六

1912年10月22日，史量才以12万两银买下了《申报》，约请张謇、赵竹君、应季中等名流参加，自任总经理。

史量才深感报纸乃天下之枢纽、万民之喉舌，认定只有报纸才是最及时、最迅捷、最深远的救国利器。

他上任后积极网罗人才，以高出《时报》一倍的薪水（300元），聘请既有经验又有写作能力的陈景韩为《申报》总编辑。当狄平子得知此事后，斥责史量才过河拆桥，挖他墙角，气冲冲几欲与史拔拳相向。史量才申辩说：狄平子手下人才济济，走了一个无关紧要，况且自己尚无办报经验，还要收拾这边残局，人才紧缺，迫于无奈。狄平子这位佛学家自释情怀，便不再勉强陈景韩，改由包天笑任《时报》总编辑。

史狄交往三十年，后反目不来往。直到史量才遭遇暗杀，狄平子丢开往日恩怨，特地写了一首真挚感人的悼亡诗，并以有正书局的名义送上一条红缎绣花陀罗经被，出殡时覆盖在史量才遗体最上面。

七

1931年，溧阳遭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淹没农田三十余万亩，灾民超过十五万。1934年夏，溧阳又发生大旱灾，外出逃荒者达二十万人。

对溧阳水灾，史量才特别关注。他除了捐款赈灾外，还专派记者到溧阳采访，并做了连续报道。9月12日，《申报》刊登溧阳灾民困苦的情况报道，并指责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赈灾不力，仅给赈灾款五千元，对于十几万灾民无济于事。从十月十八日起，《申报》连续八天，刊登《乞募赈款紧要启事》，帮助溧阳水灾赈义会募集捐款。

1934年大旱，史量才又派记者到溧阳专访，发表连续报道，并连续在《申报》中刊登启事，发动募捐。

1935年，溧阳人民树立一座石制纪念塔，记录下史量才、狄平子等旅沪溧阳籍人士对桑梓的义举：“其个人具热忱者，则以旅沪闻人狄平子、史量才二善士，情关桑梓，输款尤多。”“邑人相与歌颂，金议建塔，以垂纪念。”

该塔六米多高，烛台形，坐落在东门宝塔湾旁（今人民医院南宿舍区）。

关于史量才籍贯。1932年版《当代中国名人录》上为“江苏省溧阳县人”。他祖籍溧阳埭头史家，乃东汉溧阳侯史崇之后裔，移籍江宁，后迁松江，这应该是史实。2001年3月，中央电视台专题片《天涯共此时》介绍史量才生平时也持按此说。

八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突然对上海发起攻击，国民党十九路军浴血抗击。1月31日，虞洽卿、杜月笙、王晓籁等上海知名人士自发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护会，《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推选为会长。

史量才在演讲中说：“只知打仗杀人是武人，倾国倾城的是美人，那些做了大官只知封妻荫子的人是家人而已。唯有以身许国的人才配叫国人……事已至此，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话掷地有声。

九

史量才苦心经营《申报》二十余年，从不懈怠，他把企业造产看作福民之本，创办中南银行，建立民生纱厂，扩大五洲药房，复兴中华书局，体现出超凡的才能和魄力。

著名掌故专家郑逸梅《老报人史量才的机关密室》称，史量才居住沪西哈同路，华屋若干间，美轮美奂，高爽轩敞，有草坪假山，奇木佳石。有一次老友钱须弥来访，史量才留膳，带他进入机关密室，里面陈设精雅，四壁书画，都是一时名流吴昌硕、吴湖帆、赵叔孺等的作品。另有多宝橱二具，摆放商彝周鼎、秦砖汉瓦，还有古俑玉佛、瓷盎晶章，光怪陆离，令人目眩神迷。

史量才说：“沪上匪氛太炽，这是用以逃避绑票的。”屋内有一后间，墙边藏有一个仅能容身的小洞，他说：“万一急难，那就不能不钻一下狗洞了。”两人都笑了起来。

据《申报魂》作者庞荣棣描述，她十岁时曾随父母去史公馆拜年，暑假便住在里面。洋房前平台有石雕仙女，小孩子们便爬了上去。史家人惊呼：“快下来！不能爬！那是真仙女！”然后，家人便对她讲了一个故事：史公被暗杀当晚，石女双双到南路路口吃馄饨，她们一言不发，吃完将两枚铜板扔进水钵却浮在水上。摊主奇怪地尾随其后，发现她俩朝史公馆内两尊石女飘飘然飞扑上去便消失了。“这是仙女来报噩耗的！”

史量才遇难惊天地，泣鬼神。

十

关于史量才招致暗杀的原因，众说纷纭。

郑逸梅言有两个原因。一是《申报》曾有一篇社论《剿匪与造匪》，不满蒋政府而加以尖锐的讥讽。二是史氏出席南京经济会议，主持者要他认购巨额债券，他当场拒绝并把情况揭载报端，从而得罪了蒋政府。

据曾任《申报》设计部主任的黄炎培先生回忆，有一天蒋介石召史量才谈话，开始交谈甚洽，临别史握着蒋的手说：“你手握百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百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听后立即变了脸色，甚为不悦，杀机顿生。

1934年10月6日，史量才因胃疾劳累，赴杭州西湖疗养。11月13日下午乘自备防弹车沿沪杭公路返沪。车驶入浙江海宁翁家埠时，被车挡住去路，有暴徒拔枪射击。史量才夺门而出，被特务追上杀死在干涸塘内。

史量才大殓，备极哀荣。上海市府下半旗致哀，市长亲往吊唁，两万多人前往参加殓礼。林森、蒋介石等党国要员发来挽文，章太炎撰写了墓志铭。苏联、德国发来唁电，各国报纸予报道。

《上海泰晤士报》称：“史君才能出众，多所建树，以故在沪声誉广著，英俊如史君，而竟在其有为之年殒生于残暴匪徒一群之手，诚可痛惜之事。……史君于国家生活上有伟大贡献，中国报界目为领袖，许多外人亦视为‘中国之北岩勋爵’，报界失此人才，尤甚扼腕……”

十一

史量才在西湖边上的别墅，名为“秋水山庄”。

和史量才同车返沪的沈秋水，跳车时伤了脚踝，回沪后又咯血不止，但她仍步履蹒跚来到丈夫遗体前，她喊了一声“家修，让我为你送行……”止不住泪如雨下，和着泪水，一身缟素的沈秋水抚琴弹了一曲《广陵散》，悲痛哀怨。相思深情随七弦琤琮流出。曲终人去，“嘯”一声琴弦声如裂帛，断了！沈秋水缓缓站起，抱着断弦古琴向火钵走去，在锡箔纸钱的熊熊大火里，双手颤抖，将琴送到火中焚烧，自此与琴绝缘……

沈秋水诵经礼佛，将秋水山庄二楼办成了仁济育婴堂和尚贤妇孺医院。自己离开这个铭刻着一生记忆的大观园，搬进公寓单间，焚香念经，与世隔绝。

秋水焚琴谢知音。子期已去，伯牙何复操琴？人生知遇，可歌可泣。

十二

老一辈的人称报纸习惯为“申报纸”，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老报人胡憨珠说：“若要说起上海‘报业’和‘报人’的前尘旧事，为举世人士所共知的，在报业莫如《申报》，在报人莫如史量才。”

姜丹书笔下的旧式教育

南京艺术学院原副院长谢海燕曾这样评价姜丹书：“姜丹书先生给国家培育了这么多艺术人才，给后人留下这么多遗产，他一生的成就，在于他恪守一个‘恒’字，植根一个‘勤’字，立定一个‘诚’，崇尚一个‘朴’字。他鞠躬尽瘁，为艺术教育奋斗终身。”“在他一生中，还撰写了许多教育家、艺术家的传记及艺术教育史事的实录和评论，给我们提供了近、现代许多有价值的资料文献……如不是他脑勤手勤，雪泥鸿爪，随时记录所见所闻和感想，便不可能给后世留下这么丰富的史实。”

溧阳教育，根深叶茂，昔日科举，“三鼎甲”六人蜚声遐迩，一百八十五位进士荣登高榜，成为人中之杰，国之栋梁。耕读传家的乡风民俗，渗透到江南古邑的每个角落。

按下旧式教育之智愚优劣不说，我们对过去的旧式教育体制知之甚少。资料匮乏，陋见针砭，否定封建迂腐之观念，都是造成这种因果的渊藪。但溧阳有个姜丹书，幸甚！

丹书先生在其“自编年谱”中，以惊人的记忆力和翔实的笔墨，记叙了其求学生涯，记录了清末民初教育的实况，记载了江南古邑教学的沿革和旧式教育的实例，弥足珍贵。

姜丹书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因家境殷实，先辈皆为贡生、太学生，故尊师重教，延师督学，以求成才。

光绪十七年(1891)，姜丹书7岁，“开蒙读书，所读为《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书。由祖若父教之，并喜欢看《二十四孝图》，所以喜欢看者，全由于图画之引人入胜，其文字当然不识”。“在教育上言之，灌输知识与加强记忆，图画之效力远胜于文字，尤其对于单纯如白纸之儿童脑筋上，更有先入为主之效力。”

8岁,读《大学》。9岁,从塾师读《中庸》。其开蒙师为王镜蓉先生,曾考得秀才,塾所设在祠堂内,由丹书家延请,附读本族兄弟七八人。那时尊师重道十分讲究,王塾师按辈分要叫丹书父亲“姻伯”,但每当开学拜师及送“脩金”学费时,其祖父、父亲都要对先生下跪拜之礼,可见老师地位之崇高,亦乡风也。

塾师教书,死记硬背。姜丹书多背不出,“读资甚钝,悟资尚敏”,故苦头吃足。“读书读到《中庸》,屁股打得通红。”体罚形式有:打手心、打屁股、打头皮、打背皮、打胛骨(扇子骨头)。学生当先生面背书,一句背不出提示,二句背不出呵斥,三句背不出则挨打也。打人工具为硬木(榉木或红木)戒方,又称戒尺,古称“夏楚”,随手便打。“故所施者皆是直接肉刑,可怜余之小背皮,三日两头殷红,或如瘟猪肉,或如刮过痧一样。”有时打手心,须将手掌衬在桌子尖角上受打,打屁股要褪下裤子佝在凳子上打,还有顶戒方、跪板凳、揪耳朵、摘眼皮、“凿顶宫”(吃栗子)等种种苦刑,听起来汗毛凛凛,吓人兮兮!

体罚不算,还有羞辱。先生发火,将书远向地上一掷,责令丹书跪在地上捧读。有一次竟掷出祠堂门外的坟莹上,丹书只好照规矩在荒坟边捧读,有牧童走过刮脸皮羞之,他脸红颈赤。还有一次,先生炉边煎茶,姜丹书读书之余仰天看看浮云,却被注目,先生跑来提起戒方便打,击中右眼骨上,马上肿如核桃,不能睁眼多日。祖父和父母看到,绝不敢对先生有半句怨言,只是暗自心疼而已。当时求学,体罚为“不堪忍受而不得不忍受者”。还有其从兄深源,蒙馆塾师下手更凶,头皮常被打得浮肿发胖,丹书母亲手揪深源头皮,如揪棉絮,故愈打愈愚,愈不上学,二十余岁便死去。“此皆绝对事实,深恐后人阅而不信,故重言以申明之。余之记此,亦非敢诽谤先师,实欲告后人编《中国教育史》者耳。”

塾师以打人为唯一管教方法,是当时积久而成普遍风习。“寻遍孔氏遗书,未尝见有打人之事。”“后世腐儒读经而不明经义,可笑又可叹。”

书塾制度,先生晨授新书一段,称为“生书”,读至中饭前要背诵,否则要“关中饭”。复读前已读之书,称为“带书”,亦要连接背诵。少休后,须复读更前之书,称为“熟书”,亦要背诵。教读之时并不讲解,要学生到十五六岁时,任选几段约略说说,等于不讲。

一年之中,学生清明放假十天、端午假约十天、中秋十天,至十二月二十便放年假,正月二十开学,无星期也无暑假。

学费旧称“束脩”，小学生每年自3—5元，稍长者7—8元，十六岁以上不过十余元而已。分开学、端午、中秋、年终四次致送，故最小之塾每年不过三四十元，最大之塾每年亦不过二三百元，已称名师矣。束脩致送时非常恭敬，须用红纸包好，由父兄下跪拜礼而呈之师座，这是规矩。新年开学，每家须宴请先生一次，端午、中秋须送节礼，暑假须送西瓜半担至一担，先生率诸生分吃，家眷亦可陪吃。

姜丹书10岁，仍从王师读《论语》，但业余时间对祠堂、戏台上的门头合掌、雕梁画栋看得津津有味，对上面的文戏武戏、木雕砖雕目濡心染，虽因出神发呆屡次挨打，却屡打不改，从而埋下艺术的种子。他最喜欢在自订小簿子上任意画花，在新竹椅上刀刻花纹，将树桩削好嵌入铜笔管做小銃，攀竹弓习射箭，自糊兔子灯、扎鸽子、做鱼叉，天性天趣盎然。他还喜栽瓜、种菜、捉鱼、摸蟹、钓鳊，乡村的一切童趣，冲淡了呆板枯燥的书塾生活的束缚。“此类幼年趣事，至今思之犹觉兴味盎然，然惜当时教育宗旨与此刺谬，犹幸弱冠以后，教育革新，此乃为余一生从事艺术教育及劳作教育之根性。”

11岁至13岁，姜丹书从沈蓉轩先生在南渡镇读《论语》、《孟子》，兼读《唐诗三百首》及《千家诗》。沈老师送他《诗韵合璧》及《初学检韵》，自行翻检，渐懂得部首及笔画等。他对《三国演义》中的插图感兴趣，并仿画之，对家中字帖也自行临写。14岁读《诗经》、唐诗等。

15岁在东张村从张洪生先生续读《诗经》、《书经》。16岁读《易经》及《礼记》，开始习作“制艺”，即八股文。先习“破题”，次习“承题”，再习“起讲”，以下“出题”，按下“起股”、“中股”、“后股”，最后“束股”。“八股文之空疏害人，自清末思想革命家唤醒之后，有识之士皆诅咒之。”“从前旧式教育时代，不知误杀多少子弟，可真可发一浩叹！”

光绪二十七年(1901)，姜丹书在城厢西河沿从名师唐光被先生，续读《礼记》及《春秋左传》，选读古文、唐诗及八股文、试帖诗等，并临颜、柳等帖。“余寄食于斯，连续四年，学业大进。”“是年，余开始自动用功，进步甚速。”“惟余独自读至三更天，甚至四更天曙方就寝，无间冬夏，矢志不懈。冬则脚骨如冰，夏则掌满蚊血。一具油盏，两根灯草，灯光如豆，鸡声喔喔，一人独坐，默读冥悟，书味盎然。”“及冬，先生告吾父曰：明春有童子试，丹书可以应试矣，吾父亦大喜。”是年，溧阳

对外交通已有小轮船两艘，一日与常州对开，另一日与无锡对开。此时私塾订阅上海报纸一种，要隔三四天方可看到。

18岁，读《左传》及《周礼》、古文等。他参阅报纸、习作时文，自阅《纲鉴易知录》，每天用功过夜分。

正月，举行“县考”。当年县考之制，共考三场，每隔四五日考一场。考生半夜进场，溧阳应试童生约有七八百人，由现任县令为主考官，逐一点名发卷，已近天亮，揭示题目，诸考生按题作文、作诗，不得带书籍，字必工楷，至当日傍晚须缴卷。

考试内容，第一场试“经义”一篇，题出在“四书”上；第二场试经义一篇，题出在“五经”上；两场均要加试“试帖诗”一首。第三场试“史论”一篇，并加试时事策或议一篇。

三场考试，每场淘汰二百名，第三场发榜时，只录取二三百名。每场榜上第一名称“案首”，全县知名。余下二十名叫“前十名”、“后十名”；前十名下一场考试坐在主考官前，称为“提堂号”，颇为荣誉。每五十名又称“团”，头团，二团，以此类推。

考场当时设在北门内的“书院”内，内有大照壁墙，试榜则张贴其上。民国二十六冬(1937)，为日寇毁为平地。

“童子试”并无年龄限制，十六岁以下称“神童”，三十岁以上称“老童生”。溧阳全县有36名秀才之定额，七八百名考生，也需二十争一秀才名额，绝非易事。姜丹书是年十八岁，出考三场，均在“头团”之内，孺子可教也。

三月，赴金坛参加“府试”，当时镇江府含四县：丹徒、丹阳、金坛、溧阳，后来添设扬中一县。考场称“贡院”，知府为主考官，亦须考三场，发榜三次。五月，为“院考”，由江苏学政“学台”任主考官，再考三场，如第三次发榜名列其中，方称“入学”，称为秀才。小小秀才不易考得，多少人从弱冠考到花甲，功名不得，被人称为“一世老童生”！

当年考试制度，有几点颇为特别：一是不限年龄，老少同考；二是细筛精拣，凭文取舍；三是关防甚严，较难作弊；四是女子无考试权，身家不清白者不得试，如“娼、优、隶、卒(娼妓、戏子、差役、轿夫)”子弟，视为贱民，追溯三代！五是须是本籍人士方得参考，客籍、荒籍不得与考。

姜丹书“府考”得过第十一名，院考落榜。后仍从唐师读《左传》、古文、唐诗、时文，常考书院月课，每次第一，声名渐噪，可以领膏火钱(奖学金)数百文至一两千文，喜不自胜。19岁时，他与汤家桥望族汤克和之幼女结婚。

越年，姜丹书又在“院试”上不题。21岁时，他辍学自修，自设私塾，收小学生七八人，聊以谋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废除科举，兴办学堂。

笔者查阅1988年《溧阳县教育志》上有记述：“清光绪年间，全县有书院四所，是贡生修业的场所，到了清末，仅存的只有平陵书院。城乡各地都有义学、私塾，大多数是贫苦人民子弟读书的地方。光绪三十一年我县县试停止，公元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此处与姜述相差一年)光绪二十九年平陵书院就改为溧阳县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学堂又改称学校。”

1907年正月下旬，姜丹书考入“溧阳官学堂”，即高等小学堂，时年23岁，其教学程度，在初高中之上。他的国文教师程肖琴先生(宜兴廩贡生)、史地教师蒋梅生(宜兴廩贡生)、修身教师马香伯先生(本邑廩贡生)、算术理化博物教师蔡有虔先生(武进人)、英文教师魏先生(金坛人)、堂长(校长)为陈重纶(仪征县人)。丹书每次作文必考第一，故诸位老师多有赞许，评他为“品学兼优”。是年秋，他考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考两江师范，也颇有趣。六月暑假，姜丹书闲逛至县衙门前，见照壁上有大张召考告示，规定生员方能报考，毕业以后，可享“举人”功名。他动了心，姑往试之，心想希望不大。因为这次招考，在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展开，县里先考，择优数人保送南京本校去复试两场。县试近百人，发榜只取六人，姜丹书名列其中。八月，赴南京复试，和同学黄镇平、宋咸德搭班轮至丹阳，换船至镇江，再换长江大轮至南京(那时京沪铁路未通)。三省同试有一千多人，姜丹书最年少。主试者为本校监督(校长)李瑞清先生。九月，需赴宁复试一场，但一试后他并不抱多少希望，匆匆返溧，一为省旅费，一为没信心。不料发榜在上海报纸上公告，三名溧阳考生居然都有名，但已逾期复试，懊丧万分。幸好各地逾复者众多，纷纷要求补复，结果三人均被录取。九月入学，十月开课。

两江师范为后来的中央大学前身，当时为江南最高学府。校舍宏大，设备充实，1902年创设，1911年停办，为国家培养新师资数千人。姜丹书言：“即入是

校,受中外名师熏陶,展开各种新学术之研究,始知世界之大,科学之新,教育事业之可贵,乃立志以从事教育为终身事业,此为我踏上人生大道之初步。”

姜丹书入两江师范,逢考必列第一,成绩优异。1911年正月,偕同班最优等学生赴京师学部复试,三月试毕,以第一名资格留校,在附属中小学任职。五月,京师发榜,他中师范科举人。当年尚袭旧制,有报喜者敲锣到家门,刘家边乡人惊为何处失火,纷纷聚奔,后来才知是姜丹书中了举人,姜母强氏非常喜慰。

“补白大王”郑逸梅曾言,溧阳姜丹书擅画柿,其曾钤自一印,叫“末代举人”。一笑。

丹书先生一生是求学的一生,也是教学的一生,他曾自称是“教育园地的白胡子园丁”。他这个园丁,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着校园,培养出了这么多的艺术大师。他给溧阳教育史留下的史料,珍若拱璧。

晚年的姜丹书曾说:“譬如烧窑,我们就是第一窑陶器,虽然外表粗糙,形状简陋,但毕竟是从无到有。此后,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终于制成了精美雅致的瓷器和被世人视为瑰宝的景泰蓝。”

光绪年间的乡间婚事

男婚女嫁，人之常情，人生大事。

西风东渐。当新房轿车成了媒妁的条件，当拍婚纱照成了姻缘的前奏，当酒店饭桌成了婚礼的主场，当身穿传统服饰办喜事成了另类的仪式，我们或许可以好奇地追溯一下，前辈先人们是怎样操办婚姻大事的？

让我们走进百年前一位叫姜丹书的乡贤的婚礼吧。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姜丹书 15 岁。有媒人上门提亲，女方是汤家桥的望族汤克和先生的小女儿汤坤造，小男方两岁。“天生一对，地造一双，门当户对，日后必昌”，嚟嘴媒婆的介绍天花乱坠，姜父姜母含笑首肯。

婚娶先有“定亲”礼仪，古礼称“纳聘”，又叫“住口”，也就是现在的订婚。当年的婚姻习俗是“盲目”式的，双方男女绝对不由自主，结婚前绝少机会见面，偷看一眼也很难，所以对对方外貌美丑有无残疾破相一概不知，一直要等到结婚拜堂入洞房才能“真相大白”。万一有毛病，也是木已成舟，绝不容许离婚，只好“腐心一世，暗泪倒流”。女方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也。

旧时婚姻，有指腹为婚的，有三四岁定的娃娃亲，有本来相识的老亲做亲，有素不相识者全凭媒婆一张嘴的。媒婆以媒为生，东村窜西庄跑，手拿绢头又称“搭婆”，七搭八搭，有时受了人家酬金会“骗媒”，溧阳人讲“藏(炕)掉毛面讲光面”，麻面眇眼、跛脚骆驼(背)到了她嘴里全成“光面”，俗称“乱说媒人”。

所谓“住口”，其实就是“买卖婚姻”，先由一方开出年庚八字，交对方请算命先生“合八字”，如果吉利再行议婚。议婚之时，媒人做中间人，高榷聘金的多少，当时的行情规矩是普通至少是三十六元，至多乃九十六元，还要首饰若干、衣服若干。女方讨价，男方还价，洽商而定，既经议定，再行订婚，但从此不得再有异议，俗称“住口”。

订婚之礼送过，汤家桥的还礼来了，姜丹书见礼盒里附来一双绣花鞋甚小，即所谓“三寸金莲”，他心里暗喜，“盖情窦略已开矣”。

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廿二日，19岁的姜丹书举行结婚大礼。

汤家桥距刘家边，陆路近四十里，水路五十余里。午后，迎亲的队伍出发，新郎官身穿大礼服(套子、鞞帽)，男傧相二人，亦穿大礼服，“颇似戏台上之金兀术”，相偕带领着空花轿、一班鸣锣奏乐的吹鼓手和提着灯笼的向导，浩浩荡荡、热热闹闹而行。走到南渡镇，预先雇好的船已在大河的码头边等候了，上舟西驶，到达汤家桥已是黄昏时分。上岸，有两媒翁领丹书前行，二傧相随后，一路鼓乐大作，大家簇拥花轿至女家门口，霎时鞭炮炸响，纸屑乱飞，稚闹众嬉，十分热闹。只见汤家大门紧闭，女方拦住花轿再三要挟“开门钱”，由媒翁交涉妥协后始开门。

先迎花轿入内，接着迎接新郎登上礼堂。礼堂布置得喜气堂皇，中间摆着礼台，旁边放置几把椅子，台椅上围锦帔彩，五彩缤纷。礼台上陈设着杯、筷、供果、供菜，中间放着一只活鹅，这鹅的后半身裹入披着红布的蒲包内，前半身露出，听其自然。这活鹅叫“奠雁”，古代婚礼中有“委禽”之举，禽即是雁，雁难得，用鹅代之。礼台上摆着香炉、蜡台，高烧龙凤花烛，此刻满堂张灯结彩，乐声宣扬，喜气洋洋，参加婚礼的、看热闹的人团团围住新郎，眼光齐打量这新官人，如是英俊少年，当自傲得赞；若为麻面丑相，则无地自容了。

姜丹书居在堂中，站在红地毯上，四起八拜，连磕了十几个头。两位男傧相为亲友，分站左右，只陪立，不陪拜。而新郎所拜无具体人，只是家神和那只“奠雁”！

奠雁之后，即开盛宴，新郎坐首席首座，两旁是傧相和陪客。桌席仍用台围，点燃花烛，称为“开席”。宴请结束，已是后半夜了，鸡鸣三更，迎亲队伍稍作休息，便又乐声大作，所谓“催上轿”、“催妆”。这时，新娘必须在母亲房中放声大哭，一是哭舍不得骤离温暖的娘家，二是哭入陌生人家，既怕丈夫欺凌，又怕公婆凶恶，姑叔妯娌作弄，举目无亲，好不伤怀。有胆小害怕的新娘，数日前或数月前就暗自啜泣，哭得眼肿声哑，十分可怜。

催妆时分，由喜娘引新郎到岳母房内行“见面礼”，暂避别室，让新娘上轿。新娘此时头戴凤冠，身穿绣衣红裙，但脸面不加粉妆，发髻故作老妪式样，以取

“偕老”的吉口兆，凤冠上加顶头袱，罩住脸部，不见人也不让人见她。此时她脚不能着地，由胞兄或娘舅抱着送她入轿。花轿停置礼堂前，抱上轿前要行“辞家礼”，端坐闭帘，乐班喧响，由四人或八人轿夫抬行，这时已是黎明时分了。新娘在轿中仍放声大哭，须近夫家时，由轿夫招呼才收声。花轿起行，新郎在前走，称“领轿”，古代称之为“亲迎”礼，《诗经》中有记载。

姜丹书领轿上船，载到家中已近中午了，在一片乐声人声的热闹之中，行“交拜礼”，俗称“拜堂”。堂中设香案，花烛高烧，他衣冠肃立，由“天赞娘娘”开轿门，扶新娘出轿，向上并立，新娘跪而俯伏，新郎则又是四起八拜。这时，丹书心里挂念着新娘的美丑，但她头顶布袱，“虽偷眼斜觑而不得见，殊忐忑也”。拜堂毕，新郎应抱新娘入洞房，但丹书一介书生，抱不动，改用长彩带牵着新娘走，地上铺着红毯和麻袋，脚踩麻袋称“踏袋”，喻之“接代”，取兆也。这时看热闹的来宾夹道哄闹，虽是人生最得意之时，丹书却惦记着所执之人的相貌，不能放心。

新人入洞房，女傧相拦住门，不让闲人进来。两位新人上床，面对罗帐背靠背盘腿而坐，此称“坐床”。然后，各给一盘鸡头鸡尾，令他俩吃掉，也是偕有头有尾之意，但不过是装样子，并不是真吃。“所喜此时新娘之顶头袱已揭去，故可乘此机会，略窥面貌，尚不便端详，美则欣然自慰，丑则暗中啜泣，但亦无可奈何耳。然此时所见新娘面貌，只是本色，并未妆扮，如认为有八分姿色，则少顷一经化妆，便成十分美人儿矣。”

坐床结束，新郎出屋。“伴房喜娘”始为新娘“卸礼服、开妆奁、梳云髻、调脂粉、饰丽容”一变本色面容，化为闭月羞花之美人。俗语称：“女大十八变，临上轿，变成一个活观音。”

新娘上好妆，穿礼服戴凤冠，俯首端坐，开始任人“看新娘子”。此时谁都可以进新房看新人，每个人必发喜果，观人者必千方百计引新娘笑，而新娘则绝不开口、庄重正色，实在忍俊不禁，也只能略露笑容或愠容。观者则挑逗调侃，以恣乐笑，新娘则被人戏弄，俗语“遣猢猻”。

大喜之日，贺客盈门，昼夜大宴。黄昏以后，有年轻亲友陪宴新郎，故意劝酒，称“送房酒”，想让新郎喝醉。宴毕，一群亲朋手执花烛，送新郎入洞房，并一一向两位新人敬酒，好话和粗语夹杂，再三强饮，百般调笑；还有过于恶作剧者，新人还不能发作，只能讨饶，此为“闹新房”。客人尽兴而散，送完宾朋关上房门，

两位新人脱礼服穿便装，才并坐用膳，称“合卺宴”，俗称“和合饭”。吃完东西，两人同到父母跟前磕头禀告，方能回房就寝，这时已过夜分，两人疲乏不堪。房中花烛要任其点完，通宵达旦，良辰美景，卿卿我我，“始得互相审视庐山真面目。然遇一方丑陋或一方顽呆，则有趣之事反成毕生之憾矣”。

丹书先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展示了一段光绪年间溧阳乡间婚嫁的真实场景，让后人了解到旧时婚礼之繁琐昏聩、礼仪规矩，在今天看来虽显可笑可气，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对父母的尊敬孝顺，对祖宗的缅怀尊重，乃民族之传统根本。如今仍流行的“喝喜酒”、“闹新房”，也是传统婚礼的一种沿袭。丹书先生写道：“过去数千年，纵横廿几省，如此礼俗，大同小异，故以上所述颇有一般的代表性。及入民国，三四十年以来，一切的一切，大不相同，甚至相反。我为末代之人，所说如是，后之人或讶而不信，故不惜絮絮叙述，语语纪实，以贻治风俗史者之资料。”

他想得远，写得好。

弘一书《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考略

2011年11月25日，西子湖畔的柔风分明带了几分凉意，垂柳的丝绦褪去盛绿的浓妆，迎接岁月的更替。位于杭州市南山路的浙江美术馆一片静谧，门前的宣传招贴画在街灯的映照下不是很显眼，走近看却很亲切：姜丹书文献展，2011年11月26日—12月16日。

我们专程而来。走进10号展厅，墙上是丹书先生的画作，橱柜里是他的著作及手稿，那本著名的中国第一本美术史教材上，“溧阳姜丹书”的署名颇为醒目。布展尚未结束，我们也许是第一批参观者。墙上丹书先生的大幅照片在笑眯眯地看着我，那抿拢的嘴角仿佛随时会张开，说：“你家（你们）介晚还来看我的东西的？”后面是先生自撰的年谱，记叙了这位“白胡子园丁”教书育人的可敬可亲的一生。

展览开头，用绳子圈拦着一块石碑，敦厚凝重，方整庄严，这就是我心仪已久的弘一法师书《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这是一块宝碑，被称为“弘一法师红尘绝笔”，是法师传世不多的珍贵文物。这是一块“魏”碑，弘一的书法功力在此呈显无遗。这是一块“情”碑，展现了姜丹书和李叔同共教一校、同处一室的交谊。这是一块“奇”碑，历经磨难的身世见证了山河岁月的沧桑。

我久久伫立在这难得一见的石碑前，心潮澎湃。

“姜丹书研究课题组”组长尹舒拉说，办姜先生的文献展，好多美术馆的小青年在问：姜丹书是谁？

说起潘天寿、丰子恺、郑午昌这些大师，也许无人不知。说起他们的老师姜丹书，不知几人能知？

不管知与不知，姜丹书是大师之师，这点不容遗忘。

石碑不会说话，但它凝固了历史，凝聚了世情。我想寻找一下她的来龙去脉。

一、姜母强氏

姜丹书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出生在溧阳南渡镇南五里的刘家边村。他在自传中记述：“先母强氏，本邑上沛埠强公艺山先生长女，贤淑见称乡里，六十三岁卒于杭州就养寓内。”“先母咸丰六年(1856)丙辰生……惟闻先母常说：余六岁始断乳，故自今日思之，余一生辛勤刻苦而体质不坏，且形貌虽清癯，而一生无大病，即小疾亦绝少，即因此得天独厚之故。”

姜母对丹书十分宠爱，但又不失严厉。“有一次于寒冬十一月间，瞒着母亲，跟随他孩至相近之黄山湖内芦滩里踏冰摸鱼，即赤足踏破薄冰，鱼便偃着人足之体温而不动，故可摸而得之，顷刻之间，摸得大鲫鱼数十尾，心中又喜又惧，及归而献诸母前，非但不称赞，且打小屁股一顿，盖虑余险些淹死也。此类幼年趣事，至今思之犹觉兴味盎然。”“先母戒责一次，终身革除赌念。余虽是独子，而母教甚严……亦往偷赌，为母侦知，责打屁股一顿，招认下次决不再犯，始蒙饶赦。从此以后，确未犯戒，且绝是念。”“余一生为教师，平日执行职务之暇，正因不染赌习，故能将所余精神、所余时光一齐用于学术范围之内，结果略有几种著作，以报答我母之一抔，不然浮生一世，若将半生精神与平生时光枉费于金迷纸醉之中，便死而与草木同腐，不著一些痕迹，岂不可惜？”

从“摸鱼”、“戒赌”两件小事，可见姜母对丹书一生的影响很大。

1913年，应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之聘，任图画手工教员的姜丹书，迎母杭州，以尽孝侍。“母初迁居，熟人少，不甚惯，常奉游西湖以资消遣。”

1916年，“是年秋，母病反胃，俗称‘食膈’，即今名胃癌。延中、西医疗，不见效，忧甚”。姜丹书在《忧母病》一诗中，忧心忡忡，孝心可鉴：

丙辰仲冬，母病胃癌久，一日侍疾过夜分，见满窗凉月，百感惧兴。

世间须弥一芥尘，当空皓月转冰轮。
似闻兔捣长生药，为乞天医老母身。
素抱牛忧怀海内，追伤血粥泣苍旻。
断肠语合鸡声写，待觅飞鸿寄故人。

姜丹书二十岁时，父病，他曾“割股疗父，沥血为糜，卒亦无效”。他“书此以戒后人”道：“割股之事，甚愚妄而危险，古称愚孝者，取其心而斥其事也。倘一割而流血不止，则亲未死而子已死，岂非速亲之死耶？然余所以为之于父而不为之于母者，初则徒有迷信，后已研明科学，正因为之于父而不验，当然从此破除迷信也。”

母病，姜丹书“请黄佑农大夫为母医治，取五种蔬果捣汁为剂，卒无效”。“胃癌，旧称反胃，食即吐，吐后复食，食后复吐，俗亦称膈气病，绝症也。余母患此，延至明年岁次丁巳闰二月十一寿终杭寓，六十三岁。”

1917年(民国六年)，33岁的姜丹书痛别慈母，他不胜哀痛。

二、姜丹书与李叔同

关于李叔同，姜丹书撰有三篇文章，分别为《才子——艺术教家——高僧弘一大师(李叔同)传》、《弘一大师续传》和《追忆大师》，都为作者与弘一过往交谊，均是宝贵的一手资料。近读《爱就是慈悲——弘一法师传》，马璐瑶著，其称“鲜为人知的一手资料，最贴近弘一禅心”。但通篇不见姜文中的史实，实为缺憾，可见作传之不易也。

李叔同，名文涛，别号息霜，浙江平湖人。他擅书画，工诗词，精音乐，是我国第一个出国专学美术和音乐之人。他曾执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其时与姜丹书同事。“余与上人，初为文字交，先即以报章文艺相往还，继为南社同人，直至是时，始同事于杭州之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以致改组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六七年间，志同道合，声应气求，相交益契”。“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呈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室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对于李叔同的教学生涯，姜丹书赞赏有加：“延聘上人主授是科图画及全校音乐。上人言教之余，益以身教，莘莘学子，翕然从风。”“上人为教师时，对学生素无厉声正色之责让，至不快时，只于面貌上稍见愠色，而连说几声‘有趣’‘有趣’，即是顽劣学生亦无不敬畏悦服。此种感化力，实为常人所不及，余等辄戏之曰‘魔力’也。”

李叔同决意出家，姜丹书和他曾有一晤谈：“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余因知其非厌世，更非欺世，盖由于参透人生，飘然出世，世所谓返朴归真者是也。”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姜丹书作赞曰：“天生异人，必有自来。体天行化，一木支颓。少为才子，艺文双魁。长为良师，桃李广栽。既皈三宝，妙法宏恢。”“华枝春满，香庄严兮；天心月圆，光庄严兮；如此境界，极乐奚疑？”

三、汪崧撰铭，弘一书丹

1917年，姜母去世。姜丹书记叙：“母弃养于长庆街寓所，不胜悲痛，寿六十三。”“汪崧为撰《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挚友李叔同为书碑字。”“汪崧字曼锋，杭州名士。李叔同雅擅书法，世所珍之。书成此碑字之翌朝，即悄然入山，披剃于虎跑寺，释名演音，字弘一。故此碑署名已为‘大慈演音’（‘大慈’为虎跑寺所在山名）。”

姜丹书在追忆文章中提及：“上人雅擅书法，世所共知……所作汉魏六朝分隶真书居多。”“而余先母强太夫人墓志铭，则为其在家时绝笔，亦可谓出家后开笔之作。因其时人尚住在校中，但已封笔不书，感余踟请之诚，乃破格书之，故已署释名，诘朝即入山剃度矣。”

《中国美术》1982年2月第八期上，刊载了姜丹书小儿子姜书凯先生的文章《记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一件手书墓志》，较为详细地记叙了石碑的来龙去脉：

1917年春，我祖母患胃癌逝世，不久，我父亲即踵门求李叔同写墓志铭，这触动了他悼念自己亡母的哀思，两人相对歔歔良久，他才答应了下来。但不知为什么，当时并未动笔，直到第二年夏天，就在他准备出家的前一天晚上，当办完了全部俗事，他才点起一对红烛，伸纸濡毫，一笔不苟地写完了《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墓志铭一写完，他就把毛笔折成了两段，了却了这尘世最后一件心事。翌晨，他即悄然入山，到虎跑的大慈寺披剃当了和尚。当我父亲和经亨颐、夏丏尊等同事好友赶

往学校送行时，已是人去楼空，房中唯见残烛断笔伴随着这篇端端正正放在书桌上的墓志铭，上面的署款已是‘大慈演音’书了……

弘一碑书已成，丹书刻勒上石，但未入土。姜丹书言：“墓志铭本应埋在墓前地下，然此石因举葬时尚未刻竣，故未及运归埋入，至今尚在杭宅。”

姜书凯记叙：“我父亲得此墨宝后，即请人模勒上石，原准备运往江苏溧阳老家的祖莹，但因那时连年军阀混战，一直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前夕，我父亲仓皇携眷避难浙东。在匆匆离家时，为了保护这块珍贵的碑石，把它埋入了土中。一直到 21 年后的 1958 年夏，他从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职退休回到杭州时，才把这块碑起出。

“1962 年父逝世后，此碑一直珍藏于家。但其间曾险遭厄运：大约是 1974 年的春天，一位邻居看中了这块石碑，就擅自选作搭鸡窝用的材料，真是‘无巧不成书’，他正要砌时，当时还在外地工作的我，恰好因出差之便回到家中，我等不得放下旅行袋，急忙上前阻止，才把这块历久而弥珍的碑石抢救下来。

“此碑宽 67 厘米，高 63 厘米，厚 12 厘米；碑名及撰者、书者名一行，文十九行，铭三行，行二十五字，其中有三字因与前字重复而用‘、’代替，再除空格，实计五百四十九字。这篇墓志铭的字，一如李叔同的其他书法作品，也是法乳魏碑，气度雄深雅健，但结体已由早年的劲挺峭拔，趋于绵密厚重，达到‘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境界了，不过与晚年清疏高逸的风格相比，却仍然是雄浑的。在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书法作品中，这篇墓志铭实在不失为‘直闯魏室’的上乘之作。”

一块石碑，记录着两位中国美术教育先驱的交谊，记录着姜母强氏的一生劬劳，记录着鲜为人知的艺坛佳话，记录着跌宕起伏的时代变迁！

石碑尚在，幸甚！但碑未入土，姜母的坟安在？

四、姜氏宅墓考

2011 年 11 月 22 日，姜书凯先生陪同浙江省文化厅“姜丹书研究课题组”来溧，考察姜丹书旧居刘家边村，笔者、王田夫、沈佳宾等带路前往。

姜丹书在其“自编年谱”中言：“溧阳县西乡三十六里南渡镇之南五里大敦村，此村俗呼‘刘家边’，其实此村皆吾姜氏聚族而居，无一刘姓，盖昔当姜氏未发

族前，殆为刘氏之村落也。”

车进乡村，不知姜宅故址，遇村民相问，停车边上即是。我暗忖：“姜先生冥冥之中在引路？”刘家边村 67 号东面，有旧居屋基几间，残墙乱砖，杂草丛生，坐北朝南，门前尚存青石门墩一对，石长 0.75 米，高 0.56 米，厚 0.41 米；有蘑菇黑石舂臼一只，尚有原屋石构件横陈。殊为奇特的是，荒芜的屋基上有野柿树数株，枝粗叶茂，红柿累挂，松鼠窜跃其间。丹书先生平生最喜也最擅画柿子，《红到梢头甜到老》是其代表作。老宅惊现红柿，莫非敬庐魂归故里？课题组长尹舒拉亦甚为惊奇，返杭后在会上多次提及。

姜家族人姜锁开，26 岁赴杭州姜丹书家，乃民国廿三年大旱，和锁坤去谋生路，步行两天两夜始达。锁坤 7 个月就返溧，锁开一直在姜家帮工，至 30 多岁无妻，姜丹书介绍女佣诸暨人郭玉芳与其成亲。锁开儿子姜洪法（72 岁）那天没有在家，去南渡镇上了。其妻指认姜宅西南角就是丹书先生家祖坟，上有杂草乱柴堆没，并没见坟茔碑文。

关于姜家老宅，村人道出一段往事。丹书出外，屋空闲置，江北有逃荒而来陆姓者，暂借住入。抗战时，日本鬼子由小金山过来扫荡，见姜宅大门紧闭，久撞不开，乃破墙而入，恼怒之余点火焚烧，住户陆友祥冒死救火，拎了马桶当工具浇水泼焰，被鬼子一枪击中，当时他并没断气，拼命在地上爬行三里逃生，万恶的鬼子追上割掉了他的生殖器……

2013 年 10 月 21 日上午，溧阳市政协副主席崔文敏、市文广体局副局长徐国昌、文物科科长史骏和我一行四人，专程来到刘家边村，对姜母强氏墓地进行实地考察。

据姜书恺先生讲，其祖父母坟原在南赵河水利工程处，因开河通知迁坟，杭州方面因没有人手故没能回来，现坟址在哪里已不得而知。

我开始查阅相关资料。

清光绪三十年（1904），姜丹书 20 岁，“十月三十日深夜，父以痢疾卒于家，享寿四十九岁”。“十二月，葬父宅边西南隅之场园地，谐其音曰‘长远地’——吾父治堪舆学，自谓此地有佳穴，遵其遗嘱而葬之。”

民国六年（1917），姜母去世，“冬，由水道盘枢归葬于故里，与父茔合穴。在里再开丧，亲朋吊奠者甚盛”。在《为母营葬》一诗中，姜丹书写道：

丁巳仲春,母以胃疾弃养。仲冬,从杭州水道盘桓归葬溧阳西乡南五里刘家边村,与父坟合穴。

迎得板舆只六年,湖山颐养未安便。

哀荣运柩归粉里,祔葬佳城老屋边。

由此可见,姜宅西南角的老屋边应为其父母合穴之坟。

族人姜洪法告诉我们,其父母和丹书先生过往甚密,当年夫妻俩从杭州返溧,姜丹书曾说你们回去了住我屋、种我田。但其母不肯,其父锁开上山扛茅竹搭了间陋屋度日。姜洪发 12 岁时,其母曾返杭到姜家帮忙。

姜宅西南角应是其祖坟基,当年姜母归葬船由南赵河驶入,在村上啄嘴头这个地方上岸,相距 300 米就是姜家祖坟地。姜洪法四五岁时,姜丹书曾返乡扫墓,他一把抱着洪法往坟地上走,然后放下他,把长袍一撩,在坟前磕头。小洪法好奇:“爷爷,你为点要磕头啦?”姜丹书答:“男儿膝下有黄金!上跪天下跪父母。你还小不懂。”

姜锁开在姜丹书家呆了二十多年,他从杭州回来后,特地关照儿子、媳妇:“丹书先生对我家有恩,每年清明我们要替他上坟!”上世纪七十年代,村上要修路,想把两条河的桥对直建机耕道,姜锁开对已是村上队长的洪法讲:“洪法,这路正好要把姜丹书家的祖坟和宅基破掉,这地方绝对不能动!”这时,修路的线已放好,准备拔坟,姜洪法找到相关人员做工作,并请了两桌饭,路总算绕村而过。锁开活了 84 岁,临终前还关照后人不忘给丹书先生家清明“飘钱”。

姜宅西南角尚存坟莹三冢,其中有姜全仙(自来水公司供职)父亲姜天喜坟一冢,姜丹书堂侄一冢,其父母合穴一冢。具体方位为刘家边村 67 号陆月林家旁,北纬 $31^{\circ}25'25.2''$,东经 $119^{\circ}19'07.2''$ 。

在我们对墓址进行勘察时,村民陆东才(60 岁)说:“我外公是姜家人,他在世时曾讲过,姜(丹书)家的祖坟就在这里!”

我们在姜氏祖坟地前焚烧了特地带来的纸钱。一是对长眠于地的姜父姜母表达乡亲的悼念,二是对中国美术教育先驱、大师之丹书先生表达由衷的敬意!

溧阳,因姜丹书而骄傲!

附：《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原文

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

钱塘汪嵒撰 大慈演音书

溧阳姜君丹书将葬其母强太夫人，手疏内行，谒铭于嵒，嵒方有母之丧，捧状，俯而悲。悲夫丹书与嵒昔为孤露同，今为鲜民同，而母氏劬劳，饮冰茹蘖、机衽之教、门闾之望，亦无不同。呜呼！其何忍弗铭。按状，太夫人溧阳强氏，父艺山先生隐居行义，以经术鸣于时。太夫人幼承诗礼之训，故能箴管内则、衿纓闾仪，自笄以至于笃老。生二十一年，归于姜府君，府君方劬于学，太夫人承将于舅姑娣姒间，周规折矩，悉合礼度，相府君邃学而有成。归三十年而府君没，太夫人泣血襄事，置墙翼、罄衣珥，诏丹书曰：董荼之苦、井舂之瘁，吾自甘之，汝惟媵壻厉学，毋辱我先人！今丹书德建名立，绩世而有声矣。呜呼！观太夫人之所以为女为妇为母者，又何与吾母之所以为女为妇为母者更无不同耶！风木之痛、杯棬之怀，嵒与丹书共之，亦惟衔哀茹血终天而已，嵒又胡忍不铭？铭之不独以昭太夫人之贤，而吾母更藉太夫人以俱传也。太夫人生于清咸丰乙卯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中华民国第一丁巳闰二月十一日，享寿六十有三；府君讳宝廉，赠儒林郎，孝义有古君子风；女一，适宋恩深，贤孝见称于乡里，先太夫人卒；子一，即丹书，以优级师范生授京职，教授于浙，卓然人师也；孙二：书梅、书竹。是岁十二月，将奉柩返葬于溧之大敦村长远阡，与府君合墓，莹兆相度，受之府君，金曰佳城。乃铭曰：

耸高阙，镌灵碣。今母师，聚营魄。孰母师，彼美姜。
行琚瑀，言缣緼。肃柔笄，饋交贺。虔脩腆，劬织火。
哀缠酷，茹荼蓼。教胄子，子式谷。考终命，媿显融。
返灵车，江之东。长远阡，风萧然。乐长夜，万斯年。

纪闻轶事杂摭

乾隆《溧阳县志》“杂摭”辑云：“正史之外，不废稗官，所以备参考、扩见闻也。《语》云：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荒渺无稽，学士大夫难言之，若乃事非习见，言固可传，片纸零星，亦当蒐载无遗。为集杂摭，附诸简末。”

溧阳为长寿之乡，源远流长。

明朝洪武初年，有彭子美的妻子李氏，享年 118 岁；其孙彭真年 109 岁，孙媳 102 岁，一门三寿星，都过期颐之年，均为人瑞。（据嘉庆县志、光绪续志）

溧阳状元公马世俊云：“余览邑志有云：邑为李白所经，故多文；为伍员所经，故多武。”

钟离权，唐咸阳人，以草书闻名。明焦竑撰《焦氏笔乘》有记：“淳熙十一年（1184 年），溧阳仓斗子坐盗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书二轴，题云：‘庚申岁书’，其名权花押，正如一剑之状，盖钟离翁也。词云：‘露滴兰芽玉满畦，闲抛象屐到峰西。但令心似莲花净，何必身将槁木齐。古堑细香红树老，半峰残雪白猿啼。虽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满蹊。’李粹白跋序：‘字画放逸，有翔龙舞凤之势，脱去寻常蹊径，飘然神往风度也。’真本藏建康府治年资库。一作唐僧贯休诗，见《弘秀集》。”嘉庆《溧阳县志》“纪闻”辑亦有此记，摘自《夷坚志》，并有“绢素裱饰处皆断裂，字画不动”之述。

赵葵（1186—1266），字南仲，湖南衡山人，抗金儒将、画家、诗人。宋理宗时授右丞相兼枢密使，四次上表坚辞，归隐溧阳。

溧阳西南郊湾里水西，是赵葵及其子赵准的府第。马世俊的《水西祠记》云：“南仲公初罢相，治第水西，高台广榭，卧游其中，赋诗枕簟，侍婢糜酬，诂非一世之豪风哉！”赵氏在溧有南北两府，南府在今老省溧中、老机电厂一带，北府在北固桥外光华中学一带。水西之第，应为其避暑之处。

马世俊云：“数百年后，马子读书其中，时徙倚水涯，凭吊风烈。昔之游鱼碧藻何在乎？翠云绿莲何在乎？牙旗戎卒、千百其伍者何在乎？荒藤断梗，依井罩涂；饥鼠野狐，晨趋昏见。世代几何？而废兴若此之连耶！”仅几百年过后，昔日豪宅，化为荒芜，荣华富贵，过眼烟云。

马文中所言翠云、绿莲，乃是人名。元兵东下，赵准曾招募义旅，积聚粮草，在长荡湖？昆山一带设寨抗击。后在淮东因力穷被执，慷慨骂敌，阿术将他砍头弃尸江滨。翠云、绿莲两妾抱着赵准尸体跃入长江，以免玷污，何其烈也。

马世俊言准乃葵子，后文均言侄。两妾抱尸跳江，后文言抱骨灰瓮跳水。

现湾里水西，为赵氏世居，村民多为赵葵后裔。

乾隆县志有记：赵南仲丞相赐第溧阳，尝避暑水亭，有诗云：“水亭四面朱栏绕，簇簇游鱼戏萍藻。六龙畏热不敢行，海水煎彻蓬莱岛。身眠七尺白鰕须，头枕一枚红玛瑙……”六句既成，忽睡去。时有侍婢梅姐、杏姐戏续云：“公子犹嫌扇力微，行人尚在红尘道。”南仲见而存之，颇得诗人之旨。

后人录葵诗，均将最后两句载入，却未注明出处，分明抹杀梅、杏两姐功劳，也少了不少情趣。

赵府中曾养四只老虎，虎圈近火药库，一天焙药遗火，众炮忽发，地震屋倾，四虎悉毙。

陈名夏在《施赢闲传》中言：吾乡自国初迄今以贵雄喜讼斗，若夫彬彬称文学者，不数见。

施赢闲发愤为学，在童子试中崭露头角，孰料家父去世，家道中落，寡母倚养，他只能绝意进取，学为躬耕，以孝名闻乡里。他老了以后恨自己未能走访名山大川，譬如邑中的芝山，据传是梅福隐居之地，他难道没有后人吗？他有后人

未能相见有多遗憾。他把这种对山水的热爱,转移到书画之上。当时溧阳有两位画家强鹿庄和芮筠庵,都得法于米氏父子的画法。鹿庄公去世,施赢闲毫不吝嗇地花大价钱购买其画。筠庵公和他交往时,两人相谈契合,为他画了许多山水林木,施公也拿出自己的收藏交他鉴赏。公曰:“吾老不及策杖远行,然心切向往之,存此以当卧游也!”

一介农夫,心寄山水,足不远行,观画当游。施公,懂画者也,真藏者也!

彭印山,名寿之,五岁就能写大字榜书,会作五言七言;八岁的时候,元朝成宗帝于大德己亥(1299年)召见他,让他赋诗,称旨授予文学侍诏,出入宫殿,是为神童。六年后,皇帝赐他返乡省亲,不幸溺于河中。作为神童征召,他应制诗中有云:“金貂帽煖风无力,银鼠裘温雪有姿;仙人坐处翔丹凤,王母来时下翠禽。”都是警句,不愧溧阳神童也。(据《乾隆县志》)

姜丹书先生在《印南印存》序文记:宋葆麒,字羲樵,别号印南麻公,溧阳名士。清光绪年间廪膳生。科举废,学校兴,他与同仁兴办尚志小学,卓然有声。辛亥后,他继姜丹书后主持本县学政若干年,生性淡逸,不求功利,言行诙谐,品茗清谈。雅好治印,风格在邓石如、赵之谦之间,可惜长居乡里,外人很少知道。宋葆麒遗有印存一长卷,抗战时流落到县西前川村,被朱叔寅所见。朱是城里人,带家眷避难于前川,此君笃嗜文艺,对于乡彦的艺作尤为关心。在日本鬼子进城之际,抛弃家业毫不心疼,但一见残纸,不忍心让其湮没,于是斥资收留此印存,并遗印三十余方、遗砚一方,以图流传不朽。此时正值战乱,姜丹书逃难返乡,朱叔寅出示其物,说准备装裱付印,请姜先生作序。

文人之癖,入心蚀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家业可抛,艺宝不弃。爱乡爱艺,朱君姜君,昔时义举,今之楷模。

方山,甚僻,人迹罕至。

有出入云间的僧人印林,结缘筑舍百余间,方山得以出名。开始时山上没水,要走数十里去挑,后印林在精舍之右发现泉水,汲而不竭。精舍之南,有巨石耸立平地之上,像发怒的石马要奔驰而去。马世俊和当地朋友二三人,坐在巨石

上,发现数百步外乱石丛倚,其必有异,指着问僧,僧答此为青龙洞也。随后带着锄,斫棘前往,此洞很大,广可坐百十人,众多怪石千姿百态,层累变换。马世俊让僧人攀石而上,望之如过海罗汉出没在苍烟绝岛中。

僧人告诉马世俊,印林初来此山,没有一间屋,曾经在洞中住了二个月,没有人知道。印林三十岁,经常往返云栖、天目、四明、雁荡诸山之间,所以看方山不在话下。既而又赤足入燕,沥血写经,名动都下。选历名胜,驻锡方山,而方山已存在千万年,自印林来了才传扬开来。不远处的芝山,秀甲溧阳,洞壑之胜尤奇,为什么不如方山有名呢?后来只有人先到了方山,才知去芝山观游。

名山大川,锦绣奇观,赖人文得传。马状元的言论,乃文化是根之理。

陈名夏为我们描述过一幅溧阳城游图。

城河穿春雨桥而过,折入学宫的泮池,在灵雨亭右出跃龙关。学宫东为城隍庙,再东为太清观,又东为前邑宰。灵雨亭为城中嘉观,楼台映带,丹碧照耀。如是舟游,从秦桥(夏桥)荡桨入关,水声泠泠,鸣于关口,溪迴岸边,有亭翼然,舟泊亭下,仿佛武陵辋川。如是陆游,从春雨桥(中桥)沿河岸徒步而行,瞻仰学宫,心目敞爽,登文昌阁,然后下来,得径甚幽,有城门曰“借景”,有庵叫“如庵”。

陈探花描述的是春雨桥、学宫、文昌阁、灵雨亭一带的溧城名胜,令人神往。昔日之景,烟消云散,仅见文字,扼腕惆怅。

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二十九日,文人县令陈鸿寿到溧阳任职。

嘉庆十八年春正月,雨雹。十九年夏,旱,大疫,地生白毛。二十年夏五月,飞蝗蔽天而过,不为灾,一直到秋,历时一年。真可谓多灾多难,但曼生募捐赈灾,活人无算,治行为江南之最,功德泽邑,不能忘记。

张庚的《国朝画征续录》记:溧阳马世俊善山水,好作巨障,不专师法而自出杼轴,耸拔夺目。同邑吴颖并称于时,又有宋邕同,岁贡生,写意花草笔致天然,兼工书法。

明朝洪武年间,有位叫徐文英的溧阳人,由岁贡考升为御史。宫中有一位受

宠的太监犯了死罪，就从徐文英家乡请他父亲进京为其说情。一天徐正在侍朝，仆人忽报其父来了，他知道是为太监的事而来，但坚持上了弹劾的奏章才归寓所，见到父亲说：“来不及（救他）了！”第二天一早，以百钱和草鞋两双送父亲返乡，一送数十里，错过了上朝。当时法纪很严，朝廷抓住徐文英问话，徐如实相告。太祖命人追上他父亲对质，见百钱尚在腰间，草鞋一双在脚，一双在衣带。太祖对他表示敬意，见他衣袍双肩已破，因此命宫人绣了“穷御史”三字于袍上，大家对徐文英愈加敬佩。（《乾隆县志》）

姜丹书和郁达夫相识于民国八年（1919）日本名古屋。民国廿三四年，郁达夫为姜的《丹枫红叶图》卷题诗：“难得多情范致能，爱才贤誉满吴兴。秋来十里松陵路，红叶丹枫树几层？”其时，郁与王映霞住杭州大学旁，伉俪情深。姜于民国十九年因妻故，后娶红君，将住宅唤作丹枫红叶楼，一时名流齐聚，《丹枫红叶图》有诸多名士题诗作画，成为美谈、宝卷。

狄平子言：余所心得者，惟山水一门。花卉人物，则已不敢自信。因余于山水佳者，尝自临摹，而花卉人物则未曾命笔故也。是以未尝谓不能作画者，必不能深悉其中之奥蕴。即号称能识画者，亦仅能得其皮毛已尔。余之于花卉人物亦犹是也。盖其中艰苦，非过来人不能道也。

宋之绳在给友人杨五爷的信中言：弟废锢乡村，无从得达，然此心萦系不可言也！忆昔杯酒笑谈，靡问晨夕，舟中马上，接肘连袂，何分尔我？而一经睽隔渺矣！山河能无望烟树而兴思乎？

山河破碎，友朋远隔，从朝廷高位沦落乡村闲居，凄苦之情溢于言表。

燕山形如飞燕，故名。

马世俊带着学生登山，山上有歇脚小亭，亭前有两庵，僧人种竹穿渠，潇碧相映。僧人出来邀请他们用斋，马世俊推辞，说等爬完山索要一壶清茶吧！披草棘，上巉岩，历数峰，见燕之左右翼之相系，首尾之相应。他与诸子见遥峰叠翠，波光塔影。他对学生说：“君子之进于道也，虽期是以往，而将来之所得或更有加

于是者，可以目前所信而遽谓已足耶？今日之游为不虚矣！”言毕，僧人出竹径迎曰：“茶熟久矣！”马世俊饮尽一盃而别。

光绪四年戊寅年(1878)夏，有虎出没燕山之麓，一日而毙二人，行人戒途，虎亦不知所往。

嘉庆溧阳县志选谢天选诗五首，但不知其生平。

陈名夏有《谢公素庵传》云：公讳天选，号素庵，新昌里人也。公少好学，治举子业，随弃去，学为古文诗歌，遂以诗名，家邑人士皆称诗人。

谢天选向陈名夏推荐了业师汤筑夫。名夏出城返家，必经新昌，都要停留谢处。后来他返乡省亲，谢也必来看他，交往有十多年。有一次，陈名夏将赴金华，谢公召他见面，说：“子行矣，求山水，勿求金钱！”名夏到了杭州西湖，夜里梦中谢天选向他求挽诗，他也得了几句，醒后却忘了。回到故里，谢天选已去世了。过三年，陈名夏科举考南宫第一(会元)、又考进士第三(探花)，历官至编修、修撰、户兵两科都给事中。但甲申三月之变，他逃回乡里，又为南明马阮为难捉拿，出逃，行程万里，可惜谢公都看不见了。

谢天选生平喜交友，但不妄交，仅汤筑夫、钱玄溪、刘雪筠数人，他有诗集若干卷，藏于家。《溧阳古诗选》有《归得园》、《冶山寺云版》等五首，见其对家乡风物名胜十分熟悉。陈名夏言：“予欲传公则益愧，而又恐后之人不知有公也。”看来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狄平子论画：中画入手既难，而成就更非易事。自元迄今，称大家者，元则黄王倪吴，明则文沈唐仇董，国朝则四王及恽吴，共只十五人耳。

凡学中画而能佳者，皆善书之人。试观石田作画，笔笔皆山谷。瓯香作画，笔笔皆登善。以是类推，他可知矣。若不能书，而求画似，夫岂易得哉？是以日本习汉画者极多，不但无一大家，即求一大名家，而亦不可得，识此之故。

马世俊对洮湖(长荡湖)描述甚精美：予邑洮湖在五湖为最僻，而大涪山孤立其中，宽闲寂寞，若在无人之境。然其地为予邑及金坛、宜兴之界，而三邑又分隶

三郡，以故山虽一卷石，而所系于封域甚大。山顶有寺，兴而废，废而复兴，年月多不可考。

当其日霁沙平，水天同色，村墟可数，烟树如织，绿波澄泓，翠岫竞出，雁鸿堕影而参差，凫鸥相迎而唼喋。尔时尘埃远去，而定慧以生，似同佛界于我界也。当其风雨乍至，狂涛拍石，一木怒号，千帆俱失，蛟螭翔舞，鱼鼃跳踯，芦荻乱鸣，洲渚灭没。尔时戒心风波而乐依寂静，又可同我界于佛界也。若夫鼓客楫于中流，来贾船于返炤，湖光就晦，山月未上，凌万顷之浩渺，顾彼岸而茫如。望峰头之一灯，听钟声而夜泊，行者环山而行，止者依山而止，溯慈津而瞻宝炬，佛界与我界无不可同观也！

状元郎之文笔功力，令人叹服。

关于伍子胥与金瓜子之事，姜丹书先生有述：按《建康志》载：溧水一名濑水，东流为永阳江，江上有渚曰濑渚，即子胥乞食投金处，东流为濑溪，入长荡湖。这些地名，均在今江苏溧阳市境（溧阳县起初甚大，后来又析出溧水、高淳二县。上文所说溧水二字，是指原始的溧阳境内的一条水名，不是指今溧水县。此水在春秋时代很辽阔，故称濑江，后世疏浚水道，才分成湖荡、河道和田地）。所谓子胥乞食投金处，确在今溧阳市西三十六里的南渡镇西北数里之间。此处在那时所谓吴头楚尾。

（贞女祠）在清亡之前，历朝定制每年春秋两季派典史去祭。

（金瓜子）据父老说从前该地的渔民农民往往偶然有获，远的且不谈，最近最确实的乃是在国民十几年江浙军阀内战时，木杓兜村上有人锄桑地而掘得一颗金瓜子，便跑到城里向银匠店兑去。他们只知可兑三五元银币，还要办一个祭事，所余无多，哪知它可贵的乃是历史性的无限价值！过了几日，传到我族兄姜荫球耳中，他便立即至该店去想转买，可惜该店说已经融化掉换入首饰了！此事他亲口告诉我，绝对是真实的。也就可以证明伍子胥乞求和浣纱女投江的故事是真实的。

杨伯玉，科举高中进士，朝廷按例要封官许愿，但他坚持要求教职，由桐庐教谕转杭州府教授。他惜才识才爱才，当时年轻人有徭役，他力争废除，教学生如

同教子女。后来他的门人不少登第做官，想谢恩师，但杨已去世了。弟子为他树碑，住在墓旁祭奠他。杨伯玉的儿子杨逊，由贡元选为福建兴化、莆田县教谕，升江西丰城县知县，任期满后不再做官，笃志好学，诚其父遗风。

李远庵，名师，溧阳史氏请他教授弟子，年薪八十金。史家怜惜李先生家贫，到年终另外发点“奖金”给他。李只取聘金，余钱挥之不顾，教授如旧。后来李考中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副使。归老后仍然当私塾先生，在溧阳、高淳之间奔忙，因为家里贫寒，需要自给也。

教书先生，似李老师，学生有望，国家有望。

宋之绳困居故乡，务农求生，孰料大灾，民不聊生。他在给乡友吴颖的信中说：“盟兄高第，复登瀛洲，海内有知无知，俱当为文章庆、为世道庆！”“家乡存饥，死徙将尽，控告无路，切身之痛也！盟兄居都下，应念里闾，公郎来自能切切道之，留意救此一方，是弟所百拜而恳者矣！”

居庙堂之高忧其民，退江湖之远忧其君。宋榜眼之信，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溧阳关帝庙新建戏楼，进士陈时泰作记云：金人立国制为院本、传奇人之，人人所好郑伟之声、艳冶之形，以深入其耳目，而穷乡僻里之贩夫饮妇不识史记者，皆相啧啧曰五娘糟糠、云长秉烛。戏楼之设，安在不可以兴观君怨、与孔子学诗之训而同功也哉？

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同此理也。

春雨桥，三国赤乌年间兴建，邑志载宋嘉定年间加固重建，明嘉靖二年和崇祯四年再建。旧称春市桥，嘉定修桥始时久旱得雨，改名叫春雨桥，俗称中桥。桥开始为木桥，又是砖桥，又建为石桥，后来改为沙石。桥越建越高、越坚、越漂亮。明嘉靖以后桥一直失修，乾隆年间倡议捐修，“吾溧之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私者，能不起而从之哉！”“椎凿之声不绝于耳，牵挽之夫不绝于路。二三任事者，昼则立赤日中指挥匠作，夜则会计筹划久而弗懈。”“桥之上车如水马如鳞，负担之徒肩摩踵接。”

春雨桥，即今东风桥。“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文革”产物也。不过也合，东风化春雨，润泽一方地。桥的变迁，史书一部。

陈名夏于癸酉高中举人，参加进士科考。他听说有位叫胡泌水的相师，谈星命多奇中，有的考生已位列公卿，他便去胡家拜访。胡泌水一见他就言他必中第一人！但接下来的甲戌、丁丑两科，陈均落第。胡几次私下叹息，自己的占星术不灵验了？郁郁不乐了很久。时至癸未，陈名夏到长安，泌水喜而迎之，告诉他：你如不为第一人，我卷帘歇业停讲！这年，陈果然考中南宫第一，后又经廷试成为进士第三，即探花，并读书翰林。

溧阳南有秦山，据说是秦皇经过之地。西峙伍牙山，有庙在焉。北有石屋山，欧冶子铸剑之处。但有一子母山，知道怎么来的吗？

韦村，山村也，蒋以兰带着老伴葛老太，在此引泉种竹，耕凿其中。明末弘光二年(1645)的“乙酉之变”，天下不太平，清兵打下南京城，南明二三十万大军溃散逃亡。有阮晓江及妻彭氏，侍奉翁都谏避乱来到这里，但与蒋葛夫妇从来没有打过招呼有过往来。一天，阮晓江陪翁都谏隐匿到句容深山去了，彭氏和侍婢躲避到蒋家园中来，蒋家起初不知道，直到强贼突然闯入，彭氏见没法跑掉，便要投入水中守节，葛老太出来一把抱住她大哭道：“来的都是亲戚，绝不会侮辱我女儿的，你为什么要投河啊！”贼人谩骂葛媪，用刀挟在她的颈脖上，强行要将彭氏带上船！葛呼：“这是我女儿！”彭氏也大喊：“这是我母亲！”两人紧紧拥抱仿佛生离死别！强贼见状，信以为真，松开了彭氏。事后，葛彭结为母女，安居山中，看到她们的人都称赞道：“其子也洁，其母也贤，节义如此，山光霭然，无愧子母之名！”于是，山便命名为子母山。

己卯早春二月，溧阳邑大夫率百姓在东郊举行迎春仪式，箫鼓大作，士女喧杂，好不热闹。马世俊闭户不出，抱着刚去世的降儿尸体痛哭。等春游的人群返家了，他才送儿出东郊之外。因为家贫没钱择地，只能将歿儿埋葬在瓦砾中；因为带的仆人不，多，坟仅挖了一尺多深。突然，异风起，云压城，木梆子哀鸣，店家纷纷关门。马世俊一个人孤单回家，打开门，再也听不到降儿的啼哭了，哀哭在

灯下的，是降儿的母亲！

过了三日，马世俊出东郊给儿子坟上加土，他边壅土边哭诉：我们生你时，你的哥哥尚在襁褓，夺下兄吃的奶乳你。你哥痘先发，又夺下你吃的奶乳兄。你枕在侍婢的手上十昼夜，屋冷地湿，你发痘先亡也！贫家有子，不能两全，抱你兄在怀，不曾想你十天就去世了。早知晚生你六月，或晚怀你一年！哭你有泪，埋你无钱，数尺之布，数两之绵，仅此而已！你有宥、容两兄弟在前，不是父母偏心，生死聚散，无愚无贤，聊以自解，心似油煎。

马世俊的哀儿辞，真正揪心伤肺，催人泪下。

史蛰夫，硕学笃行君子也。

他是一代良师。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学制罢，越二年，先生倡办尚志两等小学校及溧阳第一女子两等小学校于县城，自任校长，兼教国文，尽义务五年，后又赴常州、苏州、无锡师范教书，任事三十八年，造就英才以万千计，鞠躬尽瘁！

辛亥革命时期，溧阳邑官逃走，新官又未上任，人心惶惶。史蛰夫倡组地方过渡政府，以维治安。文则创办报馆，领导舆论；武则创办民团，震慑流寇。事成之后，他身退恬淡，不想做官，以教育事业为终身追求。

先生精研经史古文辞，著有《六书综》三十卷，字字手抄，每一字以正体为纲，古文钟鼎籀篆各体书法搜罗赅备，一一隶次其下，付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另有《国学概要》付梓行世。

史蛰夫死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六。死前，姜丹书先生雇马车急送医院抢救，是为挚友也。姜先生的《史蛰夫先生行略》中备述其详。

记得史先生的人，寥寥也。若无丹书先生的文章，吾辈无从知晓。但史先生有一后人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他的重外孙女，著名电影演员陈冲。

康熙溧阳县志载知县徐一经言：“(溧阳)江左声名文物之会，故虽百里小邑，冠盖甲于大郡。”“兹邑诸旧姓，或为世禄，或为巨家，代有更变而族无凌替。谓非前人培养之厚，奚致此乎？又若高昌畏吾之族，曰偃、曰达、曰普、曰把，其先皆出异域。”

此几姓氏，皆溧阳少数民族后裔也。偁普两家，在杨庄沙涨村定居，把姓在东门外有把家村，上沛亦有三村百户；达家在泓口、前斑竹、竹簧等都有分布。他们都是畏吾儿人之后代，但经多代同化，已分辨不出相貌特征，偶有异相，实属少数。

溧阳歌岐周氏，望族也，人丁兴旺，有十三村之说。

周氏定居溧阳，在宋末。歌岐周家，祖先为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周必大。其子周纶，筠州知事，纶子思仁，罢官居姑苏之阊门里，遂不思归。思仁生敬章，敬章生申，申生明，明生原三，原三生岐隐。宋岐隐在南宋末携妻、子隐溧阳之歌岐里。

周必大当年曾几经溧阳，在三塔荡留下诗文。不知此时他是否想到会有子孙一脉繁衍于此地呢？人世沧桑，当有夤缘。周文忠公亦为吾祖，外公周域生，歌岐南圩村人也。非高攀，乃血脉。

溧阳探花黄梦麟言：溧阳城东有广教寺，建于唐，更名于宋，明正统、嘉靖年间屡兴屡废，清初有行鉴和尚恢复更新，之后六十多年修举乏人，又被某僧溃坏，以致缙流云散，绀宇榛芜，盛衰循环之数，虽佛法亦有不得免者！幸有晓堂和尚，继承临济之传衣，主龙池山之法席，剪剔荒芜，施者垒集，不数月堂庑斋寮补之，塌圯之处修之，使庙宇灿然改观。恰逢皇上（康熙）祝寿，于是寺改万寿寺。

马世俊在《夜酌小柬》中写道：良辰已届，嘉月可陶，过舍倾倒，烛消人倦，漏色将尽，天色鳞盼，渐见晓色。相送出门，日高已数丈矣。此乐何如哉！

宋之绳在给李小有的回信中写道：燕市悲歌，文场痛醉，廿年一日，如时时见。先生肝胆意气也！南中晤对，又隔十年之外，去岁邗沟正如失路，风雨蹉跎，遂垂良观……奇荒荐饥，若加意与病魔为祟，把犁荒村，作辍相半，暑月沉疴，闲门憔悴。忽捧手书，顿爽心目，先生意中犹有小子弟，窃以为异数矣！

陈名夏写信给马世杰（万长）言：圣天子临太学，环阶听讲经义数千百弟子，

恨我兄丈未能与此盛事也！……昆仲称邑中高材生，屡困于秋试，殊不可解。若早来长安，偕诸英杰抵掌论议，必更有万丈光炎！又以读礼留里门，深为叹息。愿兄丈善自爱垂云之翼，历九万里风，斯在下岂只尺观乎？坐卧松亭，怀人濼上，不识何时握手道宿昔也！

乾隆县令邹廷模记曰：县治迤西过凤凰桥三里，有胥渚村。村之西北隅有聚奎桥，桥之东为文武帝君殿阁。余视事兹邑，稔知胥渚狄氏素称平陵诗礼世家，尝至其里，桥梁庙貌，虹饮翬飞，虽曰胜地名区，而亦系乎其人也！

唐霞轩，城西唐家村人，清光绪廪贡生，绝意进取，在西门河沿设帐教学，姜丹书十七岁时跟他学习。丹书赴金坛应试，水道需二日，先生每次伴送监护，比父母还亲。丹书灯下用功，唐先生半夜披衣而起，柔声催他睡觉。平时见他夜读，则轻声回避，生怕惊扰，一腔慈爱，令学生感激涕零！后唐先生赴北京入大清银行供职，不久便退隐乡里，抑郁早逝。

康熙榜眼任兰枝，为乾隆县令吴学濂重修尊经阁作记云：我溧阳庙学，斯古于构于作，肇元蒲候，阁以并兴，继在明世，乡大夫孟河马公起而新之，爰有重建。百余年于此矣！圯乎？岁月之久！剥乎？风雨之深！泽宫遥瞻而慨然，子矜相顾以增叹。乾隆壬戌吴侯治邑，既数载，人和政修，庶理孔成。念教学之为先，思经术之宜振，不有更造，何表奋兴？于是谋其缙绅与县中诸生，鳩召工佣，计庀财费，不劳不匮，期年而落成。

马世俊与萧云从过往，有记：忆昔己卯秋，余谒萧子尺木于秦淮寓，邂逅论文，即称知己。论文之暇，娱情六法，两人各有短长，而萧子于黄一峰、梅道人临摹尤善。自后，余特访于区湖。相别二十年，今春丙申，萧子自区湖过夏林彭园，二三知己，赋诗染翰，洵称胜事。时儿子宥读书夏林，亦得追随杖屦一日。

周仁寿(1858—1929)，歌岐后村人。出生贫苦，在城里开设茶馆为生计，十年中结识各色人等，处事圆滑。因假造铜筹罪逃避异乡，于清末最后一次乡

试偷回溧阳，疏通关节，录为举人，于1906年分发莒县知县。任中，他禁除鸦片，禁止赌博，提倡慈善，修补城墙，兴办教育，被调升胶东道道尹，莒县百姓送“万民伞”，立“去思碑”。后任民国赈灾委员会职，内定浙江省主席，因病死于上海。他对家乡溧阳做了不少善事，自费重修秦公桥（夏桥），修建旧县西大石桥，兴建周氏祠堂，为本村农民办纺织等作坊，筹办歌岐小学。他一生经历晚清、民国、军阀几个时期，三次仕莒，两次升迁，可谓传奇。

溧阳之有育婴堂，是乾隆吴学濂创始。“惠婴儿之不得其所者，谋建堂以育之。”“邑之东南隅有屋若干楹，藉淫祠田若干亩，以备乳哺之用。”“独育婴之堂，前此未有，有之自我公始也。”（陈大伦《创建育婴堂记》）

宋之绳晚年备受痛风折磨，生不如死，在给友人信中言：弟病弥深，自顾此躯活亦无味，但未死之际痛苦难耐！即如开岁以来，未有两日能以足履地，穷居僻陋，朋友笔砚之事已与判绝，而病在髀膝上下，但不能行耳。饮食非是痛极时仍是平常，乃皆在枕上哺歔。如此生趣何在？里中人不见谅者，多以为伪，弟又懒于榻前见客，故一切谢绝。

太白楼，溧阳之名胜也。

吴湘皋记曰：溧阳酒楼，在旧城，太白赋诗其上，后人遂名为太白酒楼。唐末城移今治，楼之址不知的在何所矣。太白奏“清平调”后遭谗放逐，足迹几遍东南，凡所游览觞咏，各郡县分载遗迹及诗于志。

溧阳探花郎任端书记：太白之名既千古，其昔所饮酒之楼亦千古。在其地者，得之为光落落然，若众山有岳而杰出也；又若太白方醉于此，而意凌云霄如昨日也！嗟乎！是乌可使废哉？凡楼以太白饮酒传为后人所重，爱而称道者三，曰任城、曰洛阳、曰宣城。宣城之楼，唐沈光记之文甚逸，足以扬太白。其在溧阳者名少闻于时。然翼起令署东，偏踞郭门，瞰流水图经。县志沿注翔实，意其还自夜郎，辞参谋，往当涂依李阳冰，渡牛渚至姑孰，时经行所醉游也。

马世俊评价马一龙书法，云：孟河太史书法直逼山阴，而体格稍异正，其屹然

自命处也。草圣纵横不可端倪，如神龙出没云烟，支股间断，益见飞翔缭绕之奇。余习诸名家书，即仿佛门户，独摹符太史近三十年，更笑画虎矣！诸帙皆神妙，三十年哀聚，以选其尤者。

又：前朝书法，以先太史为规矩无疑矣。故人陈芝山先生尝语余曰：少时不知书法，每为凤州所惑，以马孟河太史书为八法中魔道，及晚年寝处而摹府之，始信太史用意真逼逸少神明，观如淮阴兵法，自合古而人不知也。芝山为蒙宰时，一切馈遗皆谢绝。有持太史真迹至者，倒屣迎之，且为指点运笔变化处，虽尺幅中经以细楷，必数百言。芝山尝藏二小卷，今已失去。余尝论：知书者难，知而能藏之者尤难。况岁月迁代，兵燹消沉，金石之存几何？遗言轶简，大抵化为烟云矣！

马一龙有《宿太虚观柬储子实》诗一首：“白龙轻渡一舟平，夜泊仙家隔市城。林鸟惊巢山月出，溪鳞跃浪水风生。感怀欲弃人间事，对景应忘病里情。明日太虚还送我，烦君须记玄时程。”

马一龙有《歌者王文》一诗，叙昔日优者之辛酸：“梨园人老玉华宫，谁惜何堪旧面容。流落风尘千万里，归来不得见列宗。”

康熙县令徐一经，在县志《轶事志总序》中言：三百篇之外有逸诗，今古文之外有逸书。搜奇索隐，何可谓九州外无九州也！故言有正史无传，而集见于偏纪；事有土人未谙，而旁出于秘函。此鲜见寡闻者所讳，而博雅之士，盖不忍或释者矣。

一件洪宪年间的讨袁轶事

溧阳地处吴楚交界，民风淳朴，崇尚礼仪，英贤郁起。在柔和的吴风吹拂出人文的温润儒雅之时，刚劲的楚韵也曾嘶吼着胸膛里的铿锵激烈。山和水，刚和柔，在这片土地上演绎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

《金陵新志》记：“（溧阳）有伍子胥之遗迹，故其俗多义而勇。”尽管史事如水流逝东去，尽管先人如山静默无言，我们不应遗忘。

溧阳的竹簧桥是北边的大镇，东与金坛接壤，西和句容交界，瓦屋山、丫髻山横亘绵延，丘陵起伏，物产丰饶。自古至今这里是交通要道，古时通往金陵的官道从此经过，故历来商贾云集，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宋时，山阴陆游之子陆子遯在溧阳做县令，看中这里山清水秀，其次子陆立基，举家定居下来，留下陆氏一家宗脉，留下陆篴一片村落。

话说这民国初年，竹簧桥街上有两个大商户，一位叫李培生（音），金陵籍人士，经营南货经货、酱园糟坊，生意做得蛮大。另一位叫查金刚（音），乃安徽泾县籍人士，开经货店、南货店，买卖十分红火。李查两位，虽都是生意人，但肚皮里有墨水，学问都不错，而且都关心时政，关注民生，算是有识之士。

竹簧桥水陆两路通畅，地名有南关、北关、西关，却没有东关。据说这大河上原来没桥，河边的竹子生到对岸，竹节相结，相连成桥，故名。李培生开的“李元盛”在南关，查金刚的“恒源顺”在西关。你敲你的锣，我唱我的戏，各做各的生意，大家客客气气。

天有不测风云。

辛亥革命胜利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百姓额手相庆。孰料，窃国大盗袁世凯却又做起了皇帝梦，他倒行逆施，阳奉阴违，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卖国求荣，试图让历史的车轮倒退。1915年12月31日，他

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年号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即日登上帝位。

在经济上，袁世凯竭力维护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巴结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将沉重的税赋强压到劳动人民头上，造成商不堪税、民不聊生的局面。1915年12月25日，云南督军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贵州诸省纷纷响应，讨袁之战在全国蔓延开来。

李培生是位颇有正义感的商人。在讨袁护国之风吹到竹簧这个江南偏远的小镇，他痛恨“新皇帝”的厚颜无耻，痛恨新政权的苛捐杂税，思忖着得有行动来揭露暴政，唤醒民众。但怎么做才好呢？

一天夜里，收店关门，他叫来女婿周某说有要事相商。一灯荧然，街静狗吠，他对女婿耳语：“你去多写点反袁护国标语，四处散发，再贴到各地的告示墙上！”周某脸孔煞白，哆嗦着说：“岳丈，这可万万使不得！被官府查出可是杀头之罪！我不敢，不敢！”李某厉声斥责：“亏你还是个七尺男儿！竟胆小如鼠。袁贼祸国殃民，税赋这么重，害得我们生意都做不下去！你若不听我的，那好！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女婿！”周某遭一顿抢白，知丈人动了真格，忙说：“你老息怒，我去办，一定去办！”

周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无眠。一大清早，他便找到另一家经货店老板狄某，两位密友挠头抓耳，商议半天。后来还是狄某出了个点子：“这标语不好由自己写，找一家偏僻的小书坊，请人代写！”于是两人找到竹簧桥街上一家小书坊，私语要写什么样的标语。那书坊的先生惊得嘴半天没合拢，眼镜掉到鼻子下，死活不肯写！周某一脸焦急无奈，狄某咳嗽一声，说：“你尽管写就是，有事我们顶着，不关你屁事！至于酬金嘛，好说！三天后我们来取货！”

三天期到，重金之下，始得标语。李培生拿到女婿送来的标语二千多张，立即雇了一条小船，沿运河而行，到杨巷、戴埠等大镇张贴，小船舱下面是传单，上面是盖着稻草、蔬菜，不引人注目。他们往往乘人不注意时散发张贴，有时来不及贴就到人群聚集之处一卷卷散发。他们从小路进溧阳城，停靠县衙门后的后仓门，在官船停泊来往的“接官亭”处张贴散发，又到渡船口如法炮制。讨袁的传单像雪片一样突然散落街口巷头，像一颗颗炸弹在小城各处炸响。一时，茶馆里、饭桌上都在热议此事，各种传言迅速蔓延，好像护国军的大旗已在明城墙上迎风猎猎！

“传单炸弹”震得县衙门的门墙摇摇欲坠，县官们惶惶不可终日。洪宪年间，溧阳的县令姓张，人称“张剥皮”，他搜刮民脂民膏，手段十分残忍，跌跤抓把膻灰，雁过拔根羽毛，残害黎民百姓。张剥皮看到满城标语传单，十分惊恐，下令县署限时侦缉捉拿，搜捕严办。

不知是何人，认出传单上的字出自竹簧桥镇上的小书坊，侦缉队马上查封书坊，追查后台，书坊先生只得招供出经货店老板狄某，经货店上下十几人立马又被锁走，狄某吃不住逼讯，招供出周某。周某天生懦弱胆怯，被迫供出老丈人李翁。这一路顺藤摸瓜，一个没跑掉。李某被押解回衙，竹簧桥凡有牵涉的，一个没漏，包括那十几个无辜的伙计，全部缉拿关押。

公堂之上，张剥皮滥施酷刑，炮烙、钉指、拔甲、鞭挞……李某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张一直要李招供“同党”，李实在苦熬不住，只得编造说同街生意人查金刚乃一伙之谋。

提解查金刚，他十分镇定。查某学问很好，生意上一把好手，而十七岁时就帮人料理讼事。面对张剥皮的恫吓威逼，查十分沉着回答：“我是生意之人，不懂什么党不党的。我和李培生从小一起长大，同坐一桌上学，长大后又在一起做生意，只有生意上的往来，其他没有什么牵连往来！”张见他讲话头头是道，没有丝毫破绽，手头又没有任何证据，一时无话可说，但他不甘心就这么轻易放查过门，眼前这两位都是几代经商的富户，可狠狠敲他一笔竹杠！往府上一报，又是升官晋级的台阶，此等好事，岂能善罢甘休！于是他扯嗓一声呵喝：“来人啊！把人全部锁上，押解回县衙重审！”

天昏地暗，人去店空。“李元盛”的老板娘哭得死去活来，一时六神无主。这一切，店里的“出水朝奉”周域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周域生饱读诗书，15岁时一心想考功名，无奈时运不济，光绪年间科举取消，他空怀抱负。后为养家糊口，周域生从歌岐钱家圩来到竹簧镇当朝奉，负责店里的进货出货。他对老板李培生的义举心生钦佩，决定设法斡旋相救。

周域生坐快船赶往县城，一路风尘仆仆，忧心忡忡。船一靠岸，他匆匆赶往迎秀巷，这里住着他的表亲戴尧天。这戴尧天在溧阳城里也算个有头有面之人，他是有名的讼师（律师），满腹经纶，打起官司来头头是道，包赢不输；同时，他为人正直，侠肝义胆，经常为穷人仗义执言。加上人脉很广，面子颇足，官府民间都

兜得转，所以找他是个合适的人选。

长话短说，周域生一见面就和戴尧天摊牌，要他去县衙通融救李。戴定定神说：“姐夫，此事非同小可，麻烦大了，要花大铜钱的啰！”周急忙言：“表弟，现在李老板有杀头之罪，马上家毁人亡了！花点钱没法在乎了。只要能救命，要多少你尽管开口！”戴尧天呷口茶，伸出右手，屈中间三指：“至少这个数吧！此钱不是我独吞，主要是要去疏通县衙各个关节！张这个人想必你也听说了。”周见表弟只要六百块袁大头，知道他是真心帮忙，不是图财了。

等待消息，住在客栈里的周域生像热锅上的蚂蚁，人命关天啊！一晃两天过去，终于见到戴尧天来了。关门说话，戴沉着脸说：“姐夫，实在对不住啊！事我没办成。疏通再三，人家有了打算，不是钱所能买通！你通知李老板家里，准备收尸吧！表弟我实在无能，告罪！”周闻言一屁股跌坐椅上，长叹一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老板你休怪罪啊！”

戴尧天道出事情原委：张剥皮想升官，不想发财了！他准备把竹簧桥捉来的十几个人，统统砍头示众！连狄家伙计也杀！过天把先杀六人。虽然当时衙门已有枪了，但执刑全部用刀砍，将首级取上送南京府邀功请赏。

话说一段，分表两事。洪宪年间，溧阳城里还出了件大事件。

溧阳城里南门有家宜兴人开的当铺叫“通记”，因失火全部焚毁。当铺着火，殃及百姓，因为铺子里好多东西是穷人借来典当度日的，所谓“脱裤子当档”，要命不顾羞了！这宜兴店主心地善良，见兵荒马乱，时局不稳，百姓涂炭，所以贴出告示：凡本店典当之物，凭当票一律七折赔偿！要知道，一般当铺赔钱为五折，七折是要蚀本的！消息一出，百姓奔走相告，都说当铺老板是好人，自己遭受火灾损失惨重，但不让典当穷人吃亏，真是有情有义！但当大家拿着当票去兑换铜钱之时，却见墙上又有一张告示覆盖了原来的那张，新告示说当铺的赔偿率一律改为三折！不得增加！限时三天，全部结清，逾期不予再赔！云云。告示末了盖着县衙的大印和张剥皮的签名，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张剥皮见当铺赔付七折，油水很大，于是软硬兼施，逼宜兴老板交出当票存单，全以七折付清，他接过当票以三折赔当，自贪四折！真可谓良心给狗吃掉！这当票可是老百姓的养命钱、救命钱啊！

刚刚高兴没一个时辰的当民一下愣住了，没想到张剥皮的心会如此狠、手会

这般辣！自己拼命敛财不管百姓死活！消息不胫而走，当时有杨庄村的几位好汉，率众人到县公堂请问张县令。孰料一人挑头，万众响应，人越聚越多，将县衙团团围住。张剥皮自知理亏，死活不肯出来见民众。大家被激怒了，撞开衙门冲击公堂，要揪出张问罪；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突然枪声大作，子弹乱飞，前面的人即刻倒在血泪中……张剥皮的卫队排成一列，单膝跪地，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射击！一时人群拼死逃命，挤伤的踩坏的人不计其数……

当铺吵堂一事，死数人，伤无数，一时溧阳城里腥风血雨，风声鹤唳，死者横尸，亲人悲绝，魑魅世界，人鬼莫辨。据说前麓村有一小伙子，明天要结婚了，到城里来买菜办喜酒，路过县衙前被打死！老爹娘一急之下都命归黄泉。

丧尽天良的张剥皮，上书一封到南京府上，说溧阳出了土匪，冲击县衙想夺印抢权，幸亏县令当机立断，开枪弹压，击毙土匪数人伤十人，事已平息，匪徒也作鸟兽散，特邀功请赏！

有死伤者家人，吞不下这口恶气，请人写了状纸，赴南京击鼓鸣冤，状告张剥皮贪财枉法、残杀无辜，置黎民生计于不顾，视百姓生命如草芥！跪请弹劾，予以严办！

面对两种完全不同的陈情，南京方面也摸不到头脑。为查明真相，特派巡抚丘智刚（音）赴溧阳微服暗访，探清实情，上报省府，再做判决。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话说关于李查传单一案，戴尧天送走表姐夫周域生，心里一直忧郁发闷。这张剥皮无法无天，草菅人命，残害百姓，转眼李周翁婿就要开刀问斩，自己纵有一肚墨水、一腔热情、一身正气，却斗不过这恶鬼凶魔一县令！他长叹短吁、寝食难安，为自己的无能而自责！衙门前贴出告示，明天午时，在麻坊里（原老汽车站）先砍六人，包括李培生岳婿和四名伙计（与此事毫无关联），隔天再砍查金刚和伙计数人，定罪为“革命党匪”！戴尧天看到告示，两腿发软，脸色煞白，气得发抖。衙门前有一枕石，蘑菇石质，小孩用铜钱贴上面可粘着不落。这块石头，人称“公道石”，据传是甓桥马一龙之物。太平天国之年，被放置在侍王府，后被放在县衙门。戴尧天手拍枕石，叹道：自古天下有公理，可如今公理何在？天理何在？连你这公道石也沾满了铜臭！还到哪里讲理？

溧阳城东门有家茶馆，叫“五间庭”，五间六进，十分气派，很有名气，城里的乡绅名士都在此吃茶。是时，茶馆里却冷冷清清，客人稀少，只因今天李培生六

人要杀头问斩，弄不好有人来劫法场，打打杀杀，又要闹出人性命！谁还有心思吃茶聊天呢？

天麻亮，戴尧天一人在“五间庭”里自斟自饮，以茶浇愁，以茶解恨。

再说这丘智刚带了一随从叫张志刚，两人名字相近，性格相合。两人匆匆赶到溧阳，人地生疏，从哪里着手调查呢？张志刚提议，上茶馆问问吧，茶馆是人群聚集之地，也是信息集散之处，说不定会问出名堂。于是两人一路打听，来到“五间庭”茶馆，却发现茶客稀少，问店主原因，老板说，今天要杀革命党六人，人都去看热闹了。丘张两人相视点头，想去县衙看看，正抬腿欲走，只听里面雅间有人长叹：“这天下之大，公理何在啊？”两人返回，正欲寻雅间而入，只见一位儒雅的先生出门作揖而迎：“两位先生，想必是省府派下来的钦差大人吧？”“你是？”“草民戴尧天，以讼事混饭糊口，请进，请进！小二，上头等龙井！”

原来，戴尧天心中不平，正闷闷不乐，刚想回家，看见两人进得茶馆，从服饰气度上与常人不一样，边上那位手里还拎只公文包，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明白了几分。再说，当铺杀人一案的讼状乃他悄悄为人撰写，早闻省里有人要下来彻查，暗想这两人肯定是微服的“钦差”了！于是，不顾唐突地投石问路了。

戴向两位行礼请安后，丘问：“听说今天县衙门口十分热闹，又有何事发生？”戴也顾不得转弯抹角，遂将当铺失火一案和李查传单一案和盘托出，抨击张剥皮搜刮民脂、滥杀无辜之罪状，恳请两位钦差从中斡旋，救人性命，明辨是非，还民公理！一时，戴尧天说得慷慨激昂，涕泪俱下，“扑通”一下跪在丘、张面前，说“青天老爷，还有一个时辰李、周六人就要成刀斧下的冤鬼！小民恳请你们从速营救，情况万急，请快快前往，要不来不及了！”丘智刚闻言，当机立断，速赴县衙，救人要紧。

县衙前，人山人海，张剥皮正在将“李元盛”六人示众，等宣布完了罪状即将五花大绑，赴刑场执法砍头！正当他声嘶力竭，列数“革命党”造反逆天之罪行，即将令箭掷于地下之时，只听有人高喊一声：“且慢，刀下留人！”只见张志刚拨开人群，上前递上一张片子给张剥皮。张一看慌了神，赶紧走下台案，给“钦差”大人行礼！邱智刚扶起张县令，说：“我是奉命来查‘通记’当铺失火一案的，本当此事不在我过问之列，但既然给我碰上了，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得不过问一下了！”他当场宣布犯人缓斩，等过堂审明了再行发落。衙门前围观

人群一片欢呼声，李查和伙计的家人纷纷跪地，喊：“多谢青天大老爷！”大家对这戏剧里才有的情节半天不敢相信，像在做梦。

是夜，溧阳县衙灯火通明，丘智刚升堂重审，让戴尧天在侧陪审，并传周域生等证人上堂作证，对在押的“死犯”一一过堂，陈述经过。在当事人、陪斩人、证人分述案情经过后，丘智刚当堂宣布：与本案无关的两店伙计立即释放，留下李查周等“要犯”隔日重审。

隔天，丘智刚又传竹簧桥小书坊老板等人陈述案情。

再说这丘智刚，也是翰林出身，后又留学东洋，与溧阳“民国第一文人”狄平子等都有交往，素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心存芥蒂，后虽入幕赴仕，也是一心为民办点实事，所以对讨袁护国之举暗地认同。他也知道这“洪宪”帝制撑不了几天。对李、查一案，在了解到查金刚实不知情的经历后，即刻予以释放。对李培生和女婿周某，他上书省府，竭力为之推诿申诉，要求轻判：“经商之户，不谙政事，听信谣传，一时糊涂，当从轻发落！”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诏告天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当了83天皇帝的“袁大头”隔两个多月后便一命呜呼！

消息传到溧阳，全城一片欢欣！丘智刚赶紧致电南京，请求释放李周诸位“讨袁”勇士。上头回复：释放全部在押人员！将民愤极大、残害百姓的张县令逮捕入狱，不日解押省城，择日审判！鉴于溧阳暂无县令，由张智刚暂行代理公务，行施邑政。

“洪宪”历时83天，小小溧阳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风波，小小百姓目睹了忽生忽死的场面，这成了当年街谈巷议的话头，成了剧场滩簧的戏词。

据说，当年张智刚坐上邑宰之座，商请戴尧天、周域生到县府任职，但两位坚辞不就。实在盛情难却，戴尧天说：“这溧阳人都知晓我和你走得近，不便落任人唯亲的嫌疑。这样吧，我是当地人，风土人情我熟，你有事传我立马到！”于是，他白天从没坐过县衙交椅，丘智刚有事用轿子夜里把戴尧天抬进衙门相商，人称戴是“影子县令”！

轶事讲完了。诸位看官可能有疑：你是怎么知道这段历史事件的呢？杜撰瞎编的吧？为什么地方史料上不见一点踪影？

呵，容在下如实禀告，此事先由吾舅周镜泉（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告之

一二,我赴外婆老家(歌岐钱家圩村)采访二公公周域昌两次,由他口述,时年已八十有九(他活了 93 岁),二公公言,他是听大哥周域生亲叙。

周域生乃我外公,死于 1938 年日寇之祸,时年仅 47 岁。

口述史事,姓名年月均会有误,但历史梗概既在,理当记之,以补空白,我只不过稍加细节而已。

时间一晃已去二十多年,当年采访的纸张已泛黄,坐在钱家圩河边长凳上听二公公讲叙的情景,恍若眼前。手懒心惫,一直未能成文。外公如在世当 123 岁,二公公 113 岁。还望两位先人恕不肖之罪。

小城里的武事武人

江南崇文，北方尚武。

溧阳出过科举场上的“三鼎甲”六人，出过进士 185 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过去人谈的是《四书》、《五经》，辩的是史记国学，吟诗作画、弹琴吹箫、赏花饮茶，这仿佛才是雅事。即使一不小心，掉的也是书袋子，绝不会是匕首暗器之类。“三代不读书，等于一圈猪”，民间的俚语，直接表达了崇文的乡风民俗。

武术，又称国术，也是老祖宗传下的国粹，强身健体也好，惩恶防身也罢，好象总和“江南”搭不上界。本地人称武术为“拳头”、“拳脚”，好像总和“江湖”沾边，总是觉着有一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武人，争强好胜，打斗角力，冲冲杀杀，较劲比试！“打拳头佬”成了武者的通称，也成了“卖狗皮膏药”的代号。如此偏见成见，也是重文轻武习俗沿袭的结果。

溧阳，与武术无缘吗？

查阅县志，与“武”相关者寥寥，只有光绪续志上“艺术”一辑，记胡景春一人，有点意思。

胡景春，溧阳人，一只眼睛观人事——“重瞳”。年少时他是位卖油郎。有位山东人是位道家，天天买他的油他不收钱，道人受了感动，教授给了他秘门异术，能挟击双丸，能像巾帕一样飞腾空中数十步，这类本事他掌握很多种。

胡景春一次到陕西做生意，夜里住宿在山中一位孤家老太婆家中。老太对他讲，这地方多强盗，不便过夜。景春回答：“我如住下死于盗贼，如行走则死于虎狼，难免一死！不如坐以待命吧！”他向老太索要水数十碗，一只脚着地口诵秘诀，把水全部喝了下去。过了一会儿，有强盗二十多人来了，指名道姓地喊：“为什么不快快开门，乖乖把货物送上！”景春出门，突然尽腹中之水喷之，二十多个强盗全部僵仆倒地，如被绳索捆绑动弹不得！一群人哀求说：“我们知道你是胡大师，只是和你闹着玩玩的！”景春乃释放他们，盗众千恩万谢而去。

胡景春在家时，他的儿子想试试父亲的本事，于是装成盗贼进攻。景春不知实情，以为是真盗，行施武术制止。他儿子大呼“心痛！”气绝身亡。他这时才发现是儿子胡闹，赶紧念咒施术解救，但为时已晚矣！

明朝正德年间，有以刘六为首的流寇盗贼猖獗，官府招募智勇之士予以打击，乡亲们推举了胡景春，但此时的景春年龄太大了，官府没同意，但由此可见他在地方上武术界的威望。八十多岁时，胡景春才去世，这在当时已是高寿了。

武林轶闻，神秘莫测。武人武事，代代相传。

幼时我家住戏馆子附近的大同巷，门前有一块场园，隔壁是民办学校一教室。大门前常有习武者练功，有对门的小牛，后面的双顶伢，还有一群小伙子。他们在一招一式地比画着，一拳一腿地对练着，还有石锁、石笋、石担子，看得我们这些七八岁小孩觉着十分神圣、神秘。从大哥哥嘴里，我们知道了什么叫站桩蹲坑，什么叫压腿下腰，什么叫“十二路谭腿”，什么叫“散手”，什么叫摔跤中的“采木花”……

我们也渐渐知道，杨家院有位武术名家叫狄兆龙，碑林巷里有位大师傅叫金凤山，他们都是浑身本事的高人，带了不少徒弟。狄兆龙长胡子一把飘忽，仿佛仙人！金凤山铁塔一座像金刚，走路呼呼生风。两人都在中医院里做医生，医治跌打损伤，骨折筋扭。后又听说公园花房里还有位高人叫王永昌，人呼“王老头子”，也是一身的好功夫！

时值动乱岁月，武斗肆虐，会一身好功夫仿佛比什么都强！习武之风燃炽。大哥哥们练累了也讲故事，如狄先生一把伞打进城门，金先生硬气功掌断青石，王先生一招定胜负……听得我们眼睛眨都不眨。这就是江湖，这就是功夫！那时尚无武侠小说可读，而小城武师们的故事，活生生地好像就在眼前，因为故事中的人都在附近住着呢！

年幼无知，也想习武。5岁时因竖蜻蜓上墙，腿被小师傅一压，小腿骨折，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后也学“十二路谭腿”，两路不到，便打不下去，没有那个毅力。记得妹妹曾由父亲介绍去拜金凤山师父学过，什么“朝天蹬”，什么大洪拳，曾去灯光球场表演过，只是后来也没坚持。

国学和国术，江南和江湖，还是有区别。后来知道，习武也是要有慧根的，你不是那块料，练也白搭。

多少年过去，小城里的武事渐少，而那时的武人却记忆犹新：夏文彬、孟小保、丘炳坤、房楼保、蛮子伢（忘姓名）、刘国良、管志松……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

每个人都有功夫，每个人都有传奇，都是那个精神狂热、物质匮乏年头我们心中的偶像和大侠啊！

小城，那时很小，城里人碰面几乎都脸熟，于是武林中的武人、武事，便发酵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便衍化成夏夜竹床上纳凉的演义！

我那时知道的武林，也只有这些。

2007年4月2日，“史式八卦掌溧阳研究总会”首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天目水庐召开。作为该总会唯一的“特邀记者”，我有幸列席会议。我看到全国各地竟有这么多八卦掌的爱好者前来聚会，其中，还有来自国外的弟子。我惊讶狄兆龙先生在推广史式八卦掌这项国粹时，所做的大功德。我惊讶小时候在家门口看到的“转圈”，竟在各地有这么多练习者。我惊讶史式八卦掌竟是如此博大精深，如此多种功法。我惊讶江南小城里竟隐居着这么多的八卦掌高人高手……

九子寻母剑、龙形八掌、指路拳、粘身枪、八卦掌、八卦刀、鸳鸯钺……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登台表演了各种拳法器械，令人眼花缭乱。狄兆龙先生的长髯飘逸的照片挂在墙上，看着大家的表演他在笑，在满意地笑……他播下的种子，今天结下了果实。

家门口的这位大胡子爷爷，让人肃然起敬。

我碰到武术家协会会长戴水保，每次都惭愧脸红。我不是记者，他却“特邀”了我。我从小就见过狄先生、王先生、金先生，但我却没能能为小城武术做点什么，写点什么，为史式八卦掌记点什么，难为情！

记得在那次会上，我认识了中国武术协会秘书长康戈武，认识了武林作家高飞、洪本烈，也向他们讨教了一些八卦掌的渊源故事。一晃八年过去了，我想不揣冒昧，也该写点什么了，特别是关于史式八卦掌的，哪怕是只知只懂点皮毛。

史式八卦掌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溧阳地方文化的一张名片。“武艺无止境，自强永不息。”这是狄兆龙先生的嘱咐，文化亦无止境也。

狄先生、王先生诸前辈已仙逝多年。作为局外人，我想，对于史式八卦掌而言，现在值得探讨研究的是如何继承推广的问题，而不必去追究谁是嫡传、谁是正宗的细枝末节。作为八卦掌传人，应不辱使命，不负师望，将小城的武术瑰宝传承下去，弘扬开来！

啰嗦。

八卦掌渊源记略

康戈武先生在《八卦掌源流及其他》一文中言：“八卦掌，原名转掌。这是一种把攻防招术和导引方法融合于绕圆走转之中的拳术。大约在清同治五年（1866）左右，河北文安朱家务人董海川（约 1813—1882）始在北京传出此术。时人多以‘凡其所传，皆平日所未闻未睹者’（见光绪三十年《文安董公墓志》），疑其术得自神传仙授。讹传附会由是而生。”

“据近年考证所得，转掌之源主要有三：其一是‘幼以武勇名乡里，弱冠后技益精’（《文安董公墓志》）的董海川氏幼习的拳技；其二是董海川氏因故南游遇‘道者’所得‘炼神导气之功’（同上）；其三是用来阐发转掌义蕴的‘易理’。这三个源头，在当时追求技击与健身统一，崇尚将拳理升华入哲理的武术发展趋势下，经董氏的创造性劳动和弟子们的协力，融为一体，汇为一派，形成‘以易理说拳理，藉八卦名掌术’的八卦转掌——八卦掌。在不晚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时，八卦掌由京津畿辅传向全国各地，成了与太极、形意拳宗齐名的一大流派。”

康先生对八卦掌的介绍言简意赅，原名为转掌，绕圆走圈进行攻防，后以《易经》之理解说拳理，借八卦之名称拳术。它是清代同治年间，河北省文安县朱家务村董海川在北京传授此术，大家都没见过这种拳术，怀疑是由神仙教给董海川的。

关于董海川的身世和八卦掌的来历，始终是一个谜，没有典籍和文献的记载，这主要和技不外传的传统及习武者文化水平不高有关。

狄兆龙先生在《八卦掌锻炼特点和技击运用探讨》一文中叙述：“八卦掌是我国传统著名武术项目之一，这个拳种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创造，没有留下可靠文献。清代末年道光、咸丰年间，有位武术家董海川先生，把这一类武术传入北京。经他倡导、传播才发展、流传，闻名于世。更因他的技艺高超绝伦，各派武术

名家多次与他比武，俱没有能胜过他，遂名扬武坛，闻名遐迩，肃王府曾赐匾题为：‘大清一人’。董公传人要求极严，谆谆善诱，因材施教，高徒辈出，绵衍不绝，全国各地到处流传，更为国际友人所爱好并流传国外。惜董公当年未将此一拳种源流及传授老师姓名、法号传告众徒，致众徒们亦讳莫如深，不明真相。墓碑文中说：‘遇高人授以八卦绝技’，给后世留下一个哑谜。”

关于董海川先生生平，我们亦只能从其门人立的“墓志铭”及“墓志”中了解一二。

董海川，世代居住在文安县城南的朱家务村。他年少时家里贫穷，但善好习武，一边砍柴还一边练艺，一直坚持不懈，到二十岁成年时已练就一身武功。他性格豪放仗义，好济困解危，帮助别人不遗余力，有武侠之风。他不喜种田生产，性善打猎狩猎，天天奔跑驰骋在山野茂林之间，野兽看到他都害怕逃走。

董海川成人后浪迹江湖，遍游四方，到过江浙重庆四川，凡是名山大川都要去拜访探寻，历险搜奇，以壮阔自己的胸怀。后来一次在游历九华山之巅时，遇到“黄冠”，即道中高人，教授给他八卦绝技，练成后返回京城燕都，此时已是艺精拳勇。谁也没想到他中年后竟学司马迁之举，自阉入宫，充当宦官。他疾恶如仇，常常打抱不平，露出豪侠之气，为宫中同人所猜忌嫌恶，于是改投到肃王殿下充当侍卫。肃王喜爱他身怀绝技，授给他七品护卫之职，护卫宫墙。

董海川因年岁渐大，60岁时他恳请出府寓居外屋。他的武艺名声威震京城，公卿王侯、工商达官纷纷投其门下，拜他为师，共有千人之多，他能因人施教，各授一技。

董海川曾于壬戌年(1862)亲手击败沙氏于京城外。一次出关到塞外，碰到有一群人手持凶器将他团团围住，他空手迎击，快如旋风，克敌制胜，围观的人无不称其神勇，称赞丰采。

董海川仙逝时无疾而终，似有“内外八卦导气之功乎”？弥留之际，门生动其手足好像铁汉一样，他端坐三日而去，有人称为“羽化”。前来奔丧送葬的门人百余人，全部缟素戴孝，墓地葬于东直门外，离城只有一里多路。“门人等哀思之余，特志碑文，藉资怀思。”

董海川的墓志有两块，都为“光绪九年”立石，一块为“春二月”，一块为“孟夏”，前有门人56人，后为八大弟子。后来又有门人立过三块碑，分别为光绪三

十年、民国十九年。

董海川的事迹，流传甚少。据说溧阳狄兆龙先生按照师父杨荣本之意，曾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赴北京虹桥小牛房村找到了董公墓，并拍下了照片，抄下碑文，一共是五块碑。1980年将墓移至京西万安公墓时，仅存四块碑，八大弟子碑遗失。

董海川之后，八卦掌第二代传人为史计栋。

据《冀县六品顶戴史君振邦墓表》和《八卦掌第二代传人史计栋传略》中简略的记叙，我们对其平生略有所知。

“墓表”开头先介绍了董海川：“当有清同治光绪间，有所谓董太监者，字海川，以拳技显名于京师，号其曰八卦掌。人初学其术时，皆先教之旋转，支右肱而左行，支左肱向右行，如推磨者然，俗称曰‘磨门’。击人与避人击，皆从此变化，有奇学之称，一人可敌数十人。其徒友遍京城内外，递相传授，先后辈相称谓，如家人骨肉然，继承其门而益光大之者，独推吾冀史君。君皆基本术最精，而名亦最著。”

史计栋，字振邦，行六，人称史六，河北冀县小寨村人。他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享年七十三岁。他的祖父史俊，父亲史鹏飞。

史计栋为人慷慨，仗义好侠，善于结交朋友，善于辞令辩说。在京师经营木业，开设义和木厂于东城，与人无争，同业中有劳资争议，他做中间人仲裁调停，双方都满意而议息。

史计栋幼拜谭腿名家，当时人称铁腿秦凤仪学武术，锻炼刻苦勤奋，家离师寓约十里，来去途中踢腿不停，凡数年尽得师传。后尹福亦从秦学，两人颇为投机。秦师歿后，尹福拜到董海川门下，史计栋亦投入董门之下。他学董公六十四掌，苦心钻研，行走时步型臀低于膝，不间寒暑，常练至汗出如渗，滴下黏稠如球状，技益精进，尤擅腿法，发腿击人，常出人意料，防不胜防。武林人士辄以“贼腿史六”誉之，师兄弟辈都折服赞赏。

史先生每天清晨来到东城脚下，用身体撞击城墙，数十年不断。他家中藏有弹弓一张，悬挂在梁，用时取下，弹无虚发。京师郊地，强盗占山为寨，掠夺行旅，劫财害命，地方官一时无法缉获。史计栋受守备王德录先生之邀，前往协助平匪，擒获其魁首十一人，为民除害，经步军统领奏报朝廷，奖给六品顶戴官职。

史计栋常年居住京城，其间也归乡里，要跟他学八卦掌的人天天都有，来自工农兵学商各界。后来为御外侮、振兴民族，在天津成立了武术馆，而馆中武者大都是史先生的门徒及朋友，尔后拟在各地成立分馆，未能实施先生已仙去了。

由于声名在外，前来比试者常有。一日，有位砂手名家来访，史先生率众弟子迎候于门，引之入室。门旁有块石碑，那位砂手为显耀自己本事，以手掌抚碑，走在后面的人上前一看——碑下的砖块都碎掉了！到屋里坐定，大家相互抱拳寒暄一番，砂掌名家请求和史先生过招较技。史命学生杨荣本出场，杨应声而出，拱手致敬，各立门户，砂手家以拳进，杨稍撤避其锋芒，对方又进攻，杨荣本摆步旋转俯身以后蹬腿应之，那人踉跄跌出丈余，仆倒在地。史先生急命人扶起，砂手家羞愧而去。事后有人告知先生碑的事，他说，砂掌等功，学以增重打击力，以及自身可以抗痛，有其作用，若不仗技艺经用之以取胜，未必尽能如意。

董海川深喜史计栋这位爱徒，收其妻为义女，史先生把董公迎养到家，躬亲事奉，情逾亲婿。董公也感其义，倾艺悉授之。董公逝世，先生料理后事，营葬立碑，竭尽孝道，是为人品。

史计栋授艺，首重武德，要求极严，他所传授技艺有：八卦六十四拳掌法、腿法，多种器械、八卦器械刀剑，各具特点。他北京的弟子中，著名的有韩福顺、张德珍、于庆进、杨荣本、寿山等，其技艺称“八卦掌东城派”，后称“史式八卦掌”。

史计栋于宣统元年突患急症，病危由弟子送回原籍而故。无子，立兄子为嗣。下葬之日，来吊唁者数千人，盛极一时。

史式八卦掌的第三代传人为杨荣本，亦为“福源和尚”，由他传授给溧阳的三位徒弟：狄兆龙、彭袭明、王永昌。其中的渊源传承，颇有戏剧性、历史感和使命感。笔者在探寻此源时，尽量用第一手材料，防止以讹传讹，杜绝望文生义，避免道听途说，禁止合理联想，摒弃“武侠演义”，这也是作为文史搜集整理的要旨。

两篇珍贵的八卦掌史料

史式八卦掌是溧阳宝贵的武术文化遗产。

董海川先生的弟子铁岭贵荣在师父的墓碑上撰文：“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不禁抗怀屠狗，独黯然其销魂。”燕赵出壮士，江南产文人，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八卦掌这朵武林奇葩，竟在溧阳这个丝府茶乡扎下根去，开出花来。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充满着机缘，充满着巧合。

如果没有史计栋之徒杨荣本的削发南下，如果没有溧阳两士结伴郊游，也许史式八卦掌与小城擦肩而过，无缘相识。如今，斯人已去，掌艺尚留，“然身虽泯，而名则荣”，我们在学习了前辈的转掌步伐之时，是否在其文化层面尚需挖掘整理？

狄兆龙先生功德无量，他在传授武艺之时，不忘文史资料的整理。他在《秘传武当八卦掌》一书的前言中说：“笔者从师僧福源上人学艺，福师得师公史计栋老先生传授，史公为董祖师第三位入室弟子，又系其干女婿。”这就是一张清晰的传承图。那么，福源上人（杨荣本）的生平我们又了解多少呢？

关于八卦掌的第三代传人杨荣本，笔者有幸从史式八卦掌第四代传人之一吕正立先生处，得到王永昌前辈文章的手抄本，从未公开发表过，弥足珍贵！吕正立先生曾受教于狄、王两位前辈习武，他出身医生世家，父亲吕谷声为小城一代名医。他享受平淡，不求闻达，医武双修，虽已退休，但仍坐堂门诊，悬壶济世。征得他同意，将王永昌先生的《缅怀福师 追忆往事》和狄兆龙先生的《八卦掌的特点》两文，一并发表，这将成为我们研究史式八卦掌的第一手资料。抚读之时，吾辈切切不可忘老前辈们的苦心、苦力、功课、功德！

缅怀福师 追忆往事

王永昌

福源师，宜兴湖海会僧人也。俗姓杨，名荣本，山东掖县海新庄人氏。世袭承太和殿侍卫，与乡人于庆进同习技于北京东城史计栋先生处。于年长，师每称大哥，二人恳习，殊艰苦。时蓄有辮发，每练下场，必至袜履尽湿，发梢汗滴如溜始毕。然史颇疑二人为盗艺者，虽授而寡言拳理。

年余后，史之义和木厂曾因承办皇陵木料，亏损颇巨，因之而情绪不佳，且躁急易怒。时冀南宫老家，又来信索银，先生接书阅悉，恨曰：“今木料之事尚无从弥补，哪来多余寄汝等？”竟不问之，诸弟子皆默然不敢言。福师知其事原委后，乃阴与于庆进计议曰：“老师处境如此，实难应付！莫若我等筹措百金，潜寄南宫，以解其急！”庆进家业烧锅铺，轻裕出七十金，福师出三十金，交由镖局捎付南宫家中。家中得金后即复书告知，史得知其情大疑，曰：“此金何人所寄？”诸弟子均不知之，福师等亦不敢自承。事后史偶与镖局诸友聚谈，提及此事，局中人忆之曰：“早日汝遣二人送百金来，嘱便致南宫家中，何便忘却？”史亦愕然！而详询来人年貌征纪，疑福师及于庆进二人所为。回木厂后招福师与庆进至前，佯怒以责，二人乃自承，并述捎金委意。史谓之曰：“汝二人既意以求，余自不吝！”至此始渐告以内家拳理。

初，福师与于因史每偕张法修至小园内授技，二人预潜身僻静处，攀垣窃窥，虽羨之又不敢屡往，居常郁郁，皆谓必有不传之秘。自获内家要领后，始知机实在理明，利便在恳习，小法之事乃从形析理，实非别有妙诀，其疑始解。福师自谓论腿法则稍逊法修，而手法过之；论手法则稍逊庆进，而腿法过之。又曰，庆进演技往往气促变色，犹强为支持，疑而询诘，则云：“每下场走掌，即以有多人围攻不舍，因之欲罢不得。后竟因此而绝少走掌矣。”揆以情理，此善用之不分乃凝乎？神不得其中则魔道生焉，乃以心理之变态也。

史当以牛散刀法授韩六，六深自我惜，不以示人。福师偶与于睹其自习，强记之，又不全，乃由于（庆进）伪称师授，略有遗忘，请正于韩。韩与于最厚，后虽知其伪，终亦促成之。福师虽与西南诸子相识，而独与尹福弟子马贵善时过从。福师又曰：“曾与白虎队领班较技，相持二个时辰许，虽无所得，一笑而罢。”又云：“在哈尔

滨时，影院内曾邀俄国大力士演技，力士善拳击，福师招与交流手法，而屡以擦阴手轻击之，俄大力士自愧赤色，然求罢而止。”

福师之南来时，约民国廿年，削发于宜兴湖滏海会寺。时海会寺主持曰耐冬，时年九十余，犹健在。寺距湖滏四十余里，有下院曰普目庵，庵处罄山之麓，距海会二十里，主持之名曰中殿，亦工技击外家也。罄山有洞曰西施，曲折窈窕，却二里许，穿山而过，其中钟乳悬垂为玉，亦有自地上耸立如雪山；泉声淙淙如鸣钟鼓。虽需燃炬而行，然爽燥无水气。洞外林木森秀，海棠天竺，随处皆是。

余与彭袭明因湖滏诗人向君之介绍，初谒杨师于庵，时年五十二岁，顶上受戒之痂尚未脱落，形体清癯，目有感光。挑灯夜话，始知福师为海川公嫡系，其时二人欣喜难以言宣。盖余等至湖滏，原为畅游玉女潭而来，虽得向君之介，仅知普目庵有僧善技击而已。尝阅读过近代《武侠奇人传》一书，知海川公事，其悉心虽向往，奈无从查询，即闻向君之话方知。二人于途中曾几度祝愿，不意竟天遂人愿，如愿以偿也！

翌晨，游西施洞，返后坐谈，少顷即进午餐，素饌丰盛，有鸡菌、蘑菇、发菜、菊花头等等。其中鸡菌与菊花头为最妙，鸡菌又鲜嫩，有鸡味而无菌类土气，堪称素绝，不可多得！菊花头则清香脆美，别具风格，为庵中所植。

回溧阳后，彭君即相狄兆龙同往从学，而余则皆因生活之累，尚不能同随。每至二君返里，然间接传习。二君初居普目庵，后迁海会寺，前后三载，虽日夜勤苦，而福师犹以为惰，往往撰语谓“南方人糟豆腐”！初习掌法，继之器械，每一动作必详言其所，如此之理，兼及之变。师云：“定式聊以示范，而运用在于演绎。若能择其规律，则变化自生。武功之诀无他，勤学多思而已！”掌法器械每毕，则继之较演。福师移步换形，动静径切、吞吐开合，递变出人意料，虽极度精审，犹动未取得咎，甚至无所措手足。福师曰：“此即董公所谓‘转身活活无定势，左右衡顺随敌意’也！汝等当铭刻心中，勿忘也！”

彭狄二君学武归来后，福师移至张渚龙池挂单。恨海善技击，颇负声誉，然得福源大喜，从学。偶尔兴至与福源手法交流，胸际中背身掌呕血。福师教以蝙蝠捣烂如泥，加用热黄酒冲服而瘳。福师曰：“换掌时速高则中伤愈重，此乃物理之惯性也，非有意如此也。”师在龙池时，又有曹润亭者从学八掌。润亭者，宜兴人氏，曾为上海中华武术会学员。业医，后设诊所于张渚镇。曹因事至上海，过

武会渴望前师，师询近况俱告之。论及八掌拳理，师不解，交流手法，师不敌，再交再不敌，始驚訝而止。自后曹至溧阳城镇医院为医，现已从故，故前曾为该院之院长。

福师在抗战初期，曾至江西某地，犹得其来书，时因溧阳沦陷，尔我辈等皆奔命他乡，遂联系中断。据《子曰》发刊杂志，南昌王易撰文《技击者董海川》，其文中有民国廿四年，彭袭明尝至北京董公海川先生墓，拍得碑文照片之事。此事为福师误记，实乃狄君兆龙前往北京董墓，抄其碑文而归。另福师绘有《八掌图谱》，每图兼有释注，余及狄君均复绘收藏。至其平日讲授，则择其要录，名曰《福源上人语录》。

屈指前情，至今已有四十余载，而我已须髯尽白，垂垂老矣！犹记忆福师小住狄君家中时，每日前住聆其癸谈，炉火煜煜，诸人围坐，如在目前也。

1975年10月15日

八卦掌的特点

狄兆龙

八卦掌又叫八卦拳，是祖国传统武术项目之一。这个拳，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创造的，无明显文献可考。清末名武术家董海川先生把其传到北京，经他倡导发展起来盛行于世，流传至今。

八卦掌是一种以转圆圈的独特形式为锻炼基础的武术传统套路，它主要在行走中，同时结合锻炼身、手、腰、腿。要求：步履轻松灵活矫健，上肢沉着松静干脆利索，身腰翻转滚绕遒健柔韧，精神贯注，气势充沛，呼吸沉细深长，下注丹田，眼如闪电，巡视侦察。当年董公作过这样的指导：“身如游龙雁腾空，虎撞龟泳蛇行动，围回连势无定，斜横进退谈笑中。”当然，要达到这种境界非多年纯功难以做到。

八卦掌动作对配合的要求：讲究势势相承，招招贯穿，上下相随，完整一气。身法、手法、步法、腿法等相互配合关系，有时足随手运，手法变动，领着步法，斜横进退，往返摆扣，转移闪让。有时手随足动，步法移动，带着手屈伸折叠，开张收合，防御进攻。身法转动，促使手脚跟着进退摆扣，解化攻击。手法步法变动，

领着身腰拧闪旋转扭绕滚翻,做到全身上下左右,形成一个完整体,浑然一体,一动俱动。眼的作用是侦察瞭望,判断“敌”情。训练时眼随主要动作转移视线,运用时,手脚身腰依据眼的反映,因势发动,做出符合对方的活动。八卦掌手法主要有:推托带领剪,搬扣劈缠靠。腿法主要有:撞、探、踩、扫、截、撩、蹀、蹬、摆拦、膝打等。腿法的应用,是用脚进攻或解化,它强调腿来腿化,拳打三分,脚踢七分,拳打不知,脚踢不防。因此,常在身手步的配合或掩护下,发动腿脚来踢人。这些动作形式和变化理论,都是前辈老先生经验的总结,教导学者锻炼强身,兼有防身自卫作用。在技击意义上说:练以备战,练以应战。在增强体质上说,练好身体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在发展祖国武术来说,振兴中华武术精神,向世界体坛推广发扬光大。

笔者练八卦掌十余年,结合自身体会,以为八卦掌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外形的特点,一般武术都是直来直去的套路形式。八卦掌锻炼时是摆好“射箭式”形态,像一手推弓把,一手拉弓弦,在它的锻炼要领下,蹲身躬腿蹀泥步走圆圈,刻苦训练二条腿,达到灵活运用二条腿。对步法要求特别高,搏斗时,在斜横进退的过程中,转移闪让,出击进攻,发挥步法制胜。另一方面,转圈时,活动循环往返,断而复连,周而复始,两侧肢体都经训练,无偏废之弊,可获两侧同时提高之益。

2. 训练动作的同时训练大脑。这种训练法,历来称作“内外合一练法”,使大脑罗列外界刺激时,对外界的刺激,感应灵敏,反应迅速,适应外来的活动,判断正确,处理及时,应付恰当,动作合理,达到所谓“懂劲”。一般人谈起“内外合一”,以为非常神奇,有些人还故弄玄虚,故神其说,其实很合乎科学,说穿了就是锻炼时要考虑动作的意义和作用。为什么要这样动,要弄懂弄通弄清楚,更要弄清楚它的活动规律和变化规律。

3. 呼吸配合动作活动,呼吸随着动作的开合攻防的变化而异,防御解化时候的动作都由吸气来完成。这种呼吸练法,先吐出腹内含二氧化碳的气,再吸入新鲜空气。用鼻呼鼻吸,舌抵上颚,以意识引导,把气运到小腹,术语所谓“气沉丹田”。在走圈时,摆好“射箭式”姿势,尾闾中正,腰部塌好,臀部不要突起,呼吸时小腹部就感到轻微的一鼓一缩活动,经过一段时期的锻炼后,随着意识的引导,腹式呼吸逐步形成,小腹鼓缩活动更形明显,这种走圆圈形式,有人称它叫

“活桩步”，又因配合腹式呼吸，像活步有节奏地作气功，也被称作“活步气功”。

4. 战略思想指导：一、尊重客观，不强调主观，所谓舍己从人，自己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适应对方做出的措施。二、要争取主动权，尤其是在被动中争取主动。否则，不能从被动中解脱，就会形成武术成语中所谓的“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能”，等着挨打。

5. 战术思想指导：游击战术，不挡不架，引进落空，避实击虚。以走为主，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视前忽后，行踪飘忽。

6. 锻炼过程：八卦掌锻炼过程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苦练基本功，把动作练得纯熟精通，创造条件，过技术关。第二个阶段，掌握了基本功后，要考虑动作的作用，练动作的变化，从主动和被动二方面着想，摸索它的作用和变化规律，怎样应用它，用什么方式来训练它。八卦掌的各个动作，都是示范作用，假设的攻防搏斗规划，练以备战，练以应战。假使对方不按照我训练的作战方案搏斗，我若死搬硬套，刻舟求剑，便不合实际。因此，八卦掌的战略理论指导，强调尊重客观，要符合实际，因人因势变动。在锻炼时，既要熟练备战，还要开动思想机器研究应变方式方法，变要有目的地变，要顺从客观实际有的放矢，学会善于变化敢于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千变万化是动态的形式，理论原则动作要领是不变的。如果平常锻炼没有应变的思想准备和善变素养，在搏斗临阵时，往往措手不及，处境被动。搏斗时双方动作是变幻莫测的，各有各的作战策略和方案，但由于生理、物理、力学的条件下，也有一定的活动规律。因此，适应对方，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要依据客观规律指导，情况不同，决定看不同的指导规律，一切的指导规律是按照情况发展而发展的，务必使主观符合客观实际，离开了实际谈武术的战术，等于缘木求鱼。

7. 感应：感应能力是从视觉中侦察得来的，要不断训练眼睛的洞察力。训练时，眼随主要活动肢体法转移视线，要含威有神。动作的精神气势常在眼神中表现出来。有素养的武术家，能在对方活动时和静止的状态下，迅速发现对方意图，传报于神经中枢，能防患于事前。

8. 反应：神经中枢获得眼睛的反映，及时选择对策，指示正在活动或静止的肢体准确应变。这种情况下，自己的行动往往要中途改变以适应客观。这种改变行动的能力，要经过长期艰苦锻炼，始能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改正判断，重整

旗鼓。这种灵活机动迅速改辙的活动,是由长期不断的训练中养成的条件反射,遇到这种客观情况,不自觉地引起条件反射,信手而发及时迅速地做出的反应。

锻炼八卦掌不仅增强体质,开动智慧,而且锻炼了意志,培养了良好的“性情”,学会了凡事尊重客观,克服主观随意性、表面性和片面性,是值得推荐的一种传统武术活动形式。

一九八九年三月

源流:史计栋,字振邦,河北冀县人,立卿为其习艺名,董公海川八大弟子之一,又系其干女婿,传杨荣本,杨为清宫廷侍卫,光复后考入哈尔滨邮局任俄文邮务员,余蒙杨师悉心传授,始得略知梗概。

兆龙补识

八卦转掌源流

溧阳吕正立先生是位有心人,他抄录的八卦掌资料中,还有几篇短文,是前人研究八卦掌流派传承的珍贵资料。公之于众,对热心于武术史志研撰的作者将有裨益。特别是流派传承世系表的排列,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信性。

研习八卦掌,在走圈运掌的同时,如能深究一点文化根源,将弥补我们对前辈生平了解不足的缺憾,也可进一步达到文武双修、以文促武的目的,对武术国粹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

一、八卦转掌源流

陈秉衡(录自浙江省国术馆教习讲义)

八卦转掌传自董海川先生。

先生生于前清末叶,世居京兆文安县朱家坞村,寡言语,精悍异常;性磊落,不事生产,喜技击之术,摹朱家郭解之所为,遨游四方,扶危济困,无所不至。厥后来京师,中年在四爷村(咸丰府邸)净身,隐于妇寺,久之渐传出八卦转掌之术。后应差肃王府,由是先生大开方便之门,名闻四方。京师内外及各省武术专家,以其拳名既所未闻,其形势又所未观,咸轻视之。迨所传既多,所行既远,各省武术家闻先生名往访甚夥,屡与之较者实繁,有徒然卒未有出先生之右者,始悉其中奥妙无穷,伶巧异于旁门,著术亦与他家迥异,其进退之迅速,转还灵活实成家法,憾先生始则未肯说出此拳之源流。继则有关外北镇县宋德厚,字惟一,先生来访,宋云自幼受异人传授,乃师名野鹤道人,又名避月侠所传,亦系八卦转掌及空中舞剑之术,董先生见之惊异,因与宋益诘,始悉乃一家人:野鹤道人系董先生师伯,先生之师乃为避灯侠客,由此诸弟子得悉八卦掌之由来。追源其本,乃武当派张三丰先师所传。

董先生卒于前清光绪六年冬间，是年八十四岁，葬于京师东直门外东北城角迤北洪桥之南。光绪九年春立有碑一座，庚子后立有碑一座，民国十九年春，本门同志见坟墓年久失修，集合同志筹资重加修葺，又添立碑两座以示纪念。每当四季冥节，本门同人前往祭扫者颇不乏人，以表饮水思源，而使后学者不失其本也。

二、《国术史》摘录

八卦拳又名八卦掌，此派未知始于何时。闻有董海川者精斯技，海川之弟子有程庭华、李存义、尹福、马维琪、魏吉、宋永祥、宋长荣、刘凤春、梁振普、张占魁、史六、王立德。尹福授马桂，存义授王后臣、韩金镛；庭华授孙禄堂、张玉魁、韩奇英、冯后义、阚龄峰、周祥、李汉章、秦成诸人。程庭华之八卦掌在北方盛负时誉，庚子一役，为德人所害。其子有龙颇得乃父之学，其弟子中之知名者，以孙禄堂为最优。孙氏曾著有《八卦掌学》行于世。

三、八卦掌根派五代名人

董海川

二代

程庭华(应芳)	尹福(寿明)	马维麒	刘凤春	宋长荣
---------	--------	-----	-----	-----

三代

郭铸山	姬凤祥	周祥	程有龙(海亭)	程有功(相亭)	马贵(世清)	冯俊义	李文彩(兴普)	张玉魁(占君)	宫玉田(占元)	门宝珍(聘三)	何金魁	杨明山	蒋馨三	尹玉章	程有信
-----	-----	----	---------	---------	--------	-----	---------	---------	---------	---------	-----	-----	-----	-----	-----

四代

孙锡堃(玉明)	钱茂林(竹波)	许永孚(秦征)	石忠义	王清和	何钧(两波)	吴连(俊山)	卢书魁	马德山	朱文豹	高柯兴	尹左臣	王景孟	张玉安	盛计辉	徐华文	田剑涛	李士铎
---------	---------	---------	-----	-----	--------	--------	-----	-----	-----	-----	-----	-----	-----	-----	-----	-----	-----

五代

汪 慧	田 锡九	刘 鹤亭	张 明轩	张 玉田	胡 庆来	杨 长庚	宋 子琴	孙 定芳	刘 振林	崔 玉岑	曹 宗馨	崔 体乾
张 万顺	王 德藻	陈 世杰	郭 海润	李 蕴石	董 宝庆	杨 清潭	金 思善	田 德安	马 孝傅	齐 焕文	刘 振麟	

技击者董海川

溧阳王永昌先生在《缅怀福师 追忆往事》一文中言：“据《子曰》发刊杂志、南昌王易撰文《技击者董海川》，其文中有民国廿四年，彭袭明当至北京董海川先生墓，拍得碑文照片之事。此事为福师误记，实乃狄君兆龙前往北京董墓，抄其碑文而归。”

《子曰》杂志早已难觅，王易文章不知所云，董海川生平扑朔迷离，此乃研究八卦掌渊源的瓶颈。

溧阳吕正立先生是位医师，师随狄兆龙、王永昌研习八卦掌，他出示一本“文革”标记明显的练习簿，上有其珍藏多年的手抄本《技击者董海川》，更为珍贵的还抄录有彭袭明先生写的《读“技击者董海川”书后》。两篇文章，应是介绍董海川的较早资料，是研究八卦掌起源演变的宝贵史料！据吕正立先生介绍，王永昌先生毕生研究八卦掌，对八卦掌的技法、理论，颇多推陈出新，这两篇文章，也抄自王永昌先生的手抄本，因一再转抄，恐多谬误之处，不敢擅自改正，尚请读者谅解。抄本轻薄，若重千金，转录于下，以飨读者，顺向吕正立先生致敬！

技击者董海川

王 易

海川，董姓，冀州文安县人。幼孤贫，无名字，依兄嫂居，人以“小二”呼之，海川其僧名也。

文安地僻，其村尤困窳，董蓄驴赁客，朝出暮归，有时远足历二三日始返。村豪有武氏者，兄弟皆武举，以财势倾一乡。董嫂薄有姿，武氏涎焉，令潮濯寝诱与通。董年十七八，常远出，初未知也。一日返家，门扃无人，其邻令牵驴入而饮食之。董问嫂迹，邻初不答，徐告以：其嫂往武氏澣，迄晡未归；其兄往探，知妇方与

武二次，愤而骂；妇亦反唇，武助妇拳杀其兄，即夕瘞董氏田中，事为乡约所默息处兮。董往询得实，痛不欲生。邻悯而慰之，令宿其家。董仍赁驴，岁余以所得给食费。

村左三官庙，有丐据之，键其门而出入于垣缺间。董频往拾刍橐，丐见其褴褛，与语问所苦，且警之曰：“若嫂非为武某据乎？”董拂然曰：“勿复道！”丐曰：“嫂可忘，兄仇亦可忘乎？”董涕出，曰：“力薄无能为耳。”丐曰：“若能鬻驴，兄仇可复也。”董果鬻驴，得钱四五千。丐引入庙谓之曰：“安居此，保复兄仇矣。”以其钱出为制衣，复要其共出行乞。董讶曰：“新衣可乞乎？”曰：“我亦有新衣，乞时勿服耳。”于是携与行乞近村，暮归庙，示以技击，谓：“此所以复仇也。”董欣跃从学，居五六年，技日进。一日，丐谓董曰：“若复仇，在今夕矣，我助若焉！”示以利刃，令偕往。人静，至武宅处，丐悉告董以户室径向，使先入，而已伺其外以为应。董潜入武二居室，并杀男女而出。丐曰：“彼尚有兄，可不杀诸？”董复入杀之。出，丐又曰：“彼家凡八人，胡乃留之？”董又入尽杀之，出，告毕事。丐喜曰：“大佳，不能尔，非我徒矣。”趣令先返，而已入濡血题壁曰：“杀人者董小二也！”翌晨，丐董往距此三十里之武氏乡，豪之族也。乡人见董至，呼“杀人犯”共逐之，及于庙，董跃入，丐迎谓：“勿惧！有技可战也！”乃辟庙门，外键立断。丐谓众：“毋相追！可告官，当就逮也！”众亟驰报，文安令遣守备率捕役来。丐董与搏，杀守备而俱逸。守告大恚，发海搏文缉之。二人遂为盗冀南，官罗捕之，迄不能获。偶却一巨室，董入而并犯其妇。及出，丐谓之曰：“行矣！自今勿复相随！”遂诀去。

董离丐，独行却，必犯妇人，省捕，益濒危者数，乃往涿州。一夕，窥一宅，众皆未寝，厅事灯火中，四少年方习武，二老临观。董窥久不觉赞叹，众觉而延人，知其盗也，主人询知其姓，叱曰：“若董二乎？曷敢入吾马宅也？”董陈遇蹇。马责令诸子比，董皆勿及，惶恐乞命。马曰：“吾不汝诛，但毋许留。”倾以二十金，令速远逸。董怏怏去，西涉晋境，至雪花山，行倦，卧道左二日，有蹴之醒者，则一道士，谓：“此何可居？”董悚息。道士引谒其师，师曰：“汝来甚善，愿留此乎？”董告以愿侍香火。师谕以清规，安衣服教；从命二道士相见，令董从学。偕入一室，刀戟森立。董笑其具太重。道士试运之，董嗤以无用。道士要与试角，刀霍霍不离其面，董伏而愿学焉。道士复令入一室习旋转，董又疑无用。道士使董屡击之，不能一中，则又伏焉。历八月，饮食苦菲，董不耐，自恚曰：“董二，何郁郁久居此

耶？”道士来，令见师，师问：“欲下山乎？”曰：“然。”师曰：“若案未销，鲁豫皆不可往，惟大江之北可耳。江南有一尼，亦吾徒，思杀汝久矣，慎毋南也！”董问计，师曰：“出家可也！”临辞，师复呼曰：“董二，慎毋南也！”董出而倦卧床中，达旦方觉，自顾茫茫无所之，颇悔此行。试所习技，觉矫捷异昔，遂决复还。至则门已反扃，董跃入视，空如也。待数日，犹寂然，因舍去，漫行无向，不期复至马氏宅。叩门入，主人见焉，然甚落寞，询董：“何来？”曰：“雪花山。”马曰：“脱非自彼来，我不善视汝。”复询以所获，董略告之。试与角，马立则，曰：“不与我同门，技高矣！师何所云？”董曰：“师令毋往江南也。”董询师名，马亦不知。董白出家意，马曰：“少林寺可耳。”愿为书介绍且任其资用。

少林僧分六支，当时为“演”支，世分“公、清、觉、海、了、悟、真、常”八名。董次列四世，赐名“海川”。初受法，旋复思动。一二年后，胆渐肆，时在近乡行不法。事闻于省，莅寺察缉，董遂颺去。

久之，竟北返，肆虐京辅，甚乃出入大内。官百计捕之不可获。一夕，月大明，董至太和殿，甫欲入，见片纸，大书“速逃”。董踌躇间，自问：“谁为是者？”忽忆侍卫班教师王桂林，技至高。“殆其人乎？”因不入，飞登殿甍伏而伺之。二更许，见王率卫士七八，提竹笼审视曰：“来矣！”遂率众习武，时许，复仰呼曰：“盍下乎？”董翩然下见，王邀入殿庑中款以酒肉，徐问曰：“海川师，子来何为？”董曰：“无他，闻公名，特请示何以投案耳。”王喜曰：“先当请技。”遂交搏四百余合，董渐不支，亟突飞上殿脊而逸。迳出禁城西直门，片刻抵西山，止而叹曰：“王桂林！我战不及汝，飞则天下无对，今汝其奈何？”言未毕，闻身后哂曰：“吾在此！”董惊而踉曰：“师何苦相迫？”王曰：“子多淫恶，非报案无以解。”董愿师事。王曰：“不可，子为少林徒，我何以教子？无己共入京耳。”董再四乞免，卒不允。董忽以手自抉其势掷地呼曰：“今可乎？”王惊抚之曰：“若，吾弟矣！”问：“尚能行乎？”曰：“能。”即偕归居王所，王为觅老庵以善药敷治，三日而愈，入役大庵家，时年二十八。

居无何，肃王以邸中常患盗，请于王。王介董入侍，肃颇善遇之。既二十余年，邸中帖然无所失。时桂林既死，继者其徒李复东。董时年五十余矣，犹日侍贝子执贱役。肃素好勇，为二子各延武师教之。二武师常使气骂董，董积忿久。一日，命茗不温，叱令重进。董恚且出，淬曰：“何骄为？所学足受箠耳。”二子闻

而告其师，师质之董曰：“信然！”遂约至北新桥角技。二武师先至，坐茶肆。董来，武师问：“若饮乎？”董曰：“吾为约来耳。”遂共诣肆左，甫交，董遽执二人项背使自相撞，晕而仆。董夷然，舍之迳返。二武师嗒焉归，束装潜遁。二子闻之，默无如何。数日肃思见武师，左右启曰：“被董监击走矣！”肃询得情，心忌之，伺其偃卧，阴以枪刺其股，锋未抵而人倏杳，闻身后低语曰：“爷，何戏之甚也。”肃迴语曰：“汝技甚工，我非欲杀汝，即伤亦不至殊也。”又问：“技若此，何久秘为？”董曰：“王教师技过于奴，奴尝誓言：彼在，奴愿晦也！”肃命与试角，董谢不敏，肃坚要之，勉允一试。肃操双刀，董徒手相向。肃欲挥刀，辄觉手若束，自省不敌，温语之曰：“汝技高，而隐于吾家，失敬久矣。今盍为我子师？”遽令二子出拜，董辞焉。肃曰：“吾既言，汝即师矣。”二子从董学，意终轻之，用力不动，且时辱以厮役。董悒郁不耐，因援例以年逾六十乞休，得许免出。

董既出，自僦居。李永贵者，南宫人，年未冠，尝随侍习技多年。董时携与出游，李之乡人尹福，年四十余，业砮米，旧师秦凤仪，谭腿大宗也。秦死而尹始来京。一日遇李，欣询近迹，李具告。尹问：“从董何学？”李微示之，尹嗤以无用，李怪之，归问师：“识尹福乎？”董曰：“秦凤仪之徒也。”李白尹意，董令李与一试。李寻尹角，尹渐不支，三试而终不胜，尹惭甚，挽李必介诸董，一见而跽。董曰：“子，秦之徒，秦技良佳，但鲜大用。子好学，姑留学可耳。”命兄事李，居数月，来学者渐增。尹同门史继东者，访尹与试近技，觉尹忽胜己，诉问所由。尹告以师董。史居齐化门，设义和木厂自给。翌日，尹侍董来，史迎候维诺。董问：“汝其史小六子乎？”曰：“然。”曰：“秦凤仪汝师乎？”曰：“然。”曰：“尹福汝兄乎？”曰：“然。”曰：“彼既师我矣。”史即解衣作势，引出院外，遽拜而师之，曰：“我不请师出拜，人曷知我敬师之深也。”遂相欢洽，迎董居焉。先是，董门有程永龙（业眼镜，号“眼镜程”）、马维骐（业煤，号“煤马”）、及傅镇邦三人，史藉之而知董者也。后复有刘凤采（业翠，号“翠花刘”）、刘某（号“大枪刘”），及士人宋良仁等，前后累三十余人，皆传董“八掌”之术。

肃王有壮田，在京北七百里之某乡，庄户四姓，豪而狡。使往征赋，既得，出乡辄遇劫，无完归者。嗣肃王患之，请于董。董独携李永贵偕，但备车马，以铁枪毳罽自随。车去门丈余，董腾而上。既至，豪具酒请示技，董许之，令毕召健者数十辈，各执刀杖，自持二小挺，蘸以涩水，中立与约曰：“命动则动，止则止！”既动，

众环攻。倏曰：“止！”董已在环外，谓众曰：“试互观若背！”则各有歪印双。众服，悉纳所赋而自赍送之。庄头某，忌董能，诒具要李，出女引酒饵以贄，并迎养其母，而令图其师。李惑而许之。伺窗中，潜入董室，而董已杳，视其枪闩亦不见，而室门外扃。知谋败，殊惶悔，急返京。董不待明，已先归，晨坐语诸徒曰：“趣往西郊俟李，令毋入，速往贄耳！”徒往俟，至日晡，李喘汗奔至。徒传师命，李益恐。徒冀李一见而乞解，偕入门。李踞而哭，众为环踞乞宥。董默然，徐曰：“休矣！速归省若母！”李惭俯而退，将出门，忽茶壶飞跃门上，触簾坠，液溅其顶。李疾走去。董乃泣，谓徒习：“汝辈与同门趣往其家，犹及一决也。”徒至李所，见李偃卧首肿若拷佬；其母哭于旁。李旋死，众为理其殡。

董晚岁居义和木厂阅廿年。歿前一夕，与徒观剧某戏园，坐厢楼中。忽有镖飞至，穿董后壁而董不见。众寻视无所得，方警怪问，董徐自上楼拔镖于手，语众曰：“且观剧。”既而散归，已夜午，董坐而索茗，握镖谓众曰：“人之徒可以此近我，而汝辈独不能近人，动怠何相远也？”众请安息。董仍趺坐，首汗忽大出，渴甚索鸡子羹，徒调以进。董略饮而辍，泪簌簌下，曰：“我惫甚。”众请偃卧，旋复坐起。天渐明，命众以巨绳来束其腰，十数人并力曳之，董屹坐不移，绳竟断，董叹曰：“吾力尽矣！”复卧，竭益甚，又命进茗，瓯及手辄碎，三进皆然。徒傅振邦自执茗进，饮讫伸手，傅当之，踉跄跌数尺外。众知甚危笃，环伺之，觉其喉际微动，息绝矣。董生于嘉庆中年，卒于光绪甲午战前，年八十二。墓在齐化门外。民国二十四年，溧阳人彭袭明，叔夜尝赴董墓，摄得四碑，谓文不足传，欲别作碑，以传其改过之勇、忍苦之深、恬然无求之精神。

董歿后数岁，豫鲁间有地名木兰店者，居人多宋金二姓。辛丑八月中，宋姓女清霜，将适村东金姓土子。方辞祖于堂，忽有老人入以神，拂烛灭。女起而见之曰：“子来乎？请登楼！”老人上，女独从，即闭门。家众骇愕，闻楼室中搏声声甚剧，历数时，门启，女送老人下，容甚谨，约以明日来。老人出，家众疑，欲追之，女戒：“勿问。”明日老人复来，复上楼搏击，送下如昨。宋金氏鸣其地驻军，使数十人围守之。女立楼上，戒众：“勿动，动将危！”俄而老人偕一少年来，女立迎之，军士群以枪拟之，老人一举手，众皆木立，枪自脱手，女复晓之曰：“更动，祸将作，请趋出。”众散去。女复与二人上楼，闻女叹曰：“二男而对一弱女，胜亦何哉？”老人谓少年：“我止汝勿来，汝自不听，今果辱矣！速去休！”续与女搏，历时许，闻女

呼曰：“伯父，若剑有隙，脱他人我不让矣。”老人叹曰：“我是汝伯乎？”曰：“固老者也。”老人云：“字派歧而源则一，使汝早云，我何争为？今不复角矣。顾以此误汝佳期，为深歉耳！”女开门，复谨送出，倏忽而杳，女遂归舍。后有访于宋氏者，闻女母信佛，有老尼年九十余，时来其家，女素娴静，鍼业外惟阅佛经，其技或受于尼。老人白姓，少年或其子徒，不可知云。又闻武术家分“心”、“衣”二派，尼殆雪花山老道之徒属“心”字，白或亦其门下属“衣”字乎？

八掌有“单、走、转、背、回、挑钩、探、翻”八纲，各演八目为六十四式，贯以“慎击策”。其术体柔而用刚，守静以待动，避实而乘虚，因人以成己，盖融内外诸家法门为一治，殆董奄汇众长而自创之者。董既歿，其徒各以技授徒于京师闾闾间。光宣之际，京师人称八掌有城南、东、西三派，其传授最多者为程永龙，号南派，次则尹、史，号东派，西派则大枪刘也。程、刘之门，未详。尹门有马贵，亦受于董，次则刘继其业。史门有文安、张德珍、善亭、于庆进、韩六等。其余刘凤采等授徒之数不可悉。大抵转相传肆，或遗精微，浸流于粗疏，故遂日渐凋落。

史继东歿于光绪戊申，有弟子山东僧福源传其绪。倭祸既作，源自宜兴问□避来赣，自以年老羸病，虑其术失坠，始稍稍出示人。崇明严君白，振奇士也，请于源，得其纲目著于书；复属南昌王易叙次其颠末，皆扶实□去溢言，俾其术其人得不终泯云。

论曰：吾国技击之术尚矣，陈思王，豪于文者也，而自叙手搏，旨哉津津乎！盖以勤肢体、运气血，进退俯仰，使百脉贯通、六淫不驻，所以立健；进而披劈控纵、跌扑腾跃，使身手呼应，外侮不入，所以保身。故南塘戚氏新书著拳击法三十二势，余姚黄百家衍松溪之搏，作内家拳法，析绎其旨，诚知其为武术之本也。海川以夔遭患苦，迫不得已，为羽、为缙、为盗、为阉，终乃以数十年研炼所得授徒以底于歿。其遇盖极人世之蹇，而其术则遵拳技之长，苟得治世而善用之，亦千城之选也。贾□有言：“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有以哉！

王易此文，应是介绍武术家董海川较早较全的生平资料，但他得之福源上人之徒严白，毕竟不是武林中人，不是当事之人，难免失之偏颇。而溧阳彭袭明则不然，他得福源师父八卦掌之真传，亦常聆福师言武坛轶事、八掌过往，因此他读了王文后写下感想，矫枉过正，正本清源。彭文所述倚重史料，言之有物，而且多

是福源亲叙,较为可信。他还有自己的考证,纠正了王文中的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缺憾。

彭公袭明,善丹青,喜读书,乃史式八卦掌之第三代嫡传。重读他撰的有关董海川生平的文章,我辈在感悟他淡泊明志、倾心文武的修养之际,更要学习他内外双修、上下探索的处世之道。下将彭文录如下:

读《技击者董海川》书后

彭袭明

近阅《子曰》丛刊见王易此文,叙事甚工,议论甚卓。然王君似不省技,其事盖闻之严君白,人物地名颇多失确。因草此篇,以为前传阙漏之补,其信者略。

海川姓董,初名□□,今字僧号也。河北文安县朱家坞人,父业儒,家小康。息子二,女一。长兄娶某氏,女□适□,幼则海川也,小字曰“董二”。

性不好书,喜驰骋畋猎,生有异禀,双手过膝。

年十三,匿姓名亡至津,居逆旅中,主人固绿林之豪也。时京津铁路未筑,驿道往还,金以东骑。海川随马蹬供趋策,以给饮食。主人怜其动敏,徒蓄之,三年尽其技。

比还,父兄愤怒,责令读书,课督綦严。数年,举秀才,年十九矣。非素志也,乃给父:“京都天下文汇,士林所聚,盍往以图进乎?”父喜从之。

抵京倾囊结塞外健儿,相互论技,艺益精,渐久,索索财尽,间为飞盗,犯妇女。两义捕之急,夜逃归。门闭踰垣入后庭,父室阒如,兄牖残灯犹明,闻小儿啼,佯嗽,室内发问,答曰:“小二归矣。”门启,妇人皓素悲哽,董愕然,嫂曰:“自叔出外,久绝音讯,翁以忧死;兄为村中武举诱与商贩,欺其愿负累多,郁郁亦以病卒。今欲将我为抵偿。”乃指床上儿曰:“此董氏血肉,胡忍弃却,正委以叔归决之耳。”董闻切齿,诘旦持刀往仇家刺杀之,家人闻变,执兵环集,海川从容问曰:“杀人者谁也?”众大声呵,将欲擒之,越屋去。南走少林,祝发为沙门。綦年勇冠缙侣,遇者疑其貌,踪迹之,又亡去。

北经太行,偶尖闻壮士谈武事,独所好蹶之,抵一大宅,有叟出,询所从来,以少林对。叟欣然迓进,堂上陈枪戟,因问:“丈人年迈,顾乐此耶?”叟笑曰:“娱儿辈耳。”令四子出见,执礼甚恭,曰:“师从嵩岳来。少林,固天下武术之好也,愿求

教焉。”令子以次与搏，虽幼者勿胜，惶遽谢出。奔荒蹊间，入山渐深，大木蓊荟，星月微明，惫而假寐。倏闻岭上有足音，俄而及前，乃一道士，佇问：“若董海川乎？凉霄风露，此胡可居，陋室不远，可容膝也。”随之，行殊疾而久不至。至则观在一峰巅——雪花山，今在娘子关附近，为兵家必争之地——门外又有道徒相待，若知海川来者，相与入，殿祀三清，旁各一厢，右有丹士趺坐，状貌奇古，修髯过腹。海川拜谒，丹士温辞慰之曰：“汝技若此，复遭新败，尚敢踽踽独行，不畏壮士缚汝耶，是尚僻静能安心暂处乎？”由是海川捨释，披簪为道士，两徒道观左室。室列巨刃长枪度逾寻常，心非之，逗与较艺，如蹈虚掩雾，不能抵衣一角。易刀则刀锋冷然时绕顶际，森森寒入骨——于是大惊匍匐。道人乃教之旋走观前磐石上，俯仰翻腾，日异其势。年有一月，董求去，师叹曰：“固知汝之不能终业也。”因嘱：“慎毋南。余在浙东，有会稽女冠，小汝而技十倍汝，吾先徒也。若见，必亟告雪花所传，可避害。然河北七省，已无汝敌矣。”书以付之，抵京就老闾公为寺人。董自于肃王府逐二拳师后，假出授技九城间，首曰李永贵、次马维祺、三尹福、四程华亭、五傅钰邦、六史继东，刘凤春、刘德宽、宋良仁等俱在后。李马早死，尹徒马贵，为太和殿侍卫；程殉八国联军之难，传子及馒头郭、孙禄堂；傅传未详，史授冀州张德修（善亭）、韩六、掖县于庆进、杨荣本（即福源上人），余与荆州毛国化、溧阳王永昌、溧阳狄兆龙（佩云）、宜兴曹润亭，皆从杨师问业焉。

公生于嘉庆之初，卒年八十二，葬北平东郊虹桥附近。门弟子集资络续建碑四座，叙其平生及弟子姓氏。佚事最多，聆之眉飞色舞，计其造诣之深，当在甘凤池辈上。

然雪花南枝，杳不可知。海川公卒，客有自远来祭者称师伯，取公遗械十三节软鞭去。忆居青城时遇阳武张松峤，自言于黄阳山从修士张空振治技，按其形式作用，一类八掌，询彼渊源，出北宋绍兴侠士赵华阳，赵氏世传。明清之际，山东李息之得之，再传张空振。空振髯眉皓白，颜如渥丹，年百余岁。李信之，据称均健在，陕西李信冈云：“张犹隐伊阙山，间过终南太白，身轻能于水上行，纵跳如飞，闪忽若电；李则剑侠之伦，转瞬不见，倾刻千里，盖技而进乎道矣。”

明素好登涉，苦乏济胜之具。因荆溪诗人向梦白之介而识福源上人，爰从之学，以是知董公事较悉。若武陟木栾店宋清霜事则似出清人笔记《河朔纪闻》（手头无书，仿佛如此）。所载与八掌派系无关，不知缘何阑入，岂误传耶！又此艺俗

名八卦掌,又称柔身掌、游身连环掌,与形意太极俱为内家正宗。母掌八乃单、走、转、背、回头、挑勾、探、翻,每掌又有散手七掌,合六十四掌,均须以九劲(顶挺沉压息实提撞柔)运之。以母掌为体,散手为用,毋贪毋坠,不挡不架,触之绵而当之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外朔迷离,隐见不侧之妙差堪仿佛,惜传之者多秘其精要,而习之者每浅尝即止,未能悬学,遂致此道寝以衰微,良可慨已!

八卦掌传人三杰

自董公海川传下八卦掌，高徒史计栋以独到的感悟，创下以“避正打斜，以下驱斜”为基本原则、以“以动为本，以变为法”为基本运动法则的“史式八卦掌”。杨荣本作为史计栋的传人，继承了八卦掌的精髓。抗战期间他南下宜兴海会寺，削发受戒，遁入空门。他虽看破红尘，却不忘将八卦绝技传之后人。期间溧阳彭袭明、王永昌两位武术爱好者，在赴玉女潭浏览途中由友人向君介绍，认识了福源上人（杨荣本），得知他是董公传人，十分惊喜，于是有了拜师学艺之愿，福师答应收徒。后彭袭明约了表弟狄兆龙一起上山习武，而王永昌则因生计杂事未能成行。彭、狄下山返家，传艺给王永昌，而福源师父到溧阳，也对王面提亲授。

小城与八卦掌的一段缘分，由此联结。而作为史式八卦掌的第三代传人，彭袭明、狄兆龙、王永昌成为传授武艺、弘扬国术的“小城三杰”。

狄兆龙（1909—2002），溧阳人，出生望族，其父是溧阳商会会长。他自小体弱多病，为增强体质，12岁时随从沧州到溧阳的武师张凤祥学习少林拳，日渐健壮。15岁时去上海跟褚柱亭学习太极拳，又向名师孙禄堂学习形意八卦掌，前后五年左右。

1931年清明节后，狄公随表兄彭袭明赴宜兴海会寺拜福源上人为师，研习八卦掌，走圈换掌，晨练暮习，严格严厉。福师对徒弟要求甚严，一招一式、一动一静，都要分析要领、讲究因果。课余也谈董公、史公及自己的平生，谈八卦掌的来历传承。福师还教狄公中医伤科本领，一可救人解困，二可安身立命。彭狄两位一月下山回家一趟，二日休整取粮，换衣洗裤，并将所学传教王永昌。

三年过后，二人满师而归。狄公仍然不喜理财，家中生意交妻子打理，自己整天打拳练功，舞剑弄枪，空下来无偿帮人医治骨伤。

福源和尚后移单到张渚龙池山澄光寺，有空便下山到狄家歇脚，期间正式收

王永昌为徒，传授给三位爱徒八卦刀、枪、剑、钺。空下来师徒围炉而坐，谈及武林往事，不知晨昏，讲习拳法招数，不晓天曙。

狄公按福师要求，曾于1935年赴京城董海川墓，抄下五块墓碑文，并摄影留存。福师将董公八卦掌原谱抄件让三徒抄录，以溯正源。

抗日战争爆发后，兵荒马乱，狄公与福师失去了联系。后知福师去了江西，一直传授八卦绝技。

狄公一生酷爱武术，一生弘扬八卦掌技艺。1949年后，他在城镇医院（中医院）任伤科医生，开始带徒授技，第一个学生为史国庆，第二位是夏文彬，后陆续带了吕正立、孟小保、刘国良、管志松、胡阿庚等众多徒。1975年，他在《新华日报》发表《漫谈八卦掌》一文；1958年他出席江苏省运动会，获剑术第一名；接着参加了全国运动会，获剑术第二名。自此至2001年，狄兆龙先生多次参加省及全国及国外武术观摩交流大会，屡获大奖。他演练的九子寻母剑，长1.43米，重5斤，被称为“天下第一长剑”，直到93岁他仍能上场表演。

狄兆龙先生自1976年退休后，三十年间走南闯北，云游四方，他所到之处没有门户之见，悉心传授八卦精髓，所教弟子不计其数，桃李满天下。他传授过八卦六十四掌、指路拳、指路剑、片散流刀、七星杆、八母枪、鸡爪锐、鸳鸯钺等绝技，毫无保留，无私奉献，为史式八卦掌的传承推广，尽心尽力，不辞辛劳，功德无量。

狄先生在武术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在全国多家武术杂志上发表了八卦掌械的文章，1996年编著了《武当秘传八卦掌》这本17万字的专著，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武术文化遗产。

1994年，溧阳成立了“史式八卦掌研究总会”，狄先生是第一任会长。他的照片曾登载《武林》杂志封面，无数新闻媒体都曾报道过他的事迹。狄先生应该是史式八卦掌传承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溧阳人的骄傲。

王永昌（1907—1986），从小喜爱书法和武术，18岁时曾任上海国术馆武术教师，亦任报馆校对，可谓是文武双全的传奇人物。

王先生1949年后曾担任溧阳商会秘书长，1958年自己要求到人民公园当管理员，天天莳花弄草，美化公园环境。他晨起习武健身，晚上读书习字，过着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

王先生对喜爱武术的青年传授八卦武艺，但教育学生先要有武德人品。他

文化程度较高，在武术文化上深有研究。为弘扬武术精粹，他整理武术套路和理论，理论文章如《柔身八掌论》等，创编了龙行八掌、龙行指路拳、龙行刀、龙行太极等套路，以求新求变，写满了几十大本。只是希望八卦绝技不要失传在他们这一代。他自己总结出的拳法刀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们，即使“文革”非常时期，他私下教授的弟子深受其益，自己则几受威逼警告。

如果说狄先生是位高人，那么王先生像位隐士，小城里凡是练习八卦掌的门徒，大多受到过两位先师的教诲。

彭袭明(1908—2002)，画家，武术家，从小喜爱武术和绘画，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遍游名山大川，喜独行，常居荒村孤庙。善画，丹青被张大千称为“不信三百年间有此人”！抗战时避难青城山，八年间踏遍其山山水水，撰写了《青城近记》。遇陆俨少，一生引为知己，陆言彭君：“异人，博学多能，非与久处不知也。”

拜师福源，彭应为“大师兄”，他尽得师父真传，但他生性旷逸豪放，不受拘束。1950年变卖家产隐居香港元朗山中，一生淡泊名利，以教画授拳为生。求画不售，送给门生知己。一生未娶，与山水笔墨为伴。

在宜兴习武时，福师曾言彭：“此人前途不可限量。”他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在家乡常免费给人治病，并写有“疡方集要”。他一身武功，却从不外露。抗战爆发，与王永昌师弟俩一路逃难入川，生活无着，到人众处摆摊卖艺，打拳筹食，也遇武林中人前来交手过招，两人从未输过，可见八卦掌之功力。

在青城山，有道士见彭公习武，一定要讨教几招，彭死活不允。那道人无法，只好开打逼他出手，彭一路后退，到道观墙底突然跃起，人在身后，道士黄帽已经掉头，道士拜服。彭此招为八卦中的“上搓掌”，如帽换头，一命呜呼。

彭袭明隐居港岛，张大千曾言：“先生避地九龙，是地熙熙攘攘，未由杜绝，名下士颇传以得接清音为幸。而先生箕坐斗室，不出户庭。”如果说狄是高人，王是隐士，彭则为高士也。

彭袭明关心家乡，关心师弟，看到报上有溧阳消息，总要来信询问。看到表弟狄兆龙武术比赛获奖，他来信祝贺。1980年5月，他自己编印的《彭袭明画集》一出版，赶紧寄了两本给狄、王两师弟。狄先生与表兄书信不断，每年寄一锭老墨给彭，彭则以画回馈。路途遥遥，隔不断兄弟情深。

彭先生晚年患白内障,但仍不忘写信,画画。他去世后,遗留下满屋子书籍和画册,家无长物,其身后费用都由弟子分担,真可谓一代高士逸人,来去了无牵挂。

狄兆龙、王永昌、彭袭明三位八卦掌传人,有着不同的个性脾气,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有着不同的功德修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溧阳武术界不应忘却的三位杰出人物!

昭旷无尘彭袭明

“洗涤烦浊尽，视听昭旷生”

——孟郊《酬李侍御书记秋夕雨中病假见寄》

说到彭袭明，知道的人恐怕不多。

提起彭袭明是溧阳人，溧阳知道的人恐怕也不多。

研习史式八卦掌的门人大略知悉，福源上人将武林绝艺传给了三位溧阳人：狄兆龙、王永昌、彭袭明。彭袭明为狄兆龙的表哥，应为大师兄，武艺的传承亦应为上乘。而这位“大师兄”始终隐逸无踪，从未露面不说，其生平行迹扑朔迷离，神奇神秘，只听说其隐居香港，偶有书信画作寄给师弟，其余一概不知。

彭袭明的“默默无闻”，是因他的碌碌无为、庸庸苟生？还是因为他生性淡泊、不求闻达？

早在1938年，避居青城山上清宫的彭袭明，其画作和文章为张大千偶见，大千惊叹“不信三百年间有此人”！1980年，张彭相遇香江，八十二岁的大千发出“袭明先生文章高一世，画笔高一世”的赞语。要知道，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间第一人”的大千先生，是很少用这样的评语论人的！

著名画家、莫逆之交陆俨少评价彭袭明：“异人，博学高能，非与之久处不知也。”

我一直在关注乡贤彭袭明先生。

200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彭袭明画集》，这是在彭先生刚逝世一年的时间，由国内最权威的美术出版机构对他的艺术成就的一种肯定。2005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出版了《昭旷无尘——彭袭明绘画》一书，汇集了先生直幅、立轴、横幅、手卷、册页、扇面、成扇等85件之多。2011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又在“近现代中国画名家”丛书系列，出版了“彭袭明”画集，并由香港城市大

学陈蓓博士撰写了长篇论文《以笔墨合天地：彭袭明的山水艺术》，推出“他立足传统，持着力求变革时代精神，取经天人同师，开辟笔墨的新天地”的结论。

走近彭袭明先生，越发感到他的神秘神奇。他的生平资料没有传记没有自传，书载年谱都是三言两语，和什么人交往、得什么书画、观什么原作，言简意赅。他一生以画画为趣，以授徒为生，但他从不卖画，画作都赠送学生，作为学费的酬答。所以他的画集，都是学生弟子们将自己保存的老师画作凑集，汇合成书。他一生未娶，孤独一人，其归道山后丧事都由门人料理。没有资产，仅有图书字画遗世。独居异乡五十年，他身怀绝技，但从不示人，以致他的学生在编年谱时，对他研习八卦掌的经历几乎一无所知。他思乡情切，但自隐居香港，再也没有踏上家乡故园一步……

有人说他是“高士”，有人言他是“怪人”。在提笔想写彭袭明先生之际，我有点犯难。资料太少，评价甚高，对于这样一位奇逸高人，我有资格来写他吗？

和彭袭明有缘。当友人告知网上有他的亲笔签名盖章题赠侄女的画册出售时，我毫不犹豫地花高价买下。乡贤的墨宝啊！不可多得。

打开薄薄的1980年彭袭明自选画册“初集”，似乎闻到彭先生“凤辉阁”居所里的墨香。那潇洒遒劲的毛笔书法，透出浓郁的亲情关爱。我仿佛一下子拉近了和他的距离，不揣冒昧，为乡人介绍乡贤，尽力而为。

一、“归心原上草，绿到濂阳西”——彭袭明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彭袭明出生于溧阳。

彭家乃溧阳世族，袭明祖父、父亲都是蚕商，做白丝生意，因此家道小康。他的母亲出自胥渚狄家，也是溧阳望族，大家闺秀，能诗敬文，知书达礼。少年彭袭明喜欢音乐，爱拉二胡；喜欢绘画，信手涂鸦；喜欢武术，捐枪弄棍，枪头擦得锃亮，把店堂柜台上戳得全是洞。他还喜欢云游，少年就出游宜兴、无锡、苏州等地，母亲不但不阻止，而且每次要多给盘缠，让他回来讲述一路见闻为乐。彭袭明十三岁那年，母亲去世，慈恩不再，失怙心悲。

1924年，彭袭明十六岁，与朋友一起游览庐山。回来后，拜访当代金石学家、目录学家顾燮光先生。在其家费时月余，观看所藏原拓珍本碑帖千百种，眼界大开，“因此得知历朝书法的演变，与不同的政经、宗教信仰、人民风俗有关”

(《彭袭明生平传略》)。

1930年,他从上海美专毕业,留居上海。“民国文化第一人”、溧阳籍海上闻人狄平子,是彭袭明母亲的叔叔。在外叔祖父家里,他第一次见到狄家世藏的传家稀世珍宝王蒙的《青卞隐居图》。狄平子是位大收藏家、鉴赏家,他首用珂罗版印刷的《中国名画集》,共三十八辑。视野的开阔,大大提高了彭袭明的书画鉴赏能力,同时也坚定了他选择国画之路的心志。此后,他始游浙东五泄、四明、天台、雁荡等名山胜景,阅万卷书画,行万里河山,真正是意气风发,浪迹天涯。

1931年,返乡后的彭袭明和同龄好友王永昌,在清明节应宜兴友人之邀,赴玉女潭、张公洞游玩。友人向君介绍竹海海会寺来了一位董海川传人、武艺高强的和尚,两人一听大喜,急忙上山进寺拜谒福源上人,三人深谈一天一夜,非常投缘。两人提出拜师学艺,福源应允,彭王赶紧下山回家搬行李,与王永昌紧邻的狄兆龙也是位“武迷”,他是袭明的表弟,家境厚实,一听如此好事兴奋不已,再三恳求三人同去学艺。临行之时,王因店里杂事缠身未能前往,而彭狄两兄弟如约而至,经过三年的苦练,得了史式八卦掌的真传,回家休整时又传授给王永昌。后福师挂单龙池山澄光寺,常来溧阳城里与三个徒弟相聚,并面聆耳提,悉心传授,将八卦掌的沿革及精髓交给第三代传人。

彭袭明习八卦掌后身体壮健,前后判若两人。游黄山,那时天都峰绝壁尚未安装铁链,他竟能在向导的带领下爬上绝顶。后又随一江湖豪侠登泰山看日出,上太行山绝高处,绕道嵩山而归。

二、“风舸顺流骤如马,人生随处若浮鸥”——彭袭明

福源和尚在一见彭袭明之时曾言:“此人前途不可限量!”对彭君格外看重。

人,有时是一叶飘萍,在时代的大潮面前,只能无可奈何地随波逐流。

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彭袭明开始了逃难之旅。关于逃亡经历,应为和师弟王永昌同行,一路衣食无着,便摆摊卖艺,并邀人切磋武艺,但并未遇到对手。而《彭袭明画集》年谱上言,他是“只身从芜湖渡过长江,经皖北、豫南、鄂北到武汉。未久,沿汉水西行,留居当阳,游堆蓝山,白云长老云:‘你喜欢山水,可溯漳、沮两水到远安清溪寺一游。’清溪寺右边有一青螺洞,下面就是两水发源处,右后方有一鬼谷洞,终日滴水如雨,洞的左后方,有一山坳,如此得见楚蜀连山,高耸

人云，深谷无底”。“回来后欲游武当，惟因交通不便，未能前往。”

当年，彭袭明从宜昌经三峡到重庆，生了一场大病，愈后养病张大千故乡内江。数月后，又从内江经成都，西抵灌县，上青城山，居上清宫，得与张大千相识，观看他收藏的许多名画，其中有董源的《溪岸图》。不久后，彭袭明于成都举办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个人展览，成绩颇好。于是和一友人乘舟由岷江南下，到嘉定看江边大佛，上乌龙山，留居一日。又从嘉定西行百里，抵达峨嵋城下，次日登山，用三天时间游遍该山名胜。下山后，经青衣江乘车到成都，回归青城。

是年，彭袭明以“知常子”为笔名，撰写了《青城近记》，正《青城山记》之误；并注释陈撄宁的《中国道教协会宣言》。

1939年，三十一岁的彭袭明于上清宫结识陆俨少，成为莫逆之交。

1941年，《青城近记》初版面世。

1945年，抗战胜利，他原想从川陕公路到西安，以便游览终南、华山，出潼关，绕道回归乡里，因同伴生病，未得如愿。于是南下，和陆俨少乘木筏出峡，急滩险浪，惊心动魄，方抵宜昌。由宜昌乘轮经武汉等地，由南京、无锡回到故里。彭父在抗战前已去世，旧居和收藏图书，都已尽付劫火。

彭袭明回乡的一段生活，其侄子彭翟君有简略回忆，摘录如下：“在上海美专毕业后，他就遍游大山名川，黄山的险、峨嵋的秀、雁荡的清统统摄于目，记于心。他喜欢独行，常往寺庙，没有钱用，画几张画叫小和尚去变卖。”

“从四川回到溧阳新昌我婆婆家，那时我还小。”“叔父看事深远，他告诫我爸爸，不要认为家里有几亩地就成天在外赌，一旦地没了，你吃什么？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跟我学点医，对你今后会有好处。邻居蒋自胜是内科医生，隔壁是我大娘舅蒋廷庆，有名的伤科，为了不影响他们的财路，就决定让我父亲学点小外科。因为是免费为人治病，来看病的特别多，每天都有二三十人，一下子家里就热闹起来。别看三叔对家里人冷冰冰的，对病人却非常热心，他治愈了十几年的老烂腿，每次换药，都根据病人伤口情况上药，叫我大哥连夜进城买回一些贵重药材来用。更有趣的是他治疗疮，用一种叫‘麻丸子’的药，形状如老鼠屎，放入患处后几天就能把疮连根拔出，治好的人不知其数。他把实践中有效的药方一一写成《疡方集要》，至今还有两卷我妥善保存着。叔父喜欢寻幽探险，从四川回来带来半条脆蛇（另半条赠了朋友），这种蛇出没在高山悬崖峭壁处，从高处

落下来，一节节变成数段，一听响动就顷刻间接了起来，要捕捉十分困难，对骨伤疗效特佳，须在蛇的出入地挖几个深坑，才能捕到。”

乡居数年，想不到又要匆匆别离。据说，彭袭明变卖了田产，换成金条，于1950年冬月，孤身南行，移居香港。

三、“幽人自爱清秋景，闲坐虚窗对夕阳”——彭袭明

彭袭明初寓九龙，曾数易居所，后定居元朗郊外，以授拳教画为生，室名“且安居”。他鲜鬻其画，但好以画赠予学生，作为束修之馈。

乡郊清静，生活简朴，彭袭明廿多年隐居抱道，甘于清贫，享受寂寞。他常于南山一带写生，画墨竹，写松树，带领学生在香港胜景临摹自然。后情况渐次好转，认识了许多文人藏家，像吴子深、饶宗颐、王季迁、张碧寒、燕笙波、赵鹤琴、溥心畬等等，得以欣赏王蒙《夏山高隐图》、仇英《玉洞仙源图》、恽格《山水卉册》、巨然《茂林叠嶂图》、王蒙《林泉清集图》、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卷》、石涛《宋元吟咏册》等真迹。他在50—80岁间，笔耕不辍，写有《山水画习作法纲要》、《书谱书法分究》、《董其昌年谱》初稿、《山石十三势图说》、《经营位置》等专著，60岁后著录有《书画旨》、《见道篇》、《山水构图诸势说明》、《画要》、《山水心法》、《构图诸势说明》、《书法分类集录》、《董元名画分究》、《分布法究》、《黄公望山水诀补释》等。七十四岁时写有《中国山水画入门》。

彭袭明的画作很少有示人，仅有的几次参展历历可数：1978年水墨山水立轴参加香港艺术馆主办的“香港前辈艺术家作品展览会”；1981年以《上清幽居图》和《碧蘚岩》参加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之“艺展八一”；1984年以《山水图卷》和《诗意山水册》参加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之“艺展八四”；1986年以《石梁秋瀑图》参加美国 Aspen Art Museum 主办“现代中国山水画展”；1994年以《黄山十景图册》于置地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传统国画今貌”展出。

靳炎芳女士乃彭先生弟子，由她主编的《彭袭明画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其《彭袭明生平传略》写道：

七十岁患足疾，步履失匀，不能行远，眼患白内障，视力渐减，遂少下楼。余资多购书史、文集、珍本图册，用志临池，深究书画分布、互通

之理，并勤读经史，悟得“内无所养、外无所触、手无所发”要诀，书画之成，在于“极虑专精”四字。

八十多岁因眼疾，目力更逊，几不能视物，绘事停止，外缘几绝。一九九八年移居港岛静养，九十二岁时入院治眼，经数月诊治疗养，视力恢复，开笔重新作画，继续未完绘业。惜已届高龄，体力不复健壮，绘制作品不多，得手卷、册页十数，然画境奇变，笔墨高古，气韵清绝，皆非寻常之作，是老师一生用功的体现，精神所之寄，识者当自有论定也。二〇〇二年十月廿四日，于香港养和医院安然离世，享寿九十五。

老师一生，勤读经史、佛典、道书、诸子百家、山志……读书万卷，实不是浮言。常以“儒使人腴，佛使人清，道使人真”的读书心解，训勉诸生要多读圣贤经典，为修身立行的根本，然后绘事始能臻于善美。晚年虽饱受足疾眼患困扰，仍坚忍病苦，勤修书画文资，口述心得要旨，命余笔记整理，此数千万言语，一线传灯，或可留给后学者一正确学艺之路径也。

四、“万峰千嶂云中见，采药仙人何日还”——彭袭明

《青城近记》是彭袭明避乱青城时所著，初版于1941年，再版修订于1945年，2004年由巴蜀书社重印出版。

1938，彭袭明入蜀，在青城山上清宫一住就是八年。清人彭洵辑成《青城山记》二卷，由于褻缕草创，不免舛漏，悬想臆度，率尔为文，是为瑕疵。彭袭明在“书引”中言：“余始来天阁，寓常道观，淫雨不霁，购《青城山记》诸书披阅遣闷。憾士人不惯登临跋涉，遽悬想臆度，率尔为文，致讹误百出，思有以矫之，因泛览群籍，搜剔幽隐，成此册约数万言。后徙上清，冯住持见而善之，遂以付印。仓促未校正，错脱甚多，然未经岁而千册俱罄。余亦周览博访，觉前记多略，辄与改正，或加删补。今重为剖劂，爰弁数言于首，聊记写作之由，并留鸿痕云尔。”

1943年，辽东钟瘦眉为《青城近记》作序道：“有平陵彭昭旷者，世居吴季子之邦，偶避西蜀少陵之地，观栖常道，宫住上清。梦生彩管之花，袖隐青蛇之剑。书精鸿戏，绘比龙眠。啸咏之余，览游斯尚，每探前人之所未探，更到前人之所未

到,所谓独得益奇,而善发奥秘者也。先生固深达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乃周罗胜概,博探遗风,撰为《青城近记》,以享游者于来兹,庶可按图索骥,不致兴‘只在此山云深无处’之叹。”

《青城近记》字数虽不繁浩,但言简意赅,都是作者亲辑亲阅、亲力亲为之结晶,是对蜀中名山青城的一次大勘探、大归纳、大总结。书中内容分《名称沿革》、《位置》、《山界》、《气候》、《山脉与诸峰名称、位置》、《河流》、《宫观》、《物产》、《人物》、《艺文》、《楹联》、《摭余》和《后记》等辑,非对青城一文一籍烂熟于心者不能为,非对青城一峰一川足蹬手濯者不能知,由此可见裘明先生为文的严谨和郑重。

2004年《青城近记》再版“前记”称:“彭先生博取群书,详加辨证,踏遍青城,亲加验测,所以能以翔实取胜。对历代青城山记载中的讹误,的确起到了矫正之功。可以说《青城近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文字上,都有超出前人之处;既能为学者备用,又方便了游者。青城山能跻身于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之列,驰誉中外,其中也包含了彭先生的努力。今天,我们重印彭先生这部著作,正是为了缅怀他对青城山所做出的贡献。”

此言甚是。

彭裘明在1987年画的《青城景物图》上题款曰:“余居青城多载,土著相稔,草木生情,既登大面绝顶,四外表里无不遍历,其胜则雄奇幽秀兼备,不独以一趣擅名也。兹写后山、岷江、天彭关、漩口、莲花石、水磨沟、寨子坪景物,危峰绝壁,飞流急湍,荒村野店,曲径茂林,加以烟云变灭,移步换形,实难明状。”时间虽然过去四十余年,但青城胜景却历历在目,巨壑奇峰处处藏胸,可见他对蜀中名山的钟情之深。

五、“不信三百年间有此人也”——张大千

彭裘明初见张大千,是1938年于青城山上清宫。

抗战时,张大千也寓上清宫三年之久,偶然读到一本“山志”,奇其文而不知作者姓名,因而向道士打听。道士说只知道此人姓彭,时来时往,最近又不知去了何处。道士又言:这个人还会画画,但画不卖。张大千一听急忙问:宫中有他的画吗?道士拿出一张来,大千一看大吃一惊,惊叹“不信三百年间有此人也”!

他等彭数月，没能见面。第二年，大千去了敦煌，三年后始返回，仍旧住在上清宫，张彭始得见面，两人把臂言欢，甚是投缘。原来彭君时来时往，只因避俗如仇，不愿与世俗相交。张大千将自己收藏的名画与彭袭明同赏，其中有董源《溪岸图》等真迹。

1963年，寓居香港的彭袭明与张大千重逢，两人在毕寓拍下合影：彭西装革履，玳瑁眼镜；张长袍马褂，银髯飘逸。两君穿戴一西一中，但双手紧握，笑容可掬，可见两人交谊匪浅。彭向张打听海外所见董源、巨然真迹情况。

1964年5月，彭袭明赴香港新亚书院，再访张大千。

1980年5月，72岁的彭袭明自选册页《山水册》印就，大千居士为此写了长跋相赠：

袭明先生文章高一世，画笔高一世，人多知之，而澹泊避俗，杜绝交接，比之往古隐逸，尤为振奇，而人多不知也。抗战时，予自故都间关还蜀，同寓青城山上清宫三年，偶读所著山志，奇其文而不著著者姓氏，叩之道士，但云彭姓。时来时遄，近顷不知何往矣。又云：其人能画，画亦不卖。亟叩之，宫中亦有其画否？道士出一纸，大惊，运笔构境，大似子久，清逸直逼四王，当与华亭争道。画上有题，亦不署名，书法似方壶，尤为惊绝。不信三百年间有此人也。待之数月，未得相晤。明年，予西出嘉峪，礼佛敦煌，三年迺归，仍复借居上清，始得把臂，如平生欢，前者道士谓时来时往者，盖避俗如仇，不欲与人相见耳！忆蔡中郎传称其闲居玩古，不交当世，似犹不及先生之超迈也！大陆陷落，先生避地九龙。是地熙熙攘攘，末由杜绝，名下士颇传以得接清音为幸。而先生箕坐斗室，不出户庭。沈存中《梦溪笔谈》，载其过某处，闻是间有一异人，三十年步不逾衡门一步，因往叩之。其人独坐一室，室无长物，但有残蚀之维摩经一卷耳！存中叩问：闻先生三十年足不出户耶？其人微哂曰：此亦传说之甚也。因遥指墙外一大树曰：忆十二年前，曾一度纳凉其下。袭明其此君一流人耶？蔡中郎尚可企及也。近间于友人处读袭明画册，漫书其后。

六十九年七月，八十二叟弟爰。

离两人青城初识,时间已过去四十多年,但友情的延续却并未影响。大千居士回忆与裘明先生的过往,点滴都铭记清晰,亦如一幅文士交游图,笔笔都在胸臆。有趣的是,大千将裘明的隐逸与蔡邕相比,恰不知中郎当年亡吴十二年,远迹江湖,隐居之地正是溧阳。历史巧合,冥冥中似有机缘。

当年,张大年曾评价彭裘明为“江南一枝笔,其画必传”,这样高度的评语,应不是文人之间的酬答客套。

六、“异人,博学多能,非与之久处不知也”——陆俨少

1939年,彭裘明和陆俨少相识于青城上清宫,两人一见如故,视若莫逆。陆称彭为“异人”,深叹他的博学多能,并以秋景图相赠。

1945年,抗战胜利,原想游陕的彭裘明未能成行,于是和陆俨少一起乘木筏南下,历经急滩险浪,惊心动魄。关于此段经历,赵健雄著《画人陆俨少》有描述:

恰好做生意的友人,有一批木材由重庆放至汉口,答应他家免费搭乘。此时在青城山上结识的彭裘明亦由山上下来,到达重庆,候船回溧阳故里,住在陆家。几个月买不到船票,于是相约同乘一只筏结伴东下。对陆而言,有武功的彭,可以给自己壮胆。

这种木筏是由数百以上数围巨木扎成长方形的大筏,约有一个篮球场大小,厚两公分;前后各有大木一根以校正方向,左右也各有大木一根用来推进。有一二十工人操作。在筏上搭了两个木棚,其一为工人坐卧、吃饭之所,其一归陆家使用。筏上伙食自理,安全不保。

木筏过三峡历经千难万险,误入支流打旋,在万县灩渡搁浅,过瞿塘峡鬼门关,路遇匪船尾随……历经艰险,渡尽劫波。而沿江的水流湍急,洄湫激流,浪遏飞筏,危岩穹谷,悬瀑布涧,长云横霭,却也壮阔了两位画家视野。彭陆两人沿途浏览了白帝城、神女庙、丰都城,倒像是一场历险游历。对三峡之胜,彭裘明总结说“瞿唐峡如三代鼎彝,巫峡如两汉文章,而西陵峡如六朝人词章,绮丽而趋于薄矣”,颇合陆俨少心得。文人就是这样,总把艰险当笑谈,总把困厄赋诗意也。

筏至黄陵庙,离宜昌还有100余里,陆彭雇了小船连夜奔宜昌,归心似箭了。

而由重庆出发，至此历时已有月余。40年后，陆俨少写《自叙》，对木筏所见，一切茫然，记忆已不清晰，但画的峡江图前后不下数百幅，打下了陆氏山水的基础。

彭袭明对这次乘筏过峡记忆犹深。他在其画作《峡山奇境》中款识道：“抗战胜利，急于返里，黑市船票都为势利家所购，不得已乃与陆君俨少乘筏东下，险滩急浪，几乎葬身鱼腹，为时一月始抵宜昌。此后陆氏遂以江景驰名当代，余今亦写其大略，并附杜诗于后：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此图作于2000年，是他患白内障搁笔八年，治愈后的新作，时仅过两年即去世。

彭袭明曾作《巫山图》，款识：“神女庙，今名紫云宫，两江无径。攀摇此上望向蕉馆，竹风草坡，景物佳冷，于此指点十二峰，更可数达山，耕耨之氓，似可招而呼也。游者公列为川陈之。”他还画有《瞿唐泊舟图》，款识：“己巳初冬忆出峡所经作。”

彭陆两人，自彭赴港没见过面。相别30余年，约为1981年3月，陆俨少于港办画展，73岁的彭袭明患腿疾没法前往观展，陆便到跑马地他的住处拜访，两人相见，百感交集，互相拥抱，重叙旧缘。有一张彭陆合影，摄于餐厅，两人头发如雪，面对镜头而笑，彭依然洋装，陆穿着朴素。并肩而坐之时，上次在峡江，此次在香江，人生忽忽，仿佛梦中。

1987年，79岁的彭袭明和陆俨少重逢香港，1991年，陆又赴寓所拜访彭，并与友人和弟子九人合影留念。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因为过了两年陆去世，彭写文章悼念，内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之句。

据上海著名人物传记作家郑重记叙，他于2010年初应王世涛先生之邀，赴香港小住。王为彭袭明入室弟子，对彭陆之间的轶事娓娓道来，他并收藏有陆俨少致彭袭明信札72通，时间是从1978至1988年。《画人陆俨少》一书中第47章以“心声：与彭袭明书”为题，介绍了两位难友、画友、老友之间的书信内容。其中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79年1月13日，介绍陆为中南海创作大型布置画之事。其中有作画、托购、荣誉诸琐事近况，亦有关于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真伪的探究，也有对元人画作评论。1986年6月19日陆给彭去信云：“弟近命书斋曰‘晚晴轩’，半生坎坷，得稍安处，今衣食粗足，无他求，但欲长保健康，尽其微力，发挥余

热,多留些翰墨,如能投老精进,略有成就,庶不虚度一生。弟生活简单,不善营谋,平生无片缣旧迹之畜,过眼烟云,如或稍存,则十年动乱,反增悔恨,以足私窃自慰。”一位饱经风霜的老画家的心声,在给患难之交的老友信中,尽情倾吐。

七、“君室孤高无长物,胸中静处无纤尘”——冯康候

张大千称彭袭明“文章高一世,画笔高一世,人多知之,而澹泊避俗,杜绝交接,比之往古隐逸,尤为振奇,而人多不知也”。

彭袭明于1961年开始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中国书院任教山水课程,但不久就开始“私家授课,后陆续有从学者”。一生以授徒为生,专注画学的钻研,潜心投入画学的追求。对于他的艺术成就,吾辈不敢妄评,还是摘录画坛文界时彦评语为参考。

香港艺术馆荣誉顾问范甲曾为《彭袭明画集》题名并作序,序曰:“彭公袭明先生讳昭旷,别号知常子、昭旷道人、武夷后人,江苏溧阳人也。公系出世家,天予稟赋,才华高卓,襟怀磊落,高旷清奇,少壮立志,博涉文史,精研画理。性淡泊,不喜交接,一生好入名山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搜妙创奇,器识恢弘,画宗六法,造诣尤深,所作水墨山水,画如其人,竟无一笔尘俗气,足以睥睨古今,雄视八方,不愧为当今艺苑高人,众皆叹服,岂是偶然哉!先生晚年病目,几难握管,嵩龄九十后,始延医诊治,稍瘳而勉力作画,绘成山水长卷等十数帧,更有笔精墨妙,淋漓幽逸之致,见者,莫不叹观止矣。”(节选)

香港大学美术馆曾于2005年7月至8月,举办过一场彭袭明画展,涵盖了先生自1950—2002年不同时期的绘画。美术馆馆长黄燕芳撰“前言”道:“彭袭明先生,字昭旷,藏巨壑于胸臆,聚逸气于笔端,绘画流露一股昭逸清旷、脱俗不凡的韵味,正如他笔下的高山流水,洗尽尘虑。”“彭氏承袭五代、宋元以来的文人画传统,通过描绘山川景物,抒发心灵感受,表达胸中丘壑。他通过大量临摹古人画作及写生,运用浓淡深浅不一、充满微妙变化的墨彩,概括蕴藏心坎的山水形象,把揭示自然景观的内在神韵作为艺术追求最高的目标,即唐代画家张璪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造化自然的基础上,寄托怀抱。”

香港城市大学陈蓓博士言:“彭袭明山水艺术的追求,可能总结为‘以诗法构想,以书道用笔,以造化为形,本内外兼修,心物交融而辅之以豪迈逸宕之气,为

山水开生面，护宇宙之奇闳，使人神游心赏，玩味无穷。’”

薛慧山在《大成杂志》登载的《画中高士彭袭明》一文中写道：“（彭袭明）默默地隐居在香港这人海之中。他的山水作品，果真所谓‘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表’。足当为‘逸品’之称而无愧。”“他‘笔墨之美，冠于当代’，是此时此地一位‘画之隐者’。”“跟大千居士提起此人，老人家矍然对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此君来无影，去无踪，甚似小说中剑侠之流。当年我寄居在青城山上清宫的时候，也曾偶然见他的画，笔墨高雅之至，但一直找不到他的下落，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直到我在敦煌去了回来，在宫中才有缘相见，却又非常投契，快慰平生……他的画，大概先从元人黄大痴、黄鹤山樵入手，然后融会贯通，自我创作，其得意之笔，足与董其昌辈挑战有余，只是他的作品，从来不肯轻易示人，又懒于交际，更不求时誉。但我肯定的是，这样的画品不但求当世既是罕见，也可说近三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千居士对彭袭明的评价之高如此，直到今天，我出示了彭袭明画册之后，承他老人家于百忙之中，犹奋其大笔，一口气写出了一篇情文并茂的长跋，见者莫不诧之为异数。”

台湾大学教授、著名作家、画家台静农评价：“不落蹊径，谓之士气，不入时趋，谓之逸格。其创制风流，仿于二米，盛于元季，泛滥明初。称其笔墨，则以逸宕为工；咀其风味，则以幽淡为上。虽离方遁圆，而极妍尽态，故荡以孤弦，和以大羹，憩于闾风之上，泳沆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也。袭明先生画，高简淡远，为之神住，南田画语有极合先生风格者，录之用博会心一笑。”

著名画家陆俨少：“异人，博学多能，非与之久处不知也。袭明我兄居港垂四十年，虽日处纷华繁会之地，门外红尘十丈而门内静寂似深山太古，一芥不染于心，真所谓泥而淄者也，以其人品之高，故其笔墨高洁，似其人也。”

当代名画家黄君璧：“观彭公袭明之画，洒脱不羁，意境超越，笔墨清超，非庸史所能望其项背也，佩服佩服。”

国学、书法大师、西泠印社社长饶宗颐：“袭翁山水，力追董郭，出入黄王，长于写深远，绵密峰峦，千态万状。老辣处石涛青溪，亦须俯首。宣和画谱论河阳，回溪断崖，岩岫险绝，云烟变灭暗霭之间，一时独步，可于翁画见之。”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周士心：“彭袭明先生胸次丘壑，遗世独立，文有奇致，画得古意，展观力作，觉畅心冲淡，雅逸之气溢于纸楮，笔意含蕴，真气内藏，

读之神往。”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讲师张碧寒：“性爱山水，遇丘壑佳处必逗留多日，饱览沃观而后已。其画诀只‘随山发皴，因景立法’八字而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西东大学教授王方宁：“彭袭明先生品性高古，画如其人，所作多具宋元风范，当今艺坛纷错，宋元传灯，系于一线。先生作品影印行世，必有继往开来之功，书此以示仰慕。”

故宫博物院编撰、画家王光宾：“着笔疏而秀，落墨淡而醇，渊源有自，用力功深，尤能别开生意，心窃仪之。”

台湾画评家李叶霜：“今读袭明先生是册，始信所言不虚。出入宋元，如入自家庭院，又时而隐括之，以芟其繁芜，时而斟酌之，以胸中块垒，高怀逸韵，钦仰无已。”

香港《文汇报》鸣岚：“他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

《纽约时报》画评 MICHEAL BRENSON：“展览中最具启发性的画作是彭袭明在一九八四年所绘的《石桥秋瀑图》。画面上笔触交织肆溢，画家的描绘恰如其分，任何线条的加添都会使画面陷于崩决，在视觉上此画不祇令人目眩，而且将山峦宁谧而凝浑的气势表现无遗。”

名画家董寿平：“笔墨到处，子久清湘尽收腕底，其苍茫荒率处，绝似大痴，洵可谓学古而不泥古，比之清初大家，毫无逊色，拜观钦服，率题数语，以志眼福。”

八、“开樽莫上楼高处，远见苍苍故国山”——彭袭明

客寓香港，彭袭明画名日隆，声誉鹊起，而武名少有人提。作为史式八卦掌的第三代传人，他是否弃武从文、专心绘事了呢？

早年跟福源和尚习武的经历，影响了彭袭明的一生。据师弟王永昌回忆，他们两人逃亡川蜀，一路卖艺糊口，也有武林高手过招，一无败绩。而在上青宫与武道交手，用“搓头功”拨转黄冠，也是佳话。其侄回忆三叔曾绑铅练功，后疾走如飞，快过轮船。抗战返乡后客居新昌，村上有一壮汉名“白雄鸡”的，颇有蛮力，一次想乘彭不备绊他一跤，结果不知怎样自己摔了嘴啃泥。

阅彭袭明年谱，居港后武艺从不轻易示人，但对武术之好不变。其在日记中屡有记载，虽言语不详，略略一提，但可见他兴趣不减当年。

1953年7月访谭明道问粤中“八卦”，精进武艺。

1954年2月，观孙宝刚演“八卦推手”、“龙形掌”。

1955年10月，观席旅平演“吐纳功”。

1957年10月，与王纾仲夫妇谈“达摩内功法”。

后随年岁增大，彭袭明足不出户，鲜有武事记录。

彭袭明被友人称为“青城剑侠”，说他“说剑峨嵋顶，论道青城丘”，但由于其性格不事张扬，许多往事不见于文字口述。

关于文人之交，他在画跋中偶有涉及，寥寥数语，供人遐想。如《疏林山色》图题款：“往居锦城，尝与君璧先生至杨遇春孙家观画，时徐悲鸿氏同在，而余年最幼。既来香江，知学源先生与黄先生有旧，且索拙画，念三十年来两君子皆名震寰海，而余业艺无成，染翰之余，甚是愧于时贤也。”

黄君璧在台湾，徐悲鸿在大陆，都是画坛巨擘，一代风流，彭袭明在此自谦“业艺无成”，作为“画隐”，他不是无意进取，只是不求闻达。张大千说他“其画必传”，一言足矣。

在《上清幽居图》中，彭袭明题款：“海内闲身轮我佚，山中佳气为人浓。昔与大千居士同寓青城之上清宫，岁月悠闲，每诵此二语以自况。自别兹山，匆匆四十年矣，烟霞泉石，时入梦寐。丽泽索画，因为图之，觉高台景趣，如在目前。”

青城锦城，如在目前，而故乡家园山水，又何尝不是“时入梦寐”？在彭袭明的山水画作中，不少是荆溪景致，这与他早年在海会寺山峦中习武，不无关系。邻县阳羨的风物，常常见于他笔端，以致有人误将其称作“阳羨人氏”。

1981年，彭袭明作《荆溪揽胜册》，其中有“铜官山”、“玉女潭”、“碣石坞”、“张公洞”、“善卷洞”、“碧蘼岩”、“白云岩”、“武陵洞”等八帧，每幅都有题款，或用古人题咏，或由游历为文。如“玉女潭在张公洞后二里，文征明有记。”“碣石坞在湖滢南宜长分界，岭下一径深入，四山环抱，景物清幽。”“善卷洞，小舸泛入，可穿山而出，秋月山花缀紫，景色尤美。”“龙池绝顶石龕中有沙门潜修于内，名白云岩，下临峭壁，前接竹海，绿云蓊荟，弥望葱茏，越岭可至海会寺，兼揽石龙圈诸胜，其下澄光寺亦阳羨名刹。”“武陵洞，一名西施洞，余习静山中，数数过之，穿窬而出即磬山寺也，乃阳羨大丛林之一。”其记事状物描景十分详细，当年三载的入山习武，攀越徜徉，自是铭记心胸。

1980年,彭袭明绘有《善卷洞图》,题款曰:“善卷有乾坤两洞。坤洞潜通碧藓岩,小船可至。乾洞瑰丽,左崖金钟,花粉紫色,垂垂石隙,其色野艳可爱。地属荆溪,而去吾梓里甚近,往时数数游之,故详悉其景状。”是年,又作《洞泉水石图》,题款曰:“江南多洞泉,水石幽丽,董北苑画中常见之。如宜兴之善卷、武陵、太极等皆然。而太极尤瑰奇特异,以地处荒僻,游履罕至。余两择,始穷其胜。钟乳下垂都作莲萼,惟恬状青赭殊色,信海内甲观。”

1987年,他又画《荆溪岩洞水石图》,卷首款识云:“荆溪为吾郡邑,景物之佳,甲于江南。地近笠泽,两从铜官、离墨、龙池诸山,连峰接岫,千丘万壑,挥诗难穷。自唐宋元明以来,文人雅士盘桓其间,诗篇画迹流传甚多。顾浅游不深,便游不广,未能尽其洞岩林泉之美也。余昔养静山中,名胜古迹,罔不遍览,兹所描绘,什一而已。”1985年他画的《山水图册》,其第八页为题曰:“荆溪玉女潭,为吾邑先贤史公玉阳仙居旧址,舍已荒芜,无游踪。”

2001年,彭袭明已95岁,他在全盲八年之久后,割除白内障恢复视力,即作图不辍,但体力已不行,仅作长卷两帧,一为《峡山奇境图》,一为《岩洞图》,交给学生王世涛作为绝笔。《岩洞图》重写阳羨五景,并题了长跋。蜀山峡境,江南洞泉,是他一生最爱的题材,也是他生命中难以忘却的印迹。

九、“十里青山,一溪流水,都做许多情”——彭袭明

“异人”、“怪人”、“画隐”、“高士”……当众多的形容词冠在彭袭明的头上,使他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其实,除了不善俗接、疏于应酬之外,他是个有肉有血的寓公游子。

如果说他是“异人”,不如说是“画痴”。他为画松,写下了千百幅草稿,有时为观察一棵古松在晨光中怎样的形色,绝早就盘桓其下。为画邻居围墙上一丛修竹,每天进进出出仰头凝视,以致次数太多引起邻居人怀疑,竟一下把竹砍去。

彭袭明晚年患眼疾,但他不相信西医,只信中医偏方。于是告诉学生王世涛,说昔日借居青城上清宫,有一道教练师采有一种草药叫“一朵云”,是治疗眼病的灵丹妙药!你赶紧给我取来。王世涛笑着说真是“一旧云”啊!只得托人去寻找,谁知友人不负其望,真的觅得此草药空运到香港,彭用后开始有效,但不能治根。到了84岁时已近全盲,只好进浸会医院欲动手术割去白内障,谁知彭老

先生仅住院一夜，第二天归家，手术未成！就如同他患膝病，不肯就医，慢慢就不能步行了。这就是老人的固执！一直拖到2000年彭92岁，始进养和医院治疗白内障，手术成功，重拾画笔，但已耽误了整整八年！目明后作画不绝，但体力不再，只能多作册页小卷了。

彭袭明安于清贫，无意名利，一生未娶，与书画为伴，留下了境界极高的墨宝，但为此他奉献了个人的全部心血。“闲卷孤怀背尘世，独营幽地傍云岩”，简朴自适，不求时誉，逍遥自在。

从“且安居”，到“凤辉阁”，到“从因楼”，再到“海会楼”，彭袭明的家一搬再搬，斋号一换又换，但不变的，是他一颗思乡之心，一片故乡之情。

彭袭明有印钤“江南客”、“家在投金濑畔”，均是家乡的印记。投金濑，为伍子胥报溧阳史贞女守口舍身之恩，在濑江投下三斗三升“金瓜子”，李太白曾有铭赞咏此事。彭画落款，多为“濑阳袭明”或“濑阳昭旷”，可见他一刻未忘自己的根扎在梓里故土。他画《墨竹》，题曰：“墙外新篁渐成林。乡居有此，自以入画。”

《溧阳县志》记载，米芾之子米友仁曾来溧，画过《溧阳溪山图》，此画早佚。彭袭明在其《江水烟雨图》上题款曰：“米友仁为吾邑新昌蒋仲常作《云水图》，真迹犹存，余变其法成《江水烟雨图》，仿佛其地山川。嘉节怀旧，不见故里之思泉。己巳重阳无客，晴窗作此并识。濑水彭袭明。”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珍贵的名画线索。重阳虽不能登高望乡，不能饮故乡之泉，但以画“寄兴游心”，怀旧之思溢于笔墨。

独在异乡为异客。彭袭明在其画作题跋中，思乡之情令人心动。“残山剩水飘零客，不为听琴也白头。”“中庭碧树覆前轩，远望青山亦到门。行李曾移多少处，新居总是别人园。”他乡再好，总是异乡啊！又：“故国三千里，他乡二十年。羁人惊柳色，客子畏杜鹃。”每到春至，怕听杜鹃唤归！又：“借住桥西傍柳堤，三春芳草正萋萋。年年北望无归日，树上子规也不啼。”又：“秀色满芳堤，青林百鸟啼。归心原上草，绿到濑阳西。”又：“钓得鲈鱼出水产，开樽斫脍对长川。可怜今日良朋会，不是归舟是钓船。”

即使白了鬓发，老了容颜，但乡俗难忘，乡情难却：“它乡习俗未深谙，岁岁思家意不堪。三日芳菲头更白，绿杨依稀似江南。”客居他乡，年年想家，即使是看到绿柳，好像也只有家乡才有。这种深入骨髓的情缘，读来令人怆然泪下。在

《江南春》图中，彭袭明题道：“倪元镇有《江南春图》并词，文衡山尝画而和之。余江南人也，年老羈旅，岂能无感？漫写此图，笔意略近赵子昂《水村》卷，不令人在久违矣，放笔题思。”移情尺幅，墨写故园，对游子来说，也是一种无奈的寄怀。

彭袭明人在港岛，心系溧阳。他和师弟、表弟狄兆龙常有书信来往。狄的弟子在北京武术比赛中得奖，他来信祝贺。家乡遭旱，中学生食物中毒，他得知消息都来信询问情况，其时已患眼疾，字大如斗且交错重叠，但这是一片赤子之心啊！

1980年，彭袭明的自选山水集一付印，即给家乡的两位师弟各寄了一本。表弟知表兄善丹青，每年寄上一锭老墨供其临池；表兄知表弟生病，寄来千元供其营养，并每年有画作寄来。表兄曾邀表弟南下香港一晤，但两人终未见面。

彭袭明自1950年赴港，从此再未踏足江南。

放棹好向溪山去。他的归舟终未解缆，他的钓船停泊香江。

笔行至此，夜深春寒。画集上的乡贤彭先生在对我笑着，笑得很灿烂。

我将他亲笔题写的画册放立面前，仿佛与其对晤：“庚申初夏，画册印成，邮赠贤姪女，并祝新婚愉快！三叔识，时居香江凤辉阁。”

有人放言，说“溧阳地薄，不出人才。历古邻县金坛有段玉裁、华罗庚，宜兴有徐悲鸿、吴冠中，其地能报出几位？”

吾辈无言。真无言乎？熬灯费油，耐寒忍暑，坐凳出痔，昏头酸腰，咬牙切齿，揪发揉穴，吃力地爬着格子，翻着故纸，为啥？作甚？

一个心愿：不能让先贤青史湮没于时间的长河！

溧阳多高士。高士多隐逸。像袭明先生这样的胸襟，我是无法企及的。“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彭前辈曾用辛稼轩的词题赠弟子。

我似懂，又不懂。让您见笑，袭明先生。

题外余话。

徐悲鸿的溧阳缘

缘,一个有点玄的字眼。

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两件不相干的事,忽然就那么相识相知了,蓦地就这样相关相连了。其中媒介,看不见,摸不着,仿佛冥冥之中有一根红丝线,把人和事牵扯到了一起。这就是缘吧?

亲缘、姻缘、友缘、学缘、乡缘、佛缘……人的一生,离不开缘。

徐悲鸿,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艺术大师、教育大家、一代宗师、美术先驱……众所周知,他是宜兴这块土地上养育出的文化名人,和溧阳似乎并无多少瓜葛。

“徐悲鸿是溧阳人培养出来的!”“徐悲鸿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溧阳度过的!”“徐悲鸿在溧阳有很多亲友!”听到这样的话语,我大吃一惊!溧阳出的才俊远不如宜兴多,是不是非要攀附邻县的名人来充门面添光彩呢?

冥冥之中,也许是缘,我的生命中陆续出现和徐悲鸿有关的人和事。点点滴滴,零零碎碎,经历过往,资料文献,让人惊讶,让人感叹。随手记下,想哪写哪吧。

廖静文女士坐在轮椅上,面对前来参加“徐培晨艺术馆”开幕仪式的溧阳各界人士,她大声地说:“我想讲一下悲鸿在世的时候,跟我讲的他与溧阳的关系。悲鸿在过去有一个好朋友叫陶麟书,是个做药材的小商人,因为跟悲鸿的父亲是世交,所以悲鸿十岁的时候父亲就把他带到溧阳来,跟他认识……”

文化局的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有重大发现,廖静文亲口讲徐悲鸿小时候到过溧阳,你知道这件事吗?有相关资料吗?

我说我知道一些。

那天是2014年4月30日。

三

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某一天,溧阳党史办副主任、文史前辈奚渭明找到我,说:“你在北京工作,能否托你一件事。我有一篇关于徐悲鸿的文章想寄给廖静文女士看一下,但又不知怎样交给她,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地址吗?”

我那时在“驻京办”混饭。

一个休息日,我骑着破车来到新街口大街,走进那座著名的“徐悲鸿纪念馆”。同样著名的那座徐悲鸿雕塑,在庄严又有点冷静的氛围里,迎接着我这位隔壁乡亲。

走进展厅,看到展出的徐大师真迹,激动不已。这些早已在书刊上见过的巨作,虽然隔着玻璃窗,依然在散发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人少,厅静。我沉浸在那幅写着“悲鸿生命”题款的《七十二神仙卷》的神韵中不能自拔。

突然,一个很响亮的声音传来,分明是大嗓门的女声在大声说话,与周围宁静的环境形成对比。谁啊?我循声寻去,见在一间明亮的展厅里,一位头戴红色绒线帽的老太太正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她对着话筒大声地讲着带点湖南音的普通话。这不就是廖静文女士吗?

采访间隙,我大胆地上前,对老太太说:“廖馆长,我是悲鸿大师家乡来的!”她一脸疑惑,大声说:“啊?”我提高声音:“我是江苏来的,有一篇文章想请您过目,请问怎样寄给您?”“啊?”她还是不明白。边上有人讲,她耳朵不太方便。我恍然大悟,难怪她讲话这么大声!拍摄又要进行,不方便再打扰了。

纪念馆门卫边有个小卖部,我买了一张徐悲鸿纪念邮票小全张,上面有廖静文的亲笔签名。我问小卖部的大爷:“我有一封信要寄给廖静文,怎样寄好呢?”“廖馆长几乎天天下午来,你就写新街口大街徐悲鸿纪念馆她收好了!”

我在徐悲鸿塑像前深深鞠了一躬。

第一次寻访，就见到了廖女士，缘分？

四

1895年7月19日，徐悲鸿出生于宜兴圻亭桥。

他的祖父做了十年工，才盖了一所简陋的小房子。他的父亲徐达章依靠自学成为一个画师，在乡里靠给人家写对联、卖画为生，同时种几亩薄田，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徐达章于光绪丁未年（1907）曾画过《荆溪十景图》，纸本、设色，风格受徐渭、任伯年的影响，写实功力扎实。当时宜兴境内的寺庙观庵上的匾额，很多出自他的手笔。

悲鸿原名寿康，据说因少时常从半夜里哭醒，其声如悲鸣鸿雁，因此改名“悲鸿”。他六岁随父学书画，九岁开始临摹吴友如的画，读书、学画、种地，放牛、戽水、刈草。

十三岁那年，家乡大水，徐悲鸿只能跟父亲出外谋生，替人画像、写联、刻章，走江湖卖手艺。十七岁时，父亲重病，他担任三个学校的图画教师，负起家庭重担。十九岁，他父亲去世，他借债葬父。二十岁时，他赴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开始了新的人生。

叙述徐悲鸿的青少年生涯，大多是这么的经历。而其中一段他人生重要的过往，知晓的人并不多。悲鸿十岁时为什么要来溧阳？廖女士谈及的陶麟书又是何人？徐达章和陶麟书是怎样认识的？徐悲鸿和陶家又有什么渊源？

五

“禾德堂画廊”的主人黄玉希先生，溧阳人，他给我发来一张拍卖会的徐悲鸿手迹，照片边上有其学生黄养辉先生的题跋。

悲鸿手迹为诗一首：“春水绿迷漫，青山秀色含；一帆风性好，舟过万重峦。”后有诗注：“先君率我过西沅至溧阳舟中小诗，匆匆三十余年。录于安弟。丙子元月，悲鸿。”

黄养辉题跋：“师少承家学，故从小即能吟诗作画。此师十岁左右，侍父达章老先生舟行之作，书于丙子元月，赠其胞弟寿安叔者。按丙子为公元1936年，师43岁，抗战之前夕也，前推30余年当在十岁左右，真实生动，情文两茂，弥觉可

珍！泳雪妹持之见示，属题为记上。1978年暮春 黄养辉并书于宁。”

廖静文女士在溧阳说：“悲鸿十岁跟他父亲到溧阳来，画了一张画，悲鸿的弟弟保存了这张画，给了女儿，还把这首诗背下来了。这是我对溧阳的第一印象！”

宜兴东氿边上竖着数块诗碑，其中就有徐悲鸿的这首诗，并有徐先生的题跋：“本世纪初，余方苕龄，先君达章公载余赴溧阳，过寄陶趾祥先生家。舟经宜兴东西氿，写景咏此，将五十年，犹能记忆。悲鸿。”

两幅诗作，一幅为40多岁写，一幅为50多岁写，前幅书迹潇洒秀逸，后幅墨宝苍郁老辣。只是一字不同，前者为“风性”，后者为“风信”。

韩其楼先生为宜兴文史专家，他撰文言及此诗，亦为“风性”。

一首十岁时写的小诗，悲鸿先生念念不忘，几次题写。那么，他父亲带他乘舟前往溧阳，过寄给陶趾祥先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六

姜丹书(1885—1962)，溧阳南渡刘家边人，毕业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师从李瑞清先生，与吕凤子、李健、江采白等一起为我国第一批艺术教育人才，以第一名成绩取得举人学位。后执教于浙江两级师范，与李叔同同为图画教员，培育出了丰子恺、潘天寿等艺术大师。

姜丹书先生为我国美术教育先驱，撰写了我国第一本《艺术史》，并最早出版了《艺用解剖学》、《透视学》等艺术教育专著。丹书先生勤于笔耕，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史料。他写的一篇题为《画家徐达章小记》的文章，我们不妨一读：

画家徐达章小记

徐达章，字成之，宜兴县屺亭镇人，是近故友人名画家徐悲鸿的父亲。他和我溧阳乡友陶麟书很要好，陶常常和我谈及他，人物、山水、花卉皆擅长，文字亦好。家贫，清光绪年间卖画于宜兴、溧阳、建平（辛亥革命后改称郎溪县）一带以为生。我曾见他所作《课子图》（原作大约是堂幅？兹是缩小影印插图片，刘汝醴藏）：父四十许，面正相，脸长方，科

着头，时装长衫，身稍侧，坐在树筋藤椅上，手执羽扇，目凝神，似注意其子朗诵的模样。子约十岁，面正相，脸圆硕，科着头，时装长衫，坐其父稍前位，书桌上摊着垫书布，布上摊着书，有笔砚等文房器具及一个小菖蒲盆，目凝神，作背诵状。右后侧立二少女，一女面八分侧相，古装仕女服饰；一女全侧面相，仅露半面，全身被松干遮没；相与作听书声状。四人相貌皆开得很好，是现实性的，表情亦皆佳，且互相相应，有绘形绘声的妙趣。姿态自然，衣褶流畅遒劲。右侧一老松，枝叶扶疏荫上方。下脚地面略布小竹、短栏、细草，均甚落位。后壁一正面，一侧面，侧壁上露出半个圆洞窗，从窗中遥见室内所设帐幕和叠书等物。就全面的意境看来，是表现新秋时候，在庭园内松下读书的场面。一切经营位置皆恰当。左边长题，亦颇落位。总的说来，足称能手。此图是由悲鸿带到苏联印在某杂志上，题字缩得很细，肉眼几看不出，但我尚辨得出起首数字是“光绪二十有一年岁次乙未中秋之……”云云。据此，则尚是一般性画题的创作，不是他们父子的现身写照。大概悲鸿此时尚未出生，即使已经出生亦尚在怀抱，决没有这样大。因为悲鸿大约小我十岁光景，可以推算而知，我光绪十一年生，今七十三岁，悲鸿当在光绪廿一二年生，今若不死，当为六十三四岁。陶老先生又曾告我说：悲鸿在十几岁读书时，其父即教他坐在附近岷山上对树石练写生，亦可见他的家学渊源了。陶、徐是通家之好，故知之甚详。

徐达章先生为同治、光绪间人，民国十余年卒。

一九五七年冬观记于无锡华东艺专校舍

七

溧阳城里有片药店叫“松茂祥”，店主陶瑞，字麟书，号趾祥、留芬，爱好音乐、绘画，是位儒商。

陶瑞和徐达章一见如故，引为知己。徐达章每次到溧阳来都带着儿子寿康，居住陶家。日子长了，徐达章提出把寿康过寄给陶瑞，陶瑞欣然应允。寿康跪拜寄父，此后常住陶家。

陶家有二子一女,长子嘉贵,次子嘉谿,女儿蕙清,还收养两女福珍、贤珍,加上寄子寿康,儿女成群。陶瑞一视同仁,予以照拂。他见寿康有绘画天分,城里嘈杂,店里人多,不是读书之地,于是在城外十里的泓口西泗墩村上租了一间屋,从南京聘请了一位教师,让寿康和嘉贵两人搬到乡间去读书绘画。他为寿康买来许多笔墨宣纸,让他潜心习作。寿康也不负苦心,刻苦用功,两三年里画了整整十多箱的木炭画、铅笔画、水彩水粉画,画艺大有长进。

寿康十七岁,父亲病重,他便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开始在宜兴始齐小学、女子初级师范和彭城中学担任国画教员。

寿康十九岁那年,徐达章去世。廖静文说:“后来悲鸿父亲去世,那时候家里穷得没有钱埋葬父亲,他写信给陶麟书先生,借二十块钱买棺材。陶先生不但借钱给他,而且亲自帮悲鸿料理其父后事。这是悲鸿活着的时候对我讲的话。那时候陶麟书先生还活着,悲鸿叫我在北京寄钱给他。”

徐悲鸿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期间,陶瑞常支助其生活费用。后他赴日本、法国深造,陶瑞一次就汇了1 000元旧币作留学之用。

1949年前后,陶家陷入困境,“松茂祥”药店因失火烧尽,全部家产毁于一旦,陶瑞一急之下双目失明。陶嘉谿开了一月米行,因经营不善而蚀本关门。家道中落,十口之家,生活艰辛。徐悲鸿知悉,每年不定期地汇款前来,以报抚育之恩。有时500元,有时1 000元,以解燃眉之急。

徐悲鸿一直想把陶瑞一家接到北京定居,但陶瑞怕水土不服而执意不从。1953年,悲鸿又来信催促,希望陶家举家北上,变卖笨重家具,他等9月份开完文代会来溧阳迎接。谁知徐悲鸿在会议期间脑溢血猝死!噩耗传来,陶瑞为痛失寄子哭了三天。

八

奚渭明将搜集到的资料,写了篇《徐悲鸿与溧阳》的文章,收到他那本《溧阳》一书中。

他将《溧阳》寄给了廖静文,此时已距他写成文章过去了9年。

2000年1月17日,他接到一张“三阳开泰”的贺卡,廖静文女士回信道:

渭明先生：

《溧阳》一书收到了，关于介绍悲鸿的文章也看了。悲鸿确曾十分系念陶先生，第一次中风住院期间（1950年），曾嘱我汇款给陶先生，他很想为陶先生治好白内障。至于书中早年与陶家的叙述，我未听悲鸿详述过，后人写此，因未目睹，只能作为参考。悲鸿写给陶先生求借二十元埋葬父亲的信稿，其妹夫曾保存，现拍成照片陈列在馆内。我在《徐悲鸿一生》中也提及。

祝你新年健康、幸福。

并致谢意。

廖静文

徐悲鸿向寄父告贷的信写道：“今临穴有期，欲世伯代筹二十元，使勿却者，则悲鸿刻骨铭心，愿化身犬马而图报耳……”

陶瑞之孙陶维钧，向奚渭明提供了徐悲鸿与陶家交往的素材。奚根据采访经过，又写了《苦寻徐悲鸿的足迹》和《再寻徐悲鸿在溧阳的足迹》的文章，先后寄给了廖静文。时隔两年，廖回信：

奚渭明同志：

你2001年的来信，我今天才看到，非常抱歉。因为当年出差，回来信件堆积很多，有一些就被遗忘了，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今天整理办公室才找出来。

您的大作《再寻徐悲鸿在溧阳的足迹》，我读了很感动。有那么多溧阳的朋友还在心中保留着对徐悲鸿的记忆。请代问候陶麟书先生的两位公子和女儿。正如尊文所述，悲鸿是陶先生的寄子，我记得他1951年正逢手术在医院病床上，曾对我讲，他的寄父陶麟书先生患白内障眼睛看不见，他想接他来京，听说可以开刀治好。但是后来由于悲鸿中风在医院躺了四个月，回来后又卧床近一年，所以他未能顾上接陶麟书先生来京就医之事，我知道这是悲鸿心中的遗憾，也可以想见悲鸿对陶麟书先生的感情。而我作为悲鸿的妻子，在悲鸿去世后，未能完成

悲鸿的心愿,而感到深深的内疚。当时我太年轻,又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女,深深感到生活的沉重和压力。许多在悲鸿去世以后,我应做而未做的事,至今仍在我心里留下极其深沉的痛苦。

我将把您寄来的文章交给资料室保存,并向你深致谢意。

敬祝

新春健康

廖静文 口述

陈秘书 代录

九

我原来住在溧阳城东门万太街一幢老楼的二楼。

出出进进,总见我楼下有位干干净净、直腰直背的老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衣裳穿得直直落落,经常迈着一寸金莲去买菜,去串门,有时晒晒太阳,邻居称呼她陶老太。

碑林巷有位世纪老人谈华清,五保户,无儿女,满腹往事故事,人生经历曲折。我有事无事,总去陪陪谈公公,听他讲讲古经,讲讲掌故,回家记录下来。

一次在谈公公处巧遇陶老太,她是包了馄饨送来给他尝鲜的。老太走后,谈老问我:“你知道她是哪个吗?”“陶老太呀!我们住楼上楼下!刚才不是攀谈了。”“她叫莲珍(小名),是徐悲鸿的寄妹子!”我大吃一惊。

谈老告诉我陶家的几件往事。

陶瑞是怎样和徐达章认识的?陶瑞的药店经常要去无锡进货,那时是走水路,船摇一天到不了,刚好在宜兴妃亭桥过夜。夜来没事,陶瑞上岸散步,见临河一间房子里有人画画,不禁进去观看,画者徐达章,两人爱好相同,越聊越投机,遂结为朋友,经常走动。寿康十岁那年,过寄陶瑞,徐达章也是想给他找个好点的人家培养他。

徐达章过世,徐悲鸿连父亲棺材钱都没有,写信给寄爷(爹)借钱。后来他夹把雨伞,从妃亭桥走到溧阳城,前来报(丧)信。一到药店,见到寄爷,“扑通”跪在陶瑞面前,放声大哭!(那时报丧都要带把雨伞,哪怕晴天)陶瑞扶他起来,马

上雇船赴宜兴，买棺材，办羹饭，置坟地，花去大洋八十块。

奚渭明的文章见报后，陶老太摇着小脚，拄着拐杖，摸到报社楼上去找作者。奚赶去会晤，陶老太说：“悲鸿认我父亲作寄爹后，就常住在我家。有时，我父亲包了人参、蟾蜍等补品药材，让他回岢亭桥去看望生病的父亲。”

“悲鸿比我哥哥陶嘉贵大三岁。开始两人在城里念书，后来到泓口西泗墩去念，是我父亲请人来教的。悲鸿的成绩比我哥哥好，他有空时就画图。我家有三间屋与一家烟酒公司相联，有一阵天一亮，就有一只狐狸从公司跑出来，悲鸿不去惊动它，专心把他画下来。他还画狗、猫、鸡，最喜欢画马。”

“悲鸿最喜欢我了，画了画，不签名，不盖章，送给我。有一次他画了一张画，我骑在一只狗身上，我哥哥在前面用绳子牵着狗跑，笑煞人！”

十

当今，徐悲鸿大师的作品动辄百万、千万地拍卖，真是价值连城了。有一个敏感的话题：陶家到底有多少悲鸿的画？

奚渭明在《徐悲鸿与溧阳》一文写道：“徐悲鸿在世时，在陶家的习作以及寄赠甚多。少年时代画的十多箱，在日寇占领溧阳时毁于战火。寄赠的绘画有八幅：四幅画的不同姿态、神采的骏马；有四蹄奔腾的飞马，昂首站立的骏马，挥动尾巴的白马，蹄交叉的奔马。另四幅是：一幅猫，一幅立于悬崖上的大雄鸡，一幅牛，上有书写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还有一幅就是给寄父的祝寿图。后一幅，在‘文革’中，连同仅存的全部书信，被付之一炬。其中两幅画的题词、落款、印章，因摄于当时的淫威，全部剝去。其余五幅，都转移外地。当地文化部门多次前往征求墨宝以展出，也只能扫兴而归。”

1950年，陶瑞70大寿，远在北京的徐悲鸿没有忘记寄父的生日，画了一幅骏马图来祝寿，上面写着：“寄父大人寿，悲鸿，戊子（1948年）四月敬书。”陶嘉镛结婚时，徐悲鸿画了两幅画作为贺礼。

陶冀清回忆：“我22岁结婚，（悲鸿）他画了一只雄鸡、一只雌鸡，带着五只小鸡，意思是：祝我们五子登科。这张画和他写给我的信，‘文革’中被造反派弄去了……”

谈华清老人告诉我：“陶莲珍嫁给了胥渚狄家的狄勤芝，是老油坊的少掌柜，

榨油换油，家底殷实，深宅大院，内有花园。徐悲鸿送她的那幅画，‘文革’被抄走了，她知道在谁手里，多次讨要没有结果，下落不明，后来人家放话出来讲，老太别闹了，你有什么生病络痛我们管，用钱给报，画没有了……”

陶老太我见她时已 94 岁，身体硬朗。后来少见了，据说去了儿女家，活到百岁，没见那张“鸡的一家”！

十一

在北京西城的“中国画院”，雕梁画栋，小桥流水，亭台楼阁，闹中取静。

在院内的亭中，张晨先生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儒雅文气，侃侃而谈：“徐悲鸿先生作为杰出的艺术活动家，一生除从事艺术创作外，投入精力最大的既是培养艺术人才。他在国立中央大学担任教职的近 20 年间，总共有学生 300 余名（包括旁听生和肄业生）。”

张晨是中国画史的研究专家，他的父亲张安治，扬州人，1928 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科，师从徐悲鸿、吕凤子，后执教中央美术学院，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史研究专家。

“1946 年冬，徐悲鸿先生推荐他的学生一行四人赴伦敦考察学习，其费用是教育部用中英庚子赔款出的，这四人是张蓓英、陈晓南、费成武、张安治。这里面还有一件轶事，当时四个名额里面有一个是福建省的，徐先生爱才心切，做通了当时福建督学的工作，让出了名额。后来那个督学据说给革了职。”

2010 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大型的“徐悲鸿师生艺术联展”，张晨负责编辑了一本《艺为人生——徐悲鸿的学生们艺术文献集》，收集了 25 位先生的资料作品。他递过厚厚的一本《艺为人生》，说：“书几乎没有了！这本还是送给你吧，陈晓南不是你们溧阳人嘛！”

阳光透过绿阴的间隙，像筛过的碎金铺散在古亭的石阶上。2013 年 7 月 4 日，一个温暖的日子。

十二

廖静文女士说：“后来我就不知道陶麟书先生的消息了。所以我这次来还希望如果他有后人，我应该去感谢他们。”

2001年，陶维钧曾回忆，1988年和1993年，他两次去北京，都参观了徐悲鸿纪念馆。第一次去，在纪念馆里遇到了廖静文，虽然没有见过面，也从未联系过，他还是从徐悲鸿的画册上认出了她。当时，他年幼的儿子在一旁也认出了她，指指点点几乎说出声来，但陶维钧马上拉拉他衣角，示意别声张，别去打扰廖女士。参观完毕，他原想在留言簿上写几句，后一想作罢。“我这个人，是不会攀的。”

徐悲鸿生前对陶瑞一家感恩戴德，念念不忘。

据说，溧阳城里有一人，竟把徐悲鸿的画揭去表层真迹，将底层高价出售。谁知这幅以假乱真的画几经转卖，到了国民党一个委员手中，被看出破绽，扬言追究。这位造假者吓得魂不附体，跑来央求陶瑞，请徐悲鸿重新画一幅好去抵偿。陶瑞去信寄子，悲鸿随即寄了一幅新作来，以了此案，那个小人得以保命，千恩万谢，再也不敢造孽了！

溧阳城里，据说不少人手里有徐悲鸿的画，但未曾一见。有位先生曾撰文提及悲鸿来溧作画一事，应是史实。这位先生叫程沅。

十三

邱行湘先生对徐悲鸿很是钦佩，他回忆：“我记得悲鸿先生于1928年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时，关心南京古城的风景文物，特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不要拆除玄武湖自太平门至神策（即今之挹江门）丰润门一带的城垣，以保留历史上的艺术胜迹。那时南京政府批准先生的请求，明令妥加保护。悲鸿先生的远见卓识，使金陵城外明孝陵至尧化门一带的中华民族之瑰宝——石刻人像、石兽等艺术珍品得以保存下来。”

邱行湘，溧阳南渡邱家桥人，生于1907年，18岁进黄埔军校，38岁当将军。1948年3月洛阳被围，蒋介石派飞机将他接到南京，亲授死守之事宜，让他任洛阳警备司令。他41岁被俘，1959年和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十一人获特赦，后任江苏省政协委员。

1941年3月，邱行湘由湖北恩施去四川，亲见悲鸿先生兴致勃勃在画抗战题材，心里对他越发敬佩。“悲鸿先生胸襟豁达，他的一生交友之道是：达则共赴艰巨，穷则愿作林下土，以道义终。”

徐悲鸿和溧阳人有缘。

曾在明治大学当过舍监的曹铁生，是溧阳人。悲鸿随达章公流浪卖画时，在溧阳认识曹君。曹见悲鸿勤奋好学，曾将欧洲艺术大师们的绘画复制品赠给悲鸿。曹是一位落拓不羁的旧知识分子，嗜酒，不修边幅，爱打抱不平。曹君别号‘无棒’，取‘穷人无棒被狗欺’之意，爱仗义执言，不为校方所容，因此失业。后来悲鸿帮助曹铁生到汉口谋生。

悲鸿先生和在中国文艺社工作的华林先生亲如手足，关系十分密切。

溧阳王平陵亦悲鸿先生的莫逆交。一九四三年春，华、王两老为悲鸿与蒋碧薇的和好，出了不少力。特别是王平陵对悲鸿之爱护尤为深切。

邱行湘对徐悲鸿的追忆，十分真切详细。

一九四三年春，我的五弟行槎在重庆失业，走投无路，后得徐悲鸿先生的照顾，安排在重庆美专陈之佛校长身边学习。暑假中还支持行槎偕同美专四位同学到宜昌三峡，参加抗日战线的宣传工作；写标语，画漫画，在三峡写生、演戏，使行槎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悲鸿先生爱弟子，从行槎可见其办学精神。

记得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北平艺专开学时，悲鸿先生邀我到该校参观，他艰难创业，费了不少心血。

邱行湘的弟弟行槎后来去了台湾，是有名的指画家。多年后返乡探亲，作梅花图一幅，馈赠乡里，聊谢养育之恩。

十四

廖静文女士回忆：“悲鸿有一个学生叫陈晓南，是溧阳人，国画不错，就他一个人在重庆，我和他很熟。他现在也过世了。他家里不知还有人没有？如果有我也希望去看一下……”

1908年1月15号，陈晓南出生在溧阳戴埠镇陈家村。

1931年，23岁的陈晓南来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师从徐悲鸿先生。

1942年,陈晓南在重庆被徐悲鸿聘请为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并兼任私人秘书。

1946年,由徐悲鸿推荐,陈晓南一行四人赴英国考察学习,他在伦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从鲁宾斯教授专攻铜板画艺术。

1950年,42岁的陈晓南回国,带回一幅巨型英国艺术大师勃朗琼的铜版画《锯木工人》,赠送给徐悲鸿先生,现珍藏“徐悲鸿纪念馆”。归国途中他受悲鸿先生之托,专程到新加坡将抗战期间委托黄曼士秘藏的一千多幅书画共九箱带回国内。回国后,应徐悲鸿先生之聘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1951年,陈晓南在中央美院建立铜版画工作室,并任徐悲鸿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美院工会主席。

1953年,徐悲鸿先生病逝,周恩来总理指示筹建徐悲鸿纪念馆,由吴作人任馆长,陈晓南任副馆长,负责整理研究徐悲鸿遗作。

1961年,陈晓南调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从事铜版画教学、创作、研究工作。

1993年10月14日,陈晓南在北京同仁医院走完了他的艺术人生,享年86岁。

陈晓南先生是中国铜版画艺术的先驱,是中国铜版画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十五

程运(1909—1999),画家,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入上海新华艺专攻读,是小城溧阳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他擅翎毛走兽,指墨画得潘天寿真传,鹰猴狮虎、翠鸟八哥,画来十分传神。

程运父亲程筱堂,随父从徽州绩溪来溧经商,开间香烛店,喜爱书画、古玩,与溧阳前马村画家陈半亭过往从密。程筱堂、陈半亭与徐悲鸿熟识,曾在一起作画。

程运《忆名画家陈半亭》写道:“一九二六年春节时,徐悲鸿先生来溧阳探亲,与半亭先生相处甚得。曾同在我家作画两日,也合作了好些作品,可惜全部毁于战乱,片纸无存。”

1926年,徐悲鸿为31岁,陈半亭为24岁,程运为17岁。

程沅后来对女儿程萍讲：“画稿画了撕，撕了画，废了一堆，被你奶奶拿到灶膛烧火了。早知徐悲鸿的画日后这么值钱，哪还舍得烧掉？哈哈……”

徐悲鸿春节来探望寄亲，证明他是个十分重情义之人，那作画两日，据说食宿全在程宅，以便日夜切磋绘事。

程家和陶家是邻居。杨家院程家的对门，就住着陶家小儿子嘉谿。这也促成了程沅和徐悲鸿的一段师生缘分。程沅赴上海新华艺专念书，陶家小姐莲珍做了介绍人，推荐给寄哥予以关照。程沅家境中落，莲珍拿出私房钱 300 大洋供其学资（谈华清语），又为他做了一身长袍马褂做“出客衣”（程萍语）。到了学校，徐悲鸿对程沅也是格外关照。

至于徐悲鸿当年在溧期间的画作，到底有无遗存？成了一个谜团。

十六

徐悲鸿常对邱行湘讲：“画马，要以马为师。”

1942 年 5 月，在湘西会战中，邱行湘率部歼灭日军一个旅，俘获日酋关根旅团长的金黄色战马，他打算送给徐悲鸿作纪念，但苦于没法空运。后来部下又送给他一匹“菊花青”，深为喜爱。后来徐悲鸿曾将这匹好马画进了大作《九方皋》里面。最后到了北平，邱行湘立即给徐悲鸿送去两匹战马，以供徐写生之用。

赠马终成。良骥伯乐，由画传承。乡谊友谊，溢于言表。

十七

1942 年 6 月 29 日，在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内，欢迎徐悲鸿教授出国访问归来的联欢会热烈而隆重。会后，师生拍了合影，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徐悲鸿先生双手交叉，脸带微笑。他右边站着的上身西服、下面短裤的人，就是陈晓南。

邱行湘写道：“在中学里与我同班的陈晓南，是悲鸿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一直培养他到英国读学，我曾看到一九四二年悲鸿先生从新加坡回重庆中大艺术系与师生的合影，悲鸿先生站在前排正中，右边是陈晓南，左边是留有山羊胡子的陈之佛，当时我这样想，晓南学了画，我则学了剑。”

在徐悲鸿九十寿辰之际，陈晓南写文章悼念恩师：“我为恩师徐悲鸿感到无

上的光荣与骄傲,为有幸得到他的栽培感到无比的自豪与幸福。我跟随徐先生二十多年,他不仅在艺术上孜孜不倦地教导我们,而且在思想上、品德上也为人师表,给我们以深深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陈晓南到徐先生画室去看他作画,当时他正在创作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他问陈晓南等学生,田横是怎样的人?故事是什么意思?大家瞠目结舌。徐先生将这位历史人物的故事详尽地讲给大家听,让学生领悟艺术作品所含的教育意义。

徐先生还介绍中外艺术的各种画种流派,使陈晓南知道版画中除了木刻,还有铜版、石版画等等。

他在编成了《初伦杰作》一书后,给了陈晓南几幅单页画片,让他细心研究。抗战期间,陈晓南又参加了徐悲鸿亲自组织的“战地写生团”。后来所画素描《轰炸后的重庆》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抗战美术展览会”,并在苏联《艺术杂志》上发表。

陈晓南的一生,与徐悲鸿的师生缘绵绵相连。

陈晓南的外甥、溧阳台湾同乡会原会长朱志东回忆道:“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读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由于勤奋好学,深得系主任徐悲鸿大师的赏识和栽培,成为嫡传得意门生,造诣非凡。舅舅毕业后在中国文艺社任职,当时我父亲居住在南京中华路尼玛巷,每逢假日,徐悲鸿先生、晓南舅舅还有溧阳籍全国著名的作家王平陵先生,都会到我家聚会,饮酒作画,文采飞扬,可谓人生乐事。我虽年幼,但记忆犹新。”

王平陵(1898—1964),溧阳人,原名仰崇,笔名西冷、史痕、秋涛等,1924年曾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后主编《中央日报》副刊,提倡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闻人。

1935年,由徐悲鸿先生介绍,陈晓南到南京中国文艺社工作,华林为总干事,他在那一干就是十多年。

廖静文在《往事如昨——忆晓南先生》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美术学院,我第一次见到了陈晓南先生,他是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抗日战争前,他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曾受教于徐悲鸿,擅长

国画。他对老师悲鸿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这感情贯穿在他的一生中。

陈晓南先生回国途中,途经新加坡,悲鸿嘱他前往好友黄曼士家中,取回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悲鸿在南洋举办支援祖国抗战的画展时,留在新加坡的作品。其中40幅油画,都是悲鸿的精心之作。

徐悲鸿女儿徐静斐在《忆晓南叔》一文中回忆:“晓南叔叔常说:丽丽是我看着长大的。这句话反映晓南叔叔与我们家的密切联系。”“1985年我曾去秋瑾姐家看望晓南叔,他那时正患老年痴呆症,认人都困难了,但他还是认出了我,紧紧握着我的手,亲切地叫了声:‘丽丽’。”

十八

程萍女士今年72岁,这位曾担任过溧阳卫生局副局长、市政协副主席的老人,至今仍住在祖屋杨家院旧地的老楼里,她回忆起父亲讲的一些往事,还是记忆犹新。

程沅曾讲,蒋碧薇和徐悲鸿恋爱,遭蒋家拼命反对,一个大家闺秀,一个贫穷书生,门不当户不对呀!蒋徐私奔,气死蒋父,这面子往哪搁呀?在当时可是伤风败俗丢死人的大事件!蒋父逼得没法,只好对外宣称女儿得疾病暴亡,全家正儿八经办丧事,像模像样出棺材。当然那是空棺材!

徐悲鸿出国留学,经济拮据,寄妹子莲珍变卖首饰,瞒着家人供给了寄兄。

“文革”期间,陶家藏的徐悲鸿的画怕惹出灾祸,只得把悲鸿的题字、印章剃去。陶嘉镛大儿子在西安工作,杨家院老屋拆迁,他回来说我不要分房产,给我一张徐悲鸿的画就行了。后来,据说他拿了一张没有题款印章的画回去。

陶莲珍对结婚时悲鸿寄兄送的那张画一直耿耿于怀,始终追寻下落。她几次找到程萍,说要去找县长,讨回“鸡的一家”。程沅和程萍都劝她想开,“文革”浩劫,能捡条命就算不错了,何必在乎一张画呢?

程萍叫陶莲珍“姑姑”,常有来往。

莲珍姑姑和亲兄弟、晚辈都不来往,弟弟死了也没去看一眼。为什么?有人说都是为了画。

十九

1946年8月底，徐悲鸿从南京来到北平。

在一次和邱行湘的交谈中，他提到存在南京的大批书画、古玩，因交通梗阻，无法北运。这些珍贵的收藏品，许多盖着“悲鸿生命”的印章，如不及时抢运出来，不但对徐悲鸿是一大遗憾，对国家来说也是极大损失。

邱行湘听此言有些焦急，又有犹豫。当时蒋介石连打败仗，形势紧张，军运繁忙，空运这些重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为了艺术珍品，为了民族财产，也为了乡友众望，邱行湘还是决定帮这个忙了！他派人事科长胡本莲专程前往南京，临行时叮嘱：“一定要把悲鸿先生的东西抢运回来，哪怕多费一些周折，亦在所不计！”胡本莲在受命后誓言：“无论冒什么风险，一定把悲鸿先生的东西抢运到北平！”不到一个月，胡本莲没负重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复命，胡说：“我能为徐先生效劳感到欣慰。”悲鸿对他十分感激，特意邀请胡本莲到他画室，作泼墨《奔马》落款赠胡，以表谢意。

1947年后，邱行湘多次到徐家作客。有次，悲鸿对在座的廖静文讲：“静文，邱先生如果要我家里的东西（指书画），要什么就给什么！”邱行湘听后是十分感动，这种情逾手足的友情，铭记肺腑。

二十

我有幸结识陈晓南先生的公子陈秋虹先生，他赠送我《墨香悲秋——晓南先生纪念集》一书，了解了不少陈晓南和徐悲鸿的师生情谊。

我还去北京南城采访了陈晓南女儿陈秋瑾女士，她告诉我不少徐家和陈家往来的情谊。

陈晓南生前曾写道：“（悲鸿）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讲起过，溧阳是他的第二故乡！尤其对溧阳的小吃，如豆腐脑、乌饭等等，他总是赞不绝口。”

陈秋虹告诉我，以前家里送了乌饭给他父亲，陈晓南先生总是舍不得吃，先要送给悲鸿老师尝鲜，徐老师边吃总要边夸赞：“好吃！好吃！”

徐悲鸿曾画过一幅《生八月方熟之桃》，题词道：“古典主义作家必写五百年结实之桃，大于真肥城桃两倍。如溧阳西瓜，胃健者一次亦能食得一个。但如此

大桃子，吾实未之见……”

豆腐花、乌米饭、棠下瓜……这些充满地方风情的溧阳特产，由童年而壮年，已深深印在了徐悲鸿的生命里。

我曾陪同陈秋虹先生前往戴埠陈家村附近的大洪山岗，去祭扫陈晓南夫妇的合葬墓。青山苍翠，碧水清澄，普通的墓冢，掩埋着不平凡的中国铜版画教育奠基人的遗骨，让人肃然起敬。

陈秋虹告诉我，1946年陈晓南赴英国前，徐悲鸿先生曾画《奔马》图赠别，上题：“晓南弟将有欧行，特此赠别。”又画折扇《猫》一幅，上题：“晓南仁弟游欧，悲鸿以此赠别。”还在陈晓南的册页上题“雪泥鸿爪”封面四字，可见师生情义之重。

徐悲鸿曾画《雄狮》一幅，题“晓南仁弟属，悲鸿丙戌早春”。此画已于1986年由陈氏姐弟捐赠给宜兴徐悲鸿纪念馆。

二十一

我曾问起程沅几位弟子，有没见过程先生珍藏的徐悲鸿画作？他们均肯定地回答：没有。

那么，1926年那场两日程家笔会，真的如程先生所言“片纸无存”了吗？

程萍女士告诉了我一些端倪。

吴世明律师已经90多岁了，重病住院。他和程沅是老友，是世交。吴家是周城人，大地主，房田众多。抗战时期逃难，程家躲到了吴宅，结下交情。

吴世明律师亲口对程萍讲，程沅曾给他看过两张徐悲鸿的画作，一张是《牧牛图》，牧童拉着一头水牛，另一张吴先生没讲内容。

程萍姐姐程星曾讲，看到过另一张《猫鱼图》，一支竹竿上挂着一条鱼，下面蹲着一只馋猫盯着鱼。

程萍讲，她也从没有见过徐画，不要说学生了。

1989年杨家院老房拆迁，拆迁补偿83元一平方，拿新房要360元一平方，程家可享140多平方，但巨额差价哪里来钱？程萍着急得不得了。程沅先生不急不慌地讲：“不要急！实在没办法卖掉两张画咧喂！”可说归说，也不见他拿画出来卖！程萍没法，跑到信用合作社开口求贷，借了2万多元总算买了住房。

“文革”期间，程家曾被抄，书画、花瓶、铜器被红卫兵拖去一板车。那两张画

幸免于难？

程运先生在世，始终未露有徐悲鸿的画作珍藏何处，后来已成了另一个不解之谜了。

也许，面对价值连城的画作，还是守口如瓶为好。也许，正如程先生所言，画作早已灰飞烟灭了，留下的，只是美好的记忆！

二十二

前不久，《大师的背影》纪录片的开机仪式，在溧阳天目辉煌酒店举行。著名导演米家山率领他的摄制组，将用情景再现的形式，记录包括徐悲鸿大师在内的艺术家们的往日风采。

我和徐悲鸿先生的长孙徐小阳坐在古色古香的厅里，聊着徐大师在溧阳的点点滴滴，聊着我所接触到的有关徐悲鸿的人和事。

徐小阳先生讲：“你所讲的都是徐悲鸿先生生平研究中的空白。因为在溧阳这一段历史，没有人好好整理过。你能尽快把它写出来吗？因为明年就是徐悲鸿诞辰 120 周年，我们打算拍一部纪录片，可以用这些材料。”

我送给他一本奚渭明先生的《采古撷今话溧阳》，因为奚老虽然去世，但他是史料发掘者。其余资料，我点点头，说：“试试看吧！”

我始终相信，人是有缘分的。

铜版画先驱陈晓南

溧阳东南的山区小镇戴埠，自古就是竹木山货聚散的商埠。往南几里地，有个村庄叫陈家村。村的西北，有座叫大洪山的翠岭。山麓，一片苍松郁林之间，有几座简易的墓冢。一块墓碑上有这么几行字：“中国铜版画艺术的先驱、铜版画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陈晓南和夫人高凤生合葬墓。”

风过松吟，鸟儿啼鸣，一切寂静安宁。杂树生花，幽谷生香，一切归于自然。

对于墓的主人，我们已经陌生，而他离开这个喧嚣的世界，仅仅才二十个年头。对于墓的主人，我们心生怀疑：这么一位艺术大师就长眠在这么默默无闻的地方？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陈晓南学生王莉莎说：“我们要否定、忘却一个人是多么容易，而要懂得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

我们懂得陈晓南吗？

—

1908年，戊申年1月15号（农历丁未年12月12日），一个取名桂荣的伢儿降生在溧阳戴埠的陈家村。

这里风景奇秀，山水相依，村后青山叠翠，松涛竹浪如烟，山溪清流常年不断。春天，漫山遍野花簇似锦，更喜那无际的桃林，花开时节，真可谓“天机烧破鸳鸯锦”，“烘楼照壁红模糊”；村前绿水纵横，塘渠沟通，水清澈无染，游鱼可见。田间的秧苗、菜花、豆蔻、麦浪，脆嫩金黄，编织成梦幻般的天地。村东头有古松数株，如苍龙顶立，常有松鹰盘踞；下有灵官庙、土地庙各一座，这是村民们焚香上苍、祈求丰年与保平安的

地方。村西有有一大片森林，古木参天，景色神奇，这是孩子们捉迷藏与游戏的乐园。远望陈家村，只见一片苍松翠竹，不见居家，庄内有百十户人家，炊烟起时，也只是林间烟雾浓重。只有在冬季，树叶稀落，大雪压弯了竹梢，才能依稀看到那些白墙青瓦。

我家门外有一围场园似镜，周边有枣树六七棵，还有梅杏桃李、枇杷、石榴、棕榈、櫻桃、栀子花以及丛生的蔷薇杂草等，一年四季，竞吐芳华。稍远处有一条曲径小路通向一片竹林，内隐各种珍奇的飞鸟：有雪白的鹰、鹅黄的鹇、鲜红与纯白的寿带、悦耳的画眉、灰蓝的喜鹊、花斑的啄木鸟和精灵的小松鼠等，它们来往穿梭于萧竹密林之间，行天堂之乐。竹林深处，有一垄高埂，上有三四人合抱的橡树五六棵，树上白鹭成群，繁衍栖息。竹林东侧有一池荷塘，夏秋季节，白莲盛开，清香诱人。

这是陈晓南之子陈法民，对故乡陈家村田园诗般的回忆。

陈家祖辈都是地道的农民，家境贫寒，经过几代人的耕作劳治，终于有了水田山地数十亩，青瓦楼房十多间。陈晓南的父亲寿林先生，勤劳朴实，心灵手巧，乐施好善，年轻时帮人出殡抬棺材折断了腰，因而成了驼背，人称“骆驼寿林”，不满四十岁就病故了。他的母亲迟三妹，生了五个孩子，陈晓南居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

陈晓南乳名桂荣，原先学名陈毅，后改名晓南。他和夫人高凤生是表兄妹做亲，旧社会讲究亲上加亲。他的弟弟桂华，是位老师，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三十多岁就忧愤而死。母亲迟三妹，一位朴实的山村妇女，命运十分凄惨，年轻守寡，丧夫丧子丧女，后又接连失去两位女婿及孙儿，一连串的打击逼使她常常喝酒浇愁，一个人跑到田里坟头去哀号痛哭，以泄胸中悲哀。抗战时期，家乡沦陷，陈晓南远在重庆，音讯全无，生死未卜。1953年9月，迟三妹病故，恰巧徐悲鸿先生也在同月逝世，为料理恩师丧事，陈晓南未能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一生引为憾事！

陈宅进门有一方天井，景色如画，花坛有花卉兰草、假山玲珑，墙角有天竺腊梅、月季牡丹。如果说是故乡的秀山丽水孕育了陈晓南的艺术天分，那么故园里凋零的花魂应是他难以释怀的梦境。

二

1915年,陈晓南在村上读小学。13岁那年,他进城到私立同济中学读初中。又过三年,他考入镇江的省六中读高中,校长是两江师范毕业的名师吕凤子。1926年,18岁的陈晓南中学毕业后回陈家村教了一年书。一年后,他入无锡市美术专科学校读书,校长为民国大儒吴稚晖。1930年,陈晓南应聘去印尼的苏门答腊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1931年,23岁的陈晓南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师从徐悲鸿先生学画。同时他在南京鼓楼小学任美术课教师,半工半读。毕业后,他由徐先生推荐到中国文艺社任美术编辑。“七七事变”后,他随文艺社迁到重庆。当时,陈晓南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于1938年春参加了由中央大学艺术系吴作人为团长的“战地写生团”,深入到台儿庄战区访问写作,这是由郭沫若、田汉直接领导的抗日活动。1939年6月,他又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抗日前线太行山、中条山一带访问,这是由周恩来、郭沫若、老舍等组织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

中国艺术研究院剧作家葛一虹回忆:“6月18日,我们从细雨纷飞的山城出发,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老舍参加欢送会并致辞热情鼓励。这支被称为‘笔部队’、‘笔游击队’的战地访问团,一路经成都、西安至洛阳,而后在渑池渡过黄河,进入山峦叠嶂的中条山。那是战争的前线,敌机在上空盘旋,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前方还不时传来隆隆炮声。我们这些久居城市的热血男儿,在这里终于呼吸到了战争的空气,每个人的心情都异常激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我们手挽着手,迎着战火硝烟,《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在深邃的山谷间久久回荡。”

原中国美协主席、版画家王琦回忆道:“我与晓南相识在1939年的重庆,当时画家沈逸千来约我去参加陈晓南刚从战区前线带回来的一批写生画展。经沈的介绍,我和晓南同志初次见面,他很热情地请我对他的作品提些意见,我对他的那些丰富生动的战地写生画非常感兴趣。”“晓南当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秘书,我们有工作上的接触。我发现晓南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待人接物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精明的才干,无怪乎他会被老师徐悲鸿先生所赏识,长期成为徐悲鸿先生

行政事务方面的左右手。悲鸿先生在重庆成立中国美术学院时，晓南便是学院的副研究员兼秘书……当时我对晓南的两幅油画《雾重庆》和《嘉陵码头》曾经做过认真的评价，认为他的《雾重庆》在技法上得助于英国风景画大师透纳的影响。”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冯法祀回忆道：“陈晓南因抗战以来画了许多战地写生作品，创作了优秀国画，参加了国内外许多重要展览，被聘为（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并兼任徐悲鸿的私人秘书。”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在《往事如昨——忆晓南先生》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美术学院，我第一次见到了陈晓南先生，他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副研究员，抗日战争之前，他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曾受教于徐悲鸿，擅长中国画。他对老师悲鸿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这感情贯穿在他的一生中。

他的身材并不高大，黑黑的头发衬着他那细嫩、洁白的皮肤，显出文质彬彬的神采。那常常挂在眼角上的笑容，使人感到他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人。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简陋的木板结构在寒冬和炎夏都令人生畏。

陈晓南先生的家在江苏溧阳农村，他孤身一人来到重庆，母亲、妻子、儿女都留在家乡。八年孤独的生活对陈晓南先生来说，好象一泓澄清的泉水。他洁身自爱，从来不见他有任何亲密的女朋友。抗日战争期间，怀着炽热的爱国心情，他曾经几次到战地进行速写。

家境贫寒，却不忘孜孜求学；一介书生，却不忘热血救国；身不魁梧，却不输金刚勇士；以笔作枪，却不畏枪林战火！从少年到壮年，陈晓南以莘莘学子、文艺青年、战地画家的形象走过了特殊的人生之路，温和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

三

1946年10月的一天，香港的海滨微风徐徐，天气晴朗，海湾内风举船帆，

波涌远山。陈晓南白衬白裤，深色西装，一手撑腰，满脸的笑容里洋溢着开心的释放和对未来的憧憬，他边上个子较高的张安治也是精神焕发，神采飞扬。

1946年，由徐悲鸿先生推荐，教育部用中英庚子赔款公费选送费成武、陈晓南、张安治、张蓓英四人赴英国考察学习，进行中西方文化交流。

陈晓南的外甥、原溧阳台湾同乡会会长朱志东回忆：“出国前，父亲（朱汉玺，溧阳县令）曾为舅舅在戴埠小学隆重举行欢送酒会，当时到会人数多达五百多人，可谓盛况空前。”

陈晓南女儿陈秋瑾回忆：“出国前父亲从重庆回家探亲。那时，我在溧阳城厢的县中读书，记得星期天我乘轮船返校，父亲是从溧阳也是乘轮船回家，两只快船相对而驶，我在船头突然看到一位非常有风度的先生，似曾相识，他也看了我一眼，目光中似有惊奇，我认定他就是我的父亲，他也看出来是我，彼此没有出声。抗战八年了，我们父女突然久别重逢，一驰而过，似在梦中。父亲去重庆时，我才7岁，这灾难深重的漫长岁月，在擦肩而过的一刹那，匆匆一瞥，亲情交流，内心那种久盼的喜悦油然而生。我一到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父亲到学校来找过我，当时激动的心早已飞到了父亲的身边，只恨回程的轮船开得实在是太慢太慢了。”

1946年10月23日，一架螺旋桨的英国货运飞机停在美国某机场的草坪上。机翼下，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职员劳莱以及机组人员合影留念，陈晓南的笑容十分灿烂。因欧亚交通不便，飞机由美国转伦敦。考虑到弟子们出国人地生疏，徐悲鸿特地给在美国的林语堂写了拜见信：

语堂尊兄赐鉴：

门人费成武、陈晓南、张蓓英、张安治四君，由教育部派赴英伦研究艺事，因欧亚交通工具缺乏，乃改道由美转次道经纽约，特嘱拜谒足下，面聆训诲，幸垂教焉。

敬请

俪安 夫人万福

徐悲鸿 顿首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

在赴英途中,陈晓南一行在意大利作短暂停留,在罗马竞技场的巨石前,他仰望天空,对艺术的世界双眼充满渴望。

四

雾都伦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迎来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

陈晓南在《我是怎样走上研究铜版画的道路》一文中写道:

到了伦敦,我认识了艺术界前辈蒋彝先生,由他引荐和一位装饰版画家勃塞·史密斯相识,我想进入他的画室学习铜版画。后因学费太贵,每周要八英镑多,还要材料资料等费用,实在负担不起而作罢。史密斯主动告诉我说,这样学习你花钱太多了,于是他写信介绍我到伦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金工部版画科跟一位P·鲁滨斯老教授学习,一个学期只要花费六七英镑。他审视了我的画稿,同意我进入他的铜版画工作室学习。

由于鲁滨斯教授的推荐,我去拜访了英国当代最伟大的版画家佛兰克·勃朗琼先生,这是我一生中最感荣幸而难忘的事。勃朗琼是世界著名的版画家和油画家,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同时是欧洲德、法、意、比等国的艺术学会会员。他年近九十,还孜孜不倦地作画。

我手持鲁滨斯教授的信,带着自己的部分铜版画习作,走进这座别有韵致的小楼。鹤发童颜的勃朗琼,短小精悍,步履矫健,毫无老态。他把我引进客厅,我把信与习作给他看了以后,他突然问我,中国的民族艺术如此美妙,你为什么要学习西欧的铜版画?我告诉他,学习西欧的东西正是为了充实发展自己的民族艺术,他点头笑了。然后,他要秘书佛尔陵格女士把我带到了他的铜版画工作室。因伦敦气候阴晦多雾,老人嘱咐把电灯开得通亮,让我参观。这里是一间艺术宝库,有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品,使我感到格外亲切的是书架上有许多中国古代画册和大幅精美的唐宋画印刷品,中间是一座大型铜版画自动印刷机。

当我告诉他我已办好了回国的手续时,老人安祥的脸上略带些激动,叮嘱我说,回国后可以用学到的艺术多描绘一些人民的生活和美丽

的风景。然后,他走到画柜前,精选了几十幅珍贵的名作,并一一署了自己的名字,亲切地赠送给我。这充分表现了一位老艺术家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对我殷切的期望与关怀。在这些画幅中,有一幅巨型的铜版画《锯木工人》,是老人特地委托我带给徐悲鸿先生的珍贵礼品,这幅画现在珍藏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陈晓南在英国的求学生涯,我们从他摄下的一幅幅照片中可大略了解。

陈晓南喜叼个大烟斗,在昔日的照片中这也成了他特有的标记。1947年初,在留英学生伦敦寓所,桌上杯盘铺陈,墙上画作展壁,徐先生的四位弟子和一位外籍朋友以及另两位留学生,也许刚刚在此小聚,研讨艺事定格在瞬间;1947年,西装革履的陈晓南和吴作人等四人合影;同年,公园的大松树下,鲁滨斯教授手持油画笔,留着山羊胡的他笑着看着镜头,陈晓南的左手竖起食指在指点着什么,两人开心地在讨论着什么;1947年冬,一群白天鹅聚在公园的湖畔,陈晓南和费成武在给它们喂食,远处的森林影影绰绰,像中国水墨画中的染晕……

1948年,陈晓南先生在伦敦举行了个人画展,参展的五十多幅作品中,有松鹤、有双猫、有疏林、有苍松……陈晓南双手插在裤兜里,嘴衔烟斗在认真观画。

1949年,应英国援华伯明翰华西大学基金会邀请,在伯明翰市举行了中国画展,费成武、张安治、陈晓南、张菡英展出了各自的作品,英国首相丘吉尔参观了画展。

伦敦大英博物馆前,身穿大衣、头戴线帽的陈晓南手夹一叠书籍,留下了为艺术感动的一笑。口含烟斗,头发锃亮的陈晓南,正在四人合作的国画上落笔点桃花,下有游鱼可数。伦敦泰晤士公园内,雾笼疏林,树枝虬劲,身穿深色大衣,脖围围巾的陈晓南,风度翩翩地站在草地上,睿智的目光看向远方,也许是思乡的情绪带给了他不易察觉的一丝忧郁……

“父亲的形象永远是那样的朝气蓬勃,精神焕发,步履矫健,充满了活力。他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穿戴朴素又非常得体,举止温文尔雅,浑身上下透露出特有的艺术家的风度。”陈法民先生的描述,与陈晓南的形象举止非常贴切。

五

1950年早春,新中国刚刚成立,陈晓南坐船返回祖国。茫茫海洋上,身穿短袖白衬衫的他双手交叉,满怀信心地站在甲板上,笑视远方,迎接新生命历程的开始。

船靠新加坡,陈晓南专程找到了爱国华侨黄曼士,接受徐悲鸿委托他来取回的抗战时期秘藏在此的书画一千多幅,共九箱,这些都是徐先生的精品力作,后来大多收藏在徐悲鸿纪念馆里。在一张和黄曼士的合影里,黄先生年届六十,留须,手握折扇,身穿立领白衣,宽松白裤,一副儒雅风范,边上那位青年人不知是否是黄公子。徐悲鸿的这批画作的取回,为祖国保留了珍贵的艺术瑰宝,陈晓南功不可没。

“陈晓南先生回国途中,途经新加坡,悲鸿嘱他前往好友黄曼士家中,取回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悲鸿在南洋举办支援祖国抗战的画展时,留在新加坡的作品。其中40幅油画都是悲鸿的精心之作。”廖静文女士回忆道。

陈晓南先生在《我与黄曼士先生的一面之交》短文中写道:“到了新加坡,黄曼士先生和夫人特地到船坞来迎接我,并用车接我们到他家住宿一夜。晚上,曼士先生邀请了新加坡几位画家联合作画,以留纪念,并浏览了新加坡的夜景。黄曼士先生将徐先生的珍藏书画一共九箱送到船上,我也完成了任务。”

陈晓南道来轻描淡写,但冯法祀先生却言:“这是极其珍贵的国宝,浸透了徐悲鸿先生一生的心血,如果遗失了这批作品,今天的徐悲鸿纪念馆将会黯然失色,这是陈晓南先生做出的杰出贡献。”

六

徐悲鸿给远在英伦的陈晓南写信:“晓南弟,希望你早点回来,以后学院将要成立版画系,并有铜石版专业课程……”

陈晓南撰文:“1950年2月,我从伦敦回国,悲鸿先生聘请我担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50年早春,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首都北京,带着异常喜悦的心情来到徐悲鸿先生的身边。在他的关怀下,我与李桦同志一起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着手筹建铜版画工作室。”

廖静文女士写道：“新中国成立后，陈晓南先生听从悲鸿的召唤，欣然回到祖国，用他所学习的铜版画在中央美术学院授课，教育和培养了很多学生，他也成为了中国铜版画的开拓者和先驱。他曾被调到徐悲鸿纪念馆担任副馆长，后来又调到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铜版画，直至退休。”

冯法祀先生评价：“陈晓南先生在英国学习期间，对铜版画的历史溯源与发展改革，以及德国之丢勒、荷兰之伦勃朗、瑞典之左恩、英国之勃朗琼均有深入的研究，可谓中国版画界之功臣。”“为中国的铜版画的创作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著名画家赵瑞椿在《铜版画艺术的拓荒者》一文中写道：“我1954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当时铜版画工作室的条件很差，只有一架上年代十分久远的凹版机，过去是用来印刷钞票的。我就在这一间平房里，与陈晓南老师度过了三年时光。李桦教授曾这样告诫我们：中国只有三个人会搞铜版画，陈晓南是其中之一。”

著名画家曹文汉回忆：“他讲课既没有高深莫测的宏论，也没有绘声绘色的渲染，而是简洁和明确。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干刻、腐蚀等铜版画最基础的技法练习。由于我们从来也没有接触过铜版画，在制作时显得手忙脚乱，而晓南先生始终耐心地、手把手地教我们，既给我们讲解又给我们示范……晓南先生的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使我终身难忘。”

著名画家广军说道：“先生给我安排的第一个作业就是临摹。他讲：‘铜版画是中国本来没有的东西，要想了解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照样做一下。其实中国画也是一样的，不了解笔、墨、纸、水的性能和关系，就画不好国画了。’”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陈晓南学生伍必端撰文言：“陈先生不但是一位好教师，也是一位优秀的铜板画家，他创作的《英伦南郊》、《建设中的新北京》、《浇钢锭》等都是极优秀的作品……我们也看到他回国后，不断努力追求怎样把这种纯粹的西欧古老的艺术形式和中国民族艺术传统相结合，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他的木刻画《万古长青》，能明显看出陈先生是在努力运用中国花鸟画的构图与线条来完成这些创作。陈先生是一位有抱负且艺术修养很深的铜版画家。”

赵瑞椿回忆：“1957年陈晓南老师与我们一起下天津钢厂两个月，回来之后他着手《浇钢锭》、《运钢锭》这几幅铜版画的创作。”“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铜版

画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佳作。”“晓南老师还著有《怎样作铜版画》一书,继而他又撰写了《英国版画》一书,书上所附画页,均是他私人收藏。我们回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如果没有他从事铜版画教学和展示这么多英国铜版画原作,我们想学也不知该找谁。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铜版画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当年寥寥无几的情境相比,现在这支成百上千的铜版画队伍,该记得拓荒者的艰辛了。”

欣赏陈晓南的铜版画杰作:《船坞一角》、《画廊修建》、《农村小景》、《高原运输队》、《白洋淀上》、《农村孩子头像》……题材虽然打上时代的烙印,但其表现手法和构图造型,既有传统的技法,又有独特的创造;既有国外的模式,又有本土的韵味,体现了作者的鉴赏力和创造力。在中国画一类,陈先生的《钢厂高炉》、《娄山关北望》、《林泉高致》、《鱼鹰》等等,呈现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笔墨功夫。廖静文曾言:“在中国美术学院他研究的是国画,怎样用水墨来表现传统和现代技巧的结合。他擅长画荷花,这可能和他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熟悉荷花有关。他总是用纤细富于变化的线条勾出花瓣,略施白粉,婀娜多姿,然后用浓浅不同的墨色,大笔渲染荷叶,有时再加上一只蜻蜓飞舞其上,给人以生动温馨之感。”

傅抱石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对陈晓南的作品有高度的评价:“晓南兄近岁作人物花鸟,往往见新意于轨度,极为难能。予尝谓中土艺事之真谛,在得生之全,所谓道也……”

徐悲鸿先生在重庆时,曾对有些老画家说过:“陈晓南的荷花不在张大千之下。”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魏谦评价:“在建国后的 30 年中,陈晓南先生从 20 世纪 50—80 年代的铜版画创作和一系列艺术活动的确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他在中国版画的历史画廊中理所当然地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国美术界,在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史中,铜版画家陈晓南的重要地位,为美术史家所公认。他的作品感情真挚、意境隽永、形象鲜明、结构质朴。他的铜版画作品多变的色调和有力的线条,也影响着他的学生……一代宗师陈晓南一生学习、研究、介绍、引进、创作铜版画艺术,是他打开了中国现代艺术通向铜版画创作圣殿之路。”

七

人生,有那么多被逼和无奈,有那么多苦厄和磨难。

作为一名醉心艺术的铜版画开拓者,陈晓南在一心泛舟艺海之时,却被卷进了一场惊心的政治骇浪之中。

葛一虹先生回忆说:“晓南治学严谨,孜孜不倦,勇于创新,他为中国版画尤其是铜版画的创作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晓南先生为人谦和,彬彬有礼,说起话来轻声慢语。就是这样一位一生追求进步、一生追求艺术的知识分子也难逃历次政治运动的厄运。记不得是哪次运动了,有人向我报告,说晓南是国民党反共分子。我当面予以驳斥:‘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陈晓南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从事的是革命的进步文化活动。’”

1966年,“文革”一开始,58岁的“留洋海归”陈晓南就被关进牛棚,被指控为“文化特务”、“国民党军统特务”,诬告藏有枪支,遭受难以忍受的殴打、人身污辱与残酷的批斗,被红卫兵撬门抄家,所收藏的勃朗琼铜版画原作、图书画册和历史资料,被抢劫一空,存折被偷走,钱款被人取走私分。

赵瑞椿回忆:“大祸临头的时候,他像瓮中之鳖。他当时是版画系年龄最大、学位最高的,自不待说,立即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有一天这帮坏学生勒令教师至某教室集中,召开揪斗国民党军统特务陈晓南的会议。让陈站在讲台位置交代问题,张信让系主任站在旁边低头陪斗。我们教师在下面‘接受教育’。一开始就要陈承认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并藏有枪支,陈再三辩解,他们不由分说,其中一个随手从墙边报架上取过报夹,另一个人立即扒下老人的裤子,让他双手扶住讲台,不断地抽打剥光的屁股,直到报夹子打断为止。晓南老师没有吭声,更没有叫唤,强忍皮肉之苦和人身侮辱,真是好样的!后来他急中生智,问什么就承认什么,问他有没有藏匿枪支,他说有。问他枪支号码是多少,他立即很流畅地编造一串数字,才没有继续忍受皮肉之苦。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教过的学生对他施暴,受着天大的委屈,却无法解救他。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有的年轻教师被逼疯,有的较年长的教师经不住吓唬上吊,还有的跳楼致残,但陈先生毕竟挺过来了。”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王莉莎回忆:“我在‘文革’中唯一一次参加批斗先生的会

上,亲眼见到先生如何受审:叫他趴在椅背上毒打,方式是:问——不承认——打,踢——不承认——打……如此折磨半天,批斗完结,先生已不能走路。他们扬言:对于叛徒要打屁股不让睡觉,这样才能使他交代。那些所谓的罪行,凡是有一点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是毫无道理的。先生忍受着人格的侮辱,在干校、牛棚从不发怨言。”

1971年,广州美院全体教师下放到干校劳动,地点是三水县某劳改农场。和陈晓南一起下放的有大名鼎鼎的画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的关山月,他们两人负责养牛。两位顶级的大画家,硬是把一群从劳改犯手中接过的瘦牛,养得膘肥体壮。“军代表”还讲风凉话:“把牛养得这么肥有什么用?”“在一次班会上,陈晓南得到了表扬,他顿时号啕大哭,大家都愣住了!一个知识分子,他能忍受住皮肉之苦、人格的侮辱、精神的创伤,却忍受不住对他的肯定。在这个精神被完全扭曲的年月,他已经不知道还算不算个人,自己的尊严该不该受到尊重?”赵瑞椿先生如是说。

城头失火,殃及池鱼。

陈晓南夫人高凤生,聪明贤淑,处事大度,虽不识字,但气质高雅,举止不俗。

廖静文女士撰文道:“陈晓南从英国回来以后,他的妻子才从偏僻的溧阳农村回到了陈晓南先生身边,十多年的离别未曾割断他们之间纯真的感情。一个是留学外国的艺术家、教授,一个是自幼被包办婚姻的童养媳,目不识丁,但两颗善良的心仍融合在一起。陈晓南先生得到了妻子的温存、体贴和照顾,幸福地度过了十分欢畅的家庭生活。在他晚年,妻子不幸去世后,他的身体便渐渐衰弱了。”

王莉莎教授回忆:“他的家庭是旧式婚姻,师母是没有文化的表妹、童养媳,但十分美丽、贤惠、大度,烧得一手江南好饭菜,常邀我去他家吃饭,我的女儿常高兴而不客气地独自去就餐。和睦而宁静的家庭生活,常使我们这些主张个性解放的学生不大理解:一位见识广博的‘洋教授’,一位目不识丁的农家女,却能长期陪伴家中的老母,抚育儿女,处理老家大大小小的事务。1949年后将全部家产献给国家,还收养无家可归的乡邻。在长期的政治运动和生活不安定的岁月,她始终辅佐丈夫,先生对师母也十分尊重,从无轻视态度,相敬如宾地和睦相处。但是这种日子不长,大约‘文革’前是最长的一段了吧。”

陈法民在《我的故乡家史》一文中描述：“‘文化大革命’，我们这样的家庭是在劫难逃的，父亲因留学英国被定为‘文化特务’，姐姐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母亲更惨，重新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从广州强行遣返溧阳老家，路上三天三夜罚跪在车厢一角，身上所带的几百元钱全部被红卫兵没收分文不留，连开水都喝不上一口，我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到了上海，幸亏一位好心的老乘警出于人道主义，偷偷给了母亲十元钱，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恩情啊！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位恩公的姓名难以报答，要不是他，我母亲必将流落街头，后果不堪设想。母亲回到老家，一住就是十年，日子更难了，先是剃鬼头，然后被揪、陪斗、罚跪，双膝红肿了，填块棉花，被造反派发现了，勒令跪碗底、跪扁担，以至双膝流血等十分残暴的斗争，母亲不堪忍受这一切，几次想一死了事，结束人间这么残酷的斗争，但一想死后在政治上会给儿女带来多大的麻烦，那就宁可活遭罪，也不去走这条路。有一次下大雨，造反派要母亲翻过一座山去送什么通知，路泥泞难行，她不慎掉进了一个地洞里，半天挣扎爬不上来，脊椎受了损伤，从此埋下了病根，最终还是由于脊椎受伤导致头部供血不足而死。试想，一个老年妇女，在农村十年冬夏是如何熬过来的，没有坚强的意志是难以生存的，可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血泪悲苦的人生，母亲确是一位如此坚强而可敬的人！”

八

陈晓南对恩师徐悲鸿是一生怀着崇敬心情的。拿徐悲鸿先生女儿徐静斐的话来讲，是“他把老师徐悲鸿看得比他父母还重”。陈法民曾说：“他对徐悲鸿先生更是恭敬崇爱，举个最小的例子吧，家乡亲友送给他一种乌饭米，他特别爱吃，但他自己舍不得吃，全部送给徐悲鸿先生，悲鸿先生也舍不得独享，用来招待外宾，可见他们师生的为人是如此至诚。”廖静文女士论及这种师生之情，讲得到位：“他对老师徐悲鸿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这感情贯穿在他的一生中。”

蒋碧微女士在其回忆录《我与徐悲鸿》一书中，多处写到抗战时在重庆，陈晓南陪徐先生去看望其家人，其时蒋徐已经失和。蒋父逝世，陈晓南提出守夜，并忙于丧葬之事。由此可见，陈晓南是悲鸿先生身边得力的助手。

陈晓南对家乡溧阳也充满感情。他的文章中有记叙：“1933年，家乡溧阳遭受大洪水，同乡会在南京发起举办了一个书画募捐集资展览会，我出于对家乡的

关心与同情，也画了几幅中国画参展，其中有一幅是《觅食图》，画了一弯垂柳，半塘春水，几片芦苇，一个渔笼，三两只翠鸟停息在渔笼上，仿佛忍饥觅食之态，我在画上题了‘干戈满地风波恶，如此江湖觅食难’的诗句。这幅画被国民党的一位达官贵人所购买。”

1956年初冬，一位从浙江美院版画系前来中央美院进修的青年教师曹剑锋，见到了陈晓南：“在谈话过程中陈先生知道我是江苏溧阳人，显得十分惊奇，‘怎么，你也是溧阳人？那我们溧阳就出了两个铜版画家了……真巧！’”后来，在收集徐悲鸿素描作品照片时，陈晓南对小老乡予以大力支助；并应邀从广州前往杭州做铜版画艺术的学术讲座，携带了他珍藏的勃朗琼原作进行展览。曹剑锋言：“晓南先生和我同是溧阳人，记得他曾经说过，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将我们俩在几十年中创作的铜版画作品，回溧阳举办一个联展，以此向家乡人民做一次汇报。如今先生已仙去十余年了（2004年），这个愿望尚未实现，这将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一件憾事！”

九

人生，其实就是一块铜版，我们用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人品，镌刻下或粗或细、或深或浅的痕迹。

在经济潮流汹涌而来之时，在“大师”、“泰斗”、“专家”、“领袖”之帽子，于艺术界漫天飞舞之际，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我们慢慢把真正的“开拓者”、“拓荒者”、“奠基者”给淡忘了。是因为他们默默无闻的谦逊？还是因为我们在炒作中迷失了自己？

陈晓南是“文革”后“全国三版展览”（木版、铜版、石版）的发起人之一，他从不抢功自居。赵瑞椿文章写道：“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的文人已不再斯文，剽窃和盗名窃誉也创了新高。在东听说某某自诩是‘三版展’创始者，在西也听到某某自诩是‘三版展’的创始者，殊不知真正创始者是陈晓南。”“这是晓南老师一生最后一次在中国现代版画事业所做的贡献！我只有借这一机会，多写几句过程，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目，告慰版画艺术的拓荒者晓南老师的亡灵。”

王莉莎评价她的老师：“他深爱自己的祖国，无论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还是在

国家建设时,抑或在政治风暴的摧残下,他始终保留一个纯正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做人、做学问。他对人对事有是有非,但从不强加于人。”“他谦和地对待朋友、家人和学生。他的谦和包含了求学、治学、作画、写文章,也包含了他人格和对待名利的态度。他的谦和蕴含了那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志气。”

伍必端先生评价:“陈先生是一位有抱负且艺术修养很深的铜版画家,可惜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没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但我们也能从他已经展现出来的少量作品中,看到他在铜版画艺术上深厚功底和艺术才华。”

陈法民回忆父亲说:“他性格开朗而幽默,风趣爱开玩笑,生活中充满了艺术情趣。他偏爱京剧、昆剧、沪剧、锡剧、评弹等艺术,有时也能清唱几句。他对艺术有一种坚毅执着的追求,一辈子献身艺术,没有分心照顾过家庭,可以说他为艺术全心全意,尽心竭力。”

学生曹文汉给他老师陈晓南撰联道:“恋丹青,锲而不舍,执教铜刻开天地,常思悲鸿前辈;浇钢锭,万古长青,镌镂放歌铸华章,惟有晓南先生。”

“惟有晓南先生”,是学生们对老师艺术业绩和崇高品格的赞语,也是心声。

十

初春,阳光明媚,鸟语花香。

我陪陈法民先生去拜谒陈晓南先生的墓冢。

大洪山下陈家的祖茔地,晓南先生的墓穴十分简朴,正如他朴实的人生一样,没有奢华的铺陈,没有耀眼的炫显,自然平淡,冲和澹泊。

油菜花黄灿,紫云英艳丽,绿塘里菖蒲青葱,荷沐清风。陈法民谈他的父亲说:“他一生平平淡淡,一位普通的画家,一位平凡的教授,极普通不过。他死得那样平静安详,没有殡仪,也没有张扬,极普通不过,像秋叶回落大地那样自然,那样无声无息地化作泥尘。”

秋叶落地,寂静地化作春泥更护花。人归自然,普通就可以随意忘却吗?

1991年,原中国美协主席王琦患眼疾住同仁医院,恰巧陈晓南也生病住院于此,两位老友相见,陈晓南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要知道,他重病在身,已患老年痴呆多年,人都分辨不清了!此处哭声,分明有老友重逢的激动,有多年积压委屈的倾诉,有本真自然感情的流露……这哭声,怎不令人揪心裂肺、潸然泪涌呢?

陈晓南喜画白荷、墨荷，常题图为“香远益清”，实乃中国知识分子气节的真实写照。

陈法民先生赠我一本《墨香悲秋——晓南先生纪念集》，里面有许多陈晓南先生写的文章：《我是怎样走上研究铜版画的道路》、《徐悲鸿先生青少年时代的艺术道路》、《艺术是生活的灿烂花朵——介绍勃朗琼的铜版画作品》、《伦勃朗与他的铜版画艺术》、《铜版画艺术欣赏》、《岭南画派溯源》……他以扎实的艺术功底和深入的艺术探索以及平实的艺术语言，为我们遗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艺术财富！

陈法民先生讲，他家原有齐白石的人物十八罗汉造像精品 18 幅，是用金粉在深蓝的原色纸上画的，形象怪异，栩栩如生，五十厘米见方，均用多层纸做底，精工装裱而成，可谓无价之宝！是他父亲于抗战后，从重庆托运回来的。可惜在老家土改时丢失了！实为憾事。

人世间的万物确是如此充满着机缘和遗憾，“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物是人非，人在物去，挨了天地，挨了人间，一切都在变化。

前几日，与陈法民教授通话，告知他我欲写一篇关于他令尊的文章，以表家乡小辈对乡贤名人的敬意。陈先生告诉我，戴埠陈家村正在筹建“陈晓南纪念馆”，陈列山乡小村上走出的艺术大师的生平和成就，以缅怀贤达，鼓励后辈！这是好事啊！他正在积极找资料、图片、画作，并嘱咐我：明年清明一定要来参加落成仪式啊！到时大家也好见面。

我想，我一定会去的。

我想，人生，有一样东西是不灭的，那就是精神。

钱松岩的溧阳情

在《常州书画》“溧阳卷”一栏中，对钱松岩记录如下：“钱松岩，溧阳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生，卒不详(按，应为1986年)。工画，善诗词，擅长山水。作品清新隽永，颇具韵味。”

姜丹书先生在《晚近美术家小传》中，有记：“钱松岩，号芑庐，江苏宜兴溧阳交界之杨巷乡人，居无锡。山水秀润，能以传统笔墨写真景，努力于现实主义风格。现为江苏省中国画院画师。一九五九年六十余岁。”

前文言之凿凿：钱松岩为溧阳人。姜丹书言之模糊，宜溧交界之人。那么，钱先生的籍贯到底哪里？

钱松岩的小女儿钱心梅，撰文记叙：“1899年9月11日，父亲出生于宜兴杨巷湖墅，它曾是溧阳在宜兴境内的一块飞地，一会儿归宜兴，一会儿归溧阳，解放后才正式划归宜兴。”此言较为合理，杨巷在旧时属溧阳管辖，而上黄历史上归宜兴县境，钱松岩出生和生活期间，均是“溧阳人”，而上黄籍书画家黄若舟，总说自己是宜兴人，这都是历史之使然。

把钱松岩说成溧阳籍，并没有附庸名人之意，而钱心梅的一句话很是动人：“所以父亲的家乡情就是溧阳情。”可见钱先生与溧阳之间的情愫乡缘。

1927年8月，钱松岩曾应邀任溧阳县的第一小学校长，到次年1月离开，应聘到无锡美术专科学校，教山水、诗词。

已故百岁老人谈华清，生前常与笔者谈及钱松岩先生轶事。谈老是钱父绍启先生学生，钱父为私塾先生，诗文书画俱佳，以收学生课书为生，对松岩影响颇大。谈华清结婚，钱绍启先生对儿子说：“我们送他画吧！”两人合作了四条屏作为贺礼，后为日本鬼子所焚毁。在溧阳任教期间，钱松岩与程沅等人交往，后书信不断，曾有交换画作之约。钱心梅带家人曾来看望谈老，一起去湖墅看老居。

谈老亦赴南京，钱心梅赠父亲画册等。

笔者同学张西秋，其母是钱松岩的表外甥女，钱从南京返杨巷，必经溧阳换乘轮船，常歇息其家。随身一只皮箱，里面有画作等物，曾长年存放，后取去。

1983年，钱松岩夫妇携儿孙返乡探亲写生，回南京途中路过溧阳南渡，他专程去上吴村拜谒了史贞女祠，后作《濼渚泽清》国画一幅，画面上墨瓦粉墙临水而立，绿柳下野塘的水埠上，有妇人在洗濯，不知是淘米还是洗菜。树阴掩舍，石桥横波，濼水泛漪，芦荻生渚，远帆风行，近桅停泊。钱松岩题诗文：

濼渚泽清

一

古祠夷泯小村幽，往事乞浆话埜叟。
刻骨难销巢覆恨，持金惆向泽中投。

二

俎豆四时史贞女，渊潭万古濼江清。
甘心一赴千钧诺，正义如山躯亦轻。

楚伍子胥罹祸奔吴，过溧阳濼江之滨，饥乞於浣沙女，临行嘱勿为追者道。女即投水，以自灭口。伍后投金水中以示报，里人义之，建祠以祀。李太白曾为撰碑文，李阳冰书后。一九八三年六月，余携儿孙往宜兴写生，返南京途中途经濼滨，停车寻访。祠近毁於浩劫，仅存遗址，但见野塘田舍，景殊清幽。归制斯图，并缀小诗两章。八十五叟钱松岩。

史贞女是溧阳历史上的贞义烈女，历代多有歌颂。钱松岩去寻访遗址，吊古怀旧，并作画记之，可见他对溧阳的人文是十分了解的。

据钱心梅介绍，钱松岩的外婆家在“冏麓”，就是冏山脚下，此地为江南蒋氏始祖“冏亭侯”居住之地，1947年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曾来寻祖。

钱松岩早年作品上，刻有“冏亭”闲章。到了晚年，他“思乡之情尤烈”，作《冏

山恬梦图》，并有诗跋：

青山白屋绕桑麻，舐冰慈恩爱蔑加。今日风尘千里客，翻然犹梦外婆家。

外祖母家在山麓，母殊爱我，童时屡往省，乐而忘返。今写斯图，恍然如重回儿时温暖旧梦中也。八十四岁叟钱松岩。

画中场园有碾谷碌碡，树有鸟巢，一草一木就寄托着作者对故乡的深情。

钱心梅讲，将“匱”改为“后六”，是听表弟来访说的，这是“文革”带来的笑话。匱亭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地方名字有专属性，历史遗址没有了，但历史记忆不应抹去。“匱山是溧阳的品牌！”

“踏遍东西南北后，匱亭山翠梦频频。”钱松岩作为新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他的画作“以书入画”，构图稳中求变，笔墨浑厚苍茫，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式的人物”。他的女儿钱心梅总结：“父亲浓郁的乡情，一直伴随他一生。”“就是（故乡）这块富饶、美丽，又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土地，造就了父亲。”

小城名画家程沅

《程沅国画》终于面世了。

历时六载，历经波折，对一本普通画册来讲，显得有点不易哉。手捧油墨飘香的大开本画册，我倒想谈下程沅先生及他这本画册的缘起和由来。

我和程沅先生并不十分熟稔。在省溧中念高中之时，偶尔路过小岛旁的医务室，见里面的校医是位清癯严肃而颇有风度的人。后来听人说程先生是位多才多艺之人，会画，写诗，操琴，唱戏，从医……一个生活在小城里的人，能有这么多的本事，应该是位能人了。因此，程先生是小城的名士。

又听人说，不少人跟程先生学画、学诗，他外表孤傲冷峻，但心肠很热，看得上的学生，悉心指教，并不吝啬。程先生是小城里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在上海进过正规学堂，和不少名画家是同学。他的画，是“上板眼”的，不是草台班子的涂鸦。也听母亲说，程先生年轻时扮相英俊，擅京剧，会牵（拉）胡琴，是杨家院里的风流才子，祖上是安徽人，开店的，也算是商家后裔。

与程先生的一面之缘，印象深刻。电大中文班开了写作课，我算是课代表。听说溧阳籍著名作家菡子返乡了，真是好机会，请她来上堂课讲讲怎样写文章，肯定受益匪浅。在几位同学的引路下，我们来到杨家院的程宅，菡子女士每次来溧都爱下榻于此。记得那次还特地买了请柬，郑重其事地写上了事由。程宅我第一次来，墙上挂着字画，这在当时属很高雅的布置了。

菡子女士在，朴素无华，穿一条“副纤”的裤子，飘飘忽忽，一点不像想象中的大作家。老干部周利人也在，笑眯眯的。程先生也在，很清瘦，走路有点喘。我们说明来意，菡子回答：“我不会讲课。我讲的你们年轻人也不爱听！”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周老帮我们腔：“去咧喂，你大作家还不会上课？讲点给他们听听，年纪轻的人爱学习好事体喂！”程先生也讲：“他们诚心诚意的，你就去讲讲吧！”

菡子还是没答应,说因为要去武进采访,没时间了。

程先生送我们出来。他拄着拐杖,走路吃力,气有点短。我拿着那张大红请柬,情绪有点低落。他问:“你们学的什么?”我答:“文科。”巷弄弯七弯八,他一直送到巷口,拄着拐杖,重重叹口气,说:“学文科没点格(什么)交易(意思)喂……”像是一种感叹,像是一种感悟。

程先生拄杖伫立的形象,定格在 1983 年的春天里。他的那句叹息,我当时并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才渐渐知道其中人生的况味。

了解程沅先生,主要通过谈华清老人。

谈老活了 99 岁,一生坎坷,一肚故事,一肚往事,一肚掌故。他曾蒙冤入狱 28 年,后经平反定为五保户,无儿无女,孤身一人。他曾借住在程先生家多年,相互了解甚多。我有空就去谈老处坐坐,听他讲讲故经,谈谈过往,老人记忆力惊人,而他讲的较多的就是程沅。

程家祖上是安徽绩溪人,过去是开锡箔香烛店的。20 世纪 30 年代,程沅赴上海新华艺专学习,据说是徐悲鸿做的介绍人。程先生在《忆名画家陈半亭》一文中回忆,1926 年春节,徐悲鸿来溧阳探望寄父陶瑞,曾与陈半亭、程沅父子交流画艺,画了许多的画,后毁于战乱。据谈老回忆,程沅先生说,徐先生试纸时画了揉、揉了又画,废画全给烧了火灶。早知日后徐悲鸿的画价值连城,那烧的都是钱啊!呵呵。

谈老曾出示一本程先生遗下的《新华艺专通讯录》,上面有朱屺瞻、应野平、吴作人等名画家,均为老师校友。艺专校友还举办过回顾展,程沅有指墨鹰入展,后在杭州办展,他也有画参展。新华艺专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近代美术教育的高等学府,徐悲鸿、潘天寿、黄宾虹、汪亚尘、朱屺瞻等大师均为老师授课。程沅的指墨画,据说就是得潘天寿之真传。

程沅擅长翎毛走兽,以指墨鹰最为传神,灵猴毫发毕现,鸬鹚孤傲独立,翠鸟活泼顾盼,雏鸡呼之欲出,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和水墨功力。得之名师,融之指腕,授之学生,他是小城里的名画家,也是现今不少以画谋食之人的老师。

程沅有名士之风,恒以校医谋食,不以画师自许。鲜与俗流交合,喜与同道交流。常州的房虎卿、胡一飞,溧阳的陈半亭、程寄春,南京的林散之、钱松岩,浙江的应野平,苏州的颜文樑,与他有书画来往、信件过从。他又是个散淡的人,书

不离手，画画随兴，有人求画，十分难得，即使答应，没有三年五载不出手。

谈华清老人曾谈起两件往事。

钱松岩曾写信给程沅，叙旧之后，问尚有何需求否？程把信给谈看后，谈言：“你向他要两幅画。”程言：“他的画也不比我高明到哪里！”谈言：“他名气比你大啊！画比你的画值钱！”程言：“我的画是不值钱！丢在大街上没人捡。如有人捡我倒要问问他：你为什么要捡？这画画了什么？如他答得上来我就送他。如不懂我的画之人，五万一幅也不卖！”程先生讲，画画和写字一样，一笔都不能错，错了一笔一钱不值。一幅好的画，其价值要百年以后才能认定。

据说，钱松岩先生对程沅的画技较为钦佩，说他的画没一笔多余。后来，钱老的女儿来溧，也曾提出用钱老的画换一张程老的画，作为纪念。钱老因是“金陵八家”之一，省国画院院长，其画已是价值连城。而程老始终甘于无闻，淡泊自处，隐于小城，以画自娱，以课徒自乐。

程沅与溧阳华风天、杨木斋、王曦四人，曾办过一次联展，请谁题字好呢？程想到同学应野平，于是去信请题了“晚香画展”四字，众人看了果然是好！程沅和学生也办过联展，请中国画坛的巨擘、苏州颜文樑先生题过字：“程沅师生国画展。”另还请南京杨建候先生题过“迎春画展”，林散之先生还专门书过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诗幅赠他。言及这些，说明程先生虽蛰居小城，但在书画界还是颇有影响地位之人。

后来省溧中校庆，派史解老师来借画参展，程先生没答应，后校长亲自上门也没借成。程说，每次画展，有借不还！不借。后又有史志山老师登门，史是谈的外甥女婿，谈出面借，程才勉强借出一幅松鼠，一幅八哥。校庆结束，校方提出留下老校医的画作纪念，谈急了，赶去学校，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遂使画完璧归程。

程先生是位“敝帚自珍”之人。

谈老对我说，程先生活了九十岁，生前最大愿望，是出一本自己的画册，可惜未能如愿。

这句不经意的话，触动了我的神经。

我忽然觉得，应该为程先生做点什么。

程沅先生的女儿程萍女士，是原市政协副主席，是位医生，我们早就认识。

在谈及为程先生出画册一事，她表示也是夙愿，但有难度。一是作品散佚，很难聚集；二是资金有缺口；三是她是学医出身，对绘画是外行。我谈了三点：一，程先生是小城为数不多的“科班”画家，应该将他的国画艺术传承下来，弘扬开去，不然，将是一个遗憾。二，作品散佚，可发动亲属、朋友、学生将收藏的先生画作拍照，原作各自保留。家中作品，我请人拍摄。三，资金问题，大家想办法解决，先征集作品。

程女士翻寻父亲遗作，我请了星光照相的曾荣国先生带了相机上程宅拍摄，因为他的相机像素高，拍摄技术到位。后又有几幅“老虎”、“猴子”作品，索性拿到照相馆拍照。曾先生是亲戚，我直言，没有费用，义务劳动，画册出版后送你几本，算是为前辈做点好事吧！他咧嘴笑笑，我脸皮老老。照片拍好后，还要拷进光盘，这都由曾代劳，谁让他是“表妹夫”呢！

有些作品，没有裱拓不能拍摄，赶紧找人拓裱。有的作品，人家贴在五斗橱上，已残破了，赶去拍下。吕谷声先生和程沅先生是好友，在江如福、吕正立先生的引见下，我买了一束鲜花去拜见年事已高的吕医生，拍下了挂在堂前的“雏鸡图”……

作品的征集，没有想象中的顺利、简单，本该出画出力的人物，意想不到的不配合、不出力。各人有各人的隐衷吧？程家仅有的画作，不够出一本代表程沅艺术成果的册子。日子在焦急焦虑中过了一年，又一年……

原本想在程沅一百周年诞辰出的画册，搁浅了。一拖，就是五年。期间，谈华清老人在即将活到一百岁的坎上，乘鹤西去。我和程萍女士赶到上黄谈巷里谈老的坟上祭拜，荒冢野坡，风舞纸钱，我跪在谈老的坟前，默默许愿：只要有机会，画册一定要出版！您放心吧！

机会终于来了。真心感谢市政协和市电视台的领导，在了解了有关情况后，给予了大力的支助，使《程沅国画》终于付印出版，并在“两会”期间隆重推出。

画册筹划过程中，尚有许多插曲，正如人生这舞台，喜剧、悲剧、轻喜剧、话剧、小品、歌剧……轮番地上演，丰富了生活和艺术的色彩。

程萍女士在整理程老遗物时，发现一个信封，当时也没在意。后来我随手打开一看，天哪，全是尺寸不一的程沅画作照片，共八十几张，虽因当时相机等因素模糊不清，且全是黑白，但原作都已找不到了……我赶紧拣出几十张，经电脑修

整,补充画册内容。

我忽然觉得,冥冥之中程老是否在提醒着我们什么?

程老是喜欢摄影的,他拍照都是自己洗印冲扩,水平十分了得。有几张摄影作品如“黄山”、“太湖”、“竹影”,艺术水准颇高,原打算放进画册,后怕冲淡主题而作罢。

程萍女士告诉我,老爷子爱画如命,去北京儿子家,在颐和园里写生,买块烧饼充饥,一画一天。为画指墨画,他留了很长的指甲,盘曲如笔。后来生病住院,她要剪掉他的指甲,免得吓到护士,老人说:“我还要画画的!”无奈之下,才让剪去。

程云有一同学对他评价:“程君,名瀛,风度翩翩,擅画鸟兽。善青衣,扮相俊美,乐操琴。”据谈老回忆,1952年,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说荀慧生有误)来溧演出,程云曾负责接待,与尚相谈甚契。程云知戏甚多,尚小云戏言:“先生对京剧如此精到,要是你下海唱戏,兄弟我没饭吃了!哈哈……”程云手中有本剧著《戏考》,上有秘事秘诀,尚向程借书,后久没归还。此事真假,不得而知了。

人和人都是有缘的。我认识谈老,了解了程云书画,然后为出画册裱画、拍画、寻画、印画,一晃几年已过。我要感谢谈老和程先生,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接触了小城里的大画家,懂得了什么叫大隐隐于市;知道了八大山人的鸟为什么总是斜眼看人,也明白了能做一点文化事业上的“做手”、“推手”之事,是多么的受益匪浅!

受益匪浅,当然指精神层面。我一开始接触程萍女士谈画册就表明:一不要任何报酬,二不要一张程先生的画。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你是傻子吗?有那么傻吗?我要回答:我不傻。我得到的,不是你想象的。尽管我并不是个所谓高尚的人,小人物,做点小事情,图一乐也!

瓦屋如云春作花

——瓦屋山寺庙探访

瓦屋山，似乎一直笼湮于云雾之中。

南宋大诗人陆游有诗“山横瓦屋批云出”，明朝著名戏曲家汤显祖有诗云“瓦屋如云春作花”，清顺治溧阳状元马士俊诗曰：“北湖亭望处，此日尚浮云。瓦屋成高筑，平岚净远氛。”这三个朝代的三位名人，看到的瓦屋山都是披云浮岚，耸立天际，仿佛穹屋玉宇，横亘仙境。

再往前推，唐代天宝五年(747)，诗仙李白来到溧阳，他站在北湖亭上，瓦屋山尽入诗怀：“朝登北湖亭，遥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觉秋风还。”他看到的瓦屋山，是白露时秋山，那天恰好无云，于是产生了“与君拂衣去，万里同翱翔”的豪情逸兴。

到了清朝光绪年间，有一位叫宋鏞的溧阳人，登上了瓦屋山，抒发悠悠怀古之情：“平远山川极望开，登临谁是谪仙才。寒芜一碧秋无际，细雨潇潇雁又来。”宋诗人登山那天，好像也是无云，山川极望，细雨潇潇，几声雁鸣，平添了寒秋的萧瑟落寞。谪仙已去，诗歌尚留，怀古之情，平远无际。

登瓦屋山，仿佛秋季为佳，历代几位诗人，似乎都是写的秋山秋景秋情。

乙未秋分，我又登上了瓦屋山。愚昧自知，不会遣词作诗，非为附庸风雅，只因为与瓦屋山的一段缘分，只因为瓦屋山的一段“云雾”。

初上瓦屋，应是20世纪80年代末，作家协会在瓦屋山林场搞了个笔会，我们由杨湾林区拾级登山。也是深秋，细雨蒙蒙，雾锁峰峦，林草垂珠。山顶有茅棚几间，清泉一汪，一位溧阳老人带领几位信众吃斋念佛，募化建庙。

认识瓦屋山，是在2005年。由省溧中的老师芮金川和市作协组织，由瓦屋山宝藏寺管委会主持，编写《宝藏禅寺》这本书。依据宝藏禅寺提供的两份史料，

一份是林忠志、芮金川编写的《宝藏禅寺史话》，一份是由林忠志编的《宝藏禅寺》小册子。我写了一篇习作《圆缘宝藏寺》，3000多字，加上原先的两篇民间故事《秦皇举鞭够瓦屋》和《金舟横陈渡苍生》，算是交了“差使”，承蒙编者收录付梓，愧列书中。

我于此认识到瓦屋山是座诗山、佛山、史山、名山。

关于宝藏寺的史话，林、芮两位老师是这样讲述的：该寺始建于唐代天宝五年（747），是地藏菩萨的道场，素有“小九华”之称。寺由九华山地藏菩萨金乔觉的二弟子道明和尚开创，当年他三十五岁，游历江南，选中瓦屋，结草为庐，苦修募化，经四十余载苦营建成宝藏禅寺，有房九十多间。道明和尚回到九华山，师父已圆寂多年，他主持法会悼念，将寺改为“报恩禅寺”，定农历七月三十日为庙会，与九华山同。唐元和七年（812），道明圆寂，成为瓦屋山第一位肉身菩萨。

宝藏禅寺院名几经更迭。元代为华藏禅寺，明代为报藏禅寺，清代为宝藏禅寺。因是地藏道场，始终不离个“藏”字。1937年，寺庙被海州土匪焚毁。1942年，上海的候定和尚整修庙宇。“文革”时期，千年名刹荡然无存。20世纪80年代末，溧阳觉志居士带头募化建起三座仿古大殿，逐步恢复宝藏禅寺。九十年代初至今，觉志（钟保芝）外孙沈田春负责宝藏寺的复建重修。

历史的沿革，脉络清晰，陈述清楚。千年名刹，让人敬仰，让人膜拜。四方信众，不分贫富，不辞辛劳，登山礼佛，慷慨解囊，修庙建殿，功德无量。宝藏禅寺，香火鼎盛，名闻遐迩。打开网络搜索引擎，道明和尚瓦屋开山，募建宝藏；“小九华”地藏道场，旅游胜地。历史的典故、道明的故事、朝代的沿革、宝刹的今昔，一条条突入眼帘，目不暇接，引人入胜，令人神往！

蓦然，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瓦屋山宝藏禅寺的历史是假的！是关起门来杜撰出来的！以前历代山上只有一个小庵，根本没有大寺庙，是为了旅游开发，编出的历史故事！你不信？溧阳县志上没有记载！句容县志上没有记录！这段历史，以后不能瞎写了！

我很吃惊。

历史是可以杜撰的吗？如果是，那么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啊！

我决定探究一番。

乙未初秋，瓦屋山掩映在深深的绿阴里。沿 104 国道西行，车外的树林急速地向后退去，使人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

从句容境内眺望瓦屋，却分明和溧阳不同，山脊如梁，平绵东西，东岭高耸，西峰隆立，像极天然屋宇。不知这硕大房屋里，住过何方神仙？真想穿越过去，探个究竟。

乾隆《溧阳县志》云：瓦屋山，北八十里，山形连亘，两崖隆起，如瓦屋状，与句容分界，李白游北湖亭望此山有诗。

查嘉庆《溧阳县志》，亦是此说。查“寺观”一栏，均无瓦屋山寺庙记载，让人疑窦丛生：难道这山上从没有过梵呗磬音？这消逝的晨钟暮鼓，只是今人的幻听幻觉、虚构想象？

失落失望之间，我想到了一个人：林忠志。

据芮金川老师回忆，当年编书时的史料，大多是林老师搜集提供的。打开厚重的宝藏寺山门，林忠志是一把钥匙。可他身在何处？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认识了句容市袁巷镇瓦屋山净觉寺的慧学监院。慧学师父俗名栾成义，因身体欠佳，发愿侍奉佛门，于 2003 年在觉静法师聘下兴建菩提寺，2008 年复建净觉寺，2012 年出家剃度。这净觉寺原名周嘴庵，是瓦屋山寺院的下院，始建于元代，句容弘治县志上有记载。104 国道改道，慧学师父到市里申请不再毁掉古庙，于是新国道 1197 公里处向西迁移了 50 米。

慧学师父说林老师在大山口，他们很熟，如要去他可带路，我喜出望外。

瓦屋山脚下的密林中，有柏油路盘曲。上杆村、水库、农庄一一闪过，山乡的树林味和坡田里的稻熟味扑面而来。沿坡而上，有山泉一汪，砖屋数间，这就是大山口村了。场园上有陶土台凳闲置，后面就是林老师的家，真是个世外桃源，林中福地。

林老师中等个子，皮肤不白，笑意盈盈。在他谦让进“陋室”之际，我注意到靠墙有两排书橱，《句容县志》、《溧阳县志》、《淮安志》、《文史资料》等书籍十分醒目，表明主人是位文史爱好者。

慧学师父早已说明来意，林老师取过那本《宝藏禅寺》，我指出书中我的文章，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问起瓦屋山寺庙史料，他娓娓讲起缘由来。

改革开放以后，瓦屋山上已有觉志（钟师父）等人在山上募化建庙。作为“老

山民”，林忠志从小就知道山上有庙，庙会很热闹，是“小九华”，但没人能说出个寺庙根源来，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出外寻根探源，因为他觉得这么大的寺庙不该没有历史啊！

林忠志原籍是湖北枣阳，祖辈移民至此居住已有六代人了，他在袁巷小学当语文老师，也教数学，平常对文史感兴趣。他听说过道明和尚开道场的故事，联系到“小九华”，于是决定赴安徽池州青阳去找资料，因为那是九华山的所在地。后来托朋友的朋友，在池州档案馆查到了瓦屋山宝藏寺与道明和尚开山的关系的史料，结合《文史资料》上的相关文章，写了一本小册子《宝藏禅寺》，里面也搜集了一些人文史料和民间故事，自费印了 2000 册。后来觉志老人为了表示感谢，给了 2000 元钱的工本费。

1988 年，林忠志随觉静（现在菩提寺）和觉根（溧阳人）出外考察寺院。先到了栖霞山，又到镇江金山寺，拜访了六摆渡的瓜洲寺庙，接着到焦山定慧寺，想拜见高僧茗山法师。他们先找到监院，说明来意，监院说茗山长老很忙，要通报请示才能答复。请示后，答复明天上午八点半接见，时间不超过半小时。第二天，见到茗山长老，几位出家人伏地顶礼，林忠志深深鞠了一躬，呈上宝藏寺的小册子，介绍了该寺的前世今生，双方交谈契合投缘，时间一晃到了十一点钟，茗山长老留膳。林忠志见状恳请长老为瓦屋山门题联，长老说今天来不及了，我写好后寄来吧！他说即将去南洋讲经，为万佛塔募化。临别，长老送了一大包佛经，有五六十斤重，他又打开柜子里的小皮箱，从里面拿出 2000 元现金，说带着作兴建庙宇之用。觉根回来将钱交给了觉志老人。大约过了十天左右，有人通知林忠志到袁巷邮局拿东西，觉静师去取了，是茗山长老写来的山门对联：“天宝物华修行胜镜，地藏闵老弘法道场”，后来此联成了珍贵的镇山之宝。

林老师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包，打开，原来是一套明弘治年间的《句容县志》翻印本，5 本，编修于 1492 年，刊印于 1496 年，影印于 1946 年。我翻到“寺观”一辑，大小寺观有一百多座，不见“报藏寺”或“宝藏寺”，宝华山隆昌寺、天王寺、延福寺……都有记载！为什么独缺瓦屋山寺庙？是有意漏记还是根本没有？是寺名有误还是其时无寺？

林老师的解释是，句容历来是古战场，南边是兵家必争之地，荒无人烟。知道寺庙情况的人或杀或逃，记录缺失。句容又是个移民之地，外来的流民、难民

对当地文化不了解，文化又浅，造成历史资料空白。但“弘治志”上没有不等于瓦屋山上没有寺庙，从古到今一直有。旧时的庙会非常热闹，老人讲过，小时候见过，书里也记过。就讲解放后吧，瓦屋山寺庙在上杆村有寺田 15 亩，在杨湾有 20 多亩，山上的林地都归寺庙所有，土改时政府都给庙里发了土地证，这在档案馆可以查到存根。1958 年时，老蒋要“反攻大陆”，据说瓦屋山上有人给台湾打信号枪，于是民兵就上山把山上寺庙里的和尚全部迁到了周嘴庵，这些都是史实，怎么能讲瓦屋山没有寺庙呢！

以前上瓦屋山北面有三条路，东边有两条路。民间传说寺庙里有个疯和尚，跑到溧阳竹箐桥买肉，人家不卖给他，他一刀剁下了自己的手，把屠夫吓跑了，又把手接了上去。还有一个和尚从东庐山回山，路上下雨，他去人家借伞，那户人家没借，他抓起门口舂米的石臼，顶在头上挡雨，一路走了回来……

告别林老师，在送慧学师父返寺的途中，他指认我们过去上瓦屋山的古道，都是沿小山脊走，每到七月三十庙会，上杆村民会砍草清路，迎接香客，现菩提寺北面还有石阶古道存在。

慧学师认为，原来瓦屋山寺应在东山头，因为那里是制高点，海拔虽都是三百多米，但东山头比现在的西山头高出几米，而且山顶有开阔地带，适合大寺庙的建设。现宝藏寺所在西山头，原来应为下院，从西到东，山脊有很宽的道路，由此可见过去是相通的。净觉寺过去叫周嘴庵，是瓦屋山寺的下院，因为过去有寺田，条件比山上要好些，所以老和尚们年纪大了，爬不动山了，就到庵里来养老。这次 104 国道的改道，寺西就发现了很多无主坟，应该是老和尚的归宿，移了几冢，还有几冢在。

20 世纪 80 年代，溧阳觉志老人带了觉涛、觉根等溧阳信众四人，还有袁巷的栾、杨、杜、陈四位信众，在山上恢复宝藏寺，其中以觉志为主，所以关于寺庙的归属，后来由溧阳管辖。这瓦屋山脚下，许多寺庙都有记载，像泉水庵、周嘴庵、龙王庙……为什么单单没有宝藏禅寺呢？奇怪！

我也觉得奇怪。

揭开瓦屋山寺庙的迷雾，靠道听途说不行，得有文献资料为凭。

瓦屋山到底有没有古刹？有古刹为何句容明弘治志没有记载？溧阳县志及诗文也无记录？我查阅了文献及史志，又经实地考察，得出了几点意见结论。

1. 战争因素

南京博物院溧阳籍研究员王少华在《数万年之“瓦屋”、千多年之寺庙》一文中言：“自东汉末及六朝，此为兵家争战之地，山顶何能建大寺？今见山北之多战堡即其证也。”《句容文史资料》第十五辑，有《“黄天荡战役”发生在句容境内》一文说：“句容是历史古县，境内古战场很多。宋代著名战役——韩世忠大战金兀术于黄天荡，就发生在句容境内。”作为南京门户，“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句容是南京的外围，是拉锯的战场，战斗频繁，大小战斗达数十次之多”（《句容文史资料》第四辑）。战事战乱，造成人口流徙，山寺屡毁屡建，这在情理之中。

2. 移民因素

据光绪《句容县志》记载：“同治元年七月，大江以南疫病，句容移民死者殆尽。”“咸丰丙辰，庚申两遭兵火战后，遗黎不及十之二。”短短十年间，句容人口减少百分之八十左右。土地荒芜，从江北招募佃户，故句容北乡苏北移民较多；而河南、湖北连遭干旱，“荆豫客民来开辟殆尽”。故南乡荆豫客民较多。原居民锐减，移民剧增，对地方文化历史的记忆，难免遗失。

3. 地域因素

瓦屋山作为句溧两地分界山，都属偏远地带，不为人重视。而区域的划分又经常变更，如1955年12月将溧阳县东王庙、喻庄划句容县下张乡，1958年2月又将下张乡东西十二华里、南北七华里划给溧阳。历史上区域的划定变化，也造成了史料的漏记或遗忘。

4. 寺观因素

寺庙道观，以名推重，以大著称。句容有宝华山隆昌寺，南朝梁代开创，清朝康熙乾隆三代皇帝都数次登山，乾隆下江南六次，六次朝拜，声名日隆。其殿、堂、坛旧时不下千间，在清以前兵荒马乱，毁拆殆尽，后由三昧、见月等和尚陆续重建。由此可见，寺庙的毁建，程度何等惨烈，破坏何等惨重，何况瓦屋山乎？句容另有茅山道观天下闻名，寺观的倚重，使瓦屋山寺因偏远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宋代诗人周必大有诗云：“千峰溧阳来，势若西南奔。”（《游茅山道中口占》）站在瓦屋山顶，平畴田野，湖塘如镜，江南如画。

自古至今，瓦屋山有无古刹？回答是肯定的。

（1）乾隆《句容县志》卷四第四十页“寺观”辑记载：“瓦屋山寺，在句容南瓦

屋山，望之绵亘如平屋。康熙间有云存和尚，湖广人，憩息于此。筑道场开山，虎皆驯服。年六十九将辞世，谓其徒曰：三年后开龕，我肉身不烂，当有人装金。后开视，果颜色如生，居人争相装塑，至今香火不绝。”这条通过国家图书馆资料库查到的信息，太珍贵了！《句容县志》有记载！康熙年间有湖广人云存和尚，开筑道场，圆寂后肉身不腐，这与九华山高僧大德的遗风一脉相承。至少在清早中期的盛世，瓦屋山香火不绝。那么，云存和尚是瓦屋山的开山祖吗？

(2) 溧阳才子马一龙(1499—1517)，生活于明代弘治、嘉靖、隆庆年间，曾选任国子监司业等职。在他的《玉华子游艺集》二十六卷第二卷中，我查到他有《和凌惟孝晓发瓦屋山》诗两首：“上下山蹊险，始知行路难。病兼弩马钝，寒觉袭衣单。早起日初出，幽探兴未阑。高人成世隐，家在白云间。”“缓行迷故道，一径两峰开。露宿人皆病，村沽酒可来？深山高士隐，古寺乱云埋。傍晚天心月，悠然入我怀。”马一龙来瓦屋山是来访高人隐士的，山上有古道双峰，有深山古寺。这足以说明，在明代以前，此处早已有寺庙的存在。

(3) 据林忠志、慧学师回忆，瓦屋山东山头现为茶场，当年山埂里曾出土 12 个座化缸，就是和尚往生后不火化，不入棺材，端坐在陶缸中入土掩埋，这也是从九华山肉身菩萨保留下的传统。而同样的座化缸，在西山头今宝藏寺的菜地里亦出土过六只，毁掉五只，现仅存一只。瓦屋山脚下的大山水库，清朝时就有水塘，“文革”时扩建，那里原有寺庙的塔林，几十座石塔，后修水库时把塔石砌了坝，塔基扒掉了。当年的瓦屋山庙会，七月三十日人山人海，有卖艺的，杂耍的，唱戏的，十分热闹。江南武僧“五小辫子”来过，唱京戏的“小魔王”家里很有钱，下海唱戏后也来过。从归葬规模和庙会盛况来看，山上寺庙不是后人所言是“小庵”。王少华言：“民间口碑，今山顶宝藏寺，人谓‘小九华’，则与唐朝朝鲜金地藏游此有关，时其行乞燕山下，往宜兴太华，后遂于皖南九华山立主庙，亦当尊重其说。……是故，瓦屋山寺庙文化之始年东晋、晚唐也。”

(4) 笔者在宝藏寺的旧殿和寮房处，发现许多原寺庙建筑的老基柱、老石墩、老石香炉、老石经幢，石质为青石、蘑菇石(火山岩)，大多饱经风霜，岁月的胞浆浸泡历史的痕迹。柱墩有圆形腰鼓、莲花花瓣，经幢有六角型，可见当时寺庙建筑众多，规模不小。在今大食堂门外有一口倒置荷花缸，缺盖，底座为圆形，上有堆花缠枝、人物、荷花等图案，拟为宜兴产物。缸正面有名录处，惜无刻录。从

荷花缸的工艺来看,应为明末清初之物。

瓦屋山探访,是为缘,是为真,是为史,是为情。

我可以负责地讲,瓦屋山上有古刹,史志上面有记载。我们在宣传介绍瓦屋山佛教渊源时,可以理直气壮地讲解。

瓦屋如云春作花。乱云迷眼,春花媚眼,做一次瓦屋文化之旅,对于像我这样没知识缺文化的人来说,不啻是一次修炼,一次提升。阿弥陀佛! 合十!

“淳化阁帖”寻亲记

甓桥老街的一隅，夹弄似的老房，一开间，踏进门去，户槛有点高，里面光线阴暗，高处的一只小窗洞透进光亮来，窗框的装饰有点西洋味道。小屋并不特别，只是四面墙上有一块块的印痕，像曾是镶嵌过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会装到墙上去呢？

老街上的老人都知道，这里原是虞家祖传族宝，叫“淳化阁帖”，刻在一块块石头上，镶砌上墙。经常有练毛笔字的细佬（孩子）家，到屋内来看稀奇，也有照着上面的字临摹的。他们都不知这些字为何要刻到石头上？刻石又为何放到墙壁上？

老街上的老人都知道，太平天国“长毛”在时，刻石被分藏虞氏各家保存，因逃避战祸，族人流徙，流亡他乡，帖石损毁许多。待大家返乡，集石砌于祠堂，已有大半残缺，幸而石尚在，人尚在，堂尚在。“文革”期间，“破四旧”日甚，刻石厄运难免，幸有族人以石灰抹墙，上书标语，聪明地护住了族宝。石灰伤石，石质受损，刻迹磨糊，总比化为碎屑、填埋墙脚好些。

族宝，传承下来像是奇迹。后来，石刻成了“县宝”，成了“省保”，还有可能成为“国宝”，我们才知道她的价值，知道她承载的分量。

什么都在变。“甓桥”变成了“别桥”，“凹麓”变成了“后六”。但有一样东西不会变，那就是传统文化的价值。

虞氏庆远堂，名取得真好。庆幸我们的“淳化阁帖”石刻，经历了那么久的岁月、那么多的磨难，长远地保存下来，成为地方文化的“第一文物”。感叹之后，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

《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共十卷，收录了先

秦至隋唐一千多年间,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 103 人的 420 篇书法作品。

宋淳化三年(992),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用“澄心堂纸”、“李延琰墨”初拓,赏赐皇族大臣。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失火,枣木原版焚毁,初拓本异常珍贵。帖石早佚,历代摹刻、翻刻甚繁,顾从义本、潘允亮本、肃府本较为著名。

现存《淳化阁帖》刻石有四种:1.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肃王府遵训阁本”,俗称“肃府本”。2. 清顺治三年(1646)陕西费甲铸按肃府初拓本摹刻一部,置于西安碑林,俗称“西安本”或“关中本”。3. 溧阳虞氏重刻本,俗称“溧阳本”。4. 杭州文渊阁旧址新发现刻石,二十五块,经和故宫博物院“懋勤殿本阁帖”比对,确定为宋代刻石,俗称“世堂本”。

兰州、西安、杭州都是历史悠久的郡府省会所在地,为何独有一套帖石会落户溧阳这个县域?

据光绪年间秀才、虞氏族人虞封山所作《珍藏淳化阁帖记》和《跋淳化阁法帖》所述,南宋时有虞氏十九世先祖虞维,字敦素,授宣议郎之职,娶赵氏郡主为妻。郡主擅长书法,常临摹钟繇及王羲之的笔意,内府对她有“卫夫人”(书法家)之称。赵氏郡主有北宋时赐淳化阁帖拓本,郡主朝夕临摹,出嫁时,拓本作为嫁妆陪到虞家。南宋时金兵南侵,虞维携妻儿及阁帖由丹徒黄沂坝避难来溧,举家到暨溪定居,成为暨桥虞氏始祖。

明朝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九日,肃王府通令征集淳化阁帖拓本送京审核,暨桥虞氏将珍藏的拓本经明臣温如玉送呈肃王府,据此本审定,重新摹勒上石,人称“肃府本”。

这是虞氏族谱仅见的有关阁帖的来龙去脉。由于年代久远,清末虞封山的记叙不尽详实。从北宋淳化三年到明代万历四十三年,时间已过去了整整 513 年,虞氏的帖本能否保存完好? 没讲。肃王朱模仅为甘肃藩王,他有权通令天下广集阁帖? 姑苏温如玉仅为当时著名刻工,而非大臣,他如何将虞氏帖本送呈肃府? 他怎知虞家有珍藏原帖? 没讲。虞家的阁帖石刻是肃王为谢献帖而赠,还是虞氏族人筹钱私刻? 何人何时摹刻? 没讲。

民国七年(1918)和民国二十五年(1936),虞氏两次重修宗谱,族人决议将阁

帖刻石镶于“庆远堂”一间廊房墙上，石分六层计 118 块，其中完整的 47 块，破损的 71 块。

民国二十年(1931)虞氏曾将帖石拓印出册，售价五元一本。据说上海商务印书馆得知消息，曾派人来洽谈购石，许以重金，但族人认为祖传族宝，不得出售，拒之。

1981 年，别桥将“庆远堂”廊房杂物清出，洗刷掉石灰，帖石重见天日。1993 年，对墙上帖石破损严重处进行了修复。2003 年，市文化部门邀请南京博物院有关专家，将帖石进行墙面剥离，运至文管会进行修复保管。2015 年，别桥镇政府和市文化局规划实施“淳化阁帖”刻石展览馆。

一部法帖石刻，历经岁月的洗礼、兵燹的熏炙、风雨的侵蚀、人祸的损毁，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这份历史的厚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她是刻在石头上的书法传承史，也是镌在心坎里的社会发展史。她又留下了许多的谜，等待我们去破译。

市图书馆西边有一简陋的夹弄，谁也不知是派什么用场的。它是文管会临时的仓库。

石碑、井圈、棺木……杂陈的文物堆里，透散出阴沉古朴的气息，像时光隧道，引领人们走向消逝的过去。

“淳化阁帖”刻石用泡沫纸包裹着，一条条竖立在墙边，像等待检阅的列阵士兵，一动不动，沉默无语。

经市文化局的领导同意，来自上海的几位专家学者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溧阳刻石。那位戴眼镜的“小伙子”叫仲威，上海图书馆碑帖部主任；那位沉着稳重的叫王运天，上海博物馆碑帖部主任；还有上海图书馆“拓碑第一人”、白发满头的老专家赵嘉福，和他的弟子邢跃连、张品芳两高徒；那位长发飘洒的帅哥叫汪大江，著名摄影家。当然，还有佛相满脸的好友李维伦夫妇，他们是这次活动的牵线人、联络者。

仲、王、汪三位，业内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上博”花四百多万美金从美国购回的“淳化阁帖”北宋拓本“安思远本”，主要运作者，就这三位。

王运天一走进仓库，对几具棺木先发生了兴趣，言：这是汉代的金丝楠木啊！汉以后就少见了。当时“安思远本”阁帖买回来，想找一金丝楠木匣盛之，结果好

不容易到扬州才找到一块料。没想到此处这么多！文管会的人闻言，连说没想到。

阁帖刻石仅一、二块未包，抬出欣赏，乃唐太宗书法。仲威观石观书，十分细致。我问如何，他慢条斯理说出四个字：精美绝伦！他说，此为南刻，刻工细，线条到位，入石三分。全国几套刻石，溧阳因是私刻，一直秘不示人，所以鲜有研究。以前也曾想来看石，终因没机缘而告罢。今天终于一睹，如要研究，当打开全部石刻，拓成拓片，因为原石因岁月剥蚀不会太清楚。

王运天言，可拓片出书，增加知名度，毕竟是国宝级的东西。也可把近年初拓出售拍卖，用作研究。还可出外展览，几套汇合……

汪大江自告奋勇，从拓片开始纪录，拍成集子记录……

宜兴紫砂国大师徐秀堂，携儿徐立及徒史小明，专程赶来拜访赵嘉福大师，成为这次活动的花絮。

后来，又赴上海与三位老师洽谈。后来，又赴别桥参加阁帖展览馆讨论会。后来，又参加南京大学贺云翱老师关于阁帖拓印的研讨会……

一切皆有机缘。据说擦肩而过的一瞥，都要修上几世，那与阁帖的结缘，几世修得？

车窗，掠过长江的百舸，掠过安徽的水田，掠过河南的村舍，掠过秦岭的沟壑。西安，仅是驿站，一夜过后，我们起早又奔赴甘肃省府兰州。

千里奔驰，我们只为一件事：为“溧阳本”《淳化阁帖》寻亲！

这是一件考虑筹划已久的事情。“溧阳本”和“肃府本”到底是什么关系？两本有何关联？“溧阳本”和“西安本”有什么关系？三套石刻是否血脉相连？

溧阳市政协副主席崔文敏、广播电视台长沈伟、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沈佳宾，我们四人组成了一个“寻亲团”，想了解一下三套碑石之间的关系，杜绝以讹传讹与不合理的想象。

做学问重要的是刨根问底，大忌道听途说。

北师大副教授、溧阳籍书法家虞晓勇在甘肃讲课，相聚在黄河之滨，自是一番欢喜。

晓勇的研究生是兰州人，其父是七里河区的书记，姓石，而甘肃博物馆正好位于该区。石书记十分热情，他帮忙联系博物馆长，提出想看下肃府本原石。馆

长似有为难，一因是国宝级文物，要两名以上保管员到场才能出库；二因正好是周末，工作人员休息，能否到周一再说？石书记一连打了三通电话，言明人家是从江苏千里迢迢专程而来，还要赶去西安，能否破例加个班？对方终于答应。石书记有点激动，说：馆长，我给您烧三炷高香啦！

7月19日上午，晓勇和石书记全家陪同我们去市郊拜访了中国书协副主席、甘肃省书协主席张改琴女士。张主席在了解我们此行的意图后，十分赞赏，认为这是为书法艺术的传承做好事。在欣赏了“溧阳本”石刻拓片后，她说帖刻十分精美，线条到位，点划到位，是艺术瑰宝。应崔主席之请，她答应为将来的溧阳“淳化阁帖”展示馆题写馆名，要晓勇届时告知尺寸。她还将自己刚出的作品集，一一签名相赠。

黄河，穿越兰州滚滚东去。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也像这滔滔不绝的河水，绵延千年，源源不断，润泽子孙。

天气酷热的江南，暑气蒸人。一到兰州这个高原峡谷之城，凉意顿生，难怪很多人爱到兰州来避暑。

中午的阳光下，还是热。我们来到甘肃省博物馆，进入后面有门卫的库房三楼，在一间陈列室的桌上，静静地放着四块长方石，等待我们的到来。

明初，朱元璋封他的十四子朱樛为肃王，并将一套宋拓《淳化阁帖》赏赐于他。朱樛视阁帖为珍宝，藏之内府。万历四十三年(1615)，肃王朱绅尧决定将阁帖摹勒上石，他请来当时镌刻高手姑苏温如玉和青州张应召二人，将拓本字帖临刻于富平石上。拓刻尚未完工，朱绅尧去世，他儿子朱识鋹继位，刻石历时七年，用富平石142块，终在天启元年(1621)完成法帖的刻勒。朱识鋹亲自作序，称赞其“新旧不爽毫厘”，可见温、张两位水平颇高。

“肃王本”刻石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几遭沉浮。清初时曾沦为马槽，后又为兵士毁石作为炮子，于顺治甲午(1654)始补石重摹。宣统二年(1910)，翰林刘希焘移帖石于兰州文庙尊经阁。1966年，兰州博物馆将之收藏。

“甘博”两位工作人员都戴眼镜，一位四十多岁的是主任，研究古瓷的，一位三十不到的女性；另有一位搬运工人。我们迫不及待地观赏起刻石，机会难得啊！崔主席、虞教授一一比对，如饮甘醇。石三块双面为草书，一块为小楷，有“梁肃思活书”题记，另一有“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二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篆）

和“万历四十三年之卯岁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重摹上石”之落款。富平方石，双面刻画，敦厚沉朴，温润如玉，色褐如铁，光洁如肤。虽刻痕划迹累累，缺角损边，但刻工精湛，字迹清晰，点划钩捺，刀刀到位，笔势气韵，一脉相承。虽历经四百年沧桑，依然散发艺术的魅力，闪烁惊人的光彩！我们戴上手套轻叩，声如钟磬，悦耳动心。

我致电仲威，告之终于看到肃府本原石了，他说他都未曾见过，虽然很多“肃府本”帖书由他作序，要我多拍照片，侧面也要拍。

明代大书家倪苏门对“肃府本”评价很高：“《淳化阁帖》在明朝，惟陕西肃王府翻刻石最妙，从宋拓原本双钩勒石，所费巨万，与今市本相去天渊。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作蝉翼擦拓，无不精妙，拓工间有私购者值五十千。”

比对“肃府本”和“溧阳本”两套刻石，我这个外行认为，“肃府本”毕竟是官刻，财力雄厚，用石考究，名工细刻，实为典范。当时所费逾万，不是小户人家所敢动的文化工程。“溧阳本”据陈鸿寿主修的嘉庆《溧阳县志》记，亦为明刻，那么当时的虞家何来这笔巨款？说是肃府所赠，当是谬误，路途遥遥，一百多块刻石，骡驮船载，运至江南？不大可能。

关于肃府版本，贵州李连昌有“肃府本”初拓本一套，他认为是一位叫张鸣鹤的人献宋拓本于肃府，肃王重刻，不知此说是否源于该拓本序跋？如此说温如玉携溧阳虞氏宋拓本赴肃府，缺乏依据，亦可能是后人合理想象。

溧阳本刻石，仍是谜团重重。但我们“访亲团”有一个共识：肃府本应为“老子”，溧阳本应为“儿子”！

甘肃兰州原有两位老专家是研究阁帖的，一位叫徐祖蕃，一位叫秦明智，据说他们共同发现了“肃府本”子本“溧阳本”。十分遗憾的是两位老先生都去世了，我们请教隶属关系真相的线索断了。那位戴眼镜的主任说：“现在像这种‘黑老虎’，很少有人去碰了。”他倒是问了崔主席许多的问题，隔行如隔山嘛！

石书记设家宴招待我们。他说，像崔主席这样的在职领导搞学术研究的，太少了！崔主席谈到阁帖源流，说：“四百年了，大概第一次有人来追根寻源！”竟一时哽咽，一时激动无语……

西安碑林位于南城墙魁星楼下，是收藏古代碑石最多最早的艺术宝库。

陈根远研究员在泮池边迎接我们。来西安前曾请两批朋友联系碑林石刻专

家,竟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人——陈根远,也是缘分。

在贵宾室的地毯上,“溧阳本”的拓片铺展开来,陈老师和崔主席蹲地观看,相互比对,认真的精神令人动容。

走进碑林第七展室,整整一屋的阁帖碑石叠垒成墙,隔着玻璃,那一块块刻石泛着三百七十多年岁月的幽光,在点划撇捺间诉说着昔日的故事。

清初,陕西金石学家费甲铸按照肃府本的初拓,摹勒上石,此石刻又称“陕西本”、“关中本”。刻套刻石共 145 块,两面刻字,高宽不一,每石八至十二行字不等,落款为“顺治三季丙戌长至月,关中费甲铸重摹上石”。碑林刻石有一显著特点,刻工和立石都有姓名,如卜栋、卜相、张翔、张文、赵璧、杨复林等刻字,宁献功等立石。刻工姓名如“长安卜栋”、“京兆杨复林”、“长安赵璧”等,多次出现在同时代的其他碑石上面,他们都是关中地区有名的刻石家族,是明末清初的刻石高手,与费甲铸多有合作。

碑林石刻据康熙五十九年(1720)记载,曾置于西安府学东北隅,能保留如此完好,实在不易,但已有损坏,也有漏刻。石质虽为富平石,当时朱笔勾勒,摹刻上石,但我个人感觉,刻工较之溧阳刻石,尚嫌粗放,较之肃府刻石,差距较大。

“西安本”(刻石)与“溧阳本”(刻石)之同异,应同为肃府本之后,“溧阳本”刻成为明末,“西安本”为清初也。

7月24日,洛阳龙门博物馆。

一场关于《淳化阁帖》的小型研讨会正在进行中。像一次不期而遇的邂逅,洛阳、溧阳,围绕一个传统文化的专题,大家聚到了一起。

龙门博物馆由朋友王迪私人创办,历时十年,藏品之丰富,规模之宏伟,设计之精巧,绝不亚于任何一家省级博物馆。

路过洛阳,王馆长盛情接待。在东湖宾馆的夜宴上,他特邀了洛阳艺术馆原馆长赵振华、中国文化艺术网郑州站主编王蔚波等人作陪,书画家常济中夫妇是“介绍人”,也坐列其中。席间,谈及阁帖寻亲之旅,王迪说他也有一套十本的拓片,而赵振华先生说,洛阳的晁会元是全国收藏阁帖版本最全的藏家。王迪接话说,把晁先生请来,我们明天就开个《淳化阁帖》版本小型研讨会!

人有缘、事有缘、会有缘、帖有缘。意外的收获,源于《淳化阁帖》的渊源,源于河洛文化的底蕴。

洛阳文物局副局长余江宁来了，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来了，赵振华、王蔚波、王迪、常济中……少林达摩院院长、老乡陆海龙专程从登封赶来。

晁会元先生来了，拖着一个旅行箱，拉链拉开，宝贝呈桌，让人赞叹不已。他一共带来了初拓“肃府本”、“关中本”、“王著本”、“溧阳本”、“上海五石堂银锭纹本”和“百泉本”六种版本，加上龙门博物馆的清中期朱批本和我们带的新拓溧阳本，八部阁帖拓本排列一桌，满堂生辉，眼界大开！

晁先生是三代收藏的大家，国家付梓重印的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本，就是由他提供的原本。他带来的阁帖版本中，有两套是吸引人眼球的，一套是两本的肃府初拓本，据他说全国仅两套半，北京、兰州各一套，他为半套，这是他初次展示，只因来了溧阳客人。一套是溧阳本全册，也是因为来了溧阳客人。

晁先生说他曾为考察溧阳本原石，两次专程去了溧阳，一次到了别桥的虞家祠堂，一次到了堆放原石的某建安公司仓库，好说歹说，总算看到了堆放着的刻石。他对溧阳有感情，见到来自溧阳的人感到亲切，所以特地把肃府本初拓也带来了。

晁会元带来的溧阳本拓册一套十本，封面为鹅黄线装，题签为“淳化阁法帖”、“子纲题签”字样，盖有“路景松印”，品相完好，对比后应为清中晚期拓本，该套拓本保存完好，内容较民国拓本完整，具有较高的文史价值。看到此本，我们愈感觉溧阳本刻石的珍贵！

晁先生还带来了他新发现的“孟州本”拓本，介绍了该套刻石的情况。他表示愿意和溧阳有关方面合作，重印阁帖“溧阳拓本”。他说，孟州仅剩几块石刻，还打算恢复全套刻石，你们有那么多块，可以说是国宝级的文物，为什么不恢复？

余江宁先生说，今天的研讨会有点像兰亭禊会，群贤毕至，这么多版本的《淳化阁帖》聚到一起，太不容易！民间有高人啊！

我想，这也许是《淳化阁帖》版本的一次大聚会了，希望下次聚会的地点在溧阳。

九天，横贯五省，行程四千公里。

这是一次“寻亲之旅”，这是一次文化苦旅。疲惫，心却充实。踏在继往开来的土地上，一步一个脚印，踏实。比坐在电脑前凭空臆想、随意杜撰，务实。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至少，我们在路上。

长寿之乡话美食

溧阳，山清水秀的一方江南福地。大自然的造化赋予这1535平方公里土地钟灵毓秀的同时，也赐给了她物阜丰饶、天宝物华的特质。

早在4500万年前，“中华曙猿”这哺乳类动物共同的祖先，就生活在这片草木丰茂的山水里。六千年前马家浜文化的“神墩遗址”，原始陶罐里曾装盛延续生命的食物。“良渚文化”时期的小梅岭美玉，祭祀苍天对苍生繁衍生息的恩赐。旧县汉墓里的陶盆瓦罐，炭化的谷物依旧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竹箬李彬墓葬的陶制家居，猪鸡牛羊，农耕稼穡，埋藏着千百年前溧阳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山一水六分田”，地理上的黄金分割，使有山有水的溧阳物产丰盈，特产丰富。四季分明的气候，雨量充沛的滋润，使这片丰腴的土壤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给千年美食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料。山有山珍，水产鱼虾，田收稻麦，溧阳—真正的鱼米之乡！

关于溧阳美食，最早的著名故事应为《晋书·陆机传》：“至太康末，（陆机）与弟云俱入洛……又尝诣侍中王济，济指羊酪谓机曰：‘卿吴中何以敌此？’答云：‘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时人称为名对。”这里的千里莼，就产在溧阳的千里湖。《名胜志》载：“溧阳有莼湖，即陆机所谓‘千里莼羹，未下豆豉’者，又名千里滄。”千里湖早已干涸，莼菜也渐渐淡出溧阳人的视线，但这段千古佳话，却为人们留下了两道溧阳美食：莼羹与豆豉。关于盐豉，历来说法不一，杨万里、陆游等文人都有自己的解释。其实，盐豉为溧阳百姓的家常菜——酱油豆！将黄豆浸泡，让其霉变，放进盐巴腌制，捞起搁菜油上锅热蒸，这便是地方上常年的“过饭菜”——酱油豆！陆机进中原，让他难以忘怀的竟是溧阳的两道家常菜！而“莼鲈之思”的典故，更让人感叹颇深。《晋书·张翰传》云：“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

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人驾而归。”吴人张翰，为美食而辞官返乡，可见溧阳美食之魅力也！南宋词人辛弃疾有《六么令》：“谁怜故乡梦，千里莼羹滑。”也许为美食和故乡的关系，下了最好的注脚。

莼鲈之思，掀开溧阳美食筵席上的一角。自然的馈赠，使四季有特产、月月有时鲜的溧阳人，大快朵颐之际增补了营养，增加了健康，养成了一套以食进补、延年益寿的养生之道。如果说空气、水源的洁净是溧阳人长寿的外部条件，那么合理的膳食习惯、时令菜肴的不断更换、山珍湖鲜的烹饪进补，则是溧阳人长寿的内在秘诀。

据说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江南，问三朝元老、溧阳籍宰相史贻直：“爱卿，你的家乡有何风味美食啊？”史贻直答：“毛尖花红棠下瓜，黄雀青鱼白壳虾；馒头烧卖鸭浇面，芹菜冬笋韭菜芽。”第一句言瓜果，第二句是讲河鲜，第三句乃面点，第四句说时蔬，浓缩了溧阳地方风味的精华。

“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茫茫愁煞人。”唐代诗仙李太白三到溧阳，与当时草圣张旭相遇于溧阳的酒楼，饮美酒、品美食，赏白纛舞，听胡雏笛，写下了千古绝唱《猛虎行》，张旭草书于墙，留下一段佳话，也留下一家名店“太白酒楼”。四时八节，溧阳人讲究吃，满桌佳肴，座无虚席。清时盛极，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小小的溧阳城就有临时馆、仁和馆、胡复兴、复珍轩等酒菜馆七八家，其中南大街太和馆有餐桌 30 余张，司厨 70 余人，宴席用银台面、象牙筷，颇具奢华。

溧阳厨师根据时令节气，选用本地特产，像戴埠南山的冬笋大栗、长荡湖里的青鱼白虾、社渚横涧的山鳊鲜蘑，做出了如栗子烧鸡，清炖鸭饺、菊花青鱼、还丝汤、神仙蛋、炒随配、高丽肉、炒三冬等名菜佳肴，脍炙人口，为美食家称赞，为百姓所喜爱。即使是“文革”期间，溧阳不少厨师还是国家驻外使馆里的“大师傅”！

溧阳有俗语：吃是真功，穿是威风；不吃不穿，一世亏空。虽有调侃，却也是道出了溧阳人对美食的看重。

就说早点吧，除烧饼、油条、豆腐花之外，溧阳人还有鸭浇面、麻团、油老鼠、烧卖、小饺馄饨、小笼馒头、羊蹄蹄、粢饭糕……烧饼分甜咸，还有萝卜丝、拆酥、

黄壳、高脚、芝麻之分；油条没花样，也有“老油条包茴芽豆”之美味。生活精细到这份上，人还能不长寿？七月初七炸“巧云”，九月初九蒸“重阳糕”，乡间还有“粢米豆腐”、“满锅摊”、“咸粥糊汤”、“油炸糍”、“白粥扁团子”、“绿绞头团子”、“毛鼻头饼”、“荠菜馄饨”等时令家常美食，既绿色有机，又美味可口，让人魂牵梦萦，常常有“莼鲈之思”也。

再说时蔬吧，溧阳一年四季，新鲜蔬菜不绝于时。春季有毛笋、蒜苗、菜苔、莴笋，夏天有冬瓜、长豆、茄子、番茄；秋时有茭白、萝卜、小塘菜、黄芽菜。冬令有芹菜、菠菜、茨菰、乌油菜……还有春雪菜、三月白、四月塘、苏州青、秋匹兰、伏青菜、赤塘菜、八月黄、鸡毛菜、秋蒿菜、飘儿菜、天花菜……富有诗意的菜名，积淀着江南的膏腴，洋溢着餐桌的丰盛。

让我们欣赏一下溧阳时蔬珍品白芹吧。叶如翡翠，茎若白玉，须如银针，这是它的外形。清脆爽口，入口无渣，香嫩可口，降压降脂，这是它的内质。具有八百年种植史的珍蔬，凝聚了溧阳人的聪明才智。水芹旱培的独特方法，使白芹摆脱了药味涩味，充满着水乡的清香纯朴，充溢着吴越的白嫩水灵。

雁来蕈也是地方的一朵奇葩。每年大雁南飞，秋雨霏霏，丘陵间的松林里便能钻出这种深色的菌菇来。大家王世襄曾言：“‘蕈’通‘菌’，或称蘑菇，其味确实隽永，且富营养，是厨蔬无上佳品。我素嗜此物，尤其是春秋两季野生的，倍觉关情。”溧阳人爱把雁来蕈用酱油浸泡，烧汤佐面，鲜得落脱眉毛无数。

乌饭是目连救母故事衍生出来的特产。目连给地下的母亲送饭，都被恶鬼抢食。目连从山上采来乌饭草，杵叶成汁，把米放进去浸泡，蒸出来的饭是黑色，恶鬼再不争抢，目连母亲得以饱腹。乌米饭散发自然的清香，糯软爽口，佐以绵白糖，香柔甜滑，入得肚去，消化着孝道的营养。

豆制品是寻常百姓的家常菜。大豆经过浸水、磨细、滤净、煮浆，加入适量石膏或盐卤，蛋白质凝结，压去水分，便制成可口的豆腐、素鸡、百叶。在缺荤的年头，这是普通人家桌上的佳肴。城里居民要凭票供应，起早摸黑排队。豆渣也是美味，放点大蒜叶下锅一炒，香！

溧阳还有一道似菜非菜的点心，叫糊鲜蚬螺。用面粉放进腌菜水，搁蚬螺肉和韭菜末，下锅一拨——闻闻臭，吃吃香，尝尝鲜的“中华名小吃”出炉了。过去百姓人家既当菜又当饭，现在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逢春节北山片的许多人家都要上一道大菜——扎肝！原料为猪肝、油豆腐、五花肉、笋干，用小肠一扎，放进锅里红烧。揭盖汽腾，异香扑鼻，荤素搭配，令人馋言欲滴。这道“大菜”，因小肠节像玉带，两块油豆腐像“官帽翅”，而方言“肝”与“官”又同音，所以从前考功名的仕子要多吃。近年又被评为“中国名菜”和常州市“非遗”。

“砂锅鱼头”是溧阳最负盛名的一道招牌菜，许多外地人就是冲这道菜而来，于是一锅鱼汤煨热一方旅游的故事便口口相传。其实，砂锅鱼头的出名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天目湖由沙河聚水而成。所产鳊鱼头大身肥，俗称“胖头鱼”。20世纪70年代，75个国家的使节来溧阳考察水利，临时要在当时的水库招待所用餐，这可难坏了厨师朱顺才。他灵机一动，利用水库自身资源，做了一席全鱼宴，最后一道大菜就是砂锅鱼头汤！孰料外宾们被这汤色乳白、原汁原味的浓汤征服，纷纷以汤代酒，连呼“OK”！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江苏，提出要品尝“砂锅鱼头”。朱顺才带了溧阳的鱼，溧阳的水，为首长做了一锅鱼汤。卓琳女士端了一杯红酒，专门到厨房向朱师傅致谢！后来，许多政要名人品尝过鱼头汤后，对其“肥而不腻，鲜而不腥”的特色赞不绝口！食客络绎不绝，游客纷至沓来。游天目湖，尝砂锅鱼头，成了一种时尚，一道风景！原来食堂里的一道下饭菜，成了淡水鱼烹饪的“中国名菜”。原来食堂里的朱师傅，成了烹饪“金爵奖”得主朱大师！个中嬗变，个中演绎，不是传奇，又是什么？

传奇，有偶然性。但砂锅鱼头的传奇，却有其必然。江南少有的一泓清水，清水里游弋的胖头鱼；真山真水的环境，真材实料的煨炖，真诚睿智的师傅，缺一不可，就不会成就名闻遐迩的佳肴！

我总觉着，砂锅鱼头的成因，是溧阳美食与长寿的最佳代言。山水孕美食，山水养长寿，美食促长寿。

说美食，谈长寿。“中国长寿之乡”溧阳，千百年来的传统美食，养育了一代代黎民百姓，养育了一代代能人志士。朱顺才煨制出一锅香飘八方的浓汤，烧制出红烧划水、碧影红裙、鳊鱼粉丝等道道名菜。王新华立足家乡美味，搜集整理成288道地方风味，打造成溧阳菜系！使很多即将失传的“妈妈菜”、“外婆菜”，重又走上餐桌。溧阳的二百多家农庄，家家都有拿手菜，庄庄都有“看家菜”，个个都有特色菜。正因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有了溧阳美食的推行与弘扬，有了长

濼水钩沉

寿之乡的美食口碑!

夏丐尊曾说：“中国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口的文化。”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有句地方俗话，叫“吃煞溧阳人”，喻指溧阳人的好吃，但好吃有什么错吗？好吃衍生了美食，美食带来了长寿。

春天来了，你看那田野泥地里，马兰、荠菜、香椿、茅鼻鼻、红花草、野小蒜……都是溧阳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溧阳人讲究吃，溧阳人很会吃，所以——溧阳人长寿健康!

吃煞溧阳人

民国文人夏丐尊，在《谈吃》一文中，大谈国人的吃相，入木三分。他说，中国人是全世界善吃的民族。俗话说得好，只有“两脚的爷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吃”。在中国，衣不妨污浊，居室不妨简陋，道路不妨泥泞，而独在吃上，却分毫不马虎。中国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口的文化。

夏先生的话说得有点绝，但不为过。既然以食为天，那还有比天大的事吗？

还有比夏先生绝的，叫“吃煞”：“吃煞”，不等于“吃死”，更不等同于“撑死”。煞，是“凶”的意思，也是“极”的意思，凶狠到一种极至，可见其厉害，也是溧阳人方言里到位、煞根的意趣意味。

“吃煞溧阳人”也是一句俗语，表明此地吃风很盛，也表明此地人会吃善吃。“吃是真功，穿是威风。不吃不穿，一世受穷！”吃是实惠之事，又叫“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溧阳人是毫不避讳好吃之道的。

就吃来说，溧阳人来得豪爽，有点看不起丹阳人“大麦糊粥”，看不起金坛人“江北俚气”，也看不起比溧阳富裕的宜兴人“把把细细（节俭）”。亲戚上门，哪怕借钱也要上街剁肉买菜。逢年过节，哪怕到隔壁人家借菜也要撑足桌面，面子有了，夹里有了，自家苦点无所谓。表面上是好吃，骨子里是好客。死要面子活受罪，那是风俗，也是过去。

笔者是溧阳人，也好吃，但远不是美食家。记忆中吃得最气派的一顿，是1996年5月2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丹麦楼，宴请江西朋友，单是朋友买的，客算我请的，朋友说我“派头”像点的，又会“撇”北京话，让对方摸不清我方的路数。生意场上的事，我是外行，但冒充大款，一生也就那么一次。为什么日子记得那么清楚，因为桌上人手一份的菜单我一直保留着，也想保留一份关于“豪宴”的回忆。菜单如下：“彩色花拼、四围碟；热菜：汽锅乌鱼蛋汤、鱼翅四宝、焗蜗牛、意式

计司烤鱼、砂锅羊排、鸡汁双素、冰激淋、点心、水果。”时过二十年，味道全忘掉。只记得没吃饱，为敬客人，茅台酒喝了二三两，两三天没有醒转来，昏昏沉沉，人家问味道，只是答：“那茅台是真佬，凶的！”

在溧阳也曾享用过一餐“豪宴”，因为脸皮厚，挤进“美食学会”当了“秘书长”，在“山珍宴”研发品鉴会上，饱了口福。其菜单如下：“冷菜：油焖岗笋、蒜蓉山菜松、鱼香卤花菇、干煸鹿肉脯、烟熏野猪肚、芝麻野鸽胸。热菜：虫草竹荪肝膏羹、参雉扒大乌、桔香扒鹿筋、杨梅炒雀脯、锅烧羊肚菌、竹鸡烩三珍、肉末紫蕨苔、芥汁炒山笋、大鲩炖鸽蛋。点心：野菜大汤圆、鹿肉煎锅贴。”看完是否馋涎欲滴？倒也不必心惊肉跳，鹿、鲩、野猪、竹鸡等珍禽，都是人工饲养，不属暴殄天物。在此也无炫耀之意，只是想说：溧阳有很好的食材，也可做许多的佳肴。

好吃不算本事。吃过之后嘴一抹，打几个饱嗝，剔一下牙缝，什么菜都不记得，那叫白吃。我为了长个记性，留住记忆，也给后人留点关于地方美食的名材、名菜、名店、名厨，查阅了一些资料，并特地拜访了两位餐饮界的前辈马恒德和史庚福，让他们回顾一下溧阳美食的今昔、他们的美食人生、他们的美食故事。

溧阳有句老话，叫“吃在东门，玩在南门，穿在西门，住在北门”。

由于地处三省交界，商贾云集，饭店菜馆、酒楼小吃星罗棋布，尤以东、南门为集中。民国二十五年(1936)县城就有酒菜馆七八家，以南大街太和馆为最，拥有台面30余张，司厨70余人，上等筵席用银席面、象牙筷，极尽奢华。抗战胜利后，餐馆兴盛于码头街、前后街一带。1947年，溧阳有饭店33家，像码头街的临时馆、仁和馆，前后街的胡复兴、复源轩，南门街的复珍轩，都是当时有名的菜馆，常年座无虚席，生意兴隆。

1949年后，1950年11月城区有饭馆19家，1956年40家大小店面参加公私合营，定名“公私合营溧城镇大众食堂总店”，下设10个饭菜馆，另有186户摊贩合作组成饭店17家。

马恒德师傅是溧阳餐饮业的“老法师”，许多人叫他“马师傅”。他是1956年进大众饭店学徒，该店在现新晨百货对面，楼上摆14桌，楼下10桌，是当时城里最大的饭店，店长是赵洪福。那时公私合营，十个店分成了十个门市部，分别在码头街、南门桥、中桥、东门桥等地。

当年一桌酒水价格在12—16元左右,12元一桌的上4个大冷盆,16元一桌上4个大拼盆,热炒4—6只,分别为炒腰花、炒虾仁、炒蹄筋、红烧鱼、炒随配(肉皮、小肉圆、鱼圆、虾圆、大蒜);笼菜有:肉圆、蹄膀、东坡肉、八宝甜饭、整鸡;考究点上“全家福”,就是鸡圆、肉圆、虾圆的组合。也有根据时令上的菜,如大栗烧鸡、清炖黄雀等,一桌菜肴一般冷热18道菜。乡下办酒水俗称为“猪鱼肉斩”,以“猪八碗”为主。

那时散客上馆子时兴吃“和菜”。和菜分小中大三种,根据人头多少而定,小份3.6元,可供2—4人吃,一拼二炒;中份5.5元,二冷三炒;大份8元,三冷五炒。那时工资低,饭店工作的底薪为16—18元一个月,但月底拆账分成,往往超过底薪。一般人上饭店吃了一顿和菜,嘴巴要咂味几天,到处要嗨威(炫耀)几天,了不起的事!

1958年,马恒德18岁,就当上了第三门市部的负责人,“三门”是原来的大华饭店,当时是最大一家饭店,每月营业额有6000—8000元。1964年7月,原中国饭店和大华饭店合并,在县东大街百货公司旧门面房,经修缮开设“国营溧阳饭店”,算高档饭店,负责人是徐春殿。饭店的名字,是县委常委开会定的。1968年,马恒德负责溧阳饭店,当时房屋陈旧,堂口狭窄,设施简陋,后来房屋改造,县委常委都来看现场,拍板决定,可见对餐饮业的重视。他当溧阳饭店经理,一直到1996年。

1980年12月,太白酒楼开张,香港《大公报》、《中国烹饪》都刊登文章予以介绍。1985年,溧阳全民所有制饭店有太白酒楼、溧阳饭店、大众饭店、平陵饭店、群众饭店、车站小吃店,集体所有制饭店有东升楼、杏花楼等12家,个体饮食摊店132家。

大有大吃,小有小酌。溧阳习俗,婚丧嫁娶,拜祭上坟,时令节日,乔迁高升,都是开吃的日子,都是饱腹的理由。没得吃,想出吃,有得吃,敞开吃。传统乡风,至清已盛,民国三十六年的《苏农通讯》上,就登过乾隆宰相史貽直的家乡风味:“毛尖花红棠下瓜,黄雀青鱼白壳虾;馒头烧卖鸭肉面,芹菜冬笋韭菜芽。”能说溧阳人不会吃吗?

史宰相说的特产,溧阳还真不少,如横涧冬笋、平桥板栗、社渚山鱖、城南白芹、上黄黄雀、毛尖花红、上阁楼家庆子、善庆蜜枣、棠下西瓜、雁来蕈、乌米饭、三

黄鸡、小山羊……四季不同的丰富食材,为溧阳美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身为溧阳人,是应为有口福而自豪的。

庖厨之道,五花八门。烤炖烩炒、炸熘爆烧、卤熏醉炆、蒸煮炙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马师傅讲,过去饭店普通食材大抵分三类:肉类,分肉片、肉丝,又分生熟,可烧回锅肉、粉蒸肉、腐乳肉、东坡肉、酒焖肉、清蒸肉等。鸡类,分鸡丝、鸡片、鸡丁、鸡块,还有整鸡,可红烧、白焐、上笼蒸。鱼类,分鱼丁、鱼圆、鱼球、鱼片、鱼丝,可红烧,可清蒸,像糖醋鳊鱼,清蒸白鱼等。

溧阳有许多传统名菜,因精工细作,用料考究,现在的厨师大多不肯做了,要吃除非几位老厨师亲自下灶才能原汁原味,有老味道。讲几道吧:

神仙蛋:将鸡蛋下锅煮三分钟,蛋白凝固用筷子在蛋壳上捅一小孔,倒出蛋黄,用鲜虾茸、肉茸拌佐料打浆,塞入空蛋处,湿淀粉封口,上笼蒸熟,再将蛋去壳下油锅炸成金黄色呈虎皮状,红烧,勾芡,上盆。蛋脆茸鲜,外香里嫩,咬上一口,赛过神仙!

还丝汤:黄鳝去骨切片,下油锅灼后捞出,用虾仁、开洋、虾籽、火肉片、香菇做汤头,将鳝片还锅,焖煮至白色。片软滑嫩,汤白鲜美,夏令佳肴,温而去火。

夹沙高利肉:用猪背脊膘肉,披成薄片,两片中间夹豆沙,在炒米粉上滚,再上蛋清,入温油锅炸,几分钟后起锅,搽上白糖。香甜可口,脆柔相宜,油而不腻,甜食最爱。

花鼓蹄筋:乃清末同治年间品升楼菜馆创制的名菜。蹄筋水发,切段,将虾茸、肥肉茸拌成糊状,火肉、香菇、葱切成条;再将蹄筋放入调匙内,上辅虾肉茸,再放一层火肉、香菇、葱条,轻抹成腰鼓形,上笼用小火蒸四分钟,取出装盆,用高汤勾芡,浇在盆中即成。外形美观,味鲜可口,荤素溢香,柔软入味。

清炖黄雀:又叫黄雀塞肉。将雀去毛、内脏,洗净,腹中塞满肉茸,排列碗中,放姜、酒、盐,点缀虾仁、鸡丁,再盖上一张青菜叶,上笼蒸透即成。还有黄雀卷,一只雀剃两块,浸到佐料里吃味,用豆腐皮包卷,上笼蒸熟。另有“百鸟朝凤”,用母鸡一只,置于品锅中央,周围排列黄雀,上笼清炖而成。过去长荡湖黄雀很多,十一月份最为丰腴。

如意笋:用南山冬笋,煮熟,放案板上披薄,将虾仁、肥肉斩茸,放调料,拌成糊状,加蛋清摊在笋片上,卷成如意状,放在盆中,上笼蒸熟取出,切成段,用高汤勾芡浇上即成。鲜美可口,香味扑鼻。

双合蛋:取鸡蛋3—6只,打花,放蹄筋、虾仁、腰花、开洋、香菇,入锅油煎,泛黄后起锅,烧配料勾芡浇上,再摊一个蛋皮,合拢,双合。脆嫩交融,香味浓郁。

荷叶粉蒸肉:先将肉片浸在调料中入味,取出拌熟炒米粉,用新鲜荷叶包裹,上笼蒸熟。清香扑鼻,肉片鲜美。

虎皮糟肉:取五花肉切片,放锅里煮七成熟,取出冷却后,开油锅高温炸,至外皮发黄起泡成虎皮形,改刀,先放露酒,做芡浇,上盖露酒糟,上笼蒸,起锅。酒香满桌,肉质肥美。

翡翠烧卖:始创于清品升楼。用打过霜的乌油菜下锅灼,放少许碱,捞出斩细如泥,腊肉切丁,和熟板油一起搅拌成馅,放姜葱调料,关键是皮,一斤干粉要擀皮160张左右,薄如纸张,上笼先稍呵气,到吃时蒸熟。吃时一定要配麻方烧饼夹之,过油不腻,皮色碧绿,香而不腻,鲜而爽口,似翡翠宝石。

汤面饺:猪肉剁茸,加木耳、肉皮、虾仁、虾皮拌馅,手工擀皮,一斤粉60只,大如茶盅,包馅,捏成半圆形花边,上笼蒸十分钟即熟。吃时配姜丝香醋,汤汁满口,味鲜不腻。

鸭浇面:大鸭剁七八块,小鸭剁五六块,过水2—3次,去掉血沫,鸭汤也过滤2—3次,肉开片,扣碗,上笼,佐料入汤锅里,汤要求象牙白色。面另捞。吃时一碗面,一碗浇头,可和可分。鸭肉鲜嫩,汤汁鲜美。

金钱虾饼:面饼用模制成钱状,上笼蒸,上面放火肉末、虾米、香菇、葱末。饼香味美,点心佳品。

那时的饭菜类型分“普通商品”:面饭汤类,利润幅度为18%—20%;“中级商品”:热炒、烧卖、春卷、面饺、盖浇面、炒饭等,利润幅度为22%—24%;“高级商品”:传统名菜、创新菜肴,利润幅度为26%—28%。黄鳝、虾可做高级商品,像黄鳝可做刺毛鳝筒、沙司鳝片、清炒鳝片、油爆鳝糊等;虾则可做糖醋爆虾、盐水虾、炒虾仁、炆活虾、寸金虾、琵琶虾等等。做点花色花样,就是高档宴席上用了。

溧阳在民国时期,有名厨史小山,茶亭人,在太和馆掌厨,红烧鱼是拿手菜。

史小山有徒弟周洪春。当时配菜的史益山名气最大，配菜是技术活，要翻花样，要适合不同顾客的胃口，全靠配菜师傅。

1985年，溧阳有一级厨师郭顺伢，二级厨师朱洪福、万俊生、贾洪生、李志安，三级厨师马恒德、吴阿三、赵洪保(女)等十三人。溧阳先后有三、四十名厨师被委派到我国驻外使馆和美国、日本、伊拉克、科威特等十多个国家工作，掌勺烹饪，将地方美食输出到五湖四海。这在当时国门尚未打开之际，是件十分嗨威(荣耀)的事。

史庚福，74岁，一头有点卷曲的白发染着岁月的风霜，棱角分明的脸庞透出几分睿智。

他是溧阳餐饮界的一个传奇。

1980年，作为一名下放知青，史庚福开了家后陆饭店，开始了颠勺烹鲜的生涯，捏锅铲柄比锄头柄总要省力点。饭店不大，弄几个小菜滋味不错，渐渐远近有了点小名气。1985年曙光针织厂相中了这位厨子手，把他调到厂里食堂，专烧小灶，招待贵客。那时厂里上海客人多，嘴巴来得挑食，但史师傅烧的菜连上海人都啧啧称赞，一道“羊宝冬笋”成了必点佳肴。

1989年，史庚福接手承包宾馆对面的“曙光餐厅”。餐厅很小，两间门面，40多平米，摆不下几张餐桌。酒香不怕巷深，菜好不嫌店陋，渐渐桌子不够用了，食客要等候了。螺丝壳里做道场，挖地三尺，空中加阁，总算扩建到六七十平米，设五个包厢，堂吃七桌半，但仍然挡不住食潮汹涌，中午一般要翻台三次。老史开饭店有何“绝宝门”(办法)?

老史是个肯动脑筋的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敢于创新。地方传统菜肴，不懂的他就去请教姐夫马恒德，老菜翻新，老法新做，老料新配，老味新烹，使他做的菜肴既不失传统特色，又适合时下食客的口味。

老史空下来就揣摩菜肴的创新，怎样以日常的食材烧出高档的口感?怎样以低廉的食材创出较高的利润?怎样以翻新的食谱吸引刁钻的老客?怎样以有限的空间营造美食的殿堂?

史庚福最传奇的是他的“豆腐席”。

行内人都知，素菜难烧，素食难做，要想用素材做出花样来，那得花大工夫。

先说下菜单吧：凉拌豆腐、雪花豆腐、开片豆腐、麻辣豆腐、网油豆腐、进香豆

腐、剪刀豆腐、金钱豆腐、眨眼豆腐、鹅脑子烧豆腐、乌龙穿壁……总共二十四道豆腐菜，只只不同样，道道有名堂，盆盆有花样，桌桌有特色，你说老史没点新点子、新招数、新花式，能让一个小餐厅天天爆棚嘛！

讲几样有名的吧。

乌龙穿壁：买小的活泥鳅，置整块嫩豆腐，慢火炖烧，泥鳅受热钻进豆腐，加料烹烧。

网油豆腐：将小豆腐切刻成三角形，过油炸，开红锅烧，豆腐卤汁放生粉熬，加料浇上面。再将蛋清放水生粉打搅，开油锅烧至七八十度，用漏勺将蛋清汁沥下锅，炸至蟹壳黄，香脆美味，像极猪油板网，罩在烧好的三角豆腐上，即成。

金钱豆腐：取方块豆腐，用刀揭薄皮，内用工艺刀剝一圈取走，将香菇水里捞一下，剪边去梗，压扁，放入豆腐内。上笼蒸，放油盐味精，揭下豆腐皮走油锅，稍黄后盖上；将豆腐卤水拌佐料，勾薄芡烧，豆腐红烧。外方内圆，像古铜钱。

雪花豆腐：将嫩豆腐放入锅里烧，勾芡，放料，加入开洋、淡菜增加鲜味，起锅时上面放上肉松。豆腐嫩似雪花，澈骨粉嫩。

眨眼豆腐：用豆油将四方豆腐走油，煎至蟹壳黄，放齐佐料烧一下，再将锅烧至热温高，干炒，起锅，下盆。因豆油泛泡，好像眨眼，小心烫嘴。

鹅脑子烧豆腐：据传溧阳人到上海载氨水（肥料），跑进饭店张口就喊：“我老子来它一盆烧豆腐！”溧阳人出口腔好称“老子”，结果店家端上一盆鹅脑子烧的豆腐，价格不菲，吓煞食客。史庚福利用这个笑话，创制一道名菜：定购豆腐和鹅头，将鹅头剖开，脑花用清水养上，放点盐花；将养好的一个半鹅脑花上盅，上笼蒸，下放嫩豆腐花，一盅卖 12 元，成本才 5 毛钱。剩下的鹅头，烧卤菜，一个卖 5 毛，一元 3 个。那时熟卤菜外卖还不时兴，一下子供不应求，有一“烧酒鬼”常常买来下酒，后说不能从餐厅门前过，闻到香味馋唾沥！

曙光餐厅还有几道拿手菜：

霸王别姬：用地产鸡婆，去毛去脏，加野生甲鱼一只，上锅放料清蒸，营养丰富，汤鲜肉肥，当时要卖到 560 元一道，可谓高档。

清汤鸡脯：将浓度高的蛋清用力打稠，放到调羹里，上放鸡脯嫩肉一块，油烧至 30 度，将蛋清鸡块发到鹅蛋大小，边上汤锅放木耳、菜心，将鸡脯放入，形如汤圆，鲜嫩可口。

红烧肉蟹：肉蟹，非螃蟹也。取猪前蹄脚圈大蹄筋小蹄筋中肉一块，贴在墙上阴干，烧时取下，加料红烧，脆韧有余，肥美异常。

素烧卖：用本地产小堂菜去头尾，中间放虾仁、香菇、开洋木耳、葱花、佐料，上笼蒸，形似烧卖，外素肉荤，清香鲜美。

正因为有了这些“看家菜”、“特色菜”，老史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不少人慕名而来，连当时不少领导也登门品尝。有人讲“开会大宾馆，吃饭小餐馆”，指的就是“曙光”，因为对面就是溧阳宾馆嘛！但也有人讲“曙光”菜肴一流，刀快也一流！实指餐厅利润率高。1991年，溧阳电视台新闻频道采访了史庚福，针对人们的议论，他面对镜头说：“我们的菜品成本不高，利润很高，大家看到了。但也有大家看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每道菜后面花的工夫！我们卖的是工夫钱！”其实，拿现在的话来说，还有技术含量和知识产权。1991年5月，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新闻纪录片，用餐就在曙光餐厅，听到史老板的自主创业的故事，曾想拍一部纪录片，但史庚福婉谢了。

1992年，南渡人民机具厂（锯镰刀厂）请来一位日本技术人员指导生产，他在宾馆用餐不对胃口，踱到对面小餐厅吃吃试试，谁知一尝就喜欢上了。日本工程师提出一天三餐要在此用，至少一天一顿，老史提出每天只能供一小桌，还要错开高峰时间。日本客人早饭一块豆腐，一只水煮蛋，一杯啤酒。晚上老史就上特色菜，他要吃对蟹，就用小笼蒸，色美味鲜。日本客人拍了照，带回去。另一西瓜盅，把西瓜瓢取出，里面放百合、桂圆、白萝卜丁、白糖，外皮把日历上的十二生肖剪下，贴皮上，照样刻出，日本人品完甜点，一定要把西瓜盅带回国去。那位常州的翻译说，走遍大小城市，溧阳菜肴最满意！后来，那位日本客人又来了，带了两把东洋刀送给史庚福，以表谢意。他说那张螃蟹的照片，他老母亲留了一张挂在家里，实在是喜欢！

1989年，史庚福曙光餐厅的营业额就达到63万多元，而当年整个饮服公司公家十来家饭店，营业额才64.8万元。税务局根据他的营业收入，让他缴了一万多元的个人所得税，这在当地也是破天荒的。第二年，餐厅营业额达74万多元，而饮服公司是下滑的。“曙光”的员工年收入能达万元，而当时工厂工人年收入才一千多元。

1993年，史庚福私人经营，将餐厅改为“德兴餐馆”，做了两年，歇业享福。

他也成了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当然，这个富，是靠他的烹饪技术，是靠他的创新技能。

史庚福回忆起他的美食生涯，充满着回味，充满着骄傲，但也有一丝遗憾。眼下的烹饪大都是速食了，现成的半成品下锅一颠完事，哪还有那种精心细作、那份静心琢磨？有的是外表的雕琢奢华，而品质的提升往往被忽略了。时代在变化，新菜在推陈，那么传统的名菜谁来继承发展呢？

溧阳美食，代有人出。吃煞源于好吃，好吃源于会吃，作为一个溧阳人，有口福了！

有口福才会幸福。

光阴里的光影

我孤独地坐在一叶扁舟上。

黑暗,在四周弥漫着,弥散着黑暗独有的气息。像布幔罩住了苍穹,像大雨滂沱的深夜。在这漆黑的夜里沉下来,沉住气,沉下心,甚至沉沦住光阴。让整个身躯沉下去,沉陷在轻柔的放松里,只剩两只眼睛,向前探寻着光影。

孤独在黑暗里光临。这不应是一叶扁舟呵!该是坐一千多号人的大船。人头攒拥,一票难求。在枯燥乏味的日子里,多少人渴望登上这条梦之舟,获得点精神的愉悦。人呢?人都到哪里去了?环顾四周,孑然一人。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波涛汹涌。我害怕。

不应该是这样。这是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和梦想的舟船啊!那黑暗里的光影,演绎了多少人世间的悲欢,来来去去,分分合合,我们为之哭,为之笑,为之感动,为之愤怒。这是大众共同的梦呀!人活着,都不要梦了吗?

我是个爱梦的人,可眼前的黑暗,明明要把这梦吞噬了去,令人不寒而栗……

灯亮了。赵师傅说,全场就剩你一个人了!我们要冲洗场子了,明天早上有个会。我讲那我走吧。他说不用不用,你看你的,只要把脚搁上椅子就行了。

水哗哗地就冲了下来。另外的两男一女在用竹丝扫帚打扫着,哗哗唰唰,银幕上的对话已听不清楚。赵师傅是邻居,我来看电影都是“白看”,不买票的。我是影院的常年影评评委,经理们也熟。他们说要看电影来好啦!我总是厚着脸白看。白看也是看,这场子里总是冷得瘆人,来个白看的,也添点人气。

放映员下来了:就一个人看啦?停了!赵师傅说,你放你的,一个人也要放!我们打扫完了就走。

灯又熄了。黑暗重新包裹过来。空气里散发着水门汀的气味,间或有肯德

基的鸡香味,那是影院正门里飘过来的。“禁止吸烟”、“安全门”的灯光在黑暗里机械地亮着,侧门厚厚的布帘遮不住隔壁舞厅的霓虹,五颜六色的光闪烁在湿湿的水门汀上,挤眉弄眼。

大厅里空荡荡的。隔着玻璃墙,肯德基里热闹非凡,时髦的少男少女们啃着舶来的快餐,享受着舶来的快乐。厅里有道门通着隔壁,但只有几个嬉闹的顽童不时推门过来,又追逐过去。

值班的老头有点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看“专场”的怪物。“香格里拉”歌厅、游戏机室、小卖部、服装店、饮食店……时髦的店铺像一个个妖艳的女郎,扑入眼帘,争相献媚。占据影院主体门面的肯德基,窗明几净,灯火灿灿,使人联想到有钱的阔佬。挤到一边的影院分明是迟暮的老女人,冷落得有些凄美。

“看电影?你还去看电影?”每当和人谈到电影,总会听到这种语气的诘问,那瞪大的眼珠里,分明露出发现落伍怪物的神情。

今夜,我有些孤独。下雨了吗?衣衫湿了,可能是水溅的。再一摸,脸颊也湿了。

小城不大,有两家放电影的场所。一家叫“人民电影院”,一家叫“大众影剧院”。院如其名,确是人民大众聚集娱乐的地方。不过小城里人习惯叫它们“电影院”、“戏馆子”。电影院在城中心,专门放电影用的。戏馆子里有戏演戏,无戏亦放映。看戏的地方北方人叫戏院子,这里称戏馆子,像茶馆、饭馆、旅馆一样,都属消遣的去处。那时的拷贝少,电影院和戏馆子放着一样的片子,时间上差了半小时。这边放完一盘,马上由送片员骑脚踏车送片。送片员一路吆喝,车蹬得只见腾灰不见人影。路人一听“跑片”的呼声,自觉地避让开来,因为救场如救火,耽误了人家看电影是大事。后来饭局宴请因分不开身,要两边应酬,把“跑片”一词引用过来,倒也有几分贴切。

记忆中的电影院,是小城的聚焦中心。娱乐生活的单调乏味,使看场电影成了一种大享受。电影票和当时的肉票、豆腐票一样,都是紧俏之物。那时在电影院上班可比眼下的公务员吃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谁不巴结着、阿奉着?电影票也成了职工的福利,每一场一人只摊几张。没熟人想看电影?排长队去吧。那售票窗口像个小门洞,上面还装着铁栅栏,门洞仅供一只手进入,钱送进去,票扔出来,几排几号,听天由命。你肯定连售票员的脸长什么样都没瞧见,就被后

面挤上来的人搯开了。紧俏的票人更挤，有浑身是劲的小伙子爬上人墙，死命地把手伸进铁栅栏里，一只手的门洞卡住了几只手，大家不肯让，票捏到手皮上有几道血口子那是常事。有时年少气盛的楞头青们为买票动起手来，那也是常事。说是打架，只不过推搡几下，边上人一劝亦罢了。城小，一聊一扯，弄不好还是沾亲带故的。

影院前东西两旁有玻璃长窗，里面贴些影讯影评什么的。间或也有书画篆刻作品展出，候场的人们可在那里消磨一段辰光。窗廊下面白天也有租小人书的摊子，租书人提供小凳子让你坐。我们没钱租就在别人后面半蹲着蹭看，有时租书人看得慢了，不识相地喊“翻啊！”大都遭人白眼，或干脆把书一收。也不脸红，换个人蹲下继续看白书。

夜幕降临，人潮水般地涌来。“瓜子，瓜子，五分钱一包！”“茴香豆！茴香豆！”“棒冰，三分一支咧！”小商小贩的吆喝一声接一声，吊着人们的胃口。进电影院是要严格检票的，因为那一指宽的票上分明写着：一人一票，对号入座。席间还有检票员查票，遇有站立者或可疑者，电筒一晃你的脸：把票根拿出来！严厉的语气和态度，不亚于今天上飞机时的安检。散场了，前场的人从边门涌出，后场的人又从正门涌进。潮来潮去的攒拥里，人们像赶潮的鱼儿，在光影的虚幻中享受片刻的欢愉。为光影里的人哭，为故事里的人笑，哭过笑过以后又觉着自己傻。在单调枯燥的日子里，人人都好像傻得可爱，傻得无怨无悔。

那时男女青年谈恋爱，“看电影”可是里程碑式的一步。一对陌生的男女经人介绍，如果肯一起看电影，证明有戏了。应该是男的先进场，女孩等正片前的《新闻简报》放得差不多了，姗姗来迟，一为躲人耳目，一为略显矜持。《新闻简报》多放些“祖国形势一片大好”之类短片，配合宣传教育。第一次看电影，两人互不搭话，正襟危坐之时双目紧盯银幕，生怕前后排有熟人窥见。小城太小，熟人太多。电影未映完，必有一人先撤，要不灯光大亮之时难免尴尬。只有到两人熟了，关系确定下来，始敢趁着幕间的黑暗偷偷拉拉手。或是男娃悄悄塞过一包瓜子去，让女娃边磕边看。电影看过三次，大概可以筹办婚事了。双方要是不合适，哪会看三次电影？买票易哉？

电影院这个红娘，不知成全了多少夫妻。

影院那时没有空调。天寒地冻，踩着雪走进影院，觉着座位窄了。搓手擦脸

之间,光影在白布上演着别人的故事,看着看着,忘记冷了。溽暑酷夏,一只只吊扇从芦苇编织的天花板上垂下来,长长的铁杆连着旋转的叶片,像是悬在空中的大蜻蜓。偶尔有一两只大蜻蜓不转,观众便嚷嚷,服务员赶紧拿来长竹竿去拨弄那叶片,就像乡下的孩子用蛛网粘树上的知了。影院两边墙的窗户是木板做的,可以上下翻转。一到天黑气温下降了,服务员便又用竹竿去捅开那窗户,散散室内的热气。吊扇不知何时也停转了,为了省电。

1964年5月的一天,小城里万人空巷,争去电影院观看热门影片《杨乃武与小白菜》。

我尚年幼,母亲、外婆带着我和几个邻居去看6点多的首场,母亲即将临盆,挺着个大肚子。散场后走到大同巷的青石长巷中,突然轰的一声闷响,地晃了一下,周围窗户玻璃震得直响。过了一会儿,消息传来:不得了!电影院里有人扔炸弹了!死伤了不知多少人!大人们面面相觑,要是晚一场……父亲从乡下急赶回家,他吓得腿都软了,以为一家人从此阴阳两隔!见我们没事,方才长吁一口气。两天后,母亲生下了我的弟弟。这件被称为“全国第二大案”的罕见之事,后来真相大白。公安局一个叫钟勤的科长,为了泄私愤,给对立面制造麻烦,竟把民兵上缴的手榴弹从影院的翻转窗户里扔了进去,当场把一女孩炸死,几人重伤,几十人轻伤。钟勤后来被查出抓获,几年后在小城里开了公判大会,宣判枪决,立即执行。这次又是万人空巷。几十年后我们大杂院里往来一家三口,那女主人据说就是当年炸伤着的女孩,邻居左看右看也没看出点伤情来。看电影看出人命关天的大事,也算小城里人人津津乐道几十年的新鲜事。

“文革”来了。电影院、戏馆子里热闹得开了锅,今天“东方红”宣告成立革命队伍,明天“工农兵”宣誓将红旗插遍全球。有一天“工农兵”在戏馆子里聚会,被以学生为主的“东方红”发现,大街小巷围了个水泄不通,任何人不得出入。“工农兵”代表像困兽一般被围三天三夜,戏馆子对面的小副食店连盐都卖光了。革命的勇士们终于挺不住了,只得宣布自己是“保皇派”,承认对方是“革命派”。“东方红”大获全胜,鞭炮放得小城的青砖黛瓦直摇晃。但没过几天,形势发生了大逆转,以退伍军人为主的“工农兵”掌握了枪杆子,动嘴没本事咱动枪。这下“东方红”傻了眼,除了嚷嚷几声“要文斗不要武斗”之外,赶紧跑到山里“打游击”去了。

我家住戏馆子附近，那真人真事的上演，比电影好看。

电影院前的广场上，砌起了一个大砖塔，塔为长方形，四面都画了毛主席的像。画像的人姓蒋，是个美术老师，他的爱人也是老师，和我母亲是同事。女教师们空下来就喜欢打听蒋老师的事。那时能画这么大主席像的人，可是了不得！蒋夫人也爱说，每次叽叽喳喳地，忽然大伙又哈哈大笑，个个花枝乱颤，大概是说到了什么床第之间的事，我们小孩子听不懂。

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年代，我们已经难得走进影院了。有时学校包场，看样板戏，五分钱一张票，我们高兴得像过节一样。《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我们太熟悉了，上面的每一句戏词每一段唱腔，大家烂熟于心，于是上面一边放，下边齐声唱，电影院来了合唱团。唱了几段，大伙又没心思了，趁着黑躲起了猫猫，东藏西伏，大呼小喊，电影院成了游乐场，老师吼都吼不住。我们班的两个促狭鬼，掏出小鸡鸡撒尿玩，尿沿着水门汀的坡度往下淌，在光阴的照射下像极两条游动的水蛇，两人喊“我的远！”“我的远！”踩到尿的女生嚷了起来，老师来捉人，两个鬼早躲到厕所里去了。

有一部电影我个人以为应该载入史册的，尽管大部分人可能已经忘记了它，那就是朝鲜影片《卖花姑娘》。什么叫人人争看，什么叫街谈巷议，什么叫一票难求，在这轰动一时的影片中表现得前无先例后无来者。先传这部片子是“哭片”，谁要进影院要备三条手绢，后传有人一连看了十八遍！有人打赌，谁要看时不哭，宁输一桌酒水！就这么传来传去，传得神乎其神。电影院前的广场上人挤着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重复一句话：“有票多吗？”远在山区难得进城的农民也闻讯赶来，在影院前的售票处铁栏杆前打上地铺通宵排队，一边唠家常，一边谈论卖花姑娘的传闻。“卖花来哟，卖花来哟，花儿鲜哟花儿香！”当那感伤的歌声一响，大妈大婶、姐姐妹妹们早已哭了个稀里哗啦！老爷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是坐在一个角落里，衣袖擦湿了半截。在看惯了《鲜花盛开的村庄》之类的歌颂片后，一部简简单单的悲情片，攒足了我们的眼泪。

罗马尼亚的影片《多瑙河之波》上映，在小伙子们中间热烈传谈着。有人看了一遍又一遍。这部外国片里，罕见地出现了男女接吻的镜头，冗长乏味的等待后，仅仅为的就是看几秒钟的一瞬。在一个禁欲的年头，这几秒钟已足以使无数青年男女热血沸腾。但没过多久，那几秒钟的镜头还是被剪除了。

我那时最羡慕的人，就是邻居童师傅。他是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能有本事从一个小窗口把光和影投射到银幕上，演绎出千百样的故事，让人笑，让人哭，他是个魔术师。边工作可以边看电影，还有什么工作比这个更让人羡慕的呢？

记得念五年级的时候，同班农村的同学说他们村上放电影，是《地雷战》，我们相约去近郊的乡村去看。乡下的场园上竹竿支起了一块白布，四乡八邻的乡亲赶来了，场园上坐满了人。虽然是部老得掉了牙的片子，但大家的脸上依然流露着过节一样的兴奋。贫乏的娱乐生活，已使人们把看场电影当作精神享受的大餐，人除了填饱肚皮，看来还需要点别的。

日本鬼子开始冲锋了，那猪头小队长用指挥刀一指，喊：“屙屎阿点点！”（冲锋）大家哄笑起来！孩子们拼命学着喊：“屙屎阿点点！”电影放完时，我突然发现城里来的同学走散了。月色皎洁，沿着田埂往城里走，我一个人有点害怕。突然，一阵纷乱的脚步声袭来，我还没明白过来，背上就挨了一小板凳，接着又有人冲上推了我一把：“叫你到老子家村上来白看！”我落荒而逃，像一只丧家之犬。远远看见，同班的同学在远处偷笑，是他们叫村上的细伢打城里人的！明天过来回到班上，那几个农村同学无事人一样，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也没告诉老师，谁让你看了人家的电影？

那个年头，一个村一个村追着看电影的人，不在少数。放映员也会在影片结束时预告，明天在什么村放什么片子。

我看得最多的一部电影，叫《一个护士的故事》。

我陆续看了七遍。不光看，回家后夜不能寐，写吧！写感受，写向往，写满了几本日记本。这是一部朝鲜故事片，讲的是一名女护士在战场上，为保护伤员英勇牺牲的经历。青春的冲动，使我觉着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上战场与敌人拼杀，或为战友牺牲生命！我能记住影片里每一句对白，每一段音乐。夜里躺在黑暗里，满脑子是那电影里的画面。一哼那旋律，浑身就毛孔扩张，激动不已！我还和一名已到部队当了兵的同学通信，通篇谈的，就是这部影片，信厚厚的一摞。有一天，在路上我捡到一小段电影胶片，那上面分明写着“一个护士的故事”。像做梦一样，怎么会那么巧？这胶片上的字是手写的，可能是影片的预告，冥冥中我觉着感动了上天！我把小胶片贴在日记簿前，继续写。

我每看一场电影，都在小本子上记下片名，时间地点，并把票根贴在本子上。

上海大光明、国泰,南京大华、曙光……我把电影当作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了!以至有一次路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拼命往里张望,想象这造梦的工厂里面肯定会有无数的秘密。自己也曾幻想有一天走在马路上,被导演发现,说你正好符合我影片里的一个角色……

光影投到银幕上,在造着人生的梦。人生的梦,浓缩成光影,诉说着过去和未来。影院,在光影里演绎了无数的故事之后,自己也将成为光阴里的故事。光阴似水,人们有了电视,有了电脑,有了卡拉OK,有了4G手机……就不要电影了吗?

电影的辉煌,成了一去不复返的往事。人们总爱追逐那新鲜光亮的时髦,把千人大影院大剧场,当作过时的老古董无情地抛弃。有人说,小城的电影院要不是为了每年一次的“两会”,早就拆掉了。现在国外院线的五星级电影院都进来了,高清晰数字机器,超级震撼音响,真皮座椅,几十人的小厅……你那个大影院留着干吗?放一场进几个人,连电费都收不到!

大影院退出历史舞台,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我依然留恋。在浮华的喧嚣里,已很难找到一个安顿心灵的场所了。我总是在感到孤独的时候,过来陪陪比我更孤独的老朋友。尽管她老了,尽管我也不再年轻。

影院可以拆掉重建,但拆不掉的,是人生中的那段光影。

怀念码头街

有人说,怀旧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当这种思维积淀成一种思念,那必定成为你心中的块垒。

我常常会想起码头街。闲谈中,我发现许多溧阳人提起码头街,就像在提起一位自己熟悉的长辈,提起一位渐行渐远的老者。消失了,没有了。一声叹息,几句感怀,惋惜之余是挥之不去的深深思念。

同济大学著名的古建筑教授阮仪三曾说:“城市是有生命的,老建筑就是城市的记忆。”码头街曾是停泊过我们生命之舟的载体,对生活过的城市而言,我们能忘记她的一街一巷、一门一店、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吗?

—

城门城门几丈高? 三尺六寸高。再高高,没则高;再低低,没则低!
借你(家)城门过一过!

——溧阳儿歌

月牙儿躲进了云里。

一盏昏黄的路灯吊在高高的电线杆上,在风中晃荡。青石板在光晕下泛着亮色,狭长的巷弄里光影在墙上斑驳陆离,石灰在线砖上剥落成岁月的故事。

我们真开心。吃过晚饭,是我们的开心时光。两个同伴用手交叉高举,这就是城门,孩子们围成圈快速通过城门,嘴里念着儿歌。“城门”放下,关住了哪个同伴,他就去扮演“城门”。没有作业,没有电视,没有电玩,没有的东西很多很多,但我们开心。

从记事起,我们生活的城市已经不见城墙了。只有虹桥(支农桥)头有一高岗,据说是城墙土基。唐朝天复三年(903),溧阳县城迁至今址。是因安史之乱的兵燹,还是隶域划分的变故,史志上没有说。时间过去了三十五年,南唐(937—975)邑城有了土城墙,周围仅为四里。南宋建炎年间,城西开辟“青安草市”,城池加宽两里。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明太祖渡过长江,令将士修筑城墙。又过七年,命专使郭景祥用石加固城墙,改四城门为东平、西城、南安、北固,四城门外增筑瓮城。作为江东要冲,京畿重镇,朱元璋的“高筑墙”方略,垒砌成邑城的雉堞,“溧水之阳,崇墉焯焯”。青条石码叠成长九千多尺、高二十七尺、宽十八尺的团城:“仰瞻雉堞,雉堞如陵;俯观河流,河流载清。”

濼水汤汤,长河荡荡。城毁城建,墙圯墙立,草荣草枯,柳绿柳衰,人世几度沧桑。城垣曲曲,濼河弯弯,女墙野花,望楼残月,早成昨日梦境。92岁溧阳籍上海史学家蒋星煜曾在《童年 少年 青年》一文中,回忆童年时的城墙,他随外公上城垣转转轱(散步)、采野花、捉蟋蟀、放鸽子……

陈鸿寿主修的清嘉庆《溧阳县志》上,芜湖汪鸿画的“名胜图”引人入胜。上水关上“清晖门”飞檐高耸,沿河商铺民舍连片,临水吊脚楼栉比,舟行舟泊,双桥如虹,疏林密柳,牌楼迎风。这是否码头街之雏形?清康熙年间,上水关有“太白楼”;同治九年,原址重建“太白酒楼”。“双桥烟水,孤塔夕照,邑人登临,辄神往焉。”那时的“溧阳八景”,该有何种的诗情画意?嘉道间本邑进士潘际云写道:“溧阳三月春风吹,无数杨柳黄金枝;谪仙何时此系马,酒帘入望先成诗。”他虽是借景怀古,时空地点星转月移,但春风依旧,杨柳依旧,酒香依旧,诗情依旧。

我想,南宋的青安市场应是码头街繁衍的肇始,明清应是码头街繁荣的演绎,民国应是码头街繁华的鼎盛。

水流花开,舟来楫往,载不走的是隔世的浮华,载不动的是昨日的乡愁。太白楼上的酒幡依旧在熏风里飘晃,孤塔里的剪影依然在夕阳中沉醉,双桥头的忠义石依然在静听橹声桨歌,倏忽间,物是人非,换了主客!昔日风景,成了老唱片胶木上的刻痕,成了爷爷茶余嘴边的故事。

码头街是一本书,记录着这座小城的荣辱兴衰。

二

牵磨拌磨，米粿筛播；鸡生咯咯（鸡蛋），宝宝要吃；妈妈吃一个，大大（爸爸）吃一个，还有一个，留给外婆。

——溧阳儿歌

溧阳，“踞皖浙屏障，扼京畿咽喉”，通三省物流，聚千家商贾。

三山一水，六分耕地。地产稻麦，山植茶果，水游鱼虾。芹菜板栗、冬笋茶叶、蚕蚕丝茧、生猪禽蛋……老天赐给这块福地一片丰饶。

清末民初，溧阳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光绪三十四年（1908）沪宁铁路通车，给长江三角洲带来了流通的便利。宣统年间，溧阳至无锡的轮船通航，小火轮清脆的汽笛，给千年古城带来一份新鲜，一份惊奇，一份商机。涡轮卷起了濛江水浪，拍打着两岸的泥埂，溅湿了码头上浣衣妇女的纱衫，晃落了捉鱼小划子梢头的竹篙。码头街狭长的青石板上，从此不光有宣城广德纤夫草鞋的水迹，也有了上海苏州老板皮鞋的印痕。

商铺挨家，门店比肩，舟楫泊岸，桅帆林立，汽笛嘶鸣，号声阵起。我想，此时的码头街，才真正称其为码头街。本地的稻米丝茧，郎广山区的竹木薪炭，句容高淳的粮食土产，从码头街上船运出。无锡的盐糖面粉，苏州的绸缎呢绒，上海的金五百货，从码头街输进批发。由于码头街上商业进出利薄实惠，邻县苏皖客商趋之若鹜，货进货出，船来船往，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溧阳一时有“小无锡”之称。

从双桥至西城桥到前后街这一片商业区里，两扁担宽的狭街上行人如鲫，店堂里熙来攘往，京广货店新式的留声机里女人嗲气的歌声传出老远，河边离岸靠岸火轮急促地鸣着汽笛。码头街到乡埠到城市的航班据称每天有七十二只半之多。每年，70万担稻，5000担茧，2000担糖，35000担油，700件棉纱……从码头街进出贸易，商品以稻米绸布为大宗。

繁华，逛逛码头街商业区，你会目不暇接。南北杂货店有汪德隆、义隆润、聚源昌，典当铺通济、泰丰、裕丰。钱庄有瑞和、瑞昌、汇丰，油饼业有振昌、坤大，木

材店郑鼎丰、万瑞福，京货店同泰昌、纶章泰，酱糖店豫成、升昌，药店有黄义兴、松茂祥，米行有万昌、顺昌祥，茶叶店有吴庆泰、正聚丰，纸箔店有三阳泰、同德昌……当然，更有名饭店太和菜馆。京货广货、丝业木业、茶食炒货、油榨酱糟、鞋帽绳席、香作纸箔、茶馆旅馆、豆腐肉铺、面饼饭菜、旅馆浴室……店铺鳞次，行栈密布，作坊铺陈。

光绪三十二年(1906)，溧阳有了第一个商会。

民国四年(1915)，溧阳成立了电报局。同年，振亨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 000 只钨丝灯泡，在众人好奇惊叹的表情中闪光闪亮，代替了世代沿用的油盏风灯。

民国七年，溧阳电话股份公司成立。

民国二十年(1931)，京闽线公路(宁杭公路)修成，全线长仅 171 公里，沿线途径溧阳。

古城在变。时代在变。这些嬗变，与码头街密不可分。没有商埠的繁荣，变化会如此快吗？

码头街是一条船，承载着变迁的重任。

三

日本“太皇”，杀人不眨眼睛；“和平”伪军，专门糟蹋百姓。

——溧阳民谣

鬼子来了。

日本人的飞机真放肆，贴着屋脊俯冲，如入无人之地。“哐当”，那摇着尾巴的炸弹丢了下來，轰隆一声，地崩房摇，码头街一片火海。

母亲回忆说，码头街上有一家人正在围着桌子吃饭，一颗日本人的炸弹穿屋而落，霎那间血肉横飞，人都没影了。“那辰光还小，风前头雨前头，也不晓得怕。跑去看热闹，只见墙上一只手臂床脚一条大腿，哪还见人？只剩了一个丫头，坐在墙角马桶上撒尿，拣了一条命！”

溧阳城遭日军飞机轰炸达 34 次，侵扰 6 次。

日本人要进城了。当时的学生小舅公杨延宝和大舅周镜泉等一批念书人开始了逃亡的路程。小舅公随人流一路逃向后方,没有车,没有船,整整走了一年,才到达了陪都重庆。他一生从此就生活在那里,直到老死。他曾任重庆公交公司工会主席,我出差去看望他,溧阳话一句不会讲了,句句听得懂。说到逃难的经历,那一脸的凄惨痛苦,还在心头挥之不去。

1937年12月1日,溧阳沦陷。由于遭到抵抗,文昌阁、宝塔湾东亭被炮击炸毁。1938年3月19日,溧阳二次沦陷。1940年2月23日,溧阳第三次沦陷。《江南日报》载:“经此三度沦陷,城内市房付诸一炬,瓦砾满地,焦木纵横,断壁危墙,目睹这种情景,不觉惨然泪下。”

一张摄于民国三十五年的黑白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惨状:“西门城内大街从前为著名之五大社,西式房屋高耸入云,银行、钱铺、绸庄、百货满目琳琅,皆比拟为苏州之观前街、上海之四马路。今则瓦砾累累,满目凄凉。”

码头街满目疮痍,房倒屋塌,客散主逃,惨不忍睹。货物劫掠无遗,民生凋敝,商家有的逃去杨巷经商,有的雇船昼避乡间河港,夜入城内摆摊。小商贩则肩挑货担,疲命于安徽河沥溪,以资糊口。

1943年10月18日,日军第四次入侵溧阳城,也是最后一次。据说,鬼子撤退时,拆毁了溧阳的城墙,四城门没有了,城垣雉堞没有了。老溧阳最美的建筑没有了,最美的景致没有了。提到日本鬼子,哪个老溧阳不是咬牙切齿呢?提到汉奸,老溧阳又怎会忘了城门墙头上挂着的那六颗“维持会”人头呢?码头街的青石板上,写满了国恨家仇的往事!

老溧阳蒋星煜在1947年7月8日的《申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叫《还乡》的文章,他写道:“当我回到这个残破的小城,发现一切都和我相当陌生。”“城里尽是荒烟蔓草和废墟,只有那些表彰贞女烈妇的石碑坊还存在着……我却只能以它为唯一的标记,来辨识方向,来想象从前的市街。”“我的旧居早已是一片平地,不知谁在上面种了些南瓜,毕竟瓦砾里没有什么肥料,南瓜的茎叶都瘦得可怜,就像一个先天不足的孩子……”“在许多建筑物毁坏以后,这城市仿佛更加显得寒伧。”最后,蒋星煜动情地写道:“何时,再回故乡来欣赏月色呢?这是很难预卜的,在这动乱的时代。”

码头街,多灾多难的一条街。

四

打更板，客人桥；三块板，搭仙桥；仙人走过凡人桥，凡人桥上一粒
稻，问声老爷饶勿饶？

——溧阳儿歌

母亲说，她是两岁多抱到码头街姑家当女儿的，从此由姓周改姓狄。姑父是胥渚狄家，开炒货店，瓜子生果茴香豆，远近闻名。店在碑亭头巷往西第三家，隔壁是修伞的戴家，往东是剃头的陈家，往西是卖荸荠菱角栗子的汪家。母亲在码头街上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

父亲是无锡人，在码头街三阳泰巷的“协成五洋公司”当店员。父亲到溧阳，颇有喜剧性。他原在无锡学生意，上车行租了一辆自行车，学着踏，这时来了一位好心男人，在后头帮他扶着。钟点到了，父亲去洗手，那男子骑着车一溜烟跑了。那时候的一辆自行车，大抵现下的一辆名牌轿车吧！父亲被歇了生意，只得投奔溧阳“协成”的表姐夫。母亲说，那时“协成”的伙计，都穿西服打领带的，很有派头。父亲也留下许多年轻时西装革履的黑白照，风度翩翩，小开模样。

父母的婚姻，纯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露园巷里租了间房，酒席也摆在那个院子里，一个大门里的人家都来帮忙，都喝喜酒。奶奶从无锡赶来，还有小舅公、舅婆。我缺席那顿喜酒，母亲说“还不知在哪里的粪缸板上剥豆瓣呢”！呵呵。

从我记事，家已安到了露园巷后的大同巷。这里原是孙家大院，是做五金的大户人家。大门进去是天井，花台上种着天竺枝，木窗木门木板壁，花格窗地板房。中间住着胡家戴家，腰门出去原是荷花塘，干涸成了空地。再过去就是任家史家童家，石库房大铁门，出门就是三阳泰巷了，往左是小菜场、小书场、新马路、戏馆子，往右就是露园巷、义隆顺、码头街、渡船口。大同巷大概是取“天下大同”之意吧？往南通小轿巷、灵官堂到护城河码头，小轿巷之名很有趣，旧社会是“花柳巷”之所在，“狭斜”曲巷，流莺浪燕出门，专坐定做的小轿，故得名。灵官堂原有灵官庙，那时有“洋龙”停放，“洋龙”下有轮子可滚，供救火之用，帆布管子通到

水里，壮汉们用力压阀，把水喷出去灭火。那时的“洋龙”队员都是挑选出来的，身大力不亏，属业余之队伍，没有工钱，一有火情，马上出现，压水时声喝如雷，十分威风。记得上码头淘米洗菜经过灵官堂，那“洋龙”摆在屋内，没有门，设木栅栏，估计方便救火，忍不住多看两眼。码头是石阶的，感觉很长，轮船经过，经常打湿衣衫，卷走捣衣妇的棒槌。

那时吃水靠挑水佬，家家置一大水缸，请挑水佬从河里担水，按担付钱。河水入缸，要放明矾，用力一捣，浊泥便沉淀入缸底。到下次挑水，要先出缸渍，再循环放矾。小孩玩水，必遭斥责：“水不要花钱挑啊！”

由露园巷到码头街，路过义隆顺，从大门进去，后院都是大酱缸，喷喷香。往右一拐，就是汪德隆的大门，两月店连着大院，是条近道。偶尔抄条近路，有酱园工呵责：“哪个叫你从这里走咯？”吓得赶紧小跑，后面传来朗朗的笑声。

大同巷往西，碑亭巷中间，是和平街小学。进校门有块空地，后面就是教师的办公室，两旁有两长廊，连着两长排教室。办公室前有两棵粗大的法国梧桐，高大粗壮，华盖如屋。我在这里读了小学、初中。中途随母亲去新庄小学读了几年。后来镇江小京班来招生，对门的小牛喜操京胡，怂恿我去面试，一曲“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沙家浜》选段，唱得镇江的老师连连点头，喜形于色。但后来没有下文，听说有人告状，说我不是和平街小学的，是乡下学生，不够资格。母亲闻讯，一气之下让我转学回了母校，五年级下半年，一来就真当上了样板戏里的“郭建光”，演歌剧、话剧都是“男一号”。“一青松”没当成，成了“一棵葱”！

从穿开裆裤起，我便出入于码头街了。五岁那年，婆婆家对面的戏班之家的小子教我们练功夫，竖蜻蜓上墙，我的腿不直，他用力一压——“咔吧”，小腿断了！我躺在床上静休，腿上打着石膏，每天由爸爸和顺道的戴伯伯用小竹片床，把我从大同巷抬到码头街婆婆家。路过学堂，常有孩童捂鼻跳窜：“不好，传染病，传染病！”我必努力直身辩骂：“你才传染病呢！”

码头街，其实不仅是一条街，她是一条血脉，连接大街小巷的动脉静脉，再到毛细血管，乃至每个细胞，构成了一个古城的有机整体。

从洋桥（新华桥）到双桥（凤凰桥），这千米的河街，商铺靠水，人家枕河，灰瓦高高低低，粉墙错错落落。船靠埠，石阶上就是仓库。居临河，桶落下就能打水，篮放下就能买鱼，下踏步就能洗衣。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水乡生活场景啊！

洋桥，因桥柱西洋式而得名。下有青石长坡，右往码头街，左往西后街。坡很陡，从双桥头面粉厂和木营里煤炭场拉货的板车，车夫都很吃力地上坡，下坡则把车头翘起车尾着地，边下边急促喊“喂嗨，喂嗨，车子！车子！”毛笔店、锡箔店、秤店、药店、豆腐店、煤球店、油条店、水产公司仓库、百货公司仓库……一路商店历历在目。三阳泰头上南货店、汪德隆、篷布店、旅馆、茶馆、老油坊、板桥浜、面粉厂、双桥头、木营里……闭上眼睛码头街一店一面浮现脑海，栩栩如生。

民国营造学社发起人朱启铃说：“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于建筑，建筑于吾人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

码头街于我们最密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苦于斯，乐于斯。

码头街，我们生命长河中的码头。

五

天上星，地下钉，钉铃铛挂油瓶。油瓶头，酱油豆，骨落骨落翻跟头。

——溧阳儿歌

元大德年溧阳州教授仇远，在他的《题溧阳市》中写道：“万家大县旧留都，一派中江入太湖。缩项鱼肥人鲙玉，长腰米贵客量珠。府分南北寒芜合，桥直东西夜市无。却是旗亭浮蚁美，杖头能费几青蚨？”

万户大县，府分南北，桥直东西，肥鱼鲙玉，长腰米贵，酒旗招展。名邑留都，美食美酒，直撩文人情怀。这位宋末元初的钱塘诗人，在溧阳兴泮宫、修学舍、奖士子，做了不少功德。

溧山兮苍苍，濂水兮汤汤。濂水年年冲刷着码头街的石驳木桩，洗濯着搬运工的粗布罗衫，荡涤着墨客们的文心诗怀。岁岁河东去，年年船往来，但码头街老了，旧了，破了，陋了。

胥渚石拱桥拆了，高峨的夏桥炸了，美若虹霓的双桥没了，谁让它们阻挡了夏季的洪水和时代的潮流呢？接下来，开城中河，毁掉了一个美美的大公园。

当公路逐渐替代驳船，当汽车站替代了船码头，码头街像当年小桥巷里倾城

的美人，皱纹爬上了眼角，浊泪代替了秋波，臃肿更换了婀娜，干裂化解了凝脂，岁月的无情撕碎无奈的迟暮，遗弃成了必然的结局。

拆码头街，据说当年的主管部门里的主管们意见并不统一。有主张拆，有主张留。拆者态度鲜明，危房改造整体拆迁，旧貌换新颜！留者若有所思，传统老街，小城记忆，易地建新区！后来，当拆迁决定下来以后，是拆一半还是全拆，拆河一面还是街一边，尚有争议。

1993年，码头街拆迁工程全面铺开。

二十年了，我们在此已无意也无心去追究谁、责备谁。关于码头街的去留，一位当年的老领导讲，话说经过一天一夜也不讲完、道不清。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想说的是，时代造就了码头街，时代拆掉了码头街。

码头街没了，接下来的是谢婆园。

在拆谢婆园的前几天，我约了当时在溧阳报工作的刘建华，两人扎进那熟悉不过的曲巷小院中，拍下了一张张照片。念高中时的同学，大部分住在这里。我小学的班主任黄娟，见我拿了相机来了，以为是拆迁办的，她用近乎哀求的声音说：“能不能不拆？我们在此住了几代人马了，有感情啊！”这是一个十分幽静的院落，高大的香椽树起码长了半个世纪，像一把绿伞撑起了头顶的荫凉。高敞的古色古香的木格窗棂，黑黝黝的木板隔墙都在诉说着往事。进门，一口古井默然无语，石壁的绳痕告诉人们它的年纪。黄老师说，这口井的水是甜的，以后吃不到这样的井水了！她的眼泪开始大滴大滴地滚落。我所能做的只能是让黄老师和她先生站在院子里，合个影存念。昔日的宅居，只能定格在照片上了。翌日，我以最快速度给黄老师送去照片，她紧握我的手，让座。我没应诺，逃也似地出来，因为怕她看到我眼眶里的泪水而更伤心。

记得那天拍完谢婆园出来，在巷子里遇到一名老师带着幼儿园的小朋友参观，孩童们手拉手，天真的眼神好奇地打量着这些石灰剥落的瓦房。那女老师边走边说：“看看这些老房子喔，它们马上要没有了，以后看不到了！”孩子们能听懂老师的话吗？

我记得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城市是历史文化的脆弱记录，是民族尊严的诚实记录。古街旧巷是城市的特色纹理，像灰姑娘一样

美丽,现代人要做的是为她梳洗打扮,通过修复让她光彩重现。”

灰姑娘似乎落伍了。她的美丽,也许只适应保存在泛黄的相片上,而不宜保存在现代都市里。

码头街,湮没在时代的大潮里,永远消失了。

六

正月过了二月八,婆婆带我闯宝塔。长根甘蔗腰里插,黄壳烧饼嘴里嚼。塔上塔下一闯过,忘煞我家在哪筧。

——溧阳儿歌

两位年过八十的老太,蹒跚在车水马龙的新码头街。

这里应是双桥头,这里应是老油坊,这里原是汪德隆,这里该是同泰昌。一路对照,一路感叹。她们寻找的,仅仅是故宅老店吗?

元朝溧阳路总管元淮不仅是位清官,还是位诗人,他的《寒食》写道:“城西烂漫折桐花,珠翠郭郊散绮霞。试问溧阳新燕子,今年寒食有无家?”旧时的春燕,不知今年有无回来筑巢?不知它们飞入了王孙堂前还是百姓人家?码头街没有了,它们还认识来时的路吗?两位老太在嘀咕,老房子拆光了,这水泥楼房燕子上哪里做窠?唉,难怪连燕子都不见了呢!

旅游兴旺。“汪德隆”老家的徽州宏村、西递,成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的周庄、同里,游客蜂拥,人满为患。浙江的乌镇、西塘成了影视基地。高淳、屯溪、溪口的老街,都成了当地旅游的品牌标志,像酒楼门前的幌子,招摇得让人头昏目眩。旅游归来,溧阳人有点不服气:“有什么稀奇的?不就是小桥流水人家吗?老子家码头街不拆,比它好多了!”

有位开药房的沈先生,花费数月,根据回忆画了一幅码头街鸟瞰图,中江横贯,双桥雄峙,商铺列岸,行人如鲫,酒旗迎风,酱园瓮墙,帆立潮头,舟泊驳埠,鸭嬉春水,蛙鸣菜畦。此画为钢笔画,笔触细腻,不是对码头街了如指掌之人,画不出这份感觉。

老画家朱海明,画《古城寻梦图》,码头街为主线,双桥是画眼,上水关耸立濂

水，太白楼巍峨水关。此图立意深远，笔墨淋漓，非对码头街梦牵魂绕之人，哪有如此情愫？

摄影家史剑新，在码头街拆除前，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后来，他出版了摄影集《旧忆溧阳》，里面有许多码头街旧时的原貌，成了历史永久的定格。蒙他不弃，把我拍的谢婆园的几张照片也选入其中，也算一种思念。

码头街是溧阳人肉里的一根刺，时间久了，痛过去了，摸摸没有了，看看不见了，不痛不痒了，但你心里明白：它还在！

记得一次“城市形象设计”的评审会上，南京大学的专家组对溧阳城做出如此评价：“千年古城，历史遗迹荡然无存！”恭列在侧的我闻言目瞪口呆，胆战心惊！是啊，痛惜也好，惋惜也罢，我们的后人，只能从图片上、影像中、史书里去了解老溧阳了。老街旧巷被擎天大楼取代，城市记忆的褶皱被水泥抹平，工业化、雷同化、商业化成了全球化城市发展的通病！

前不久，我坐在小汽艇上，陪市有关领导和几位局长巡视了码头街、城中河、夏桥河、戴埠港桥河。值得庆幸的是，市里规划打造旅游休闲慢城，恢复部分码头街，恢复双桥，开辟晚上夜游，开辟新的旅游项目。这应该是有眼光，有魄力的先见之举，是功德无量的高明之措。后来，市规划局拿来东南大学的设计方案征求意见，我只想说，恢复工作一要有本色，不能追求“洋”！二要有特色，不能抛开老溧阳，去重造个周庄、西塘。三要神似，不要生搬硬套，“形似”老溧阳。四要修旧如旧，坚决不能走拆旧建新的蠢路！

我知道，作为一个平民百姓，讲这些话有点造次狂妄了！但知之不言，乃是罪过！何况是为了码头街的新生呢！

我几次说过想写写码头街，此言一出，马上有人响应，“好事体，去问问我家老头子，他是老码头街！”“去问问某某，他能把从洋桥到双桥的店名一家不错地背出来！”这就是老溧阳的码头街情结吧？百人百味，百人百忆，一百个人能说出一百个码头街来。我要说的是我认识的码头街。

常常在梦里，梦见母校那两棵参天大树。那树对我说：“如何让我遇见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候。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小辰光的玩艺儿

上海九十多岁的“老顽童”贺友直，用连环画的形式创作了《儿时玩耍》54幅作品，回忆了他小时候各种的游戏和玩艺。胡建君先生评论道：“画卷之上，充满快乐童年与‘慢’生活的亲切回忆，正是如今信息时代所缺失与缅怀的一种经历。贺友直先生的系列画作，似乎片时唤回那种渐行渐远的童年记忆与生活方式，把一种平凡的快乐与平淡的美好重新驻扎在我们心间。”

江南人称童年为“小辰光”，即小时候。如今孩子们生活应有尽有，物质的富裕是我们小辰光不可想象的。高科技的电玩、游乐场的刺激、麦当劳肯德基、出国旅游坐飞机……许多家长把自己童年缺失的物欲，想方设法给儿女们补偿回来。但现在的孩子们快乐吗？成堆的作业，升学的压力，班级的名次，课外的培训……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或第三代身上，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我们应该庆幸小辰光岁月的平凡和平淡，贫乏而并不平乏。没有那么多的重压和重任，有的是嬉戏的欢乐和缅怀的甜蜜。

小辰光，有很多梦想。

看了电影《地雷战》，想自己动手做地雷，只是鬼子没有了，去炸谁？隔壁班的女生吗？不值得。

看了电影《地道战》，整夜睡不着，和另一大点的男生商量，成立一个“地道小组”，实施地道挖掘工程。地道出口放在铁匠家的灶膛，铁锅一托就是秘密通道。两人不行，得发展地道成员，一定要保密。两人密谋多时，决定要先画地下路线图，不能瞎挖。但挖土的铁锹哪里来？土往哪里运？挠头，歇搁。

看了《奇袭白虎团》，想当侦察兵，最好会飞墙走壁，会开汽车，会抓俘虏。于

是空下来满嘴的“让美国佬先走!”“阿来! 滴滴……”

看了《智取威虎山》，想滑雪，在雪原上飞驰直奔座山雕老窝！只是本地的雪不争气，不厚，易化，弄张长板凳翻过来，叫人前面用绳拉，人站在上面大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高音还没吼上去，摔了嘴啃地，碰上石头了！

看了《沙家浜》，想学翻跟头，那芦苇荡里的新四军打伪军时，个个都是空心跟头翻到胡司令的院墙里的。可翻来翻去学不会，小时候因“练功”折过腿，罢了！还是让战士们打开院门冲进去吧！然后一手叉腰，一手握枪，双目怒瞪，大喊一声：“同志们，前面就是——沙——家——浜！”

那时的梦想是和电影连在一起的。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年头，能看场电影已是过年一样开心了！可笑吗？不！那是小辰光！

小辰光，游戏简单而热烈，欢快而投入。

偃头蒙：一人脸朝墙，双手蒙眼，一群孩子去躲藏。负责“找人”的孩子嘴里大声数数，喊到“10”便开始行动；躲藏的孩子们边找地方藏身边大声喊：“不准偷看！”一般就在附近拼命找隐蔽之所，那也就顾不得身上衣服弄脏回家挨揍了！找人的找到“偃”的，大声喊“找到了！”被找到的那位换去蒙眼，如此循环。一边是寻找，一边是躲藏，双方都喊“不准赖脸皮”！找到了大声地呼喊，大声地笑叫，开心！那么谁是第一个“找人”者？“去去去”呗！也就是“石头、剪刀、布”，谁输谁去，公平公正。

公兵抓强盗：这是一群人找一个人的游戏，被找的“强盗”要尽量藏好，躲避一群人的“抓捕”！“强盗”被抓后，一般被反剪双手，这叫“捉到强盗连夜押”！

丢手绢：一般是学校组织的游戏，一群人圈坐地上，一个人跑圈偷偷地把手绢丢在某人身后，待那人发觉后赶紧去追丢手绢之人，那人跑掉后可以在空位上坐下，如此循环。那手绢一般折成“小老鼠”样，以不被人发觉为乐，有时也有假丢的假动作，游戏者边唱边拍手，时时警惕身后有无“老鼠”，兴奋至极。

老鹰抓小鸡：前有“老母鸡”张臂护卫，后有一群“小鸡”抱腰尾随，扮老鹰者左穿右突，“鸡群”左躲右闪，嘴喊“老鹰老鹰抓小鸡，抓到一只小公(母)鸡”，被抓者得扮“老鹰”。“老母鸡”得灵活应变，“小鸡群”得随之活络。

造洋房：以女生玩为多，用石灰粉笔在地上画格子，意为洋房，一格格升级，腿落地为输。

捉七子:女生游戏。用一沙袋抛向空中,下有麻将或石子、砖子七粒,用手去捉子后再抓住小袋,有攒把、添油、漏子、罩金等花样,难度各不相同,靠手的灵活程度掌握,以沙袋落地为输。沙袋里一般灌的是米,口粮紧张,以沙代之。

跳皮筋:女生为多,两人绷皮筋,一人跳,也有两人跳。脚踝处为“小一”,小腿弯为“小二”,腰部为“小三”,越往上越难。跳者如“破”了,换人。一般边跳边有儿歌:“刘胡兰,十五岁,参加革命游击队……”

过城门:两人手撑起“一城门”,其余人穿“城”而过,唱:“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尺六寸高。再高高,没则高;再低低,没则低——借你(家)城门过一过”,“城门”突然放下,闸住哪位,扮演城门,循环。

踢毽子:过年杀鸡,瞅准芦花大公鸡,拔屁股上闪光长毛;用公鸡翅膀上骨管,再用细铜钱蒙布把骨管缝上,插上鸡毛,便是毽子了。踢毽子可为单人、双人、多人,分单踢、打跳、花样多种踢法。单踢、打跳是比个数多少,花样有偷、跳、环、骑、夹、蹦、敲等多种,技巧不少,体现人的灵活程度。踢毽子一般在冬天,课余用于暖身。

跳绳子:分单人、多人。多人跳时,两人荡绳,谁跳时绳缠住脚为“破”,换去荡绳。

跳木马:一个人直膝弓背,双手撑膝,跳者双手撑“马”背,双腿分开跳越,如没跳过则去扮“马”。类似体育器械中的“木马”,往往没跳过者推倒“马”,两人滚作一团,大笑。

办人家:女生游戏,用一些物品当家什,学大人做饭、洗衣、带孩子等。男生则多用泥巴做锅碗之类,也叫“过家家”。

翻丝杠:用绳缠住手指头,变化出各种图形,对方接绳要不乱图案,有从内往外翻,有从外往内翻,变幻无穷,颇有乐趣。

打弹子:男生游戏,又叫弹弹子。弹子分光心弹和花心弹,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弹出,比眼力和准力,有一种叫“三枪一八吊”,要连续击中对方弹子三枪,再加最后“一八吊”,即擦边枪,距离不过拇、食指一卡,你就赢了。还有打进洞什么的花式,在地上打,因此一手泥灰,乐此不疲。

跳白果:白果即银杏,要花钱买,5分钱一盅。肥胖的白果不好跳,在火里煨了吃掉。要那种长腰的或瘦小的,等风干后里面的果仁摇后作响,方是“种子选

手”。好的跳果叫“扁豆吃子”，要用棉花包裹捂在火柴盒内养，上面浇菜油（偷偷地），跳起来不会乱滚，方向性很稳。跳白果也是技术活，把白果夹在双脚鞋间，跳时松开让白果滚向对方“埋”的白果，如在你手一卡之内，算赢。如滚出一卡，输。

滚铜板：也叫滚七寸。庄家用一块砖头竖斜，让铜板在上面滚下，你可在边上放铜板，他如接近你的铜板，用手中稻草做的“七寸”一量，范围之内吃掉，范围之外，配给你。或是输赢小钱，或是食物，在学校不敢来，算是“赌博”。

滚铁环：铁环当为箍，考究的有铁匠铺专打的，滚起来在青石板上铮铮作响，十分悦耳。一般的大多是木桶、水桶上换下来的铁箍，最次的是旧马桶箍。用一铁钩推行，滚动街巷，遇有障碍，一把勾住提空，再抛向前方滚推，跑多远也不觉累，怪事！浑身是劲。

抽李逵：用木头车一个头尖的锥体，顶上安一颗钢珠，一般为自行车上的弹子，用绳一抽，自转不息，取名“李逵”，叫“打不死”。那时水泥场地少，多在泥地上抽，有好事者把它往一块抽，叫“斗李逵”。

飏豆腐干：用纸折成“豆腐干”，方型，在地上用力摔，谁把对方的纸豆腐干掀翻了为胜。同样还有香烟壳子。

飘画片：画片是印着故事的连环画了，把它按到墙上，手松，看谁飘得远，算赢。

挑棒棍：用竹签组成一把棒棍，抓住一松，然后用一根去挑，要求是取一根竹棒别的不能动，一动算输，换人。要求细心，耐心。

放鹞子：多在春天，用竹杆或芦杆做骨架，用纸糊上，线要上卖鱼网的地方去买，也有偷母亲扎鞋底、缝衣裤的粗线的。郊外多风，鹞子升空，摇摇摆摆，很有成就感。鹞子，学名叫风筝，不形象，那天上飘放的，不就是纸糊的大鸟吗？要不，你手一松，它就会飞走的！这也是我们的梦。

小辰光，缺玩艺儿，那就自己做。

水箭筒：取竹筒一节，内壁打磨；取竹枝一段，上面包裹破布，塞进竹筒，在筒的一头打小眼，竹枝一拉，吸水，一推，射水，打水仗可是利器。

笔锋冲：取细点竹筒，也是竹枝裹布，把纸搓紧泡水做成“子弹”，或用树上的

濼水钩沉

一种小果子做“子弹”，利用汽缸原理，把布枝塞进细竹筒，一头是“枪筒”，用力一推，“子弹”射出，还带响声，打到脸上有痛感，但不致破皮，实是“开仗”的好武器。

炮子枪：用自行车钢丝弯成枪状，用链条的键扣做枪膛，钢丝用牛皮筋绷紧，有扳机，一扣——钢丝撞击枪膛炮子，会有烟雾和响声，极像真枪！此类为高级玩具，家中条件许可者才能拥有，因为所用炮子，是要花钱买的。

泥枪：到河埂上挖一种叫“乌金烂泥”的材料，质地硬，易成型，干后又不会开裂。摔成砖状，待稍干后画上你心仪的枪型：驳壳枪、勃朗宁、匣子枪，然后裁去多余烂泥，做成一把泥枪，有枪管、扳机、手柄、准星，待完全干后用铅笔蕊涂抹上黑色，然后用放润肤霜的“蛤蜊片片”打磨，一把锃光闪亮的专属武器便可随身携带了。

万花筒：用马粪纸卷筒，一头放三块三角形玻璃，再放些彩色玻璃，一头有小孔观看，一转，彩图变幻莫测，神奇！

小辰光，匆匆已去，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小辰光，游戏玩艺，简陋简易，却乐此不疲，视若珍宝。

记录这些童年的记忆之时，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它们的身影。那放纵的投入，那放肆的开心，也只有在那个年代，那个年龄。

童言无忌，童年无欺。想到成年后的负累，成年后的烦恼，还不如回到过去，永不长大。

回想小辰光，立此存照，让后人去想象吧。

新疆有个溧阳村

——伊犁州尼勒克县溧阳支边人员采访纪实

飞机,是一只凌空翱翔的大鸟,追逐着西沉的落日,一路向西。落霞把西域的天际染得绚丽缤纷,云絮下的雪山在余晖中显得庄严神秘。

向西,向西。我们不远万里,几乎横穿祖国的版图,向那神秘的西部边陲飞去。

我们要去寻找一群人,一群少小离家的老乡,一群几乎被人遗忘的溧阳人,一群支援边疆五十多年的溧阳人!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你的脸儿红又圆呀,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新疆民歌《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一、在半信半疑中,我们决定去探寻

有人说,世界上有一种向往叫遥远,世界上有一种诱惑叫神秘。

新疆,遥远,神秘。对于一个生活在十多万平方公里沿海省份的人来说,166万公里的面积意味着什么?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欧亚人口迁徙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孔道?丝绸古道上悠扬的驼铃和沙漠的扬尘?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伊犁的薰衣草昭苏的汗血宝马?还是巴音布鲁克的十八湾喀拉峻的天山草原?

有人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有多大。

我们相信。而我们听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溧阳村,村上住的都是溧阳人,讲的溧阳话,连周边的少数民族都会讲一口溧阳话,你信吗?

我们半信半疑。他们为什么要去新疆？他们怎么去的新疆？他们为什么要留在新疆？

二、尼勒克的溧阳人都在传话：“窠里来人了！”

深夜的伊宁市，宁静而安详。作为伊犁州的州府所在地，从空中俯视好象并不大。

机场的出租车已没有几辆，我们守着一大堆行李和司机讨价还价，摄像机、三脚架……但当司机说每人十元的价格时，我们愣住了：没听错吧？

伊犁的夜风，吹在身上有丝丝凉意，一扫江南酷暑带来的烦躁。没几分钟，下榻旅舍到了，这才明白过来，机场几乎是建在市里的！凌晨入睡，一大早我们就向 110 公里外的尼勒克县进发。

阳光，对这片广袤的土地格外眷顾。高大挺拔的白杨和田野绿油油的苞谷，享受着日照的延长而欣欣向荣。路边包着纱巾的胖大妈摆着水果摊，西瓜、葡萄、甜瓜、哈密瓜……正是瓜熟上市季节，正是甜蜜的季节。柏油路不宽但平坦，要不是路上优哉游哉的羊群马匹，要不是路人头上的纱巾角帽，我们真会当这里是内地，是江南。

州道的边上有一块指路牌，上写“尼勒克，种蜂站”。溯喀什河而上，穿过天山西段南麓的峡谷，尼勒克起伏的草甸以丰腴的曲线，蜿蜒至雪山脚下。天山是屏障，白云挂蓝天，牛羊散草原，公路伸天边。伊犁东北腹部盆地草原的胜景，令人陶醉。这就是我们溧阳人支边生活的地方？

《天南海北溧阳人》采访组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面对这么特殊的一个群体，面对特殊历史背景下溧阳人所走过的历程，有必要记录报道。虽然他们不是有影响力的名人，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他们这一群人，但是——他们是溧阳人！对于这次的远道采访，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广播电视台的领导十分重视。精心部署、用心策划、细心联络，确保了采访组工作、生活的顺利。我们重任在肩，急切地想见到老乡，了解他们在这万里之外曾经的一切。

尼勒克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邓小亚热情地前来迎接我们。站在奔涌的喀什河边，他用手一指对岸的密林，说：“这是一片次森林，也是古杨树林湿地，绵延 70 多公里，面积 25 万亩，是我们重点打造的旅游景区。”我听后吓一跳——没搞

错吧？一个湿地公园就是 25 万亩？而里面的古杨树动辄上千年几百年的？

尼勒克全县面积 10 053 平方公里，东西长 240 多公里，南北宽约 70 公里，四周高山环绕，较大沟壑 119 条。草场面积 980 万亩，林地 108 万亩，耕地 56.1 万亩，人口才 18.69 万人。对比一下，我倒吸一口冷气。动不动几百公里的长度，上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江苏才多大？溧阳才多大？什么叫地大物博，什么叫地广人稀，数字已说明一切。

我们刚在县城的唐布拉酒店住下，一位个子高高皮肤黑黑的中年男子就寻来了：“你们是溧阳来格勿啦？”一口地道的家乡话一扫陌生的拘谨。握手之间，他说自己叫陈罗伟，是尼勒克武进中学的后勤，父母都是溧阳支边人员，自己是“溧阳二代”。“格（这）几天尼勒克都传开了！说窠里有人要来，大家望你们几天了！”他告诉我们，当年他的父母支边的地点在种蜂场，离县城还有 98 公里，是溧阳人聚集的地方。“现在人散了，种蜂场只剩了几户人家。当年的溧阳人都老了，大多搬到了尼勒克县城，有的去了伊犁，有的回了老家。”

我们决定先去种蜂场，因为那里是溧阳支边青年最早的落脚点。我们拜托陈罗伟，把县城里的“老支青”召集一下，回来时座谈一下。

我问陈罗伟，你溧阳话讲得这么好，自小生活在老家？他答：“勿是哇，家里娘老子阿朝（都）讲溧阳话，勿准讲外头话！当年蜂场上都是溧阳人，学堂（校）里细佬家阿朝讲老家话，连哈萨克人都会讲溧阳话咧！我家老子规矩重，连寻老婆也要寻溧阳人！我老婆也是溧阳人后代，现在学堂里开了爿小店。”

我后来才知道，新疆“支青”，叫老家为“窠里”。窠即窝。溧阳有俗语：金窠银窠，不如家里破窠。春鸟孵雏，倦鸟返林，不是都在窠里？真好！

三、蜂场：传说中的溧阳村

从唐布拉雪山发源的喀什河，滋润着草原，滋养着牧场。蓝天白云，雪山云杉，这里被尼勒克人称为“百里长卷，天然画廊”。

县道盘盘曲曲，起起伏伏，一路向东，美景处处皆是。98 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将近 3 个小时，不是迷恋风景，而是弯道太多。

过一座几近直角的桥梁，一个小镇就在眼前。“伊斯兰饭店”的招牌很是醒目，小铺前新出炉的馕饼金黄喷香。回族人摆着烤肉串的摊头，哈族大妈卖着西

瓜葡萄。汽车站、手机店、汽修铺……店招全是哈萨克文，下面是汉字。

午后，小镇很静，时光好像停滞了。越过盆地的麦田，博罗科努山屹立在阳光的照耀里，阿布热勒山与小镇隔河相望。只有穿镇而过的喀什河，奔涌着翻腾着向西流去。

这就是传说中的溧阳村？

满眼的少数民族，哪有溧阳人呢？我倒感到这边塞小镇有点像美国西部片的场景，冷不防会冲出一群牛仔来，骑着马大喊着呼啸而过。

种蜂场场长周虎是位戴眼镜的白面书生，他是南通人的后代，也是“老乡”。他带领我们先参观蜂场。

种蜂场原来没有地名，没有居民，只有哈萨克族游牧民。几位从俄罗斯来的放蜂人，带来了高加索黑蜂来到天山采蜜，于是这里成了全疆最大的养蜂基地，天山黑蜂也成了中国四大蜂种之一。

“蜂场原来荒无人烟，是你们溧阳人来了，才有了房子，有了村，有了今天的镇。”周虎说。

我急问：“那我们溧阳人呢？怎么不见他们呢？”周虎答：“留在蜂场的不多了！明天吧，约他们明天见面。”

种蜂场纪检副书记张忠凤是甘肃移民的后代，她老公老潘也是甘肃人，一口溧阳话顺溜地道：“我明早帮你们把他们都接过来！”张忠凤说：“我们从小跟溧阳人生活在一起！蜂场是溧阳人用砍土钯一锄一锄挖出来的！”话说得一字一顿，很有分量！

四、“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在秋天的阳光下，那曾经的一张张苹果脸，已是沟壑纵横

阳光，肆意地倾洒在小院里。鲜艳的大雁花摇曳着缤纷的蕾瓣，怒放着生命的灿烂。

这是孙孝庚、周林凤夫妇大儿子的院落。一群老人散坐在阳光里，唠着家常，直来直去的大嗓门，地地道道的溧阳话，让人错觉这是在南渡或横涧的某一家农户，某一家亲戚。

因为家乡话，我们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熟悉了。握着他们的手，我明显感到一

种粗砺厚实,这是长期劳作留下的印记。望着他们的脸,岁月镌刻下的沧桑沟壑纵横,仿佛喀什河冲刷过唐布拉的草甸。

1959年9月,533名溧阳支边青年来到了蜂场,来到了焦煤厂。如今这里留下了11位老人,其中四对夫妇,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

孙孝庚,男,78岁,南渡桥南人。周林凤,女,74岁,歌岐后村人。许沪生,男,77岁,城南十土地庙村人。吴勤芳,女,74岁,南渡朱淤村人。柏锁坤,男,81岁,新昌山南人。丁小妹,女,77岁,江苏海安人(柏妻,结婚后支边)。蒋洪妹,女,78岁,戴埠夏阳岸头人。杨生岳,90岁,戴埠夏阳岸头人。赵伢,74岁,城南湾里村人。邹琴芳,77岁,马垫赵村人。石全英,73岁,南渡庆丰人。

我拉着他们的手,叫“叔叔”、“阿姨”。问起当年支边的情况,他们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滔滔不绝。摄像机、照相机忙个不停,我记录的手也不敢停,生怕漏掉一个生动的细节。匆匆五十四年过去了,回首往事,他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有每个人不同的际遇,只有一点是相同的:乡情未变,乡音未改!

周林凤家的墙上有一镜框,中间是她年轻时的一张黑白照片:齐耳短发,大大的眼睛,雪白肌肤,棱角分明的五官。就是放在今天,这也绝对是位美女!“老咧!五十几年一眨眼就过去了。黄土埋到颈梗喽。”满头白发的她笑了笑,轻声地淡淡说了一句。

岁月就在这儿轻轻地淡淡地溜走了。曾经的花容月貌,曾经的花样年华,都在这远离家乡万里之外的边疆,盛开,绽放,收获,凋零。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鲜?那根植于天山黑土地上的大雁花,开了一茬又一茬。为什么要叫大雁花?她是在大雁南飞之时盛开吗?

五、一本笔记本,工整地记录着533个名字,记录着他们生命的信息

尼勒克溧阳支边人员座谈会,是在县文化中心二楼大厅召开的。陆续来的人不少,有的拄着拐杖,有的相互搀扶。陈罗伟说,还有好多人没通知到。

周林伢、姜荷琴、姜秀珍、狄万青、史福林、朱亚兰、潘再松、周挺荣、蒋火金、盛梅珍、孔祥法……当我一一登记座谈20多人名单时,85岁的史福林打断了我:“不用记了,我那里都有。533个人,250名男的,283名女的!”我吃了一惊,

时过五十多年了,还有这样的细心人?后来,我们在他家里看到了这本笔记本,姓名、年龄、地址、电话、生卒……工工整整,一丝不苟。

73岁的戴埠人姜秀珍讲,要讲起支边的生活,话太多了,这个大厅也装不下。

回到溧阳,我们又赴戴埠采访了78岁的蒋洪珍和77岁的姚桂英;在龙泉山庄潘荷仙家,这位热心的支边大姐又约来了赵云春、周寅金、潘同梅、蒋海荣等十二位“蜂场”老人,他们已叶落归根,回家乡安度晚年。

掀开历史的一页,我忽然感到夜不能寐,心事重重,眼前晃动着那一张张年轻又苍老、陌生而熟悉的脸,那一句句或轻或重的家乡话重重地叩击着心扉。

面对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我愿意做一个不合格的记录员。

“送郎送到屋角东,三塘韭菜四塘葱。宁割韭菜根不断,莫摘胡葱两头空。”

——溧阳民歌《送情郎》

一、“支援边疆”,一个喇叭筒里高喊的名词,新鲜而又滚烫

公元1959年。

纸质的圆盆在磁铁和线圈的振动下,会发出声音,这就是“喇叭筒”。

在“社员是朵向阳花”的歌声里,在“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喇叭筒里忽然又频繁地高呼:“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支援边疆,全家光荣!”喊得青年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县上的“精神”传达到公社,公社传达到大队,选派身体好、成分好、表现好的有志青年赴新疆,支援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自愿报名,统一选送,层层发动,对方接人。

马垫乡黄泥桥头的周寅金(71岁)说:“我去新疆是父亲叫我去的!我们家是烈属,父亲是老积极,和发动支边的许县长又是熟人,他叫我报的名。母亲舍不得,说去那么远的地方可能回不来了。父亲骂她说,我哥哥为保卫国家去抗美援朝都牺牲了,细伢去支边怕的点格(什么)!走的那年,我17岁,我们马垫乡一

共去了70多人。”

城西公社棠下人周林伢(73岁)说：“我家里兄弟姊妹多，我是老大。三年困难时期肚子吃不饱，喇叭筒里号召支边，我动了心。到新疆去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嘛！去大队里报名，我叔叔是大队书记，他懂得，讲：‘丫头，新疆远得嘞，你去了不容易家来了！’听说丫头家去了好进纺织厂，我在村上又逗(约)了两个小姐妹偷偷报了名，家里娘老子阿朝(都)不晓得。我听说新疆冷，回家拿冬天的棉衣，大人不肯拨(给)！第二天到县里要走咧，娘老子追到城里送来了絮(棉)裤、绑身(棉袄)。我娘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丫头丫头哭半天！哪家大人舍得呢？”

马垫乡钟村的姚桂英(77岁)讲：“我那年18岁，结婚早，已有个女儿了。我上大队报了名，老公没被批准支边。他家叔叔上大队去讲，你们这不是要拆散夫妻嘛！于是才批了两个人。那时细佬(小孩)不准带，女儿剩在家里给婆婆带，长到18岁才去了新疆。后来我俩又生了5个娃娃。”

南渡镇朱淤村的吴勤芳(74岁)说：“我那年15岁，还在念初中，我是偷着去报的名。临走前，我去和奶奶告别，奶奶是个瞎子，她摸着我的脸问，新疆在哪里啦？我讲坐车子还要多少天的。奶奶说，那不是到了天边？她从怀里摸出一块银洋钱，放到我的手里，讲：丫头，你去那么远恐怕见不到我了！到了天边，要是想我，就摸摸这块银洋钱吧。它是我娘家的陪嫁，今朝传给你啦！”

孙孝庚说：“我参加过抗美援朝，后又参加了福建前线炮击金门的战斗，荣立过集体二等功。复员回到家乡，可以安排工作的，但一听说支援边疆，应该带个头啊！立马就报了名。走后三天，单位通知上班的信就到了家。”

周林凤说：“歌岐村上一共来了3个人，周建英、周尧安和我。娘老子不准来，我到城里报到时头发发热发烧，娘恳求我留下来，但带队的说路上有医生照顾，没关系的。我还是犟着走了。走后没几天，学校代课老师的通知书就到了家，命运却彻底地变了。”

城南乡王家村人史福林(85岁)分析道：“溧阳1959年出来支边的年轻人，大多没出过远门，不会讲普通话，文化程度大多高小，初中不多，文盲也有。算我念书最多，只上了一年高一。”

新疆，到底有多远？支边，到底支什么？

二、屯田垦边，新疆一个传统的话题

新疆地广人稀，物产丰盛，又与多国交界，历史上就有迁徙人口、屯田垦边之传统。

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后，由政府出面招募农民从事大规模垦殖，历史上被称为“屯田”。因戍兴屯，后来成为历朝各代效仿的措施。唐代屯田十分兴盛，发展至元明衰退，到清代又再度兴起，分兵屯、民屯、犯屯三种，巩固了边防，也促进了新疆农业的发展。

新疆屯垦史漫长达 2000 余年，被称为“千古之策”，屯垦兴，边疆宁，西域兴，乃历史的结论。

1949 年，王震率大军进疆，新疆和平解放。1950 年，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戍边战士开荒种地，养牛养羊，生产自给。1954 年 10 月，驻新疆解放军 17.5 万人就地集体转业，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铸剑为犁，沿用部队番号及编制，开始了屯垦戍边的使命。五年间，建设兵团开垦了 562 万亩耕地，但人员的紧缺，严重制约了生产的发展。

1955 年，从全国几个人口大省—河南、四川、江苏、山东调集青壮年劳动力援疆。

1959 年，溧阳两批支边援疆青壮年奔赴新疆，第一批 300 多人以溧城镇人员为主，到乌鲁木齐“油运师”工作；第二批 500 多人来自全县各乡镇，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焦煤厂工作。

与新疆建设兵团招人不同的是，1959 年这批是招工！丢掉锄头拿榔头，脱了草鞋穿皮鞋，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不能不让人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憧憬！

其实，溧阳赴新疆支边人员还不止这些，投亲靠友的，自找出路的，库尔勒，阿勒泰，马勒斯，石河子……我们聚焦的尼勒克，只不过是人数最多的一批而已。

三、“我们新疆好地方，风吹草低见牛羊。葡萄瓜果甜又甜，煤铁金银遍地藏。”

被选中支边的青壮年，也许是当年最光荣的人了。

柏锁坤讲：“我们胸戴大红花，大队里请吃了欢送饭，又到县上开欢送会。我

虽然结了婚,把老嬷(婆)也带上支边了。光荣啊!”

袁锁保,前马神塘圩周家村人,1925年出生,1942年就参加了家门口的新四军,成了陈毅警卫团的“红小鬼”。这位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的“老革命”,转业到竹簧桥芳山煤矿当了矿长。听到新疆又需要支边了,他跑到报名处大喊一声:“哪里热(日)头不晒衣,哪里黄土不葬人!”矿长不当了,带着老婆支援边疆!村上有几个人还在犹豫,见袁锁保报了名,就嘀咕:人家锁保是战场上下来的,见过大世面。他都报名了,还疑三惑四做点?于是周阿金等两对夫妻也报了名。

庄锡清是戴埠缝纫厂厂长,厂里有40多个工人,听到边疆需要人手,和妻子蒋洪珍报了名,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留给了哥哥。那年戴埠街上去了十多人,全镇去了五、六十人。

位于东门的小会堂是县政府所在地。1959年8月22日,欢送支援新疆溧阳人员的大会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中进行。副县长许辅钧大声地宣布:“溧阳的支边青壮年们,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你们响应中央号召,支援边疆,建设新疆,一人支边,全家光荣!希望你们不要忘了亲人的嘱托,不要忘记祖国的重任,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来新疆看望大家的!”会场群情沸腾,锣鼓声、口号声震耳欲聋。

“支青”代表发言:“祖国的召唤,就是我们的使命!告别家乡溧阳,到新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把边疆建设成乐园,创造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请祖国人民放心!请家乡人民放心!”掌声,像濠江的春潮,呼啸奔涌。

支边人员也是按部队建制的,溧阳五百多人编为“营”,营长是团县委工作的严荣义,扬中人,副营长叫吕小全,南渡供销社工作。营下面设连、排、班,每位“支青”除胸前佩戴的大红花外,还有一条飘带,上写“支边青壮年”。凡有一官半职的,另有臂章,上面写“连长”、“排长”之类。

到溧阳来接“支青”的新疆带队人员叫刘恭喜,他是最忙的人,他几乎每天要重复无数遍地回答提问:“新疆好吗?”“新疆远吗?”“我们去了干什么?”“去了能回来吗?”“有米饭吃吗?”

刘恭喜的标准答案大致是:1. 新疆是个好地方。“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

牛,走路苹果碰头,睡觉葡萄掉落嘴里头。”2. 女性去新疆可进纺织厂,男孩去机械厂,年纪小的还可继续读书。3. 支边人员一般3—5年可轮调一次。4. 溧阳“支青”这次去的是炼焦厂,当工人,不是种地。5. 新疆的大米比内地的好吃!

戴埠镇73岁姜秀珍说:“刘恭喜说进的是焦厂,没说是焦煤厂,大家听了以为是胶厂,做橡胶鞋子的厂。我那时19岁,心想去新疆三五年,回家去嫁个老倌(公)年纪正好。于是就来了。”

出发前,溧阳县人民政府给每个“支边”青年发了标准装备:一件棉衣,一条棉裤,一双棉鞋,一件蓝色大衣,一袋炒米,一点饼干。哦,还有一条棉被,重2.5斤。

那夜,濼江在不远处静静流着。大多数人都睡不着。出远门了,结了婚的母亲想儿女,没结婚的青年想爷娘,不知何时才能返回故乡?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新疆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一、1959年8月23日至9月14日,从溧阳到蜂场

由常州发往新疆的列车,是由闷罐车改装的。上下两层,中间架了一层木板。

火车开得很慢,站站停停。到南京渡长江,还要开到船上摆渡,人坐火车上,火车坐船上,这对许多第一次坐火车的人来说,非常新鲜。

每到饭餐,叫叫(哨子)一吹,大家下车到站台上吃饭,打开水。孙孝庚说:“我们和金坛人一车走的。有一次为抢开水,还和他们干了一仗,那时年少气盛,火星冒躁的!”

闷罐车里没厕所,放了一只粪桶,男人家还好说,女人怎么办?

城南的潘同梅(72岁)说:“我身上拢共带了2块半钱,到常州买只茶缸,花了2元钱,路上要吃水啊!火车上只有粪桶。我睡在下面的,车厢一晃,上面的粪溅到我的被头上、炒米上,奈点盖啊吃啊!丫头家没办法,火车靠站钻在车厢

底下去撒尿，也顾不上羞了！”

火车上摇晃了五天，过甘肃，到新疆尾亚。这是哈密前两站的小站，铁路到此为止。全体人员下车，住进了临时帐篷。下车一看，全是戈壁沙漠，荒凉一片，不见“麦子金黄稻花香”，大家慌了。刘恭喜安慰大家，这是临时停车，目的地远着呢！

77岁的蒋海荣，蒋店钱家圩人，他说：“我们在尾亚等候汽车来接，但没水喝了！一小杯水要2毛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因为这水是从兰州拉来的。”

卡车终于来了，上面没有篷布，敞着。在荒凉颠簸中走到哈密，车队遇到了沙尘暴，伸手不见五指，灰沙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江南人哪见过这阵势？休息两天，他们继续向乌鲁木齐进发。一个星期后，“支青”们抵达了自治区的首府。

“那时新疆到处要人，看到我们都抢的。溧阳有人懂得，说乌鲁木齐是新疆最大的城市，于是前马乡来的十几个人就提前下了车，留下了六个人没下。”

“每到一地，总有人来拉人。我们的卡车总是停在偏僻的地方，我们胆小，不敢瞎跑。刘恭喜总是讲，前面还要好！于是一站站走下来，总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感觉！”

从乌鲁木齐到马纳斯，从马纳斯到金河，又从金河到伊犁。“一路上都有接待站，拉着标语横幅，扎着松柏门楼，欢迎我们。吃的馒头、饅饼，第一次喝小米粥，还以为是鱼籽呢！问刘恭喜何时吃米饭，他总说，前面有！”姚桂英、吉香清（78岁）说。

在伊犁的“军人俱乐部”大院休整了三天，车队继续出发，经一天到达尼勒克县城。

“那时的尼勒克小得很！几间土房，几条土路，哪像个县城！”周挺荣讲。

旅程并没有停止。汽车又在牛羊踏出的土路上摇摆了一天，目的地——尼勒克焦煤厂到了。

一路风尘，一路奔波，他们一路整整走了21天。

二、荒凉一片的蜂场，空无一房的焦煤厂。溧阳“支青”们哭了，许副县长也哭了

尼勒克，蒙语的意思是“新生儿”、“新希望”。

昔日,乌孙、匈奴、突厥、蒙古、哈萨克的游牧民的马蹄,踏过了这片肥沃的草场。今天,24个少数民族仍然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

天山,蕴藏着丰富的矿脉。也许是为了全国上下大炼钢铁的需要,蜂场成立了焦煤厂,开始是以少数民族工人为主,但劳动力不够,决定从内地人口的稠密地区招工。

当533位溧阳“支青”拎着被头铺盖下了卡车,他们惊呆了:不见一房,一片荒凉,条件比想象中的艰苦百倍!“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只不过是缥缈的梦想!他们一下子全懵了。

“雪山比天还高,灰灰草比人还高。山沟草地到处可见黑熊、狐狸、狼还有天山梅花鹿。”

关键是没有房子住。这么多男男女女,多家夫妻住哪里?焦煤厂连办公的房子都没有,暂放在当年高加索人放蜂的木屋里。

这是一片用黑土和卵石夯实的泥墙,里面铺点麦草,就是宿舍了。几对夫妻睡中间,用带来的箱子一放就算是一家房间,两头睡没有结婚的人,一头男,一头女。

“不少丫头、伢家哭开了!感觉受骗了,吵着要回家!大哭小喊的,毕竟才十几岁的人嘛!在路上是躲着偷偷哭,到了蜂场是伤心伤肺放声哭!想家的哇!可回得去吗?家在万里之外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不少人想走,想跑!那时候连逃的路都没有,你不识路。大家的情绪很激动,刘恭喜说,你们进疆容易出疆难啰!”

“那时讲是讲支边,其实是移民。连剃头佬、裁缝、打铁佬都配好了,而且基本是一男一女搭配好的,生怕伢家寻不到老嬷(婆)。以前这里基本上都是居住的少数民族,规定不准通婚!他刘恭喜去招工,不讲得花好稻好样样好,溧阳人肯来吗!”史福林如是说。

“大通铺实在不像话,夫妻间夜里做点事,大家都听得见。一翻身箱子轰隆一倒,两家并一家了。那时天冷,早起起来门推不开,雪把门埋了,要几个人用力推,挤出一个去把雪扒了才能开门!”潘同梅讲。

“后来就挖地窝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上面一个屋顶盖上土,下面住两户人家。刚开始不习惯,溧阳人练了不少头功,进门出门撞头啊!里面也没厕

所,露天拉。”史福林说。

地窝子,几乎成了那个时代居住的代表物。

副县长许辅钧没有食言,1959年底,他带着慰问团来到焦煤厂看望溧阳支边青年。看到家乡的领导不远万里来了,大家像见到了亲人,都痛哭开了!看到这么艰苦的条件,看到还都是孩子的“支青”,这位山东汉子也哭了,大家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抱怨,都迸发出来。

当天夜里,慰问团在厂部前的场上演出了地方戏锡剧《双推磨》和《梁山伯和祝英台》片断,悠扬动听的声调旋律,打动了每一位溧阳人的心!

姜秀珍说:“我们围住了许县长,要他带我们家去!这里实在是太苦了,我们还都是细佬家呀!”

潘同梅说:“我们来时个头小,人饥瘦,还没发育呢!哪里挑得动煤?我们宿舍里住的是八位年纪小的丫头家,我就动员大家,过一会儿大家手拉手,拦住许县长的车子不要让他走!许县长看到我,摸摸我的头,说你这么小就来支边了!眼泪扑落落滚了下来……”

有人说,许副县长吓得当天夜里就逃走了。

其实不然。许副县长是连夜走了,但他马不停蹄赶到尼勒克,又赶到伊犁州,向两级政府反映了溧阳支边人员的实际困难,要求部分人员重新安置。然后又带着县、州上的领导回到焦煤厂,宣布凡20岁以下没谈对象的娃娃可重新安排工作。

“我们三十多个娃娃被带到尼勒克和伊宁市,到商业局报到。有的进了邮电局,有的到了照相馆、理发店、饭店旅馆。我去了尼勒克百货公司,一直做到退休。许县长,好人哪!”潘同梅的眼里泛着泪花。

“遥望天空飘来的白云,流连忘返生我养我的地方,雄鹰啊高高飞翔遍地牛羊,姑娘日夜把歌唱。剪不断的情啊割不断的缘啊,漂泊的人忘不了你的爱……”

——新疆民歌《故乡》

一、青春和热血，献给第二故乡这片黑土地

在阿布热勒山和博罗科努山中间这片高原盆地，平均海拔在两千米以上。

最早来这里的“支青”是淮阴人，早溧阳人一个月，被分到蜂场放蜂采蜜。同一辆火车来的金坛人，被分配到邻县的新源钢铁厂，条件要好些。

焦煤厂共有两千多人，分采煤、炼焦、基建、动力等车间。“那时每月工资 33 元，发 15 斤面粉，好坏总算吃上了供应粮。”

史福林回忆道。

“记得来的时候落大雪。焦煤厂要挖煤，下坑道挑上来，一步步的台阶，在家里从没做过活，哪里挑得动！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周林凤回忆。

“细佬家(小孩)赖被窝，刘恭喜一进门一把雪撒在脸上，起来！上班！”姜秀珍说。

蒋洪珍回忆：“天太冷了。老头子庄锡清来后，当了基建队长，负责盖房子。我去炼了两个月焦，戴了厚厚的手套，手冻麻了，要火烧到手指头才有感觉。”

稚嫩的肩膀担上生产的重担，磨去了层层细皮嫩肉。天山的冰雪，冻住了满脸的稚气，凝结了成熟。

张忠凤说：“你们溧阳女人挑担可真有本事！上坑道矿井挑煤，上土窝子顶上盖土，那么陡，都能挑上去！”

周林凤讲：“我娘在我支边后的第二年就来看过我。来一趟不易哉！从尼勒克到蜂场没有路，也没有车，要搭矿上拉石头的便车。娘走的辰光一直抹眼泪，讲我吃么吃的黑馒头，住么住的坟塚头(地窝子)。”

“那时交通十分不便。有时到县上开会，骑马要一天，坐爬犁子也要一天。路不好走，爬犁子一翻，大家灰头土脸的。”孙孝庚说。

1959 年 11 月，溧阳“支青”有 12 人光荣参军，后来在伊犁等地分配当了警察。

1962 年，“大炼钢铁”熄火下马，焦煤厂也关门了，人员开始精简疏散。留在蜂场的开始开荒种地，另一部分人去了“火箭公社”，还有人去养蜂，去了军马场。

唐布拉，蒙语里面是“玉玺”的意思。尼勒克产五彩的岫玉，唐布拉又是草丰水甜的牧场。昔时据说哈萨克牧民进唐布拉放牧，都要在牲畜身上盖上自家的

印记,于是有了“唐布拉”之名。

溧阳“支青”进唐布拉阿斯郎沟里拉木头,回来支坑道、做蜂箱、盖房子。冬天喀什河上结了冰,用马拉爬犁运木头,一人一天发一块馕饼,权当口粮。

修唐布拉公路,晚上不能回蜂场,睡在山沟里,一棵大云杉下面睡四户人家。那时的杉树又粗又大,树枝密不透风,下雨落雪都淋不着。地下铺盖一铺,四对夫妻安然入睡。

1966年,焦煤厂和蜂场合并,不吃商品粮,自己种地产粮,自给自足。

新疆到处是荒地,砍掉野草,下面就是肥沃的黑土地。那时锄地的工具“砍土镩”,与江南的钉耙、锄头不同,头上是圆弧形的,现今已很少见了。“我家还有一把!”柏锁坤说。我们采访组赶到他家,拍下了他肩扛砍土镩的镜头。

地翻过来,麦种下去,转眼就是个丰收年。原始的草甸子改成了麦田,溧阳的支青们用砍土镩一锄一锄地改写着蜂场的历史。

“收麦子。为了奖励割得快的人,前面放了两个馒头,谁先割完馒头归谁。结果为了赶进度,割得快的人越割越窄,规定每人二米宽的距离,剩下的人最倒霉。南渡人孙茂源,原来是个裁缝,没干过农活,割得慢,天黑了大家都吃过饭了还没见他回来。跑去田里一看,他的麦子足有四米多宽,大家帮忙才割完收工。”蒋海荣叙述道。

“后来割麦子改用长柄的打镰打,这样快。男人在前面打,女人在后面捆,一天要收六亩田的麦子。现在想想:当时这六亩田怎么捆过来的?”周林凤说。

麦子收上来堆在土场上,那时没有水泥场,就在土场上铺开让马牵着碌轴石滚压。9月收割,冬天滚麦,扬一扬后就轧粉吃,里面有不少的黑土扬不干净,于是馒头都是“黑馒头”!

“有一次麦堆失火了,原因一直没查到。烧焦的麦粒舍不得丢掉,做出馒头也是黑色的。”蒋海荣说。

周挺荣回忆说:“1962年我们焦煤厂有一批人约四五十个,下放到火箭公社,也就是现在的乌拉斯台乡。那里几乎全是少数民族,‘支青’变成了‘知青’,住的还是地窝子,开荒种地拉木头,吃顿蒿本(洋芹菜)包馒头算是开荤了。当年是吕小全带的队,口粮一个月12斤大麦,太苦了。不少人只能自谋生路,吕小全也跑回老家了。1971年焦煤厂重新上马,我们又回去了。但没几年又关门了,

溧阳来的人有的去了伊犁,有的去了尼勒克,我和老婆去了前进牧场。散掉了!但只要溧阳人有什么事,大家又会聚到一起。”

二、爱情,是那原野上的鸢尾花儿,一到春天就会绽放

唐布拉的春天,比江南晚一些。草原上的花儿经春风一吹,开得格外鲜艳。

溧阳支边青年赴新疆前就考虑到婚姻问题,基本上是一男一女搭配好。“我来时已经30岁了,老婆朱亚兰已经怀孕,她是1962年来的。溧阳来的小青年,上边让自由恋爱,自由结合,而基本是‘自产自销’,生活习惯都一样的嘛!”史福林讲。

“我到大队里去报名,说丫头家不能一个人去,要配对去的!我讲到哪里寻啥?正好大队上有个光棍叫潘福保的,父母双亡,弄不到老婆。大队干部就和他讲,去支边吧,帮你寻个老婆!后来到了蜂场,潘福保常对我说,你不好寻别人家啰!讲话要算数!我才不要他呢,没文化,只会背背煤!哈哈……”潘同梅讲。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家的“组织组合”不行,但生活中的“自由组合”却促成了一个家庭。

孙孝庚回忆:“我在部队上是搞修理的,到了焦煤厂也搞机械。我家祖传是打铁,我来后也打过,后来开拖拉机,带了不少徒弟。我和周林凤谈恋爱时,我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分子,说我们在煤洞开黑会!真是冤枉。周林凤没嫌弃我,天天给我送饭。有一天,我把被头床帐送给她,想摸电门死了算了!她说,你还年轻,那些整你的人到头来还不如你呢!我咬牙挺了过来,后来两人结了婚。”

也许是远离家乡的一份乡情,也许是艰难困苦的一种亲情,也许是寂寞无助的一丝温情,也许是男欢女爱的一时柔情,一对对溧阳青年男女走到了一起。没有电影院的窃窃私语,没有霓虹灯下的牵手拥吻,没有嘘嘴媒婆的天花乱坠,没有三姑六婆的穿针引线,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发苍苍,回首往事,当年是怎么相爱的?我问了好几对溧阳夫妻,他们竟然一脸茫然。是黑黑坑道里的一把提扶?是肚子咕咕叫时的一块饅饼?是喀什河边的一次相约?是乔尔玛拉木头时一次巧遇?“大家都是溧阳人,天天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就这样到了一起。”我有点失望。爱情,竟然可以这么的简单。

草原上的细颈鸢尾花开了,还有无数的无名小花。只要有阳光雨露,只要有春风沐浴,花儿就会开放。不要复杂,不要理由。

“我们都没有结婚证。你要结婚,打个报告,厂长在上面签个‘同意’,厂办盖个章,就算是手续了!”

“我们把两床被头并成一床,就算是结婚了。”

结婚,也可以这么简单。

“新源钢厂的金坛佬男人多,女人少,结果把我们焦煤厂调了一批妹妹家过去!岂有此理!”史福林回忆起当年往事,至今愤愤不平。

三、荒原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

尼勒克焦煤厂1962年下马,1971年又上马,到1976年又下马,工人们被重新分配到铜矿、水泥厂、面粉厂、原煤厂等地。

1966年,焦煤厂和蜂场合并,不吃商品粮,开荒种地,自给自足。

“那时8月份就下雪,天寒地冻,粮食运不进来,要用骆驼拉。只好半年吃洋芋,吃蒿本,蔬菜基本看不见。”

“刚来新疆,有人写信回家,说平时吃馕饼,文化浅啊,馕字不会写,就写‘狼’。家里人急煞咧,以为给狼当饼子吃掉了!哈哈……”

一晃几年过去,女人们的肚子挺了瘪,瘪了又挺。“我家大女儿三岁了,会走路了,两人天天加班,没人带,一锅开水放在盆里,她被小孩一撞跌了进去,烫伤了,又没处看,死了……老二女儿我娘来接去了,说没人问养不活!”周林凤说。

孩子们该上学了,蜂场哪里有学校?念过初中的吴勤芳、岑爱凤当起了老师,1966年,溧阳人的子女大多上了学,这是复式班,大三岁小三岁的全在一个班。附近居民的孩子也来上了学,包括哈萨克、回民的子弟。学校里面溧阳孩子占大多数,一口家乡话,带得其他孩子都是满口的溧阳话。溧阳话成了蜂场的“场话”!

念到初中,就要上县城了,路上冻得不行,爬犁子要走整整一天。

周林凤到卫生所当了护士,她自学了接生,不管刮风下雪,只要哪家产妇要生了她都会去,成了“马背上的接生婆”。

“二队这边的娃娃。大都是我接的生。”周林凤笑笑说。一个个新生命的诞

生,给蜂场带来了新生气,新希望。

庄锡清、蒋洪珍夫妇在家从事缝纫行业,到蜂场后不久重操旧业,从缝缝补补到新衣裁剪,成了大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行。他们心灵手巧,连少数民族的衣服也都来找他们做。

一片荒凉的蜂场,由于溧阳人的到来,有了房,有了村,有了小镇。

我们在孙孝庚家的小院里,看到种着蒿本(野芹菜)、南瓜、青菜,还有溧阳人吃的野菜——马兰。

“这里原来有荠菜,没有马兰,我回老家把马兰连根带来了,插下去就长。这样年年吃上马兰了。”周林凤说。

鹅,是蜂场的特产。养鹅,也是蜂场人的富业。吴勤劳说:“这里的人原来不会腌鹅,溧阳人来后开始腌制,这样有咸鹅吃了。”

石全英讲,她至今吃不惯羊肉,想念老家新鲜的菜蔬。

四、“轰隆”一声,曾经的花容月貌霎时被毁。为了边疆,他们失去了女孩子最宝贵的脸蛋

那天下井,并没有什么异样。可是刹那间的“轰隆”一声,把整个焦煤厂震动了!

“不好!瓦斯爆炸了!”“井下出事了!”大家纷纷涌向矿井,当五位女工被人搀着走出坑道时,众人惊呆了——她们被烧得面目全非,脸上、手上的皮都耷拉了下来……

五位花儿一样水灵的江南女子,刹那间变成了惨不忍睹的“丑八怪”,有的手指并了,有的嘴烧变形了……她们是:杨凤英、刘桂芳、葛小娥、李富英、陈腊妹。幸运的是她们都活了下来,但活着对她们来说是要承受着正常人想象不到的艰难。

杨凤英后来被分配到场部招待所当服务员。她把招待所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她把每项工作做得一丝不苟。张忠凤说:“她脸丑,心灵很美,是我们心中的劳模!大家都记得她,一位不言不语、勤恳工作的大姐。如今,已不在人世了……”

五朵花儿,如今只剩下刘桂芳和陈腊妹两位还健在。陈腊妹是当年烧得最

重的一位。刘桂芳曾回过家乡生活,但不习惯了,又回到了尼勒克的敬老院安度晚年。

溧阳的好女儿啊,为了边疆,献出了她们的花容月貌。

五、生命,有时像原野上的芨芨草,寒风一吹就枯萎了。他们的身躯与边疆的黑土地合二为一

青春,是春天的花儿,肆意地绽放在唐布拉绿绿的草原上。生命,有时像秋季的芨芨草,寒风吹过,枯萎就在瞬间。

1960年4月,基建队的纪年凤,前马乡人,在打土坑时遭遇塌方,年轻的生命窒息在黄土之中。

陈银妹,戴埠人,到蜂场仅仅三个月,肚子痛,口吐黄水,得不到及时医治,“她痛得不得了,下午跑到我床前看了我一眼,也没说什么,夜里就死了。说是得了绞肠痧!”赵伢回忆。

1961年冬,新昌钱家圩人李木根,煤气中毒,死在自己的地窝子里。

新昌蒋店蒋阿保,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写得一手好字,会吹笛子、拉二胡,是位文艺骨干。1962年下放到乌拉斯台乡(火箭公社),得了急性肝炎,不治身亡。“他也没有亲人在这里,我们几个老乡找了几块木板,钉了口棺材,把他抬到山沟里埋了……”周挺荣回忆道。

彭田勇,在坑井里坐罐笼车下班,头撞上了卷扬机,当场去世。

李新民,南渡镇人,人称“修钢笔佬”。他十二三岁就到上海学徒,学了一身好手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拉一手好二胡。他回家时,把老板的女儿王冬梅也带了回来。王冬梅1959年支边,他1965年也来到了蜂场。“我和他是一批来的,那时苦啊,没荤腥,我们俩就到喀什河边上掏老鸦窝,一收就收一桶蛋,心里想想有点嫌腻,但吃起来味道不错。那时的蜂场老桥是钢丝吊桥,晒麦时为了不让牲口偷吃,我们晚上把牛马赶出去几十里路,让它们慢慢走回家,桥上有木栏,牲口过不来,白天才把牛马放过桥来。李新民喜欢打鱼,他水性好,瞧不起窄窄的喀什河,说:这么宽的河算个屁啊,南渡河大吧?发大水的辰光,老子一手抱块石头,照样踩水过河去!可他偏偏就淹死在喀什河里……”66岁的朱留钊伤感地说。

李新民是和两个外乡人去喀什河的支流网鱼的。返程时,另两个人绕道走远了,他想抄近路,于是就下了河。这位南渡河边长大的“水葫芦”可能不知,喀什河的水是由雪山上的雪融化而下的,非常冷;由于地势落差大,水非常急。他下河以后,就再也没有上来。有人说,他腿起了“胖软筋”,刚喊了一声“救命”就没影了。有人说,他是被人害的,因为老婆长得好看,又会演戏……到了夜里,另两个打鱼人来蜂场打听李新民回家没有,大家这才着了急,赶忙派人沿河去找,可没有一点踪迹。过了几天,下游几十里的吉林台乡来了消息,李新民的尸体挂在河边的杨树丛中……场部派了辆马车,把他拉了回来,葬在马场的旷野里。

生命的无常,常常使我们猝不及防。溧阳的儿女们,从此永别了人世,永别了故乡。

我们采访组在蜂场的几天里,曾爬上博罗科努山的山坡,拍摄小镇的全景。喀什河在山脚下汹涌奔流,天山在天的尽头泛着银光。绿色的草原和黄色的麦田,像一块巨大的调色板,调出一幅幅天然的画卷。

离开蜂场的前夜,周虎场长为我们送行。在哈萨克的毡房里,热情的“伊力老窖”斟满了一杯又一杯。蜂场机关办公室主任池宏伟、农业队书记许忠东,这两位溧阳人的后代也特来作陪。酒过三巡,周虎说:“我为大家唱首歌吧!”他扯开嗓子吼了起来,歌声直率、嘶哑、感人。唱完他说:“这是一首哈萨克民歌,也是情歌,是送给心爱的姑娘的。今天唱的是第一段,你们下次来唱第二段,第三次来唱第三段!”

走出毡房,皎洁的月亮挂在天上,伸手可摘。一排粗壮高大的白杨林耸立在月色中,整齐挺拔。我问周虎:“这是溧阳人种的吗?”他说应该是的。我们相互搀扶着走在月夜里。

我醉了,因为不得不醉,因为不能不醉。

那些葬身异乡的支边青年,他们大都连坟墓都没有了。他们的骨肉,已经和这片黑地融为一体,长成了麦子,化作了白杨,或是不知名的野花。我们想在他们的墓前献一束花,道一声“老乡,我们看你来了!”已经找不到地方。

月夜,我泪流满面。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赛帝玛丽亚。那天我在山上打猎骑着马,正

当你在山下歌唱，婉转如云霞。”

——新疆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一、军功章、奖章、奖状，不仅是荣誉的象征

许沪生、吴勤芳这对溧阳老夫妻，还住在离蜂场十多里地的马场附近，他们还在牧场上照料着牛、羊、马和鸡、鹅。儿子许忠东，现在是场部农业队的书记，在蜂场已盖了二层小楼，正在装修，准备让年老的父母在此安度晚年。

许沪生拿出一只老式皮包，里面珍藏着他一生的荣誉：1998 年度伊犁地区先进工作者、1999 年伊犁地区劳动模范、1999 年伊犁地区农村优秀人才、2000 年“带领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党员‘双带’标兵（伊犁地委颁发）……作为蜂场这么一个小单位，能获得这样多的地区级荣誉，真是非常不容易。“我是城南人，20 岁响应中央支援边疆伟大号召，来到了尼勒克。五十多年来，我们扎根边疆，奉献了青春，奉献了子孙！”许沪生面对摄像机，话讲得有板有眼，而他手中捧着的一摞奖状奖章，却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

吴勤芳说：“我当过老师，这里的娃娃们大多是我的学生。我手上的这枚银元，是奶奶给我的，这么多年来，老头子不晓得，儿子也不晓得，你们来了我今天才拿出来！每次看到银洋钱，我就像看到了老家的奶奶……我会把它传给我的孙子！”眼泪，从她的眼眶中涌出，那枚银元，已被抚得很光，很亮。

袁锁保、吴凤英夫妇的家，在尼勒克县城的喀什河边，河对岸就是城郊的青山。小院里瓜果挂藤，一派农家风格。屋内一张床、一张橱、两张旧沙发，十分简陋。袁锁保催促着，让老伴赶紧把他的军功章拿出来，吴凤英在杂乱的衣堆里捧出一个布包来，摊在床上给我们看。88 岁袁锁保耳有点背，但直腰直背，精神很好。看到勋章，他的眼里放出光来：这是淮海战役纪念章，这是渡江胜利纪念章，这是 1953 年、1954 年志愿军司令部颁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这枚最值钱了，抗战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60% 是纯金制作的……这位 1942 年参加前马新四军的“红小鬼”，曾是陈毅身边警卫团的一员。北撤到盐城，打到日本鬼子投降；渡江解放镇江，打到杭州笕桥机场；渡过鸭绿江，三年零九个月打到三八线……几乎所有重大的战役，他都参加了。在朝鲜的大同江，他积劳成疾，七孔流血，被送回

国,到沈阳军区医院三分院治疗,后又到镇江集训,转业回到前马乡当通讯员,接着被乡里调到芳山煤矿当矿长。

“我是带头支边的,到焦煤厂采煤车间当班长,带7个人。1962年下放到火箭公社当农牧场场长,1977年又回到焦煤厂,后来调到尼勒克煤矿。1981年从原煤厂退休。”说起自己的工作经历,袁锁保很平淡,几十年的艰难困苦,他只字未提。“每到逢年过节,尼勒克县上的领导都要来看望我,参加过抗战的老革命剩下的不多了!我这破院子里,县委书记都来过好几次呢!”他的眼里再次放出光来。

袁锁保讲,1983年他和老伴回去探亲过一次,1987年又回老家把孙子接来了尼勒克,现在孙子已在伊犁当驾驶员了。“还想再回窠里一趟,不晓得还去得成吗?”他咧开没几颗牙的嘴笑了起来。

车,扬起了土尘,开出去一段,我回过头去,老两口还站在院子门口挥手。

二、江南的种子,在天山脚下的黑土地里生根、开花、结果

当1959年第一批溧阳支边青年在新疆扎根后,1965年,他们的亲属不少又来到了尼勒克,当时有个名称叫“接家属”。

朱留钊,南渡北埂人,66岁。他说:“我来新疆时18虚岁,从南京浦口坐6天火车到乌鲁木齐,又坐了3天长途汽车到伊犁,再坐1天车到军马场,那时蜂站还没有通公交车,坐了一天马车才到达焦煤厂。我们一批来了80多人,也是统一组织来的,主要是投亲靠友。”

直到1974年,溧阳的知识青年还有7人来到了尼勒克。

溧阳支边青壮年的到来,一方面解决了边疆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边疆带来了繁衍的人口,使边疆的繁荣和持续发展有了人才的储备。

我抽样问了一下子女的情况。石全英,三个儿子,一个在县城,两个在蜂场。邹琴芳,五个孩子,一个丫头嫁回了溧阳庆丰,四个伢全部在蜂场。吴勤芳,一个女儿嫁回溧阳,四个儿子全部在蜂场。周林凤,四个孩子两个在尼勒克,两个在蜂场。蒋洪妹,生了三男四女七个孩子,一个在上海,六个在新疆……他们都已是爷爷、奶奶级的老人,加上接来的“家属”,总共给新疆带来了多少人口,没有谁统计过。

当年的 533 颗江南的种子,在边疆生根、开花,由小草长成了草地,由草地繁衍成了一片草原。

溧阳人的后代都较优秀,他们有的走上了自治区部门的领导岗位,有的在州、县上成了经济建设的骨干,有的勤劳致富当上了老板,有的平平凡凡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三、乡情,是一杯浓得化不开的酒,呷一口就会醉

我们一直想找一位会讲流利溧阳话的少数民族同胞。

在蜂场,说有一位哈萨克大姐溧阳话地道得很,但搬到县城去住了。后来,找来一位在邮局工作的哈族大哥,会讲简单的几句:“谢谢!”“吃饭!”但他和老婆溧阳话几乎都听得懂,在孙孝庚家里我们用家乡话聊天,他们不时插话。孙孝庚说他的小舅子曾跟他学开拖拉机,溧阳话讲得听不出是哈族人,可惜有一天喝醉了酒在雪地里冻死了。

孙孝庚的房子原是场部领导住的,他买了下来。灶头是烧煤的,有暖气管取暖。刚做好的馒头上笼蒸着,生活习惯已经本土化了。周林凤说:“我们回去过几次,大女儿在上海开刀,住了几个月。但老家夏天热冬天冷,已经住不习惯了。我们俩打算最后再回老家看一次,就不回去了。两口喜材已经做好了,放在大儿子家,我们自己花的钱,不要给细佬家添负担。这里是好晒棺材的。”

蜂场唯一的一家汉餐厅,是孙孝庚、周林凤的大儿子开的。我们两桌老乡,聚在这万里之外的地方,真是不易。餐桌上有喀什河里的冷水鱼,还有周林凤带来的拌马兰。大家吃着,喝着,叙着,不知是谁提议:“我们唱首歌吧!”“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大家边唱边拍手,那张张不再年轻的脸,仿佛回到了五十多年前……

我坐在阿姨们一桌,自称“洪常青”,一直劝着她们多吃点菜,有空常回家看看。告别的时候到了,阿姨们个个眼里闪着泪花:“谢谢你们,娘家人!你们要常来看我们得啰……”握着她们粗糙的双手,我也热泪盈眶。

史福林、朱亚兰夫妇的家,在尼勒克县城的中心一幢楼房内。室内收拾得整洁干净,一尘不染,现代化的家电一样不缺,一点不比内地家庭差。阳台上种着花花草草,一棵硕大的玉树引人注目,主人说树龄已有二十多年了。史福林拿出

那本记录着 533 位溧阳支边人员的笔记本,郑重地翻过一页,又一页,好像在翻阅着往日的岁月。“我是这批支边人员里学历最高的一位,也只念到高一,到焦煤厂在生产科工作,所以对每个人员都较熟悉。你看这名单里的人,有的去世了,有的跟着儿女去了伊犁、乌鲁木齐,有的回了老家,好多在尼勒克。我们平时也不多往来,但只要谁家有红白喜事,一个电话,大家又会聚到一起。不管多远,再忙点也会去。我今年 85 岁了,老太婆也 80 岁了。原来还有个想法,老了能埋在窠里的土里,叶落归根,但子女们都在这边,清明节让他们怎么上坟?”史福林笑了笑。这无奈的笑容里,有对故乡刻骨的铭记,有对第二故乡不舍的眷恋。

史福林告诉我们,溧阳支边人员的晚年相对是幸福的,平均能拿到 2 000 多元一个月的退休工资,享受医疗保险,对房价只有三千元一平方的尼勒克来讲,生活应该无忧无虑,但各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子女条件不好,老人要帮衬,要苦点。

蜂场纪检副书记张忠凤讲:“溧阳的支边人员吃的苦太多了,晚年应该享享福!你们溧阳人很讲义气,平时看不出来,一到哪家有点什么事,全过来帮忙。有回老家探亲的,回来会带竹篮、竹筐、扁担等竹制品,新疆没有啊!还会带芝麻、油炸糍、团子、元宵等,真好吃啊!就是千辛万苦带回来一袋大米,也会挨家一碗一碗送,当年煮稀饭喝,香啊!”

戴埠帝商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庄子文讲:“我父母都是 1959 年支边的,一个妹妹两个弟弟都生在新疆。他们回来后,只要一听到新疆来人了,都要见见面,都要请吃饭!有感情啊!”

潘荷仙说:“我家每年要接待蜂场原来的支边人员,有的住半个月,大家像亲人一样!回家养老的几十个老支边,大家有事也经常聚聚。你们到尼勒克采访,他们都来电话告诉我们!”

记得在尼勒克的座谈会上,不少老乡亲也提出了自己的愿望:能不能组织溧阳支边人员回家乡参观一次?能不能颁发一枚支援边疆 50 周年纪念章?能不能把子孙迁回老家读书就业?能不能把尼勒克的工资、医保迁到溧阳发放?他们能提这些愿望,不正是对家乡、对“窠里”的信任和期盼吗?虽然有的难以如愿,有的有待时日,但言谈之间,对家乡溧阳,他们充满自豪,充满祝愿!

在唐布拉饭店,尼勒克县政府请溧阳支边人员用便餐,尼勒克电视台也赶来采访。我用茶一个个敬叔叔阿姨们,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辛苦啦!”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话语来。送别他们,望着那一个个步履不再矫健的背影,一句“再见”,在万里之外的边疆,分量很重,很重。

四、“奉献青春献终身,奉献终身献子孙”

旧县乡荡口村当年支边的人共有6名,其中沈洪保朱爱凤和蒋阿只朱凤仙是两对夫妻,沈锁明沈留妹是一对兄妹。沈洪保(78岁)和妻子朱爱凤(74岁),两家隔开一条河,女方是后荡北村人。朱爱凤说:“我们去新疆时已经结婚了,焦煤厂关门后,我们又到蜂场二队种田,后又上马,又关门,我们俩被分配到尼勒克县医院工作,老头子做会计,我在托儿所上班。退休后,沈洪保于2001年去世,我们共有5个孩子,分别在伊犁和尼勒克工作。2004年,我回过一趟溧阳,家乡变化太大了!”

蒋阿只(77岁)说:“我去支边时是23岁,老婆朱凤仙20岁,我们已经成亲了,但没有细佬。当时规定一个大队只有五个名额去支边,但到最后了南渡镇还缺两个人,打电话到大队里问,当时负责支边工作的人叫沈福保,他问我去吗?我说要去!但到了南渡说我不符合条件,因为家里是独子,我揉(泡)了一整天好说歹说才同意。到焦煤厂后,住的地窝子,一落雨漏得不得了,上面弄点草盖盖能不漏吗?我在井下挖煤,朱凤仙在炼焦,吃了不少苦呀!焦煤厂关门后,我和老婆一起被分到尼勒克公路处养路队,修通往各乡镇的道路。1999年,朱凤仙出了车祸,我们到伊犁医治后就住了下来。现在6个细佬,2个在乌鲁木齐,4个在伊犁。今年四月刚回过老家,变化太大了,记得沙河水库我还去挑过土,现在变成风景区了。回到荡口村上,村上人客气的不得了,家家请吃饭,城里的亲戚也留我们住几天!要经常回老家看看!”

蒋阿只讲,沈锁明(80岁)已经去世了,5个小孩在尼勒克。他的妈妈沈留妹,很早就嫁到安徽去了。

潘荷仙是马垫村人,1974年“嫁”到了蜂场。她去年带着全家重返新疆旅游。她的儿媳,一位小学老师讲:“妈妈,新疆风景真是太美了!这里就是天堂!你们怎么舍得回去的?”潘荷仙苦笑笑。“当年,我对新疆的了解,就是电影《草原

英雄小姐妹》上的草原，牛羊成群，蓝天白云。可等坐了多少天的车子一到蜂场，这么荒凉，这么冷清，我死也不肯下车，求客车司机把我带回城里。现在想想真是好笑！年轻人，他们哪里知道当年支边的艰苦！”

岁月匆匆，五十多年前的影像已经模糊。时光流逝，流走的是一个鲜活记忆。我们无意去渲染当年支边生活的艰难无助，也无心去夸大支边青年的无私奉献。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记录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岁月，和这一群普普通通的溧阳人。

记得一位老乡曾说：你们能来，就表明家乡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就是家乡政府对我们最大的关怀！

乡音，是交流的媒介。五十多年前的江南俊男美女，如今都已是爷爷奶奶了，垂垂老矣！但无改的是乡音，不变的是乡情。在我们的交谈中，一旦谁要用“新疆普通话”，边上马上会有人讲：“说溧阳话！不要江北驴子学马叫咧！”顽固的坚守，使溧阳方言得以在边疆流行。

我们采访组一直想采访一下尼勒克县副县长王强先生，据说他在蜂场和溧阳的孩子一起长大，一口溧阳话标准流利，可惜的是他上乌鲁木齐开会了。在尼勒克挂职的武进区的杨副书记告诉我们，王强曾问他，“绑身”是什么？“絮裤”又是什么？他也不知所言。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在新疆采访期间，我们曾打算赴乌鲁木齐采访一下“油运师”的支边溧阳人，但不巧，联系的两位老乡都出差了。好在不久，“新疆新通集团”副总经理郭富松回到了溧阳。他向我们描述了这批被分配到“中国石油运输公司”的支边青年的艰苦奋斗史。戈壁上住地窝子，一天劳作十几个小时，一月来回跑 28 趟独山子，冬天零下三十几度大雪封山跑长途……新疆第二运输公司（新通集团）大部分都是溧阳人，他们为建设边疆，战斗在“四个轮子”的征途上，无怨无悔，给家乡添光彩！我想有机会该续写一篇“轮子上的新疆溧阳人”。

我们在尼勒克期间，巧遇了“瑞峰建设集团”的宋锁林指挥长，他带领一支几百人的溧阳施工队，在建设“尼勒克一号工程”迎宾大道。后来，又在伊犁遇上江苏交通科学研究院新疆分院院长陈国华，他也是溧阳人，在此从事援建工程。他说，溧阳人在这里干“援建”的不少。支援边疆，代代相承，溧阳人在做着新贡献。

尼勒克县委书记周立新，父亲是上海“支青”，建立了尼勒克第一个气象站；

母亲是天津籍“支青”，曾任蜂场的组织部长，好多溧阳人认识她。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周书记说：“溧阳来的支边人员，当年生活很艰苦，住的地窝子，吃的是洋芋，他们为边疆建设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终身，现在又奉献了子孙！我们今天这样的美好生活，和他们的奉献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应忘了他们！”

主要参考书目

1. 康熙《溧阳县志》，徐一经纂修，清康熙六年(1667年)刻本。
2. 乾隆《溧阳县志》，吴学濂纂修，清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
3. 嘉庆《溧阳县志》，陈鸿寿纂修，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刻本。
4. 光绪《溧阳县续志》，朱峻、冯煦纂修，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
5. 《溧阳古诗选》(上、下)，溧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2月。
6.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溧阳县资料本》，溧阳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1989年5月。
7. 《溧阳史话》，孙瑞麟著，溧阳市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内部资料)。
8. 《李太白全集》，王琦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
9. 《孟郊集校注》，韩泉欣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0. 《清诗别裁集》，沈德潜编，中华书局1975年版。
11. 《随园诗话》，袁枚著，王英志校点，凤凰出版社2000年版。
12. 《陈鸿寿印谱》，香港博雅斋1978年3月版。
13. 《陈鸿寿篆刻》，孙慰祖编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14. 《西泠八家印选》，丁仁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5. 《中国篆刻丛刊 陈豫钟 陈鸿寿卷》，小林斗盦著，日本二玄社1982年版。
16. 《陈鸿寿的书法》，林田芳园著，日本二玄社1997年版。
17. 《中国书法家全集 伊秉绶 陈鸿寿》，金丹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8. 《曼生与曼生壶》，黄振辉编著，台湾艺术家出版社2006年版。
19. 《曼生遗韵》，唐云艺术馆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20. 《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2005年12月联合出版。

- 21.《清陈曼生花卉册》，陈鸿寿著，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2 年版。
- 22.《陈鸿寿书孙夫人墓志铭》，陈鸿寿著，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2 年版。
- 23.《紫砂壶全书》，韩其楼著，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4 年版。
- 24.《智龕品壶录》，郭若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 25.《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姜丹书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 26.《丹枫红叶楼诗词集》，姜丹书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
- 27.《现代报业巨子史量才》，庞荣棣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 28.《艺海一勺》，郑逸梅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 29.《艺海一勺续编》，郑逸梅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 30.《艺坛百影》郑逸梅著，中国书画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版。
- 31.《平等阁笔记》，狄平子著，有正书局民国二年十月版。
- 32.《平等阁诗话》，狄平子著，有正书局民国二年十月版。

后 记

陈鸿寿主编的《嘉庆溧阳县志》上，汪小迂画的《名胜图》第二幅，即是“投金濂”：“投金濂，子胥报史贞女处。湘垒博谿，溧女耿介，万古忠贞，浅又石濂。”濂江奔涌千年，激扬平陵往昔。也许是伍子胥当年投下了三斗三升金瓜子，濂水蕴藏着宝物，沉淀着故事。生活在濂江两岸的人们，代代总有收获。

我也想学那鬻河的人，泥里捞宝，钩捞起沉埋濂水里的一二粒金瓜子。

老友打来电话，说某古玩店新到一批砖头，有几块上面有文字，如要，赶紧下手，不然下午即有常州人来提货。我不敢耽搁。小店的桌下堆着一摞大砖，二十几块，店主抽出其中一块放到桌上，言是人家拆房子发现的，你要给你，不要马上有人来拿，车都联系好了。砖的尺寸较大，上面的老石灰尚存，横头有“溧阳县正堂 宜兴汤义隆行做”的阳文字样，应是老溧阳县衙门的正堂砖无疑。没有讨价还价，回家取钱，留住这批有老溧阳印记的东西再说。接着，打电话给老同学：我有一批老县衙的正堂砖，你不是在筹建博物馆吗？正好，拿去用吧！展示出来，让大家有个念想。

为何提这件事情？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道理，物和人是有缘的。当带有文化标记的物件与你擦肩邂逅，你该怎么做？是任由这种邂逅变成永别？还是尽心尽力地去挽留住这份机缘？

当母亲的学生宋国庆风尘仆仆从大庆赶来我家，捧出那本先人宋晋的《水流云在馆诗钞》，他的脸上满是忏悔的歉意，他的眼中满是对文化遗产的渴望。“文革”中，他烧掉了祖宗像，烧掉了珍贵字画，家中只无意中剩下这本诗钞的初稿，他想要付梓重印。他想要在晚年，向祖先表达一下对年少时轻狂无知的追悔，他想要让传统的文化不要湮没在时间的长河。我深深被他感动了。诗钞重印后，我帮他送到图书馆和档案馆，让今人借阅，让后人铭记。

时空的变迁,岁月的更迭,自然的损毁,人为的祸害,使多少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我们睽违,与我们诀别,与我们陌生,与我们隔绝。像宋国庆这样的人太少了。我们犯了错。人哪会不犯错呢?如果仅仅是一声“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去反思反省,不去忏悔补过,那真是对不起列祖列宗。如果我们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时代推给社会,而不去探究自己灵魂深处的良知,那做人将是失败的。

文化是根。没有文化的生命,像无根的浮萍,随波逐浪,找不到繁衍的土壤,终将枯萎。文脉是命脉,她记录着先人智慧的结晶,记录着古人苦乐的表情,记录着前人喜怒的脉搏,记录着地方文化代代传承的脉络和轨迹。

那么,文化是什么?地方文化又在哪里?

乾隆县令吴学濂撰文述:“溧阳,春秋陵平旧地、固城湖其址也。自伍员北伐,山为胥山,河为胥河。而投金濂之名著《吴越春秋》间。李谪仙所云:风号吴天,月苦荆水,令人生凭吊之思。”“自惟溧邑自春秋以迄唐宋元明,山有石屋、伍牙、芝峰白石之奇,水有五堰、洮湖、九阳千里之胜,烟峦合沓,波澜壮阔,昔称畿辅,控扼江湖,距海不及三百里,宁非东南形胜要害区哉!今亦既庶且繁矣!人材蔚起,数百年来笋班玉立,忠义著于南宋,文物盛于熙朝,宁非观风者所弦颂而传述乎?”

山水孕育风物风情,地域承载人文人才,吴县令的概括,不可谓不精辟也。春秋有名,秦朝设县,东南形胜,京畿要辅,山峦奇胜,波澜壮阔,伍员留迹,诗仙传歌……对于一个千年古邑而言,溧阳的地方文化,不可谓不精彩也!

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穿越时空,去看一看历史舞台上那一个个人物的精彩,那一个个故事的精彩,那一样样文化的精彩!

打开陈鸿寿主编的清嘉庆《溧阳县志》,在《艺文志》一辑里,从东汉到明清,“经”、“史”、“子”、“集”部,共有134位作者写有191部著作,它们在哪里?是恭列宝殿书馆,还是散落民间私藏?是完整无缺静候翻阅,还是散佚消失不见踪影?

我留意寻觅。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各大图书馆只要有机会都要去查询。听说南京古籍图书馆有狄斯彬的《山居野志》,去借阅被告知因是孤本概不外借。我渐渐明白,史料文献浩如烟海,地方古籍沧海一粟,能保存下来本身就是奇迹,哪容你个业余人士随意翻阅?溧阳图书馆馆长宋国忠先生雪中送炭,他

利用内部资料网络，觅得了一部部珍贵的地方名人文集，读之如醍醐灌顶，如甘醴暖胸。

在繁华的霓虹中，守一盏清灯夜读，享受寂寞带来的那份神定气闲，那份书润卷香。手捧古籍，仿佛与古人对晤。马一龙、马世俊、陈名夏、宋之绳、狄云鼎、史炳、狄平子、姜丹书……他们一一如约而至，在字里行间诉读心声，在诗话尺牍陈述见解。与他们交流，才知天之高地之厚，才知心之广胸之阔。

促使我拿起笔来，想写点什么，还有两件小事。

随着经济大潮的汹涌，历史文化的记忆正在加速消失。就我们溧阳而言，小时候的古街老巷，仿佛在一夜间拆除了，不见了，永别了。码头街、碑林巷、双桥、老公园、大同巷、露园巷、渡船口、堽坊场、三十亩、夏桥、胥渚桥、石牌坊、谢婆园、宝塔湾……仅仅才多少年？荡然无存矣。剩下的，只是不全的几张泛黄照片，还有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印记。我写了一篇《怀念码头街》，发表在报刊上，后又被贴在网络论坛上。令人没想到的是，竟会有那么多的跟帖，那么强的反响。当怀旧不仅是对过去岁月的回忆，当怀念成为对传统文化的追思，一石激起千层浪，共鸣的涟漪一圈圈地散发开去。我这才明白，有这么多人在关注着传统，关注着文化。

我是个不会上网的人。偶然的机，我在手机上读到一位貌似女性的人，写了一段评论，大意是“溧阳人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因此自古到今没出过什么大人才！远的不说，宜兴有徐悲鸿、吴冠中，金坛有段玉裁、华罗庚，你溧阳报出个响当当的人物我听听呢？”语言尖刻偏执，我很气愤。一气这位“女士”的孤陋寡闻，以点概面；二气我们自己对地方历史名人的研究宣传远远不足。

一正一反这两件小事，刺激我写点文字出来，以不薄今人，不负古人。

当一摞摞文集资料堆在桌前，我犹豫了，恐惧了，害怕了。一人多高的古纸堆，全是没有标点没有注释没有参照的文言文，有的是字迹不清的影印件，有的是全凭手抄的书写字，有的是早已不用的异体字，有的是字典上查不到的生僻字……这不是一项工作，而是一项工程！凭我这么一个才疏学浅、才智低下的寒士，能胜任吗？

我咬牙坚持。抱着“黄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的想法，揣着“写一篇是一篇，写两篇赚一篇”的心理，我摸着石头过河。好在以前曾在外地报刊上发表过

一些论文,在当地报刊上也发过一些文章,而像《高士芮长恤》、《马一龙其人其事》、《戴庆祖与“土木之变”》、《徐悲鸿的溧阳缘》、《良渚瑰宝梅岭玉》等等新写的篇章,在报刊上一经发表均有一定反响,也坚定了我写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濼水钩沉,你得沉得下去才能钩起历史。平陵撷拾,你得踏遍平陵才能有所收获。我自知自己远远做不到。但有几点我是刻意去做的:尽量不去重复别人,尽量少用或不用熟知的史料,尽量用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尽量保持原文的风貌,尽量传递古人的文化信息,尽量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

我做到了吗?不知道。

阅字几百万,写字几十万,历时三年余,成文百余篇。这就是这本书的经历过程。

我深知自己的浅薄愚钝,深知书文的错误疏漏。我也深知自己的出发点的天真和纯真:三年多的时间里,两鬓飞雪,经历坎坷,一天十几小时的呆坐,一笔一划几十万字的书写(我不会用电脑,只会用人脑,愚笨由此可窥)……

天生愚笨,但“蛮人有蛮福”。我得到了许多人无私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溧阳广播电视台的扶助,为了本书的出版,他们几经专题讨论,予以重点扶持。南师大博导、经济伦理学的领军人物王小锡先生,一看到敝书的目录就表态:“让我来帮助你吧!也算是我为家乡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从书稿打印到出版谋划,王院长给予了热心的支持和热情的支助,令人十分感动。他在百忙中还抽空为本书作序,这不是对我个人有何看好,而是对家乡故园的一片深情!溧阳籍著名书法家、北师大副教授虞晓勇两次为本书题写书名,他见此书写的是家乡文化,表态说:“阿哥,要怎么写,你讲!”一个书名题写了几种字体备选,令人感激!感谢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爱文先生的鼓动和帮助。原市人大副主任沈福新、市政协副主席崔文敏、市电视台台长沈伟为本书的写作出谋策划、亲自校点。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陶洪昌、史建明为本书出版予以大力帮助。吕正立先生拿出了他多年珍藏的八卦掌史料,江如福先生对本书涉及的书法内容予以多次指导。孙彬、芮文静夫妇为本书的打印编排费心尽力,史春华女士、宋军荣先生、奚兰女士也帮助颇多,姚爱娟老师、蒋立文主任、程立先生为本书费心校勘捉错。当然,还有溧阳图书馆的宋国忠先生,他是本书写作的“资料库”;杭州宋一洲先生给本书以许多帮助,对宋氏诸篇进行了认真校点。南师大出版社社长彭志斌、

濂水钩沉

副总编戴联荣,对本书出版也是颇费心思。特感荣幸的是中国出版界的传奇版式设计者朱赢椿先生和罗薇女士为本书设计了装帧和封面。要谢的人很多,原諒在此不一一列举。

《濂水钩沉》一辑,主要是记写古代风物和人物;《平陵摭拾》则主要是写近现代的地方文化。由于撰写时间、内容、目的的不同,风格体例上亦有不同。为力求史料的真实和内容的翔实,本书尽量引用、摘录史籍原文,以减少文白之间的差异与歧义。由于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古籍原文,在辨字、断句、析义上肯定有许多谬误疏漏,实是本人的拙劣,望读者谅解。

溧阳,生我养我的地方。喝了濂江奔涌的河水,流淌成血液;吃了平陵盛产的稻米,发育成身板。为她做点事,理所应当,无怨无悔。

保护遗留古迹,守护传统文化。古迹怎样保护?传统如何守护?这也许是我们大家都应深思的问题。但愿文化的接力棒不要中断在我们的手上!这也是本书的初衷和祈愿。

写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濂上灯下